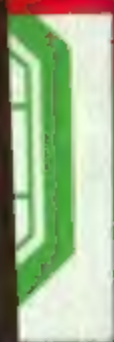


〔英〕艾伦·帕尔默 著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商务印书馆





国防大学 2 065 9778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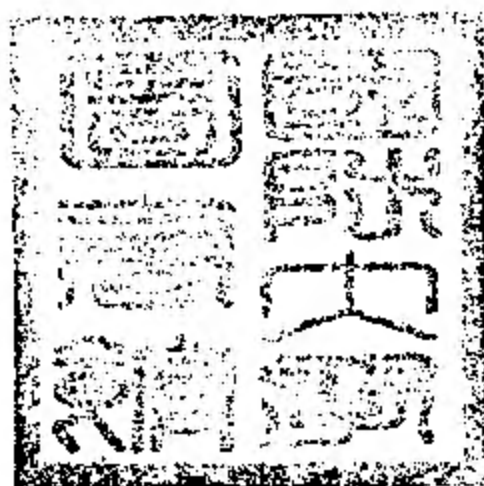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英〕艾伦·帕尔默 著

于亚伦 王守义 王爵鸾 译
冯世则 张蓉燕 赵振远

黄席群 译校



商务印书馆

1997年·北京

Alan Palmer

THE LANDS BETWEEN

A History of East-Central Europe
sinc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London

根据伦敦威登菲尔德—尼科尔森出版公司1970年版译出

JIǎFÈNG ZHōNG DE LIùGUÓ

夹缝中的六国

——维也纳会议以来的中东欧历史

〔英〕艾伦·帕尔默 著

于亚伦 王守义 王皓雯 译
冯世则 张蓉燕 赵振远

黄席群 译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8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三河市艺苑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1579-0/K · 363

1997年11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97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字数 384 千

印数 3000 册

印张 15 1/8

定价：21.3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艾伦·帕尔默是英国历史学家，对东欧历史有一定的研究，著有《近代历史词典(1789—1945)》、《南斯拉夫史》、《拿破仑在俄国》、《独立的东欧》等书。《夹缝中的六国》是他的重要著作之一。中译本根据伦敦1970年版本译出。

本书是一本中东欧地区史。书中详细地叙述了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六国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以来到战后1968年的历史。由于作者是从这个地区各国各民族人民历来遭受邻近大国德、意、奥、俄的侵略、兼并、凌辱，到起而反抗、争取民族独立为主题来写作的，因而本书也涉及了这些“夹在中间的国家”与邻近大国的关系史，其中包括苏联与东欧之间的内幕情况。书中的主要内容有：东欧各国民族复兴运动的发展；摆脱异族统治、大国控制，建立民族国家；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及各国所作出的反应；反法西斯斗争的胜利到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东欧各国的影响；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经过情况等。作者在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对重要的历史人物也作了扼要的介绍。本书所提供的史料，对我们了解和研究东欧的历史与现状，以及苏联与东欧的关系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书作者是西方的历史学家。他的政治态度和历史观点无疑会在作者对中东欧历史的评述中反映出来。作者在书中表达的对一些事件的看法和对某些人物的评价只是一家之言。我们相信读者在阅读时定会自行分析判断。

本书有地图九幅，附录中有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参考书目及索引，均照原图原文译出。

目 录

序言	1
第一章 欧洲的交界地区	3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和最初的民族起义	31
第三章 街垒的年代	55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风云	91
第五章 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	115
第六章 走向萨拉热窝	130
第七章 “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	151
第八章 缔造和平	188
第九章 民主幻想与现实	217
第十章 右倾	257
第十一章 德国潮	282
第十二章 贰心	317
第十三章 苏联的影响	356
第十四章 打翻塑像	394
第十五章 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	408
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	437
参考书目	452
索引	464

地 图

1. 夹缝中的六国地形	5
2. 1830—1914 年的巴尔干国家	51
3. 1815—1918 年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71
4. 1815—1918 年的波兰	196
5. 1919—1939 年的波兰	196
6. 1923—1938 年的东欧	220
7. 希特勒的东欧(1938 年 3 月—1941 年 6 月)	283
8. 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	364
9. 1945 年以来的波兰	376

序 言

本书旨在初步探讨西面与德意两国，东面与俄国接壤的几个夹缝中的国家最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在政治方面的发展情况。因此，主要涉及今天建立于东欧的六国，即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最广义地来讲，历史不必尊重国界，所以本书作者在行文之际，间或超越这一区域严格的地理界限，而对德国、奥地利以及南北边缘地区发生的重大事件，只在与本书主题有关时才加以论述——所谓主题，指的是沿中欧边境地区各民族的命运及其对诸强大邻邦经常反复威胁其独立时所作的反应。

主要各章叙述维也纳会议以来 19 和 20 世纪的历史。但全书一开始，便概述维斯杜拉河流域、多瑙河流域与巴尔干半岛各国的地貌，并对其历史背景略加描绘，借以表明遥远的过去如何为本地区各民族创造了一些经久不朽的传奇故事。至于以何时作为本书的下限而搁笔，则煞费推敲。本书绝大部分写于 1967 和 1968 年，而且在写作过程中，逐日的新闻报导使我愈来愈意识到，相继发生的每一紧急事件乃是不断变化中具有连续性的一个事例，并非某一时代明显的终点。我于是决定把这段历史一直写到 1968 年 11 月为止。这倒不是因为这个日期本身在东欧有什么重要意义，而是因为它标志着旧日一些超国家的帝国灭亡的五十周年，也是本地区近代史上唯一截然鲜明的分界线。在名义上的独立届满一个半世纪之期，作为纪念的并非像人们所希望的庆祝其进步与成就，反倒是在 1918 年建成的一个全新的共和国领土上出现了一支占领军，这不啻是对中东欧的长期不安全所作的一条令人黯然神伤

的注释。

爱国主义思想往往给欧洲一部分地区的民族性格刻下了深深的自豪感的痕迹，让一个外国人来叙述它的历史，由于显然缺乏同情的理解，难免有冒犯这些国家的人民的危险。我虽是以一个英国人的身份来写这些国家的历史，但我这人却相信，六国之中的每一个国家都和不列颠一样有值得大加敬佩的和偶尔也应受到非难的历史遗产。政治领袖们既非神人，亦非魔鬼；他们同样有凡人的优缺点。只因身居高位，其过失便被人夸大了。因为他们的职司举足轻重，关系国家之安危，致使企图解释其一举一动的人们在衡量功过之时，难以持平。看来，我亦难免偏颇，谨此特表歉意。

只须稍一浏览本书所附参考书目，人人都可发现我对这一学术领域的专家学者所负良多。我特别感谢 A. J. P. 泰勒先生，我青年时代在大学就读时，某一学期承蒙他担任我的导师，实属幸运；这时，他激发起我对中欧的兴趣。已故 R. W. 塞顿-沃森教授在牛津大学发表最后一系列演讲的某一讲结束后，容许我多方请教，问个不休，他那诲人不倦、和蔼可亲的精神，亦令我铭记在心。我极其感激 C. A. 马卡特尼博士；五十年代后期，我曾荣幸地同他合作撰成《独立的东欧》一书。倘若没有他的启迪，我未必会就世界这一部分写出只字片语，尽管长期以来，它一直吸引着我。自然，下列各章的一切判断和解释，均由我一人负责。

对于在海格特和其他地方鼓励我写这本书的朋友们，我当然也深为感谢。唯一与我逐章逐节仔细讨论的，是我的妻子维罗尼卡；我感谢她对本书原稿的严格评论，也感谢她陪伴我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并一同赴巴尔干各国旅行途中所给予的帮助。

艾伦·帕尔默

1969年2月于海格特

第一章 欧洲的交界地区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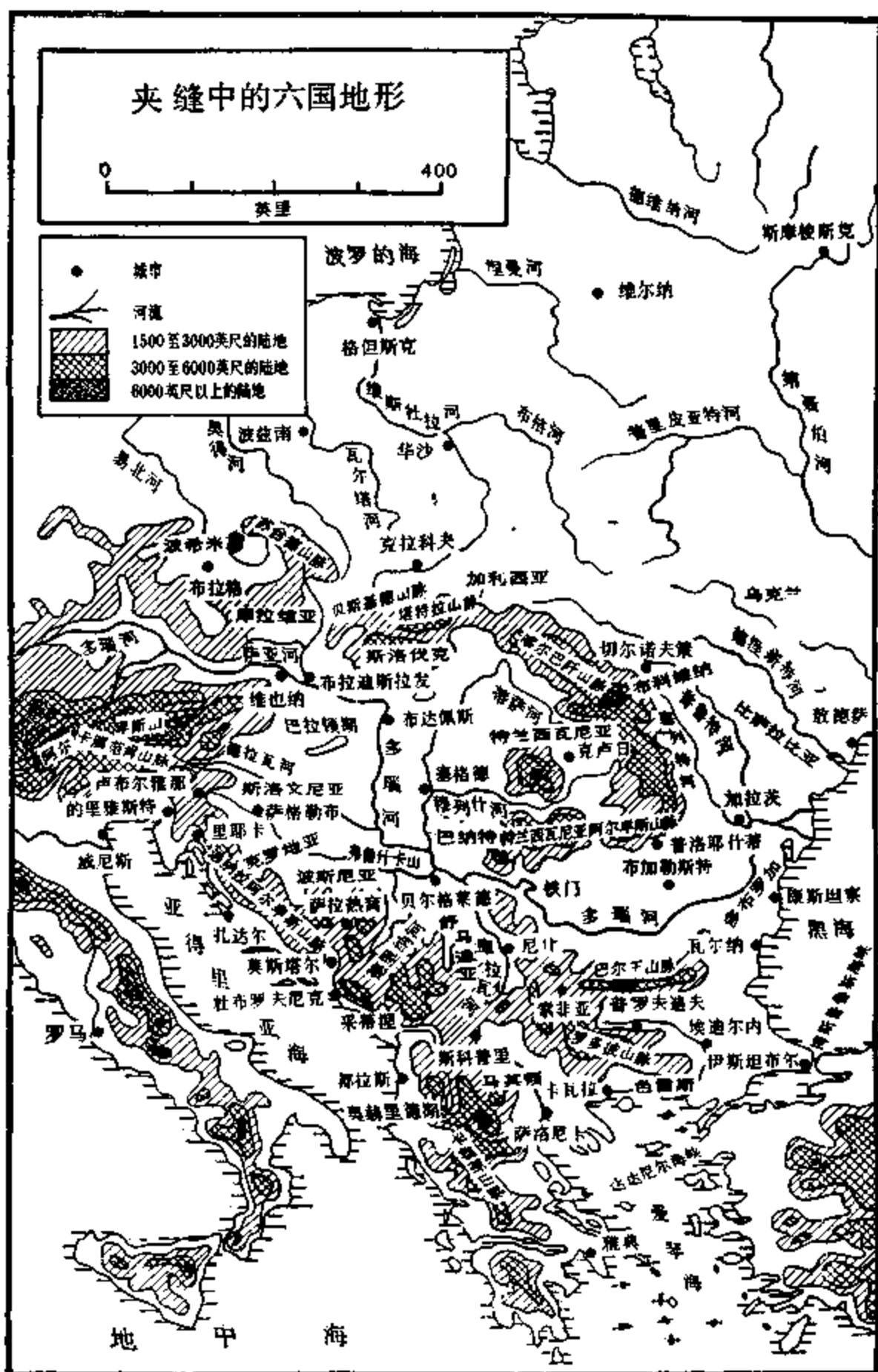
欧洲各族人民截然不同的命运是地图预先注定的。大陆西边的海岸与山脉早就决定了各个民族国家的布局，而如果说这些民族国家的形成曾被推迟的话，那不仅应归咎于地理条件，也得归咎于人的偏见。比利牛斯山脉与阿尔卑斯山脉并非不可逾越的屏障，但正像英吉利海峡那样，只是很少被入侵的军队跨越过。而中东欧的情况则截然不同。把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同俄国分隔开来的那些国家缺少天然疆界，它们好像是一些只有脊椎和动脉而没有外壳的生物体，不多的几条山脉都被河流切断，便不能阻绝游牧部落，也抵挡不了一支所向披靡、攻无不克的军队；唯有那一望无垠的灰绿色波涛起伏似的草原构成的海洋，延绵不断地伸入欧亚大平原。这一辽阔的地区，既对东方游牧民族敞开门户，又吸引着西方人前来殖民；于是，尽管其面积不到西欧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却成为至少十五个不同民族的家园。

在地理上，中东欧自然而然地分为三部分：维斯杜拉盆地、多瑙河盆地和巴尔干山脉。但因三者之间有些过渡地带，又由于大马蹄形的喀尔巴阡山的中央主要山汇将多瑙河盆地分割为二，这一格局便随之复杂化了，尽管其基本构形并未改变，而且，地理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有时是地理与当代政治的相互作用——使旅行者可能看到一些相距不过数英里的村落却各自有突然不同的社会特征，这种情况在世界其他地区实属罕见。在欧洲的这一部分，局部的变化常使普遍性的地理规律不起作用，并且迫使历史的判断语成为附在括号里的修饰语。

3

2 维斯杜拉河发源于喀尔巴阡山的西贝斯基德山脉，北流六百五十英里，在格但斯克(但泽)注入波罗的海。这一流速缓慢、弯弯曲曲的河流是条大于贸易路线的航道；在历时一千年的政治变迁中，它始终是波兰民族的轴心，也是将华沙与克拉科夫两城以及加利西亚一些大庄园与波罗的海沿岸连成一气的统一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条神秘的河；当波兰国在政治上一潭死水、复兴大业似乎遥遥无期之际，它挽救了波兰的民族精神。说得更实际些，是它灌溉着波兰平原；自北而南三百余英里延绵起伏毫无定形的田地里栽种着小麦、甜菜和裸麦；中间到处是些森林和沼泽地，而在马祖里，还被沙质土壤中四围是芦苇的不少湖泊所隔断。维斯杜拉盆地在西里西亚以一个坡度不高的带状丘陵地形而告结束；然后地势上升，终于进入苏台德山脉；更东则成为贝斯基德山脉；这里，水流平缓的条条溪流之间，隆起座座软质岩丘，山口宽而且低。在盆地的东南，维斯杜拉河的主要支流布格河排泄着东部沼泽的积水，因而将这一带平原的沃土带到乌克兰谷仓，并沿着德涅斯特河直达黑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雅尔塔及波茨坦会议以来，波兰人控制了另一条通航的大河；1945年，奥得河的东岸及其整个支流瓦尔塔河均并入波兰共和国版图，使维斯杜拉地区补充成一幅完整的地理型态。与此同时，在东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期的地图上标志属于波兰的土地，几乎一半沦于苏联之手，布格河下游于是变成了两国的边界，不再是一条内地的航道。波兰国界线如此全部西移，其情况与过去二百年间民族的发展历史恰恰相反。虽然其后果无论对波兰人还是对德国人都同样痛苦，但这不过是地理强加给波兰历史的悲剧性负担的一个近例；既然维斯杜拉平原可使从腹背两侧进犯的敌军都易于攻入，波兰的边界便反复变迁，因此她成



为以往几世纪里欧洲唯一一个版图不定的国家。三百年前，其东部边界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距莫斯科不过九十英里；那时她是欧洲大陆上领土最大的国家（除了尚未发达的俄国大片土地以外）。今日波兰东部领土最突出的部分在其17世纪时的边界以西五百英里处，而她与德国的边界却推进到奥得河，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一百五十英里。

一个民族的家园如此移动，这在近代世界史上幸而仅属独一无二。在这些变迁过程中，维斯杜拉河沿岸各城市的波兰特色、其巴罗克式建筑以及强烈的宗教感情始终保持未变；因为，尽管波兰已在1795年从政治地图上一笔勾销，直到1918年才恢复为一个独立国，但她对一种共同的文化与传统——西方的和天主教的，但却是斯拉夫式的——的自觉使其民族意识（虽受到德意志各国与俄罗斯的强烈影响）却得以保存下来。

边界既然如此显著地时而扩张、时而收缩，所以波兰在种族上从来就不是单一的，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第一个波兰国在10世纪中期兴起，当时有六个斯拉夫部落长期定居于奥得河南段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平原上，联合抵御他们的德意志与波希米亚邻邦，并于公元960年接受了近乎神话的皮亚斯特家族的军事领袖梅什科作为自己的统治者。波兰人也像其他斯拉夫民族那样，将故王的领土分给他们的儿子，这一过程不可避免地削弱了这个萌芽中的国家，而有利于德意志人土地上组织得较为健全的封建制度。最初的德意志村落是条顿骑士在13世纪建立起来的，虽然骑士们的势力在首次坦仑堡战役（1410年）^①中被波兰人击破，德意志人却长期继续渗透，特别是在维斯杜拉河下游以及波兹南（波森）地区。另外，居住在传统的波兰国土边缘地带的人们主要是农民——立

^① 坦仑堡战役指的是1410年波兰人和立陶宛人的联军击败条顿骑士团的一次战役。——译者

陶宛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贵族把一种主要属于异族的文化强加给他们；其中立陶宛人很快即被同化。波兰最大的王朝（亚盖隆王朝，1386—1572年）即为立陶宛族；而拥有十几座教堂和宏伟堡垒的维尔纳（威尔诺），尽管原为立陶宛人所建，却象征着两个民族的结合。立陶宛迟至1569年才正式并入波兰，而明显的立陶宛民族感情直到19世纪80年代方才复活。其他民族的命运不如他们，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被视为劣等民族，并受到相应的对待，而给予犹太族居民的特权则是一种嘲弄。

正像欧洲的交界地区常有的情形那样，在古代的波兰，不同的民族分属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在18世纪的加利西亚，波兰地主指望乡间的土地由乌克兰人耕种而自己则住在城里通过犹太商人作买卖，马车和大车则由德意志工匠制造和修理。这种阶级结构一直延续到1772年和1795年波兰的两次被瓜分之后。

所谓的“历史省份”^①把维斯杜拉—奥得地区的波兰土地在西边与多瑙河盆地分隔开来；这些省份基本上是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的捷克土地。虽然波希米亚是一地形起伏的高原，三面为森林与山峦所环抱，东面丘陵的山脊却不甚高，而西北部的易北河谷径直通往萨克森和德国的核心；主要由于这一原因，所以自13世纪以来，波希米亚全部外缘地带（即苏台德）的居民中始终以德意志农
5
民占压倒多数。

波希米亚在这次德意志人向东移民之前，已有五百余年的历史。在6世纪中叶，现今的波希米亚一带似乎曾经有过一个西部斯拉夫国家。但这不过是一个部落同盟，由一个名叫萨莫的首长统治，公元685年^②他死后不久便告解体。9世纪时，有过一个由斯瓦托波勒克大公统治的“大摩拉维亚帝国”，囊括波希米亚、斯洛伐

① 历史省份即指圣文采斯拉斯王室历史领土。——译者

② 应为658年，萨莫是有史可稽的最早的斯拉夫人国家的统治者。——译者

克以及相当于现今的摩拉维亚一带地区。由于摩拉维亚人 906 年在现今的布拉迪斯拉发城附近被马扎尔人打败，这个国家在其主要的统治者死后也同样只维持了几年；斯瓦托波勒克王国的西部土地与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合并，归于普舍米斯尔王室^① 的圣王、即文采斯拉斯治理之下；但东部土地斯洛伐克却与马扎尔匈牙利同命运达一千余年之久。

中世纪的波希米亚是一个半斯拉夫、半德意志的国家。它与摩拉维亚、西里西亚共同构成“圣文采斯拉斯王室历史领土”，而“历史省份”这一名称作为该地区的正式称呼，一直沿用到 1918 年哈布斯堡君主国灭亡之时。波希米亚的“黄金时代”是在卢森堡王室的查理一世国王统治之日，他与查理四世一样，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其在位期间为 1347 年至 1378 年。波希米亚大学 1348 年在布拉格成立，其学术地位使它在中世纪后期与巴黎、博洛尼亚（波伦亚）和牛津等大学并驾齐驱。而在 15 世纪早期，捷克人中出现了一位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约翰·胡斯，他像一百年后德国的路德那样，成为其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胡斯派为宗教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加剧了德意志化的天主教地主与主要是讲捷克语的“信奉异教的”农民之间的分歧，从而削弱了波希米亚的政治结构。但波希米亚却维持了它的独立存在，虽然有时有名无实；直到 1526 年，由于哈布斯堡王室传统的、手段巧妙的联姻政策以及联合防御土耳其游牧部落的需要，使历史领土归于查理五世皇帝统治之下。一个世纪后，他们由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在三十年战争中完全丧失，而到了 17 世纪中叶，“圣文采斯拉斯王冠”已变成哈布斯堡世袭遗产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较之本书所论及的其他地区，波希米亚的地貌与西欧有更多

^① 普舍米斯尔王室是约 9 世纪起到 1306 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世袭王朝。

——译者

相同之处(斯洛文尼亚可能除外),但捷克诸民族虽然对西方高度发达的文明有很强的接受能力,却始终向着在语言上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文化力量。然而,正像波兰人由于国家边界的不断变迁而深受其苦,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也注定使捷克人自15世纪早期新教徒的首批骚动以来,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卷入东西方的每次历史动乱之中。因为布拉格这个波希米亚的主要城市几乎刚好在维也纳与柏林之间的中途上,而且,具有同等历史意义的是,它又正在美因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中途。俾斯麦曾经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也是欧洲的主人”;他这一警语的涵义已多次证实为捷克各民族的凶信。

摩拉维亚是“历史省份”的东部高原地区,战略上有相似的重要性,尽管其威胁作用在现代已经较小。因为波兰与匈牙利平原之间的主要通道横贯摩拉维亚,这是联系欧洲南北的大道之一的关键路段。摩拉维亚于是成为穿过喀尔巴阡山这道半圆形屏障的一条天然通道,从奥得河上游开始,继而扩大为一处六英里宽的山谷,至奥洛穆茨周围则成为一片较开阔的平地。摩拉瓦河经奥洛穆茨南下与萨亚河合流,最后在布拉迪斯拉发西面注入多瑙河。摩拉瓦河以东为斯洛伐克,尽管贝斯基德与塔特拉两山所荫蔽的一些山谷,土地肥沃、物产富饶,但长期以来这是一片落后的边远山区。斯洛伐克是多瑙河盆地的门户,其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位于下游距离维也纳仅四十英里处,在沿河诸国的历史上起过各种各样的作用,一般称为普雷斯堡(德国名称)、间或称为波索尼(马扎尔名称)。但该城的风貌一直是由它所依傍的这条大河所决定的,建筑样式五光十色。

多瑙河蜿蜒于中欧,长一千七百英里,像一条纤细的纽带将许多民族联系在一起,却从来无力使它们结成持久的统一体。它发

源于黑森林，大约三分之一的河身流经阿尔卑斯山麓。沿着利奥波德堡山岬——一道长满树木的陡峭悬崖，如挺立于维也纳西面的哨兵——之下流过，最后冲出山区，流入一片罗马人称之为潘诺尼亚的富饶平原。多瑙河中游平原，纵横十万平方英里，浸透了入侵欧洲的东方人的鲜血；因为这就是匈奴人和阿瓦尔人在所谓的“黑暗时代”以及马扎尔人在9世纪末、土耳其人在16、17世纪以及俄国人在20世纪的进军路线。而且这也是西方人回击挑衅者的途径，无论是萨沃伊尤金亲王的骑兵，还是里斯特陆军元帅和冯·克莱斯特将军的装甲师，或是更加阴险的德奥制造商和推销员在哈布斯堡君主国最后十年时“冲向东方”的入侵，也都是走的这条路线。无怪在这条河的中游许多地方——例如埃斯泰尔戈姆和布达佩斯、或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和斯梅德雷沃——一些城堡的遗迹依旧在俯瞰着广阔的平原。过去两个半世纪中，仅贝尔格莱德一城就曾在敌对两军之间易手达十二次之多。

潘诺尼亚平原本身——在环流于斯洛伐克的多瑙河的南面，而后又位于转弯后贯穿而把匈牙利辟为两部分的多瑙河的西面——尽是起伏不平的田野，在巴拉顿湖周围逐渐升高成一片丘陵。这一地区的农民很自然地效法德国南部和奥地利的农业技术，而且自从1685年土耳其人撤离以来，多瑙河西岸的匈牙利便始终明显属于“中西”式，而不是“中东”式。18和19世纪，潘诺尼亚的拓殖远比多瑙河中游其他地区更有系统，其所以如此，一部分是因为它靠近布达佩斯，当然，也靠近维也纳，一部分则由于其地势利于较密集的人口。封建地主鼓励殖民，虽然他们中许多人本身是马扎尔人，这一过程大大地加重了一个种族交界区域人种混杂的现象，因为它使德国的“斯华比亚人”^①、斯洛伐克人、甚至南部斯拉

^① 斯华比亚(Swabia)是从前德国西南部的一个公国，现为巴伐利亚的一区，该公国居民称斯华比亚人(Swabian)。——译者

夫人与农民杂居共处，这些农民至少有一部分是9世纪马扎尔拓殖者的后裔。

跨过多瑙河，在河流东岸的匈牙利土地上，地理特性不同，生活方式因之而异。这就是俗称的奥尔弗尔德^①（“低地”），一片平坦的耕地，毫无特色可言，所以在许多方面不过是亚洲草原的西向延伸。大约八百年来，它曾是野蛮的游牧养马人天然的家園，而在“普兹塔”地区，由于土地贫瘠，不宜耕种，长期存留着一些吉卜赛人的遗风，他们带来音乐与色彩，为匈牙利文化平添了一派别致的风貌。

匈牙利也像波兰一样，是欧洲的一个“历史性”国家，虽数度丧失独立，却从未丧失其特征。匈牙利国创建于公元9世纪最后十年；那时发源于远在乌拉尔山彼侧的马扎尔人一直是四处流浪，越过喀尔巴阡山在奥尔弗尔德定居下来，稍后，在今天的布达与埃斯泰尔戈姆所在处渡过多瑙河。同其他于7世纪到13世纪流入中东欧的亚洲牧民相比，马扎尔人早就在两个方面显著不同：他们的语言在形式上属于芬兰-乌戈尔语，而不属于斯拉夫语；传说在公元1000年，他们的领袖斯蒂芬蒙教皇赐予王冠，承认他是一位基督教的使徒国王。中世纪后期，“神圣王冠”^②本身变成一种民族团结的神秘象征。11世纪早期，匈牙利政权向东扩及特兰西瓦尼亚，同时向南伸入斯拉沃尼亚与克罗地亚（后者于1102年以个人王朝方式与匈牙利合并^③，尔后，仍保持它本身的体制）。但在1526年匈牙利军队在莫哈奇被土耳其人击败，奥尔弗尔德的全部以及多瑙河至巴拉顿湖之间的部分领土并入土耳其帝国，匈牙利的剩余

① 奥尔弗尔德(Alföld)，意即匈牙利大平原。——译者

② 圣斯蒂芬王冠，匈牙利王位的传统象征，据说是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赠与匈牙利国王斯蒂芬二世(约967—1038)的。——译者

③ 1102年，匈牙利国王科洛曼同时为克罗地亚国王。——译者

部分，连同“神圣王冠”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一起，1541年均归哈布斯堡王朝保护。这种统一局面持续了四个世纪，并且在土耳其人逐渐被推向东方时显得更加重要。

匈牙利南面没有天然国界。由多瑙河及其支流灌溉的一望无际的平原，一直延伸到今日的南斯拉夫境内，地形上无甚变化。多瑙河在此与两条重要支流汇合，一条是从西向东的德拉瓦河，另一条则是当多瑙河本身转而向东时从塞格德和北面的奥尔弗尔德流来的蒂萨河。德拉瓦河与蒂萨河汇入多瑙河的地区称为伏伊伏丁那，东南欧最肥沃的耕地有一部分便在这里，当地种植玉米、小麦和甜菜，并以繁殖良种马的传统著称。伏伊伏丁那（“公爵领地”）包括三个地区：巴兰尼亚，即多瑙河西岸的一个三角地带，西面以德拉瓦河为界；巴茨克绍，即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地区；巴纳特，是一个较大的地区，它向东北延伸越过蒂米什瓦拉（特梅斯瓦尔）直抵穆列什河。今天，伏伊伏丁那一词仍作为一个行政区的名称在南斯拉夫保留着，却不包括巴兰尼亚（它划分为二，北部成为匈牙利的一个县，南部成为克罗地亚的一个区），也不包括巴纳特的大部，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被瓜分，罗马尼亚获得其大部分。老伏伊伏丁那地区，尤其是巴纳特，由于历史的偶然以及有意制定的政策，成为一个多民族的特别混杂的区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重划国界时，发现在巴纳特的许多村庄里马扎尔人、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德意志人毗邻而居——虽然不幸的是并非融洽无间。这里也像中东欧其他许多地区一样，本地的紧张关系比昔日的政治制度还持久。

德拉瓦河以南的多瑙河盆地的肥沃平原，通称为斯拉沃尼亚，它延伸到克罗地亚本境内，直达遍栽葡萄的丘陵区，最终止于波斯尼亚的丛山密林。斯拉沃尼亚与波斯尼亚之间的萨瓦河为界，这河是多瑙河的一条支流，与德拉瓦河平行达二百五十英里以上。尽

管萨瓦河的入海处没有形成一个港口,但对低洼的南斯拉夫来说,⁹它在许多方面都相当于维斯杜拉河对波兰的作用。它起源于阿尔卑斯山的卡拉万克山脉,顺坡而下,穿过盛产木材的地区,再经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附近,直奔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在贝尔格莱德的石灰石巉岩下与多瑙河汇合。虽然萨瓦河今日已成为南斯拉夫的一条重要的大动脉,过去却另有一番作用:二百多年来,它一直是西方阻挡土耳其人的东方天堑。早在18世纪,哈布斯堡王朝把他们最初于1578年在阿尔卑斯山麓设立的“边屯区”向前推进,使之沿萨瓦河穿过斯拉沃尼亚,后来又顺多瑙河而下,横贯巴纳特。这片满布了望塔、守卫哨和烽火台的边区,全部由边屯军驻守。他们一般是从塞尔维亚亡命而来的凶悍难民或富于冒险精神的德意志殖民者,以及对维也纳的帝国政府宣誓效忠、当兵服役的一些人。直到19世纪末,他们的子孙依旧是享受特权的庄园主,甚至直到这以后还继续是哈布斯堡王朝的忠实臣仆。

由此往东的多瑙河平原较斯拉沃尼亚与克罗地亚两处略为狭窄。这里有满是树木的丘陵,即弗鲁什卡山,位于多瑙河与萨瓦河之间的“希雷姆”地区之内。这个地名是塞尔维亚语,近于拉丁语的“Sirmium”,是公元1世纪时罗马皇帝图密善^①的军团给帝国的这一边境城镇的命名。再往东,在由多瑙河、萨瓦河、德里纳河与(塞尔维亚的)摩拉瓦河形成的四边形地区内部则是舒马迪亚地势起伏的乡野;一个多世纪以前,这里还林木茂密,如今已砍伐殆尽,遍种谷物、李树,并且养猪。近代塞尔维亚民族的摇篮舒马迪亚,在地理上是多瑙河平原与巴尔干山脉之间的过渡地区,那儿满是树林的山坡俯瞰着德里纳河与摩拉瓦河的上游。

贝尔格莱德下游八十英里处,山峦开始丛聚于多瑙河两岸,至

^① 图密善(Domitian),罗马皇帝(公元51—96年),在位期间为81—96年。——译者

卡赞峡谷，山岩几乎会合在一起。此处河身狭窄，不足二百码。直接向北，在沿罗马尼亚一侧，喀尔巴阡山脉出现一些高峰，或称“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高度与斯诺登山相同；沿南斯拉夫一侧的巴尔干支脉虽相形较低，但也有些海拔二千五百英尺的山峰。这种高度本身当然并不奇特，但因临近河流，而且东西两边都是宽阔平原，便显得风景如画、巍峨庄严，令人生畏。在最东边的峡谷，花岗岩峭壁陡立，河面顿窄，迫使多瑙河流经河床岩石时汹涌奔腾，形成湍滩，竟有“铁门”之称，船只至此只得通过运河上一道道的船
10 闸，十分缓慢。运河于 1890 年方才开凿完毕，现正修建一道巨大的拦河坝，为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提供水力发电。喀尔巴阡山实际上并不如地图所示的那样阻绝交通，因为除沿多瑙河的航道外，往北还有深沟巨壑形成了天然通道，过去几个世纪中，移民与进犯的游牧民族便沿此而来。但图拉真^①的军团却是通过卡赞峡谷将西方文明首次带给东方平原和罗马尼亚，这个近代国家的国名，至今仍标志着它昔日与罗马的渊源。

多瑙河通过铁门后，距海仍有六百二十英里，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省位于其东北，土地肥沃，种植小麦、玉米；河流继续向北，在布加勒斯特与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一段弧形之间的普洛耶什蒂（“雨城”）一带则有许多油田，从 1857 年起便有设备原始的炼油厂开始在此生产。东部的多瑙河平原向北延伸至锡雷特河下游的湖泊与沼泽地，直达摩尔达维亚省，与普鲁特河及德涅斯特河之间的草原连成一片，中间没有任何天然障碍。这就是称作比萨拉比亚的那个地区；这名称的由来，原可能是因为 14 世纪时有个半传奇般的瓦拉几亚的巴萨拉布家族，曾企图在多瑙河口建立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公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苏联边界向前移动到普

^① 图拉真(Trajan, 即 Marcus Ulpius Trajanus), 罗马皇帝(公元 53—117 年), 在位期间为 98—117 年。——译者

鲁特河，比萨拉比亚便成了今天称作摩尔达维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一部分，——这未免有些混淆不清。在地理上，比萨拉比亚和与之毗连的乌克兰辽阔的大片土地毫无差别；而在政治上，罗马尼亚的历代统治者与俄罗斯人二百年来对这一省份争夺不休。这片土地在沙皇时代的地主手中时，葡萄栽培业十分发达，但在两次大战之间却为罗马尼亚人所荒废。这个省份在经济上虽然无足轻重，却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价值；因为俄国只须占领比萨拉比亚，便会成为多瑙河上的强国，而有权参加沿岸国家的一切会议。

多瑙河弯曲的河身看来几乎将罗马尼亚的低洼地区环抱起来。这河在铁门以下便成为瓦拉几亚与今天保加利亚的北部平原之间的边界，直到距离黑海沿岸不足五十英里处为止。在这一地区内有个比该地区地势略高的地方，人称为多布罗加，迫使多瑙河转而北流几达一百英里，且不时泛滥，流入沼泽地。多瑙河再次流近喀尔巴阡山时，便与往下流的锡雷特河汇合，再往下不远，便与普鲁特河末端重要支流汇合。三条河水合流后转而向东，分作若干混浊的支流，最后入海。

如果说多瑙河三角洲与密西西比河三角洲颇为类似的话，那么，位于与锡雷特河汇合处的加拉茨这一河边商埠便是东欧的新奥尔良。但这根本上仅仅是表面的相似，因为加拉茨只是在本世纪才开始吞吐海轮。罗马尼亚人从来不是海洋民族；黑海上的贸易长期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所垄断，他们的船只并不使用加拉茨，而是使用康斯坦察，后者一度是罗马的托米港，昔年奥维德^①在这儿死于流放；康斯坦察在地理上是多布罗加的一部分，从这海港到瓦拉几亚平原之间的一段多瑙河，附近有一条十二英里宽的沼泽地带。但是，部分由于多布罗加全境都较易于从保加利亚

^① 奥维德(Ovid, 即 Publius Ovidius Naso), 罗马诗人(公元前 43 年—公元 17 年)。——译者

的北部低地进入，布加勒斯特的统治者们便有意突出康斯坦察的罗马尼亚性质，用铁路、公路和管道将它与内地连接起来。康斯坦察与其南八十英里外的保加利亚海港瓦尔纳之间的沿海地区是保加利亚人、罗马尼亚人、土耳其人、希腊人和从高加索迁入的航海者的一个混居杂处之地，而南多布罗加这一海水紫蓝、沙滩如银的地区，长期以来成了索非亚与布加勒斯特之间权力游戏中的羽毛球。

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多瑙河流域无可争议的一部分，直到 19 世纪末叶，甚至曾经被正式称为“多瑙河两公国”。如果说这条河始终是罗马尼亚的生命线，那么，喀尔巴阡山脉便是它的脊柱，此地丛山高耸，有如一弧形屏障俯瞰着低地，其外沿像一条曲线贯穿全国，长达四百多英里。特兰西瓦尼亚高原就在这弧形屏障之内，在地理上独成一体，富于森林、矿藏、良好的牧场；但许多世代以来，由于敌对民族间的相互猜疑仇视，在精神文明方面则极度贫困。

特兰西瓦尼亚问题是东欧内部冲突的典型，其起源可追溯到中世纪。由于喀尔巴阡山的许多隘口敞向横贯欧亚平原的一条移民大道，13 世纪的匈牙利国王们便邀请德意志人（“撒克逊人”）前来特兰西瓦尼亚定居，协助马扎尔的封建贵族保护中欧免受新的入侵。撒克逊人获得了真正的自治权，并保持了六百多年，他们建立起七座设防城镇作为殖民的工具；特兰西瓦尼亚的德语名称至今仍是 Siebenburgen（“七座堡垒”），很说明问题。但是除了当封建领主的马扎尔人之外，在撒克逊人到来之前，这里已有另外两个种族：其一是讲讹化的拉丁语的土著农民，一般称为罗马尼亚人；另外则是从奥尔弗尔德移入特兰西瓦尼亚的一部分人，叫作塞克勒人。他们与马扎尔人极其近似，而且也起源于乌拉尔山东面的草原；他们也像撒克逊人那样以驻守边疆为条件，换得了自治权。

主要为平原人的马扎尔人和主要为山地人的塞克勒人之间虽然也¹²偶尔发生冲突,双方最终都把自己看作匈牙利人,决意结成共同战线,反对罗马尼亚农民,并且一般都得到撒克逊人的支持。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特兰西瓦尼亚与罗马尼亚的合并,不仅是归属关系的改变,而且也引起了社会秩序的颠倒;像中东欧其他部分一样,敌对民族之间的仇视,甚至在随着共产主义而来的伟大得多的政治革命之后,仍继续存在。

但是,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中有一些因素是其他有冲突的地区极其罕见的。那就是其人种构成由于地理环境而变得格外错综复杂。因为塞克勒人群居于东南部一些地区,沿着山脉因此临近瓦拉几亚,而与匈牙利低地接壤的特兰西瓦尼亚西部地区的居民则主要为罗马尼亚人。与他们相比,几乎所有城市中拓居区的德意志-撒克逊人家族都很有势力,虽然他们在商业界的优势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开始遭到迅速增长的犹太人的挑战。另外,几个世纪以来,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派繁多,这个情况极端复杂的省份在社会上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就越发严重。东正教会的各个支派、奉行拉丁仪式的天主教、奉行东方仪式的天主教、加尔文派、原始浸礼派和路德派,等等,都曾在这一地区风行;巧合的是:特兰西瓦尼亚的首要城市——罗马尼亚人称作克卢日、匈牙利人称科洛兹瓦尔、而德国人则称克劳森堡——却成了唯一神教派^①的智识中心,这真是莫大的讽刺。

弧形山脉的东北坡长期以来人烟稀少,大部分地区遍布密林,居住在这儿的健壮耐劳的山民以伐木为主要职业。18世纪后期奥地利人在该地区建立了布科维纳(“毛榉林”)省,其行政中心设在普鲁特河上游的一个城市,他们称之为切尔诺维策(罗马尼亚人称

^① 唯一神教派(Unitarian),一译“一位论派”,这一教派主张上帝只有一位,反对三位一体之说,认为耶稣只是人,而不是神。——译者

作切尔劳察,俄国人称作切尔诺夫策)。当时的居民主要为罗马尼亚血统,但19世纪期间已有大批乌克兰人迁入,这也就是19世纪时当地人所称作的罗塞尼亚人^①,到了1880年,他们就成为最大的民族集团。布科维纳北部各地区与叫作罗塞尼亚的那个地区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后者长期以来便是“奥属波兰”(加利西亚)的一部分,1918年以前,布科维纳与罗塞尼亚都属维也纳管辖。但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布科维纳并入罗马尼亚,而罗塞尼亚却构成捷克斯洛伐克国土的一部分。如今整个这一地区,除布科维纳南部一小块地方仍属罗马尼亚以外,都归入苏联版图,称为“外喀尔巴阡乌克兰”;这个名字强调了山区居民与黑上带的劳动者之间在种族与语言上的相似之处,却把历史遗产与地理常识一股脑儿全抛弃了。

中东欧下属的第三个地理区域是巴尔干山脉;亚得里亚海、爱琴海和黑海环抱着一个三角形的半岛,萨瓦河与多瑙河连成的一线恰为其底边,巴尔干山脉占满了三角形的大部分。巴尔干山脉本身是由一座座峰峦结成的一条链子,自东而西横贯保加利亚,长达三百七十英里;整个半岛即由此山脉而得名。希腊境内一片片平原,面积虽小而土壤肥沃;保加利亚中部有一可耕的高原,沿亚得里亚海则有一条条滨海地带,达尔马提亚一带幅度狭窄,但阿尔巴尼亚的都拉斯附近一带较为宽广。此外处处皆山。巴尔干山脉有两条支脉,即罗多彼山脉与皮林山脉,由西北向东南穿过保加利亚至色雷斯走向爱琴海。再往西,狄那里克^②山脉贯穿整个南斯拉夫西

① 据查 Ruthene 即 Ruthenian, 一称“小俄罗斯人”,住在奥地利东部与波兰东南部。今依商务1982年版《世界民族译名手册》均译为“罗塞尼亚人”。——译者

② 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脉(Dinaric Alps Mountains, 一称迪纳拉山脉(Dinara Mountains)。——译者

部，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只隔着斯洛文尼亚的一片满布森林和有断裂沟壑的高原（即所谓的卢布尔雅那隘口）。狄那里克山脉扩展开来，环抱着大半个波斯尼亚和整个黑塞哥维那；洛夫琴山即属此山脉，意为“黑山”，门的内哥罗^①由此得名；它继续南伸，直抵阿尔巴尼亚境内一片荒芜之地，边界地区尤为萧森可怕，幸喜有三个大湖点缀其间：北边的一个是斯库塔里湖，南边的两个是奥赫里德湖与普雷斯帕湖。这条山脉在南部扩散形成品都斯山脉，将希腊北部切成两半，并分出一支，成为众神安居的奥林匹斯山，又分出另一支成为缪斯女神们居处的帕纳萨斯山。山脉继续蜿蜒向南，甚至进入伯罗奔尼撒半岛境内，有些山峰几乎高达八千英尺。这半岛与其说是中东欧，倒不如说是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更为恰当。

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和希腊这四个高原地区国家所见的巴尔干风光几乎一模一样：山坡上一片荒凉、乱石森然、石灰岩色调凄凉暗淡；山坡下，一个农民把毯子当作马鞍，骑上驴子沿着一条山岩上凿出的羊肠小径赶着羊群。阳光充足时，群山不黑不灰，却也没有颜色，仿佛遵守着某种清教徒的清规严戒、弃绝人世间一切色彩。但在黄昏时分，没精打采的村庄恢复了活力，大气里飘着炭火炉发出的芬芳烟味时，同样的峰峦则呈紫红色，山谷一片深棕色，暗褐色的平原霎时间闪耀出蜂蜜般的美丽色调。古老的市镇紧傍着冠状的山岬以求得庇护，条条小径呈阶梯形，一座座覆盖着弧形瓦的低矮小屋，丛集在清真寺铅笔般的尖塔或基督教堂灰泥墙的圆顶脚下。较新的拓居区却径自沿着车辙纵横的道路铺开，一直伸展到梧桐或柏树的绿荫丛中，在一个未加修饰的广场上汇合起来。人们可以把家长里短的琐事带到咖啡馆的小桌子上来公开谈论，因为东南欧的风尚一向如此。旧习难改：公牛的轭上

^① 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一称黑山，因 Monte 意即“山”，Negro意即“黑”。——译者

依然套着单铧犁，耕耘着冷酷无情的土地，或在四轮车队中拖运木材；马其顿和保加利亚的农舍墙上仍旧挂着木竿晾晒烟叶。半岛上许多地方，绚丽的服装与民族舞蹈仍旧保持民间的传统，表达出历史上的全部辛酸与光荣事迹。

当然，如果认为这些山区只不过是一所僵化了的古董店，那就错了。一些湍急的河流在两次大战之间初次受到了控制并用于发电；近年来，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都已着手广泛建设水力发电工程。在 20 世纪之初，南部斯拉夫地区的高地已开始发展采矿与冶金业，希腊也已开始，不过规模较小。这一过程继续将工业引入落后地区。但在过去一个半世纪的大部分期间，巴尔干山脉还不是经济发达的中心，而始终是个无尽无休的冲突的中心。这儿的森林与山谷为反抗帝国统治、反抗政治家们在会议上对国境线的任意挪动或反抗建立一个听命于外国的新政权的叛逆者提供了藏身之所。在诸如马其顿的某些地区，其种族界限之复杂有如特兰西瓦尼亚，民族主义每受挫伤，立即引起冲突；而在其他类似波斯尼亚的一些地区，宗教和文化上的分歧同样尖锐。山区人心胸偏狭遇事不能容忍的性格，似乎不时在本地人和入侵者身上同样养成一种残忍性，而这种残忍性有时竟令人可怕地轻易越过了可以接受和姑且宽恕之间的界限；正是这人性丑恶的一面，受到一班在观察巴尔干紧张关系时不承担个人约束的评论者们强烈的道义谴责。

但在巴尔干的历史地理背景后面，还存在一种矛盾现象：从地图上看，这个半岛是中东欧洲唯一为群山和海洋维护的地区，但从古至今，它不但没有成为亚洲与西方之间的障碍，反而是一座桥梁。保加利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军人统治者分别于 10 世纪和 12 世纪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帝国只有一个短暂期间在巴尔干称雄，主要是由于这地区易于进入。因为从东方通向多瑙河平原及中欧的最简

便的几条路线都只到达群山的边缘。从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¹⁵往西直到马里查河上的埃迪尔内(即阿德里安堡),至今仍属于土耳其的那部分土地,一马平川,从那儿可以沿河通过东鲁米利亚直抵普罗夫迪夫(菲利普波利斯)以远,才遇到第一处高地。将罗多彼山脉与巴尔干山脉主干部分隔开来的山谷经过索非亚和斯利夫尼察延伸到德腊果曼山口,最后止于(塞尔维亚的)摩拉瓦河上的尼什,地势由此处开始渐渐地向北倾斜,直达多瑙河。13世纪期间的十字军和19世纪时修铁路的人们都沿着这条路线朝相反的方向行进。通到摩拉瓦河谷另外有两条路线:从色雷斯海岸的卡瓦拉,越过鲁佩尔隘口,沿斯特鲁马河而上直到德腊果曼隘口;或从巴尔干各国都极珍视的萨洛尼卡港口,沿瓦尔达尔河而上直至斯科普里,抵达位于库马诺沃以北的摩拉瓦河源头。

入侵者正是沿着这些道路攻进中欧的,其作用不亚于喀尔巴阡山的各个隘口或维斯杜拉流域的广阔平原;若干世纪以来,各种军队均取道于此。而罗马军团还另有一条进军之路,即厄格那夏大路。这条大路贯通半岛顶端,从都拉斯穿过阿尔巴尼亚中部平原,跨越品都斯山到达奥赫里德湖和普雷斯帕湖,直抵弗洛里纳、埃德萨和萨洛尼卡。还有另外几条道路:从弗洛里纳到比托利(莫纳斯提尔),由此越过巴布纳山口到达斯科普里和摩拉瓦河;或者另一条比较艰险的道路,即从斯科普里到普里什蒂纳和伊巴尔河谷,这就是上土耳其时期叫作新帕扎尔州的那个地区,由此再通向克拉古耶瓦茨和舒马迪亚一带。

经门的内哥罗或里塞哥维那跨越狄那里克阿尔卑斯山到达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平原,这是一条在过去和现在都困难重重的道路。因此,黑塞哥维那首府莫斯塔尔和门的内哥罗旧都采蒂涅比更东边的许多城市显得尤为偏僻落后。门的内哥罗仍旧是真正的荒山僻野,只是凭着最高明的建筑工程技术才得以着

手开发，却有一条河流经黑塞哥维那；这小小的山溪，名叫内雷特瓦河，从亚得里亚海穿过莫斯塔尔，顺着深深的峡谷流到科尼奇，这儿有一隘口通往波斯尼亚的首都、即整个巴尔干最都市化的城市萨拉热窝。从萨拉热窝起，有几条在夏季几乎变成干涸山沟的河流，构成通往萨瓦河与中部平原的通道。

巴尔干有两个处于中东欧边缘的地区，即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南部。由于历史传统和地理位置的关系，两处都被吸引外向，成为地中海世界的一部分，亦即面向意大利或黎凡特。^①阿尔巴尼亚也曾几度短暂地同意大利半岛的政治相联系；因为阿尔巴尼亚和意大利隔海相望，有一处相距不过八十英里而大海港布林迪西距离都拉斯又较之南安普敦（英国）距离勒阿弗尔（法国）还略为近些。

16 达尔马提亚沿海平原被一道水蚀石灰岩墙与内地隔开，居民历来惯向亚得里亚海对岸寻求罗马文化或向北仰望威尼斯商业帝国；值得注意的是直到1925年、南斯拉夫国已经存在七年之时，亚得里亚海岸与克罗地亚平原之间最早的有效经济联系——从斯普利特港通往萨格勒布的铁路——方才完成。虽然一些最有远见的相信南斯拉夫理想的人有些来自达尔马提亚，但沿海岸地区一带总是有一大批讲意大利语的少数民族。另外，某些城镇已养成独立的习惯；扎达尔和科托尔如此，杜布罗夫尼克尤其如此，后者曾有四个半世纪被称为拉古萨，实际上是个自治邦，在商业上的冒险精神与范围都与威尼斯相匹敌，直到拿破仑革命时期，她才像威尼斯一样在政治旋风中丧失了自由。

南部希腊过去从来不是欧洲交界地区的一部分，尽管从十字军和土耳其人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的入侵军队，都曾潮水般地涌入她的平原山谷。希腊人根本上是地中海地区的成员，他们

^① 黎凡特(Levant)指地中海东部及爱琴海沿岸的国家和岛屿(包括叙利亚、黎巴嫩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译者

在近代介入中欧事务主要是胸怀宏图：想建立一个泛爱琴海联邦，横跨欧亚之间的海域，就像卡雷斯所建的一度横跨罗得港湾的西岸大雕像那样^①。希腊人是土耳其帝国的商人和航海者，在安纳托利亚大陆和黑海沿岸以及诸岛屿上都有拓居地。这种海上活动却把他们带到萨洛尼卡和一些小得多的港湾，例如卡瓦拉和亚历山德鲁波利斯（后者是1860年才由土耳其人建立起来的，当时名为德迪加特奇）。这一带的海港是东欧贸易的南部天然出口，因此，又特别是由于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竞相争夺控制马其顿，希腊的政治家和统治者的野心便不免时常驱使其同胞卷入巴尔干内地的政治纠纷。

东南欧所有的这些地区，也就是从伯罗奔尼撒到多瑙河及其以远一带，仍不断有拜占庭这个东罗马帝国的幽灵作祟；它从公元330年起，直到1453年土耳其人攻入君士坦丁堡为止，一直繁荣昌盛。政治上，这幽灵甚至到1922年还在活跃，当那位以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城市缔造者名字命名的国王^②在位期间，希腊人被诱入小亚细亚一场灾难。在商业和社会两方面，长期以来，“法纳尔希腊人”使得拜占庭帝国与其继承者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各种观念有时甚至其家族血统延续不断。“法纳尔”这个词最初专指君士坦丁堡希腊区法纳尔的居民而言，后来转用于土耳其政府管理行政或商业的希腊籍官员。法纳尔希腊人在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格外有势力；而在1714至1821年期间，苏丹一直是从小法纳尔家族成员中遴选这两个公国的首脑（即“霍斯波达尔”）。17

① 公元前约280年由卡雷斯（Chares）在土耳其西南罗得（Rhodes）上建成之太阳神青铜巨像，高约一百英尺，乃世界七大奇景之一，是为纪念公元前305—304年反抗德米特里一世（Demetrius Poliorcetes）袭击该岛获胜而建立的，后毁于公元前224年地震中。16世纪时，又传说塑像的两腿跨立岛的港口两岸，来往船只可以通过。——译者

② 兼指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大帝（274—337年），和希腊王君士坦丁一世（1868—1923年）。——译者

但拜占庭的主要影响是在文化方面。巴尔干各族人民，也像俄罗斯人那样，接受了君士坦丁堡的教会、艺术、音乐，大多数民族还袭用其字母。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的中世纪文明便是将拜占庭原则强加给原始的斯拉夫社会的一种尝试；而塞尔维亚人与门的内哥罗人（他们的基督教与文化来自拜占庭）和克罗地亚人与斯洛文尼亚人（他们的基督教与文化来自西方）之间的界限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障碍，妨害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团结。值得注意的是将希腊基督教与拉丁基督教分隔开来的这条线恰恰符合公元385年划定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之间的行政区域的分界线。这条线尽管并没有地理基础，却成为欧洲交界地区的边界线中最持久的一条。

中东欧的人种结构几乎是无法根据其系统进行分析的。波罗的海与亚得里亚海之间的大部分土地居住着从公元7世纪到13世纪来自东方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习惯上分为四个主要民族：西部斯拉夫人（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南部斯拉夫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保加利亚人、马其顿人）；匈牙利人（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以及从种族上看来像是谜一般的“拉丁人”（罗马尼亚人）。在这些民族之外，还必须加上四处分散拓居的希腊人、土耳其人和阿尔巴尼亚人（即什奇普塔尔人）；以及来自西方的一些移民，其中有的是有高度组织的日耳曼人的飞地，或是规模较小、影响也小得多的意大利人的贸易站。黑海沿岸还有几个城镇，居民是从高加索来的少数民族，特别是亚美尼亚人。而各种不同的犹太居民点的建立就使种族结构更加复杂，其中有些已同化于所在国家的生活，大部分则保持自己的风俗、文化和语言。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有些阿什肯纳泽犹太人居民点；而塞法尔迪犹太人在15世纪末被西班牙逐出后，便在巴尔干、特别是在萨拉热窝与萨洛尼卡找到了藏身之地，直至希

特勒的军队到来时为止。

这些民族中大部分的最初起源与早期历史尚不清楚。沙文主义¹⁸的学者们不时提出种种说法,似乎对“黑暗时代”可以探明,但多数证据都属可疑,特别有两个民族的问题格外难解:这就是阿尔巴尼亚人和罗马尼亚人。

阿尔巴尼亚人定居区,不但从 1913 年起便建立在以他们的名称命名的国家里,而且在南斯拉夫境内从科索沃到奥赫里德和库马诺沃一带,以及希腊许多地区,从边境附近远至卡瓦拉和科林斯,甚至在海德拉岛和萨拉米斯岛,处处都有。本世纪早些时候,还有些孤零零的阿尔巴尼亚居民集团散布在布加勒斯特、萨拉热窝和希雷姆,以及扎达尔周围地区,但多数看来已失去自身特点,尽管什奇普塔尔还作为一个贬义名称在巴尔干某些地区保留下来。阿尔巴尼亚人在若干世纪中吸收了土耳其人的风俗与传统,他们的语言却属于迥然不同的印欧体系,分为多种方言;他们有可能是伟大的古典希腊时期居住在伊利里亚和色雷斯的那个民族的后裔。他们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保留着一种对家长制氏族的忠诚,但从未凭藉昔日的荣耀而作为希腊民族称雄于世,虽然他们也不时以斯坎德贝格的传说而自豪:此人是五百年前连续二十五年胜利抗击土耳其人因而由一个盗匪成为一个英雄人物。

而另一方面,罗马尼亚公国虽然晚至 1862 年才成立,罗马尼亚人却对自己古老的过去牢记不忘。公元 2 世纪和 3 世纪期间的一百六十五年中,他们现今的大部分领土,包括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在内,曾是罗马帝国的达契亚行省;这种拉丁渊源长期以来是他们珍贵的传说,而他们语言的性质与结构则使这一传说尤为逼真。然而,毫无疑问,多瑙河口的全部土地在大迁移期间全被斯拉夫部落占据,其他游牧民族则离开巴尔干向北移动,在 13 世纪渡过了多瑙河。另外,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的全境都受到拜占庭文化

传播者的巨大影响。因此，罗马尼亚与其各邻邦之间在种族上的区别可能从来不像布加勒斯特的宣传家们所强调的（至少在1945年俄国影响向南扩散之前）那样明显。但不论这种说法是真是伪，认为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是拉丁文化的最东方的维护者这一信念许多世代以来却是罗马尼亚政治家们的鼓舞力量，常常起着好的作用——偶尔也有损于其信誉。

- 19 长期以来东欧各族人民把死的历史当作现时的政治。他们歌颂往昔的某些英雄事迹，念念不忘某项独一无二的民族使命，缅怀某位爱国的祖先，凡此种种，都使他们把历史陈迹变为活的史诗。这种浪漫主义的夸张颇有事实依据。中世纪期间，大多数民族确曾创建若干王朝，其名望威力都宛若流星一般在这些交界地区国度的上空一划而过：10世纪末，波兰皮亚斯特王朝^①将其领土扩及奥得河；五百年后，亚盖隆王朝又把边境向东推进到莫斯科大公国；匈牙利的阿尔帕德王朝^②抗击13世纪鞑靼人的入侵，保护了多瑙河平原；波希米亚的普舍米斯尔王朝谋求从波罗的海上的科尼斯堡直至卡林西亚的卡拉万克的中欧控制权；还有塞尔维亚的尼满雅王朝在14世纪中叶从萨瓦东部至塞萨利以南建立起自己的统治权。同样还有一些民族英雄：像10世纪保加利亚的沙皇西美昂，或匈牙利黄金时代中兴之主洪雅迪·马提亚等伟大君主；以及一些并非真实的人物，像克罗地亚的早期领袖托米斯拉夫、佩塔尔·克雷希米尔和14世纪后半叶的波斯尼亚统治者特弗尔特科·斯蒂芬；或二百年后率领罗马尼亚人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勇敢的米哈伊尔等。如同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贝格一样，这些神话般的人物，声誉历久不衰，远远超过其成就。他们的形象一半是由希望一半是由崇敬塑就的。

① 波兰土著王朝，9世纪统一了国家。——译者

② 阿尔帕德的后裔建立的匈牙利本地人的王朝（895—1301）。——译者

在异族统治的几个世纪里，也有过将慷慨赴难的事迹加以神化的现象。譬如 19 世纪的捷克作家们曾教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人把 1620 年的白山之战视为一次民族殉难，当时他们的祖先宁死不肯接受一个德意志暴君的掠夺抢劫。这类传统中最著名的却是关于 1389 年科索沃之战的一组塞尔维亚民歌。那时，被阿尔巴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匈牙利人组成的部队所支持的拉扎尔大公率领的塞尔维亚首领组成的军队，被土耳其人战败于“黑鸟坪”，此处因而成为民间神话中的圣地；1912 年塞尔维亚军队终于解放了科索沃^①，士兵们走过古战场时生怕惊动了长眠地下的昔日英烈，都脱下了靴子。

科索沃之战确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它宣告西南欧各族人民从此进入屈辱和停滞的时期；在此期间，存留下来的徒有中世纪巴尔干各国的空名与回忆。土耳其人在 1526 年莫哈奇一战中的胜利，同样标志着多瑙河流域各民族独立的终结。维斯杜拉盆地以南的全部中东欧从此被哈布斯堡王朝与奥斯曼土耳其人瓜分，前者的首都在维也纳，后者则远从君士坦丁堡实行统治，声威显赫。哈布斯堡称雄的局面似曾两次遭到挑战：一次是波希米亚起义引 20 发三十年战争，并导致白山之难；另一次则是土耳其力量突然再起，苏丹的军队在 1683 年竟一度攻抵维也纳郊区。但在四年之内，哈布斯堡再次走运。布达落入奥地利人之手，马扎尔人感恩戴德，承认维也纳的统治者对“神圣王冠”^②土地有世袭之权；在莫哈奇再次交战，1526 年的一切决定完全推翻。但除了难以攻克的大门的内哥罗要塞和达尔马提亚沿海一带商业城市之外，整个巴尔干地区仍留在回教徒的弯刀之下，直到 19 世纪之初。

① 奥斯曼土耳其人和基督教徒在塞尔维亚发生两次战斗(1389, 1448)的地方。
——译者

② 这里指圣斯蒂芬王冠。——译者

对奥斯曼帝国最持久的威胁并非来自西方，乃是随着俄罗斯帝国的兴起而来自北方。自1682年彼得大帝即位之日，至一百三十年以后拿破仑向莫斯科进军时为止的这段时期，俄国人六次对土耳其作战，然后逐渐在克里米亚取得立足点，终于于1783年将其吞并。他们在黑海上也插进一只脚，于1778年建立赫尔松港，1794年又建立更有价值的敖德萨运谷港。俄国人卓越的外交成就是在叶卡特琳娜二世进行的首次战争结束时取得的，那就是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其名称来源于保加利亚的一个村庄，即1774年7月签订这条约的地方。根据条约规定，俄国取得黑海之滨大片的草原，打破了奥斯曼垄断海上贸易的局面，并获得在君士坦丁堡郊区建立“俄—希教会”和代表“那些服务于”这一教会的人们提出请求的权利，俄国人后来便凭这一含糊的措辞，以奥斯曼帝国全境的正教基督徒的保护国自许。与此同时，土耳其人承认俄国人有权代表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信奉基督教的居民“提出抗议”。这些让步不仅对俄国而且对全部中东欧国家都有重大意义。土耳其商业最终只得处于和外来者竞争的地位：譬如说，奥地利便能从这种新的贸易安排中获益，而在1782年将第一艘货船从维也纳沿多瑙河开往黑海。但在政治上，库楚克-开纳吉条约却是俄国人独享的胜利；正因其措辞不够确切，使接连几代的沙皇有了借口，得以在尔后八十年间干预奥斯曼事务。接着，俄国人通过雅西条约（1792年）把德涅斯特河作为国界，通过布加勒斯特条约（1812年）兼并了比萨拉比亚，但这两项条约在性质上都不像库楚克-开纳吉条约那样有爆炸性。

- 21 俄罗斯在叶卡特琳娜二世时代以欧洲一个主要强国的面貌出现，也决定了维斯杜拉河流域各国的命运。波兰的选定君主国^①

^① 选定君主国，Elective Monarchy，国王由选举产生的君主制国家。君主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在中世纪的波兰，曾实行这种制度，即由贵族代表会议选举国王（见《辞海》）。——译者

在整个 17 世纪继续昌盛，并于约翰·索别斯基在位期间（1674—1696 年）达到极点；把维也纳从上土耳其围攻中解救出来的正是他麾下的军队，这可能是波兰八百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但他去世后，波兰国家即迅速衰落。一小撮权臣政治上不负责任，沉溺于内部纷争，而把两个无法令人尊重的撒克逊人推上王位。在拉齐威尔亲王庄园入口处贴出的一张威胁性公告中便有这样一句狂言：“国王是华沙之王，纽斯维茨的主子却是我”，这典型地表明波兰贵族的自私自利和夜郎自大。而正当这些权贵们醉心于封建角逐之时，东方的俄罗斯国却正在披挂上沙皇帝国的全副甲冑，西方的勃兰登堡也已变成普鲁士王国。后来，各处的自由派作家都谴责瓜分波兰是一种罪行；但这究竟是谋杀呢还是自杀？

但对波兰国的最初挑战并非来自俄罗斯或普鲁士，而是来自奥地利。1769 年哈布斯堡王朝夺取了贸易城斯皮什（德语称作“齐普斯”，马扎尔语称作“塞佩斯”），这个县份的四周围几乎全是匈牙利领土。瓜分是在三年后开始的。俄国所得到的土地是沿第聂伯河到维捷布斯克东北一带，主要还并非波兰的土地；普鲁士与奥地利却主要从波兰领土波美拉尼亚西部和加利西亚分别谋得补偿。波兰国进行为期过晚的改革，1791 年才制定自由主义的宪法，普鲁士与俄罗斯竟以“从雅各宾派手中拯救波兰”为借口在 1793 年实行第二次瓜分。次年，当波兰人以塔德乌什·科希秋什科为首举行爱国起义，对新的边界线提出抗议时，三个强国再次入侵，把波兰的剩余部分也瓜分了，唯独留下波兰民族主义的幽灵；这可是一个强大无比的鬼魂，它把三个独裁国家捆在一起达一百五十年之久，借以确保他们事实上是波兰人永世不变。

1795 年波兰第三次被瓜分之后，整个的中东欧从波罗的海的沙冈到南伯罗奔尼撒遍地岩石的半岛，都沦入四个超国家的君主国——俄罗斯、普鲁士、奥地利和土耳其统治之下，直到第一次世

界大战为止。但当时并无多少迹象表明这种势力划分竟会持续如此之久。甚至,这种安排初看起来将特别短暂,因为在其后二十年²²间法国人一次接一次地不断攻击旧政治制度。拿破仑本人两次胜利攻进维也纳。他的军队在1805年、1807年和1809年三次几乎要撕碎东欧地图。此外,如果俄国人在1872年莫斯科被占领后竟然求和的话,那么鲍罗季诺之役对维斯杜拉地区来说,其后果很可能与莫哈奇之役对多瑙盆地同样重大。在政治上,拿破仑对欧洲的交界地区作出的改变较之它们以往所经历的任何一次都更为迅速、也更加全面。他制造了一个傀儡国,即华沙大公国;他占领了斯洛文尼亚的土地和达尔马提亚海岸;他甚至派遣法国军队驻扎在科孚岛,作为进入巴尔干半岛的跳板。他给波兰人、南部斯拉夫人和希腊人带来了一线微弱的民族独立的希望。如果说这些前景从未近于实现的话,那是因为他缺乏一项明确或一贯的东方政策。他究竟是要维护旧秩序呢,还是鼓励民族起义?他究竟愿意看到奥斯曼帝国强大得可以抗击俄国呢,还是要它在俄国默许之下被扫除掉?他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但由于他自己的行径矛盾重重,致使这些问题无法得到解答。他的帝国在1814年崩溃时,这些问题却依然拖延一个多世纪,弄得欧洲的政治家们困惑得不知所措。

第二章 维也纳会议和 最初的民族起义

23

1814年9月，拿破仑一世被囚于厄尔巴岛上，欧洲终于突然出现和平局面，君主们与全权使臣们于是车马骈连涌向维也纳，举行为期九个月的会议。有这么多欧洲国家参加的盛会，以前唯独1648年在威斯特伐利亚见过一次，可是那次俄国与英国都未被邀出席。现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占用了霍夫堡宫的一厢，英国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勋爵则驻节于米诺里滕广场。这是政界显要与社会野心家们一次令人瞩目的集会，控制奥地利外交政策已经五年、而且还将继续控制三十四年的莱茵省人梅特涅，主持了在巴尔豪兹广场举行的多次委员会会议；他的首席顾问、在奥地利外交界供职的普鲁士人弗里德里克·冯·根茨担任大会秘书，并在赛莱尔街他下榻的地方举行了菜肴精美的宴会。法国波旁王朝的发言人塔莱朗也在约翰街举行招待会，城内某些地方住着三十个德意志诸小国的统治者和随行的大臣与名妓。在诺伊斯多夫和科本兹郊区的葡萄园中，一群波兰伯爵满怀希望地等候始终未至的召唤。还有一个衣着华丽的瓦拉几亚人，代表着苏丹，以及一个除了自己而外谁也不代表的来自美国费城的博尔曼博士，可是社交界接纳了他，不过只作为君主马戏团中一名共和主义的畸人罢了。

维也纳的和平缔造者们最关心的是德国、意大利和西方的问题。他们自然都把巴黎视为革命病毒的发源地，他们的努力大部分是为了把法国遏制在它原来的疆界之内。梅特涅从自己的社会与政治经验得出如下的结论：假定法国仍将是对和平与秩序的最

大挑战；但从习性上看，他是“西方人”，而不是“东方人”。但是，既然这次会议要谋求整个欧洲的“全面和平”，就不能完全忽视占欧洲大陆三分之一的东部地区；在这里，前一世纪的巨大变迁是作为一个主要国家的波兰国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帝国。

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在整个维也纳会议期间都因1812年战役的余悸犹存而患严重的炮弹休克症。法国人指挥一支泛欧军队的战绩使他们为之震惊，而俄国居然能力战敌军把它赶过了涅曼河及其以远的地方，使他们同样担心。卡斯尔雷也为俄国军队深入西欧腹地而忐忑不安；因为沙皇亚历山大1814年4月胜利驰入巴黎，乃是自1413年英格兰亨利五世之后进入这座城市的第一个外国征服者。看来，异军突起的俄国武力是对于欧洲交界地区权力转移的最佳解释。哥萨克人控制着波兰，沙皇的特工人员已渗入多瑙河流域两公国和塞尔维亚。不仅如此，仿佛是为了炫耀他的底覆之广，亚历山大率领的与会代表团甚至还安置了一名波兰贵族（亚当·查尔托里斯基）和一个出生在科孚岛的希腊人（约翰·卡波第斯特里亚）。难怪根茨要写信提醒梅特涅说，俄国是拿破仑权威被打垮以后的最大受益者。哈布斯堡王朝若要保持它在中东欧称雄的地位，最重要的一着是必须阻止俄国前进。夺取对夹缝中间诸国主宰权的长期较量就此开始；争夺双方首先要在波兰问题上对阵，这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了。

波兰问题之严重，似乎一时又带来了新的战争威胁。拿破仑的军队横冲直闯，破坏了1795年的领土划分格局：普鲁士在1807年把它分割来的一份丢给了华沙大公国；奥地利在1809年放弃了加利西亚。但到1813年春天，整个波兰都落入俄国掌握之中，最后正如沙皇本人直截了当地对卡斯尔雷强调的那样，他本人便是波兰前途的主宰，因为他的军队占领了波兰每一座城市。“我已经征服了公国，我有五十万大军守住它，”他说，“普鲁士应得的一份

我会还给她，但对奥地利就连一个村庄也不给。”但对于波兰的地位，正像对多数问题一样，亚历山大却举棋不定。他的大臣和将领都希望把整个波兰并入俄罗斯帝国，作为“全体俄罗斯人极权君主”的亚历山大同意他们的意见。但是作为独一无二的神的意志的执行人，“有福的亚历山大”，却不怎么拿得定主意：他有意承认波兰的部分权利，一部分是由于他与恰尔托雷斯基的友谊，但是也由于他思路不清、感情脆弱，使他总是钦佩坚定不移的对手——他甚至曾经派遣俄国的仪仗队去巴黎向爱国的革命党人科希秋什科致敬。波兰人自己只愿求得一个恢复独立自主的王国，而不问谁作国王，但是他们却只能接受沙皇给予的恩赐。虽然一般说来，普鲁士人对俄国的西进怀着戒心，却准备把波兰的领土牺牲给沙皇，以换取莱茵河流域和萨克森的德国一片肥沃土地。惟独奥地利人对沙皇亚历山大的企图深怀敌意：他们认为，1795年的无耻交易还保持着一项合法契约的尊严。 25

就波兰的前途进行的谈判持续了五个月；其中有三个月，沙皇亚历山大甚至拒绝和梅特涅讲话。前盟国之间的分裂实在太深，所以梅特涅与卡斯尔雷一起在1815年1月3日同塔莱朗签订了针对俄国和普鲁士的秘密军事条约，以防战事再起或俄国向维也纳进军。不久，这一同盟经过一番大肆渲染之后，传到沙皇亚历山大和普鲁士国王（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仍然是梅特涅在霍夫堡宫的主子每日用餐的伙伴）那里。然而，战争的恐慌基本上是人造的，这一同盟徒有虚名，只不过是交相讹诈而已。因为亚历山大心里明白，梅特涅心里也清楚，一场新的波兰战役为双方力所不及。这一危机以令人难解的速度烟消云散，并且在五星期内达成了一项瓜分波兰领土的协议，这局面保持了一个多世纪，只在1846年略有改动。

后来并入维也纳正式条约里的关于波兰的议定书，把波兹南

分给了普鲁士，把加利西亚分给了奥地利。克拉科夫和一个六百平方英里的地区变成一个中立的独立共和国。包括华沙本身在内的前大公国的其它部分成为一个由俄国沙皇统治的王国，沙皇自然把 1772 年与 1793 年两次瓜分中所得到的土地仍然作为其帝国的一部分保留了下来。这样，该协议就对旧波兰国的幽灵作出两项让步的姿态：克拉科夫——波兰生活中的第一个文化中心——得到少许的自由；一般称之为“会议波兰”的王国被蒙恩赐予一部宪法，其中规定建立波兰议会和波兰军队。但是宪法的序言明白宣称，波兰之享有权利全承俄国沙皇的恩赐。恩赐的权利是易于撤销的；波兰人对王国的政治生活所设想的自己能有所贡献的前景大都属于虚幻。罗曼诺夫王朝在华沙稳坐江山，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亦复如此。

俄国在另一地区的推进，对奥地利利益的威胁最终比在波兰为大，这地区就是比萨拉比亚。根据 1812 年签订的布加勒斯特条约，俄国的东南边界已经推进到了普鲁特河两岸；俄国军队再向上
26 土耳其帝国深入一步，就能在多瑙河入黑海处附近渡河，从而扼制奥地利的交通要道。梅特涅本人是个地道的德意志人，他倾向于不去管这些问题：没有什么事实可以证明他平生曾从维也纳顺流而下走出过一百多英里，有一次他宣称“亚洲始于兰芝路”，而兰芝路是从维也纳通向东方的一条大道。相反，根茨虽然与梅特涅同样是德意志人，眼界却较为开阔；他了解多瑙河两岸的国家，而且在整个会议期间与瓦拉几亚的一个省总督（霍斯波达尔）天天有书信来往。劝说哈布斯堡王族放弃其历史地位并致力于支持奥斯曼帝国而切莫推翻它的，不是别人，正是根茨。他在 1815 年写下了这样的预言：“上土耳其君主政体一朝覆亡，奥地利君主政体也就长久不了。”

但是东方问题看来一时还没有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而奥地

利人则想把它束之高阁。然而，由于卡斯尔雷没头脑地建议由列强全面保证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沙皇就向这位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了这个关于保证的问题。亚历山大告知卡斯尔雷，他希望英国、法国和奥地利能在俄国与土耳其之间进行调停，这样，俄土两帝国之间的所有悬而未决的问题都能在作出国际保证之前得到解决。涅谢尔罗迭（俄国外交大臣）提出一项备忘录，重申俄国的主张——第一次是在叶卡特琳娜二世统治时代试探性地提出的——要求保护所有生活在苏丹统治下的基督教徒，虽然这次没有把居住在塞尔维亚、希腊、黎凡特或君士坦丁堡当地的基督教徒加以区别。但只要俄国的建议还是如此包罗万象，苏丹就有充分理由拒不讨论哪怕仅仅是进行调停的可能性。幸运的是俄国人还没做好强行解决这个问题的准备，梅特涅与根茨便想出办法使它很快就搁置起来了。这是个简单无解的问题。熊已经咆哮开了，顷刻间就要张牙舞爪了；没理由认为，不睬它，它会自动地走开。

这样一来，在维也纳达成的解决办法实质上是俄国的失败。沙皇亚历山大赴会时，军威赫赫，不可一世，离会时，除了华沙而外却别无所获。就连他那个保证各君主国团结一致的朦胧不清的计划之得以实现——把这样一个名称来代表“神圣同盟”该不至于太庸俗吧——也是在维也纳会议结束之后。一切条约都没有给沙皇多少东西。他的祖母在第一次瓜分（1772年）中所得到的主要是非波兰人居住的土地被确认归俄国所有，1793年与1795年获得的各族杂居地区同样地得被确认。亚历山大经拿破仑同意，在1809年27从瑞典手中夺得的芬兰，被承认为俄国的一个省，而比萨拉比亚——与土耳其进行七年战争所得的唯一好处，也勉强地得到承认。但是除了本身就是一种妥协办法的“会议波兰”之外，并没有新的领土划归沙皇统治。这样一些条款看来不足以补偿当时战争造成的损失与破坏。

相形之下，哈布斯堡王室的收获倒十分可观。统辖德意志邦联的头衔并没给弗朗西斯皇帝带来什么真正的政治权力，因为新体制只不过是三十五个邦国与四个自由市组成的松散的联合，并无中央权威。但是它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蒂罗尔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等各个不同的地区获得一定程度的统一，而且它们全都在哈布斯堡的霸权统治之下。与此相似，弗朗西斯皇帝使整个意大利半岛都成为他自己的属地，而他便得以左右欧洲的中部带状地区，这种控制由于兼并了伦巴第与威尼提亚^①而进一步加强。在东部，整个伊斯特拉半岛与达尔马提亚沿海岸一带和岛屿都成为奥地利的属地，同时，哈布斯堡王朝又重新统治了在波拿巴变乱年代暂时失去的省份——斯洛文尼亚、卡林西亚西部、克罗地亚的一部分和加利西亚。“奥地利帝国”1804年仅正式宣布成立，1815年才在维也纳会议上默认其存在的理由是为了保持中欧的完整。但是这种完整是针对什么而言的呢？帝国盾形纹章上的双头鹰面朝两个方向，这既证实奥地利的强大也证明奥地利的虚弱。

传统上，西方历史学家把1815年的条约看作18与19世纪的真正分水岭，它使那个把“维也纳”与“凡尔赛”分开的时代在时间与特点上成为天然的整体。历史时期的划分从来都必定出自武断，所以这种看法也同其他看法一样很值得商榷：维也纳会议的确是个鲜明的界限，一边是二十五年的革命与战争，一边是嗣后终于导致意大利统一与德国统一的数十年的表面和平与内部动荡。整个这一世纪中，欧洲大陆的事务都由在维也纳首次加油润滑的外交机器来调整，其外交程序之文明礼貌，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此后便无人理睬这一套了。即便是在欧洲东部交界地区，维也纳条约的

^① 威尼提亚(Venetia, Veneto)，是古代罗马的一个行省，在今意大利东北部和南斯拉夫西北部，一作威尼托。——译者

条款也都得以罕见的长期维持：正如 1817 年奥地利的四桅战船在普拉和科托尔港外停泊一样，1917 年，奥地利的无畏舰队仍在那儿停泊；敌对的两军在沿波兰的边境线上互相对峙长达九十九年之久，从无越界的举动，虽然双方没有任何一个据点在军事上足资 28 防守。然而，维也纳会议实质上是一次统治者的会议，而该会议的决议必然大事宣扬的是总理大臣们的意见，决非各国人民愿望的微弱呼声。那些在维也纳集会的人们深深地意识到“革命”宛如山雨欲来，意识到他们构想的欧洲是一个保守的、压制人民的欧洲；他们却未能看到另有一种挑战、一种与“雅各宾主义”全不相干的民族意识正在他们各自的领土上发展着。对于这些从属的民族来说，主要的是证实了哪一个君主政权不会承认他们；除此之外，1815 年的种种大事对他们皆毫无意义。

几乎近代世界所有的种族集团对其共同传统的最早意识都产生于语言与文化的复兴。在欧洲的靠东的三分之一地区，便是如此，例如，人们比较熟悉的意大利（甚至，在爱尔兰和威尔士）也是如此。18 世纪最后几十年的启蒙的理性主义，虽然本身是带普遍性的，在中欧则激发起一种探究各种口语的源流与方言特征的精神，所以民族主义的旗手们并不首先是争夺街垒的浪漫派革命者，而是争论正字法的语言学家和词典编辑者。再往东，在土耳其帝国统治下的各国，这个运动的形式稍微不同一些，因为东正教总是喜爱在他们的礼拜仪式上使用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希腊语，尽管教会无休止地使用这些古老语言，后来竟使有语言纯正癖的学者和文人们感到恼火。当然，波兰有特殊情况：在一个时期的文艺复兴、特别是戏剧繁荣之后发生了被瓜分的悲剧；但是对于语言的狂热崇拜扩大了爱国斗争的基础，天主教传教士克普辛斯基在 1778 年出版了《民族学校语法》（Grammar for National Schools），林德在华沙大公国存在的七年中主编了一本权威性的波兰语词典。

由于浪漫主义诗歌的鼓舞，文化民族主义的第二阶段在波兰比在中东欧的其他任何地方都来得较早一些。

在有些民族中，从民族意识的最初觉醒到采取政治行动，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停滞。譬如，第一部罗马尼亚语语法是在1780年由特兰西瓦尼亚的东仪天主教会^①的神学院二名学生（承认罗马教皇至高无上权力的东方基督教徒）编辑出版的。以此成功地维护了拉丁字母对西里尔字母^②的绝对优势，他们清楚地表明罗马尼亚人在东南欧各民族中与众不同。而居住在喀尔巴阡山彼侧的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罗马尼亚人显示出他们的国家观念，却是三代人之后的事了。再有，虽然保加利亚修道士帕伊西在1762年就完成了一本历史著作《保加利亚、沙皇与圣徒的历史》，这本书直到1841年俄国人开始从边境那面来“教育”保加利亚人时方才印行。少数知识分子的爱国自尊心虽能点燃民族性之火，却不能使它一直燃烧下去；在很大程度上总是要看是否有可能得到外来援助或权势人物的支持。

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境内，国王有时对西部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的语言复兴敷衍塞责地予以支持。例如玛丽亚·特丽萨女皇1775年批准在维也纳大学开设捷克语课程，十六年后，布拉格大学才开这门课；利奥波德二世皇帝（1790—1792年）赴布拉格加冕为波希米亚王时，甚至从头至尾观看了用捷克语表演的戏剧节目。弗朗西斯皇帝1792年批准把马扎尔语列为匈牙利本土（除边屯区、克罗地亚和特兰西瓦尼亚等各族杂居地区以外）的高等学校必修课；从1805年起，并允许其匈牙利臣民不用德语或拉丁语而用

① 东仪天主教会(Uniate Church)承认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威而仍保留其原有的东方宗教仪式的天主教徒和教会。——译者

② 西里尔字母(Cyrillic alphabet)是9世纪传教士西里尔(Cyrl)发明的以希腊语为根据的古斯拉夫语字母，亦即现在俄、保及其他斯拉夫语国家字母的本源。——译

马扎尔语同匈牙利大臣官邸通讯,但德语和拉丁语直到 1844 年还是法定的国家语言。另一方面,在约瑟夫二世(1780-1790 年)统治的十年期间,政府公务与公众教育却厉行德语化——于是在波希米亚和匈牙利激发起人们对本国语言的顽强的自豪感,这是求生存的民族意志的表现。约瑟夫在没有意识到其行动的政治后果的情况下于 1781 年颁布信仰自由令,准许新教徒、东正教徒与罗马天主教徒在宗教和公民权上完全平等,间接地鼓舞了语言上的爱国主义。例如,布拉迪斯拉发的路德教文学会成了捷克与斯洛伐克文学活动的中心,其学者中有泛斯拉夫主义诗人杨·科拉尔(他本人即是路德教文学会的牧师),还有伟大的捷克历史学家弗朗蒂舍克·帕拉茨基。捷克语语法和正字法的基本规则,像在波兰一样,是由天主教教士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制定的,有意思的是此书是用德文写成的。

斯洛文尼亚的语言运动,从某些方面来说,对南部斯拉夫人是一种虚假的曙光。斯洛文尼亚语是一种斯拉夫语,它古老,却富有特色。18 世纪时,这种语言仍在他们聚居地使用,这些聚居地主要分散在卡林西亚、施蒂里亚和被称为卡尔尼奥拉省亦即莱巴赫(卢布尔雅那当时的名称)周围的地区。斯洛文尼亚传奇文学与民间故事的研究主要应归功于佐伊斯男爵(Zois,斯洛文尼亚语为 Cojz)的赞助。他是一个业余学者,富有的矿场主,典型的“启蒙时代”人物。天主教方济各会神父瓦伦丁·沃德尼克凭借佐伊斯的财力支持,1797 年在卢布尔雅那创办第一家斯洛文尼亚文报纸,并且出版了斯洛文尼亚语的入门手册,以及学术性较强的关于语法结构原则的著作。从 1809 至 1814 年的五年间,斯洛文尼亚的大部分 30 地方(加上达尔马提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缘地带)成为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称为“伊利里亚诸行省”,而沃德尼克受命负责发展新行政区的教育。新行政区从菲拉赫延伸至杜布罗夫尼克,以卢布尔雅

那为省会。沃德尼克在一首颂歌中欢呼拿破仑是斯洛文尼亚人的救星，一位“伟大的英雄”，他号召伊利里亚“抖掉一千四百年的灰尘”，“一只手安放在高卢，而把另一只手伸给希腊”。这里，诗人对历史事实既不拘一格，对人体结构也灵活处理了；因为把斯洛文尼亚人与古代的伊利里亚人混为一谈，其实并无根据。不过这种情绪在当时是无可厚非的，虽然很快也就过时了。

不过，法国的统治这一短短的插曲对斯洛文尼亚人却有双重的重要性：它相当可观地改善了这整个地区的物质条件；它第一次使斯洛文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在一个政治共同体中相处。法国对斯洛文尼亚文化采取的鼓励态度，迫使奥地利在施蒂里亚（那里的斯洛文尼亚人约占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临时边界另一侧的格拉茨城建立了一个旗鼓相当的斯洛文尼亚研究中心，以资对抗。耶尔内伊·科皮塔尔在格拉茨进行的语言学与语法方面的研究补充了沃德尼克的工作。科皮塔尔虽然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语言都感兴趣，在政治上却是个特别激烈的斯洛文尼亚主义者，敌视伊利里亚这一概念，因为他担心斯洛文尼亚特有的传统会被它淹没不彰。意味深长的是，1815年卢布尔雅那重归奥地利统治时，沃德尼克从公共生活中隐退，而科皮塔尔成为政府的检查官，“伊利里亚主义”仍旧是梅特涅的欧洲的一股活跃力量，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因为杰出的青年学者路德维特·盖伊的鼓动，其领导权由斯洛文尼亚人转到了克罗地亚人手中。整整一个世纪中，斯洛文尼亚文学一直繁荣；但斯洛文尼亚人再次参加沃德尼克曾经倡导的共同的南斯拉夫运动，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政治上的这种放弃，一部分是科皮塔尔奉行文化孤立主义的后果；不过，这也是因为一则生活水平比较富裕，一则地理上的偶然情况致使斯洛文尼亚人散居在至少奥地利的六个省份，有助于促成这种情况。

塞尔维亚文化觉醒的政治影响,要比斯洛文尼亚的较为长久。它也发端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境内。1691年,一大批塞尔维亚移民逃避土耳其的迫害,相率越过多瑙河,定居在后来被称为伏伊伏丁那的地区。这些叫作“普雷恰尼”^①的塞尔维亚人迅速建立起自己的学校和宗教组织,当然也形成了一个控制南匈牙利大部分商业的中产阶级。在伏伊伏丁那,塞尔维亚青年人所受的教育性 31 质上当然属于狭隘的僧侣教育,但还是造就了启蒙时期杰出的塞尔维亚学者——修道士多西特·奥勃拉多维奇。1760年,由于一次青年人的造反,他失去了职位。奥勃拉多维奇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来说服他的同胞们有必要用通顺的散文表达口头语言,摆脱早期作家生搬硬套的那种矫揉造作的文雅俄语和宗教语言。他认为无论天主教教会还是东正教教会都是分裂性的势力,用不同的礼拜仪式这种毫无意义的障碍,“使一个(同族)大家庭的成员分了家”。他以理性主义者对基督教教会的疑忌,作为渴望建立南斯拉夫联邦的论据,这一点——至少在他的自传里是如此——使人想起他的同时代人、英国的爱德华·吉本^②。

奥勃拉多维奇远非典型的“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与他那处于愚昧无知桎梏中的南方同胞就格外不同。他的文笔属于城里人的精致风格,与民间口语相距已远,可能比他自己觉察到的更远。他的恐俄症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而他的不可知论在社会上又显得十分古怪。没有什么事物足以动摇塞尔维亚人对他们教会的狂热的忠诚。甚至在奥勃拉多维奇生活的时代里,在塞尔维亚本土,教会似乎比以往越发显得是民族传统的捍卫者。因为在1722年,希腊的宗主教团曾诱使土耳其人取消了塞尔维亚主教的职权,从而把希腊文化的统治强加给塞尔维亚人,其无孔不入,并不亚于土

① 原文为prečani,意即越境者。——译者

② 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英国历史学家。——译者

土耳其人的政治统治。较之奥勃拉多维奇的批判性研究，塞尔维亚领袖倾向于更加珍视因袭传统学说的隐修士约万·拉伊奇的爱国主义历史著作。但是，作为一个语言改革者，奥勃拉多维奇的学说对南斯拉夫各民族的发展却有双重意义：它使伏伊伏丁那成为塞尔维亚主义的文化源泉；又一反十个世纪的历史，坚持肯定塞尔维亚语与克罗地亚语之间的根本亲属关系。“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中还有其他一些文人，但就欧洲政治的最终格局而言，其重要性都不如他。

民族意识对奥斯曼帝国政治权力的首次挑战，发生在萨瓦河与多瑙河两河彼岸的塞尔维亚本土。18世纪末叶，土耳其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统治腐败而又无能。土耳其近卫军本来是苏丹精选的卫士和精锐部队，却变成了君士坦丁堡奥斯曼政权的心腹之患，以至历代统治者采取的政策都是把他们大批打发到边远省份，特别是塞尔维亚。近卫军“达比”^①在很大程度上独自行使其权力，残酷任性不亚于西欧任何封建贵族。他们既不尊重苏丹的代表即贝尔格莱德的帕夏，也不尊重村民推选的专门负责塞尔维亚人与奥斯曼行政机关之间联络工作的代言人。1801年，“达比”们处死了帕夏；三年后，他们又命令土耳其近卫军杀害七十二名农村中的长者。塞尔维亚人起义就是在这场大屠杀的阴影下开始的

起初，塞尔维亚人的斗争是一场反抗“达比”暴政的运动。如果它始终如此，那就不过是转瞬即逝的插曲，不会成为历史事件。土耳其边远省份的农民造反并不罕见：1820年到1840年之间，在波斯尼亚发生过五次，在阿尔巴尼亚发生过三次，全都很快被残暴地镇压下去了。塞尔维亚人的起义却与其他起义不同，它有若干支

① 原文是 dabis，意即指挥官。——译者

有组织的、武装得很好的骑兵参加，有建立政府机构的自觉愿望，在起义中还出现一位天然的领袖。不幸，这次起义也远远没有获得预期的成就。

舒马迪亚的荒山野林，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无法无天的地区，进行着所谓的哈伊杜克^①战争，即后来被誉为新生的爱国主义，其实不过是土匪行为而已。哈伊杜克首领中有个五十二岁的猪贩子乔治·彼得罗维奇，此人年轻时曾越过边界去伏伊伏丁那参加奥地利军队，因勇敢过人荣获勋章，升为军士。随后又返回舒马迪亚，以个人勇敢和极其暴躁而驰名。他像农民起义中的其他传奇式人物一样，终身一字不识，却由于和“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经常接触，比较能认识政府组织的重要性。部分由于他一副黝黑的外表，部分由于他暴跳如雷的性格，故被称为“黑色的乔治”（即卡拉乔治），这个绰号竟成为巴尔干半岛当地执政时间最长的唯一王朝的姓氏。从来没有人选卡拉乔治当村民的代言人，这大概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既不够圆通，也不善逢迎。但是1804年2月在贝尔格莱德以南五十英里的奥拉沙茨举行的一次塞尔维亚人大会上，他被推举为起义领袖。尽管后来他和最初的支持者们发生争吵，但仍不失为合适的人选。

卡拉乔治是铁托的样板——这只是在起义的策略方面，而不在其他方面。他是位出色的军事领袖，能把各个哈伊杜克游击队联成一气，向土耳其近卫军发动一连串协调一致的攻势并大获全胜，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在贝尔格莱德四周山坡上安营扎寨。嗣后十二个月中，塞尔维亚北部的要塞城市一个接一个地被起义者攻陷，唯独贝尔格莱德这座堡垒直到1806年11月方才投降。卡拉乔治在起义的最初阶段就考虑建立一个独立的、至少是自治的塞尔

^① 即塞尔维亚、保加利亚等国家反抗土耳其压迫者的群众性武装组织。——译者

33 维亚，即使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曾准备与苏丹的代表们暂时妥协，以便对付“达比”们。奥拉沙茨会议以后不过九个月，一个由马蒂亚·奈纳多维奇率领的塞尔维亚代表团便抵达一千二百英里以外的圣彼得堡，与查尔托里斯基（当时的俄国外交次官）会晤，谋求俄国支持塞尔维亚的自治。除了一小笔经费，一些高明的主意，和表示一点谨慎的同情以外，查尔托里斯基没给他们多少东西。但是尽管这次出使一无所获，却证实当时正在塞尔维亚发生的事情并不只是农民骚动。代表这次起义的大使们出现在圣彼得堡精美的廊柱中间，对所有超国家的帝国的统治者都是不祥之兆。在一定的時候，俄国人的确提供了军火和几支部队，但是大部分时间塞尔维亚却被丢下不管，全凭自己努力奋斗。

足有八年，卡拉乔治控制着一个实际上独立的公国，其疆域从萨瓦河与多瑙河开始，越过舒马迪亚直抵摩拉瓦河谷。苏丹拒绝了他所提出的承认塞尔维亚自治这种解决办法，卡拉乔治就着手组织中央政府，成立国务院和国民议会（斯库普什丁纳）^①。被卡拉乔治任命为教育大臣的奥勃拉多维奇和其他塞尔维亚学者都急急忙忙地从伏伊伏丁那赶往贝尔格莱德。奥勃拉多维奇创立的一所中学虽然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破坏性战争，今天依然屹立在贝尔格莱德。

然而，到1813年10月，卡拉乔治的反抗行动便以惨败告终，他本人在灰心绝望中逃往伏伊伏丁那，政府机构也随之瓦解。土耳其人显然是胜利了，并重新进入贝尔格莱德，再次以恐怖手段统治着整个塞尔维亚。他们成功的某些原因是军事方面的：他们比1805至1806年时人数较多，指挥有方。此外，俄国、法国和奥地利都忙于参与莱比锡战役，塞尔维亚人已毫无获得外援的指望。但

① 原文是 Skupština，意即国民议会。——译者

是最应受到责备的还是塞尔维亚人自己。卡拉乔治在管理国家事务上越来越任性，他以军事专制的君主国代替起义初期的家长式民主；他徒然向拿破仑和梅特涅求援，甚至提出割让塞尔维亚的一些要塞；最主要的是他控制不住手下的军队指挥官，其中许多人变得像“达比”一样武断专横。1813年，土耳其人再次进犯时，自治的经历已使塞尔维亚农民的幻想破灭：因为在城镇里受黑市盘剥，在农村里遭军阀勒索，他们已经缺乏以游击战继续进行抵抗的意志，于是，起义就像它突然爆发时一样地突然垮掉了。大约两万四千名塞尔维亚人逃往伏伊伏丁那。另外有很多人把武器藏在山上。妇女在贝尔格莱德市场上被出卖，她们的父亲和丈夫则在城门前受刑，周身都被敌人用木桩扎透了。

十八个月后，塞尔维亚再次起义。这次起义由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领导，他四十二、三岁，甚至远比卡拉乔治还要狡猾。他的军事策略是机智的侧翼包抄运动：土耳其的一支万人部队向他原来的驻地慢吞吞地开来，他这时却沿着山间小路直趋全未设防的城市。在这两次起义之间，米洛什给土耳其人造成一种印象：认为他是个甘心和他们勾结的人物，等到北塞尔维亚一旦掌握在他手中，他便再次寻求与苏丹订立协定。他们制定出一个古怪的妥协方案，尽管土耳其人直到1830年才正式予以承认。方案允许塞尔维亚人参加司法行政，保持一支民兵部队，并在贝尔格莱德召开国民大会，但塞尔维亚仍然是土耳其的一个行省，城镇中照样驻扎土耳其军队，代表苏丹的土耳其帕夏依旧留驻在卡拉梅格达姆城堡里。米洛什与土耳其人谈判了十七年，土耳其人才承认他作为大公有管理卡拉乔治曾经控制过的这些疆土之权，在这方面他显得很有耐心；可是，他对本国的政敌则毫不留情。卡拉乔治本人于1817年从匈牙利南部回到塞尔维亚，随即被人谋杀，据说这是出自米洛什的指示（应当提到，米洛什认为卡拉乔治在1809年毒死

了他的异母兄弟)。卡拉乔治维奇和奥布雷诺维奇两个家族的仇杀一直到 1903 年方才罢休，这种激烈的内争削弱了塞尔维亚国家，而其残忍则使这个君主国名誉扫地。

塞尔维亚求解放的斗争的重要性对欧洲来说是难以估量的。许多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忽视它，而把各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头等重要的地位归于希腊人。塞尔维亚公国早期的统治者从未实现卡拉乔治政权最初几年的理想。瓦绍·楚布里洛维奇教授在纪念塞尔维亚起义一百五十周年的著作中论证说，1813 年的失败将塞尔维亚的发展推迟了半个世纪。1854 年，土耳其人仍驻守着塞尔维亚八个城镇；直到 1867 年他们才终于离开贝尔格莱德的卡拉梅格达姆要塞；以后又过了十一年列强才承认这个公国的完全独立。塞尔维亚发展的速度，比查尔托里斯基在圣彼得堡接见奈纳多维奇代表团时似乎可能要慢得多。当时吸引欧洲注意的不是公国内的塞尔维亚人，而是“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这一点在 1848 至 1849 年尤其明显，伏伊伏丁那仍然是塞尔维亚文化智识菁华荟萃之区。只有到了 20 世纪，塞尔维亚这两次起义的全部意义才明显起来：卡拉乔治、米洛什以及许许多多传奇般的哈伊杜克骑兵们

35 在两大帝国之间安置了一个微小却强有力的民族主义磁石，它终于吸引了所有塞尔维亚血统的人以及许多其他与南部斯拉夫民族有血缘关系人们的耿耿忠心。如果没有这块磁石对哈布斯堡和奥斯曼帝国国内从属民族的吸引，中东欧的历史，乃至整个欧洲大陆的历史便会完全不同，其结果兴许较好，多半会更糟。

塞尔维亚的起义不仅表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虚弱，也显示它的恢复力和坚韧性。土耳其人一直对巴尔干各族人民管理不力，却长于对党派和民族间的纠纷推波助澜。如果他们的敌手是毫无民族观念、劫掠成性的军阀，苏丹们便采取一种简便而并非独创的政

策：即挑拨互相猜忌的巴依^①和邻人们火并，然而往往还要经过多年的流血和厮杀，才能谋得解决的办法。土耳其人正是用这种方法除掉了19世纪初年在瓦拉几亚和塞尔维亚边缘地带恣意劫掠的维丁（现为多瑙河上保加利亚一港埠）的帕夏、巴斯温-沃格鲁。在历时三十年的地区冲突和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远征之后，1822年他们用同样方式消灭了自从斯坎德培^②以来最杰出的阿尔巴尼亚首领，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但是，这种简单办法毕竟解决不了希腊问题，虽然土耳其人曾经一度企图如此行事。因为希腊独立斗争引起的一些问题关系到整个东南欧，致使国际强权政治这一笨重的机器也得开动起来。

导致1821年起义的思想，在东地中海和黑海的希腊商人殖民地酝酿了已经几十年。起初，这一运动极其雄心勃勃。其目的不单是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民族国家，而且要建立一个由希腊人治理的巴尔干联盟，一个现代的拜占庭，其疆域包括多瑙河两公国、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整个马其顿和色雷斯、君士坦丁堡、黎凡特的大部分以及一般公认构成希腊的地区在内。鼓吹这种新希腊主义的学者、预言家的典型代表是赫尔松的沃耳加里斯大主教，他声称希腊人将“凭借福音书和荷马”重新统治近东。不过也有若干积极反对东正教教会实际垄断希腊事务的世俗作家：一位是1798年被土耳其人处死、成为第一位伟大的民族英烈的康斯坦丁·里加斯·费拉伊奥斯，他的著作根本上属于非宗教性的爱国诗篇，表达了巴尔干统一的概念；另一位是不愧为古典学者的阿迪曼提俄斯·科腊伊斯，1804年他前往巴黎，谋求法国理性主义者同情于建立一个新希腊。然而，这一运动最出色的表现形式 36

① 巴依(bey)是土耳其次要省份的省长。——译者

② 曾率领阿尔巴尼亚人反抗奥斯曼人的统治。——译者

却是“菲莱克希特里亚”^①，即一伙商人1814年在迅速扩大中的俄国粮食港口敖德萨建立的秘密社团，他们立誓要将巴尔干诸国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菲莱克希特里亚”认为它能够协调斯拉夫人和希腊人的利益。在卡拉乔治被害前不久，它吸收他为成员；它还寻求俄国政府的支持，特别指望得到沙皇亚历山大一世1816年任命与涅谢尔罗德同时担任外交大臣的科孚岛人约翰·卡波第斯特里亚的支持。不过，“菲莱克希特里亚”的政治宗旨过分激进，对俄国人是如此，当然，对希腊东正教教会的首脑人物和更加富有的法纳尔人也是如此。1817年，卡波第斯特里亚拒绝了他们秘密提出的要他担任该组织领袖的请求。然而三年以后，一个在俄国人看来更加激进的希特里亚成员亚历山大·伊普西兰梯将军承担起了卡波第斯特里亚拒绝的责任，并开始计划在东南欧发动总起义，预定起义在1825年举事。“希特里亚”的成员不仅与希腊诸岛上有势力的船主们建立了联系，而且与塞尔维亚的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约阿尼纳的阿里帕夏以及奥斯曼提名任命的摩尔达维亚的“霍斯波达尔”^②米海尔·苏图建立了联系。他们还与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接触，他出生于瓦拉几亚的农民家庭，此前，曾任沙皇军队中的军官，参加过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而且希望成为罗马尼亚的卡拉乔治。

伊普西兰梯性情急躁，易于冲动。他也真害怕土耳其人会过多地察觉他的计划。因此，1821年3月，在几乎毫无准备的情况下，他便带领一大队希腊学生渡过普鲁特河，向摩尔达维亚的重镇雅西进军，他在那里高举东正教大主教庄严地祈求上帝保佑他的

① 原文是Philike Hertaia, 希腊秘密会社。——译者

② 原文是Hospodar, 意即总督。——译者

这面旗帜，宣布十字架必将战胜新月。大起义过早地提前四年开始了，结果一败涂地，只有米海尔·苏图支持伊普西兰梯；甚至教会不久以后也转而反对他。沙皇正式将他从俄国军队中开除出去，并授权土耳其人采取他们愿意采取的任何惩罚行动。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则按兵不动。另一方面，弗拉迪米雷斯库抢在伊普西兰梯前面占领布加勒斯特，斥责入侵者是要使外来的法纳尔人的统治永久存在，为了回答起义军领袖向他呼吁合作，他直接了当地宣称：“希腊属于希腊人，罗马尼亚却属于罗马尼亚人。”伊普西兰梯部队的行为疏远了许多原会同情他们的人：他们在加拉茨城杀了一群土耳其商人；弗拉迪米雷斯库本人也在夜间被伊普西兰梯部下的一名军官杀死。十一天之后（6月7日）土耳其正规军在布加勒斯特西面九十英里的德拉格沙尼击败入侵军，伊普西兰梯逃往特兰西瓦尼亚（他在那里被逮捕，并根据梅特涅的命令被监禁了七年）。

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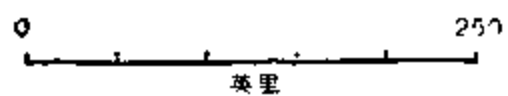
伊普西兰梯逃跑以后，“希特里亚”迅速瓦解，巴尔干地区总起义的计划从此无声无息。不过，“希特里亚”的成员已在伯罗奔尼撒半岛发动一次反抗土耳其人的起义，争取希腊独立的事业由帕特雷的耶尔曼诺斯大主教承担下去，不久，扩大到各岛屿，著名的是海德拉岛和斯佩齐亚岛。然而这新的运动已经纯属一场希腊的革命，一场民族的和宗教的斗争，其范围仅限于爱琴海沿岸地带和海上各岛屿，与多瑙河两公国的人民以及塞尔维亚的人民并无直接关系，虽然二者都因其后的国际协定而获益匪浅。

希腊独立战争与“希特里亚”的煽动迥然不同，与其说是夹缝中的各国历史上的一次事件，不如说是地中海各国人民和近东历史上的一次事件更为确切；但它的影响如此广泛，不能完全略而不提。希腊人和土耳其人的战斗从1821年4月开始，持续到1829年9月。战事起初有利于希腊人，后来在1823年，希腊领导人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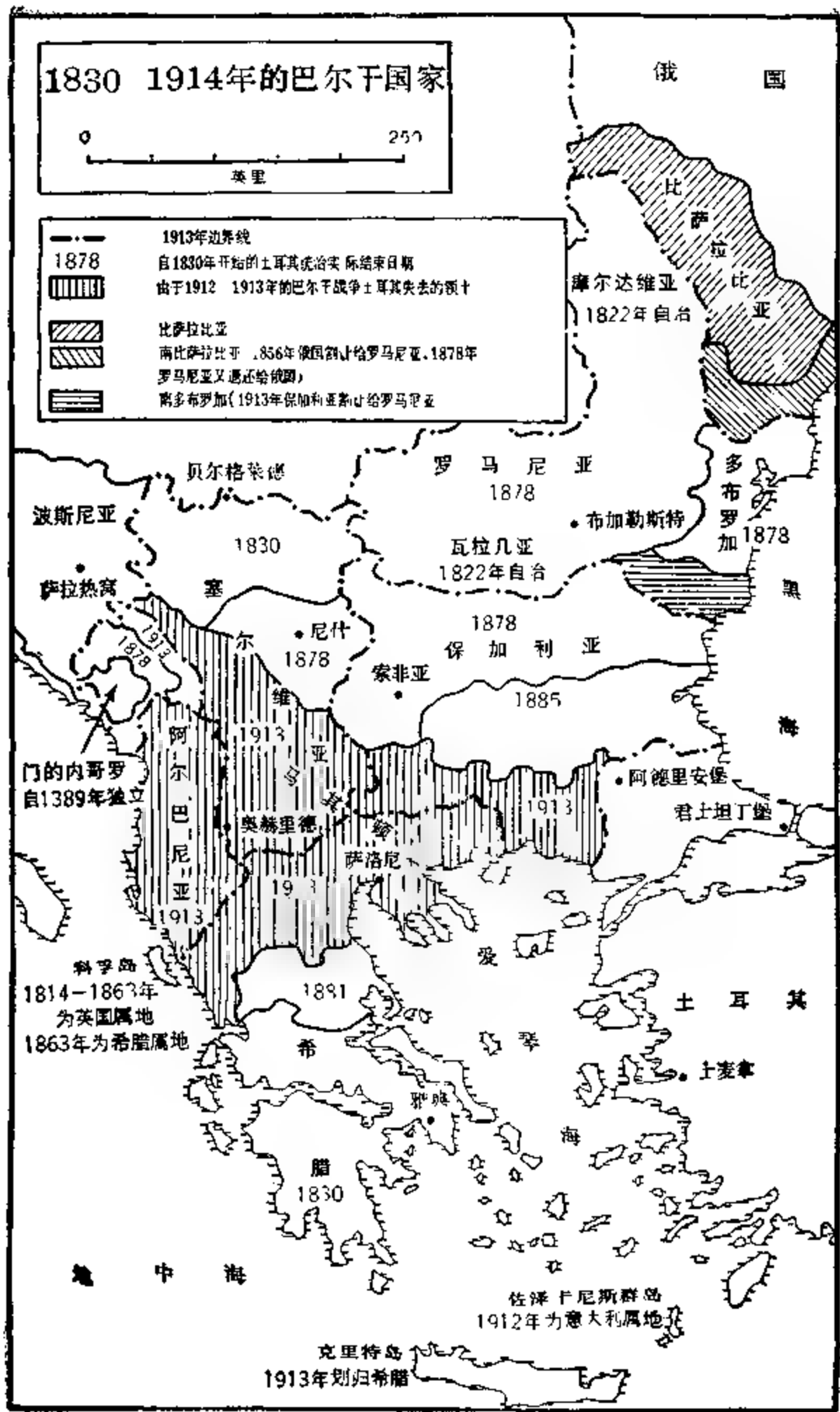
间公开发生冲突，苏丹便乘机重占雅典。次年，易卜拉辛帕夏率领的埃及实力强大的军队到达时，土耳其的情况更加好转。全靠列强勉强仓皇的干涉，特别是1827年英、法、俄三国海军中队在纳瓦里诺全歼土、埃联合舰队，才使希腊人免于败北。十分奇妙的是，在底比斯附近击溃土耳其军队，为希腊赢得最后胜利的不是别人，正是前“希特里亚”的指挥官的兄弟季米特里乌斯·伊普西兰梯。但是，有关划定疆界和新生的希腊国家性质的决定都不是在雅典、甚至也不是在君士坦丁堡，而是在圣彼得堡和伦敦作出的；这场外交谈判旷日持久，希腊独立战争本身反倒成了一种阴沉而有时令人厌倦的节外生枝的背景。

列强只是笼统地谋求欧洲的安宁，而希腊起义使他们处境狼狈，他们的政策也举棋不定。只有梅特涅始终如一地对东方的任何新安排持敌视态度，害怕土耳其的解体会像根茨预言的那样，危及奥地利帝国境内微妙的民族平衡。英国的舆论坚定地支持希腊独立运动，但历届政府的行动都很小心翼翼，复辟后的法国君主政府也持类似的态度。俄国的政策同样摇摆不定。宗教信仰和思想感情把俄国人和希腊人联系在一起，但是只要亚历山大一世在位，而他又不愿庇护叛乱，便牵制其不能进行有效的干预。沙皇的态度使卡波第斯特里亚的幻想归于破灭，他于是在1822年离开俄国；1827年成为希腊的第一任总统，四年后，被一伙妒火中烧的地主暗杀身亡。1825年，尼古拉一世继亚历山大即位，俄国人开始对土耳其人采取比较强硬的方针。然而，很清楚的是俄国人对于在多瑙河与君士坦丁堡之间的各国，比较对于在伯罗奔尼撒半岛这样偏远的地区确立影响更感兴趣。因此，苏丹的代表们在俄国的战争威胁下于1826年10月签订的《阿克尔曼条约》，实际上无视了希腊问题：该条约扩大了塞尔维亚的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享有的特权，规定土耳其从多瑙河两公国撤出军队，并从此以后

1830 1914年的巴尔干国家



- 1913年边界线
- 1878 自1830年开始的土耳其统治实际结束日期
- ▨ 由于1912-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土耳其失去的领土
- ▧ 比萨拉比亚
- ▩ 南比萨拉比亚, 1856年俄国割让给罗马尼亚, 1878年罗马尼亚又退还给俄国
- 南多布罗加(1913年保加利亚割让给罗马尼亚)



允许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的“霍斯波达尔”由罗马尼亚的“博亚”^①选举,而不再由苏丹直接任命。这些条款对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各民族有重大意义,但对希腊的斗争却无影响。

1828年4月,俄国终于真正对土耳其开战,俄军穿过两公国缓缓向前推进,首次翻越巴尔干山脉。到1829年9月,正当希腊最后几次小规模战斗进行之际,俄国骑兵部队自阿德里安堡磨师南下,直达距君士坦丁堡以西不足五十英里处的爱琴海边。土耳其人乞和,整个奥斯曼帝国的未来系于钧于一发。不过,作为最后的一着,俄国人就收缩了,他们不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他们害怕一旦奥斯曼帝国崩溃,其他列强将会要求领土补偿;对俄国在黑海的地位来说,它们最终将会成为比削弱了的奥斯曼政权更可怕的威胁。因此,《阿德里安堡和约》(1829年9月14日)只不过是把《阿克尔曼条约》加以扩充:它使俄国人在高加索获得相当可观的利益;它确保俄国商船队可自由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进入地中海;它允许俄国人对多瑙河两公国的“霍斯波达尔”的政务进行监督;然而,至于希腊本身,只限于促使土耳其人承认它需要在阿尔塔湾—沃洛斯湾一线以南的地方建立一个自治的国家。

有关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希腊王国的谈判又继续在伦敦进行了三年。英国人确信沙皇将把这个新国家变成俄国的卫星国;俄国人也同样肯定,1830年11月出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帕默斯顿想要把一位依附英国王室的亲戚安置在希腊的王位上。1832年5月,终于在伦敦签署了一项条约,规定在《阿德里安堡和约》认可的疆界内建立一个独立的希腊,归巴伐利亚的鄂图亲王统治。条约
40 上载明可能由英、法、俄三个“保护国”对希腊予以保证。事实上,

① 原文是 boyar,意即拥有土地的贵族。——译者

从未给予这样的保证，但这些保护国以后的行动就好像确有这一约束似的，因此有时有利于希腊（如在 1897 年），但有时同样也是为了它们自己的目的（如在 1913 年）。

《伦敦条约》虽然把将近二百万希腊人撇在新王国之外，只承认了希腊爱国者的最低纲领，但仍不失为各从属民族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西欧的政治家们为了保证希腊的独立而承认，如果土耳其像上个世纪的波兰那样从地图上消失了，便要设想出某种较为公正的秩序，决不能由现存的专制君主们厚颜无耻地将奥斯曼帝国的遗产瓜分了事。这本身便是一项重要的原则，纵然俄国人又花了二十五年才懂得它的涵义。从列强政治和当地人民理想相互作用所得到的启示，同样意义深长。没有外国的干预，希腊的领袖们便会遭遇与阿里帕夏和巴斯温-沃格鲁，甚至亚历山大·伊普西兰梯相同的命运。因此，希腊的起义证明了正如未来三十年内的意大利民族复兴运动更为清楚地表明的教训：为争取独立，单凭民族意识是不够的，必须有强大的外国势力作后盾。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都很好地汲取了这一教训。后来，捷克人和波兰人也以另一方式汲取了同一教训。

但是，这种情况还有另外的一面。外国从来不会本着利他主义精神给予支持。保护国对被保护国国内事务有相当大的干预权。例如，从希腊起义起至伟大的美利坚合众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止，列强认为新国家必须是君主国，这些国家的统治者必然出自公认的王朝，而非来自当地的家族。塞尔维亚这方面的经历从未重见于东欧其他地方，无容置疑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害怕一个土生土长的皇室会使世仇永远得不到消除，而有碍统一。此外，划定边界历来是欧洲各大国首都老练的政治家们自许的特权：边界是相互嫉妒对方利益的外交官们达成妥协的结果；绝少符合当地人民的心愿。到 1830 年，民族原则已开始成为政治才能的必要

因素，但“民族自决”原则的类似十字军一般的号召力，则还是很久以后才出现的事情。

第三章 街垒的年代

41

在希腊的独立获得承认后的三十余年中，对东方一些专制独裁国家称雄的主要威胁来自中欧的一些历史悠久的民族，而非来自巴尔干各国早期的民族主义。一个易受非理性的、但却富于诱惑力的政治上的浪漫主义激动的城市中产阶级，在多瑙河与维斯杜拉河流域各国家迅速成长，乃是梅特涅制度的心腹之患。与此同时，德意志人和意大利人中民族意识的传播威胁着维也纳会议整个解决办法的稳定性，为其他各从属民族既树立了榜样也提出了潜在的挑战。当然，直到1848年街垒才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里设置起来，梅特涅本人也只得去伦敦避难；但民族对抗的时代却比“革命之年”开始得早些，也持续得久些。正如法国波旁王朝于1830年的垮台和德意志诸小国与比利时的骚动预兆着西方嗣后十八年的动荡不安一样，东欧和中欧的情况也是如此：1830年11月的华沙起义给波兰人民和他们的邻国树立了一个起义的模式。1863年波兰又发生了第二次流产的起义，这个时代是怎样开始的也就怎样告终，真不禁予人一种历史上罕见的无比齐一吻合之感。

第一次波兰起义起因于1815年会议王国宣布成立之后所产生的幻灭感。起先，一切似乎都很顺利。俄国人准许波兰人有相当大的开发其经济资源的自由：于是开采了新的矿藏，建立了铸造厂，在华沙西南面昔日的一片林地里建立起纺织工业。公路干线把首都和各省连接起来。由于计划者和建筑者深入这一古老的自治城市的每个角落，华沙顿时面目一新，农民虽因战争的后果受了几

年苦，却也由于采用了比较科学的耕作方法而颇受其益。人口猛增，王国似乎大有物质进步的美好前景。随着工商企业的发展，出现了一个特有的波兰中产阶级，这对整个波兰民族来说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革命。

12 但到了1830年夏季，波兰农村虽然平安无事，城镇中则骚动不宁。俄国政府既颀顽无能，又令人失望。1815年，波兰人曾希望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会把王国政府委托给他的朋友亚当·查尔托里斯基治理，沙皇却选中了他的兄弟康士坦丁大公为总司令，而任命一个俄国地主尼古拉·诺沃西尔佐夫为全权代表，把所有的政治问题都交给他去解决。一些波兰人虽然高踞要职；直到1824年，查尔托里斯基是维尔纳大学校长（维尔纳当时不在会议王国境内），德鲁茨基-卢拜茨基是财政大臣，波兰经济的显著改进是他的功绩。但在大多数情况下，议会的代表仅限于波兰较大的一些地主。尼古拉一世于1825年继位，他一仍旧贯，没有任何新猷，因为，虽然众人皆知这位新沙皇憎恶波兰的一切事物，却一意维持他哥哥所创建的制度。1829年5月他按照惯例莅临华沙举行庄严的加冕典礼，而意味深长的是，加在他头上的是一项俄国皇冠，并非特制的波兰皇冠。一年后，他再次亲赴华沙参加波兰议会的一次会议。这时已娶波兰女子为妻的康士坦丁大公向沙皇大肆夸奖波兰军队，实际上，军官们正在不断地与秘密的爱国会社策划起事。巴黎爆发革命的消息震动了尼古拉一世，他遄返圣彼得堡，但他相信会议王国百事平安。五个月后，波兰军队哗变，年底，议会中爱国的鹰派已在号召组织一支十字军对付俄国。

1830年11月29日的密谋计划不周，以任何合理的标准来衡量，它必将惨败。这次起义主要是由驻守华沙的第四步兵团的下级军官和军事学院的士官生发动的。事先没有人向群众进行普遍的宣传鼓动，奇怪的是这次革命竟无人领导。议会和民政机构中

的波兰官员大为惊异，对造反者的意图亦迷惑不解。大学生和华沙北区的工人冲入军火库，立即自行组成一支国民卫队。情况异常混乱，致使康士坦丁大公过高地估计了造反者的力量，而他稍一迟疑，局势便不可收拾。12月5日，波兰王国临时政府成立，拿破仑大军的老将约瑟夫·赫沃皮茨基将军被推为执政官。由于赫沃皮茨基本人是个温和的保守派而不是激进分子，其他驻军中的波兰团队都投身于这一民族事业。但赫沃皮茨基不是科希秋什科，他准备和沙皇达成某种解决办法，而不是冒险一战，因为他认为那 43 就必然会以惨败告终。

12月份的俄罗斯帝国内的通讯情况非常恶劣，军事政变发生一星期多以后沙皇才得到消息，他还没有来得及调集足够的军队去讨伐造反者和恢复秩序，一个月就已经过去了。俄国反应迟缓，使华沙起义得以变成全国性的造反。赫沃皮茨基的温和政策很快便不合时宜，他被迫于1831年1月17日下野。两星期后，临时政府正式废黜了作为兼任国王的沙皇，把政权交给以亚当·查尔托里斯基为主席的五人委员会。激进派不仅仅要求独立和兼并立陶宛，还要求恢复1772年的旧有边界。他们看来不只是要向俄国，而且要向这三个专制独裁国家同时挑战。查尔托里斯基身为一个不太情愿的革命者，敏锐地意识到华沙的市民群众正在强迫他为其所不欲为。他在委员会中的同事们——尤其是历史学家约阿希姆·列列维尔——想要改变社会秩序。作为最起码的让步，他们打算以应允实行土改来赢得农民的支持。但乡绅们拒绝解放农奴。查尔托里斯基本人则宁可谋求欧洲各国使馆采取的外交行动，这本来是他一贯生活和活动的天地。他万分迫切地希望得到外国的承认，并且由西欧的政治家们带头行动以便为波兰国争得真正的独立。但是，波兰却被摈弃于悲剧性的孤立之中，这在她的历史上既不是第一次，也并非最后一次。

而直到 1831 年秋季为止，波兰人继续对抗他们的俄国主子们。俄国总司令迪比奇元帅和康士坦丁大公都死于那年夏天的流行性霍乱，这固然帮了波兰人的忙，可是这次持久抵抗的主要功绩还应归于波兰军官阶层的勇气，特别是 1812 年战役中的老将齐格蒙特·斯克申奈茨基将军。2 月间在华沙郊外的格罗霍夫受挫之后，他把波兰人团结在一起，并于 5 月在城外东北方向发动一次成功的反击。但波兰领导人内部争吵不休，斯克申奈茨基被认为过分谨小慎微，因而免职，民政机构和军事司令部的人事变动频繁，颇不利于士气。又因未能支持立陶宛和乌克兰的起义，触怒了华沙的激进分子。帕斯凯维奇统率的俄军逼进华沙城时，群众的情绪变得极坏。8 月 15 日，街头发生骚动，接着便对狱中有叛徒嫌疑的人任意屠杀。如果说华沙表现出了革命的巴黎的情绪的话，它却没有丹敦^①那样的人物力挽狂澜，夺得胜利。加之帕斯凯维奇是一位比三十九年前的布伦瑞克公爵更为精干的指挥官，他毫不手软地步步紧逼。9 月 6 日，俄国军队进抵城郊。一连两天，在郊区的街垒上发生激战，双方损失惨重；可是波兰人受不住俄国大炮火力的集中轰击，9 月 8 日，一支三万三千人的波兰队伍疲惫不堪地奔向北方和普鲁士边境。10 月初，整个会议王国的抵抗告终。

波兰起义预示着 1848 年起义的许多弱点：趋于极端的爱国主义者们过分的民族主义要求，保守的乡绅和城市激进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农民的漠不关心，街垒里英勇的卫士们终于无力阻挡专制独裁国家纪律森严的军队。但与 1848 年的相似之点并不都在消极方面。波兰人是第一个触动西方良知的从属民族。数千名华沙保卫者于 1831 年和 1832 年到达巴黎，他们被传奇式的人物拉法

^① 乔治·雅克·丹敦(Georges Jacques Danton, 1759—1794)，法国革命领袖。——译者

叶特本人欢迎到这座以作为自由主义摇篮而自豪的城市。有些波兰流亡者随后在英国定居，另一些人则渡过大西洋前往拉丁美洲和美国。伦敦和巴黎都对波兰民族的困境表示真诚的同情。在这两个首都，在瑞士各州的安全避难所以及像格拉斯哥和纽卡斯尔这样一些人们未曾料到的地方，也涌现一些致力于与波兰友好的协会。法国议会议程中插入了对波兰处于俄国统治下表示惋惜的年度动议，路易·菲利普政府对五千多名难民发给补助金。在英国，下院通过激进派提出的每年赠予波兰流亡者一万英镑的动议，直至1852年为止。

政治上，流亡国外的波兰人继续表现出在华沙时曾使他们无法进行有效领导的各种分歧。查尔托里斯基直至1861年去世前仍然坚信贵族的开明统治，但他越来越孤立于较年轻一代的政治流亡者之外，这些人同情地响应马志尼主义的呼吁。列列维尔渐趋左倾，转移到环境比较自由的布鲁塞尔去活动，甚至结识了年轻的卡尔·马克思。但侨居西方的波兰人在政治活动之外的影响都要大得多，因为波兰的民族主义既激发了文学上的浪漫主义，反过来又受到了浪漫主义的鼓舞。克拉辛斯基和斯洛伐茨基的诗作中阐述了波兰移民救国救民的使命。亚当·密茨凯维支最杰出的作品也在他流亡年代中出版于巴黎。1832年他曾祈祷说：“为了解放所有民族的全球战争，上帝呵，我们祈求您！”然而他这个奇怪⁴⁵的祈祷文却没有得到上帝的答复，因为他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死于君士坦丁堡，当时，他曾打算组织一个波兰军团与土耳其人并肩作战，对抗俄国压迫者。但在他死后的六十年中，这个祈祷文一直是流亡者理想的一部分。

虽然流亡者把他们的“惨遭牺牲的国家”的情况描绘得全然暗无天日，俄国统治的压力在波兰却因地区而有所不同。俄国原先在1793年获得的那些地区，例如维尔纳周围一带，进行了残酷的

镇压。这些“帝国领土”的当局认为，凡是同情查尔托里斯基的波兰人都犯了通敌叛国之罪。会议王国波兰的遭遇略为好些。确实，取消了议会，把没收的教育经费用来在维斯杜拉河两岸建筑碉堡，炮口永远对准华沙的心脏。但沙皇 1832 年颁布的宪法保留了王国的独立行政体系，低级官吏均由波兰人充当。自然，波兰军队的独立地位被取消了。恢复了首都秩序的帕斯凯维奇元帅受封为“华沙亲王”，并被任命为总督。贸易和工业继续发展，特别是在从维也纳至华沙的铁路——1839 年动工，1847 年竣工——建成以后。可是，波兰的文化生活在会议王国内遭到破坏，情况与立陶宛和其他东方诸省份相同。华沙大学则如同查尔托里斯基在维尔纳建立的大学一样被迫停课。从 1839 年开始，波兰学校事实上被纳入俄国教育体系。公布了一项严格而却不适用的书刊检查法，不准出版以历史为题材的书籍，凡属逃往西方的波兰作家的作品一概禁止。会议王国波兰之所以没有成为文化沙漠，全赖教会的力量，而天主教教士的活动也遭到俄国行政当局的怀疑。

在边界另一边普鲁士境内的波兰政府，19 世纪 30 年代所受的压迫并不比会议王国稍轻一些，尽管生活水平较高，特别是在乡间。紧接着维也纳会议后的年代里，一些绅士，特别是拉齐威尔家族曾为促使普鲁士与波兰和好出力。农民事实上已从封建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学校里鼓励使用波兰语。但普鲁士军方领袖总是特别厌恶波兰的民族主义理想。在华沙 1830 年揭竿起义之际，东方军队司令格内森奥及其参谋长克劳塞维茨（他像迪比奇一样，死于下一年的流行性霍乱）深知波兰各省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们的态度导致波兹南尼亚总督厄里奇·弗洛特韦尔采取有计划的镇压政策，这种镇压持续了整整十年。属于路德会教派的普鲁士当局和罗马天主教神职人员发生的冲突尤其激烈，终于以镇压宗教会社和没收修道院财产而达到高潮。1840 年腓特烈·威廉四世即位。

由于他与一些波兰贵族之间有人友谊，情况突然好转。在波兹南市，波兰人于是利用爱德华·拉津斯基所建立的公共图书馆和马辛科伍斯基的“市场”为基础创建一个民族文化中心，“市场”是波兰中产阶级交换政治意见的天然论坛。当局的这种宽容态度使波兹南的自由派得以和巴黎的波兰民主协会建立联系，后者派出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作为使者，准备于1846年2月21日至22日的那个夜晚发动全波兰的总起义。但计划尚未就绪，普鲁士的秘密警察便逮捕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及其同谋者，不久，即解往柏林投入监禁。1840年曾经显著改变的官方政策，如今又急忙颠倒过来。所有波兰社团一律查封，弗洛特韦尔时期的大部分刑法重新使用，但普鲁士人还会有再听到梅洛斯拉夫斯基名字的时候。

波兹南尼亚警方的警觉性一部分是哈布斯堡领土上的一些事件所引起的。整个1845年，加利西亚流传大量谣言，这种不稳定的局势与1789年夏天遍布法国的歇斯底里的“大恐怖”相似，绅士和农民都认为自己将在夜晚遭到强盗袭击，还出现了当时似乎毫无事实根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暴行故事。这就足以使当局警惕起来。

加利西亚是农业区，经济和社会都比较落后，由于耕作方法陈旧保守，当地波兰乡绅庞大的庄园产量都低，封建主义法定的负担之重，和中欧其他任何地区没有什么两样。就像在奥地利国内那样，强制劳役制要求农民在他主人的土地上干若干小时的活，但也允许他耕种自己的一小块土地。但是，乡绅和土地耕作者之间区别颇大，有如革命前的法国。甚至在加利西亚西部这种农民在血统上是波兰人而不是罗塞尼亚人的地方，仍然缺乏民族意识。另一方面，地主们都像在会议王国里一样充满爱国主义的自豪感，他们受到了波兰知识分子在“自由城市”克拉科夫所享有的自由的鼓舞。梅洛斯拉夫斯基进入波兹南以前，便先在克拉科夫开始他的 47

密谋活动，是足以说明问题的。

自从 1833 年发生了一次由于计划不周而毫无结果的起义以后，梅特涅和奥地利当局已经预见到一旦整个欧洲局势能提供某种成功的机会，波兰绅士就会再次试图反叛。西方的歉收和财政上的无保障确实在决定把梅洛斯拉夫斯基从巴黎派往克拉科夫方面起了些作用。但是，起义的计划根本不完备。波兰爱国者得知梅洛斯拉夫斯基已在边界另一边的普鲁士被捕，虽然时机尚未成熟，也在 1846 年 2 月 18 日至 19 日成群结队地起义。奥地利缺乏足够的军队来恢复秩序，便向农民发出号召：如果他们采取行动反对地主，便答应给他们取消强制劳役制中规定的全部契约义务。农民们根本不需要吩咐，一夜之间，过去十二个月的恐惧立刻变为现实。一次农民起义席卷加利西亚西部，造成二千人死亡，高楼宅第，或被焚毁，或遭抢劫。波兰爱国者不论死活都被送往奥地利警察或士兵的哨所，马上论功行赏，既赏现金，又给实物。用这办法扑灭起义虽然原始，却大有破坏性。

唯独在农民早已完全解放的克拉科夫才出现了真正团结一致的波兰民族运动。在那个 2 月里一连十天，一个激进而又独立的“克拉科夫共和国”用爱国者赞歌的词语宣布：“波兰未亡”，但这个共和国不可能持久。奥地利军队从南方进攻，俄国军队从北方进攻。3 月 3 日，俄国近卫军便从城上降下波兰国旗。七个月后，克拉科夫正式并入哈布斯堡君主国。波兰独立的最后遗迹——根据维也纳条约所建立的这个半真半假的自由城——就从地图上被抹掉了。

加利西亚的动乱和克拉科夫的被兼并标志着哈布斯堡疆土上 1848 年革命的真正开始，尽管王室和农民出自偶然的联合打哑了反对派的炮火，也给了绅士们轻举妄动的造反游戏一个严酷的教

训。但是如果企图通过波兰问题为普遍性的病症作出简单的诊断，却会引起误解。因为在加利西亚，只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是历史悠久的斯拉夫人保存自己的民族特色的权利，一是落后的农民本能地渴望得到社会的承认。的确，这两个问题在中欧其他地方也反复出现，但它们的影响却为引起不安宁的其他三个因素所缓和，有时甚至被歪曲了。这些不安的原因是：基于语言上的排他性的民族优越感这一历史神话；若干城市里的资产阶级渴望在政治上被认可；以及手工业阶层对工业主义沉重负担的最初的一再抗议。从根本上说，正如梅特涅自己所感觉到的那样，使革命变得真正不可避免的原因，乃是哈布斯堡国家的性质不够明确。他为此这个王朝服务了四分之一世纪后厌倦地抱怨道：“我的时间都耗费在支撑一个腐朽的机构上了。”⁴⁸

哈布斯堡君主国是由若干大的贵族家族组成的联盟，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专制帝国，其程度还有胜于俄国和普鲁士。权贵们的土地有时集中于一个地区，但经常超出过去的行政管辖界线。例如，施瓦岑贝格家族虽然严格地来讲是波希米亚贵族，却也在下奥地利拥有庄园。埃其特哈泽、泰莱基斯以及卡罗伊家族的庄园也不全在马扎尔人占优势的地区之内。但哈布斯堡帝国版图十分辽阔，各式各样互不相同的地方特色都得到发展和保持，甚至在这个阶级内部也是如此。尽管更为强大的哈布斯堡统治者们反对，匈牙利的权贵们却通过县议会保持着他们自己的地方行政系统。中等土地贵族，即“乡绅”，在县议会里占多数，但大贵族们仍然控制着县议会，他们在这里坚持行使自己的真正的或想象中的权利，分毫不让。另一方面，捷克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边境地区的权贵们其所以能存在却是靠了他们尽忠王事，因而受到王朝统治者的宠幸。他们的观点几乎纯属德意志帝国式的，凡属在允许他们生存的地方的议会，他们都使之充分反映其传统的保守主义。在

表现“忠心”方面的这些根深蒂固的区别，足以说明哈布斯堡帝国内的名门巨室对于19世纪40年代政府危机所持的矛盾态度。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这些捷克地方，并且尤其在匈牙利，矛盾表现得最为突出。

整个18世纪期间，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政治上似乎均处于停滞状态，即使在动荡不宁的拿破仑时期，战争的潮流两次冲击这些省份，却没有留下丝毫革命的影响。但在梅特涅时代的初期，首先是波希米亚和西利西亚，随后是摩拉维亚，经历了一次小规模的工业革命；出现了纺织工业，开采了一些煤矿，建立了铁厂，传统的制糖业有所恢复。这些发展开始改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阶级结构：一个最初是由德意志人或犹太人组成的资产阶级在布拉格和布尔诺定居下来，而捷克农民则离开田地到老的城镇边缘地区发展起来的新市区寻找工作。1846年，布拉格和比尔森的捷克手工业者发生骚动，这是一次明确的社会革命的征兆，其意义之深远
49 胜过了加利西亚的动乱，虽然当时几乎无人注意。

在捷克，最令人惊奇的变化却是在文化方面。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通过他们的研究作为波希米亚的半传奇式的王国唤起一种地区性的爱国主义。约瑟夫·多布罗夫斯基写了第一部语言学著作，其后，1818年他协助建立的波希米亚博物馆学会的学者们继承了他的工作，容格曼也于1835年到1839年出版了一部巨著：《捷克语大词典》。但成为捷克人民知识界当然领袖的却是弗朗克·帕拉茨基，他那本从1836年开始问世的巨著《波希米亚史》，记载了过去的英雄业绩，从而唤起了对未来的希望。帕拉茨基看到在本民族的历史中，民主的斯拉夫人和专横的条顿族人之间存在着连续不断的冲突。但他感到为了获得更多的读者，头几卷必须用德文而不用捷克文来写。奇怪的是，直到1848年春天，布拉格的讲德语的市民由于受到约翰·赫德尔的浪漫主义的

历史逃避主义的影响，对于波希米亚的历史文物的研究所给予的经济支持远较捷克人自己更为慷慨。于是捷克的民族意识的恢复便几乎真是出自偶然，而且，这些赞助者们也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对中欧会起什么作用。

匈牙利则另是一番光景。在那里，诗歌和戏剧的黄金时代与匈牙利议会为了争取基于狭义的民族主义的宪法权利而开展的坚定不移的运动平行出现。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马扎尔人都属贵族阶级，因此，很自然，早期的文化复兴如同政治斗争一样，都应接受匈牙利的地主为中部多瑙河的天命的主人，在这一整个地区，只有晦涩的唯一的马扎尔语是适合的交际工具。在革命前夕，青年诗人裴多菲·山多尔的抒情诗将比较自由的社会信条引入他所信仰的马扎尔爱国主义的理想（因为他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斯洛伐克人）。通过议会，强迫推行了语言的马扎尔化；只是在这一场树敌多于交友的激烈政治斗争之后，裴多菲的天才才开花结果。1835年，马扎尔语获准可以替代拉丁语使用于法庭上；五年后，它取代拉丁语成为议会里的正式语言；1844年，它成为匈牙利境内行政和商业上的唯一语言。难怪还在1848年街垒建立起来之前，罗马尼亚人，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以及斯洛伐克人竟然被议会中鼓吹马扎尔化的偏激分子推到反对派一边，反对匈牙利的一切事物。而在克罗地亚，敌对情绪则推动了路德维特·盖伊的伊利里亚主义以及他试图使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不同方言标准化成为一种共同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的活动。⁵⁰

但是，不可误认为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的每个马扎尔人在政治上都褊狭鲁莽，1832年“改革议会”首次在布拉迪斯拉发城（匈牙利代表称之为“波索尼”）开会时，权贵们的主要发言人是塞切尼·伊什特万伯爵，这是连他的政敌科苏特也称之为“最伟大的马扎尔人”的人物。塞切尼和其他名门世族的成员一样，以自己的

出身高贵而自豪，他献出自己庄园的一年收入资助建立国家科学院，借以促成他所赞美的马扎尔语的纯洁化和标准化。但塞切尼深信，即便不说是为了匈牙利的生存，而是为了发展经济，匈牙利也需与其他哈布斯堡王朝所辖各国保持密切关系。他曾赴国外四处旅行，对自己的阶级了解很深，因此他准备批评其社会盲目性，谴责其愚昧到竟想保存一个建立在免税基础上的古老的制度。在19世纪30年代，他强调土地改革和改善交通的必要性，但因马扎尔化在后十年里迅速发展，他开始提醒匈牙利的自由派防止过分的沙文主义。在1842年11月的一次饶有历史意义的演说中，他要求对少数民族实行一项道义上符合基督教兄弟友爱精神的政策。塞切尼在反对极端主义方面并不孤立，由奥波尼·捷尔吉所领导的“进步保守派”赞同与梅特涅合作进行一系列有限的改革。三十年后在签订“奥匈协议”时曾起过相当大作用的德阿克和厄特沃什也已在40年代的议会中提倡温和适中。但到1848年，马扎尔人——特别是那些普通贵族——骄傲自大，刚愎自用，政治上根本不受约束。塞切尼因为反对马扎尔化使他失去了追随者；这时，把许可说出的民族意愿说了出来的，乃是出色的演说家兼新闻记者科苏特·拉约什。

科苏特在历史上是谜一般的人物，既是民族救星，又是煽动群氓的江湖骗子，他一生的事业和他的政治理论都同样充满矛盾。虽然他认为贵族是马扎尔传统的柱石，但却以一个真正激进派的火热感情主张解放农民和扩大公民权的范围。他在血统上原来属于斯洛伐克新教徒家庭，接受了“匈牙利王冠”这一神秘的象征。凭着 51 着他的一支笔，领头推动了有关马扎尔化的各项法律在议会里顺利通过，他把民族自由置于其他社会进步之上，他的法庭和绞架使 他为本国的斯洛伐克人所憎恨，正如克伦威尔为爱尔兰人所憎恨。虽然 他后来在美国被誉为“自由的斗士”，但他在得势之时却不重

视塞尔维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的权利，对克罗地亚人更是丝毫权利也不给。虽然，即使科苏特的这些缺点显而易见，使他的形象不免虚假，他的成就仍旧是真实无疑的。他把那些不仅落后而且还向后看的马扎尔乡绅、五十万小土地所有者从冷漠和贫穷中鼓舞起来，变为民族解放大军的先锋。如果说他们的鼠目寸光、麻木不仁和骄傲自大等弱点也反映在他的事业中，这是不奇怪的，因为他们正是他自己出身然后又从那儿爬上来的阶级。无疑，科苏特为马扎尔的独立而自豪，恰如加里波第为意大利而自豪一样。他当之无愧地在大西洋两岸赢得了作为一个浪漫主义的失败者的声誉；他是位辩才无碍的英雄，所用的词语，热情奔放，总是在听众的记忆中打下深深的烙印，即使用英语演讲，也是如此。他强烈的爱国热情使得因此受害的人终身怀恨。这对整个中欧都是个悲剧，对匈牙利尤其如此。塞切尼在1847年就预言般说过：“刺激每一个民族都来反对马扎尔人，那就是用自己的怨毒斟满了复仇之杯。”这个忠告未被听取，可能是讲得太晚了。

但当匈牙利议会在布拉迪斯拉发——亦即普雷斯堡，这是它在1847年9月时的名称——开会时，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革命和内战比前四年较为迫近。这个议会甚至比过去的议会更近似代议制机构。因为一个鲜明的政党体制已经出现。而且有一个由奥波尼领导的政府集团，得到了包括塞切尼在内的大多数权贵的支持。反对派则是由中等土地贵族的政党即科苏特的“自由派”与德亚克的温和派和厄特沃什的“中央集权派”结成的不稳定的联盟。反对派要求成立匈牙利责任政府，议会设在佩斯，要在比现在的议会更广泛的选举权基础上推选出来。它还要求社会改革，包括取消封建捐税和给予出版自由。辩论拖到了新的一年，事情明朗化了，权贵们也许可能答应实行社会改革，但要组成一个责任内阁却根本不可能。到了2月底，议会陷入僵局。这时，奥尔良王室的君主政

权垮台、法国又成为共和国的消息从巴黎传到多瑙河流域各城市，打破了无所事事的沉闷气氛。

梅特涅有一次说过：“巴黎打个喷嚏，欧洲就要伤风。”他这个比喻当时看来还嫌调子有些低，因为在匈牙利，政治温度已从低于正常急剧升高到发烧的地步。在维也纳，学生示威游行和工人骚动导致梅特涅于3月13日被撤职，也导致皇帝于两天后召开制宪会议。马扎尔人没有落后很远。佩斯的激进派学生——因为这是裴多菲得志的时刻——在权贵中造成了一片恐怖。科苏特匆忙向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议会提出建立匈牙利政府的要求。一系列的“三月法令”使匈牙利建立起自己的政府，同时又废除了强制劳役制，于是，在解放农民方面迈出了一大步。月底，科苏特、塞切尼、德亚克及厄特沃什全部在同一个内阁会议里就座了，主席是思想进步的权贵人物鲍詹尼伯爵。4月11日斐迪南皇帝正式批准“三月法令”时，匈牙利的革命似已告成。但是革命就像战争一样，收尾要比开头难。而对于那些从属民族来说，它几乎尚未开始。

1848年期间，从西南的塞维利亚到东北的波兹南，革命的街垒在二十座欧洲城市里修筑起来了，有时还修过不止一次。由于造反的第一个城市是西西里的巴勒莫而第一个首都是巴黎，因此，孤立地讨论中东欧的起义而不与南部和西部的起义联系起来研究就容易让人误解。但是，尽管自由主义的智识源泉在法国，保守主义制度的堡垒却在维也纳。而给中欧各国各民族以革命推动力的正是梅特涅的逃跑而不是路易·菲利普和基佐的逃跑。另外，西方革命者主要关心的是获得民主改革，东方革命者的目标在政治上却不那么先进。因此，虽然意大利、德国与多瑙河盆地的事态发展有密切联系，哈布斯堡领土上的起义明显的民族主义特色使它们在多样化之中还有一定的统一性，尽管也存在着利害冲突。

1848年春天有几个星期，看来很可能要在伦巴第平原而不是在多瑙河盆地决定中欧的命运。维也纳条约后的三十年中，奥地利人把他们的伦巴第和威尼斯两省用作间接统治整个意大利半岛的工具。梅特涅垮台的消息鼓舞所有的意大利城邦起来争取自由和统一。3月23日，小小的撒丁—皮埃蒙特王国对哈布斯堡帝国宣战，企图把奥地利人逐出伦巴第和威尼托。米兰及时获得解放，奥地利驻军退到佩斯基拉、曼图亚、维罗纳和莱尼亚诺四个要塞里，这就是著名的军事上的“四边形”。拉杰茨基元帅1848年7月的第四个星期反攻，在库斯托札打败了皮埃蒙特人。在此之前，意大利前线使奥地利的人力物力大受损失。甚至在拉杰茨基重新控制伦巴第平原以后，威尼斯的“圣马可共和国”仍继续高举意大利民族主义的旗帜，直到1849年8月为止，那时，食品缺乏，霍乱流行，起义领导人只得听任奥地利人卷土重来，重新统治。在1848年，除匈牙利而外，没有其他任何地方的反抗维持得这样久。⁵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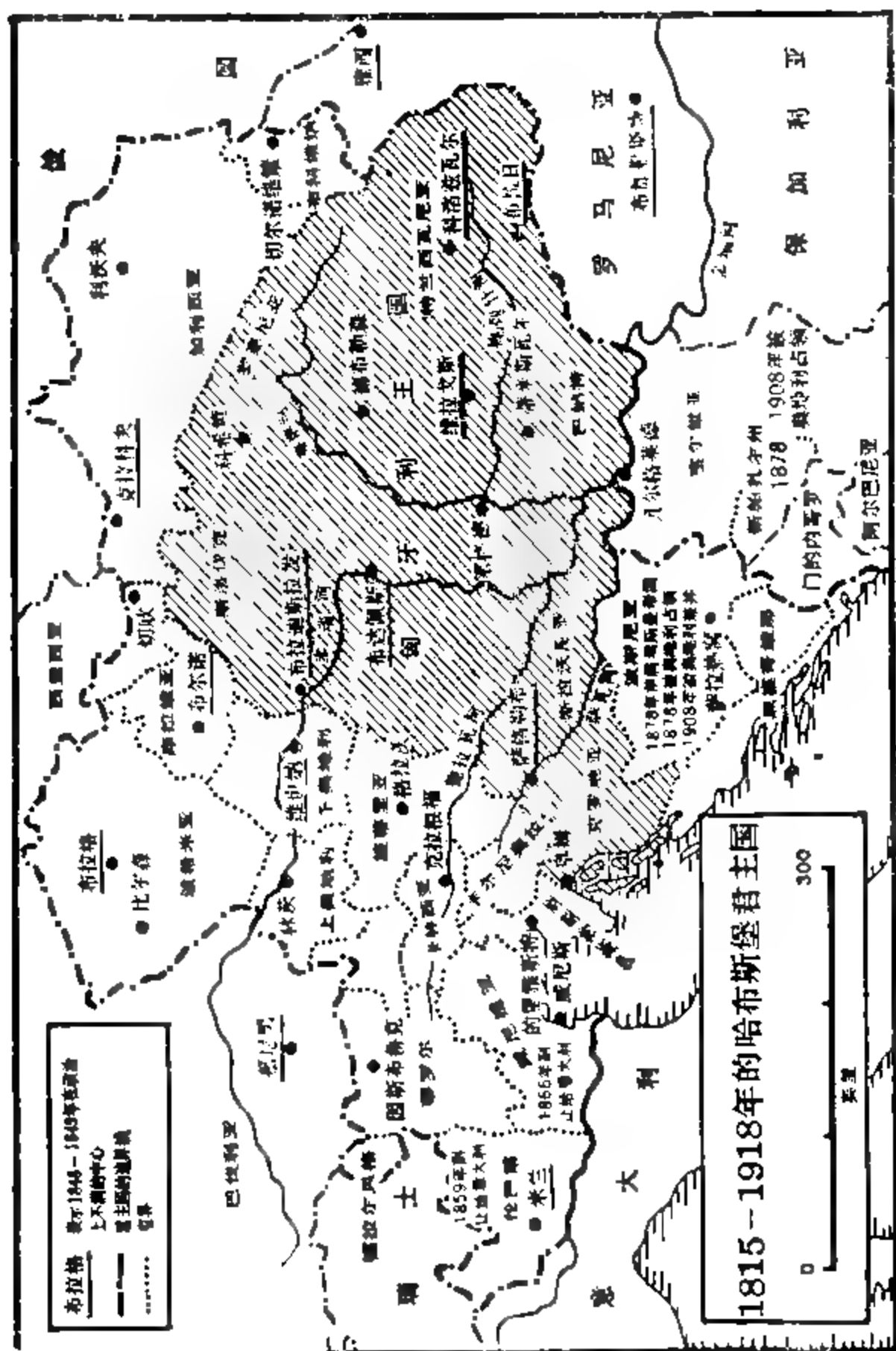
布拉格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清楚地表明造反的精神在急剧变化。此地就如同布拉迪斯拉发和佩斯一样，早在3月13日维也纳人把梅特涅赶下台之前，群众就走上了街头。但游行示威并未显出任何紧急迹象。3月11日，讲德语和捷克语的波希米亚自由派在圣文采斯拉斯温泉疗养地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表现得小心谨慎而又克制，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考虑关于体制改革的建议，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入请愿书递呈皇帝。自由派谈到法庭上的语言平等、集会和出版自由、农民的解放以及有可能——虽然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态度不明确——为捷克建立一个共同的议会，轮流在布拉格和布尔诺开会。在“圣文采斯拉斯国王领土”的三个省（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奥地利属西里西亚）建立一个共同的代议制议会的建议是在这一周末捷克人得悉维也纳发生了两天骚动的消息后才作出的。从新郊区来的工人参加了资产阶级和学生们的游行示

威，并迫使自由派派遣一个更有民族主义觉悟的代表团前往维也纳。4月8日，帝国政府接受捷克代表的意愿，三个省将享有实际上的自治。

梅特涅倒台后的四星期内，斐迪南皇帝作出三项重大让步：应允制定一部奥地利宪法，认可匈牙利的“三月法令”，并承认“波希米亚国王的权利”。除了维也纳各城门附近稍有冲突外，革命者未用任何暴力就取得这一切。但在争取改革的人们中间却已出现分歧；在捷克，这些分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

摩拉维亚议会在布尔诺开会时，对布拉格的自由派自认为可以代表捷克所有三个省份发言的做法表示不满，并向皇帝提出抗议；西里西亚议会同样充满敌意。这两个议会里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都不像波希米亚议会里的德意志人和捷克人那样密切合作，斯拉夫人的代表——多半是来自乡间的天主教徒——也不如城市化了的布拉格捷克人那样有政治觉悟或者那样精明。但在某种意义上，较之最有影响的捷克发言人帕拉茨基的决定，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的种族分裂只不过提前了几天。帕拉茨基虽然住在布拉格，但出身是路德派的摩拉维亚人。4月6日，他已被邀去协助法兰克福的自由派为德意志联邦（包括波希米亚的所有领土）起草一部民主宪法。但是，4月11日，他给法兰克福送去一封回信，表示拒绝合作，理由有三：他自己是斯拉夫人的后裔，不是德意志人；捷克的土地在历史上从来不是德国的一部分，仅仅是通过王朝联盟而与那古老的帝国连系在一起；最重要的一点是，建议中的泛德意志议会必将不可避免地削弱奥地利国，而他认为，为了保卫多瑙河各民族免遭俄国的“亚洲分子”的奴役，奥地利国是欧洲必不可少的。

帕拉茨基的这封重要信件是近代史上对捷克的民族观点第一次的明确界说。它比发自维也纳宫廷的任何感情都更加同情哈布



斯堡君主国。奇怪的是，它体现了最为革命的概念：由一些自治邦组成的奥地利联邦将能对付俄罗斯和德国的入侵而保持多瑙河盆地自然经济的统一，而它的存在本身必将使斯拉夫人在组成上占优势。难怪维也纳政府给了帕拉茨基一个部长的职位（他拒不接受），也难怪法兰克福和奥地利各城市里的德意志自由派发现他的论点不可理解而骂他是反动奴才。他绝非如此，他决定6月间在布拉格召开斯拉夫大会一事将足以表明这一点。但是，毫无疑问，波希米亚的斯拉夫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公开分裂，促使帝国宫廷于同年夏季转而采取那种久经试验的策略：“分而治之。”

如果捷克人能够戳碎“大德意志”狂热的肥皂泡，克罗地亚人也能对马扎尔革命提出同样的挑战。1848年3月，克罗地亚巴昂^①的职位刚好出缺，斐迪南皇帝在认可匈牙利的“三月法令”之前，任命了一个对匈牙利深恶痛绝的四十七岁的边屯区团队上校军官约瑟夫·耶拉契希男爵担任此职。耶拉契希在感情上是彻底的“伊利里亚”分子，他拒绝承认鲍詹尼政府的权威。3月25日，他在萨格勒布召开“三位一体王国”——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代表会议，会议正式选举耶拉契希为国家长官并通过了一个三十点权利宣言。这个国民议会向国王提出的改革建议十分广泛：其中包括实际等于承认其自治的体制上的变更，
56 要求教会同意废除独身主义并在祈祷日课中使用本国语。这些要求根本不可能全部实现：它们既涉及匈牙利各县，也涉及奥地利各省，因为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达尔马提亚就归维也纳管辖。他们也与罗马教廷的传统相抵触。尽管如此，结果达到了耶拉契希召开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他的权威在外表上得到公众的认可，使帝国宫廷相信萨格勒布确已完全与佩斯分离。耶拉契希宣称他“作

① 原文是Ban，意即总督。——译者

为南部斯拉夫运动的首脑人物，依然是皇帝坚定的支持者”。4月19日，他戏剧性地与匈牙利政府断绝一切联系，满怀信心等待着皇帝召见他去效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耶拉契希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整个夏季，帝国当局继续明显地厌恶这位巴昂，甚至一度勒令其停职。

其他民族也反抗三月法令。4月间，伏伊伏丁那的塞尔维亚派了一个代表团去佩斯，却发现科苏特对他们的要求粗暴地置之不理。5月10日，塔特拉山中的特普拉的斯洛伐克人“国民议会”向皇帝和鲍詹尼政府请愿，要求承认匈牙利境内非马扎尔人的权利。五天后，在特兰西瓦尼亚，四万罗马尼亚人在小城布拉日城郊的集会上向皇帝上书表示效忠，谴责科洛兹瓦尔的满是马扎尔人的议会投票，赞成与佩斯的匈牙利国民政府建立立法联盟。

但是，收到这些请愿书的帝国当局正处于困难的地位。维也纳骚动频繁，致使宫廷于5月17日逃到因斯布鲁克避难。皇帝的顾问们——他们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因为斐迪南皇帝过分优柔寡断，善于掌握国策——对于在欧洲心脏地区占据战略地位而又历史悠久的捷克人依然抱有好感，但是支持本国遥远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运动则是另一回事。当来自布拉日的罗马尼亚代表团终于到达因斯布鲁克时，他们没有得到宫廷官员的鼓励，甚至连表示同情的姿态也没有见到。另外，鲍詹尼内阁对于王朝依旧忠心耿耿，毫不动摇；而帝国政府又希望从匈牙利得到精锐部队去意大利前线，支援承受敌军严重压力的拉杰斯基师团，后者正抵挡着皮埃蒙特人，保卫着“四边形”，形势十分吃紧。只要马扎尔人愿意接受王朝联盟的义务，帮助帝国免受异国民族主义的侵犯，朝廷就无意在匈牙利挑起一场内战。

鲍詹尼在6月间访问了因斯布鲁克，他打算与王朝达成协议，⁵⁷甚至准备对耶拉契希让步。塞切尼和德阿克都赞同他的观点，但

随着时间的推移，革命也一天天更加与科苏特的刺耳的声音一呼一应。科苏特当然不是个讲妥协的人。在距离新的匈牙利议会7月4日开会前八个小时内，科苏特宣布这个国家面临克罗地亚和“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叛乱的危险，作为财政部长，他要求议员们投票表决拨给他一笔款项，建立一支二十万人的部队。他主张与历史上原来处于统治地位的那些种族——德意志人，马扎尔人以及（在较小程度上）波兰人——进行合作，以便使各从属民族不敢越轨。这个立场当然使他对于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的理想，比较对维也纳的有罗塞尼亚、斯洛文尼亚和捷克议员参加的奥地利议会更加同情。但尽管如此，他还准备同皇室讨价还价：如果帝国政府“肯协助降服克罗地亚，而且在战后满足意大利人所有的正当民族要求”的话，匈牙利自由派愿意把马扎尔军团派往意大利前线作战。看来这种条件任何时候都未必能被接受——也许原来就不打算让人接受——但是，它们是在1848年7月这个特定的时刻提出的，这就使它们显得完全不现实了。因为，就在科苏特建议向意大利派兵的那个星期里，拉杰茨基已在库斯托扎打败皮埃蒙特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专制又重掌政权，宫廷做好了从因斯布鲁克迁回维也纳的准备。一场驯服马扎尔人的战争的前景已经在望。对于科苏特来说，时间却不多了。

到8月，全欧的革命似已处于低潮。随着“六月的日子”的到来，法国的有产阶级和农民处于一个社会共和国的威胁之下在恐怖中退缩了：巴黎已经发高烧的神经又一次在远方的城市里迟迟地唤起了反响，在那里，别的人同样宁愿接受可能遭遇的专制统治，而不喜欢在例行的暴力中过日子。例如，在维也纳，人们就把那个在5月间成立的命名不祥的公共安全委员会当作不过是幽灵般的威胁，奥地利革命的主要成就已由中产阶级和农民占优势的

议会制定成法律：正式取消了强制劳役制规定的劳役和地主世袭的权利。尔后，激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便越来越脱离群众性的政治运动，因而，当10月间维也纳的左派企图进行第二次革命时，他们就如同四个月前的巴黎社会主义者一样孤立，帝国军队的炮火⁵⁸把所有的街垒都一扫而光。

这一年早些时候，奥地利的炮手们已在克拉科夫和布拉格平息了动乱。克拉科夫的革命是半心半意的，这可能是由于两年前加利西亚的失败的影响。尽管如此，4月26日的游行示威遭到了连续的炮火轰击。此后，加利西亚平静无事。只是11月间在利沃夫发生一次工人起义，这次起义由于遭到炮火无限制的轰击，再度被镇压下去。五十五名波兰劳动者在街垒上被哈默斯坦将军的大炮轰得粉身碎骨。

由于捷克人在帝国的斯拉夫各民族中的重要地位，波希米亚发生的事件的意义特别重大。布拉格是遭受普鲁士迫害的波兰难民和被马扎尔人欺凌的斯洛伐克人的天然避难所。4月间，正是在这些流亡者中首次提出了召开一个斯拉夫大会的建议。这一意见得到帕拉茨基和斯洛伐克人萨法里克的赞同，可是捷克领导人坚持把会议成员限制为哈布斯堡帝国的斯拉夫臣民，虽然也允许其他斯拉夫人以来宾身分列席。大会于6月2日在布拉格以宣誓效忠于哈布斯堡王朝和要求成立奥地利联邦帝国的改革方案开始。在斯洛伐克人中有激进派——因为只有那些胆大的人才敢于到布拉格去冒犯匈牙利政府——波兰人和罗塞尼亚人中也有；但是，正如波希米亚总督后来向维也纳报告的那样，“斯拉夫大会……没有追求不法的目标，……也没有图谋任何抵触法律或与奥地利君主国的利益不相容的东西”。大会准备发表声明，建议斯拉夫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虽然在不同的城市召开），应建立共同的斯拉夫学术机构。可是这些声明一直未获通过。激进派的学生

陶醉于布拉格总的兴奋氛围之中，波希米亚的手工业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在降灵节的周末，由于一些偶然的小事发生了骚动。布拉格驻军司令官温狄什格莱兹亲王6月15日把全部部队从城中撤出。两天后，命令士兵在炮火的掩护下一座小山一座小山、一条街道一条街道地重新夺取波希米亚的首都。这就是斯拉夫大会的末日，的确，也就是在4月8日对捷克所许诺的种种自由的末日。奥地利议会于1849年3月解散，在这以前，温和派的捷克议员被允许参加议会；但在布拉格，正如温狄什格莱兹亲王本人宣布的那样，他是波希米亚的独一无二的主子。

- 泛德意志主义者把温狄什格莱兹将军对布拉格惩罚性的袭击当作是他们的斯拉夫对手、特别是帕拉茨基的重大失败来欢庆。
- 59 随着夏季的到来和消逝，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一天比一天更加依靠旧王朝的军队，因而失去了它赖以形成的革命热情。它的大部分工作当然与领土问题有关，而那些领土从历史或语言上来看可以认为是属于德意志人的（因此不在本书研讨范围之内）。但有几个地区不能简单地以这两个原则的任一原则来划分，其中两个地区——波希米亚和波兹南——的主要居民在血统上是斯拉夫人。使德国代表讨厌的是，波希米亚的地位已由帕拉茨基的著名信件加以澄清；但波兹南人中没有一个具备他这种地位的人来为波兰人讲话。事实上，由于波兹南是普鲁士王国的八省之一，所以法兰克福议会对波兰事务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柏林掌权者的一时兴致如何。

1848年3月普波两国曾一度短期友好。在革命的最初的日子里，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波兰密谋者从莫阿比特监狱获释，欢呼的群众护送他们穿过柏林的街道，甚至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也在王宫迎接了他们。紧接着立即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允许波兰人在波兹南建立国民委员会并开始训练一支特属波兰的军队。一

似乎真有实现普波二国合并的可能，而且能得到共和制的法国的支持，以对付俄国。3月22日，德国的一位领导人宣布：“德国已经抛弃了它的亲王们与亚洲主义的联盟，准备举着它的黑红金三色旗与你们的旗帜一起投入反对黑暗争取光明的战斗。”新的一代看来在追寻着1812年的幽灵。

这样一种欣喜若狂的结合不可能长久，连蜜月都未度完便告夭折。因为波兹南的波兰人不同样具有其流亡领导人广泛的民族观念，这个省的德意志人也改不了旧有的习惯和态度。梅洛斯拉夫斯基一心想要进行一场战争来解放会议王国之际，波兹南农民却正在攻击普鲁士官僚中或经商的犹太居民中的当地的“压迫者”。普鲁士军队传统上就是反波兰的，他们对无政府状态的扩散真正感到惊慌，不打算容许一场加利西亚式的农民起义。4月10日，即梅洛斯拉夫斯基从狱中获释后仅仅三个星期，普鲁士正规军便向一些波兰部队发动进攻。敌对的两军在波兹南及其附近发生小规模战斗，持续一个月之久，“暴动分子”——柏林如今这样称呼波兰人——5月9日终于投降，德国驻军恢复了秩序。

这些事件影响了法兰克福的德意志民族自由派的态度。3月60份在海德堡召开的为后来的法兰克福的议会作准备的德意志预备议会已经通过一项决议，谴责瓜分波兰是“可耻的罪行”，宣布恢复波兰国是“德意志民族的神圣责任”。这种情绪没有经受住普鲁士人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分裂的考验。直到7月的第四个星期，法兰克福议会才举行唯一的一次特别有关波兹南的辩论，这时，德国的民主派已经抛弃早先决议的“愚蠢的感伤情绪”，“我们的权利就是最强者的权利，也就是征服的权利”，来自柏林的代表威廉·乔丹咆哮道。既然历史看中了德国人民而不让波兰人有一个可以在其中表达“健康的民族利己主义的”国家，那么，波兰人显然无权

享有政治独立。法兰克福议会以三百四十二票对三十一票，一百八十八票弃权，决定波兹南的性质基本上是德国的一个省份。法兰克福议会里只有一名波兰议员，辩论时，他向德国同僚们讲清楚了他们的行动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果：“波兰人虽然被吞掉了”，他宣称，“但是，凭上帝作证，却不可能把他们消化掉”。就其作法来看，这个议会的裁决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它标志着波兰问题从此再也没有靠德国办法来解决的任何希望，虽然这种可能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再次出现过。波兹南两个种族的深仇大恨将持续一个世纪甚至更久一些。

先是普鲁士人，后来又有法兰克福议会拒不承认波兰人的权利，这使沙皇尼古拉一世感到高兴。他一直以相当忧虑的心情观察着3月间的革命热情的扩散。整个1848年，会议波兰风平浪静，其原因一则是总督帕斯凯维奇有所警惕，一则是人民生活水平在慢慢提高，特别是华沙及其近郊的居民。但是，沙皇一直充分意识到靠近俄国边境的地区有发生革命的危险。除波兰人外，他眼中还有另外一个与法国激进派有着危险联系的一个邻近的民族；他决心绝不容忍多瑙河两公国的罗马尼亚人搞民族运动。既然他认为根据条约规定，俄国对多瑙河口具有一种相当于悬而未决的保护国的权利，他相信万一政府方面出现危机，他有一切正当理由进行干涉。

实际上，沙皇对北方公国摩尔达维亚完全不必担心。确实，1848年3月底在主要城市雅西发生了一次示威游行，但运动的领导人很快被捕，人民大众对其他地方发生的一切，仍旧漠不关心。

- 但作为预防性措施，沙皇于7月派遣部队渡过普鲁特河占领摩尔达维亚。那时，南方的瓦拉几亚爆发了一场较为严重的反叛。这一部分是由于在边境另一侧特兰西瓦尼亚的布拉日那儿罗马尼亚人作出的榜样，而扬·布勒蒂亚努及迪米特尔·布勒蒂亚努兄弟

俩刚从共和主义的巴黎赶回布加勒斯特更加煽起了潜在的自由主义热情。临时政府在布加勒斯特建立了起来，并且保证要进行广泛的改革。但沙皇再一次插手干涉。他敦促苏丹作为两公国的最高君主恢复传统的行政制度，同时，又命令自己的将军们渡过塞列特河进入瓦拉几亚去援助土耳其人。到9月底，民族主义运动失败，罗马尼亚的自由主义者逃往西方避难。俄国占领军在这两个公国里挖沟高垒，安营扎寨，在普鲁特河以南呆了两年半的光景。

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各国和德国发生的事件相比，罗马尼亚的革命有些操之过急。尽管如此，它仍然有两大重要后果：无论扬·布勒蒂亚努在布加勒斯特的活动多么不当，可是，这样一来，却使罗马尼亚问题排上了欧洲的日程表，从此一直排了三十年。俄国人的南下意味着沙皇的部队已在喀尔巴阡山的弧形地带里布列开来，一旦哈布斯堡皇族需要显示保守的团结原则，便可穿过各个隘口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俄国部队进入瓦拉几亚之日，便是维也纳帝国当局对匈牙利的态度强硬之时，这绝非偶然。

到1848年9月，科苏特虽无其名，却有匈牙利的唯一统治者之实。从一开始，鲍詹尼内阁就是一个不稳定的联合，到了夏末，它终于分崩离析。科苏特和自由主义派声称，他们能够一面拒绝分担国家的债务，一面又能够与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其他国家继续分享王朝联盟的好处。塞切尼、德阿克和温和派却知道，维也纳可没有任何人会批准这样任意逃避财政义务的行为。于是，德阿克和鲍詹尼先后辞职，塞切尼力求防止内战，竟于9月里精神失常，尔后，便在维也纳附近多布林的精神病院里面度过他余生的十二年。显然，匈牙利的政治舞台上从此不再有人和科苏特角逐。

9月的第一星期，帝国宫廷授权耶拉契希总督对抗命的马扎

尔政府采取行动。9月11日,他率领一支四万五千人的部队在瓦拉日丁渡过德拉瓦河向东北方朝巴拉顿和一百五十英里外的布达佩斯进军。这次克罗地亚人的入侵使科苏特得到了一个可以点燃马扎尔乡绅们热情的火星。他很得力于才智过人、年仅三十的将军戈尔盖·奥尔图尔,此人在匈牙利南方指挥民兵,不仅阻挡了耶拉契希的进攻,还把他赶过了边界。这是一场野蛮的战争,双方的非正规军都犯下了若干暴行。普遍的兽性行为迅速蔓延到斯洛伐克、特兰西瓦尼亚和伏伊伏丁那(那里的“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于10月起义,他们对马扎尔人绝不饶命,敌方也毫不留情)。

匈牙利战争一共持续了十一个月。起初,在冬季到来前,匈牙利民兵曾有可能打到维也纳去;这座首都发生的10月起义,一部分便是出于泛德意志激进派对科苏特同情的一种表示。但尽管宫廷再次迁移(这次是迁到摩拉维亚中部的奥尔穆茨),温狄什格莱兹却注意防止维也纳人以后再闹革命。到11月底,贵族和保守的军官阶层已牢牢控制奥地利各省,急于要严惩佩斯的激进分子。12月2日,斐迪南皇帝让位于十八岁的侄子弗兰西斯·约瑟夫。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违反宪法的措施也是对匈牙利作战的一部分,因为新皇没有像他的前任那样地保证过支持三月法令。值得注意的是,科苏特拒绝承认斐迪南的让位之举。在马扎尔的维护宪法的纯正派看来,弗兰西斯·约瑟夫必须首先在布达加冕才能成为匈牙利的君主;否则,只要斐迪南还健在,他就是匈牙利的国王(他一直活到1875年,即弗兰西斯·约瑟夫终于加冕之后的八年)。匈牙利的正规军军官曾对斐迪南宣誓效忠,只要内战继续一天,他们就没有对他的继承人尽忠的义务。

温狄什格莱兹和耶拉契希对良心上的这种细微差别毫不介意。他们的两支军队向匈牙利推进,两星期后,佩斯落入温狄什格莱兹手中,马扎尔政府向东逃往德布勒森。科苏特似乎马上就要

走投无路，因为普奇纳将军已在特兰西瓦尼亚成功地招募一个罗马尼亚军团，当地的撒克逊居民也已武装起来反对马扎尔掠夺者。但是科苏特由于任用了两个出色的波兰流亡老军人贝姆和丹宾斯基为将领，就守住了特兰西瓦尼亚。戈尔盖开始向多瑙河发动一次反攻，甚至曾一度夺回布达佩斯。1849年4月14日，匈牙利议会在德布勒森开会，正式废黜哈布斯堡皇族，宣布“匈牙利及其诸属地”是一个以科苏特为摄政王的独立国家，对未来的政府形式未作具体说明。

废黜哈布斯堡皇族无异于政治上的自杀。没有任何外国准备 63 承认科苏特政权（说来可怜，唯一的例外是威尼斯共和国，这时，它本国正在拉杰茨基部队的包围之中，饿得快投降了）。弗兰西斯·约瑟夫早在听到德布勒森宣言之前，就要求沙皇援助他镇压匈牙利的反叛。沙皇部队2月间曾一度进入特兰西瓦尼亚，但因贝姆将军所率部队的推进而撤回。匈牙利军队中有这两个波兰将军，因此尼古拉一世急于要进行干涉。6月，俄国部队不仅从瓦拉几亚，而且取道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从会议王国横扫过喀尔巴阡山。贝姆的部队不及敌军的一半，7月31日溃败于沙斯伯格，青年诗人裴多菲在此役中阵亡。贝姆本人逃往土耳其，俄国部队无情地长驱直入景物平凡单调的奥尔弗尔德草原。

科苏特与戈尔盖意见不和，使匈牙利革命最后几星期的局势更加暗淡。奥地利人迫使戈尔盖退回到匈牙利东南部，他知道，由于北面有俄国人，南面有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他的处境是无望的。科苏特起初不肯承认失败已不可避免，到8月11日，他却把他的职责交给戈尔盖，带着少数卫兵逃到土耳其。两天后，戈尔盖在维拉戈斯向帕斯凯维奇投降，他相信，这位华沙亲王对待他会比报复心强烈的奥地利人海瑙宽大。戈尔盖所见不谬，匈牙利果真被置于军事占领和军事管制之下达一年多之久；十三名在匈牙利

民兵里服役的帝国军队的前军官 10 月间在阿拉德被绞死。鲍詹尼虽在科苏特与国王分裂前已退出政界，但也被枪决。戈尔盖由于得到帕斯凯维奇的保护，幸免于死，一直活到 1916 年。

整个中欧的一系列革命以戈尔盖在维拉戈斯的投降而告终。回顾起来，它们政治上的收获显得微乎其微，而它们的行动记录也不光彩，因为民族间的仇恨的相互作用加速了专制主义统治的复辟。但从社会方面来衡量，它们的成就是伟大的。农奴制度最后一些桎梏的废除使较有事业心的农民得以大为提高他们的地位，即使在破坏惨重的匈牙利也是如此。此外，田间的劳动者和城里的工人同样有了行动自由，他们能到新的工业中心去找工作；意义更大的是，他们可以迁居国外。最后，这么多次革命的主要历史遗产是创造了一些历史传奇：例如相信斯拉夫各族人民本是一家人，有一种信念在讲英语的民族中特别强烈，即马扎尔绅士内心里是杰弗逊式的辉格党人；还确认了一点：即俄国魔鬼真有其事，沙皇国家是个罪恶的机构，自由主义无论在何处抬头，它发誓要加以镇压。这些设想没有哪一项是完全错误的。解释上的真正错误在于人们以一种轻率的态度把这些反叛的复杂情况过分简单化了，总想把纠缠不清、解决不了的混乱情况按照道德标准黑白分明地区别开来。因为在一个各人有各自效忠对象的动乱的世界里，人们是作为自然的自我来行事的，唯有如痴如狂的偶像膜拜者才会把他们当作神明来崇拜。

整个 19 世纪 50 年代，欧洲生活在濒临革命的影子里。表面看来，哈布斯堡帝国的各族人民不久便被平定下来了，因为在民族运动最终被镇压之后，弗兰西斯·约瑟夫在君主国建立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官僚统治制度。甚至在击败匈牙利以前，奥地利议会就被解散了，也没打算再召开一个议会。尽管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

各国的习惯极不相同，它们还是被当作一个单一的国家，以维也纳为其中心。它们还被当作一个单一的自由贸易区（这倒比较合理），因为把奥地利各省和匈牙利分隔开来的关税已经在1851年7月取消，这一措施对捷克国家的繁荣助益极大，后来对匈牙利王国亦复如此。

但在政治上这却是个死气沉沉的时代。除了官僚以外没有任何民族被另眼相待。匈牙利的军人政权一经结束，马扎尔人便发现他们自身的处境并不比克罗地亚人糟，而克罗地亚人在1848至1849年是站在王朝一边的；但同样地，他们的处境也并不比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或者“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强，这却使他们十分恼火。这个社会偶然得以改善地位的一部分人是波希米亚的城市中产阶级，其中既有德意志人，也有捷克人，因为这是哈布斯堡行政当局遴选文职人员的主要来源。因此，布达佩斯人的抱怨也就不无几分道理；他们说，虽然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民族色彩特别浓烈的捷克民族语言的复兴已经停止，管理他们城市的却全是捷克人。将帕拉茨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的动议被否决了，但捷克新闻记者中的老前辈卡列尔·哈弗利契克却被逮捕和监禁。对帝国所有的民族来说，这十年是沉闷的，科苏特流亡国外以后，那些峥嵘岁月也随之消失，跟随他转移到伦敦、南安普敦和纽约等处座无虚席的会场上去了。科苏特发表的多次演讲使大西洋两岸的自由主义者更加憎恨俄国，这是自然的。大陆的独裁者中，唯独沙皇的领土上没有造反的事；他活过了那革命的两年的，安然无恙；而且，由于他的政权在国内是十分巩固，遂能派遣军队去绥靖多瑙河两公国，平定匈牙利内战。他是欧洲的宪兵，欧洲可不愿由他按照他的方式来维持秩序；早在1831年波兰人出亡外国时，这一点就已清楚地表现出来了。发动一场全面反俄的欧洲战争的想法，早在荒谬的圣殿纠纷使其成为可能之前，在西方颇有一种思想

意识方面的号召力。

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黑海的海军优势以及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暗地里争夺东地中海的海军优势。因此，它更多地关系到欧洲的均势而不是沿俄国边界而居的诸民族的命运。作为一个枝节问题——有时倒是一个高度重要的问题——它提出了罗马尼亚问题。甚至，战争的起因事实上在于多瑙河两公国。作为对土耳其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俄国人在1853年7月重新占领这两个公国，不到四个月之后，俄土在此首次开战。另外，英法两国1854年2月向俄国发出最后通牒时，他们的唯一要求也是要俄国撤出两公国。正是因为沙皇没有撤军——虽然作为总司令的帕斯凯维奇出于战略上的理由赞成这一点——才给两个西方盟国提供了向黑海派兵的借口。

英军6月在瓦尔纳（在如今属于保加利亚的海岸上）登陆时，他们能够听见俄国大炮正在猛轰六十英里外多瑙河上锡利斯特拉四周的土耳其阵地，看来他们必须坚守巴尔干山脉一线以防止俄军冲击君士坦丁堡。但俄国在月底放弃了对锡利斯特拉的围攻，开始通过瓦拉几亚后撤。到9月初，俄军已全部撤出这两个公国。此后，成为战区的便是克里米亚而不是巴尔干半岛，六十一年后，英法两国才派他们的部队第一次在巴尔干作战。

沙皇之所以对两公国改变主意，是奥地利政策的直接后果。弗兰西斯·约瑟夫的外交大臣包尔决心保卫多瑙河下游盆地。有一段时期，他似乎在外交上已取得出色的胜利。他与土耳其达成协议，允许奥地利在对俄作战期间占领两公国；又威胁要同普鲁士采取联合行动来对付俄国，迫使沙皇就此退让。于是从1854年8月到1857年3月，奥地利军队沿着一千四百英里长的多瑙河驻防，即从多瑙河与因河汇流处的帕绍开始直到三角洲上有沼泽的河道为止。要是和平恢复后奥地利仍能保住这个阵地的话，俄国将

永远无法向巴尔干扩张(当然,除非俄国能在另一场战争中打败奥地利帝国)。

包尔也许曾希望其他列强能允许他将暂时的占领变为永久占 66
领,但它们不可能同意将欧洲地图作这么重大的改变。奥地利此举的主要效果是,使多瑙河问题在 1856 年的巴黎和平会议上处于显著地位。巴黎条约对这条河流建立了两个国际委员会:一个是 6 个大国组成的“欧洲委员会”,负责清理三角洲的一些河道;另一个是更加有长远意义的“多瑙河委员会”,沿河各国都在其中派有代表,它负责决定有关航行和治安管理规定,以便使这条河能够发展成国际航道。与此同时,条约剥夺了俄国在多瑙河上的出口,办法是把南比萨拉比亚划归摩拉维亚,于是,该地区的宗主权又重新正式归于土耳其的苏丹。这两个公国名义上仍是土耳其帝国一部分,但被允许拥有“独立的国家行政机构”,甚至拥有国民警卫队。无论对瓦拉几亚或摩尔达维亚,任何外国都没有独自进行干涉的权利。

由于大国互相嫉妒,多瑙河二公国赢得了虽属实质的但却又明显与众不同的独立。如果拿破仑三世得以实现其主张的话,它们就会联合为一个罗马尼亚国,因为这位法国皇帝觉得他有义务注意到一个拉丁民族要求得到国家承认的权利,特别是他们的一些主要发言人已在法国首都组成一个有影响压力集团。俄国人也宁可要一个他们可以在那儿自由地施展阴谋诡计的罗马尼亚,而不要两个单独的省份被人为地支持着来阻碍他们。但是,英国和奥地利都不支持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者:帕默斯顿既不信任拿破仑三世,也不信任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包尔则担心这两个公国的联合将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中激起民族主义情感。

出席巴黎会议的代表早已纷纷散去,关于“联合”还是“分治”的争论却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1858 年夏季,就这个问题在巴

黎召开了一次特别外交会议。会议上产生了一个公约，该公约规定，“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联合公国”有两个单独的大公，两个单独的行政委员会和两个单独的人民议会。这种离奇的一派胡言，很快就受到颇有见识的罗马尼亚人自己的嘲弄。因为1859年2月，瓦拉几亚议会效法两星期前的摩尔达维亚议会，也选举亚历山德鲁·库扎上校为大公。于是，尽管巴黎公约设法从宪法上设置障碍，这两个被分离的公国却有了一个共同的统治者。

67 在许多方面，以库扎为民族领袖却是一种奇怪的选择。他虽曾于1848年被捕，但对解放运动是个同情而谨慎的旁观者，并非参预运动的主要人物。虽然他的公开言论带有令人信服的真正的爱国主义调子，然而他的个人品德一经揭露却难令人产生敬意或希望效法之心。由于他有意模仿他的恩主和导师拿破仑三世的种种更加令人讨厌的性格，终于导致军队（在绝大多数政界人物的支持下）于1866年把他废黜掉，另选一位德意志小亲王接替他的职务。他虽然不具备国父的尊严形象，但他在位七年的政绩并非无足轻重。土地改革把农民从封建桎梏下解放出来，尽管土地的分配十分糟糕，致使最后这种解放所造成的负担反而大于所解除的负担。一个教育计划——虽然不幸又是虚有其表——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基础。最重要的是，为了保证建一个共同的政府，库扎敢于公然反抗列强。1862年2月，在他当选三周年时，他把两个议会合并为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议会，会议地址在布加勒斯特。“联合公国”终于正式采用了罗马尼亚这个国名。因而，异常令人啼笑皆非的是，1848年民族起义中最无效的一次，却是在中东欧第一个得到普遍的承认。

1863年的波兰起义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起义的星星之火最后一次的闪闪发光。虽然波兰人自己相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重

演了1830至1831年的事件,但这两次运动之间很少有连续性,促成这两次起义的环境及其总的性质都显著不同。甚至,人们不禁要指出1831和1863年事件之间唯一真正的相似之处就是革命领导人互相对立,尔虞我诈、彼此猜疑。

沙皇尼古拉一世和他的总督帕斯凯维奇于1855年3月及1856年1月先后逝世,旧制度从而失去了两大支柱。会议王国的波兰人再次开始希望能从他们的俄国主子那里取得让步;他们正式获准在华沙建立一个农业协会和若干高等教育机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立意要使他的整个帝国现代化,赞同在波兰进行改革,把改革看作稳定局势和有效治理的最可靠的手段;作为回报,他所要求的是,波兰的地主与他合作,放弃他们长期以来所珍视的理想,这理想是要把立陶宛的领土并入一个波兰王国的版图。为了试图与波兰人和解,1861年3月沙皇任命亚历山大·维洛波耳斯基去领导华沙的一个机构,其正式名称为“宗教与教育委员会”,虽然他的受权调查的范围包括土地改革和建立特属于波兰的行政机构。这本身就是一种和解的表示,因为这个新会长本人曾经参加过1830年的革命。

维洛波耳斯基是个热情的亲斯拉夫一派的人,他真相信自己能诱导他那些“白色的”贵族地主同胞们和他一样相信亚历山大二世的良好意愿。他却失败了。有三个原因:这些贵族怀疑他那把雇农变成交付现金地租的佃农的主张;顽固坚持任何波兰改革计划中均应包括早年“丧失”的立陶宛和罗塞尼亚这两块交界地区;害怕波兰运动中的激进派(“红色分子”)会对任何与沙皇政府关系过于密切的集团实行报复。俄国人的作法有时笨拙愚蠢:例如1861年10月,他们派部队驱逐华沙一些教堂中长时间反复高唱国歌纪念科希秋什科逝世的教徒们,因此,竟让自己被推入一场与天主教僧侣统治集团间的冲突。维洛波耳斯基本人在政策上也犯了两大

战略性错误：他解散了农业协会，流放了该会温和派的“白色”领导人扎莫伊斯基；他还宣布将征召青年入伍，参加俄国军队，以便去整饬波兰城市中无纪律的行为。这两项措施正中“红色分子”的意，使他们得以将计就计；这些人如果还接受任何控制的话，他们所遵循的也就是1846和1848年的老革命、永不疲倦的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原则。

征兵入伍的威胁加速触发了这次起义，起义从1863年1月22日开始，持续了十四个月左右。其主要支持者是三十五岁以下的城市居民，部分是乡绅和自由职业者阶层的子弟，许多是手工业者。由于俄国驻军力量强大，这次起义从未能控制任何较大的城镇。与其说这是一场内战倒不如说是一次造反。3月间一连两星期马里安·兰盖维奇将军——加里波第军团的旧成员——率领一千人占领了小镇瓦霍克。他希望能把这个位于加利西亚边界以北五十英里左右的边远矿区变为波兰的西西里，从那里开始解放王国的其他地区，而欧洲列强将同时会对沙皇施加压力，使他对波兰的民族复兴运动作出让步。但是，尽管法国、英国甚至奥地利都请求亚历山大二世遵守1815年的所准许的一些自由权；但是波兰既是内陆省份，华沙又没有加富尔^①这样的人物，意大利统一的盛举休想在此重见。两团俄国军队迅速而又残酷地击退了兰盖维奇的袭击，迫使战斗中的幸存者退回加利西亚，接受奥地利的拘留。在其他地方，起义采取游击战的形式，互不协调，农民对波兰的事业要么漠不关心，要么完全敌视。而在城镇里的地下运动中，“白色分子”与“红色分子”之间的冲突竟堕落到了互相暗杀和出卖的地步，这种情况，只有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分裂才超过了它。

波兰和立陶宛的大部分地区都战火熊熊，维洛波耳斯基的合

^① 加富尔(Cavour, 1810—1861)，皮埃蒙特自由议会党人，1852—1861年曾任皮埃蒙特—撒丁首相。——译者

作政策从此消声匿迹；他本人也在幻想破灭之后流亡在外，退出了历史舞台。俄国当局扑灭这次起义是靠镇压行动，其手段在立陶宛尤其严峻，但也通过一种新的土地改革办法成功地使农民反对整个运动。1864年3月，农民得到了所种土地的所有权，同时获得保留牧场和森林的使用权。甚至拨出一部分国有土地分给无地农民。于是，波兰农民被置于一种比三年前俄国本土解放的农奴好得多的境地。一般说来，波兰农民拥有更多的土地，并且不付任何赎买费，尤其是在法律上得到与其他波兰人处于平等地位的保障；而在俄国，原来的农奴仍受歧视。当然可以指出，事实证明俄国对波兰农民的慷慨将是灾难性的，由于农民对贵族地主从此不再有任何社会方面的抱怨，他们一腔的不满都凝集成积极的波兰爱国主义，从而寻求从俄国官僚作风以及异族的文化和语言的沉重负担之下解放出来。

尽管如此，土地改革暂时毁坏了农民群众对革命运动所怀有的任何一点点残余的同情。于是，华沙当局得以在一段时期里对人民严加束缚，甚至比帕斯凯维奇高踞于城堡之中牢笼统治的二十五年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波兰，时代正在变化。由于工业主义以惊人的速度遍及整个王国，过去的不满已被遗忘，旧有的忠诚也已不知不觉地被抛弃掉，直至下个世纪开始时为止，此时，对民族效忠的问题将由那时尚未出生的一代人在一个不同的环境里另行措辞重新提出。因为兰盖维奇的传统——甚至科希秋什科的传统的继承人将是约瑟夫·毕苏茨基。他在1867年，亦即这场经济革命的高峰时期，降生于瓦尔纳附近。

波兰起义的失败标志着欧洲所有的民族一个时代的结束。1863年的起义是19世纪中由深沉的爱国热情促成在一个相对发达的社会里举行武装起义的最后一次。每逢青年们对变革的姗姗来迟表示难以忍耐的时候，一些较古老的城市便不时发生骚动和

示威，但革命的街垒已成为社会主义左派所独有的东西。为民族解放而进行英勇斗争的观念在巴尔干各国的比较天真的社会里依然存在。但其他地方在政治上，理智已开始战胜感情。在意大利和德国，1848年的疯狂激情已让位于由加富尔和俾斯麦所完善的外交技术上的冷静的深谋远虑。一种类似的现实主义构成了东欧和中欧各从属民族对民族问题的根本态度，虽然从外表上看来它的成就显得不那么令人瞩目。妥协与和解将成为新政治的关键，争取民族承认的运动已进入中年。

第四章 多瑙河上的风云

71

19 世纪 60 年代，中欧在结构与组成方面发生了较之以往任何一个十年都更加剧烈的变化。最大的动荡自然是由于普鲁士军事与政治在奥托·冯·俾斯麦指挥下取得胜利所引起的；因为尽管俾斯麦本人对多瑙河盆地兴趣极小，而对东南欧则更无任何兴趣，但统一的德国紧随着统一的意大利相继出现，终于迫使哈布斯堡君主国“将其重心移至匈牙利”——值得注意的是这正是俾斯麦自己的话。王朝的这一“多瑙河使命”从一开始就受到其斯拉夫臣民的挑战，而弗兰西斯·约瑟夫在 1867 年与马扎尔人之间所达成的和解却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直至 1918 年俾斯麦帝国垮台时才告破裂。

虽然人们一般习惯于强调 19 世纪 20 年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性，着重指出其对于以后岁月里紧张关系所产生的影响，但如果忽视工业资本主义的增长在此时强加于中欧各族人民的社会调整，也是错误的。因为在这个地区，“俾斯麦时代”恰恰是“蒸汽动力时代”。奥匈帝国的奥地利诸行省早在 1848 年革命前就有了一个铁路网，此时，这些铁路开始将东西两方联系起来，首先集中于波希米亚，随后便深入各边境地区，有时达到边境以外。蒸汽动力的用途也不限于运输。施蒂里亚、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中部的铁厂与机械厂逐渐采用蒸汽机驱动机床、操纵汽锤、发动起重机。无论维也纳和布尔诺周围或者布达佩斯南面的切佩尔岛，处处都烟囱林立。工厂改变了文明生活的面貌，吸引人们离开农村，既造成一个城市无产阶级，又造成一个商业阶级，后者从事股票和证券投机活动，

常常不负责任地肆意妄为，有时则造成灾难，如在 1873 年，即其一例。工业人口所占比例在 19 世纪最后三十多年间更加迅速地成倍增加，但早在 1870 年，维也纳新建的环形街两旁的华美建筑物与多瑙运河彼岸的贫民窟之间的对比，其本身就是对社会的一种评语，而布达佩斯的工人住房条件之糟，很快就赶上了欧洲的任何地方。因此，虽然最初一批旗帜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直到 1889 年及 1890 年才相继在奥地利和匈牙利成立，但工业社会的艰难困苦却几乎在二元君主国刚一建立的时候便开始表现出来。从许多方面来说，1867 年 6 月为匈牙利国王精心安排的加冕典礼，以八百名骑士身着华丽服装、马蹄得得地穿过佩斯街道，这却是封建君王最后一次盛大的表演。哈布斯堡君主国已与它在不过六十几年前力谋取代的神圣罗马帝国一样，变成了一种不合时代潮流的中世纪事物。

弗兰西斯·约瑟夫虽然认真刻苦，却不甚颖慧，缺乏洞察力。甚至还在 1866 年与普鲁士进行灾难性的战争之前，他已意识到他的权威委实脆弱得惊人之至。自 1860 年 3 月至普奥战争爆发之前，他授权进行了不下四次的宪政试验，并且意识到其中任何一次，无论其性质是联邦制还是中央集权制，只不过能使一小撮政治领袖感到满意。哈布斯堡的政治体制不够健全，必需牢牢掌握住帝国境内民族力量的平衡，而要达到这一点，则须与马扎尔人达成谅解。

1864 年，在一个马扎尔贵族莫里斯·埃斯特哈泽伯爵——此人的庄园就在距离维也纳五十多英里的多瑙河下游——怂恿之下，皇帝与匈牙利一个自由主义派人士德阿克·费伦茨秘密接触，他发现这人具备国内社会人士中罕见的政治家才干。政治上，德阿克早在 1848 年以前便是温和派，此次他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他要为匈牙利谋得后世称为“地方自治”的那种体制。当时弗兰西斯·约瑟夫才三十四岁，有相当充分的经验，已不会立即拒绝德阿克的

条陈。倘若在早年他当政的时候，是会那样干的。次年春天，他突然巡视布达佩斯，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其他民族已经察觉，皇帝在准备同马扎尔人结成伙伴关系。

可是，倘若不是因为来自普鲁士的威胁以及嗣后奥地利军队在萨多瓦—科尼格拉茨打了败仗，他和马扎尔人的这次勾搭很可能也会像前六年间所采取的其他宪政措施一样地有始无终。因为把君主国变成一个二元国家的前景招来了几乎所有政治集团的愤怒指责。最强烈地谴责他的是捷克人，帕拉茨基出版了一本书叫作《奥地利国家的设想》，主张奥地利为了完成其历史使命，需要在平等基础上对待日耳曼、马扎尔和斯拉夫等各族人民。皇帝犹豫不决：他给捷克人下了一道谕旨，保证说他有意去布拉格加冕，成为波希米亚之王；而且他似曾一度赞成奥地利首相贝尔克雷迪伯爵的计划，把王国分成五个联邦国。⁷³

这些内部纷争的步伐不慌不忙，波希米亚北部边境以外不断增长的危机却在日益加剧。俾斯麦与毛奇^①已经决定，如果弗兰西斯·约瑟夫不准备放弃他在德国事务中要求最高权力的企图，普鲁士军队必将一劳永逸地粉碎哈布斯堡在德国充当仲裁者的力量。经过六个星期的战斗，普鲁士的一个军团便开进布拉迪斯拉发，另一个军团开进瓦格拉姆。匈牙利人没有参战，他们在佩斯欢迎伊丽莎白皇后（她对马扎尔的每一事物都有一种浪漫主义的热情）；他们没有对俾斯麦的试探作出反应；但他们也极力禁止在匈牙利土地上为帝国军队征兵。德阿克认为，这场战争是一桩不相干的事，不过是为了控制德意志联邦的一场争吵，对任何忠实正派的马扎尔人都无关紧要。他告诉弗兰西斯·约瑟夫说，匈牙利在萨多瓦之役以后的要求并不比这以前更高。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宽宏大量，而是一贯如此。他的最高限度的要求早已提出。发生了

^① 毛奇(Moltke, 1800—1891), 普鲁士陆军元帅。——译者

变化的是匈牙利的地位，而不是它的态度；因为普鲁士人既已控制维也纳与布达佩斯之间的多瑙河，弗兰西斯便不再具备与马扎尔领导人讨价还价的地位。由此达成的协议称为“妥协”（即“奥匈协议”），对帝国内的斯拉夫各民族来说，这个词儿不过像是投降的委婉说法而已。

关于协议的最后谈判是在斐迪南·冯·博伊斯特（他是弗兰西斯·约瑟夫任命为奥地利首相的一个撒克逊人）和安德拉西·久拉伯爵（此人出身于马扎尔贵族，仅仅十八年前还被人骂为造反者）两人之间进行的。德阿克本人秉性谦虚，不怀个人野心，谢绝政治职位，但弗兰西斯·约瑟夫任命安德拉西担任匈牙利第一任首相却是出于他的推荐。不久之后，皇帝便开始把安德拉西看作为一位不可缺少的大臣，他在1871年至1879年担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期间，对欧洲事务所施加的影响，是自梅特涅以来的任何前任所无法相比的。

“奥匈协议”——按奥地利的算法，是第七号法律——1867年5月底经新召开的匈牙利国会批准。形式上，这是君主与其马扎尔臣民之间的一项契约，尽管它规定在奥匈帝国的另一半中将设置一个平行的政府。根据“协议”的条文，弗兰西斯·约瑟夫承认包括特兰西瓦尼亚、斯洛伐克高地，边屯区及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在内的“圣斯蒂芬王室领土”的统一与完整，以换取匈牙利国会承认皇帝—国王负责外交与国防，有权任命负责掌管这些事务以及君主国两部分的共同财政的联合大臣。匈牙利王国与“帝国领土”（奥地利——包括卡尔尼奥拉、戈尔夫和伊斯特拉、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加利西亚、西里西亚和布科维纳）均分别设立两院制国会和各自的行政机构，各由一名首相领导。两个国会各提名任命六十人组成“代表团”每年在维也纳或布达佩斯交替开会，完全独立地讨论有关两国的事宜。对于共同国籍未作规定，因此住在匈牙利

的“奥地利人”只有在归化之后才能参与公共事务，住在奥地利的“匈牙利人”也是如此。对于商业联盟作了规定，每十年延长一次。共同开支的分配办法有利于匈牙利，正如安德拉西一次讲的那样，“如果有人抱怨说‘协议’的条件不利于匈牙利，我要回答说我们目前只付共同开支的百分之三十，而享受的权利却与付百分之七十的那些人相同”。

从技术性来说，这项独特的宪法性文件所创造的是奥地利—匈牙利二元君主国，但马扎尔人所得的好处如此之多，有时似乎不如说是“匈牙利—奥地利”，这尽管并不怎么悦耳，倒能更加恰当地说明这种关系。匈牙利王国的政治结构是一元化的，其精神主要是马扎尔式的：“帝国领土”的结构则是一种虚假的联邦式，因为地方议会保有广泛的权力，虽然这些权力从来既不足以与朝廷的中央集权倾向相抗衡，也不足以使从属民族的政治领袖们感到满意。正如帕拉茨基所担心的那样，“二元制”实际上限制了可能有意满足另一民族集团的要求的任一君主的自由行动。弗兰西斯·约瑟夫和博伊斯特无意之间作茧自缚。19世纪70年代初，当安德拉西作为外交大臣率先寻求与俾斯麦的德意志联邦和解的时候，情况就清楚了：宪法结构的性质不仅决定了奥匈帝国的内部事务，甚至也涉及对外政策的制定；这种情况一直保持到1918年。

安德拉西对斯拉夫的一切都十分反感，而无论维也纳还是布达佩斯也有许多别的贵族持这种态度。但是，除了德阿克的温和的影响之外，安德拉西政府中还有一位教育大臣，即哲学家兼小说家厄特沃什·约瑟夫，他诚心诚意地相信对马扎尔以外各民族的歧视是既不人道、也不明智的。正是德阿克与厄特沃什使匈牙利国会在1868年通过了一项字面上宽宏而开明的民族法，允许给予⁷⁵少数民族以司法、教育和地方行政事务方面的广泛权利，但以后各

届政府由于具有沙文主义的顽固性，竟使这些保证成为笑柄。

匈牙利人得以自行处理其与特兰西瓦尼亚居民中占多数的罗马尼亚人、以及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南部斯拉夫人的问题，而第三个从属的种族集团（斯洛伐克人）则因实际上一直默不作声，便遭忽视。他们拒绝特兰西瓦尼亚自设议会；罗马尼亚人则被邀直接向布达佩斯国会派出代表，虽然公民选举的限制极严，很少罗马尼亚人有选举权。而罗马尼亚东正教教会却被赋予自治权利，它从此以后便成为罗马尼亚国家统一运动在国境内的旗手，这一爱国活动直到最近若干年还有影响。可是，特兰西瓦尼亚人民则不然，他们只能从民族法所允许的权利中寻求慰藉。只要罗马尼亚王国软弱无力，特兰西瓦尼亚人民的主要倾向便是争取在哈布斯堡帝国内部享有某种形式的自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的领导人便把目光转向维也纳，后几年则特别转向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但从未转向布达佩斯。

克罗地亚人认为“协议”无异于王朝的一种出卖行为。耶拉契希巴昂统治时期，他们在1848至1849年的大动荡中保持忠诚，而克罗地亚士兵不论对扑灭意大利革命、还是协助驱逐科苏特都起了大作用。他们却没有从皇上那里得到任何物质或政治上的好处作为报偿，只不过竖起一尊耶拉契希的雕像，手执一把指向匈牙利心脏的宝剑，以及里耶卡港（当时的名字是意大利语“阜姆”）从匈牙利手中转给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这一新行政单位。当时他们只得与马扎尔人这个坚持把他们看作“野蛮人”的民族自行磋商解决办法。

在安德拉西、甚至在德阿克和厄特沃什看来，1868年对克罗地亚的解决办法（称为“纳果达”）^①像是宽大的：克罗地亚被承认

^① 原文是Nagoda，匈牙利与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人之间的解决办法（1868年）。——译者

为一个“政治国家”，其人民有权派代表出席萨格勒布的议会（沙布尔）^①；一个由三人组成的克罗地亚行政机构掌管内政、司法和教育；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被承认为国家正式语言。克罗地亚人却很不满意，而且有充分道理。他们的总督（巴昂）并不对弗兰西斯·约瑟夫负责，而是对布达佩斯的一位国务大臣负责；并且它与哈布斯堡所辖其他各省的关系都是由匈牙利首都，而不是由萨格勒布管理的，这是对本地区的商业与经济严重发展的严重束缚。⁷⁶此外，“沙布尔”选举极端腐败，选举权几乎完全限于大地主和官员；每五十人中大约只有一人有选举权。各种诡计中最露骨的例证是关于阜姆地位的规定。“纳果达”的匈牙利文本里宣称该港口作为王国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归还匈牙利，而克罗地亚文本里却只提到要就它未来的行政管理进行讨论。当把克罗地亚文本送交弗兰西斯·约瑟夫签字时，却在克罗地亚文本上贴了一张马扎尔文本的克罗地亚译文，得到了皇帝的批准。阜姆因此直到1918年便被作为匈牙利独有的领土对待；必须承认，这种安排使这个城市受益颇多，尽管克罗地亚人从未放弃他们的要求，认为这个港口按理应由萨格勒布直接管辖，不应该由布达佩斯管辖。

如果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一直是马扎尔人编造的传说中那种原始和落后的省份，那么，“纳果达”至少还有现实主义的优点。但是，由于贾科沃的主教约瑟夫·斯特罗斯迈尔的努力，19世纪50年代克罗地亚文化经历了一次显著的复兴。在他的倡议下，1867年在萨格勒布成立南部斯拉夫艺术与科学学院，接着于1874年建立一所大学，十年后又建立一所美术馆。斯特罗斯迈尔担任贾科沃这一富裕教区的主教达五十六年之久，直到他在1905年去世之时；他始终保护着诗人、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推动了克罗地

① 原文是Sabor，意即议会。——译者

亚学术的发展。他是南部斯拉夫统一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希望迟早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和保加利亚人吸引过来，与克罗地亚人共同组成南斯拉夫联邦，以萨格勒布为其精神上的中心，甚至作为其政治上的首都。然而，不仅匈牙利的领导人不信任他，贝尔格莱德的政客们几乎也同样不信任他。而且，由于多数克罗地亚人对他们边境以内或以外的塞尔维亚人一贯鄙夷，正像他们自身遭到马扎尔人的鄙夷那样，斯特罗斯迈尔的梦想从来未曾有过多少得以实现的前景。但他的事业，以及他的主要合作者历史学家弗拉尼奥·拉契奇的研究工作却使克罗地亚学术的声誉达到新的高度。斯特罗斯迈尔由于与格莱斯顿有通信联系，以及他在1870年梵蒂冈会议上激烈反对教皇的极端要求，成了全欧洲的著名人物。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南部斯拉夫运动，特别是克罗地亚各族人民与斯拉夫民族性认同的第一位对外联络员。科苏特这位西方自由主义派所崇拜的人物，曾一度宣称根本不存在什么克罗地亚民族，而且他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克罗地亚这个地方；斯特罗斯迈尔的成就便在于证明了这种狂言纯属胡说。

77

作为对“奥匈协议”的补充，1867年12月在“帝国领土”上正式实施宪政；紧接着便采取一系列开明措施，限制教会的权力，使刑法人道化，改善犹太人的地位，并发展公共教育。但“奥地利”也面临着民族问题，即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的捷克人与维也纳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挟带着不久前才过去的风暴的余波，亟待解决；但是，其他民族集团——最明显的是罗塞尼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暂时都像匈牙利的斯洛伐克人那样默不作声，他们在政治上的地位因而遭到忽视。

1868年加利西亚议会在利沃夫开会，会上通过的几项决议，原会使本省获得高度自治。足有五年，维也纳国会中的波兰议员

一直谋求实现这一纲领。但在二元制政权体制下，几乎完全不可能给予波兰人这样一种民族发展的机会，虽然由于他们是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比起另一些祖先在社会上不那么完美无瑕的斯拉夫民族集团来，他们的愿望总还承蒙马扎尔人给予较为同情的关注。如果说波兰人未得充分实现利沃夫纲领的话，却确实使维也纳国会同意了一些法律，允许学校和大学波兰化；而且他们也被授权派一名特殊的“加利西亚大臣”常年出席御前会议。毫无疑问，加利西亚的波兰人比他们在俄罗斯帝国或普鲁士境内的同胞所享有的独立程度较高；波兰学术于是在利沃夫与克拉科夫继续繁荣起来。

捷克人曾经希望王朝正式承认“波希米亚国家权利”，而且他们像在普鲁士入侵前做过的那样，恭请弗兰西斯·约瑟夫莅临布拉格正式加冕。皇帝曾三度同意举行这一典礼，但每次都迫于形势而自食其言。不过，这样明显的失信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捷克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显然很不得体。帕拉茨基的预言警句如雷贯耳，他当之无愧地在欧洲负有学者的盛名，但在政治方面他所见过远，以致对眼前一些问题的看法则一错再错。他的女婿弗兰蒂塞克·列盖尔是个年青一代的代言人，这方面也帮了帕拉茨基的倒忙。萨多瓦之役过后才不几个月，他便去莫斯科参观泛斯拉夫人种史展览会，强调把捷克人与俄罗斯人联系在一起的斯拉夫兄弟情谊，这是政策上一重大错误；1868年在布拉格召开泛斯拉夫会议同样是不明智的，这些高谈阔论毫无效果。最后，1869年还泄露了一桩保守不严的秘密，说列盖尔曾去巴黎敦请拿破仑三世出面为捷克人说情；弗兰西斯·约瑟夫的态度于是明显地强硬起来，这是毫不奇怪的。

对于捷克人，关键的一年是1871年。波希米亚议会提出一项详尽的关于民族自治的方案，即“根本条款”。皇帝听取了捷克人的计划，而奥地利首相霍亨瓦特也并非不同情；但帝国的德意志人

举行吵闹不休的游行示威反对这一决定，他们相信这项决定最终将导致所有少数民族的地方自治，从而摧毁德国对中欧的控制。维也纳与苏台德发生骚动。霍亨瓦特一时不知所措，弗兰西斯·约瑟夫几乎自动地转而向安德拉西求教。其实安德拉西在波希米亚事务上并无被咨询的合法权利，皇帝却已把他当作朋友和一位直率的顾问来依靠。马扎尔人像德意志人一样把“根本条款”视为斯拉夫楔子的尖端；在安德拉西适当地表示了一定的不情愿之后来到维也纳时，他给霍亨瓦特的建议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准备用大炮来承认波希米亚国家权利吗？要不，就别着手实行这一政策。”安德拉西的警告像正式否决那样有效；与捷克人的谈判当即突然中止。从此足有八年时间，当选的捷克议员不肯接受他们在维也纳国会里的席位，拒绝参与这个否认他们民族权利的大会的事务。列盖尔和他的同僚们赌气弃权的这种策略是否有利，倒是值得怀疑。

在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社会与经济发展中的紧要关头，未能与布拉格达成解决办法，因而使德意志人与捷克人之间的敌对更加深化持久。19世纪60年代，捷克人在文化上的进步与克罗地亚人同样显著，在这些年里创办了一家很像样的捷克日报和一所捷克民族剧院。出现了新一代的捷克小说家，斯麦塔纳的歌剧开始了捷克音乐的黄金时代。爱国主义的自豪感也被“索科尔斯”^①培育起来了。这种群众性的体操运动创始于1862年，是出于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有纪律的体育活动的节奏来训练人的心灵，从而可以对国家做出贡献。这是一种精神教育的哲学，多少来源于德国人开创的先例，它却赋予捷克的民族运动一种独特的特征，虽然后来其他国家里也曾被模仿，而且有时还被随意滥用。

捷克人爱国主义感情的增长适逢他们迁入一些新的工业区，

① 原文是Sokols，意即捷克人的群众性体操运动。——译者

形成一个由讲德语的雇主统治的无产阶级之际。在帝国其他地方，城市里的社会问题都没有同民族对立联系得这样紧密。随着 1868 年第一所捷克银行即齐夫诺斯滕卡银行的建立，以及捷克人渗入小商业官僚机构，也就开始了对德意志—奥地利霸权的更加严重的挑战。与以往不同，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之间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的主要斗争目标已不是虚假的历史权利，而是有关就业和捷克语的使用问题。人们几乎未能觉察，年复一年，捷克人在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取得了更大的控制权。

多瑙河以南和以东，在新的奥匈帝国边界之外，社会和经济仍旧处于原始状态，国界所标志的看来也不仅仅是国与国之间的差别。19 世纪 20 年代，法国和英国资本已开始开发罗马尼亚，集中于谷物出口方面，多瑙河下游的海上贸易迅速发展，与敖德萨和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展开了竞争；但这时多瑙河两公国还都没有什么工业。塞尔维亚的工业发展得也很慢；到 1870 年，国内工厂仅十二家。经济增长迟缓，一方面是由于 1847 年所通过的、旨在保护国内传统的家庭手工业的行会法，另一方面由于奥地利人拒绝修改最初于 18 世纪早期与奥斯曼政府订立的关税率，订立关税率时认为塞尔维亚人将仍是一个游牧民族。保加利亚——当时仍属于土耳其帝国，而且也像塞尔维亚一样为行会法所限制——有几家纺织厂，在旧扎戈拉有一座现代化工厂；经济生活中的主要变化却发生在农村，人们试图将封建庄园扩大为大农场以供应较大的市场。由于土耳其人失去了罗马尼亚谷仓而需另觅一处谷物产地，又因西欧兴起一种吸“土耳其”烟草制成的纸烟的习惯，这一转变因而加速。

在巴尔干诸国，蒸汽动力时代姗姗来迟。尽管连接君士坦丁堡与中欧的联运铁路干线到 1888 年方才建成，但早在二十多年前

就已修筑一些零星而互不连接的线路，其中一些后来在战略与商业上也有相当的重要性。譬如，在横跨多瑙河沼泽地带长达十二英里的切尔诺沃达大桥于1894年通车前三十多年，英国人早已修筑一条从康斯坦察到切尔诺沃达、经过多布罗加的铁路；1866年从瓦尔纳到鲁楚克（鲁塞）修筑保加利亚第一条铁路的也是英国人；在鲁楚克最后也修了一座横跨多瑙河的桥梁，不过直到1954
80 年才修成。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巴尔干本地区的铁路企业大部分是由德国和奥地利资本经营的。1877至1878年土耳其人与俄罗斯人交战期间，从君士坦丁堡到菲律普波利斯（普罗夫迪夫）间的铁路对土耳其人颇有军事价值，使其部队得以迅速北调，保卫巴尔干各隘口；但一般说来，除了十年旷日持久的混乱必然推迟工商业的增长之外，东南欧的经济发展和这一时期的政治问题并无联系。

19世纪60年代，俾斯麦的影子深深地笼罩着西欧与中欧，因而巴尔干各族人民中的大部分首次有机会自行安排自己的命运。于是，布加勒斯特的政治家得以在1866年通过一场不流血的政变摆脱了库扎，而选择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家族的查理作为第一次正式称为“罗马尼亚”国的大公。由于查理大公这个二十七岁的活力充沛的普鲁士军官正巧又是拿破仑三世的表兄弟，他的当选仅在国际上引起最小限度的分歧便获通过，柏林和巴黎两地的王朝都对自己亲戚的高升感到满意。

贝尔格莱德的政治家们从来不具备变换君主的本性，在此期间，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大公的八年统治使近代国家机器得到发展。他建立了一支善于作战、装备精良的军队，并在1867年迫使土耳其驻军终于撤出贝尔格莱德和其他要塞，因而成为人民英雄。诚然，如果不是米哈伊洛1868年在城外的托佩多遇刺，造成玷污塞尔维亚历史的不解之谜，很可能趁欧洲正全神贯注于普

法两国的冲突时，会在俄国支持下产生一个巴尔干各族人民的反土耳其联盟。米哈伊洛的继承人，他的堂弟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当时不过是个十四岁的孩子，因此，在位的头四年得由一些年长的政治家摄政。

巴黎会议后的十五年间，巴尔干各国的政治面貌无疑发生了明显变化。一部分是由于新罗马尼亚的创建与巩固，由于阿卜杜尔·阿齐兹苏丹日益喜怒无常、随意摆布奥斯曼对保加利亚、马其顿和波斯尼亚的行政管理，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于 1864 年到 1877 年间俄国驻君士坦丁堡的大使伊格纳切夫将军一再企图把对土耳其的不满拴在泛斯拉夫主义的战车上。另外，与伊格纳切夫和俄罗斯官方政策都不相干的是，还有一种赞成南部斯拉夫（即南斯拉夫）统一的情绪正在滋长，这是由于斯特罗斯迈尔和克罗地亚人的鼓舞——“南斯拉夫”（Yugoslav）这个词便是 1861 年的萨 81 格勒布议会创造的——而且是通过一个秘密的塞尔维亚青年运动，即“奥姆拉丁纳”^①的活动来实现的。该组织在性质上比捷克的“索科尔斯”更倾向于社会革命，但缺乏后者那种道德上的开明精神，它越来越为圣彼得堡和萨格勒布所怀疑，对于贝尔格莱德的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统治者来说，它最终也成为过分危险的革命了。19 世纪 70 年代初的情况在许多方面都像是在预演第一次大战前夕那种局势，不过后者较为人们所熟悉，当时俄国外交官和名为“黑手党”的塞尔维亚秘密会社的活动之激烈，无论是俄国外交部还是塞尔维亚政府都终于无法控制。

但是，在 19 世纪 70 年代中改变了巴尔干的地图、使列强的注意力集中于东南欧达十年以上的却是保加利亚民族的觉醒，这比

① 原文是 Omladina，意即塞尔维亚秘密青年运动。——译者

其他任何原因更重要。保加利亚人的文化复兴比其他南部斯拉夫各族人民都晚得多，原因有四：地理位置的孤立；教育的落后——第一所保加利亚学校迟至1835年才开办，这是加布罗沃的一位退休的伏特加酒商给他的故乡的献礼；19世纪50年代以前与欧洲其他地区没有贸易往来；以及一班对立的语言学家就西部与东部方言孰优孰劣问题进行高度学究式争论所造成的保加利亚的文学语言形式的混乱。

俄国军队虽曾于1828至1829年占领过保加利亚，却没有鼓励反抗土耳其的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与上一代的塞尔维亚人相比，保加利亚人缺乏地区性组织。甚至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政府也只是后来才想到去鼓动保加利亚人，但已事过境迁，毫无效果。战争结束后的二十年间，约有五百名保加利亚人在俄国接受教育，主要是靠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的资助，这个团体建立于1858年，嗣后，在外国观察家心目中等同于泛斯拉夫主义。先是在莫斯科，后来在敖德萨为保加利亚人提供的教育是宗教性质的，虽然许多学生起来反对过他们的导师，并染上了虚无主义色彩。当代人和某些历史学家夸大了泛斯拉夫主义对保加利亚民族复兴的开创与形成所起的作用。只有一位保加利亚人，那就是哈尔科夫大学的马林·德里诺夫教授出席了1867年和1868年在莫斯科和布拉格举行的泛斯拉夫集会，他在1878年后声望很高，因为他是保加利亚第一任教育大臣，又特别因为他是提出以索非亚为新公国的首都的第一个人。但在1877年至1878年的东方危机之前，德里诺夫在保加利亚流亡者中间的影响还根本微不足道。运动的领导者，诸如柳宾·卡腊维洛夫、赫里斯托·波特夫和年轻但却更有名气的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等人，认为俄国沙皇制度是压迫性的暴君专制；他们较之例如在帕拉茨基和列盖尔领导下的捷克人，更不信任泛斯拉夫那一套丰富有力的言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保

加利亚爱国者并不在哈尔科夫或敖德萨，而是在布加勒斯特寻求避难所，在那里，他们可以较少地依赖俄国的庇护。他们想利用泛斯拉夫主义，却又不想被泛斯拉夫主义分子所利用。但西欧和中欧的政治家们未能觉察到这一区别，这些人长期以来不理解保加利亚民族运动顽强的独立性。

保加利亚人要决定自己的前途的愿望在 19 世纪 60 年代早已表现出来，当时反对希腊宗教与文化统治的长期斗争正达到高潮。俄国人鼓励保加利亚人在东正教的会议上取得某种形式的代表权，并且要求在礼拜仪式上使用保加利亚语。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虽也愿意让伊格纳切夫帮助他们与土耳其太上皇打交道，他们所要求的倒比泛斯拉夫分子所设想他们应当得到的多得多。他们希望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教会，要像亨利八世的英国教会那样，独立于教皇控制之外，完全摆脱君士坦丁堡的普世牧首^①的控制。他们在 1870 年得到了所希望的一切。因为在那一年，土耳其政府批准成立保加利亚督主教区，下设十四个主教区，由一个不属于总主教的会议管理，毫无疑问土耳其当局指望利用保加利亚人与希腊人之间、当然还有保加利亚人与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宗教仇恨——因为主教区中有两处是居民绝大部分为塞尔维亚人的地区——来分散反对奥斯曼统治的政治运动；但不到几年功夫，督主教区变成了保加利亚民族感情的发源地，正如半个世纪以前希腊的主教与牧师们那样为爱国事业尽力。

尽管保加利亚领导人无意为俄国人火中取栗，泛斯拉夫运动却在莫斯科新闻界的支持下继续将金钱倾入巴尔干。首席大臣戈尔恰科夫所制定的俄国官方政策远为有节制。但是，戈尔恰科夫本人既趁普法战争的时机宣布俄国不再认为有遵守巴黎条约所规

^① 普世牧首 (Oecumenical Patriarch) 是东正教君士坦丁堡牧首 (宗主教) 的首席荣誉称号。——译者

定的黑海非军事化的义务，欧洲的其他政治家自然也就不再区分戈尔恰科夫的谨慎与泛斯拉夫运动的鲁莽之间有何不同。于是，人们又纷纷议论“巴尔干积雪融化时，春季风波恐将再起”。俾斯麦惧怕为了在普鲁士无利可图的世界某一地区与人发生冲突；一部分出于这一原因，他在1872至1873年主张在德国、俄国与奥匈帝国三国皇帝之间缔结一项松散的协定（即第一个“三皇同盟”），作为君主团结的姿态，并保证通过外交途径而不诉诸战争以谋解决未来的任何危机。安德拉西作为奥匈帝国的外交大臣，也无意在巴尔干各国谋取一个总揽一切的地位。他跟梅特涅和根茨一样极力维护土耳其的完整，理由也大致相同。但是，颇似1914年形势的又一次预演，奥地利军方一伙不同意这位外交大臣的观点。在他们看来，达尔马提亚的狭长地带在军事上是无法防御的弹丸之地。其腹地包括土耳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两个行省，这些地方如果被奥匈帝国军队占领，就能在东南欧保卫君主国不受侵犯。弗兰西斯·约瑟夫对这种论点深表同情，他此时还在因为1859和1866年间失去的意大利土地而感到懊丧。

1875至1878年东方大危机的烈火实际上是黑塞哥维那的奥地利军方而不是保加利亚的泛斯拉夫主义分子点燃的。1875年5月，弗兰西斯·约瑟夫视察达尔马提亚的驻军时，接见黑塞哥维那信奉天主教的少数民族代表团，并去门的内哥罗的首都采蒂涅访问尼基塔大公。黑塞哥维那的斯拉夫族居民，苦于不平等的税收制度和落后的农业状况，已深信他们能够指望到俄国同情的支持；此时他们希望同样能得到奥地利的援助。皇帝出访不到一个月，黑塞哥维那的基督徒便开始反叛；到八月中，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受到“奥姆拉丁纳”的鼓励，也起而反对他们的土耳其主子。贝尔格莱德游行示威的人们敦促米兰大公对土耳其宣战，成百的俄国志愿军经过罗马尼亚进入塞尔维亚，而在维也纳，安德拉西不

无成效地力图遏制军方,开始了寻求一项能被列强、苏丹和反叛分子接受的外交方案的缓慢过程。

总部设在布加勒斯特的保加利亚中央革命委员会还没有做好全面起义的准备,起义便于1875年9月发难,为时甚短,旋即失败。由于外官们的一些建议先为一方、后又为另一方所拒绝,保加利亚流亡者开始策划在1876年春季大举起义。于是,派遣特工人员从久尔久渡过多瑙河潜入农民中煽动不满情绪。起义爆发时,土耳其人已有戒备,因此经过六星期的流血战斗,称作巴希-巴佐克^①的土耳其非正规军就无情地将保加利亚民族生活的全部标志一律查禁;约有一万二千到一万五千男女及儿童死难。

84

巴希-巴佐克和西尔卡西亚非正规军的所作所为激起西方人的愤慨,从而改变了这次危机的性质。西方记者深入保加利亚内地,报道他们的见闻;从六月底往后,英国《每日新闻》和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报》的读者得悉土耳其军队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全部细节。俄国报刊依靠伊格纳切夫悉心供稿,把泛斯拉夫情绪煽动到炽热的顶点。在英国,格莱斯顿的著名小册子《保加利亚的恐怖事件与东方问题》于9月初出版,第一星期就散发了四万多册,而同月发行的廉价的俄文译本卖了一万多册。格莱斯顿日记里所说的“充满风暴与一线光明的东方天空”在那年冬天把一片阴沉的光反射到西方和北方。没有别的民族,甚至连希腊人,都不曾像保加利亚人那样赢得舆论界如此的同情。

与此同时,塞尔维亚的米兰大公陷入严重困难。在第一次起义后的十二个多月里,他保持平静,圣彼得堡的官方意见也继续劝他克制。但米兰在二十二年的生活中深深染上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恶习,并没有由于政治上有所领悟而迷途知返,此时已身不由

^① 原文为Bashi-Bazouks,意即土耳其非正规部队。——译者

己。他的首相里斯蒂奇是个狡猾的恶棍；而俄国总领事，秉性软弱
85 经不住泛斯拉夫主义分子的胁迫，虽身着文官礼服却口吐恶言心
怀杀机。更可怕的是贝尔格莱德街头的群众，他们游行示威，反对
土耳其的国旗，群情热烈，危及王室；根据一条古怪的国际法规定，
土耳其国旗在最后一批土耳其军队全部撤离已达九年时，仍飘扬
于卡拉梅格达姆要塞上空。1876年6月30日，米兰终于同门的
内哥罗的尼基塔大公一起对土耳其宣战。群众扯下了可恨的新月
旗，使擅长爱国油画的画家们喜不自胜，接着塞尔维亚军队便在俄
国志愿军的带领下雄纠纠地投入战斗。

这次战役一败涂地，从一开始俄国和塞尔维亚的军官未能合
作。俄国将军米海尔·切尔尼耶夫一心想把自己装扮成塞尔维亚
的加里波第，对战略战术全不顾及。土耳其人连战连捷；九月中
旬，米兰被迫乞和，并请求列强拯救塞尔维亚免遭土耳其人的报
复。米哈伊洛·奥布雷诺维奇的智慧为塞尔维亚赢得全欧洲的敬
重，而他的年轻的继承人胡作非为，竟使它的地位大为低落。从此
115 以后，俄国几乎仅限于保护保加利亚，这个国家横跨通向博斯普鲁
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的主要陆上道路，对俄国人来说，具有战略
上的优点。1876年11月11日，难得公开讲演的沙皇亚历山大二
世在莫斯科发表一通好战的言论：严厉谴责塞尔维亚人，赞扬门的
内哥罗人，并且说“我们的志愿军中有许多人为斯拉夫的事业流尽
鲜血”。“我十分渴望”，在演说结尾时他说，“我们能达成一项全面
的协议……如果作不到这一点……我决心独立行动……愿上帝帮
助我们完成我们的神圣使命”。

虽然后果不难逆料，外交努力还是继续进行了六个月。早在
上一年7月，戈尔恰科夫和安德拉西曾在赖希镇会晤，并达成口头
协定，将在一场俄土战争以后将巴尔干划分为奥地利和俄罗斯的两
个势力范围（尽管在所达成的谅解的两种说法中存在某些不一

致之处)。进一步的秘密协议,即所谓的 1877 年 1 月的“布达佩斯协定”则较为确切:保证奥地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随意行事,交换条件则是它在俄土战争中保持友好的中立;虽然彼此默认保加利亚将成为独立国,却有一项正式保证“绝不成立一个斯拉夫族或其他民族的巨大的实体国家”。这时俾斯麦正利用三皇同盟这一吱嘎作响的机器来避免他的两个主要盟友之间发生冲突,争取和平解决;比肯斯菲尔德政府虽然与俄国人不共戴天,而且不断缩小关于暴行的报道,也在敦促土耳其人保证实行国内改革以抚慰开明人士的良心。但阿卜杜尔·哈米德苏丹上年 9 月才继承了声名狼藉的阿卜杜尔·阿齐兹苏丹的王位,很可能是出于他不理解英国的支持有一定限度,却要了一个不光明正大的花招:1877 年 1 月他否认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大使会议有权干涉土耳其的内政;4 月间,他最后拒绝英俄两国关于对奥斯曼国土上的改革进行国际监督的安排。俄国人忍无可忍,遂于 1877 年 4 月 24 日对土耳其宣战。

主战场在保加利亚,在高加索也打过一仗,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则在西面再次走上战场。罗马尼亚人也曾想助俄国一臂之力,但因俄国人一心想以收复比萨拉比亚作为和平条件的一项内容,他们的提议便遭到冷遇;查理大公被告知说,如果他肯把军队交给俄国指挥,罗马尼亚便可以参战,他拒绝了这项本来就是要他拒绝的要求。

俄国人起初似乎一切顺利,到 7 月中旬他们就控制了巴尔干山脉,先头骑兵已跨过地处要害的希普卡隘口。土耳其人则坚守普列夫纳城,在整个秋季和初冬击退了俄军的三次进攻。俄国迫于情势,便放下架子,同意与查理大公指挥的一支三万人的罗马尼亚远征军合作。直到 12 月俄国才最后攻克普列夫纳,向索非亚和普罗夫迪夫进军,后者是保加利亚民族感情最强烈的中心之一。1878

年1月20日，俄国骑兵终于攻进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由于通向君士坦丁堡的通路已经打开，土耳其人便签订了停火协议。

有关俄国人正打算占领土耳其首都的报道使英俄两国处于战争的边缘，英国还调一支舰队开入马尔马拉海。俄国于是派遣一万人前往马尔马拉海沿岸距君士坦丁堡仅八英里的圣斯特法诺。伦敦的舆论反复无常，很快忘记了1876年“土耳其屠夫们”的暴行，尾随比肯斯菲尔德和一支音乐厅的流行歌曲，试演不成熟的战争边缘政策。气氛紧张达于极点，东方问题一劳永逸的解决已无可能，但两大强国之间总算没有出什么事。

1878年3月3日在圣斯特法诺签订俄土条约，和平条件完全按照伊格纳切夫和他的主要副手涅利多夫的意旨提出。土耳其被迫作出影响深远的让步：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完全独立获得正式承认，三国并各自得到一些额外的领土；而且丝毫不考虑布达佩斯协定的规定，创建了一个自治的保加利亚，其版图之大竟至横跨巴尔干半岛。这个“大保加利亚”将不仅包括发生过民族起义的地方，而且包括整个色雷斯西部和马其顿，唯有萨洛尼卡港除外；这个新国家向西远远延伸，甚至包括阿尔巴尼亚山麓的丘陵地带。伊格纳切夫和泛斯拉夫主义分子看来大获全胜；但这一胜利却忽略了奥地利对于巴尔干西部的勃勃野心以及英国对爱琴海沿岸地区的敏感性。这是一项无论维也纳或伦敦都永远不会接受的条约；甚至在圣彼得堡，戈尔恰科夫也感觉无法为伊格纳切夫的成就辩护。

从圣斯特法诺条约到柏林条约中间相隔不过四个月，这段期间的外交谈判不仅属于整个国际关系史，而且对夹缝中的六国也同等重要。列强在柏林会议聚首时，除最后细节外，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大保加利亚”被看作是伊格纳切夫的野心所产生的死胎。

87 马其顿依旧在土耳其手中，而普罗夫迪夫周围地区则成为半自治

的“东鲁米利亚省”。自治的保加利亚被限制在多瑙河与巴尔干山脉高峰之间的地区。奥地利获得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根据法律仍属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以及管辖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之间的走廊（即新帕扎尔州）的权利。有关罗马尼亚的条款没有多少变化；它的独立得到正式承认，并获得多布罗加和多瑙河三角洲，作为将比萨拉比亚归还给俄国的补偿。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也被确认为两个独立国；塞尔维亚在尼什河东南得到的领土要比圣斯特法诺条约应允给她的还多；圣斯特法诺条约曾应允给门的内哥罗三个沿海村庄，并且真正在安提瓦利（今称巴尔）得到一处直通亚得里亚海的出口，但以永远不得将该海港发展成为海军基地为条件。土耳其人保证改善留在奥斯曼帝国境内基督徒的状况；他们还同意与希腊谈判修正边界，这项义务土耳其人只是在受到相当大的英国压力之后方才履行的，从而使希腊在1881年得到了极其肥沃的色萨利平原和伊皮鲁斯的一小片地区。除在欧洲作出这些变动之外，苏丹被迫向俄国交付一笔巨额赔款，并将大片高加索土地割让给俄国；另有柏林条约未曾提及的一项单独的公约允许英国军队驻守土耳其的塞浦路斯岛。

虽然柏林会议的解决办法使巴尔干诸国免于重大战祸达三十余年，但这次会议并未使任何与会者感到满意——也许只有俾斯麦例外，因为他只追求威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恼火地抱怨说那不过是“欧洲的反俄联合”；而对于安德拉西和索尔兹伯里（比肯斯菲尔德内阁的外交大臣）来说，柏林条约对民族原则作出的让步太多，奥斯曼帝国的局面似乎已不能再维持下去。各个小国同样不满意。罗马尼亚人非常恼怒比萨拉比亚就这样从他们的控制下被抢走，于是，布加勒斯特与圣彼得堡之间关系依然冷淡；查理大公——1881年成为国王卡罗尔一世——故意扬言要把亲属送往

德国宫廷去培养，并逐渐转入俾斯麦外交的轨道。塞尔维亚人则感觉被俄国人抛给了奥地利人，他们对于奥地利人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十分愤慨。甚至连门的内哥罗人也觉得受了骗，
38 虽然尼基塔大公在列强或多或少没有注意的情况下，趁 1880 年他边境上发生混乱之际占领了乌尔齐尼港。

但最重要的影响是在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当然对圣斯特法诺条约规定的边界线未能实现而失望。他们为达到这一条约规定的边界线的愿望继续引诱一些沙文主义思想较强烈的保加利亚政治家采取卤莽行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依然如此；即使在共产党治理下的保加利亚，有时也还能听到昔日争执的古怪回声。但保加利亚人至少有了一套国家机器；1879 年 2 月，他们的政治领袖们在特尔诺沃起草了一份异常自由主义的宪法，规定几乎凡是成年的男子都有权参加议会选举。由于保加利亚公国为东鲁米利亚（苏丹在那里仍保留相当权力）作出了民主进步的榜样，普罗夫迪夫出现了一个谋求国家两个部分统一的革命运动。

保加利亚人本身对俄罗斯人心怀感激，在大部分城市里和希普卡隘口高地上都为解放英雄们竖立纪念碑。在 1877 至 1878 年的战役中，俄国军队伤亡二十余万；俄国人认为，他们有权决定保加利亚国家未来的发展。1879 年被选为保加利亚大公的德国巴滕贝克的亚历山大亲王是俄国皇后的亲戚，跟他邻国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一样同属皇亲国戚，在这方面无可非议。但亚历山大个性坚强，他意识到保加利亚自由主义派永远不会对消极接受俄国的统治感到满意。同时，亚历山大也不情愿让政治家们得到他们通过特尔诺沃宪法所取得的自由行动的权利。到了 1885 年，这位大公就变成相当孤立的人物：原先的革命运动成员对他已不信任；俄国外交官认为他不如他们在他当选时所想象的那样听从摆布。他特别不喜欢那个硬被派到保加利亚当国防大臣的俄国将

军，也像几乎他所有的臣民一样，怨恨俄国人包揽保加利亚军队里上尉以上的全部指挥官职位的作法。有一次，他在新首都气愤地写道：“俄国所有的下贱坯子全都在这儿找到了藏身之所，玷污了整个国家。”

正是在这一时刻，即俄国人把亚历山大视为敌人，而保加利亚自由主义派又把他看作独裁者而不信任之时，普罗夫迪夫的革命者猝然一击；1885年9月18日，他们宣布保加利亚两部分合并，东鲁米利亚软弱无力的行政当局未采取任何行动加以制止。亚历山大碍于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施加的压力，只好接受既成事实。

1885至1886年的保加利亚危机是巴尔干历史上最希奇的一页。俄国人突然间从保加利亚军队中撤走全部俄国军官。获悉俄国人已经抛弃了他们在巴尔干国家中最宠爱的保护国以后，塞尔维亚的国王米兰——他这一尊号是1882年加上的——真是无法抗拒这一诱惑，普罗夫迪夫政变后两个月，米兰就派遣塞尔维亚军队入侵保加利亚；一星期内在斯利夫尼察被保加利亚人——尽管他们没有高级军官——打败，尼什落入保加利亚人手中。只因受到奥地利的威胁，保加利亚人才没有继续向塞尔维亚内地推进，也未向贝尔格莱德进军。

1886年2月，土耳其政府承认亚历山大为东鲁米利亚总督，这就使两个保加利亚得以通过这个人而合并起来，虽然还不是完全的政治上的合并。8月间，俄国阴谋炮制一场索非亚宫廷革命迫使亚历山大让位；不到两个星期，他又复辟。但看来很可能他要不被俄国人便会被保加利亚革命者刺杀。这个可怜人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与沙皇和解，但这一姿态使他在臣民中不得人心，于是，在他回到自己首都仅十一天时立即第二次让位，前后相距不足一月。然后他突然也肯定最后离开了本国，把它留给斯塔姆博洛夫掌管。接着，俄国人便与这个他们刚刚几年前煞费苦心建立起

来的公国断绝外交关系。1887年7月，议会终于将保加利亚的宝座献给弗兰西斯·约瑟夫军队里的一个军官萨克西·科堡的斐迪南大公。当时看来他充当这个合并了的保加利亚的统治者不大可能超过几个月；他是罗马天主教徒；他面临着不可缓和的俄国的敌意，而他所来到的这个国家缺乏稳定的体制。但他竟能高踞宝座直到1918年11月，而且活着看到他的王朝一直存在到1946年（此时，俄国解放者们第二次从北方一拥而至），这如果不足以表明他的政治道德，至少也说明他是多么精明强干。

索非亚的这些事件，虽然在八十年后的今天回顾起来仿佛是理想王国舞台上的一出旧式滑稽戏，却构成东南欧历史上的一道分水岭。诚然没有什么能够破坏巴尔干各族人民对于“俄罗斯母亲”的天然同情心，但同样难以怀疑的是1885至1887年的危机也标志着他们已从对泛斯拉夫神话的盲目忠诚中解放了出来。这是一个新建立的国家第一次坚持主张独立必须意味着有充分实行本民族政策的自由。列强的政治家们开始修正他们的观点：在圣彼得堡看来似乎只有军事占领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及达达尼尔海峡才能取得对黑海的控制权；反之，在伦敦，人们也不再以支持土耳其这座腐朽的大厦为拒俄国于地中海之外的手段。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实业界人士的态度同样发生了变化：新的国家便是新的主顾；过去那么频频充当入侵途径的多瑙河此时已为商业竞争而开放。倘若东南欧得享两个世代的和平，这既是靠政治家的智慧，也同样是工业家和制造商的成就。但民族主义的分裂性并不减于1848年，而被剥削者与其经济上的主子之间的新的冲突又已在表面的平静之下开始展开，这些国度获得一种持久安排的前景仍一如既往，可望而不可及。

第五章 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

91

19 世纪的欧洲民族主义总是戴着两副面孔：一面是群众起义，力求爱国愿望能得到普遍承认；另一面则是内心以某些美德的化身自居，似乎是要把一种传统的继承者同他们不甚幸运的邻居们截然分开。有时，这两副面孔在自我表现民族精神的同一行动中合而为一，科苏特那种两副面孔的门神式的爱国主义即其一例。回顾起来，这两面之间的差别却更通常表现在不同世代的人们之间，19 世纪 80 年代与 90 年代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辈与祖辈就是这样分开来的。看来，这种新的咄咄逼人的排他性往往是偏见教育和社会怨恨的产物。对人类进步的信心日见其大，与此同时，人类的同情心却日见其小。当代欧洲的巨大悲剧或许种因于此。

在西方，这现象有两种表现方式：人民大众心甘情愿地背上帝国义务的十字架；并相信国家行动不受道德和正义的约束是完全正当的。因而英国有罗兹和米尔纳，法国则有巴雷斯和莫拉斯。但在中欧和东欧，相似的心理状态却产生了不同的思想意识。在那里，久经公认的各个民族以纪律和一致性为根据要求人们忠诚，于是沿着沙皇帝国的西部边界，“俄罗斯化”成为贯彻国家政策的精选工具；而在大陆的心脏，“泛德意志主义”的新概念对哈布斯堡统治的整个性质提出了挑战。后来，对多样化的鄙视也在新近被承认的民族中传播开来，使犹太人和外邦人之间，天主教徒和正教徒之间，甚至宗主教教区和督主教教区之间树起了一道道人与人互不理解的玻璃屏幕。政治野心的热门术语是个“大”字——蛊惑民心的政客在林茨和维也纳谈论“大德意志”，在布加勒斯特谈论

“大罗马尼亚”，在贝尔格莱德谈论“大塞尔维亚”。在新世纪里，人类必将自食这些愚蠢提法的恶果，因为这正是阿道夫·希特勒在1889年、扬·安东内斯库在1882年、加夫里洛·普林西普在1894年出生的这种环境。

92 富于侵略性的民族主义首先力图制服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的地区是波兰。19世纪70年代，对古老的“会议王国”的波兰人施行了一项故意制定的政策，其目的在于使他们效忠沙俄，思想上也变成俄国人，到80年代，这种情况变本加厉。与此同时，他们在普鲁士诸行省的同胞首先是由于宗教问题而与俾斯麦冲突——因为那些年是德国政教斗争即所谓文化斗争的年代；随后就政府资助德国人购买波兰人庄园——这是容克地主向东殖民的过程——的问题发生冲突。在普属波兰和俄属波兰都为教育发生了冲突。1874年5月，臭名昭著的普鲁士教育大臣法尔克坚决主张在正常情况下应以德语为传授知识的工具，虽然规章里有一个奇怪的例外条款，允许“如果不懂其他语言的话”，可以使用波兰语。1885年，华沙政府颁布一项法令，硬性规定除天主教的教义讲授课及作为外语的波兰语课程外，小学全部教学必须用俄语。

天主教会的僧侣统治集团一贯捍卫波兰传统，它对这两个政府来说都是个问题：普鲁士人把波兰主教都换成德国人；俄国人则半心半意地派出了文化传教士，徒然指望至少能在农民中争取若干人皈依东正教。俄国人在波兰人和其他种族集团间挑拨离间的阴险政策所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煽动波兰人仇恨犹太商人和实业家，以及为波兰人对维尔纳附近的立陶宛人和东南的乌克兰人所怀的传统优越感推波助澜，这是很容易的。但在出版和集会权方面的限制对各个民族都同样严厉。在这方面，奥地利的加利西亚虽然经济上比另外两个地区更加落后，看来却是自由主义的避难所，而也只是在那里，特属波兰的政党能继续蓬勃发展。

1831年和1863年会议波兰的悲剧以及加利西亚1846年的悲剧，使波兰爱国者新学到了一种小心谨慎，也就是对可能做到的事情的一种现实主义的估计，这与昔日造反时的浪漫主义恰成对照。结果，出现了把“三忠于”学说作为一个政治纲领来接受的某些倾向，这个学说最先是19世纪60年代克拉科夫和利沃夫比较保守的地主提倡的。“三忠于”的意思是对统治波兰的三帝国中每一个都要顺从，这不是背叛民族事业，而是相信波兰人对于社会生活所作的贡献要比他们的外国主子所能提供的大得多，以至于他们终将同化其压迫者。这一论点在俄属波兰是很有意义的；在那里，工业化迅速开展，保证任何有才智的波兰人都能获得负责的职位，而那些才智较次的人也能得到稳定的工作。在加利西亚这甚至更有意义，因为当地的波兰人有在奥地利帝国政府和行政机构中任职的机会，而俄国人却坚决禁止波兰人占据官职。但在普属波兰这却毫无意义，当地德国人优越的技术知识和行政效率肯定使波兰人被看作只配充当天然的耕夫或者命定的工厂劳动力。

够奇怪的是，“三忠于”被两个截然不同的革命领导人作为政治战略加以接受，一是1897年创建国民民主党的罗曼·德莫夫斯基力主与俄国修好，以此作为促进波兰人民政治教育的办法；一是杰出的波兰马克思主义者罗莎·卢森堡也恰恰在这同一时候论证：波兰工人唯有通过与德国、奥匈帝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者合作才能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因为这些国家中的每一国都拥有平衡的工业经济和地域广大的市场。波兰服膺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中，只有一小部分准备接受罗莎·卢森堡的精微的逻辑。大部分社会主义者都把波兰独立作为社会民主的前提，民族主义的这一翼由约瑟夫·毕苏茨基领导，他在哈尔科夫大学求学时就曾因从事颠覆性的煽动而于1887年被捕，流放西伯利亚五年。他对任何俄国事物怀有不能调和的敌意，以致他主张与奥地利合作，这一

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八年中为人们广泛接受。

对于“三忠于”的政策，华沙的俄国当局先是困惑不解，后来便深感放心。这被看作是俄罗斯化产生效力的证据，在尼古拉二世1894年继承他父亲为沙皇后，这种思想认识没有减弱而是强化了。波兰人不可避免地参加了1905年的革命鼓动；6月，在纺织业中心罗兹出现了一星期的骚动。饶有意义的是，波兰工人的行动是席卷俄国欧洲部分的总罢工洪流的一部分，他们的游行示威几乎丝毫不带特有的民族主义色彩。有两年时间，俄罗斯化的政策略微放松，波兰人被允许开办私立学校，全部教学都用波兰语进行。但在1907年底，就连这一点让步也收回了，在斯托雷平的统治下，波兰人再次奉命把自己变为奉公守法的俄罗斯公民。到1914年，情况就清楚了，在沙皇制度下根本得不到任何有持久价值的东西，人们不再认为“三忠于”是和解的姿态，而是投降的象征。

在普属波兰，1890年俾斯麦的垮台先是缓和了对非德意志居民的束缚，但在皮洛夫当政时，情况又变得和从前一样令人难以忍受。随着本世纪的开始，东方马尔克党——一个旨在使德意志人在普鲁士“东方边疆地区”的社会和经济生活中取得全面优势的组织——促使通过了若干扰民的规定，不仅在学校，在任何公众会议也都禁止使用波兰语。一些波兰学校的儿童因此罢课，并受到了野蛮的纪律惩罚，特别是在1906年。这些孩子在如此年幼时便以如此生动的方式开始见到了民族冲突；这即使不能成为一种借口，至少也有助于说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一代孩子长大成人时何以那么痛恨德国人。

西斯勒萨尼亚——二元君主国非匈牙利部分的名称——的泛德意志主义的起源和特色与普鲁士波兰所推行的强化的德意志化都不相同。它先是由乔治·冯·商涅列尔提出的，他父亲是维也

纳的铁路大王，给他留下一笔相当大的财产供他从事政治冒险。商涅列尔早在 1873 年就以林茨附近的边区——希特勒的双亲不久即去定居之处——代表身份被选入奥地利议会，但一直到 1882 年才作为泛德意志政策宣言（即所谓的“林茨纲领”）的主要起草人而成为知名之士。商涅列尔希望哈布斯堡帝国的所有曾包括在旧德意志联邦内的地区与柏林的霍亨索伦君主统治下的新德意志帝国联合起来。南方的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和斯洛文尼亚地区从而全面受制于德国，把它们的斯拉夫居民降到二等公民的地位，就像普鲁士国境（而且当然在会议王国里）内的波兰人一样。西斯勒萨尼亚的其他部分则不妨并入匈牙利王国，这就规定附带将九百万斯拉夫人交由马扎尔人统治。为了实现林茨纲领，商涅列尔创建一个专属泛德意志主义的政党——德意志全国同盟，这个组织决心从“东方公地”清除掉犹太种族的污秽、哈布斯堡家族的令人不堪的奸诈以及大企业的恣意自私。为了捍卫德意志人的利益，建立了一个“保卫联盟”网，特别是在捷克土地上：1880 年建立了“德意志学校联盟”，1884 年建立了“波希米亚森林联盟”和“北摩拉维亚联盟”，1889 年（为斯洛文尼亚地区）建立了“南方公地”。到 19 世纪末，奥地利帝国已建立了一千多个地方协会，致力于捍卫德意志民族感情的纯洁性；直到 1945 年第三帝国垮台时，它们的学说和影响一直是中欧政治中的一股力量。

俾斯麦当政期间，商涅列尔及其支持者没有从德国内部得到 95 任何鼓励。俾斯麦外交政策的基石是他在 1879 年结成的联盟，他当然不愿卵翼这样的狂热捣乱分子来使他的伙伴难堪。但威廉统治下的德国就毫无这种顾忌了。1894 年在柏林成立了一个泛德意志联盟。它得到德国国会中有影响的议员的支持并与势力极大的海军联盟联系起来。它对于干涉奥地利内政似乎从不踌躇，这既使弗兰西斯·约瑟夫也使其继承人弗兰西斯·斐迪南感到恼火。

从1879年到1893年，奥地利首相是皇帝孩提时代的朋友爱德华·塔菲伯爵。他的政府是个联合政府，以“铁环”见称，对帝国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并非不同情。塔菲不让任何一个民族处于支配地位，他有一次宣布：“在奥地利，不许排挤任何人。”一上任，他就成功地说服了当选的捷克议员前来维也纳并最后参加议会的工作。“铁环”从三个方面表示了对捷克人的善意：发布了一系列有关语言的法令，允许在波希米亚的行政事务和诉讼中既可使用德语也可使用捷克语；修改了波希米亚议会选举中对公民权（允指选举权）的要求，从而给予捷克选民更大的控制权；最重要的是，1882年批准布拉格大学分为两个单独的学府，一个用德语，另一个用捷克语。捷克语大学不可避免地成了帝国内除波兰人外（他们在学术上的需要已在克拉科夫得到满足）所有斯拉夫人的智识源泉。而有托马什·马萨利克任哲学教授，则保证这所大学在精神上虽可能是捷克式的，学术上却决不会是狭隘的沙文主义。对于被憎恨的捷克人的这些让步正发生在斯拉夫人的出生率大大高于德国人的时刻，使商涅列尔及其性情暴躁的追随者怒不可遏。

上个世纪的最后十年中，捷克人与德意志人之间的关系一年坏似一年，其过失并不全在商涅列尔。在波希米亚，对工业社会的步速和竞争十分敏感的新一代已对自从帕拉茨基时代以来的列盖尔及其他老手们政治上的保守性失去了耐心。一个激进的和富于战斗性的“青年捷克人”党逐渐取代了列盖尔的“老年捷克人”党。1890年，列盖尔和塔菲就教育和立法达成一个复杂的妥协办法，“青年捷克人”党拒不接受这计划，进而在1891年的选举中赢得明显的胜利。“青年捷克人”党以同样手段回答了商涅列尔的挑衅。布拉格骚动频仍，似已濒于内战，特别是在一项似乎答应了捷克人的大部分要求的语言法令（1897年颁布，旋于1899年匆匆收回）颁布之后，情形尤其如此。泛德意志主义的煽动者们给这些示威游行

带来了奇怪的色调，邪恶的反犹太主义开始露头，新教徒由于据说天主教会反对泛德意志主义，他们便愤怒地喊出“滚出罗马”，这在胡斯的国度里真是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事态。暴力绝不只限于波希米亚。甚至在维也纳，议员们的举止也是对议会规章的嘲弄：他们在议会大厅里四处乱抛墨水瓶，仿佛一群闹翻了天的学童，争吵、叫喊和唱歌声交织在一起，以致议会不得不经常休会。弗兰西斯·约瑟夫 1900 年对某一捷克议员抱怨说：“我们已经成了全世界的笑柄。”

这种近于无政府的状态对奥匈帝国的整个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只要塔菲当政，弗兰西斯·约瑟夫就几乎不认识自己究竟在干什么，而被迫到似乎是各民族间一名不偏不倚的裁判员。“铁环”的十四年统治提高了王朝和议会的威望。但在塔菲 1893 年倒台后，后继的一连串奥地利首相仿佛是一班幽灵，这些人来去匆匆，其轻松愉快的神态几乎不亚于法国人。七年中换了八个政府首脑，他们除了响亮的姓氏、头衔而外，一无所长。行政是靠使用宪法的第 14 章来进行下去的，这就是规定在紧急情况下由皇帝直接以诏令进行统治。在新世纪的头几年里，政治方面略有改善；稍后，在 1907 年采取了一项广泛的改革措施，其中包括对议会的选举实行普选（虽然对地方议会和地方政府选举并不如此），这就作了实行民主的诺言；可是，不久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再次竞相采取故意妨碍议案通过的战术，致使整个西斯勒萨尼亚政治管理陷于瘫痪。

1908 年弗兰西斯·约瑟夫在庆祝登基六十周年时，已对议会、特别是对各民族集团不断的争吵深感失望。泛德意志主义分子继续指望柏林当救星；“青年捷克人”党则改由卡列尔·克拉玛什领导（因为马萨利克曾谴责他们好斗），以俄国为新的靠山；他们威胁说如果奥匈与法俄联盟交战，斯拉夫各族人民便将起义。只剩

下三个政党是准备支持二元君主国的领土结构的，而其中又只有一个政党拥护现行制度。这个党可以说是“政府党”，它是由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在精神上是教权主义、反犹太人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为维也纳市议长中最受尊敬的卡尔·吕格所控制，并得到皇储弗兰西斯·斐迪南的支持。而他们的死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帝国是个自然的经济单位，如能变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且从中产阶级为了民族权利而进行的不相干的争斗中解脱出来，那倒是有意義的。最后，还有马萨利克所领导的捷克“现实主义者”。他们认为，尽管现行的制度有缺点，为了在霍亨索伦家族和罗曼诺夫家族之间保持平衡，一个真正的联邦式的奥地利帝国确为欧洲所必需。弗兰西斯·约瑟夫对这些政党中哪一个也看不上。这位皇帝在他统治的后期无可避免地本性毕露，他越来越倚重的是皇帝任命的官员，而不是议会领导人。正如在青年时代一样，他听信军官团以及它在总参谋部的代言人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从奥匈帝国匈牙利部分的大臣们那里也不可能得到任何比较明智的忠告。

根据 1867 年的宪法，马扎尔人统治的精神实质是由一个家族来决定的。从 1875 年至 1890 年，蒂萨·卡尔曼作为首相控制着这个王国，甚至卸任后他仍继续发挥比其他任何政治家都大的影响。他 1902 年逝世后，他的儿子伊什特万袭其余荫，仍有声名。他虽然领导政府的时间比父亲短——总共不到六年，却也在自己的政治生涯中使这个二元制的功过成为他的化身。

蒂萨一家并非贵族，而是个马扎尔绅士家庭，是德布勒森附近乡间一处小庄园的主人。他们是严格而简朴的加尔文派教徒，他们的信仰使他们强烈地确信自己的使命是正义的。蒂萨·卡尔曼创建和领导了匈牙利自由党，这个组织决心维护“奥匈协议”和财

政改革。毫无疑问，匈牙利王国的物质繁荣在他的领导下显著提高；预算达到平衡；工业得以促进，这不仅是在布达佩斯而且在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这样一些非马扎尔地区亦复如此。铁路网宣告完成，主要干线都由国家直接或间接控制；通过匈牙利的唯一海港阜姆的贸易值，十五年内增长到十二倍，甚至开辟了横越大西洋直达纽约的航线，有船只定期来往；在多瑙河上匈牙利人获得了一个商业交通的潜在据点，尤其是在布达佩斯政府承担修通航运运河以避免铁门的急湍之后。

蒂萨自己是最高的全国推销员。1873年5月，维也纳人曾举办一个雄心勃勃的国际博览会，显示哈布斯堡帝国的新财富。但是，出于他们那种特有的惹人喜爱的错误估计，博览会竟选择在他们的城市乃至整个中欧都遭受到空前的经济萧条打击的月份里举行。但是，十二年后，蒂萨再在布达佩斯举办工业博览会时，陈列室中已看不到任何灾难的影子。布达佩斯在欧洲的商业地图上据有了牢靠的地位，就像1851年的伦敦和1855年的巴黎一模一样。农业国匈牙利那种以吉卜赛音乐和五彩缤纷的服装为其特色的古老而浪漫的形象，已被那脉搏有节奏跳动着的国家机器推入了衬景。

蒂萨虽然在议会里不断遭到沙文主义贵族和拒不合作的科苏特分子的攻击，他自己却确信马扎尔文明的优越性，决心使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总处于被奴役的地位。他从执政的最初几个月起，就公然置1868年民族法的原则于不顾，强烈地推行马扎尔化，就像在会议波兰推行俄罗斯化一样，而且常常使用同样的一些武器：即所有的国立学校必须用马扎尔语授课；内匈牙利的全部铁路工人和邮政雇员均须讲马扎尔语，而不讲德语或任一从属民族的语言（虽然在克罗地亚是到1906年以后才实行的）。文化团体用公共资金在斯洛伐克和特兰西瓦尼亚这些“杂居”地区宣传匈牙

利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所有的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社会团体均被查封。布达佩斯议会里的非匈牙利议员提出抗议，但像蒂萨那样一个信念狭隘的人却充耳不闻。当一个“普雷恰尼”塞尔维亚议员质问政府何以没收从斯洛伐克民族征集来的决定用于文化目的的基金时，蒂萨回答道：“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洛伐克民族”。特兰西瓦尼亚其一议员质问蒂萨为什么对非马扎尔人不教授他们的民族史而只教授匈牙利民族史时，对方无动于衷地告诉他，对那些居住在匈牙利而非马扎尔的人来说，不可能存在什么“民族”史。

但蒂萨至少还(在1881年)允许成立了一个罗马尼亚民族党。他的继承者们都更不容人。罗马尼亚领导人企图向弗兰西斯·约瑟夫递交一份民族苦难陈情表，竟遭贬斥，仿佛犯了叛国罪似的；1894年5月，他们以“煽动反对马扎尔民族”的罪名被捕，在科洛兹瓦尔(克鲁日)交付一个全由匈牙利人组成的陪审团审判，然后投入监狱。罗马尼亚民族党于是按匈牙利内政大臣的命令被解散的，但又在1906年初获准重建；后来，科洛兹瓦尔审判的受害者在他们的同胞以及欧洲的自由主义人士中作为争取民族权利的殉难者享有特殊的地位。

■9 与斯洛伐克人和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相比，克罗地亚与政府之间的宪法关系当然不同。在实施“纳果达”协议的头五年中，萨格勒布时常发生骚动，驻扎于古老的边屯区的克罗地亚部队1871年10月哗变。1873年，作为一种表示安抚的姿态，匈牙利政府同意任命一个克罗地亚人为巴昂，这就是杰出学者和诗人伊万·马朱兰尼奇。他任职期间，没有强迫推行马扎尔化。但是部分由于下级官员处置失当，部分由于沉重的赋税和不公的选举使人民普遍不满，1883年在萨格勒布爆发一场骚动。因为害怕让克罗地亚人给其他民族做了榜样，蒂萨以惯常的坚决手段采取下列对策：派军队上街弹压；暂停实施宪法；任命他的亲戚库恩-海代尔沃

里·卡尔伯爵取代马朱兰尼奇充当巴昂，此人是一位在克罗地亚拥有大庄园的匈牙利大阔佬。

二十年中，库恩-海代尔沃里凭借铁的意志以及对其居民的力量和弱点的精明估计治理着克罗地亚。像蒂萨在内匈牙利一样，他使克罗地亚的物质财富得以增长：农业获得可观的年产量，他还能毫不夸张地宣称，他已为克罗地亚提供了较多的学校，较好的公路和有效率的铁路（当然必须假定旅客能够看懂马扎尔文的招牌，并能从马扎尔文的行车时刻表上找到他的路线）。但是，无论是文学还是艺术方面的任何爱国活动都像新闻事业一样严遭钳制，尽管德高望重但已年迈的主教斯特罗斯迈尔极力反对。但是，库恩-海代尔沃里真正的力量在于巧妙地鼓动受鄙夷的塞尔维亚少数民族反对歧视他们的克罗地亚人：他对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作出让步；以塞尔维亚人而不以克罗地亚人填补低级行政职务的缺额；最富于爆炸性的题目却是他甚至让塞尔维亚人在教育政策上有一定的独立性。于是引导克罗地亚人把民族敌意的矛头大都对准塞尔维亚人而不是对准他们的匈牙利主子，这是扼杀新生的南斯拉夫运动的一种有效方法。1895年，当弗兰西斯·约瑟夫正式访问萨格勒布时，克罗地亚学生抄了一些塞尔维亚人的家，褻渎了一所东正教教堂，在采取下一个同样惬意的行动——撕毁匈牙利的红白绿三色旗之前，他们还烧毁了一面塞尔维亚旗。库恩-海代尔沃里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恶意播下的种子长成了仇恨的庄稼，收获者却将是两次大战之间的南斯拉夫王国。

但总的说来，克罗地亚人仍然忠于哈布斯堡王朝，他们像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一样地相信维也纳最后总会设法补救。直到太子鲁道夫1889年惨死于梅厄林之前，他们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他那无所不容的充满理智的同情心大布口袋既装下了马扎尔人也装下了克罗地亚人。他去世后，克罗地亚人转而指望弗兰西

160

斯·斐迪南大公，他毫不隐瞒他对匈牙利的一切都满怀敌意，人们说他在感情上似乎是个联邦主义者。

政治上，“沙布尔”中的克罗地亚议员大都属于一个名叫“极右党”的组织，从1897年起，它由约瑟夫·弗兰克领导，常被干脆称为“弗兰克主义者”。“极右党”狂热反对塞尔维亚，炫耀它对哈布斯堡王朝的忠诚；它力谋有一个重新组织起来的君主国，其中凡属帝国境内的南斯拉夫地区（包括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阜姆）都将与匈牙利和奥地利处于平等地位；但是——这就不符合斯特罗斯迈尔的理想——它强烈反对使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形成南部斯拉夫兄弟情谊般关系的任何建议，尽管它声称某些塞尔维亚人占压倒多数的地区也是“大克罗地亚”的组成部分。在农村地区，约瑟夫·拉迪奇和斯捷潘·拉迪奇兄弟于1902年创建克罗地亚农民党。在这以前，农村地区政治觉悟的提高较慢。农民党是特为保障农业无产者的利益而建立的，既反映农业无产者对城市里矫饰而不自然的生活的怀疑，又反映它那狭隘而迷信的天主教教义。拉迪奇两兄弟也期望维持哈布斯堡国家。作为虔诚的天主教徒，他们对于向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所作的任何让步都深表痛惜——在1895年的骚动之后，斯捷潘·拉迪奇曾被放逐出萨格勒布——但他俩也都同样反对马扎尔人称王称霸，并提出一些含糊不清的计划，建议将帝国分成五个自治王国，每个王国都向同一个哈布斯堡君主宣誓效忠。

库恩-海代尔沃里终于在1903年离开萨格勒布前往布达佩斯政府任职时，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开始缓和。这两个民族集团之所以能够和解，只是由于两个南斯拉夫理想的坚定信仰者的主动努力。这两人原都出身于奥地利管辖下的达尔马提亚：弗兰诺·苏皮洛是杜布罗夫尼克一个石匠的儿子，他后来定居阜姆，编辑这个港口的克罗地亚文报纸；安特·特鲁姆比奇

则是斯普利特市市长。1905年10月，苏皮洛在阜姆主持一次会议，会上四十位克罗地亚代表通过一项决议，企图在哈布斯堡君主国境内恢复古老的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和斯拉沃尼亚王国。几星期后，他劝使一个在扎达尔（当时称扎拉）开会的塞尔维亚代表团接受阜姆决议，并发表一庄严宣言：“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在血统和语言上同属一民族。”这个历史性事件使得布达佩斯议会以及萨格勒布“沙布尔”的代表得以组成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联合。到1908年，这联合的政治影响已经很大，以致它在“沙布尔”选举中赢得明显的多数，尽管选举法本身是不公平的。这时，匈牙利政府犯了一个错误，即在萨格勒布举行一次审判，其性质与十二年前科洛兹瓦尔的丑恶行径相似：把三十多名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支持者关入监狱，罪名是据说他们与独立的塞尔维亚当局发生联系图谋叛国——因为他们竟敢用西里尔文写信评论塞尔维亚人享有的较大的民主自由。这次审判成了欧洲轰动一时的著名案件，它还产生了一个偶然的后果：把马萨利克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联在一起来共同维护斯拉夫人的自由。了解君主国内存在一个色彩鲜明的南斯拉夫集团的这一消息，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带来重大后果，尽管西方观察家们低估了弗兰克主义者和克罗地亚农民党的追随者的力量。不管是在国境内外，克罗地亚人心底里继续怀疑塞尔维亚人，很少有人真正信仰苏皮洛或者特鲁姆比奇的根本上属于南斯拉夫倾向的理想，而对于伟大的达尔马提亚雕刻家伊凡·梅什特罗维奇有关南斯拉夫的理想——他的作品在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曾誉满欧洲——他们也持同样的态度。 101

与此同时，匈牙利的蒂萨·伊什特万在对待鲁莽的马扎尔沙文主义者方面遇到的困难比他父亲所曾经历过的更大。这个所谓的“民族反对派”是从要求修改二元君主国两部分之间的商业协定以使匈牙利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而开始出现的，它进而为匈牙利的工

业寻求保护关税，并要求在布达佩斯成立一个独立的发行货币的银行。但重要的分歧则涉及奥匈帝国的军队；蒂萨清楚地知道，弗兰西斯·约瑟夫认为军队制度实际上属于皇帝的特权，不容政治家干预。自从1903年以来，民族反对派要求在特属匈牙利（和克罗地亚）的军团中，应以马扎尔语代替德语为发布命令的语言；为了对付这一威胁，弗兰西斯·约瑟夫宣布，他将对布达佩斯议会的选举实行普选。这是明显的政治讹诈，可是成功了。马扎尔的寡头政治的执政者们不愿让自己的特权地位遭到群众呼声的挑战。民族反对派放弃了他们关于在军队里使用马扎尔语的要求；有关普选的建议仍然仅仅是历史的古玩。蒂萨派稳坐马背，牢牢紧握权力的缰绳直到甚至超过1916年弗兰西斯·约瑟夫逝世之日。

捷克人和德国人之间的摩擦既已威胁到奥地利国家的政治稳定，马扎尔人悻悻然认为“奥匈协议”骗取了他们的充分权利，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眼见君王对他们倾诉的疾苦充耳不闻，自然毫无公道可言，因而殊感失望，在和平时期的最后几年中，看来哈布斯堡国家从未像此时这样更符合它那讽刺性的尊号：“摇摇欲坠的帝国。”维也纳的外国观察家们开始相信，这个君主国将与其君主同归于尽；对弗兰西斯·斐迪南从他那贝尔维德雷宫的影子朝廷发出来的古怪的治标剂抱有信心的寥寥无几。也许，局外人易于按怨声的高低来衡量政治领导人影响的大小，而低估农村地区地主与农民两方面基本保守的忠君思想。也许，国内外批评这一制度的人们也未能正确评价这个统一的多瑙河国家对其各族人民所给予的经济利益。但尽管如此，二元君主国却与哈布斯堡宫殿中愚弄人的繁文缛节一样，在当时看来根本是个时代错误；它是个超国家的结构，却处于排外的民族主义时代；它为欧洲所必需，却与欧洲的感情相抵触。虽然它的每个关节都在吱嘎作响，却仍然算个强国，通过条约与强大的德意志帝国结成一气；但由于地理和历史

上的关系密切，它必然对巴尔干政治的每一次极细微的震动都作出反应，这一事实绝非奥匈帝国种种不幸中之最小者。

第六章 走向萨拉热窝

俾斯麦在柏林会议上以及在东方大危机解决之后的年代里，已经默认巴尔干诸国当然分属两大势力范围：即俄国将控制东巴尔干半岛诸国；奥匈帝国则将控制西巴尔干半岛诸国。以这一政策为基础，俾斯麦鼓励这两个帝国与德国一道参加19世纪80年代重新组成的三皇同盟。但在1890年俾斯麦垮台之前，保加利亚发生的种种事件就已证实这种设想毫无根据，而且在嗣后十年中，奥地利人比较俄国人所施加的影响的效率更高，地区更广。

由于贝尔格莱德是个边境城市，面向萨瓦河，可以目极匈牙利南部平原，奥地利人干涉塞尔维亚内部事务的机会就比干涉其他巴尔干国家的机会多些。米兰·奥布雷诺维奇为了换取国际上承认他自封为王的权利，于1881年与奥匈帝国订立一项影响深远的秘密条约。根据条约，塞尔维亚不得与其他外国缔结任何协定，同时保证不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或新帕扎尔州怂恿反奥地利活动。一些商务协定给予二元君主国很多经济特权，尤其是修筑铁路方面的特权，致使塞尔维亚在若干年中几乎成为哈布斯堡王朝殖民的属地。对于这种过分依赖奥匈帝国的作法，塞尔维亚商人和农民都强烈反对，东正教神职人员中也有怨愤情绪。尽管如此，这一政策仍在米兰的整个统治时期继续贯彻——他是在其私生活丑闻被公众传开时，才于1889年让位的——而且在他儿子亚历山大当政的头十年中也几乎毫无变化。

1883年，国王卡罗尔与奥匈帝国和德国缔结防御同盟（意大利于1888年加入该同盟），罗马尼亚人于是也进入了哈布斯堡王

朝的势力范围。这文件很可能是所有秘密条约中最秘密的，因为在布加勒斯特最初只有国王、首相(扬·布勒蒂亚努)和外交大臣知道。它主要是针对俄国，是在把萨拉比亚归还俄国后引起的忿恨情绪的产物。但卡罗尔似乎也希望通过改善同维也纳的关系，或许可以改善居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布科维纳的罗马尼亚人的社会地位，他的臣民对奥匈帝国统治下的这两个地区远比对割让给俄国的那片面积较小的地区更为关注。连一些政治领袖都一直未能普遍获悉的这项条约，根据法律直到1914年仍然有效；但到那时，科洛兹瓦尔审判以及马扎尔人类似的不公正行为，早已破坏了维也纳与布加勒斯特之间进行任何真正合作的前景。 104

奥地利与保加利亚之间的联系尤为脆弱，常常中断，直到索非亚的内阁再次更迭后才得以恢复，因为保加利亚人非常谨慎，不想同两个对立的强权集团中任何一方关系过于密切，免得毫无回旋的余地。斐迪南大公在索非亚掌权后，与奥地利宫廷和马扎尔贵族保持着联系。有一段时间，他似乎要强调他是西方人；他与纯粹哈布斯堡血统的意大利公主结了婚，他的儿子博里斯在1893年诞生时，他甚至让孩子受洗礼成为罗马天主教徒，这看来是强调新保加利亚脱离东正教而独立。但斐迪南在位的头七年中，保加利亚的真正主宰是首相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此人在治理国家方面使用高压手腕，像蒸汽压路机一样，对外来力量有敏锐的反应能力，使俄国接受不了，奥地利人对他产生反感，皇宫里的人惧怕他，只有一些从来同他不是政敌的保加利亚人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1894年1月，斐迪南感觉斯塔姆博洛夫已经树敌太多，便免了他的职。十八个月后，他惨遭谋杀，斐迪南看来对这一阴谋并非一无所知。他倒台以后，俄保关系开始有所改善：小博里斯年纪极幼时，又改宗皈依东正教；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承认斐迪南为保加利亚君主。此后十年，保加利亚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脱离奥斯曼

帝国，正式实现完全独立，因为这个公国在名义上仍以苏丹为宗主。亲俄的政府与亲奥的政府交替执政，外交的倾向性取决于这两个敌对帝国对君士坦丁堡政府的态度。奥地利终于胜过俄国一筹，达成了一笔较好的交易：斐迪南于1908年宣布保加利亚独立，给自己加上了国王的称号（即“全体保加利亚人的沙皇”），当时奥地利正需要保加利亚支持它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巴尔干半岛上，潜在的最危险问题是所谓“马其顿问题”，^①即试图为这个地区找到一项当地所有民族都能接受的永久性解决办法，因为这个地区没有明确的疆界，却拥有那些以其历史而令人激动的地名：科索沃、奥赫里德、斯科普里和萨洛尼卡。105 流产的圣斯特法诺条约把这一地区的大部分许给了“大保加利亚”，但柏林条约却把它仍留在奥斯曼帝国疆域以内。苏丹政府1878年应允进行的改革一直未曾兑现，于是巴尔干诸国不可避免地都谋求兼并马其顿的全部或一部分土地。这一地区的种族结构之复杂是人种学上的一场恶梦，而各种完全不可靠的统计数字则使本来就混乱的局面越发更乱。在1899年与1900年，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先后分别公布两份分析材料：二者均同意该地区有六个主要种族群；前者估计有二百零四万八千三百二十塞尔维亚人和五万七千六百保加利亚人；后者却只发现有七百塞尔维亚人，但是保加利亚人倒有一百一十八万四千零三十六人；相差的九十二万一千一百九十四人不知去向，他们似乎变成了“土耳其人”或“其他种族”。

1870年建立督主教区以后，保加利亚人占了对手们的上风。奥赫里德、斯科普里、比托利（莫纳斯提尔）、佛累斯以及斯特鲁米察的教区都由保加利亚的主教们主持；直到20世纪初，督主教区可能管辖了大约九百所学校，每一所学校都成为当地宣传“大保加

^① 20世纪初，保加利亚、希腊和塞尔维亚为争夺马其顿地区而引起的冲突，巴尔干战争（1912—1913）后，几国瓜分了该地区，另划出一部分为阿尔巴尼亚。——译者

利亚”思想的机构。尽管土耳其人直到1902年才允许塞尔维亚东正教会为该地区委派一位主教，塞尔维亚人此时也已控制了一百多所学校。在萨洛尼卡港周围和爱琴海沿岸，希腊人比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领先。甚至罗马尼亚人也在比托利设有一所学校，因为那里有种族血统与瓦拉几亚居民相似的大约十万“弗拉几人”，作为历史发展中一种极为罕见的持续现象，他们沿着厄格那夏这条罗马古道与世隔绝的一段地带居住着。在瓜分马其顿的竞争中，罗马尼亚人从未成为一名认真的参赛者，但是他们对那些主要的竞争者却具有某种干扰作用。

土耳其在马其顿的统治之暴虐无道与它在1875至1876年起义前的保加利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统治一模一样。马其顿的非土耳其人本身由于为多年来的暴政所激怒，也已开始要求自治。1893年，比托利与奥赫里德之间的地区成立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IMRO)，其目的是不分民族，将土耳其统治下的欧洲地区各族人民团结起来一致反抗奥斯曼帝国政府。这一组织不久就扩及整个马其顿；它的声势在萨洛尼卡特别强大，而在巴尔干半岛所有的城市中萨洛尼卡是最有国际地位的大都市。但是，马其顿流亡者在保加利亚政府的秘密支持下，1896年在索非亚成立了“马其顿最高委员会”，因为保加利亚政府希望实现圣斯特法诺条约中规定的它所希望的疆界。最高委员会一派的人企图接管“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到1902年，他们开始向它的那些地区的特工人员提供武器。土耳其人发现了一个暗藏这类武器的地窖，于是突然发动一次新的残酷镇压和血腥屠杀。

土耳其人的暴行被揭露以后，欧洲又一次大为震惊，而一个身为女传教士的美利坚合众国公民，竟然被保加利亚的最高委员会一派的人绑架勒索赎金，因而激起美国公众的义愤。但这时国际形势与19世纪70年代已大不相同。无论奥匈帝国还是俄国，都

无意让东南欧发生一场严重危机；它们曾于1897年达成协议，“把巴尔干半岛问题暂时搁置起来”。1903年10月，弗朗西斯·约瑟夫和尼古拉二世以及他们的外交大臣在施蒂里亚的穆尔茨施特格会晤，制定了一套改革计划，预定由欧洲国家官员监督执行；经过他们的劝说，苏丹接受了这套计划。于是，奥地利和俄国各有文官一名参加土耳其行政机构，一支由五国警察组成的部队共同保护较大的城镇，并试图使该地区混乱的财政状况恢复正常。

不幸的是，这一国际合作的有趣试验未能使马其顿平定下来，因为土耳其人既不能又不愿采纳外国顾问们的建议，自相残杀的仇恨火焰也已无法扑灭。塞尔维亚的切特尼克^①进攻保加利亚的“科米塔吉”，^②反过来又遭到对方的仇杀。希腊的“安达提斯”^③出没于弗洛里纳与埃泽萨附近的山谷里，袭击阿尔巴尼亚人，摧毁农村中的土耳其清真寺和督主教区的学校。马其顿问题并未解决，只不过是暂时搁置罢了。战斗断断续续，直到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爆发时马其顿又一跃而成为世界各报的大字标题。即使在那时也未找到解决办法，IMRO这个不祥的首字母缩略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更加恶名远扬。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的社会与政治结构颇多相似之处：它们根本上都是农业国；仅有的一点工业均属外资所创办和拥有；都有议会制政府的传统，虽然由于公民权遭到损害，以致议会不如宪法制定者原来所构想的那样民主；这三国都有政党，而政党之间的分歧不在于其对内政，而在于其对外交方面的态度互不相同；而且它们由于一心要扩张版图，都建立了与其幅员及资源不

① 原文是 chetniks，反抗土耳其人的非正规部队。——译者

② 原文是 comitadji，土耳其文，意为保加利亚志愿人员。——译者

③ 原文是 andartes。——译者

甚相称的军队。随着这些总的特点又产生出其他一些特点。工业管理既然都操在外国人手中，社会上有雄心的人便都想方设法挤入政界弄个一官半职，更高一着的就是充当军官以满足自己的欲望，于是既定秩序产生了既得利益；又由于宪法原则从来不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政界领袖们便千方百计长期把持着官职，贪赃枉法，而他们各自所属的党派都变成了贪得无厌地攫取权力的饕餮集团。此外，由于政治家们在那些远离人间的地方，装腔作势地打发着日子，农民和工业劳动者就另往别处去寻找意识形态方面的鼓舞——首先是求教于“俄罗斯母亲”的富有反抗性的儿孙们。107

但三国之间仍各有重要的差别。例如，在保加利亚，农民占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左右，绝大部分靠耕种自有的小块农田生活；在索非亚政府1900年轻率地提出要对每一次收成征收什一税时，他们便由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领导组织农民党，甚至在巴尔干战争以前就表现出惊人的自信与力量。相形之下，在四分之三的人口是农民的罗马尼亚，农民问题更形尖锐，而农业无产阶级却比较缺乏组织。政府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帮助他们购买小块农田，而大庄园的所有权，几乎毫无例外地掌握在旧日的“博亚”^①阶级手里，他们大多数是住在外地的地主。粮食的年出口量在四十年间增长了五倍，但是农民仍然贫困不堪，而且在政治上无足轻重。1907年春天，农民的不满爆发为破坏性的热潮，像古代扎克雷^②起义一样；一场狂暴的农民起义席卷摩尔达维亚，扩展到瓦拉几亚。国防大臣阿维雷斯库将军派出部队进行三天镇压，有一万一千多农民惨遭屠杀。执政党——由扬·布勒蒂亚努的儿子扬诺尔领导的所谓“自由派”——应允进行土地改革，可是，直到罗马尼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这次土改还未完成。

① 博亚(boyar)为特权贵族。——译者

② 扎克雷起义(jacquerie)，中世纪法国最重要的农民起义。——译者

在三个国家中，人民的不满都曾多次表现为对商业阶层的仇视行动。罗马尼亚的商业和金融业几乎全部为犹太人所垄断，他们有二十五万人左右，是一个紧密团结、完全未被同化的整体。19世纪70年代初，在大多数犹太人定居的摩尔达维亚开始发生激烈的反犹示威，其原因与其说是受了种族主义的蒙骗，还不如说是出于嫉妒。此后三十年间，也不时地间或爆发此类事件，而且颇有几次引起列强的注意。如果说犹太人是罗马尼亚人由妒忌而产生的朴素的怨恨的最大受害者，他们还不是引起人民愤怒情绪的唯一根源；在布加勒斯特为了修建富丽堂皇的高楼大厦和宽阔的林荫大道，肆意挥霍大量金钱，激起了农村纳税人的不满。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也对城里人极不信任，前者经常成为高利贷者重利盘剥的受害者，后者则特别憎恶职业律师。战前塞尔维亚最强大的政党激进党，就是作为农民对市民的剥削的抗议而于19世纪70年代兴起的；但到上个世纪末，激进党自己却转而成为实业界利益的代表；于是形成了新的组合——农民党和持不同政见的青年激进党——来对抗“城里人”的勒索。在保加利亚，斯塔姆博利斯基和他的农民党致力于保卫受压迫的农民，他后来把索非亚描绘成“罪恶之乡，罪恶之城，它要有一天彻底毁灭的话，我是绝不会惋惜的”，这话表明了在上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交替之际早已遍布整个巴尔干的对城市社会腐朽影响的想法。

农民对组织起来的工人也同样疑虑重重。这三个国家里都有社会民主党，三个党都有马克思主义派别，但是既然还没有重要工业，它们也就没有多少群众。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创建于1893年，七年后，在意识形态的混乱中解体，可是到1910年，当石油工业的发展改变着国家面貌时，又重新组建。塞尔维亚社会民主党1903年才建立起来，这时，斯韦托扎尔·马尔科维奇的追随者宣传一种高度利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三十余年。斯韦托扎尔·

马尔科维奇是巴尔干各族人民在马克思的“第一国际”中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个深受俄国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者。他的学说给波斯尼亚的学生和他们在贝尔格莱德的同胞留下很深的印象；他与沙文主义激进党人一样公开宣称自己是维护泛塞尔维亚统一的斗士。最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组织很可能是在保加利亚，被圣彼得堡大学开除的马其顿农民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 1891 年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社会民主党。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到 1905 年已强大到足以发动一系列的罢工。二十三岁的青年印刷工人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在组织这些罢工中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巴尔干国家经济落后，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当然极其微小，但它与俄国的运动的紧密联系已经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保加利亚的罢工竟与俄国的革命骚动同时发生，这一点并非巧合。几乎好像是依照某种自然法则似的，在沙皇被推翻前十多年，就有了左翼泛斯拉夫主义。

在巴尔干每个国家，君主继续行使着巨大的权力。罗马尼亚的国王卡罗尔享有绝对否决权，可以随意任免大臣，或解散国会；至于他把同德国和奥匈帝国结盟的密约锁在夏宫中他本人的保险柜里，他认为毫无疑义是完全正当的。保加利亚的斐迪南大公同样专制，但其方式比较圆滑。在塞尔维亚，奥布雷诺维奇王朝越来越带有拜占庭后期统治者们一些不够令人尊敬的品质。国王米兰 1889 年逊位，宣布放弃其全部权力，退隐巴黎，每年向俄国领取二百万第纳尔的年金。但他在 1897 年又返回贝尔格莱德，住入王宫，他诱使他那继承了王位的儿子亚历山大任命他为陆军总司令。足足三年，塞尔维亚实际上有两个国王，这两个人都难以使人尊重：年仅四十五、六岁的米兰，神经过敏，放任骄纵；亚历山大则秉性软弱、过分固执，置父亲、激进党和参谋总部的反对于不顾，决计要和他的情妇德拉加·玛辛结婚。

亚历山大刚一宣布同德拉加结婚，大臣们全体递上辞呈。亚

亚历山大于是设法组成一个“国王之友”政府，即使如此，也找不到一位将军愿意接受令人垂涎的国防大臣的职务——国王如果能特别注意这个凶兆的话，情况就会好些。王国的威望越来越低：1900年，米兰终于离开贝尔格莱德出走维也纳（几个月后死在那里），继而亚历山大举行婚礼；1901年，新闻界开始公开攻击王朝；1902年，总参谋部人员开始抱怨政府欠发几个月的薪饷。结局自然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1903年5月，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的二十八名军官冲进王宫，向国王和王后开枪，分别打了三十发和十八发子弹，然后把两具一丝不挂的尸体抛在花园里。一些不得人心的大臣和德拉加的亲戚同时也被屠杀。

这次暗杀事件震动整个欧洲：英王爱德华七世撤消英国对塞尔维亚政府的承认，伦敦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外交关系中断三年之久；在圣彼得堡，俄国的外交大臣向奥匈帝国大使建议，奥地利不妨出兵占领贝尔格莱德，从而恢复那里的秩序。对于塞尔维亚来说，这次谋杀意味着奥布雷诺维奇王朝终于灭亡。激进党人邀请“黑色乔治”的孙子，年近七十岁的彼得·卡拉乔治维奇继承王位。这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彼得为人通权达变，坚决支持立宪政体。在1870年的战争中，他曾为法国作战，1876年援助过波斯尼亚的造反者。人们甚至说他拥护南部斯拉夫统一的理想；他乘火车从日内瓦赴贝尔格莱德途经维也纳时，大学里的南斯拉夫学生向他欢呼：“克罗地亚国王万岁！”

然而，彼得的地位却不值得称羨。激进党及其令人敬畏的老练领导人尼古拉·帕西奇在他的头上投下一片阴影；彼得也清楚地知道，军人一旦登上政治舞台，是很少甘心当配角的。幸好至少那几年，国王与帕西奇在政策上根本一致，军方阴谋家们都被周密审慎地逐渐遣离首都。外交方面，塞尔维亚向俄国格外大大靠拢，并设法改善与保加利亚的关系；甚至考虑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之

间正式实行关税同盟。但是南部斯拉夫关税同盟形成的可能性，以及用法国武器而不是用奥地利武器重新武装塞尔维亚军队的决定，都使奥地利人感到惊恐。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戈鲁考夫斯基不同意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谈判，并要求其全部军火都向奥匈君主国订购。在塞尔维亚拒绝了这一要求后，1906年奥地利便对所有过境的塞尔维亚牲畜征收抑制性的高额税。因为塞尔维亚出口商品百分之九十是运往或通过奥匈帝国的，又因猪（生猪或已屠宰的猪）是这贸易中最大的一项，看来塞尔维亚经济面临严重威胁。但是，塞尔维亚反而终于从“猪战”中得到好处：出口商品改道通过萨洛尼卡南运，而且还在西欧找到了新的市场。这场争端引起的不快使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之间尔后三十年的关系降到最低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弗兰西斯·约瑟夫宣布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了奥匈君主国。

自从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以来，奥匈政府当局大大地促进了这两个行省的物质繁荣。从1882年到1903年，两省由匈牙利权贵卡洛伊·本杰明治理，他写过一本塞尔维亚史（如今他却在被占领的这两省内查禁此书，认为它是鼓励泛塞尔维亚感情的潜在根源）。卡洛伊开始实施大力兴建公共工程的计划，给一些城市建立了有效的卫生设施，清除了比较偏僻地区的盗匪。但是卡洛伊及其继任者布里安男爵的基本政策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殖民；他们关于基督教教会事务、教育及勘测铁路路线的决定，无一不反映二元君主国的需要。两省的领土纳入了帝国的商业体制，而两省的居民被征召到奥匈帝国的部队里当兵。当地人得不到参加当地行政管理的机会，文职人员均由帝国边远地区调入两省落户，他们都是诚实可靠的天主教徒。在萨拉热窝办了一个酿酒厂，专门给他们供应优质的中欧啤酒；在附近山坡上的伊

利扎修建了一处矿泉疗养地——如果说波斯尼亚是哈布斯堡帝国的微型印度，伊利扎便是波斯尼亚的西姆拉^①。

111 尽管如此，奥地利人开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却有两个潜在的限制因素：一是在居民人数上占优势的塞尔维亚人的愤怒情绪会有导致恐怖主义行为的可能性；二是土耳其的力量一旦恢复便可能从根本上危及他们在萨拉热窝实行殖民的权利，因为从法律上讲，这两块领土仍属于奥斯曼帝国主权所有，不过在秩序尚未恢复之前暂时归奥地利占领。1908年，这两种危险看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于成为现实。贝尔格莱德发生的王朝更迭成了刺激波斯尼亚的泛塞尔维亚热情的因素，在学生中尤其如此；1908年7月，首先在萨洛尼卡、然后在君士坦丁堡爆发的“青年土耳其党”的革命预示着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一个改革时代即将来临。与这些事件发生的同时，维也纳的态度也在发生变化。弗兰西斯·约瑟夫开始越发听信两个热衷于在东南欧实行强有力政策借以恢复帝国日渐衰落的威望的人士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在1906年10月接替戈鲁考夫斯基任外交大臣的爱伦达尔；另一个是在同一年被任命为总参谋长的孔拉特·冯·赫曾道夫。后者认为君主国内的南斯拉夫问题，只能靠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及塞尔维亚王国来解决。皇帝不敢让孔拉特完全为所欲为，但是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消息促使他授权爱伦达尔宣布，将两省并入君主国，三十年来，这两省除名分以外一切早已属于哈布斯堡的了。

1908年10月6日，欧洲的总理大臣们正式得到通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并入奥地利；而作为补偿，奥地利卫戍部队将撤离新帕扎尔州。此后的六个月中，奥地利的这一行动似乎有导致战争的极大可能性。英国和法国对奥地利单方面撕毁柏林条约表示遗

① 西姆拉(Simla)是印度北部一市镇，为避暑胜地。——译者

憾，但是总的来说，它们对巴尔干事务不如对摩洛哥以及对它们与德国的关系日趋紧张那样关心。爱伦达尔突然独立地采取这种行动也使柏林气恼；可是德国又不能同这唯一坚定的盟国争吵；及至1909年初，德国总参谋部已能对孔拉特作出保证：如果圣彼得堡发布动员令，德国将给予他军事支持。造成危机气氛的是俄国的反应。沙皇的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那时正在试探列强的意见，希望修正《海峡条约》。因为根据该条约，俄国的战舰不得通过波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宣布兼并两省之前不过两星期，他曾在布希洛会晤爱伦达尔；他认为他们已经达成口头协议：两省将来的地位必须在国际会议全面讨论东方问题之后才能确定。因此，伊兹沃尔斯基感到受了爱伦达尔的欺骗——但必须说明，爱伦达尔关于布希洛会谈的报导与俄国方面的报导完全不符——在他此后任外交大臣的两年期间以及担任驻巴黎大使的六年中，这种当众受辱的感觉影响了他对国际问题的判断。沙皇和他的内阁总理斯托雷平把伊兹沃尔斯基看作闹剧里的笨汉，而且很乐意在这次危机中把他抛弃掉；却又不能摒弃他的政策，因为丧失的两个斯拉夫行省遭受哈布斯堡的统治，以致引起俄国舆论的强烈反应。俄国继续坚持召开国际会议，英法两国不大予以支持；但是，1909年3月柏林方面蛮横地坚持圣彼得堡必须正式承认这次的兼并，俄国人被迫就范。俄国之所以屈从于德国的要求，是因为她1905年败于日本，蒙受耻辱，同年又发生兵变，内外交困，实际上已经使它从大国的宝座上一落千丈。德国人虽在外交上赢得胜利，但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三个专制帝国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新的怨恨情调，一直持续到1914年三国之间爆发战争之时为止。 112

孔拉特和维也纳的军方人士对波斯尼亚危机的结果很不满意。他们企图对塞尔维亚进行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1909年2月他们几乎得手。但是，塞尔维亚人虽然进行了动员，他们却知

道，无论贝尔格莱德街道上公众的感情如何激愤，除非确实能得到俄国的支持，绝对不敢突然冒险与奥地利发生冲突。因此，俄国一旦屈从于德国的压力，塞尔维亚也只得承认两省的并吞。但内心里从来没有接受这一事实。在发生危机最初的日子里，一个名为“国防”的泛塞尔维亚组织已在贝尔格莱德建立起来，准备在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打游击战。甚至在紧张局势缓和之际，其支持者仍不顾维也纳的一再抗议继续图谋在两省起义。表面上，“国防”似乎真的改变了性质，从训练投掷炸弹、炸毁桥梁转而从事一些较为无害的活动；但历史上少有这样的“文化协会”，其内部的一些委员会中有很多渴望被提拔的青年军官。正如孔拉特所希望的那样，波斯尼亚危机远远不能解决南斯拉夫问题，而是使之更加尖锐。

从1911年到1914年，甚至在世界大战的头两年，塞尔维亚政府的权力不断受到一些秘密的军事社团的挑战，它们在仪式上是半共济会式的，其性质则属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1911年5月建立、以促进居住在奥地利和土耳其两帝国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及其在塞尔维亚本土的同胞们的团结为目的的“要么联合要么死亡”秘密组织，亦称黑手党。这一组织的首领是塞尔维亚军事情报部门的头子及弑君者德拉古廷·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别名为“阿皮斯”）。黑手党强迫其成员立下令人毛骨悚然、表示服从与匿名的誓言，它的行动十分阴险诡秘，直至战争爆发以后，国外对它的活动几乎一无所知，虽然奥地利军事情报部不久就注意到它的存在。

黑手党与帕西奇和米洛万诺维奇的激进党政府关系暧昧。双方都认为塞尔维亚应当成为“南部斯拉夫人的皮埃蒙特”，^①但他

^① 皮埃蒙特（Piedmont）在意大利西北部地区，是19世纪意大利复兴运动的策源地。——译者

们对意大利近代历史的解释却似乎并不一致。因为帕西奇争取的是“大塞尔维亚”(以东正教这一古老的宗教为分界线而与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分开),许多黑手党人却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南部斯拉夫国家,也就是一个“南斯拉夫”,它将不仅仅只包括塞尔维亚人在内,而是作为这个国家的解放者,塞尔维亚人应居于首要地位。因为黑手党人的这些目标比帕西奇和他的激进党人的目标较为广泛,他们得以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遍及全境的革命运动建立联系;可是,许多“青年波斯尼亚党人”的政治观点比阿皮斯及其军界同僚们更左一些。1910年,六十五岁的帕西奇第三次出任首相,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过于固执不化,不可能与“青年波斯尼亚党人”合作。他虽不信任黑手党,但只要该党受到朝廷的有力庇护,他就不敢把它搞掉。此外,帕西奇一方面害怕黑手党会在塞尔维亚尚未准备妥当时突然与奥匈帝国发生冲突,另一方面也准备和它协力对抗奥斯曼帝国,特别是如果有机会在马其顿进行扩张或者向前推进穿过阿尔巴尼亚得到一个直达亚得里亚海的出口的话。

1911年,这两种盘算都愈来愈近于实现。那年夏天,“病夫”^①看起来如此虚弱,令人不禁想要就此下手;土耳其军队在利比亚与意大利人进行一场糊里糊涂的殖民战争;君士坦丁堡的陆军司令部由于私仇和政治冲突而四分五裂。对于巴尔干各族人民来说,似乎从来还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好机会能够轻易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倘若他们能克服相互间的敌对情绪,斐迪南国王就没有不能为保加利亚争得爱琴海岸线的理由,塞尔维亚就没有不能解放科索沃并麾师向西进抵海边的理由,希腊的旗帜就没有不能飘扬在那宝贵战利品的萨洛尼卡上空的理由;甚至门的内哥罗国王尼

① 原文是 sick man, 指 19 世纪时的土耳其帝国。——译者

基塔也可以席卷阿尔巴尼亚的若干城镇。为马其顿问题求得解决办法的迫切需要又一次出现；于是，保加利亚外交大臣匆匆赶到贝尔格莱德去举行会谈。

1912年3月，塞尔维亚人与保加利亚人秘密达成协议：如果它们共同打败土耳其人，马其顿北部将归于塞尔维亚，而该省剩余的绝大部分则归于保加利亚。这远非一种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仍然存在“有争议的地区”，有待沙皇尼古拉二世仲裁——但也突出地证实了驻在贝尔格莱德和索非亚的俄国公使的手腕，他们不问圣彼得堡的外交大臣意见如何，独立采取行动，使这两国政府接近起来。当然，还有希腊问题，但是雅典的首相厄琉特里俄斯·维尼齐洛斯和帕西奇以及米洛万诺维奇同样愿意与保加利亚改善关系；5月，希腊人与保加利亚人缔结一项反土耳其的秘密条约，而同时，维尼齐洛斯与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也达成了口头协议（他们同时通过谈判订立了一项军事条约）。

于是，到1912年秋便出现了一个“巴尔干四国同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违反列强意愿而搞起来的，列强惟恐有人划一根火柴，点燃巴尔干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巴尔干同盟”的形成是夹缝中的国家演变过程中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展，事情还不在于它做了什么，而在于它是几个新兴国家的独立性已经增加的迹象。将1912至1913年的巴尔干危机强加于欧洲的竟是那些不过前三十年间才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一些民族。从许多方面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不祥之兆。

1912年10月第一星期末，“巴尔干同盟”成员相继对土耳其宣战。结果证明这是一场短暂的战役。土耳其人很快就在克尔克—基利斯和卢累-布尔加斯败于保加利亚人，在庫马诺沃和比托利败于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也未遇到多少抵抗：不到三星期便攻入萨洛尼卡，希腊军队从西面进入该城，比从北面进城的保加利亚

军队只早几小时。土耳其人固守古老的要塞阿德里安堡以及约阿尼纳的山地要塞，也在阿尔巴尼亚击退了门的内哥罗对斯库塔里的进攻；但土耳其的主力部队退到了屏护君士坦丁堡本身的恰塔耳贾防线；12月3日，土耳其指挥官们与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签订停战协定。

军事胜利带来了新问题，揭开了旧伤口。列强对巴尔干诸小国任意撕毁欧洲地图的做法大吃一惊：俄国不愿看到保加利亚人或希腊人在君士坦丁堡赢得胜利；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也不喜欢塞尔维亚在亚得里亚海岸获得立足之地。于是，在伦敦举行大使会议，设法划定新的边界，它的主要任务是创造一个独立的阿尔巴尼亚。与此同时，1913年1月底，土耳其政府发生更迭，使恩维尔手下更加好战的青年军官掌握了政权。由于担心土耳其人恢复敌对行动，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宣布废除停战协定，并于2月3日重开战端。在这次新的战役中，土耳其人情况仍然不妙。在5月30日第二次达成停战协议之前，他们失掉了约阿尼纳、阿德里安堡和斯库塔里。 115

即使以巴尔干的标准来衡量，第二次停战之后的三个月也是个不寻常的复杂时期。塞尔维亚发现伦敦会议强硬反对它获得通向亚得里亚海的出海口的要求，便对马其顿地区提出比它原先同保加利亚订立的条约中所规定的划归它的那部分领土（其中包括阿尔巴尼亚山以东的整个“有争议的地区”）更多的要求。保加利亚对于希腊人“抢走了”萨洛尼卡非常愤怒，因此，斯特鲁马河谷的希腊和保加利亚部队之间发生了零星战斗。保加利亚的态度致使希腊与塞尔维亚在第二次停战协定签字第二天便订了一项秘密军事协定；两国甚至主动向土耳其人作出姿态。这时，在早先几次战役中袖手旁观的罗马尼亚人开始要求保加利亚人让出南多布罗加作为他们将要在爱琴海岸得到的领土的补偿。

保加利亚人此时犯了灾难性的大错误。索非亚的公众情绪激动，一心向往军事胜利带来的实惠，并怀疑政府软弱，转而反对内阁。首都最高委员会里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一帮人威胁斐迪南国王，而保加利亚陆军总司令萨沃夫将军向他提出了实际上的最后通牒：只有重新在马其顿进军才能使保加利亚免于发生军事暴动。萨沃夫于是达到了目的。1913年6月3日，保加利亚对它以前的同盟国发动突然袭击。紧接着的两星期，保加利亚便蒙羞受辱。塞尔维亚人在马其顿获胜，希腊人横扫色雷斯，土耳其人乘机重新占领阿德里安堡，罗马尼亚人则渡过多瑙河，开始向索非亚进军。最后，8月在布加勒斯特签订和约。同他们付出的牺牲相比，条约给保加利亚人的报偿少得可怜：他们只得到了马其顿的一个山谷，色雷斯东部的一小部分和爱琴海上的一个二等港口杰贾加赫。给予罗马尼亚的南多布罗加抵消了这点微小的收获。相形之下，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都把领土扩大了一倍，希腊争得了色雷斯的西部，包括萨洛尼卡、南马其顿和伊皮鲁斯的大部。

布加勒斯特会议的解决办法使保加利亚陷入怨恨和沮丧之中，此后三年里，它的对外政策几乎疯狂地一反常态。早在1914年2月，保加利亚便试图同奥匈帝国和德国结成同盟，但德皇威廉二世本人并不信任斐迪南国王，而奥地利人则有意拖延观望。最终，对布加勒斯特条约的忿恨比任何别的争端都更有力地决定了保加利亚政治领导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对待敌对双方的态度。塞尔维亚人、希腊人和罗马尼亚人已继土耳其人之后成为保加利亚全国爱国者的仇恨对象。

塞尔维亚人对这一新的解决办法也不完全满意。虽然他们已把边界推到了奥赫里德湖与多伊兰湖边，从土耳其的统治与保加利亚的影响下解放了斯科普里和比托利，伦敦会议却没有给他们

入海通道。但是准许塞尔维亚与门的内哥罗(它当然占有亚得里亚海岸边的一狭长地带)瓜分新帕扎尔州。1913年和1914年两个王国曾两次企图合并起来,但均告流产;奥地利人坚决反对这一合并,甚至威胁说,必要时不惜诉诸战争。但总的来说,塞尔维亚人改善了他们的实际地位,提高了他们的威信,姑无论结果好坏,倒也确保了他们依旧是巴尔干诸国中的俄国的宠儿。

然而,巴尔干战争间接地使帕西奇与黑手党之间的矛盾达到了表面化,因为军方成了文官政府几乎无法忍受的压力集团。马其顿一经解放,黑手党人便期望把这新领土置于军方统治之下。起初,帕西奇几乎完全不能抑制他们的影响,而在1913年10月,迪米特里耶维奇和军事情报部门的黑手党人唆使总参谋部向奥地利保护下的阿尔巴尼亚的一部分领土出兵。奥地利人向贝尔格莱德发出最后通牒,俄国人坚持要塞尔维亚后撤,武装部队便撤退了。阿皮斯·迪米特里耶维奇和黑手党的受挫给帕西奇提供了机会。一道正式的命令宣布,在马其顿,军方应服从文官统治;阿皮斯的知名的支持者都被派去卫戍比较难以从事阴谋活动的城镇。

1914年春夏两季,塞尔维亚激进党与黑手党之间发生重大的政治冲突。4月里,以一件比较琐屑的小事为导火线,触发了这场冲突。黑手党创始人之一、弑君者达米安·波波维奇将军在塞尔维亚统治下的马其顿主要城市斯科普里庆祝复活节时,要求坐在行政区长官的上首。帕西奇暂停了他的职务,他的军中同僚却立即选他担任贝尔格莱德军官俱乐部主席。帕西奇毫不示弱,命令警察查封军官俱乐部;到5月,颇耐人寻味地称为《皮埃蒙特》的反映军方观点的报纸开始发出不祥的叫嚣,回顾1903年时军队如何将塞尔维亚从暴政下拯救出来。议会中的反对党采取了多瑙河流域各国所有少数党都喜爱的一种策略:不到议院去。

117

国王彼得起初没有卷入这场争执。但是,当从未参加黑手党

的传奇式的、群众当作偶像崇拜的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元帅威胁要辞去总司令职务时，国王倒向了军官一边，激进党政府被迫下台。国王却遭到他儿子王储亚历山大的反对，王储由于个人的原因不信任迪米特里耶维奇，怀疑他有实行共和的野心。在王储和驻贝尔格莱德的俄国公使双重压力下，国王放弃了这场斗争；他因健康不佳，指定亚历山大为摄政王，自己归隐乡村。普特尼克元帅的健康并不比他的君王好些，他离开塞尔维亚到奥地利某一处矿泉疗养地休养去了。帕西奇政府重新执政，显然是胜利了。6月24日，国会正式被解散，宣布8月初举行选举。

选举永远未能举行。塞尔维亚国会解散后四天，正当帕西奇在尼什从事竞选活动时，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青年波斯尼亚党”的一个大学生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向他提供克拉古耶瓦茨的塞尔维亚皇家兵工厂武器的便是黑手党特务。不出五星期，巴尔干一个蕞尔小国内部的纠纷便被欧洲所曾经历的最大一次战争冲到一旁去了。

萨拉热窝刺杀案虽然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却当然是它的诱因。近代史上没有一次阴谋案件曾被如此广泛而又反复地大书特书，然而1914年6月28日的事件仍属一大疑团。我们知道，奥匈帝国的王位继承人树敌颇多，而且泛塞尔维亚分子害怕他继承王位，因为他显然愿意安抚匈牙利君主国内的南部斯拉夫人。我们知道，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将在塞尔维亚的国庆节（维多夫丹^①）访问波斯尼亚首都的决定最初在报上一经公布，塞尔维亚人民便把这看作公开的侮辱。我们还知道，偶然的一件事在这出悲剧中起了可怕的作用，因为，事先没有预料到会临时变更路线，竟迫使大公的汽车停在离普林西普只有几码远的地方。有些推测纯

^① 原文是 Vidovdan, 6月28日是维多夫丹宪法节，也是塞尔维亚国庆日。——译者

属异想天开，大可置之不理，但仍然有些根本问题，除非单靠带有偏见的猜测便无法回答。例如，塞尔维亚政府在这次阴谋中究竟卷入到何种程度？归根结底，普林西普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自己主动这样干的？

贝尔格莱德发生的权力之争，可能使黑手党领导人或者帕西奇都没有注意到这本来应该引起注意的阴谋。当危机达到顶点时，普林西普和他的两个年轻的同伙正在贝尔格莱德，6月1日至2日的夜间却被偷偷地送过国境，返回到波斯尼亚。帕西奇从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中得知他们的活动，不久之后，他亲自将它概括如下：他下令调查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的情报部门的活动；他似乎曾力图利用他同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中的政治领袖们的联系来阻止刺客执行其计划。然而，他的行动似乎犹豫不决，又没有明显证据足以表示他确曾警告过——哪怕是间接地——奥地利当局；驻维也纳的塞尔维亚公使确曾极力主张取消这次访问，但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他个人的主动，在谈到危险时，也只含糊笼统地说了一些话。 118

阿皮斯·迪米特里耶维奇的行为同样令人迷惑不解。普林西普被偷偷送过国境回去两星期后，阿皮斯才将这一密谋通知“要么联合要么死亡”组织的中央委员会——黑手党领导人的核心。除了早已参与其事并监督刺客训练的坦科西奇少校以外，委员会投票表决反对刺杀大公的任何企图。结果虽然阿皮斯当然不相信这样年轻而又外行的刺客会成功地执行他们的任务，他还是设法停止暗杀的准备工作的，但是像帕西奇一样，他的这次行动似乎也是半心半意的。自然，阿皮斯完全可能是在进行一次不计后果的政治赌博。如果计划败露，继而发现标有塞尔维亚皇家徽号的武器，将会导致奥地利向贝尔格莱德强烈抗议。既然帕西奇已经表示要避免武装冲突，他很可能不得不忍辱求全，向维也纳赔礼道歉。而如

果帕西奇被迫谴责一项在维多夫丹节进行的爱国抗议行动，他就会在选举前夕使激进党丢脸，他的政治生涯也将从此完结。假如不至于发生奥地利入侵塞尔维亚的情况，阿皮斯和政治上的反对派则可以从含有“民族荣誉”和“我们在哈布斯堡暴政统治下的塞尔维亚兄弟们”一类动人感情的概念的危机气氛中大得其利。

这些盘算如果真的存在的话，也由于暗杀阴谋出人意料的成功以及奥地利反应之强烈而毫无意义了。孔拉特仍然企图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摧毁南斯拉夫民族感情的威胁，正如他在回忆录里以难以置信的无耻的词语所写的那样，这桩暗杀事件是“上帝的恩赐，或者是来自战神的礼物”；主战派终于有了消灭塞尔维亚的理由。7月23日，奥地利人向贝尔格莱德提出最后通牒，其内容实际上意味着要塞尔维亚人放弃政治独立。然而，帕西奇接受了主要的要求，只是拒绝同意奥地利官员在塞尔维亚领土上对暗杀阴谋进行调查，而帕西奇的拒绝便已足以促使维也纳政府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

- 119 这场战争很快扩展到巴尔干国家以外，吞没了整个欧洲。塞尔维亚人向俄国求援。虽然俄国知道如果允许塞尔维亚被毁灭，俄国在巴尔干各国的影响将荡然无存，但是圣彼得堡还是有些犹豫。俄国下令动员。德国已向奥匈帝国保证抵消俄国对塞尔维亚的支持，要求俄国停止一切战争准备。俄国拒绝后，德国即于8月1日宣战。到当月中旬，欧洲的五個大国和两个小国（塞尔维亚和比利时）便在从佛兰德平原直到马祖里诸湖一带打得难解难分。

第七章 “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

120

19世纪30年代，亚当·密茨凯维支因祖国遭受磨难，忧心忡忡，曾劝告他的波兰同胞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而祈祷。及至1918年初，沙皇帝国既已崩溃，大西洋彼岸的那个多种族民主国家又卷入了欧洲事务，这种祈祷看来有可能终于得到回答了；因为“民族自决”一旦被正直的人们奉为信仰，两大军事阵营之间争夺控制权的大规模斗争便转变为维护条约的神圣性和创建新欧洲的革命运动。然而，过早地谈论“十四点原则”的基调，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既不可靠，又会引起误解。直到1916年底，旧欧洲的政治领袖们思考问题，还是从他们一度亲身经历而又渴望目睹其恢复的那种集体安全出发。1914年，在巴黎、伦敦和圣彼得堡，人们都曾认为：独立的大国是欧洲的需要，小国是历史的必然，唯独过分强大的国家才是谁也无法容忍的灾难。昔日的屏障显然已证明不胜所任，和平来到时有必要通过调整疆界以谋补救，但似乎无需在急剧的变动中把它们统统抛弃。胜利本身就是行动纲领，而“战争目的”不过是新闻记者的行话而已。只是在军事上未作决定而使隆隆炮声停息时，诸从属民族要求“免于奴役”的呼声才会在各协约国首都纳入议事日程。

这些呼声在战争爆发时还极其微弱，因而即使被人们当成耳旁风也几乎不足为奇。诚然，1914年8月20日伦敦的《泰晤士报》曾向读者报道布拉格爆发了一场革命，谈到“捷克人的鲜血染红了”摩拉瓦河，谈到包括马萨利克在内的捷克政治领袖被捕处

151

决；但是，这一报道纯属虚构，是战斗伊始便传遍欧洲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典型谣言。尽管“青年捷克人”党在战前多次提出过恐吓，¹²¹ 奥匈帝国却未发生斯拉夫人的起义；当时在布拉格，要求脱离奥匈帝国的情绪表现得甚至还不如帕拉茨基和列盖尔时代那样明显。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动员二元君主国的军队，并未发生严重的示威行动，尽管捷克人占绝大多数的某些团队里日后会滋生事端。“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中自然有很多不满情绪，匈牙利当局也对他们采取了严厉措施，但那些有不同政见传统的民族多数在开始时还是拥护这场战争的。例如在萨格勒布，身为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的斯捷潘·拉迪奇，就曾对攻打贝尔格莱德的泛塞尔维亚主义者的战役表示支持；又如在布尔诺，施纳麦克阁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的总理——也曾签署声明，保证坚持不渝地忠于摩拉维亚人民的“国家及其高贵的君主”。同样，毕苏茨基将军统率的两个波兰旅越过俄国边界袭击凯尔采城后，8月的第三星期在克拉科夫正式宣誓效忠于弗兰西斯·约瑟夫。来自君主国各地的不同种族的农民，忠心耿耿地汇集于军旗之下。军士长约瑟普·布罗兹（三十年后，他将获得南斯拉夫元帅的权杖）理所当然地随同所属的克罗地亚步兵团开拔，先赴萨瓦河畔的塞尔维亚前线，以后又在喀尔巴阡山的严寒下抗击俄军。直至早期战斗结束，战争陷于僵持状态，各民族才开始日渐不服约束。

1914年东欧有三个战区：一在塞尔维亚西北边境；一在加利西亚及布科维纳；一在东普鲁士的漫长边界上。东线战斗中最著名的一次，发生在第三个地区，即俄军溃败于坦仑堡，但在其他两地区所发生的事件也有其特殊意义：它们暴露了奥匈帝国军队兵力和军火来源有限，在一定程度上更加说明哈布斯堡君主国对德国支援依赖程度之深。

战争开始时，奥地利人认为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压倒塞尔维亚。然而，他们毕竟低估了塞尔维亚军队的顽强和英勇。波斯尼亚总督波蒂奥雷克将军曾先后于8月和9月在沙巴茨附近率师强渡萨瓦河，但每次奥地利人都受阻于采尔山上的岩石要塞而无法前进，只得退回希雷姆地区。11月初，波蒂奥雷克再作尝试，这次充分利用了他的炮火优势。塞尔维亚人被迫退却；经过四星期的激战，一个马扎尔骑兵团于12月2日攻克贝尔格莱德，以此庆贺弗兰西斯·约瑟夫登基的周年纪念日。但哈布斯堡的胜利却是短暂的。不出两星期塞尔维亚人便发起反击，解放了国都，把侵略者一下子逼退到波涛汹涌的科卢巴拉河上，然后逐出塞尔维亚王国。这是奥地利人的一次惨败，在三次失败的进攻中，伤亡共达十万人。然而，由于军火储备所余无几，城镇中斑疹伤寒蔓延肆虐，塞尔维亚人也无力再沿多瑙河向上游进攻。士气受挫，整个塞尔维亚战线沉寂无事达十个月之久；只是在1915年秋德军的几个师开到后，才打破了那沉寂的局面。122

在加利西亚，奥地利人陷入潜在的更大灾难。他们对会议波兰的轻率进犯，招来俄国四个军迅速通过桑河之畔的高原地带，朝喀尔巴阡山脉方向大举反击；奥军后撤将近一百英里。9月3日，布鲁西洛夫将军的部队占领了二元君主国的第四大城市利沃夫（伦贝格），围攻普热梅希尔要塞。向南更远之处，布鲁西洛夫的先头骑兵部队占领布科维纳，攻入切尔诺维策，并在冰雪封地迫使一切作战行动停止之前进抵喀尔巴阡山林木茂密的山坡。奥地利的一次反攻暂时解除了俄军从北面对克拉科夫的威胁，但敌人发起攻势强行通过喀尔巴阡山脉进入匈牙利中部产粮区的可能性，直到1915年春还仍然是一种现实的威胁。直至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爆发以后，奥地利从未能完全收复东加利西亚；双方在布科维纳的进退拉锯达三年之久，省城切尔诺维策易手不下十五次。

俄军在最初阶段对君主国入侵之得手，旋即为 1914 年 8、9 月间德军在坦仑堡和马祖里湖附近的惊人胜利所抵销。仅在东普鲁士，战争的第一个月里俄军就丧失了他们在 7 月间动员的全部兵力的四分之一。坦仑堡大捷纵然令人震惊，德国却未能因此获得一寸土地；涅曼河附近的森林、湖泊、河流和沼泽，处处妨碍着兴登堡的通讯联络，他只好另觅一条通往波兰心脏地区的途径。因此，他在 9 月末派马肯森率德军第九军由铁道南下，再穿过波兰西部挺进到维斯杜拉河，以便援助克拉科夫北面的奥地利军队。两星期之内，马肯森的左翼部队已抵达距华沙仅七英里处。俄国于是以十四个师投入反攻，阻止了德军向东推进；到 10 月 23 日，德军又将马肯森在这个月初攻占的土地丢失大半。然而，东线的战局变化较之西线始终要大得多；11 月，马肯森准备朝华沙方向再次发起攻击。这一次德军先沿瓦尔塔河挺进，接着溯维斯杜拉河而上。接连五个星期，尽管阴雨连绵，道路泥泞，战斗仍异常激烈；德军攻占纺织业中心罗兹，又一直推进到华沙外围防御工事，但始终未能突破俄军防线。双方军队均已精疲力竭，加之冬寒凛冽，争夺波兰的这场大战乃暂告停息以待来春。

战事的起落决定了三个专制帝国对待战争波及地区各民族的态度。1914 年 8 月 19 日，俄军总司令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向各从属民族发布两篇文告：前一篇极力号召奥匈境内各民族群起反抗君主国，给他们的俄国解放者以兄弟般的援助；后一篇专门向波兰人许诺：他们的民族应在俄国沙皇的保护下“获得新生，享有宗教、语言、自治等自由”。德国人却无意在战争的这头几个月就把波兰国旗打出来，尽管他们对波兰村落及其居民的同情比在比利时和法国进军时途经的地区略微强些。奥地利人则由于匈牙利人及其德国盟友所持的敌对态度，未能向波兰人发布任何慷慨

的宣言；但他们允许毕苏茨基在克拉科夫建立一个最高国民委员会，以便寻求一种按奥地利人意旨解决波兰各项问题的方法。

与此同时，俄国也在鼓励一批捷克流亡者，期望一旦俄军突破喀尔巴阡山脉防线，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建立一个脱离奥匈帝国的政府。沙皇先后于8月20日和9月27日接见一个捷克代表团，其成员主要是拥护克拉玛什的亲俄分子；他们谈到了“自由、独立的圣文采斯拉斯^①王冠”在“罗曼诺夫^②王冠的光辉照耀下”闪闪发光。但由于俄军始终未能深入到距离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捷克省份一百英里之内，这顶稀奇的王冠的光泽不过反映了冬宫的幻想而已。俄国外交大臣萨佐诺夫9月中旬与法国大使谈话时，脑海中当然没有这样一幅大规模地重新绘制的地图；他心目中的新欧洲格局将包括一个哈布斯堡三元君主国，其中波希米亚将获得与匈牙利相似的地位，而塞尔维亚则将兼并达尔马提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大多数捷克自由主义者对俄国的援助不抱丝毫信心，而对沙皇制度则深恶痛绝。他们在最初的几场战斗之后就不再保持比较消极的态度，因为哈布斯堡当局拒不召开维也纳议会，不给他们公
124
开表达自己政治观点的一切机会，所以他们就免不了要指望奥地利的敌人予以支持。马萨利克早在1914年9月就谋求与英国人接触，但直到12月才终于离开布拉格流亡国外。他取道罗马，去瑞士暂时定居。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解释说，他确信伦敦是协约国致力于战争的天然政治中心，因而在瑞士逗留四个月后，决定转移到英国进行活动。筹建捷克斯洛伐克国的工作将是在西方，而不是像克拉玛什所曾希望的在东方。

然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察觉到各从属民族在扰乱他们的敌人

① 波希米亚国王。——译者

② 罗曼诺夫王朝为俄国的统治家族，起于1613年，直到1917年。——译者

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却比俄国人要晚得多。这有两个主要原因：多年来泛斯拉夫主义的宣传鼓动，已使解放运动成为俄国政策中的惯用策略；而在伦敦和巴黎，人们都认为德国以及1914年11月以后的土耳其对协约国至关重要的利益所提出的挑战较之奥匈更为直接。驻伦敦的俄国大使在9月末报告说，他发现政府和反对党领袖都不愿看到二元君主国分崩离析，“因为奥地利已被相当普遍地看作是德国的牺牲品”。然而到那年年底，反对哈布斯堡君主国继续维持原状的舆论开始日益强烈。这种态度上的改变，部分是由于同捷克人运动的接触，更主要的则是由于南斯拉夫人的活动，特别是弗兰诺·苏皮洛所提出的种种论据；这位达尔马提亚新闻记者早在1905年就已带头为促成君主国内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的和解作出努力。

苏皮洛所进行的促使西欧觉醒的工作，始终没有得到理所应当的公认，可能是因为他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便已于1917年9月逝世。但在这场大战的头十八个月里，他的影响要比其他任何南方斯拉夫人都大得多，甚至也比当时的马萨利克和捷克人大得多。1914年9月末，他与驻罗马的英国大使伦内尔·罗德爵士接触，力图博得后者对“南斯拉夫理想”的同情。他从罗马前往波尔多，受到法国外交部长的接见；11月，他来到伦敦，向英国首相阿斯奎斯和外交大臣格雷陈情游说。当时四十四岁、义愤填膺时犹如火山爆发的苏皮洛给人以难忘的印象：罗德风趣地说道，“他外表虽然粗鲁，正式表达自己的观点时却也不乏一种出乎自然的农民式的礼节”；格雷觉得他是“我与中欧人打交道至今所遇到的最令人感兴趣的、最有远见的政治家”。离开伦敦后，他又到塞尔维亚的临时国都尼什游说，使得令人敬畏的帕西奇“显然感情激动地”向他保证，甘愿以自己和塞尔维亚的名义，为南斯拉夫人做到皮埃蒙特曾为意大利人所做的一切。接着，他毫不疲倦地赶到彼得格勒，在

那里以适当的方式疏通了所有的主要大臣，甚至也疏通了拉斯普廷^①，但沙皇却拒绝接见他。1915年5月他回到巴黎，与安特·特鲁姆比奇一起建立了一个南斯拉夫人委员会，为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团结在一个南部斯拉夫人的国家之中而奋斗。委员会里最有影响的成员，和苏皮洛本人一样，都是来自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但委员会中也有一个斯洛文尼亚人、一个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和两个来自匈牙利统治下的克罗地亚本土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却长期对委员会及其纲领持怀疑态度。

苏皮洛在伦敦和巴黎的成就大于在彼得格勒或尼什的成就。俄国人打心眼里就不喜欢把信奉天主教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同信奉东正教的塞尔维亚人和门的内哥罗人联合起来的想法。俄军总参谋部希望和平能带来一个版图大为扩张的塞尔维亚，它由于对沙皇感恩不尽而将同意在科托尔为俄国的亚得里亚海分舰队建立一处海军基地。帕西奇尽管在会见苏皮洛时曾经感情冲动，他的信念却依旧是创建大塞尔维亚而非南斯拉夫，虽然他已准备答应塞尔维亚议会正式表决，号召从哈布斯堡桎梏下解放同族的亲人。但苏皮洛政策的最大障碍在罗马。南部斯拉夫人统一的任何纲领，不管是苏皮洛理想中的范围广泛的统一，还是帕西奇和泛斯拉夫主义者所追求的较小目标，都与意大利人的野心背道而驰；而由于协约国企图诱使意大利人参加反对奥匈的战争，苏皮洛的影响便逐渐减弱。到1915年7月，格雷居然恼火地写道，在战前的英国，“除了十来个大学生以外，谁的脑海里也没有南斯拉夫这个概念”。苏皮洛最走运的日子过于短促，死得太早；协约国的希望就集中于罗马了。

^① 拉斯普廷(Rasputin, 约1872—1916)，西伯利亚农民和神秘主义者，后成为沙皇的宠臣。——译者

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企图使意大利参战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西线和东线难决胜负的战斗以后，只有南线能在中欧为他们的军队打开一条道路，使军事力量的对比变得有利于他们一方。然而，意大利人竟漫天要价。他们提出，若要他们参战，战后和约就得规定不仅要把仍在哈布斯堡统治下的最后几片“被侵占的意大利领土”（特伦蒂诺、戈里齐亚、南蒂罗尔、的里雅斯特和伊斯的利亚）归还给她，而且她可以在非洲和小亚细亚得到若干特许权，还可以有一个进入巴尔干半岛的桥头堡。1915年春进行了六个星期的谈判以后，4月26日签订伦敦秘密条约，答应将意大利人所要求的大部分疆土都给予他们，其中包括的里雅斯特、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北部沿海地区、作为其保护领地的阿尔巴尼亚、割让给它的发罗拉地区，以及亚得里亚海中除两个较大岛屿以外的
126 所有海岛。克罗地亚沿海一些最富饶的地区，包括阜姆、斯普利特、杜布罗夫尼克等港口，则没有明确应允给予意大利；然而，所准备进行的领土转让对南部斯拉夫人的希望是一个够沉重的打击，意大利人因此便坚持决不可让塞尔维亚人得知条约的各项条款。

不过，和意大利的这笔交易想要保密是很难的。苏皮洛在访问彼得格勒期间，偶然地获悉事实真相，把它告诉了帕西奇。接着是一场激烈的交互攻击，各协约国首都因此曾一度担心塞尔维亚可能单独媾和。摄政王亚历山大向俄军总司令提出抗议：斯拉夫人血流成河，竟全属白费，委实令人难以理解。他抱怨说，“意大利仅仅是取代奥地利构成威胁”；条约的各项条款势必在不久的将来挑起一场新的战争。但在那年春天，连斯拉夫的兄弟般情谊也无法使俄国人有动于衷；明摆着的事实是，意大利看来有向奥地利发动进攻的能力，而塞尔维亚则不能。意大利设想伦敦条约的各项条款将能一字不差地实现，故于1915年5月向奥匈宣战。在这一点上他们却不免要失望，因为在最终媾和之前，该条约对种族原则

的违犯势必会招致威尔逊总统和美国人民的非难，其抨击之严正，远非亚历山大、帕西奇、苏皮洛或其他任何南斯拉夫人的指责所能比拟。

奥地利人本身料想，罗马尼亚人也会在意大利向他们宣战后的四十八小时之内参战。这是因为布加勒斯特的官方评论员总喜欢强调把古代达契亚同当代罗马连结起来的那种拉丁联系；而更现实的则是扬诺尔·布勒蒂亚努的罗马尼亚政府已下定决心：日后瓜分哈布斯堡帝国时，必须承认它对特兰西瓦尼亚、布科维纳和巴纳特的要求。这些行省居然有可能被用作诱饵，引起帕西奇的强烈抗议，因为巴纳特西部的居民以种族而论，绝大部分是塞尔维亚人。他抱怨说，“协约国正在把塞尔维亚人当作非洲部落似地转手卖给别人”。但到当时为止，协约国与罗马尼亚之间的谈判毫无成果；而向保加利亚提出建议，允予修订布加勒斯特条约使之对她有利（特别是在马其顿），以诱引保加利亚参战（帕西奇对此建议也同样反对），也同样是毫无结果。这两个国家都宁愿在这场战争还不知胜负谁属之时保持中立，它们要看一看 1915 年夏季的战斗如何发展再定投靠哪一方。战斗一经开始，克劳塞维茨的名言被颠倒了过来，外交政策只不过是战争以其他方式的继续：在东欧赢得一场军事胜利此时已成为协约国外交的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

但在整个 1915 年，胜利属于何方仍和过去一样捉摸不定。由于兴兵五十万而未能夺取加利波利半岛上的制高点，协约国对达达尼尔计划所抱的莫大希望化为极度失望。意大利在伊松佐河下游蒙受的损失也同样惨重，他们企图攻下戈里齐亚要塞，而要塞却始终屹立在山石嶙峋的高地上，坚不可摧。但那年夏天协约国遭受的最大灾难则是在波兰：5 月 2 日，德军第十一军和奥军第四军在冯·马肯森将军统一指挥下，由防守转而发动联合攻势。他们突破俄军在杜纳耶茨河畔的防御工事，攻克戈尔利采城，接着又穿

127

越加利西亚向东挺进，四星期之内俘虏敌军十五万人以上。到6月末，伦贝格（利沃夫）再次回到奥地利人手中，塞列特河以西的加利西亚全部从俄国入侵者占领下获得解放。但突破戈尔利采只不过是序幕而已。7月，大军沿整个东线全面向前推进：北路杀向考纳斯和德维纳；中路进逼华沙；南路则从桑河流域挥戈向北直捣卢布林。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切尔宁在战后回忆说，“俄军要塞仿佛纸牌搭起的房屋，相继坍塌”。普热梅希尔、伊万哥罗德、华沙和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官方公报中都成了令人难忘的地名；随着这些城市的陷落，投降的俄军战俘竟达百万人之多。直到9月末，俄军才稳住了阵脚；在这以前的撤退中，他们被迫放弃了立陶宛的大部及整个会议王国。华沙本身早在8月5日就已沦陷，而当德军终于停止前进时，原来已攻入华沙的部队又向东推进二百英里，到达普里皮亚特沼泽地的边缘。

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幅员广袤的帝国，领土损失并不像对西欧一些版图比较狭小的国家那样有决定性作用，但撤离波兰国土却有其远为重大的政治意义。尽管截至当时德国、奥匈帝国两国政府都避而不对波兰的独立作出无法改变的承诺，并坚持把会议王国当作分割成若干占领区的被征服疆土，战役的进程已使他们掌握这方面的主动权。以德莫夫斯基为首的一小群波兰国民民主党人，继续力劝其同胞不可采取反俄行动，但只要俄国仍然固执其气量狭窄的专制统治，德莫夫斯基的呼吁就几乎得不到响应；他于是在1916年离开彼得格勒前往伦敦。毕苏茨基曾率兵一旅在布科维纳与俄军鏖战，德军进占华沙不久，他就赶到该城。但那里的军事当局不信任任何有政治倾向的军人，对他颇怀疑虑，一开始甚至禁止其波兰军团征募新兵。尽管又过了一年同盟国才接受波兰国这一概念，华沙的德国军事长官汉斯·冯·贝斯勒将军却不久就开始在教育 and 市政管理方面向波兰人作出若干让步。

协约国在加利波利半岛、在伊松佐河畔以及在波兰所遭受的一连串挫折，对东南欧仍保持中立的国家的态度有相当大的影响。罗马尼亚与双方接触的政策变得越发难以捉摸，在雅典，国王康斯坦丁和希腊的军队首脑们大肆炫耀其亲德情绪，使得同情英、法的首相维尼齐洛斯处境尴尬。在索非亚，保加利亚人坚决向同盟国靠拢，就在华沙陷落的那一星期，派了总参谋部一名有影响的上校去柏林洽谈。保加利亚的这种主动表示，在战争进入这一阶段时，特别受到德国人的欢迎。德、奥两国的总参谋长法尔根汉和孔拉特急于想消除塞尔维亚战线这一隐患，以便同他们的土耳其盟国进行有效的合作；而如果对塞尔维亚采取行动，保加利亚看来不仅几乎毫无所失，还可得到马其顿，一雪第二次巴尔干战争败北之耻。9月6日签订了一项秘密军事协定，规定在奥、德两国沿多瑙河和萨瓦河一带联合发动攻势的一星期之内，保加利亚攻打塞尔维亚前线的东侧。这月月末，战斗在俄国终于开始平息，载运德、奥军队的火车缓慢地通过匈牙利南部；马肯森及其卓越的副手汉斯·冯·西克特把他们在加利西亚完善了的那些妙计搬到了巴尔干半岛。10月6日，用大炮猛轰贝尔格莱德；一星期后，保加利亚按时进军，越过边界开入塞尔维亚南部。

奥、德、保三国对塞尔维亚的威胁所造成的间接后果，是使英、法两国在历史上首次在巴尔干半岛登陆作战。1915年10月5日，一支仓促凑成的英法联合部队在萨洛尼卡登陆，希望以此阻止保加利亚参战，同时沿瓦尔达尔河—摩拉瓦河流域与塞尔维亚人建立联系。但这支萨洛尼卡远征军既不合伦敦和巴黎几乎全体文武首脑的心意，其本身的存在又取决于悲喜交集、动荡不定的雅典政局，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徒劳无功。它既使许多希腊人转而反对协约国的事业，又未能拯救塞尔维亚。极少有人能在当时或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看出巴尔干半岛上这个小小立足点的战略价

值，或者预见到这支由各协约国推举的“东方部队”的总司令在改变欧洲局势中能有什么政治影响。特别是英国人，如果当时能尽早摆脱这场马其顿纠纷，他们将会引为莫大快事。

此时，塞尔维亚人虽败犹战。他们的抵抗持续之久，远远超出马肯森的预料：即便是贝尔格莱德，在他最初突然发起的猛烈袭击下还坚持了三天；他也一直未能在克拉古耶瓦茨或布拉采的战场上按原计划围困住塞尔维亚军队。但塞尔维亚方面由于枪支短缺和斑疹伤寒蔓延，再也无法阻挡从北、西、东三面源源而来的四十余万生力军的猛攻。到11月的第三个星期，塞军被分隔为四支孤立的部队，撤退到阿尔巴尼亚的荒山野岭之中，入侵者则为暴风积雪所阻。塞军在撤退途中伤亡惨重不亚于经过一场恶战。而幸存者甚至在抵达亚得里亚海滨后也难以找到栖身之地，因为早在1916年1月奥军就已侵入门的内哥罗，并开始沿阿尔巴尼亚滨海平原向前推进。最后，法、英海军部队将塞军从阿尔巴尼亚南部撤到希腊的科孚岛上，这个岛是法军在新年占领的，尽管雅典国王康斯坦丁为此提出过强烈抗议。塞军在科孚岛上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休整，由法国重新装备后运往萨洛尼卡，并在这个重重设防的基地与英国师、法国师、意大利师甚至俄国师汇合在一起。但科孚岛直到大战结束仍然是塞尔维亚政府的正式所在地。

德国和奥地利与保加利亚结盟并占领塞尔维亚后，把一个军政统一体强加于欧洲和小亚细亚，即从布鲁塞尔直至巴格达。只有罗马尼亚站在一旁，表面上保持中立和独立，然而也迫于商务条约的约束而以其大部分谷物供应同盟国。接着不可避免地提出实现更广泛的经济一体化的建议，商人和工业家随着大军向东拥去。贝尔格莱德沦陷不到一个月，驳船便再度开始在多瑙河上行驶，从维也纳和布达佩斯顺流而下，驶往黑海；到1916年头几个星期，旅客

又能搭乘巴尔干快车从汉堡直达君士坦丁堡。在战争中成为权威后勤专家的符腾堡将军威廉·格梭纳在铁门修筑了一条特殊铁路，牵引驳船迅速通过多瑙河的急湍，使谷物、矿石、汽油产品等源源不断地由水陆两路朝西北方向运去，力求挫败协约国的封锁。于是，被占领的塞尔维亚的经济、保加利亚的经济、甚至连凋敝的土耳其经济，统统被套在德国人的战车上。德国南部和奥地利有许多作家和宣传家希望看到这种体制永世长存，倾向于把实现多瑙河流域和巴尔干各国的经济统一本身就看作是无可非议的战争目的。为了鼓吹这类宏伟计划，在慕尼黑和维也纳相继出版几种月刊。这一理想的创始人是弗里德里希·瑙曼牧师，这位胸襟宽阔的开明人士，像多数的先知一样，见到他那些不大有远见的信徒特别是德裔奥地利人的暴行便憎恶得退缩不迭。

瑙曼所著的《中欧》一书 1915 年 10 月初在柏林出版，马肯森就在同一星期内发动了摧毁塞尔维亚的攻势。这本书成为战争期间最畅销的学术著作。瑙曼是一位路德宗的神学家和社会分析家，为宣传“德意志中欧”思想奋斗二十余年，他认为霍亨索伦与哈布斯堡两大帝国将在中欧凭借一种共同经济的牢不可破的联系而结为一体。瑙曼的一些早期著作中，几乎无处不洋溢着泛德意志主义者的狂热感情，他进入中年以后这种感情则渐趋温和。及至 1915 年，他已经基本上成为一个联邦主义者，坚决主张只有在一种给予民族、语言、教育等方面的自主权以宪法保证的制度结构内，经济上和政治上的统一才能长期存在。然而瑙曼所生活的时代既非关税同盟又非共同市场的时代；他的读者中很少有人赞同对民族差异和特性如此宽容，而他自己对俾斯麦的景仰又不时使他感到为难。此外，虽然瑙曼对波兰人和捷克人多少以保护人自居，他却认为波希米亚本来就是德国的行省，并建议布拉格应成为他所主张的超级国家的中心。因此，在帝国各斯拉夫民族以及他

们在各协约国首都的朋友们眼里，璠曼像是在企图为他们久已指责的条顿统辖论从理论上进行辩解；与璠曼的本意正好相反，他的这本书倒为流亡西方的捷克人、南斯拉夫人和波兰人提供了进行思想论战的有力武器。未经版权所有人许可的英、法、意文译本先后匆匆问世，广为流传。在以后许多年内，璠曼的理想总被误解，并常遭歪曲。

伦敦和巴黎的知名人士为《中欧》一书的明显寓意所震惊，而更趋于听信来自君主国的流亡者，尤其是托马什·马萨利克；马萨利克与《泰晤士报》国外新闻版编辑斯蒂德的友谊，保证他可以利用这个有影响的讲坛来宣传自己的观点。爱德华·贝奈斯逃亡到西方后，捷克人的活动大为加强，他成了马萨利克在巴黎的主要发言人。1916年2月成立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马萨利克任主席，贝奈斯任书记，在法国空军中服役的一位青年军官米兰·施特法尼克则是斯洛伐克人的代表。同巴黎大学和伦敦皇家学院的频繁接触，使捷克人在学术界得到更大的支持。自1916年10月起，在伦敦出版了一份《新欧洲》周刊，鼓吹需要确保东欧各族人民得享民族自由，这杂志以其学识渊博的内容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恰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在接受马萨利克的一般论点和重申他的具体论据之间有一段时间间隔。直到1916年底，在协约国的磋商计议中，南斯拉夫人委员会——以特鲁姆比奇为主席，苏皮洛则起推动作用——的影响一直要比捷克人大，在伦敦尤其如此。1916年8月英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建议中东欧在战后分成若干民族国家；但是，它赞成建立单一的南斯拉夫联邦以及“在俄罗斯大公统治下的波兰王国”，实际上却忽视了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仅仅建议“把波希米亚附属于波兰王国”。这个文件当然是保密的，对任何政府都没有约束力；甚至直到下一年才提交英国内阁会议讨论。但如果把其中的一些建议与1917年1月应伍德罗·威尔逊总统

的请求向新闻界发布的关于协约国战争目的的第一份公开声明相比较，倒颇能给人以启发。因为这份新发表的声明避免具体提及南斯拉夫人（由于罗马的桑尼诺政府的坚持），而是特别号召“把意大利人、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声明中只有一段措词审慎的话提到“俄国沙皇陛下”对于波兰的“意图”。很清楚，在这两个文件相隔的五个月中，协约国在感情上已经开始明确地转而赞成马萨利克提出的新欧洲的蓝图，尽管他并不赞同按沙皇的办法解决波兰问题。罗曼诺夫王朝的垮台，使协约国不久就摆脱了这一特殊的窘境；同时也格外提高了马萨利克作为斯拉夫各族人民代言人的地位。

在1916年的大半年中，东线战事继续不利于协约国。然而，仲夏时曾有好几个星期，似乎布鲁西洛夫的西南集团军甚至有可能使俄军到达喀尔巴阡山隘口。六月初，奥军第四军和第八军抵挡不住布鲁西洛夫大军的猛攻，在一片混乱中溃败后撤六、七十英里。同盟国从西线急调十五个德国师，甚至还加派了一个土耳其军团，一起赶到加利西亚来堵住缺口，但布鲁西洛夫仍继续不断地施加压力。直到9月末，沙皇军队伤亡已过百万，又由于后勤无能，炮弹匮乏，终于士气低落，疲惫不堪，他们发动的最后一次的大攻势才在布科维纳山毛榉丛生的坡地上停了下来。

132

1916年夏，奥匈帝国在罗马尼亚押下赌注以求分享战利品之前就会真有战败的可能，这使布加勒斯特的布勒蒂亚努政府仓皇失措，拼命地讨价还价。布勒蒂亚努亲自通知各协约国驻罗大使，如果他们的政府不同意他的参战条件，他就引退而把罗马尼亚的国事交给他的亲德对手们去处理。于是8月17日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据此罗马尼亚承诺于8月28日向同盟国宣战，但以下列五点为条件：将特兰西瓦尼亚的全部、直至蒂萨河的那部分匈牙利平原、巴纳特和布科维纳最终割让给罗马尼亚；在和会上与英、法、

俄、意享有同等地位；萨洛尼卡的部队立即发动进攻；布鲁西洛夫继续攻打奥地利；以及派遣俄军到多布罗加以保卫罗马尼亚南部免受保加利亚的侵犯。协约国为获得罗马尼亚的合作之所以同意付出这种高价，部分是由于他们希望这样就有可能在布科维纳切断溃退的敌军；但也是为了使同盟国失去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加强对它们的封锁的效力。结果，保加利亚竟抢在协约国之前动手，在签订这一秘密协定后的几小时内就向马其顿进攻；但罗马尼亚仍于8月28日按时宣战，萨洛尼卡部队于是得以在两星期后发起反击。

如同上年意大利的情况一样，秘密外交再度未能在军事上带来预期的报偿。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统帅部长期以来就料到罗马尼亚会投到协约国一边，虽然在罗军果真向特兰西瓦尼亚进军时，阿茨将军麾下只有二万五千名士兵防守边疆。然而，马肯森却在多布罗加集合起一支由保加利亚人、土耳其人和德国人组成的军队，9月初开始从多瑙河下游向上游挺进。在这个月的后些日子里，法尔根汉协助阿茨把罗马尼亚人撵出了特兰西瓦尼亚，到10月初，罗马尼亚军队已经处处陷于防守地位。俄国只派了二万军队保卫多布罗加，其中有许多是来自战俘营的自愿参战的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他们一旦被俘就会以叛国罪处决。10月25日，康斯坦察以及横跨多瑙河的切尔纳沃达大桥落入马肯森之手；12月6日，德军开入无人防守的布加勒斯特。及至这一年年底，罗马尼亚人手中已只剩下摩尔达维亚在塞列特河以东的那部分。这个王国的四分之三被同盟国占领，包括盛产谷物的全部肥沃土地在内。

■33 英国议员诺顿·格里菲思上校迅速破坏了普洛耶什蒂油田，并使之陷于瘫痪；然而这整个战役对于协约国军来说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它把布鲁西洛夫在那年夏天以昂贵代价夺来的战果统统抵消了。与此相比，萨洛尼卡部队解放莫纳斯蒂尔（比托利）的胜利似

乎微不足道，尽管塞尔维亚人由于打回到祖国的一角而士气大振。

1916年11月21日，奥匈帝国皇帝弗兰西斯·约瑟夫去世，终年八十七岁，再过十一天就是他登基六十八周年纪念日。虽然他直到去世前那天晚上仍在伏案工作，却早已不再主动过问政事，而把决定权交给总参谋长孔拉特或匈牙利的真正主宰蒂萨·伊什特万伯爵。弗兰西斯·约瑟夫是由于王朝制度与民族原则的一场冲突而在1848年被捧上帝位的，但他始终未能解决这一冲突；然而，他个人的长寿却使二元君主国的虚弱结构具有稳定的假象。他毕竟是这个君主国唯一受人崇敬的显赫人物，他一死，人们肯定会提出从根本上改变帝国性质的要求，当然不会再因崇敬这位象征团结的君主而继续默不作声。

新的君主是弗兰西斯·约瑟夫的侄孙查理；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二十九岁的青年继承了他叔父——遇刺身亡的弗兰西斯·斐迪南大公——的很多政治信仰。他曾私下表露过对克罗地亚人的某些同情，并谴责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沙文主义；他和他的臣民同样厌战。但查理却远没有意识到，他受到叔祖父遗留下的体制的羁绊达到了多么深的程度。要想在和平时期摒弃二元体制就颇为困难，而在战争中实际上更无可能。匈牙利的友好至关重要，因为只有匈牙利才能缓和维也纳以及工业地区的食物匮乏（这在那年冬季由于同罗马尼亚关系破裂而变得异常尖锐）。蒂萨坚持及早在布达举行加冕典礼，他知道一旦查理宣誓拥护宪法和保持“神圣王冠之国”的领土完整，马扎尔人就能否决对匈牙利王国境内（也许还包括境外）各从属民族所作的让步。加冕典礼及时于12月30日举行，距弗兰西斯·约瑟夫之死还不到六星期。

厌战和不安情绪在君主国内的各民族和各社会阶层当中迅速增长，每当查理途经申布龙和霍夫堡之间的工人区，看到等候施舍 134

面包和汤的长长行列时，他都能敏锐地意识到这一点。行政机构的无能几乎赶上了俄国。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逮捕的人不计其数，全靠压迫进行统治。马扎尔团队在这些行省维持治安，俨如被征服土地上的占领军。查理决心作出某些表示善意的姿态：他任命切尔宁伯爵为外交大臣，此人与皇帝本人一样渴望和平；他委派阿茨·冯·斯特劳森堡为总参谋长，以代替对斯拉夫人无比憎恨的孔拉特；他在1917年5月召开了奥地利议会，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这还是第一次；同月，他发现蒂萨不会同意扩大匈牙利人的公民权，便免去其布达佩斯政府首脑的职务。最重要的是，查理通过其内兄波旁-帕尔马的西克斯图斯亲王向协约国试探议和。但查理既打算抛弃其德国伙伴，又无足够力量劝使后者接受妥协性的和约。与法国人的频繁接触使协约国迟迟没有公开坚持要君主国解体，但谈判却因头绪过于纷乱而毫无成果；一年后，克雷孟梭在大发雷霆时泄露了双方曾进行过多次谈判，于是这位年轻的皇帝虽然仍想兢兢业业地为他的那个盟国效忠，但在对方眼中却已信誉扫地。

5月末召开的帝国议会(奥地利议会)清楚地表明了斯拉夫各民族的不满；有保守传统的波兰议员的态度变化特别显著。弗兰西斯·约瑟夫上年11月的最后行动之一，是同意德军统帅部发表的一份宣言，宣言规定建立一个“实行世袭君主制度，具有成文宪法”的波兰王国，并与两个同盟国(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结在一起。这个王国未来的疆界一直未定，因为建立王国的背景主要是为了给同盟国提供一支波兰军队，过早地讨论疆界会不利于征召新兵。但帝国议会一召开，波兰俱乐部的成员便毫不踌躇地要求这个新国家必须完全独立和统一，并确保在波罗的海有个出海口。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纲领，意味着以割让加利西亚和克拉科夫作为最低限度的让步。

维也纳议会中的捷克代表也同样直言不讳：君主国必须转变为“自由平等的国家所构成的联邦”，其中之一应该明确规定由捷克斯洛伐克人组成。斯洛文尼亚教士安通·科罗舍茨所领导的南部斯拉夫代表们组成了一个“南斯拉夫俱乐部”，发表声明要求使君主国境内所有的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联合成为一个哈布斯堡保护下的自治实体。当时，查理无法满足其中135的任何要求，但为了对斯拉夫人进一步作出友好姿态，他把一些定有叛国罪的捷克人释放出狱，其中有亲俄分子克拉玛什。切尔宁忧郁地察觉，由于地区性集团联合成为政治俱乐部，那些宿敌又把忠诚二字歪曲到无以复加的地步，1917年的帝国议会已开始酷似1789年的法国的三级会议；而看到这位皇帝既顽固，又软弱，还一味调和妥协，活像当年的法王路易十六，也委实令人惶恐不安。

在那年的和煦春风之中，确有一股革命变革的气息。3月初，俄国的罗曼诺夫王朝彻底垮台，随之而迅速明朗化的是：如果临时政府继续不把“面包与和平”给予彼得格勒和其他大城市的人民，它的权威也免不了要受到挑战。但是，尽管俄国的人民大众本身不久就看透了利沃夫大公和克伦斯基所扮演的滑稽戏而幻想破灭，这个古老专制帝国的覆亡却马上被看成是沙皇帝国的从属民族要求获得承认和解放的斗争的重大胜利。临时政府对联邦化深信不疑，它成立不到两星期就向波兰人发表宣言，应允建立“一个独立的波兰国”，其中将包括波兰人占居民大多数的所有行省。这种让步比同盟国的任何诺言都进了一步，但因为这些疆土多半还被敌军占领，所以这种建议大都仍属学究式的空谈。接着，临时政府又向芬兰人和爱沙尼亚人作出友好姿态，并承认乌克兰议会，尽管这一异常行动在彼得格勒激起巨大愤慨，从而导致临时政府分裂，促使克伦斯基立即取代利沃夫大公出任总理。但与此同时，俄国人

也充分支持捷克斯洛伐克人运动，允许马萨利克组织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在基辅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的讲话中，马萨利克首次公开宣布有必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136 1917年整个夏天，波兰事务始终处于极端混乱之中。毕苏茨基的波兰军团已经与同盟国并肩作战，他本人是德奥两国联合倡建的王国政府的前身华沙国家委员会的成员之一。然而，7月4日法国在西线宣布组成一个波兰军团，与协约国配合在西线作战；十天之后，在彼得格勒又成立了一个波兰最高军队委员会，也宣誓忠于协约国。其时，作为波兰国民民主党领袖的罗曼·德莫夫斯基正在伦敦与“新欧洲”周刊集团进行合作；钢琴大师帕戴赖夫斯基则对在美国的波兰移民施加影响；而一个自称具有流亡政府地位的波兰国民委员会也在瑞士建立。这个委员会不久就迁往巴黎，由德莫夫斯基任主席，帕戴赖夫斯基任驻美国代表，在那年秋季得到所有主要协约国的承认。俄国临时政府发表的宣言以及美国在1917年4月参加对德作战，迫使毕苏茨基重新斟酌其政策，他决定该是与同盟国决裂的时候了。1917年7月他被德国占领当局逮捕，监禁在普鲁士的城堡中，直至战争结束。毕苏茨基的行为几乎等于叛国，哪个政府也不会允许他继续自由；但他在自己的同胞中威信很高，把他监禁起来实际上就宣告了奥、德想与波兰人和解的一切企图统统失败了。因此，虽然那年年末一个由摄政理事会领导的波兰傀儡政府在华沙正式成立，波兰人民却日益转而寄希望于协约国及其美国战友。

毕苏茨基并不是在那年夏天狡黠地见风转舵的唯一的民族领袖。摄政王亚历山大及其首相帕西奇，长期以来就依靠沙皇俄国和居于东正教最高统治地位的那些教友的保护；俄国的第一次革命使他们在政治上一度陷于孤立，这时塞尔维亚统帅部也已发生严重分歧，黑手党运动的残余分子又重新活跃起来。因此，帕

西奇决定用两个办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一是诬告别人密谋作乱，并在军事法庭上施展种种严重不法手段，从而得以在军队中肃清黑手党的影响；一是与特鲁姆比奇及南斯拉夫委员会接触，从而得到了向谋求脱离奥匈帝国的民族集团故作姿态的机会。帕西奇这种向西方的流亡者献殷勤的政策并未完全成功，因为在萨洛尼卡审讯和处决“阿皮斯”迪米特里耶维奇上校的那种冷酷无情的做法，在颇有影响的“新欧洲”集团内激起了义愤。然而，与南斯拉夫委员会达成的协议——名为“科孚协定”——确实对君主国境内南部斯拉夫人的情绪以及在美国的南斯拉夫移民团体的态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这个经过为时五星期的谈判于7月20日签订的协定，规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在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统治下联合起来，享有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的种种保障，以及“按照民族、社会、经济等条件实行的地方自治”。各地区相互之间以及与中央政府之间的确切关系则悬而未决；所有这些问题都留待由不记名投票普选选出的制宪议会在适当的时候加以解决。 137

值得注意的是苏皮洛(他在几星期后死去)研究了科孚协定的条款后竟然辞去他在南斯拉夫委员会中的职务，他担心特鲁姆比奇由于遭受帕西奇愚弄而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举手投降。就当时来看，即使协定在性质上有严重缺陷，苏皮洛的悲观似乎仍嫌过分。由于委员会及其主席特伦比奇都不具备任何法定地位，按照国际法，他们的协定在法律上并无约束力；但它却显然给塞尔维亚政府加上了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必须为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而不是为建立“大塞尔维亚”而努力。特鲁姆比奇本人通过萨格勒布大学校长巴拉茨博士与奥匈帝国内的克罗地亚人一直保持着联系，后者于9月初同他在洛桑秘密会晤，并向他保证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的政治领袖们，甚至拉迪奇，都普遍支持他。门的内哥罗民族委员会也对协定表示赞同，该委员会是在奥地利人占领那个山地王国

后在巴黎成立的。然而特鲁姆比奇及其同事们都深知帕西奇还是宁愿要一个由贝尔格莱德控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而不是要一个真正的联邦。协定力图以含糊的措辞来掩饰观点上的种种明显分歧，是两次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大部分悲剧的一种预兆。

较之八个月前沙皇帝国的崩溃，1917年11月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在军事上和意识形态上都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这意味着东线的全部战斗以及罗马尼亚人在摩尔达维亚的抵抗从此结束，并造成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列宁认为敌对帝国主义之间的这场冲突，有可能转变为内战；内战一旦发生，不仅波及前沙皇俄国的全部领土，而且会把整个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统统卷入；它也曾为新的世界秩序提出一种激进的基础，从而激励了自由民主战士公开宣布他们自己对于将以不同方式消除各民族之间未来的战争所抱的信念。

12月15日，俄国人与同盟国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签订停战协定。一星期后，在该地开始为达成正式和约进行谈判。1918年2月末，布尔什维克拒绝接受对方指令的解决方案，谈判破裂；而几天之后，当德军深入乌克兰并沿波罗的海海岸进军到距离彼得格勒不足五十英里时，谈判又匆匆恢复。3月3日签订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要求俄国放弃波兰、波罗的海沿岸诸省、芬兰、比萨拉比亚、乌克兰和高加索。布尔什维克因此几乎丧失了自彼得大帝登基以来历代沙皇为帝国所扩充的全部土地。德国和奥地利占领的所有疆土，都要置于由军事当局强行规定的并在一项补充条约中经俄国明确认可的经济管制之下。宣布乌克兰为一个单独的独立国，由前沙皇将军斯科罗帕茨基组织政府；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分子，打着不同的招牌，对东加利西亚和罗塞尼亚产生了野心，颇为奥地利人及其在华沙所保护的波兰人所嫌恶。但是，由于斯科

罗帕茨基的权威全仗德、奥的枪杆子撑腰，这个乌克兰国对创造它的两个国家倒没什么麻烦。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所得到的自由，就更有名无实了。

罗马尼亚军队在布加勒斯特陷落后的十一个月中，一直英勇奋战；俄国的停战把他们隔绝开了，只好在1918年5月7日单独媾和。同盟国给它规定的条件还是比较宽大的：多布罗加南部归还保加利亚，特兰西瓦尼亚的边界稍有调整，罗马尼亚本身却获允从俄国的破碎河山中割得比萨拉比亚。只是经济管制有些不胜负担。罗马尼亚议会始终没有批准这个条约，在签约六个月后，德国及其盟国全面崩溃，一切条款也就随之无效。然而，罗马尼亚人居然设法在最终解决时保住了比萨拉比亚。

从革命最初的日子起，列宁和苏联人已明确表示，他们相信一切民族都有完满实现民族自决的权利；他们寻求一种“不兼并领土的和平”。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谈判——以及，就此而言，早期红军在基辅、芬兰和爱沙尼亚的活动——都表明，现实可能远远达不到这一理想。但这样的启示在一个普遍厌战的世界中的宣传价值却也非同小可，中东欧的许多社会主义集团都准备为实现这一列宁主义纲领而献身，虽然其中有些人在战争初期曾经是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移的人为数仍然很少，但有经验的宣传鼓动家却总是能在那些并不希望改变社会制度的公众中立即获得响应。例如，1918年2月1日，停泊在科托尔的奥匈舰队的四十艘战舰上发生兵变，领头的是在旗舰下层甲板上干活的两个捷克社会主义者。然而，尽管追随他们的水手在哗变时打着红旗，喊着布尔什维克的口号，哗变者的许多要求却只是重复威尔逊总统的历次讲话，他们的主要政治愿望丝毫不比维也纳帝国议会中各斯拉夫集团的纲领——结束战争，承认真正的民族自治——更左。1918年春，随着大批战俘从俄国遣返，共产党人的骚

139

动迅速蔓延开来：5月间，驻扎在施蒂里亚西部的斯洛文尼亚部队，卢布尔雅那的罗塞尼亚人，还有在波希米亚的龙布尔克而与萨克森接壤的苏台德边界的捷克人，先后都发生过哗变。所有这些骚动都是为了争取食物、和平及民族自决而示威；斗争的锋芒都指向倚仗哈布斯堡王朝以维护自身特权的上层阶级，它们对社会所起的分裂作用也就仅限于这一方面。对于君主国境内的斯拉夫各族人民和罗马尼亚人，国家的统一和独立在当时要比社会平等主义更富于号召力；而匈牙利人即使在革命过程中，政治上也比较保守。有意义的是，负责训练旅居莫斯科的外国共产党人的第一所“学校”于5月建立时，主持学校的不是斯拉夫人，甚至也不是德国人，而是在匈牙利出生的库恩·贝洛！

1918年1月8日，正当托洛茨基力劝协约国与俄国一同坐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会议桌上来的时候，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向美国国会发表了他的著名讲话，列举“十四点”作为争取和平的“唯一可能的纲领”。这位总统讲话的原意是，从道义上对布尔什维克立即结束一切战斗的动人呼吁进行反击。其后，这一讲话自然就在欧洲各国人民中受到热烈欢迎，被奉为争取自由的基本宪章。然而，虽然当时很多人都同意威尔逊总的看法，但他的一些具体建议除在英语国家以外拥护的人寥寥无几；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些自由民主主义者不仅感到失望，而且觉得确实是被他们所选中的先知出卖了。第十三点建议建立一个“拥有自由、安全的出海通道”的独立的波兰，受到了各协约国政府的一致欢迎，但第九、十、十一各点却并不符合它们的期望。关于根据民族界线来调整意大利边界的诺言，在罗马被理解为对伦敦条约的否定；前不久，这个条约的条款已经披露在布尔什维克的报纸上，虽然西方报刊因受新闻检查的限制而未能广为宣传。在第十一点中没有提到南斯拉夫的统一，只不过说要从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撤出敌军，并给塞尔维亚

(和波兰一样)以出海通道。然而,引起最大忧虑的则是第十点,因为这位总统尽管曾在四星期前劝使国会向君主国宣战,他却在这一点中保证给予奥匈各族人民以“最大程度的自由机会来发展自治”,显然是设想这个哈布斯堡国家要新的世界秩序中继续存在。由于劳合-乔治^①在1月5日向英国工会所作的一次讲话里甚至比威尔逊走得更远,他明确宣称奥匈帝国的解体并非协约国的战争目的之一,“新欧洲”集团以及流亡者建立的各个委员会因而发起一场运动,强烈抗议这两个国家的政策声明。 140

总统和首相之所以不愿让哈布斯堡君主国退出历史舞台,部分是由于错误地估计了中欧的民族问题,但也由于受到了奥匈帝国有可能同意单独媾和这一希望的影响,因为那年冬季查理皇帝至少通过四个中间人分别与协约国及美国频频接触。然而到1918年春,官方态度却大有改变: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罢工浪潮似乎证实,马萨利克和贝奈斯所经常宣称的捷克各族人民忠于协约国事业这一点并非虚言,而由于克雷孟梭部分地透露了和谈情况以及随后奥匈帝国与德国之间加紧了政治和军事联系,劝使君主国退出战争的可能性也就减少了。其实早在2月底,英国内阁就授权宣传人员发动一场鼓励各从属民族起而反抗的运动。4月的第二星期,罗马的“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发表宣言,主张在战争结束时建立“一些完全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一行动有它特殊的重要意义,因为代表大会得到了意大利政府的支持,而在这以前,这个政府却从来也不愿意支持任何有可能鼓舞南部斯拉夫人的理想的纲领。这的确是一次令人难以忘怀的盛会:议会大厅内,与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各委员会的代表、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派来的发言人以及塞尔维亚议会议员联席并坐的有威克姆·斯蒂

^① 劳合-乔治(Lloyd George, 1863-1945),英国自由党政治家,曾任首相。
——译者

德、R.W.塞顿·沃森这样一些时事评论家和许多意大利政治家，包括当时还鲜为人知的某报编辑贝尼托·墨索里尼。

马萨利克于1918年4月底到达旧金山后，这年夏天捷克斯洛伐克人的事业在美国有了迅猛进展，因为这位布拉格的前任教授与现为白宫主人的前普林斯顿教授之间早有私交。马萨利克能向国务院提供的关于中欧状况的情报，要比国务院自己研究所发现的更为详细。他毋需使威尔逊转而相信民族自决，只须向他证明，单靠在哈布斯堡庇护下发展自治并不能充分保障各从属民族的权益。马萨利克凭借其重新提出的并为所有美国政治哲学家所珍视的契约论，便能论证：由于哈布斯堡家族是被推选登上波希米亚王位的王朝，他们竟从事违反捷克人民利益的战争，就使自己丧失了141 在布拉格的统治权。而令那些对学术兴趣不怎么浓厚的美国人更为感动的则是在俄国的捷克军团的英雄业绩，他们为了继续对同盟国作战，硬是从西伯利亚杀出一条血路，不惜跋涉五千英里，这充分证明他们的民族感情何等深厚。

马萨利克在最终停战以前一直逗留美国，他也曾同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的移民团体进行接触：在5月30日签订的所谓“匹兹堡协定”中，他同意斯洛伐克与捷克诸行省联合之后，应享有自治权；在与罗塞尼亚人进行长时间的谈判以后，他也通过10月26日签订的“费拉德尔菲亚协定”应允给予他们同样的权益。无论是“匹兹堡协定”还是“费拉德尔菲亚协定”，对于以后的任何一届布拉格政府在法律上都没有约束力，因为它们是与美国公民而不是与仍居留欧洲的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的代表缔结的；然而，正如签订科孚协定之后的帕西奇，马萨利克也已承担一种道义上的责任：在解放后把这些声明交由各民族委派的代表来讨论。毫无疑问，马萨利克愿意同在美国的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共商国是这一点，也使威尔逊增长了对捷克斯洛伐克行动纲领的同情。

9月3日，美国正式承认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为参战友邦的政府，而法国直到五星期之后才承认委员会的这种地位（虽然英国在8月9日就已承认该委员会是“日后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目前的受托管理人”）。

尽管许多从东线返回的部队发生哗变，沿皮亚韦河与意大利军队对峙的奥匈军队直到1918年晚夏仍不失为一支纪律严明的劲旅。近在1917年10月，它还曾在德军支援下一度大捷，迫使意军在混乱中从卡波莱多溃退，整个战争过程中，意大利人与克罗地亚人之间的传统仇恨，保证了在这一战线作战的南部斯拉夫人各团队对奥匈帝国的高度忠诚；战功卓著的哈布斯堡指挥官之一斯韦托扎尔·博罗耶维奇元帅，实际是个来自旧时“边区”的塞尔维亚人，他的家族曾世代代为皇帝作战。然而，国内的动荡不宁逐渐使作为军事工具的军队战斗力减弱。6月间，正当统帅部策划突破意大利防线的最后一次攻势时，不少于七个师的兵力却被抽调去维持国内治安。尽管战斗力削弱，奥地利人还是照样在6月15日发起攻击，结果，损失十五万人而所获无几。当晚，查理皇帝闻悉未能突破意大利防线，终于确信失败已成定局；尽管他在随后几个月中曾多次指示不惜一切代价，试图拼死维护君主国的完整，却意识到自己尽其所能，也不足以与流亡国外的各民族委员会富于说服力的呼吁相抗衡。在君主国本土内，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波兰人、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代表会议公然准备脱离；在匈牙利，一直与协约国友好的卡罗利·米哈伊伯爵则在怂恿“独立党”中他的那一翼带头断绝与维也纳的一切联系，以便匈牙利与协约国单独缔结和约。意大利战线各团队士气开始低落，又因开小差而一再减员。9月14日，奥匈帝国外交大臣布里安伯爵向威尔逊建议举行非正式和谈，但遭拒绝；这位总统此时已决计要取得“军

事上的决定性胜利”。

保加利亚人民也已极度厌战。在战斗时断时续的六年中，保加利亚伤亡人数的比例较之德国或法国都大；而它在领土方面的所得看来却微不足道。国家经济受到德国工业联合企业的剥削；而且由于缺少强劳力在田间耕作，特别是由于1917年农业歉收成，饥馑迫在眉睫。军队在马其顿战绩良好，特别是1917年4、5月间，多伊兰湖附近的英军两次夜袭保军阵地，而保军抵抗之顽强一如当年法军之在凡尔登，致使英军伤亡总数达五千人以上。但在1918年6月，因为左翼政党以革命相威胁，斐迪南国王免去亲德首相瓦西耳·拉多斯拉沃夫的职务，任命同情协约国的温和派民主党人亚历山大·马林诺夫接替。马林诺夫原来打算着手进行和谈，因受到保加利亚统帅部阻挠而未能实现；他却组织了一种较为公平的面包配给制度，因此暂时使某些最危险的动乱才平息下来。

马其顿的英、法两国指挥官都知道，如果发动一次坚决而又持续的攻势，必将产生“有过于局部的影响”，但各协约国政府，特别是英国，却长期不肯同意当西线正进行重大战斗之际，又在一个遥远的战区采取军事行动。1918年6月17日，弗朗舍·德斯佩雷将军在萨洛尼卡就任“协约国东方部队”总司令，他雄心勃勃地打算从马其顿一直进军到匈牙利平原以至更远的地方。但直到9月4日，也就是他希望发起攻势的前十一天，劳合-乔治才批准英军参加进攻。伦敦对打败土耳其，比对战胜保加利亚或奥匈军队更感兴趣；在随后的战斗中，弗朗舍·德斯佩雷得以放手率军深入中欧，其交换条件是允许萨洛尼卡的英国部队挥戈东向直扑君士坦丁堡。这种各自进入特定地区作战的战略分工，在达成战后解决办法的那些年月里产生了重要后果：这种办法与艾伦比在巴勒斯坦所获得的成功，一同保证了英国得以在东地中海及黎凡特采取

积极的政策；也同样确保法国将负责守护多瑙河，从布拉迪斯拉发直至黑海。

法国师、英国师、塞尔维亚师、希腊师和意大利师共同发起的这场马其顿攻势空前大捷。保加利亚人没过十一天就请求停战，9月29日至30日夜在萨洛尼卡签订停战协定。七星期之内，塞尔维亚军队沿着瓦尔达尔河—摩拉瓦河这条路线迅速打回贝尔格莱德。与此同时，他们的法国盟军，如弗朗舍·德斯佩雷在报告中所说，“向维也纳进军，从1809年以来这还是头一次”，这种说法乃是预期式的夸张（实际上，大军距奥地利国都尚有三三百英里之遥）。

其时，沿皮亚韦河以意军为主的部队已于10月24日转入攻势。经过七天的浴血苦战，奥军的防线于10月30日在维托里奥威尼托被突破；两天后，奥匈总参谋部的代表与意军指挥官在帕多瓦会晤，商谈停战条件。意大利战线的战斗11月3日终止。由于土耳其已于10月30日在穆德罗斯签订停战协议，同盟国中只剩下德国仍在孤军作战。随着来自萨洛尼卡方面的英军攻占保加利亚，协约国军队开进了多瑙河下游的鲁塞；而由于他们已到达布加勒斯特以南仅四十英里处，这就促使罗马尼亚于11月9日再次对德宣战，尽管该王国的大部分领土此时还被马肯森的部队占领着。11月11日，西线的军事活动随着德军的停火而告结束；但在整个中欧，含有外交家意图的部队调动却一直持续了很久。

忧虑重重的秋季过去以后，接着又来了一个饥肠辘辘的寒冬；伴随着季节的交替，政治变革之迅猛甚至超过了协约国军队的快速调动。大战在最后一星期中已经变得不那么像是一场“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而是各地区起义领袖们竞相争取国际承认的一场普遍搏斗。有些临时政权在混乱中不过存在了几天；另一些

144 则在发表了往往未曾实现的意图声明后便并入较大的山头；只有少数几个成为带动新欧洲政治制度发展的核心力量。与此同时，整个中欧和东南欧的革命形势较之 1848 年更为复杂；这不仅是由于现存的民族国家和流亡者委员会所引发的离心力，而且还由于被征服者和胜利者都对一位美国总统发表的见解无比尊重。这位总统从未访问过他们的国家，而且对这片土地缺乏专门知识，这反倒被看作是他之所以不偏不倚的一种保证。

保加利亚当前的困扰轻而易举地得到了解决，但这种轻易却是靠不住的。9 月 27 日，在小小的工业城镇腊多米尔宣布成立一个共和国，由农民领袖斯塔姆博利斯基任总统，然后一万五千名左右的叛变士兵进军索非亚。发生了持续三天的内战，两军在索非亚以南十英里的弗拉达亚大战一场。维护旧制度的一方是普罗托格罗夫将军指挥下的德国炮手、军校士官生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狂热分子。然而，共和主义热情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反叛者首要的是求得和平；萨洛尼卡停战协定的消息传来，他们就纷纷散归各处城镇，共和国从此不复为人所闻。10 月 3 日，斐迪南国王让位于其子博里斯，此人的作战记录无懈可击。前总统斯塔姆博利斯基隐藏十星期之久，六个月后参加联合政府；到 1919 年 10 月，他成为博里斯国王的首相。协约国占领军在街头维持秩序，共产主义思潮席卷城乡各地；新国王忐忑不安地等着瞧他得为他父亲在 1915 年错押的赌注付出多少领土。

波兰的事态更为错综复杂。10 月 7 日，华沙的傀儡政权摄政理事会援引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自决原则，抢先宣布成立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国。但因奥匈帝国业已分崩离析，与之相敌对的政权也在别处崛起：克拉科夫涌现出一个“波兰清算委员会”；卢布林则建立起左翼的“波兰共和国临时人民政府”。另一个“乌克兰民族委员会”企图在利沃夫攫取政权；在东加利西亚，波兰人与乌克兰

人之间也大动干戈。此外，由于革命活动在德军各团队中传布开来，波兹南尼亚的城镇中还成立了若干“工人与士兵委员会”。唯一享有威望足以制止无政府状态和统一波兰的是毕苏茨基，可是，他在动乱开始时仍在马格德堡狱中。11月10日，一列德国专车把他送到华沙；尽管他得到卢布林的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并以部长职务分配给他们的领导人，毕苏茨基还是接受了摄政理事会给他的委任，从而确保战时“王国”与新共和国之间法统上的连续性。11月14日，他成为波兰的“国家元首”，如此殊荣以往仅只科希秋什科一人在1793年享有过。又过了三个月，毕苏茨基才与巴黎的德莫夫斯基领导的委员会达成和解，该委员会早已被协约国和美国承认为波兰人民的真正代言人。145

巴黎的“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很久以来就致力于防止与布拉格的独立运动之间出现类似的裂痕；马萨利克逗留美国期间，民族委员会的各项活动由贝奈斯掌管，他与祖国的地下抵抗运动“玛菲阿”^①保持着密切联系。10月25日，布拉格“民族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启程前往瑞士，代表团以克拉玛什为首，他仍然希望实行君主立宪而不赞同建立共和国。奥匈帝国外交部急于想使威尔逊有这样的印象：觉得它对斯拉夫各民族怀有善意，故在代表团赴日内瓦途经维也纳停歇时发给了护照；10月28日，代表团在日内瓦与贝奈斯会晤。就在同一天，布拉格委员会中四个捷克政党的代表共同正式宣布成立“一个独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号召同胞们切莫辜负他们的“解放者马萨利克和威尔逊”的期望。

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行政权顺利而迅速地移交给了捷克人，例外的是苏台德地区的一些城镇，那里的德意志族居民建立起一些民族委员会，直到那年年底，还在谋求与德意志—奥地利保持

^① 玛菲阿(Mafie)，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捷克国内争取脱离奥地利而建立独立国家的一种民族运动的名称。——译者

联系。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亦即布拉格委员会，宣称自己是留在国内的斯洛伐克政治家——与斯洛伐克流亡者相对而言——的代言人，这种说法颇成问题，因为他们5月间才与布拉格的“玛菲阿”建立联系，而且联系是十分脆弱的。再者，截止此时，捷克人与居住在布拉格以东三百五十英里处与世隔绝的山谷中的土著罗塞尼亚人尚未合作。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当时都是匈牙利王国的组成部分，这几星期该王国自身也在经历一场引人瞩目的革命，局势长期混乱。然而，在维也纳，人们对布拉格事态的性质却毫无怀疑；因为早在10月30日，查理的最后一位奥地利首相海因里希·拉马施就准备把民族委员会的一位发言人作为“捷克斯洛伐克国大使”来欢迎。11月14日，在布拉格召开了革命国民议会，选举马萨利克为共和国总统。克拉玛什发现他所主张的过时的君主制度已无人支持，同意在首届政府中任总理，贝奈斯则出任外交部长。

10月17日，老资格的马扎尔领袖蒂萨承认卡罗利·米哈伊
146 伯爵关于战争已告失败的看法是正确的，致使布达佩斯议会大为震惊，匈牙利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三天以后在布达佩斯获悉，威尔逊总统在答复查理提出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缔结和约的建议时表明：“自治”对各从属民族来说，已不复是满足其民族权利的充分保证；美国人对捷克斯洛伐克人和南斯拉夫人承担着义务。对奥匈帝国的这一死刑执行令的全部重要意义，在它的两个首都皆未被人们立即认识，但在匈牙利却明显地增强了卡罗利独立党人的力量。他们的领袖认为，如果匈牙利同德意志—奥地利人决裂并真正实行民主，各民族仍旧宁愿留在一个马扎尔人占大多数的国家里，只要他们能肯定向自治方面发展。10月25日，卡罗利组成了一个“匈牙利民族委员会”——因为这是当时流行的做法。五天之后，国王兼皇帝查理打电话请他执掌新政府，希望能以一个激进的脱离君主国的政府来避免发生内战。而动乱甚至在布达佩斯

也有增无已，愤怒的暴动群众把蒂萨·伊什特万杀死在他自己的寓所里。

卡罗利担任这位国王的首相大约只有二十四小时。接着，经国王批准，他与维也纳断绝一切正式关系，使匈牙利有史以来首次倾向于成立共和国（11月16日，共和国才正式宣布成立）。卡罗利为了表明脱离旧秩序的支配，亲赴贝尔格莱德谋求与弗朗舍·德斯佩雷单独达成停战协议。两人于11月7日相晤，但这次会面并非最愉快的。弗朗舍·德斯佩雷对卡罗利阐述民主原则的冗长发言无动于衷，而那套威尔逊的看法却使他愠怒，因为这位傲慢的法国将军对美国理想主义毫不同情。他通知卡罗利，匈牙利是个战败国，并递给他一份印就的停战条件，据此协约国最高指挥部将占领旧匈牙利王国的整个东部和南部，以及他们可能指定的任何其他战略据点。匈牙利向克雷孟梭致电抗议无效；卡罗利随即以一个总统对另一个总统的身份向白宫请求“援助年轻的匈牙利民主国家”，也无任何反应。

协约国当局的这种态度，使卡罗利想叫持不同意见的各民族都满意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未必有付诸实践的可能。毫无疑问，他撕毁奥匈协议时，还以为自己可以继续保持“神圣王冠之国”的领土完整，但为时已晚。克罗地亚早就决定脱离匈牙利，要保住特兰西瓦尼亚或斯洛伐克的希望也很渺茫。10月12日，特兰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人，由于尤利乌·曼纽精下的领导，在奥拉迪亚建立了自己的民族委员会；10月27日，委员会在阿拉德通过一项赞成自决的庄严声明，并尽快于11月间同布加勒斯特取得联系。10月29日，一个斯洛伐克民族会议在图尔青斯基斯瓦蒂马丁^①举行，在三天讨论中，双方同意发表宣言，声明斯洛伐克人是单一的捷克—斯

^① 此处原文为Turčianský Svätý Martin，前两字似非地名，查三联1973年版《捷克斯洛伐克史纲》同一地名仅为“马丁”（Martin），现暂按原文音译存疑。——译者

洛伐克民族的成员，尽管他们有自由的自决权；而对于来自布达佩斯的卡罗利的“兄弟般的问候”，斯洛伐克政治领袖们的反应相当冷淡。唯一支持卡罗利的地方委员会是在乌日戈罗德^①——罗塞尼亚的一个居民主要为马扎尔人和犹太人的城镇——成立的那一个；然而，它投票赞成在匈牙利共和国内实行自治，却遭到分别在卢博夫纳和胡斯特召开的另外两个“罗塞尼亚人民族委员会”的反对，它们虽然还拿不定主意究竟该怎么办，却已决定不与匈牙利联合。协约国军队的推进使卡罗利从未有机会发觉伏伊伏丁那人民的意愿，但因诺维萨德周围地区一百多年来始终是塞尔维亚文化的一个中心，即使举行自由的公民投票，匈牙利共和国也未必能得到多数票。

南斯拉夫问题根本不同于其他所有的问题：它不仅涉及无处不有的“民族委员会”，而且还包含特鲁姆比奇的“南斯拉夫委员会”与塞尔维亚政府之间的抗衡，后者由于其军队在马其顿赢得惊人战果而洋洋得意；而且由于奥匈海军——1914年在欧洲海域最强大的舰队中名列第四——的恶运，事情更加复杂化。10月29日，克罗地亚议会在萨格勒布正式宣布：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与达尔马提亚、里耶卡（阜姆）一起，是一个独立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民族主权国家”的组成部分。卢布尔雅那、萨拉热窝和其他城市的代表机构，纷纷发表类似的声明，并保证支持萨格勒布的南斯拉夫国民议会，授权它以一个临时政府的资格，负责实行与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联合。该议会以安顿·科罗舍茨为主席，“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斯维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任副主席，10月31日，该议会获得查理皇帝的正式承认。

科罗舍茨随即启程前往日内瓦，然后从那里通知巴黎的特鲁

① 此处原文为 Uzhorod，经查考即 Uzhgorod。——译者

姆比奇，授权南斯拉夫人委员会代表萨格勒布议会与协约国交涉。其时，特鲁姆比奇与帕西奇二人，正就委员会的地位问题进行激烈争吵；帕西奇也在巴黎，由于胜利在望，他已无意信守黑暗的岁月里在科孚岛签订的协定。特鲁姆比奇和帕西奇一路争吵来到日内瓦，与科罗舍茨会谈数日后，11月9日发表一项看来对特鲁姆比奇的大部分要求都有所让步的联合声明：南斯拉夫联邦“自即日起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国家单位”正式组建；在为新机构从事筹备期间，将组成一联合内阁。但帕西奇一回到巴黎立即辞职，并宣布协议无效。148

亚得里亚海北部发生的诸多事件，使解决上述争端愈见迫切。10月31日下午——帕多瓦停战前四天——奥匈舰队总司令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听从维也纳的命令，向在普拉作为萨格勒布国民议会受托人的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交出了主要海军基地及全部战舰。该委员会被主动送上门来的礼物弄得不知所措，就向华盛顿的全球仲裁人拍发无线电报，请求威尔逊总统速派美国海军前来普拉。代之来访的不速之客却是一艘意大利鱼雷艇，它拒不承认舰队已在协约国手中，用鱼雷击沉了停泊的无畏战舰“维里布斯·乌尼蒂斯”号，造成大量伤亡。这一卑怯行径充分证明意大利人根本不容许南斯拉夫人处置这样一支强大舰队；次日，舰队的其余船只入海，沿亚得里亚海向南驶往科孚岛，在那里交给法国人，留待最终分配给各协约国。11月5日，一支意大利特遣部队攻占普拉，并继续占领了伦敦条约许诺给予意大利的伊斯特利亚和达尔马提亚其他据点。

意大利人颇有可能冒险占领斯洛文尼亚首府卢布尔雅那。为了使南斯拉夫人的希望免遭这种打击，萨格勒布的塞尔维亚前卫部队司令杜尚·西莫维奇上校派遣部队进驻斯洛文尼亚；同时，他力促普里比切维奇与贝尔格莱德达成协议，而不理睬日内瓦会谈

破裂后在巴黎举行的进展缓慢的会谈。普里比切维奇要比科罗舍茨或者特鲁姆比奇都更深刻地意识到联合起来阻止意大利人的迫切性，他促使议会通过决议，赞成与塞尔维亚联合而无需日内瓦协议的任何保证条款。12月1日晚，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联合王国在贝尔格莱德正式宣布成立。虽然其后在联合政府中科罗舍茨任副首相，特鲁姆比奇任外交大臣，但在这以前的五星期谈判却使政府大权大半掌握在塞尔维亚政治领袖们手中，这一事态发展对新王国来说是不祥的。

查理皇帝的所有行省几乎都在迅速结出民族委员会的丰硕果实，这时，他除了曾于10月的第四星期去德布勒森、格德勒和布拉迪斯拉发三处作短暂巡视外，一直呆在维也纳。帝国所发表的一项终于允诺在奥地利国土上成立联邦的宣言，已无法使任何人感到满足。但甚至迟至10月20日，当威尔逊总统对“十四点原则”进行了修改的消息传到维也纳时，皇帝还在希望他那残破河山能多少保全一点。只是由于意大利战线军事失利所产生的影响，才使他确信王朝的崩溃已成定局，因为军队是帝国结构赖以维持的柱石。从法律意义上说，查理从未退位。11月11日，他在一张便条上用铅笔签字承认“德意志—奥地利组成一个单独国家的决定”，并放弃“参加这个国家的行政管理”；两天后，他又向来自布达佩斯的密使表示，同样地放弃他在匈牙利的行政职能。最后，他仍不免走上流亡瑞士的道路，但接连好几个星期却还逗留在埃卡尔曹山林的巴洛克式狩猎小屋中，透过马希费尔德薄雾缭绕的一片朦胧，极目凝视远方，而此时皇室的种种标帜则在君主国的一个又一个城市里被人们砍倒。

十分古怪的是，查理放弃君权十天之后，二元君主国的军队某部居然还为他登基二周年隆重举行纪念仪式，全然不知君主国已

经垮台，大战亦告结束。1918年11月21日，在阿尔巴尼亚中部，普夫兰策尔-巴尔廷将军——他的军事生涯直到此时还是温厚平庸无足轻重——在检阅占领军的分列式行进中举手答礼。在大陆上最遥远、最偏僻的山谷里，欧洲最古老王朝的墨黑与金黄二色战旗在作为纪念仪式的检阅中最后一次迎风飘扬。或许这正是那些曾经被奉为神明的人物没落之际的一种适当的衬景吧。

第八章 缔造和平

在德国停战后还不到十星期，战胜的“协约国”二十七个代表团云集法国首都，参加有史以来内容最广泛的一次和会。从法律上看，和会的各次会议，从1919年1月18日到1920年1月21日持续整整十二个月，但是许多问题都拖了更长的时间没有解决，对匈牙利和土耳其的条约等到主要与会者均已离会后方才签订。虽然它的决议通常称为或被骂为“凡尔赛条约”，大多数进行细节谈判的理事会和委员会会议都是在巴黎城内举行的；只是出于象征复仇的原故，才决定对德条约必须于1919年6月28日在那座四面嵌装镜子的大厅里签字；因为这正是不到半个世纪以前俾斯麦曾高声宣布一个帝国诞生的地方。其他一些前敌国举行签署和约仪式的宫殿，则都无今昔悬殊、人世沧桑之感。1919年12月奥地利共和派在一位出身于哈布斯堡皇室的皇后生下法国最伟大的君主的圣日耳曼宫签订和约；两个月后，保加利亚人在纳伊城的蓬帕杜尔夫人^①当年的沙龙里签字。匈牙利人1920年6月在大特里亚农宫签字；次年8月，土耳其人在以生产瓷器著名的塞夫勒市签字。

会议开始时，一些代表正在参照历史上别的一页，指望能找到富有启发性的类似情况。英国外交部已经编成一本关于维也纳会议的手册，满意地看到这两次和平缔造者的聚会之间的差别。在1815年，欧洲的王公贵族会聚一堂，捍卫正统主义的原则，在他们

^① 蓬帕杜尔(Pompadour, 1721—1764)，法国艺术的保护者和路易十五的情妇。
——译者

彼此的属地之间建立政治平衡。用各个行省进行交易，很少考虑当地人民的愿望。与此相反，1919年主要代表中已无世袭的统治者。来到巴黎的唯一国家元首威尔逊总统，由于十二个月前在国会上娓娓动听地阐述其崇高的理想，受到空前尊敬；这一崇高理想所体现的平等的民族自决学说致使正义得以确保，因而令人深感欣慰。但随着和会逐渐深入谈判细节时，伍德罗·威尔逊的理论 151 与划定边界的事务难以一致，便使得这两次国际会议间的区别变得名过其实。为了有效地进行工作，代表们在多数场合不得不召开秘密的委员会而不是在全体会议上“公开达成公开的契约”。为了完成议程上重大复杂的事项，只得委托各理事会对程序加以控制，而这些理事会无可避免地操纵在利害关系既最重大又最复杂的国家手中。和会的组织结构于是很快便开始变得与维也纳会议的核心相类似，唯一重要的区别只在于“四强”的成分：1815年的“四强”是奥地利、俄国、英国和普鲁士；1919年，则是法国、美国、英国和意大利。就一个重要的程序原则来看，甚至可以说维也纳会议显得对未来更为真正关切，因为，在这个会议上，战败的法国还获准以平等地位参加这个欧洲会议；而在巴黎和会上，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要对某条约的条文提出不同意见，却必须在战胜国业已就其性质达成一致意见之后。由于没有中立国的代表或俄国代表出席和会，遂使其后的怨言——认为各项条约是出于对旧秩序所造成的怨恨而强加于新秩序的——更有分量。

置身于新建立的共和德国与新建立的布尔什维克俄国之间的地区，比以往任何时代更为名符其实地成了“夹缝中的国家”。“四强”中没有哪一国在这些交界地区有长远利益，但每一国都匆匆地制订某种政策，以便部分地填补由于旧日的竞争对手消失后造成的权力真空状态。意大利人在参战前的秘密谈判中就已暴露他们对亚得里亚海沿岸一带和巴尔干半岛怀有野心；在巴黎和会上，他

们不愿让步也不妥协。对他们来说，伦敦条约比全部“十四点”的意义还要大得多。鼓舞他们的是加富尔的现实主义，而不是马志尼^①的慷慨大方，他们如此固执，有时竟被排斥于内部理事会之外，但由于他们军事上显然软弱无力，这种侮辱既比较容易落到他们头上而又特别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法国人却有弗朗舍·德斯佩雷的军队驻扎在多瑙河上这一有利条件，尽管这位指挥官表现得专横跋扈。一连几任法国外长对塞尔维亚人、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的维护使他们心甘情愿接受克雷孟梭关于安全的想法，而且就此而言，也接受了巴黎证券交易所的贷款，并与什奈德-克鲁索特（这个企业在1920年也曾短时期与匈牙利发生联系）签订购买武器的合同。最初，法国人对毕苏茨基所领导的波兰迟迟不予支持；1919年3月，他们不再犹豫不决，乃向华沙派出以昂里斯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此人在向巴尔干发动攻势时曾是弗朗舍·德斯佩雷的主要副手。

美国 and 英国较少直接卷入中欧和东欧事务，所以他们的态度比较灵活；但他们的不偏不袒也有明显的限度。美国代表团——团内没有国会两院中的多数党即共和党的任何代言人，记住这点是很重要的——对各个斯拉夫民族都怀有好意。这种同情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意识到美国国内紧密团结的斯拉夫移民选票的力量，却也表明他们真心相信争取民族自决的长期斗争的正义性。美国从未与保加利亚（或者土耳其）交战，威尔逊总统依然对协约国关于解决马其顿和色雷斯问题的建议颇感怀疑。另一方面，劳合-乔治及英国代表团高度敬重维尼齐洛斯治理下的希腊，虽然巴尔干的每一事业在伦敦的小册子作家和时事评论员中都有拥护者，而且都准备向首相建议新地图应如何绘制，但是英国政府

① 马志尼(Mazzini, 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和共和主义者。——译者

和人民除了对法国的阴谋、特别是法国在波兰的阴谋有所怀疑之外，对多瑙河和维斯杜拉河流域则较少关心。内阁中有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无论什么地方有红旗飘扬，他们都极力主张像公牛似的对它猛冲猛撞；他们对颜色的识别能力有时不是太高明的。

俄国的事态不可避免地使四强会议投下了一片阴影，虽然必须承认有一个代表团（即意大利代表团）看来几乎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英法两国都希望整个 1919 年在与布尔什维克分子力战的“白军”将会在俄国“恢复秩序”。英国对武装干涉所承担的义务比起它的同盟国都重，尽管如此，它在俄国北部的伤亡总数还是不到一千人。法国的政策表现得较为精明。起初，法国人听取了流亡巴黎的俄国人（其中包括萨佐诺夫和利沃夫大公）出的主意，后来，由于苏联政府逐渐强大，他们便集中力量建立起一支波兰军队，并沿俄国边境设立一道由对西方友好国家组成的屏障来力图遏制共产主义，这就是克雷孟梭所谓的“有刺的铁丝网幕”。建立纵贯东欧的防线的想法也为威尔逊总统所欢迎；这不仅有助于决定在波兰的政策，也有助于决定在罗马尼亚的政策。

和会的议事规程规定，每个被认可的代表团均有权给“四强”提交一份关于领土要求的声明书，并于适当时机在最高理事会上进行答辩和申述自己的理由。然后，交由五十八个委员会或专门委员会之一去细加审查，之后提出一份报告，原代表团将被召集与理事会再次开会。这种方法有三大缺点：一是烦琐而缓慢；二是就战败国而言，好像法庭的审讯，一味听信原告的证词；三是着重于各代表团团长辩论的才能。有时，一个有经验的辩护者也会由于举止狂暴而不受欢迎，特别是在威尔逊总统面前，罗马尼亚的扬诺尔·布勒蒂亚努即其一例。有时，不太内行的发言人反而出人意料地成功。帕戴赖夫斯基代表波兰提出东加利西亚问题的情况即属此例。精明的人能把要求说得那么突出地合情合理，提出的

保证又那么明显地公正，以致无论理事会成员或者专门委员会的专家们都无法反驳。从事这种辩论，无人能与捷克斯洛伐克的爱德华·贝奈斯相比。但不幸的是，他建议的“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瑞士那样的国家”的理想失之过大，居然就未来许下了他个人力量所无法实现的诺言；于是在后来的年代里，失望的人们免不了要谴责他骗人，这就破坏了按他的政治家才能他原会博得的尊敬。贝奈斯自己也在回忆录里承认，他提交给会议的某些证据相当夸张，容易令人误解。

代表团的组成人员和规模大小当然是各国政府自己的事，虽然全权代表的人数已由和会负责组织工作的秘书处作出规定。大不列颠被允许派出五名全权代表，并率领一个二百零七人的代表团。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以前南斯拉夫国家的正式称呼——有四名全权代表和九十三人组成的代表团。有时，对全权代表的遴选引起一些普遍关注的问题。布勒蒂亚努拒绝让他的政敌塔凯·约内斯库参加代表团，给罗马尼亚的事业造成一个小小的灾难；约内斯库与西方人士接触更多，他甚至曾主动设法解决了由于争夺巴纳特这块土地而提出的对立要求所造成的一些问题。应亚历山大摄政王再三要求率领南斯拉夫代表团参加和会的帕西奇（部分原因是摄政王要使他离开贝尔格莱德）也和布勒蒂亚努一样固执：起初，他拒不同意克罗地亚的特鲁姆比奇作为全权代表或以外交部长的身份出席和会，这两个水火不相容的人物在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关系很坏。只因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米兰科·维斯尼奇善于调解，南斯拉夫代表团才能保持团结。米兰科·维斯尼奇在法国和美国都有很有影响的社会关系，他的妻子是一位美国有财产可以继承的富家女。

其他民族集团也有种种要求，或要大会听取，或至少要对他们的未来发展负责的国家代表团向大会提出，因而造成更加严重的

问题。斯洛伐克人民党的领导人和缔造者格林卡阁下来到巴黎，向和会递交了一份请愿书，要求自治或在斯洛伐克举行公民投票。但法国警察发现，他和他的主要政治助手——另一位斯洛伐克神父贾赫利奇卡博士的护照都不符合规定手续，两人都被送回布拉格，他们抱怨说捷克代表团煽动法国当局进行干涉；官方的“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专门委员会”没有收到斯洛伐克人民党的任何请愿书。克罗地亚农民党领导人拉迪奇连巴黎也没有走到，他还没有来得及写完准备提交大会其极力要求在克罗地亚建立农民共和国的备忘录就在萨格勒布被捕。他的呼吁书被人篡改，传到意大利代表团手中，被用作一宗有点蠢笨的宣传武器以攻击帕西奇和特鲁姆比奇。第三个民族集团即苏台德的德意志人，以往坚持要求把他们当作“德意志—奥地利人”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他们的领导人以战败国奥地利代表团成员的身份来到巴黎接受而不是谈判圣日耳曼条约。回顾起来，无论怎么解释，威尔逊关于民族自决的保证与这些事态都是不相符合的。

会议外，还有一些带着荒谬要求的有抱负的哀求者以及一帮下流社会的土匪行为，这是对真诚的和平缔造者们的嘲弄。克雷孟梭和维尼齐洛斯都遇刺受伤；而那个古怪的老牌阴谋家艾沙特·帕夏则被暗杀在巴黎街头，此人一度是土耳其将军，此时，他自封为一个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总统，但和会拒绝与之打交道；杀他的人是另外几个阿尔巴尼亚政府之一的支持者；这帮人都既不代表任何人，也无任何人代表他们参加和会。

门的内哥罗国王尼基塔警卫森严地出现在毛里斯旅馆，造成了更加令人尴尬的局面。他从1860年起就统治门的内哥罗，在庆祝他登基五十周年时从大公晋升为国王。他是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统治者的岳父。1916年奥地利入侵时，他的行为可疑，虽然因此丢了面子，却仍受人欢迎。波德戈里察的一个国民议会已经投票

废黜国王，决定把门的内哥罗与塞尔维亚合并起来，他却声称，他的“首相”约万·普拉门纳茨有权作为一名协约国代表出席会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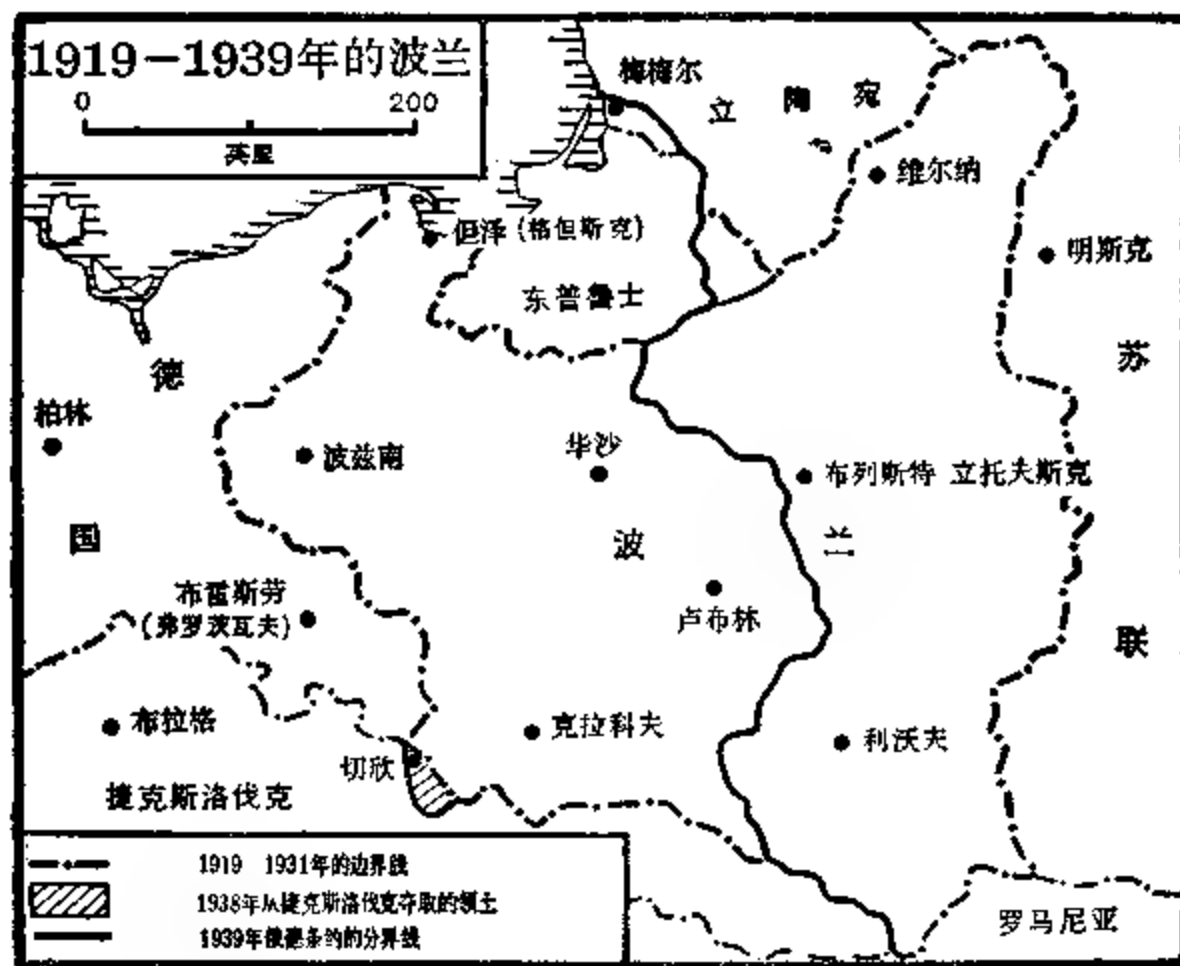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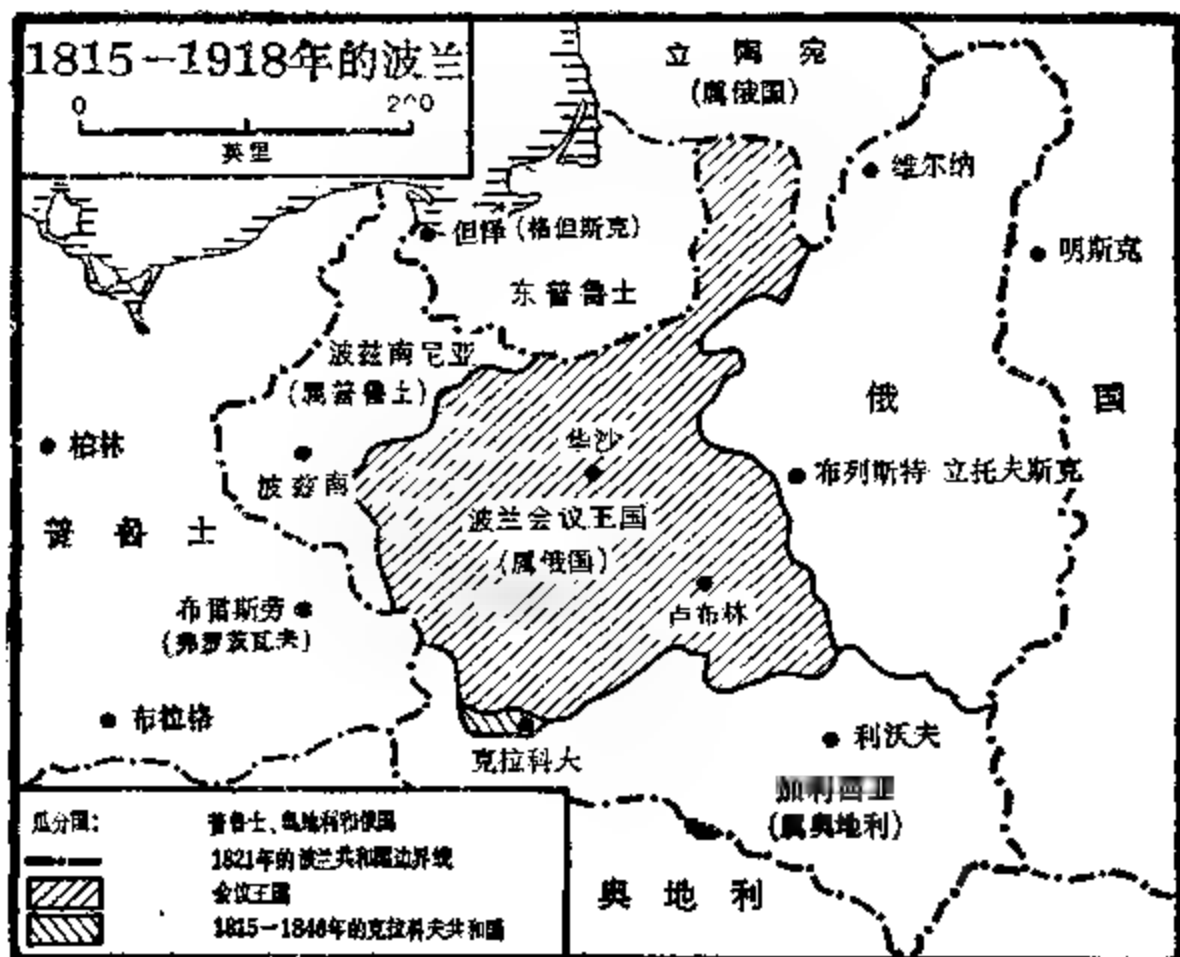
155 意大利代表团支持尼基塔的论点，从巴黎足足派了三个实地调查团去门的内哥罗，它们报告说，虽然波德戈里察议会公然挤满了塞尔维亚人，门的内哥罗人毫无疑问渴望加入南斯拉夫国家。和会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在桌子后面放了一把镀金交椅，还用一张白卡片标着“门的内哥罗”字样，礼仪无缺，给人造成一种有他们的代表席位的幻觉。但椅子一直空着，门的内哥罗人的利益由南斯拉夫代表团里两位较次要的成员来维护。尼基塔本人继续住在巴黎，靠一笔法国年金过活，直到1921年3月逝世时为止。

这些程序和代表权问题并非鸡毛蒜皮，因为就连它们偶然的荒谬之处也都掩盖着某些重要的原则性问题；可是，对于主要的争端来说，它们又基本上属于枝节问题。从根本上讲，和会面临三大艰巨任务：既要实现战时秘密条约所许诺的领土扩张，又要顾全其他国家的合法利益；既要使划定国界在贸易和国防上合情合理，又要不把当地人民当作“奴隶或棋盘上的卒子”来处理；既要贯彻在巴黎作出的决定，又要应付当地狂热分子与此相抵触的武断行为。对阿拉伯土地和中国山东所签订的秘密协定超出了本书的范围，与俄国就君士坦丁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所做的交易已因布尔什维克革命而失效。与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签订的条约造成整个会议的尴尬局面和一再拖延，今后还长期引起磨擦。特别是因为美国从来不曾参与这些条约，而威尔逊总统对条约的存在本身就十分厌恶。调和各个种族的要求的问题，以及把这些要求按经济及战略考虑加以平衡的问题，在中欧和东欧特别尖锐。对于这种情况，和会都是根据专门委员会提供的证据做出决定以求公正解决，但不可避免地趋向于假定协约国或新成立的国家是无

辜的，而不是假定某一过去的敌国是无罪的。如果提出要求的双方都是可爱的人儿，决定便经常表现出所罗门式的不计一切的现实主义：把山谷里的农场与山坡上的草地、村庄与市场、乃至城镇与城镇工人阶级宿舍所在的郊区分隔开。正规的武装部队或辅助部队所力求不审而判决的正是这类性质的一些争端，而且有时是解决得相当成功的。

这类争端把条约的签订拖延了许多个月，不足为怪，有些问题留待以后的大使级会议或国际联盟决定，少数几个问题则通过艰苦的双边谈判方告解决。因此，五项巴黎和约本身并不构成和平解决办法。好几次发生这种情况：会议上划定的政治边界，有几段划得清清楚楚，其他地方的几段则不甚确切。这种绘制地图标准不同的最重要的例子在波兰，因为虽然和会清楚地意识到它对位于西方的前德国领土的责任，但它认为要分配曾经属于俄国的领土却超过了它的权限，所以只满足于提出建议（而这些建议几乎总是不被理睬）。只要波兰认为自己与布尔什维克俄国处于交战状态，东部边界便仍未确定。这反过来也拖延了对奥地利过去在东南部的属地、特别是加利西亚的最后解决。 156

经过英法两国间长时期的争论后，波兰西部边界终于在凡尔赛条约中划定。波兰人得到了他们向德国要求的大部分土地：即波兹南尼亚、波美拉尼亚和一条通向波罗的海而把东普鲁士与德国分隔开的走廊。同意在东普鲁士边境的两个小地区马伦沃德和阿伦施泰因举行公民投票，1920年7月如期投票，结果由百分之九十六点五的居民投票支持德国，两地留归东普鲁士。因为但泽的大多数居民都是德意志人，英国代表团坚持这个港口成为国联管辖下的自由市，通过关税联盟与波兰联系在一起，它的对外关系由波兰人负责。当1919年5月初把这些条款交给德国代表团时，激起极大的愤慨。波兹南尼亚实际上等于是普鲁士的军官养



成所，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诞生于波兹南，德国最高指挥部甚至考虑废除停战协定，在东方重开战端；后来德国还是放弃了这种无异于自杀的行动，而理智地提出抗议。协约国虽未就波兹南尼亚作任何变动，却同意上西里西亚的这个大工业区的命运应通过公民投票解决。尽管如此，在东普鲁士边界上主要为农村的地区和一个矿区的各城镇举行公平的公民投票这二者之间却有很大差别，特别是由于当地的波兰狂热分子三次起义企图以此作为解决问题的捷径。1921年5月举行投票，多数人支持德国，但一些地区也表现出强烈的亲波情绪。协约国专门委员会把这一整个问题提交国联，后来终于在1922年春决定把该地区分给这两个争夺它的国家，由一个国际仲裁法庭在十五年内照管它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这块被争夺的土地的四分之三划分给德国，但六十七个煤矿中有五十三个座落在划分给波兰的地区内。这绝不是个理想的解决办法，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及其余波使它（彻底）无效。 158

南方新划定的波兰边界，全线通过从前奥匈帝国的一部分领土，亦即根据圣日耳曼和特里亚农条约而交出的领土。实际上，这些分界线的划定都得依靠与捷克斯洛伐克人达成一致意见，除了东加利西亚和罗马尼亚人占领的布科维纳的九十英里分界线以外，捷克斯洛伐克沿着波兰的整个南部边界与波兰为邻。波捷关系起初十分友好，因为当老的君主国分崩离析之时，两个民族都成立了委员会。按一条据说是根据种族划定的粗略的现成的边界，各自控制着自己的一侧。后来，在斯洛伐克的奥拉瓦和斯皮什两个小县——即整整一百五十年前，对波兰进行瓜分开始之处——情况紧张；但最严重的冲突还是在切欣公爵领地内，它恰好位于上西里西亚的德波二国争夺的地区正南面。

一份奥地利语言调查表明，1910年公爵领地的居民中波兰人

约占百分之五十五，捷克人占百分之二十七，德国人占百分之十八。捷克人要求得到切欣是由于那里有煤田，而且它横跨在连接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的几条铁路之一的位置上。波兰人则以民族和经济方面的理由提出要求。两个民族都不打算等待和会的决定，也不同意举行公民投票。1918年12月，波兰人宣布在他们的占领区为设在华沙的议会选举代表，捷克人的反应是在下个月派遣部队北进，经过几天战斗，便把波兰人驱逐出去。这个问题又拖了十八个月悬而未决，直到两国出于不同的原因都急于谋求西方在外交上的支持，因而都比上一年较为驯服时，才由一个特别组成的协约国委员会硬性划定了一条边界。委员会把切欣城留给波兰，铁路车站和丰富的煤田则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再向东一些，波兰人得到了在斯皮什和奥拉瓦的几片领土，这两县的几乎四分之三的土地都划归了斯洛伐克。波兰人把有关切欣的裁决看作侮辱；两次大战之间的整个时期，这两个斯拉夫民族因此而疏远。直到今天，边界仍然是按照1920年的分界线，尽管波兰曾于1938至1939年和1945年向南入侵。

- 159 切欣地区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曾希望波捷争端会使布拉格政府控制边界地区的整个依据引起异议，徒然落得一场空。战前波希米亚边缘地区诸如赖兴贝格、奥西希和埃格尔等古老城镇里，泛德意志主义感情比奥匈帝国其他地区强烈。捷克人在1918年年底以前接管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两地中居民主要为德意志人的地区，并把整个苏台德当作被占领的敌国领土来管理。1919年3月4日发生反捷克示威，引起开枪，五十二名德意志人丧命。用划定疆界的办法来把德意志人和捷克人地区分开来是困难的，因为存在着无数个种族“岛”；而且，恰如一些德意志工业家所认识到的那样，这在经济上也必将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因此，和会决定承认奥地利—德国历史上一向的边界，但有两个小小的例外：在胡尔茨钦

进行了调整，德国按凡尔赛条约放弃了该处一个居民主要为捷克人的地区；在格蒙德作了战略上的变动，城市本身留给奥地利，车站则让给捷克斯洛伐克。

和平的缔造者们把历史的国境作为边界线，便使旧日奥匈帝国三百五十万说德语的臣民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人口为一千三百五十万）的公民。就这个问题，贝奈斯于1919年5月20日在一份照会中告知大会，他设想要建立一个“非常像瑞士的极端的自由主义政权”，虽然在这同一文件的前一部分，他已坚决主张这个新共和国必须考虑到“波希米亚的特殊情况”，从而规定了这个颇似瑞士国家的某些特征。毫无疑问，当时贝奈斯所考虑的是保证各民族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以及行使广泛的地方自治权的问题，而这些观点也已在1920年捷克斯洛伐克宪法中反映出来。和会的“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专门委员会”当然认为，在这个瑞士般的捷克，德意志人和其他非斯拉夫民族将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一样，是同样的“国民”。但是，宪法已明文规定，该共和国由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共同组成，境内居住的德意志人、马扎尔人和波兰人是少数民族，虽然保证他们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的边界一经划定，一百多万马扎尔人便被划在新国家之内，对待民族问题的两种态度的区别就变得更加重要。决定斯洛伐克的边界和罗塞尼亚的命运时，战略上的考虑所占的分量比较决定波希米亚—摩拉维亚问题所起的作用大得多。在斯洛伐克，种族界线是沿喀尔巴阡山麓的丘陵地带划定的，¹⁶⁰平原上的居民主要为马扎尔人，尽管沿着许多河谷都有斯洛伐克人的居留地，而在较大的城镇则各族人民杂居。如果把这种族界线当作国界，实际上将切断斯洛伐克从西到东的交通，而且很可能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失去多瑙河上的一个港口。因此，和会把布拉迪斯拉发及河南的一个非军事性的桥头堡划给了捷克斯洛伐克，

并把国界划在远远超过种族界线以南的地方。尽管如此，仍旧约有十五万斯洛伐克人居住的小块地区留在匈牙利境内。再往东，罗塞尼亚也有与此类似的种族杂居情况；于是，这儿也有一片狭长的平原在划归捷克斯洛伐克的区域以内。罗塞尼亚人获得正式保证，他们将享有“在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统一前提下的最广泛的自治权”。出于下列的三种原因，罗塞尼亚那条细长的蜥蜴尾巴对捷克人也有重要战略意义：使他们与罗马尼亚接壤；把有潜在敌意的波兰和有潜在敌意的匈牙利隔开；使这个最西部的斯拉夫国家的边界更加靠近俄罗斯母亲，这一点在那些年代里被认为是有利的条件。

“捷克斯洛伐克事务专门委员会”的大部分工作 1919 年早春在巴黎完成，但特里亚农条约却在一年多以后才提交签字。其所以延宕是由于匈牙利国内政局不稳，有几个星期，似乎要对这一整个的解决办法的性质提出真正革命的挑战。

在与弗朗舍·德斯佩雷达成贝尔格莱德停战协议后，卡罗利·米哈伊被迫接受法国统帅部的一个代表维克斯上校常驻布达佩斯，监督停战协议条款的执行。于是，卡罗利力图实现若干基本的民主和社会改革，维克斯则负责查明匈牙利部队确已从包括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内的协约国各政府所要求的地区撤离。1918 年 12 月 3 日维克斯通知卡罗利，捷克人也获准占领斯洛伐克领土，匈牙利部队当即相应撤退；紧接着在月底又按照第二道强制性命令继续撤退。1919 年 3 月 20 日，维克斯交给卡罗利一份照会，命令匈牙利部队撤到特兰西瓦尼亚，让罗马尼亚人前进到最西离战前国界差不多二百五十英里的地点。卡罗利认识到这被占地区将按照和约割让给罗马尼亚，他决定宁愿辞职也不接受对具有悠久历史的匈牙利的再一次侮辱。权力就这样转移到共产党人库恩·

贝拉所控制的左翼联合政府手中。在欧洲事务中，唯一绝对真诚的威尔逊理想主义者卡罗利于是怀着绝望的心情离开了匈牙利，他后来过着流亡生活，只在1946年曾一度短期回国。

3月22日，“匈牙利发生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消息传到巴黎，代表们虽不无惊讶，却也早在预料之中。正在巴纳特调集一支强大部队的弗朗舍·德斯佩雷要立即向布达佩斯进军，但被克雷孟梭劝阻，显然因为最高理事会有几分希望通过库恩·贝拉与莫斯科的苏联政府建立联系。4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个以斯马茨将军为首的代表团被派往布达佩斯，代表团发现库恩无意接受协约国的干涉，除非罗马尼亚撤退。代表团判定库恩既非能自由作主的代理人，又非匈牙利政治意志的严肃认真的体现者，于是就返回巴黎。

当库恩正残酷地玩弄着社会革命的时候，罗马尼亚人继续从东方缓缓推进，捷克人则从北方向米什科尔茨进军。许多旧军官厌恶库恩的理论，尤其厌恶他那些更加臭名昭著的同僚们的行为，尽管如此，他们仍然准备为保卫匈牙利的国土而抗击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匈牙利红军于是在6月初发动攻势，将捷克军队逐出米什科尔茨，深入丘陵地带，直抵科希策，并建立起“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库恩本人坚持主张他的部队必须进攻罗马尼亚，因为他出身于特兰西瓦尼亚的一个匈牙利犹太家庭，凡与布加勒斯特有关的一切事物他都憎恨。这次他对罗马尼亚的作战行动在军事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匈牙利红军被打败，罗马尼亚军队继续顽强地通过奥尔弗尔德平原直指布达佩斯，与此同时，捷军收复科希策，清除了斯洛伐克苏维埃的一切痕迹。5月间，旧的权贵们在法国占领下的阿拉德组织起一个匈牙利反革命政权。6月初，该政权迁到匈牙利本土的塞格德，一支由三十二岁的后备役上尉贡伯什·久洛招募的、由海军上将霍尔蒂·米克洛什指挥的“国民军”

加入了这个政权。所有的三个集团——罗马尼亚人，捷克人和“国民主义者”——一齐向匈牙利首都争相逼进，而罗马尼亚人在这场竞赛中领先。

库恩和他的主要人民委员们（包括后来的斯大林主义魁首拉科西·马加什）在8月的第一星期逃往维也纳，后又终于返回俄国。布达佩斯从8月6日到11月14日被罗马尼亚军队占领。罗军离开时，这座城市已被十二个月来的动乱弄得人心颓丧，物资匮乏。因为广遭洗劫，不仅极端缺乏食品，许多物质财产也都丧失殆尽。霍尔蒂于11月16日声势显赫地进入布达佩斯，但因从塞格德进军途中有些军官行为残酷，协约国领导人起初对这些民族主义者仍疑虑重重。一场白色恐怖取代了库恩插曲似的红色恐怖，在白色恐怖中牺牲的有工人领袖也有同情卡罗利的改革的自由派人士，而以犹太人为最多。但西方对于出现在多瑙河上的“布尔什维主义”的恐惧如此之深，只要能控制住极端主义分子中满怀仇怨的一翼的过火行为，协约国也就有意信赖白党维护秩序。于是，成立了一个并非全属反革命的看守政府；1920年1月举行广泛的不记名投票，连妇女也有投票权。无疑，这次选举的民主性质给协约国留下了深刻印象，尽管人们感到，数千名社会主义者囚系狱中的不幸事件抵销了这次选举的价值，然而选举是人民意愿的证明。可以预见到，新议会在精神实质上是保守的；1920年3月1日议会选举霍尔蒂为立宪政体性质最后确立之前的摄政王。至此，巴黎和会相信匈牙利已有一个稳定的政府，终于向匈牙利代表团提交和约条款，并于6月4日在特里亚农宫签字。

卡罗利、库恩及霍尔蒂在匈牙利相继造成的紧急事态在中欧及更远的地区都引起反响。就马扎尔人本身而言，它意味着好几个月的流血、破坏和受苦受难；它使西方列强的态度变得强硬，不愿对条约草案的条件作任何更动；由于推迟了最后缔结和约的日期，

就连带地延长了经济封锁的时间。库恩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拙笨企图使邻国和西方的有产阶级认识到“红祸”的现实性。曾会见过库恩的斯马茨觉得他是个滑稽可笑的人物；远处的人都觉得库恩是个可怕的妖魔。归根结底，库恩在其匈牙利的反对者中所引起的反应比较共产党人的任何企图更加重要。因为这场民族主义的反革命是欧洲大陆上所有激进的右派运动中首先成功的一次。霍尔蒂本人奉信传统主义，因循守旧，他一生的政治活动都是力图把时钟拨回到本世纪最初的年代；他与蒂萨父子始终是加尔文派教徒，坚信自己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无可非议。但他赖以夺取权势的人（他们则借他为自己保持权势），并不像他那样有克制力和责任感，也不像他那样尊重过去的风俗制度。他们既贪财好货，又妒忌他人，认为仅凭智力不能取胜的，便可以用暴力代替合理的论据；由于把感情用事的爱国心（他们之中有些人是真有这种感情的）曲解为仇恨其他民族，也就把科苏特的不容忍同希特勒的不容忍联系在一起。像他们领袖贡伯什的一类人，要比卡罗利、库恩以及西方那些想通过国联以拯救威尔逊理想的人们更具备两次大战之间一代政治家的典型特征。 163

按照特里亚农条约，匈牙利丧失了1867年奥匈协议所承认的匈牙利王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领土。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划归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斯皮什和奥拉瓦两县不及二百五十平方英里的一小角划归波兰；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巴纳特东半部和马拉穆列什地区的北喀尔巴阡山山区分给罗马尼亚王国；伏伊伏丁那（包括巴纳特西部）连同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它虽然在神圣皇冠之国的境内，但在历史上不是匈牙利的一部分）都并入南斯拉夫国。匈牙利还割让了阜姆港（里耶卡），这地方原来打算建成一个类似但泽的自由市，竟成了意大利的一部分。最后，匈牙利西部以德意志人

为主要居民的一个一千五百平方英里的地区割让给新成立的奥地利共和国，后来成为布尔根兰省。

仅以割让给罗马尼亚的土地而论，面积还大于特里亚农条约签订以后残余的匈牙利，这一事实使布达佩斯特别怨恨。1916年的密约中，布勒蒂亚努曾要求将边界划在距离塞格德和德布勒森几英里以内，他的这一要求未能达到目的，但在克里沙纳的最后边界线还是划在自然种族界线以西相当远的地方，以便确保从巴纳特往北经过阿拉德和奥拉迪亚的公路和铁路留在罗马尼亚手中。当然，由于特兰西瓦尼亚东南部居住着讲马扎尔语的塞克勒人，在这一省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按种族分布情况划出一条符合实际的分界线。再往北，在马拉穆列什，战略上的考虑再次在最后的解决办法中起了作用；这一整个地区成了通过（与它有共同特征的）罗塞尼亚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腹地相连结的纽带。在西南部，从巴纳特经过的边界线在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两国之间引起相当大的摩擦，若非当地驻有法国军队，也许像在切欣一样，会导致两国军队交战。巴纳特的三分之二（包括特梅斯瓦尔）留给了罗马尼亚，但南斯拉夫人保全了直通贝尔格莱德的道路，并得到了有价值的农业地区。整个的解决办法把将近二百万马扎尔人和塞克勒人留在罗马尼亚境内，只有二万五千罗马尼亚人仍在边界西边的匈牙利一侧。还有大约七万罗马尼亚人留在南斯拉夫。

除了根据特里亚农条约所得到的领土外，罗马尼亚还能兼并另一些领土。按照圣日耳曼条约，它从奥地利得到了布科维纳，但是，这块领土只是在切尔诺维策的一个地方委员会的支持下由罗马尼亚军队占领了将近四年之后，才于1923年被承认属于罗马尼亚。1920年3月，最高理事会承认罗马尼亚1918年春季趁俄国因战败和革命造成分崩离析局面之机夺取比萨拉比亚的行动。最后，纳伊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应该把它原先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后

所得到的、继而又因 1918 年 5 月的单独媾和而失去的南多布罗加归还给罗马尼亚。所有这些条约累计结果，罗马尼亚人所获得的新领土在面积和人口数量上都大于战前王国。版图扩大一倍，则给罗马尼亚政治领袖们造成不少民族问题：因为罗马尼亚人虽然在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布科维纳是多数，但在北布科维纳（居民为乌克兰人）或多布罗加（居民为保加利亚人）情况则远非如此；在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人虽是最大的一个民族，但还少于当地人口的一半。新的大罗马尼亚共有居民一千八百万人；其中四百五十万人分属五个不同的少数民族（马扎尔人、德意志人、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和保加利亚人）。这些条约还使阿什肯纳泽犹太人的数量增至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罗马尼亚过去的反犹太经历如此丑恶，竟至于当年营救德雷菲斯运动^①的老将克雷孟梭有一次在和会上把布勒蒂亚努劈头盖脑地好一顿斥责。

特里亚农条约承认 1868 年的纳果达解决办法所规定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有权直接继承南斯拉夫联盟。虽然意大利的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竭力煽动克罗地亚的分离主义，并从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之间的宗教信仰分歧中捞到一些资本，和会却很少有反对萨格勒布国民议会决议的可能。南斯拉夫对伏伊伏丁那的领土要求则引起了较多的麻烦，一部分是由于争夺巴纳特而与罗马尼亚发生的冲突，一部分是因为南斯拉夫想要把苏博蒂察城附近“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居住的小块地区纳入他们的国家。在伏伊伏丁那的这个巴茨克绍地区的最后边界是沿着苏博蒂察（一个十分重要的铁路枢纽）的北面，但远在包姚的南边；包姚是个居

^① 1894 年，法国一小撮保皇党军官控告犹太人炮兵大尉阿尔弗里德·德雷菲斯（Alfred Dreyfus）把军事情报出卖给德国。德雷菲斯被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899 年通过行政命令获释，六年后最高法院取消他的一切罪名，并恢复军籍。立即被提升为少校，又被授与荣誉勋章。——译者

165 民主要为马扎尔人的城镇，帕西奇出于一时的乐观激动，曾对它提出过领土要求。在位于多瑙河与德拉瓦河之间的巴兰尼亚三角地带也出现了奇怪的事态。塞尔维亚部队于1918年11月穿过这整个地区，占领佩奇城。条约把巴兰尼亚的一小块土地划给南斯拉夫，其边界则划在佩奇以南二十五英里处，而塞尔维亚军队却拒绝撤出佩奇，直到1920年8月方才撤兵；甚至成立了一个“巴兰尼亚共和国”，它向国联请愿，要求的是不与南斯拉夫联盟，而是让佩奇在匈牙利境内享有自治，但未获成功。这样一来，伏伊伏丁那的边界就把三十五万德意志人和略多于四十万的马扎尔人留在南斯拉夫境内。

克罗地亚与塞尔维亚联盟后，留在它境内的少数民族的人数难以确定。1910年匈牙利人口普查表明，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九十，同时还公布了以下数字，讲马扎尔语的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居民为十万零五千九百四十八人，德意志人为十三万四千零七十八人；南斯拉夫1921年对同一地区进行的人口普查表明，马扎尔人为七万零五百五十五人，德意志人为十二万二千八百三十六人。匈牙利人人数之所以下降，可能主要由于铁路员工迁移动出境（在奥匈帝国时期，铁路是由布达佩斯控制并派人管理的），但也可能有的人对人口普查提供情报时的态度游离不定，此人出于统计目的，在人口普查员询问其母语时，他便按照自认为普查员所希望的语言而任意申报其母语。奥匈帝国时期及其分裂后成立的各国在人口统计上必然缺乏的一项统计，就是向人口普查员提供情报时态度游离不定者的数目；有人猜想为数当以千计，且分布较广。

和平解决办法使南斯拉夫的边界与七个不同的邻邦接壤，除德国外，欧洲没有其他任何一国有这么多邻邦。除了与希腊接壤

的一百公里边界线外，其它边界线无一不有争议。最棘手的是在北面和西面；这两处的塞尔维亚部队时常卷入军事行动，其结果与其说是给在巴黎的代表团帮了忙，倒不如说是使它左右为难。

南斯拉夫起初要求的边界线是穿过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超出马尔堡(马里博尔)、克拉根福和菲拉赫一线，直抵昔日的奥意两国的国界线，然后，沿着这条旧国界线南至的里雅斯特海湾的海滨。这些要求未免过分：施蒂里亚和卡林西亚的这三个城镇的风貌和人口组成主要都属于德意志族，尽管邻近的乡村大多为斯洛文尼亚式；根据1910年人口普查，的里雅斯特是奥匈帝国第三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其中意大利人占百分之五十七，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合占百分之四十三，而且长期以来意大利政策的目标之一是想得到这个港口。除此之外，昔日奥地利的戈兹—格拉迪什卡省和伊斯特拉省，其东部居民虽主要为南斯拉夫人，西部却是意大利人，而主要的城镇都在西部。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代表团因此必然会发生一场大争论。不仅在这些地区，而且在沿达尔马提亚海岸和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的要求都与伦敦条约的临时分割计划相抵触；意大利非但远远没有降低她在1915年提出的要求，现在又在单子上增加了阜姆(里耶卡)，尽管阜姆是克罗地亚内陆的天然港口，而其周围乡村和边沿区的居民几乎全是南斯拉夫人。 166

和会中大部分公正的代表都认为，南斯拉夫人要求的里雅斯特和意大利人要求阜姆都太过分。早在1919年2月的第一个星期，特鲁姆比奇就曾私下告诉威尔逊，如果他能提出一条把伊斯特拉半岛分开的界线，南斯拉夫人将接受他的仲裁。但意大利外交部长桑尼诺却执拗不让。他既受到米兰和威尼斯的处于萌芽时期的法西斯组织的压力，又受到罗马的陆军参谋部的压力，而且他似乎赞同它们关于亚得里亚海的大部分计划。因为甚至在他启程赴巴黎之前，桑尼诺就已经书面赞同副总司令巴多格里奥的一项命

令；这命令规定了为破坏南斯拉夫联盟而要采取的直接行动。1919年2月至4月，当敌对双方的要求正在巴黎讨论时，意大利军事当局及其代理人竭尽全力怂恿克罗地亚和门的内哥罗的分离主义。意大利和塞尔维亚的巡逻队也在阜姆当地和斯洛文尼亚频频发生冲突，有时连法国部队也给卷了进去。7月间，阜姆发生骚动，几名法国士兵被杀之后，协约国司令部要解除意大利准军事性组织的武装。可是，9月12日，意大利著名的战斗英雄和浪漫派诗人加布里埃勒·邓南遮出面扮演右翼的加里波第这个角色，率领一支空运的辅助性特遣部队占领了这座城市。这场荒谬的胡闹——追随邓南遮的人当真身着披风、手持匕首——把阜姆问题的解决拖延了十五个月。协约国当局形同瘫痪，不是被和谈弄得精疲力倦，就是害怕在意大利引起反响，没敢起来驱逐邓南遮；直到他已经走得太远，而对意大利本身宣战的地步之后，他的阜姆城邦才于1921年1月被重新占领，这位“多余的英雄”才被流放在外。

和会也好，随后的大使级会议也好，都未能解决意南两国的争端。威尔逊所建议的伊斯特拉的妥协性分界线意大利人仍然不肯接受，却只准备把它作为进一步讨价还价的基础，因为它似乎表明这位总统承认伦敦条约具有一定的效力。南斯拉夫人放弃了对的里雅斯特和戈里齐亚(戈兹)的要求，从而使意大利人撤回其对北达尔马提亚的要求，虽然仍坚持要求把古城扎拉(克罗地亚人称为扎达尔)割让给他们。但是，没有任何办法能改变他们对阜姆的态度，1920年夏，威尔逊和美国人民之间的裂痕扩大，更增强了他们的决心。最后，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的双边会谈终于导致在1920年11月缔结拉巴洛条约，这适逢美国民主党在总统选举中失败之后的一星期。根据拉巴洛条约，意大利确定了它对伊斯特拉大部分地区和扎拉的所有权，阜姆成为自由市，而它的郊区苏沙克划归南斯拉夫。甚至这协定也没有解决问题：对南斯拉夫在港口地区的权

利又重新发生争议。1922年10月,进一步签订的一些协定,不久便因墨索里尼上台而宣告无效,因为法西斯分子一贯表明他们根本不尊重自由市这一概念;1924年1月的罗马条约规定南斯拉夫人以墨索里尼保证“热情合作”为交换条件正式承认将阜姆割让给意大利。

南斯拉夫与奥地利、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边界问题都解决得快得多。1919年4月底,南斯拉夫人决心要获得南卡林西亚和西卡林西亚,便大举跨过卡拉万克山脉,在协约国未能强迫局部停战之前占领了克拉根福城。圣日耳曼条约于是沿着穆尔河及卡拉万克山划了一条符合自然地理情况的边界,从而使得南施蒂里亚的大部分土地归于南斯拉夫,其中包括马尔堡(现称马里博尔),条约还规定在卡林西亚境内有争议的地区举行公民投票;为此目的,一个协约国委员会将该地区分为北区——其中包括克拉根福本身及沃尔特湖——和一个大得多的南区。1920年10月南区举行公民投票,多数人赞成归属奥地利,由于尽人皆知该区的斯洛文尼亚人所占比例高于邻区,所以克拉根福未举行公民投票。卡林西亚于是成为奥地利有斯洛文尼亚少数民族的一个省,至今仍然如此。

保加利亚的边界纠纷要少得多,虽然南斯拉夫人也没有得到他们所寻求的全部东西。纳伊条约确认了塞尔维亚自1913年以来在马其顿获得的领土,另外还增加了斯特鲁米察的突出部分。它把皮罗特及其边沿的村庄割让给南斯拉夫,以保障尼什的安全。它也保障沿蒂莫克河的铁路免受枪击,人所共知,这是保加利亚的非正规部队“科米塔吉”显示其爱国主义精神而惯用的危险办法。和会拒不接受南斯拉夫占有多瑙河上的维丁和占有德腊果曼隘口的要求,以免索非亚受到南斯拉夫的控制。保加利亚人得免于更加苛刻的条件,是由于威尔逊总统和桑尼诺的同情,这是一种出人意

料之外的伙伴关系。但是，甚至威尔逊竭力帮助，也未能保全保加利亚 1912 至 1913 年以那样巨大的代价和挫折而获得的爱琴海海岸线。按照纳伊条约，几乎整个西色雷斯都割让给了希腊。而保加利亚想把杰贾加赫变成一处主要海港的愿望，纯属徒劳，同圣斯特法诺条约在柏林会议的遭遇一样，被列强投入了废物堆中。

对阿尔巴尼亚的解决办法，一则由于和会未能就其政府性质取得一致意见、一则由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两国冲突的影响而被搁置。1920 年 1 月，一场不那么普遍的普选选出一个阿尔巴尼亚立法议会，议会两个月后在地拉那召开会议，任命了一个四人摄政理事会。相当使人瞩目的是，虽然不过几个月前，阿尔巴尼亚似乎曾有可能成为意大利的托管地，摄政理事会却使阿尔巴尼亚加入了国联，并使意大利撤走了军队。最后，1921 年 11 月，大使级会议把 1913 年所划的临时边界线略加更动而重新肯定了下来，但只是在国联对南斯拉夫采取威胁行动派遣军队进入北阿尔巴尼亚并成立另一临时共和国之后，这一解决办法才被接受。

还有两个重大问题，历时多年方才解决；而且，是在再一次开战之后，当地的和平才终于得以缔造。这就是希腊与土耳其的边界以及波兰与俄国的边界问题。维尼齐洛斯的“大希腊”理想主要是力求实现于小亚细亚，因此超出本书范围，但因其影响巴尔干各国利益的平衡，故必须简略提及。同样地，虽然波兰问题的许多方面所涉及的地地区今天已彻底并入苏联，而不能被看作“夹缝中六国”的一部分，但战后十年中种种易变的因素使之时时卷入中东欧事务，情况不亚于其他边缘地区——例如达尔马提亚或多布罗加；所以这些事件也须一一记述。

厄琉特里俄斯、维尼齐洛斯的野心虽未把希腊带到它灾难的顶峰，却也直接使它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战争后半段，希腊在他

的领导下加入协约国一边英勇战斗，终于驱逐了亲德的康士坦丁国王，1917年夏拥立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为王。希腊在和会上提出广泛的要求：希望拥有色雷斯、北伊庇鲁斯、佐泽卡尼索斯群岛、爱琴海上的岛屿以及小亚细亚的上麦拿（伊兹密尔）附近希腊人稠密聚居的地区。英国支持希腊人，1919年5月，和会最高理事会允许他们占领上麦拿及其内地。一年后，塞夫勒条约相应地确认上麦拿地区割让给希腊。条约也把整个东色雷斯——其中包括加利波利半岛——和爱琴海上的大部分岛屿分给希腊人；但佐泽卡尼索斯群岛却被交予意大利，准备最后单独订一公约，再转移给希腊。

但是，塞夫勒条约一直未被批准，其条款则在土耳其人中激起穆斯塔法·基马尔所领导的一场民族主义革命，他们决计把希腊人赶出小亚细亚，就像几年前巴尔干联盟一心要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一样。基马尔主义者的造反精神这一次未能引起雅典的反应。亚历山大国王由于被猴咬伤而突然去世，维尼齐洛斯及其自由派在大选中失败以及康士坦丁国王的复位，这一切都削弱了希腊人的地位，挫伤了他们的决心。他们在土耳其从事的一场军事冒险，指挥不善，供应不足，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贸然攻入安纳托利亚，以致土耳其发动反攻，并于1922年9月底将希军撵出土麦拿。下一年夏季，在洛桑谈判达成新的解决办法，完全撕毁了塞夫勒条约。

土耳其通过洛桑谈判收复了它在欧洲和小亚细亚丢失给希腊人的全部领土（尽管多德卡尼斯群岛仍由意大利统治）。这年早些时候单独签订的一项条约，规定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穆斯林被迫离开希腊，最后一批希腊人被赶出小亚细亚，在这以前，1922年已有成千上万可怜的希腊人为逃避土耳其人的报复而离开了。洛桑的解决办法将东色雷斯归还土耳其以后，保证基马尔的新土耳

其共和国在欧洲保留了一个立足点。土耳其人留在色雷斯和(非军事化的)海峡地带的这一事实继续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影响着巴尔干诸国的态度,虽然从本世纪最初的数十年起,情况已有所不同。奥斯曼的弊政曾长期危害这片大陆的和平,如今,土耳其却在基马尔的领导下成为该地区的一支稳定力量。另一方面,希腊人不得不承认其“伟大理想”的失败,他们被迫特别集中注意巴尔干的种种问题,保护通过纳伊条约从保加利亚得到的领土。随着居民的交换,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深仇大恨开始消释。整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保加利亚是东南欧唯一怀有修订和约的情绪的国家。

正如保加利亚人、希腊人和土耳其人三方互相抗衡阻碍了巴尔干问题的合理解决一样,波兰人历史上的权利,俄国人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边界地区较小民族的民族主义三者间的冲突也耽搁了东部问题的解决。毕苏茨基本人曾一度赞成由波兰人、立陶宛人和乌克兰人结成联邦,但波兰当局的民族优越感之坚定不移不亚于战前匈牙利的马扎尔人。毕苏茨基不得不靠战斗来夺取维尔纳和乌克兰,但 1919 年在加利西亚获胜后,他赢得许多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的支持以对付共同的敌人红军。1920 年 5 月波兰人和反共的乌克兰部队进入基辅,此时,毕苏茨基的“乌克兰冒险行动”达到顶峰。但在下两个月中,俄国军队发动声势浩大的反攻:布琼尼的骑兵席卷了从基辅到加利西亚的南方前线;二十八岁的图卡切夫斯基将军则从北面开始通过维尔纳和明斯克推进六百英里直奔华沙。但图卡切夫斯基这位青年将军不是拿破仑·波拿巴:没有坎波—福尔米奥^①之役来巩固他的胜利。波兰军队大举反

^① 1796 年拿破仑奉命率领一支军队和占领意大利的奥地利人作战,他在这一战役中获得辉煌胜利,成为民族英雄。法奥双方 1797 年在坎波—福尔米奥(Campo-Formio 即今意大利坎波福尔米多)签订和约,法国保留了她所占领的大部分地区,这也标志拿破仑对第一次反法联盟的胜利。——译者

攻，到9月底便迫使红军退过涅曼河；波兰将军泽利戈夫斯基再度进入维尔纳，他决心不让立陶宛人据有这座曾是毕苏茨基故乡的城市（虽然历史上它曾是立陶宛首都）。10月18日，这场战线特别不固定的战役终于以双方近于精疲力竭而宣告停战。波兰和俄国开始直接谈判，1921年3月签订里加条约，紧挨着波军停止下来的一线划定了边界线：北方从德维纳河开始，延伸到明斯克以西直达在德涅斯特河上的罗马尼亚边界线。大约有五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被划入新波兰境内。

和会的最高理事会、后来的大使级会议以及国联都曾犹犹豫豫地试图劝说波兰人千万别在东方吞下他们消化不了的过多的领土。1919年11月，波兰人拒绝了一项建议：对东加利西亚实行为期二十五年的委任统治，在该地区，乌克兰人将享有高度的自治。波兰人也拒不承认协约国专家们提出的种族界线，即后来人尽皆知的寇松线，因为它将使大多数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留在苏联境内。1923年2月，国联作了最后一次努力，想为东加利西亚争取一项自治法，但波兰的顽梗态度排除了达成任何妥协的可能，于是，整个这一地区都落到波兰人无拘无束的手中，大可为所欲为。大多数乌克兰人，还有苏联当局，对波兰的边界线都耿耿于怀，但是，他们多少年来也都无力改变。与此类似的是，虽然国联在1923 171年3月承认波兰占有维尔纳，立陶宛共和国却从不甘心于蒙受损失；可是，立陶宛本身又过于弱小，根本无力反对波兰的占领。

在两次大战之间，感到幻灭的理想主义者和主张修订条约的人们都一致抗议，认为和平解决办法是对自决原则的嘲弄。即使作最低估计，少数民族也几乎占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口的三分之一、罗马尼亚人口的四分之一、南斯拉夫人口的八分之一；而在其中的一些国家里，绝不能肯定地说，身为“主子”的民族中的大

多数人会同意这种新的人口结构，如果他们能够完全自由地通过投票来表达其志的话。有六百五十万德意志人既不是德意志共和国也不是奥地利的公民，有五百多万乌克兰人身在苏维埃国土之外，有三百万马扎尔人不在匈牙利境内。南斯拉夫有数量相当多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希腊也有，虽然比例较低。住在南斯拉夫、希腊马其顿和希腊色雷斯的保加利亚人比例都相当高。反过来，南斯拉夫人也可以抱怨说有斯洛文尼亚人被留在意大利境内的伊斯特拉和奥地利境内的卡林西亚。在整个中东欧地区，很可能每五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少数民族；其中一些人安于他们的境况，一些人从最初起就吐露过他们的敌意，许多人在经历多年令人沮丧的不平等待遇之后，终于满怀怨恨。

评论家们还从经济的角度攻击这一解决办法；他们指出这些条约在自然成为一个单元的贸易区内筑起了道道关税壁垒，结果，例如奥匈帝国——它原先是一个关税区——现在已分成七个经济体系，其中许多是竞争激烈的对手。在一些地区，这个解决办法制造了局部性的、而不是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为了避免与的里雅斯特和亚得里亚海上的港口竞争，意大利竟故意使阜姆衰落；为了使多瑙河上较老的罗马尼亚港口加拉茨和布勒伊拉得到好处，比萨拉比亚的伊兹梅尔也在较小的程度上蒙受损害。此外，还有若干事例：出于战略上的理由而调整某一边界，把重要的铁路交叉点分给属于前协约国的国家，而使前敌国的经济利益遭到损害。在许多情况下，旧日市场的丧失使战胜者和被征服者两败俱伤：例如，匈牙利被剥夺了斯洛伐克的木材和矿产，固然受害，但是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也就被迫负起资助经济萧条的斯洛伐克地区（以及更为落后的罗塞尼亚地区）的重担。

172 和平的缔造者本人也都已意识到其工作上的不少缺陷，以及这种解决办法固有的危险。它预先假定德国和俄国将永远从他们

传统的逐鹿之地销声匿迹；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许多外交活动都是力求保留这一罕见的局面。但是，还有别的办法矫正可能引起另一场冲突的不平情绪。五项巴黎条约的每一项都附有国联的盟约；其中第十九条规定：“大会可以就重新审议那些业已不能实施的条约、以及就审议那些若任其存在便可能危及世界和平的国际局势这两点，向联盟成员不时提出忠告。”如果并未按此条采取任何行动，很难说错误在于巴黎的政治家们。同样，和平的缔造者们企图通过一系列特殊的条约保障少数民族在法律面前与其他民族一律平等，保障他们的宗教自由和语言文化权利，从而保护诸少数民族。中东欧的每一国家，无论新建立的国家，前协约国，还是前敌国，都必须在这种性质的条约上签字，唯有这一地区边沿上的国家——俄国、德国和意大利除外。俄国是这一系统之外的国家，德国给了上西里西亚这种性质的保证。而意大利之所以除外，是因为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正义的大国，人们曾错误地假定它当然会给予国内所有的民族这些基本权利。

和平的缔造者们也曾多次努力，试图缓和凡尔赛和平解决办法所造成的经济问题。捷克人在汉堡和什切青、南斯拉夫人在萨洛尼卡获得特殊的过境权。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都有条款规定：五年内，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三国间实行特惠关税率；不幸的是，由于20年代初期政治情绪紧张，这些安排始终未能实行。难免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使人们当时有心要使这样的一些补救办法发挥作用，也决不可能使情况有任何重大的改善。

事过半个世纪以后，有一点就很清楚了：这一和平解决办法的影响之持久，超过了早先批评者的估计。自相矛盾的是，和约条款遭到的主要破坏反倒是在两次大战之间最少要求“修正”条款的列强所造成的；但必须记住，由于1917年到1921年间发生的事件，俄国丧失的领土竟多于其他任何一国。除了俄国在40年代向西

推进及其对波兰的影响以外,这些边界线变动极小,尽管意大利沙文主义分子的贪婪终于在亚得里亚海上遇到了报应。受益于各种条约的民族多于受害的民族;鉴于时代的特征和有争议的主要地区民族结构极端混乱,经过一场长期而又艰苦的战争以后的胜利者,无论举行任何集会,很可能都难以制定出更为合理和公平的解决办法。但是,回顾起来,与它遭受广泛谴责和激烈挑战的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相比,这一解决办法看来不太够得上是个历史转折点的标志。欧洲新秩序的安排整顿,每每仅涉及管理方面过于频繁的变动;老毛病在新背景下又重新出现。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例如,1918 年新建国家之一的南斯拉夫国竟包括九个民族,而战前大受中伤的“历史悠久的匈牙利”却只包括七个民族;而 20 世纪 30 年代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与 20 世纪初期的马扎尔民族主义者态度上有何不同,其细微区别恐怕只有那些最长于政治语义学的专家才能解释清楚。1919 年至 1920 年期间所改变了的乃是欧洲的地图,而不是它的各个民族的习惯。

第九章 民主幻想与现实

174

俄国与德国同时声威黯淡，使 20 世纪 20 年代成为夹在它们中间的六个国家得到发展机会的十年。在这以前，西部斯拉夫人与南部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各行省的各族人民从来未曾在没有外来压力的情况下得到社会团结与统一的机会；多少世纪以来，维斯杜拉河流域也不曾有过像新的波兰共和国如此规模和潜力的国家。连战败的保加利亚人也有了罕见的前景：依靠国内政策而不是对外结盟来选择政治伙伴。如果马扎尔人不以过分要求修订和约作为其民族意图的话，他们同样会发现匈牙利也终于享有一种虽受限制却属真正的独立。在这个时期，制定宪法的人们都向西方特别是向法国寻求议会制度的蓝本，除匈牙利外，这六个国家无不经过广泛的投票选出了议员，这本来是尊重个人自由。起初政党不少，特别是在比例代议制已载入宪法的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1920 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下院就坐的有十七个党派——参加竞选的多达二十二个。在波兰的国民议会里有十四个党派。南斯拉夫的议会里有十二个党派，保加利亚议会里有九个，而罗马尼亚议会里的党派之多竟难以精确区分。所有这些企图以积极的议会主义为基础以求巩固其团结的努力，都发自真心诚意，而且考虑到这些年的政治气候，也是易于理解的。不幸的是，把外国事物生硬地嫁接到土生土长的政治机体上，自然会产生混乱，促使腐败作风蔓延。加之这些国家无一不有有势力的集团，它们仇恨这些政治机构的存在，想方设法要搞垮议会制度；于是在这十年之末，除捷克斯洛伐克之外，各地的民主理想看来都已被弄得污点斑斑，无法

挽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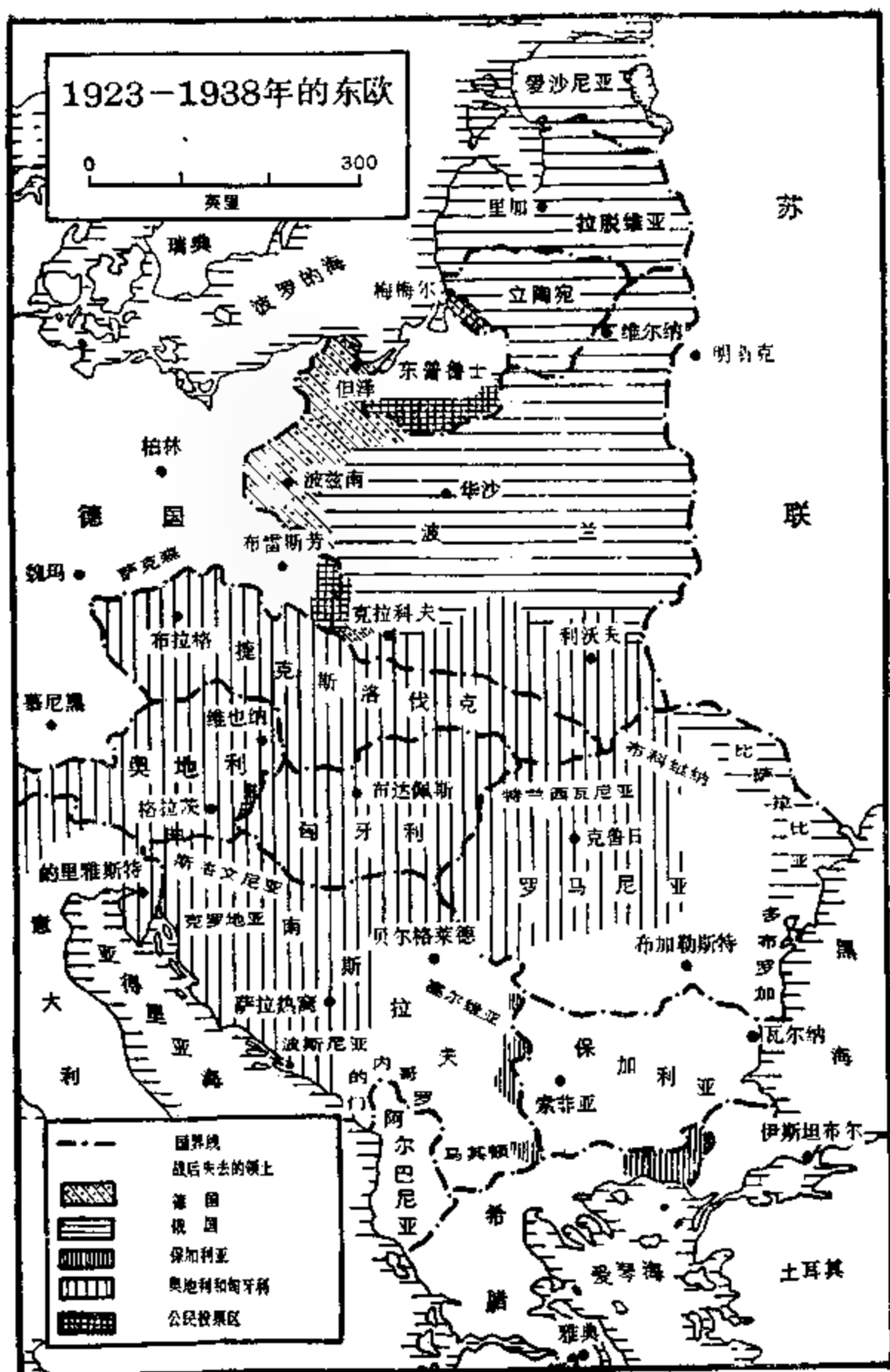
175 这六个国家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历史有许多共同点：先是动荡的革命阶段；继而是民主实验时期；然后是反动时期，反动势力在某些地方甚嚣尘上，而在某些地方则比较隐晦收敛。在这方面，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发展远不如其他各国那么符合这一模式，因为它继承了西方自由民主的传统，而且，至少是波希米亚与摩拉维亚具有一种不同的社会结构。（捷克斯洛伐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口依靠农业为生；而在其他五国中比例却较此高出一倍：从匈牙利的百分之五十五到保加利亚的百分之八十。）但在其他地方，包括捷克国家的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地区，这一新时期最初几年的主要特点乃是由战争经验及其直接后果所决定的。

1919 到 1920 年期间返回本镇本村的复员老兵的政治观点，已与战争刚爆发时簇拥到战旗周围的年轻人大不相同。他们即使谈不上饱经世故，至少已经成熟。因为应征入伍到大部队里去当兵吃粮一向是一种严酷的社会教育，俄国革命前一百多年的历史早已证实这一点，而在五年的战争与混乱期间，东欧落后地区的工人农民到过比较先进的国家，对经济上的贫困产生了强烈的不满。结果他们一反常态对传统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提出疑问，力求改变农业生产方法、迫切要求改善工厂和矿山的条件。服兵役的后果还不止于此。和平时期不可能在分散的乡间居民点中传布的革命信仰，开始在应征入伍的劳工和农民中引起反应，特别在那些在战俘营里呆过或在最后几星期从“奥匈帝国军队”开小差的逃兵中，更是如此。1914 年以前就已经开始扰乱着旧秩序的社会动乱，此时在乡村与城市都格外加剧。各国政府不得不许诺进行土地改革，并向工人们表示好感。

土地改革几乎没有触及土地问题的表皮。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确实曾将相当数量的土地从大庄园夺来分

配给农民,但在上述前两个国家,小土地所有者发现他们的新地块无法耕作,往往又把它重新卖给大地主,有时干脆卖给旧主。在波兰和匈牙利,最好的庄园丝毫未动,尽管历届政府口头上谈改革原则,土地易手的情况却微乎其微。为产业工人所做的工作就更少。捷克斯洛伐克政府诚然从奥地利人那里继承了一整套社会立法,并于1924年添上了全面的保险制度,而波兰的莫拉柴夫斯基内阁则于1919年实行一些进步的工厂立法。南斯拉夫也采用八小时工作制,并明确规定工会的地位。但总的说来,劳动条件仍旧很原始,无产阶级便自然而然地转向左倾。176

六个国家中的统治阶级同样害怕“布尔什维主义”,在中欧地区,由于匈牙利的库恩政权和维也纳工人的马克思主义倾向,这个幽灵已经是活灵活现的了。共产主义在20年代早期的吸引力究竟有多么大,是难以估计的,但保加利亚确实已经有了一个强大的共产党,该党在1919年的选举中获得四分之一的选票,而且能够一连四年相当自由地组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在捷克斯洛伐克,虽然到1921年才从捷克的最大党派即社会民主党中分离出来一个单独的共产党,而共产党人却在下一届国会选举(1925年)中获得几乎一百万张选票,而且直到1938年发生危机时,继续得到巨大的支持。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在1919至1920年取得显著的成功,成为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尼什和乌日采市选举中最强大的政党,并在制宪议会上赢得五十八个席位,成为其中第三大党。但是,他们承袭“青年波斯尼亚党”这样一些运动的传统而保存了恐怖主义派别,这就被政府用作借口,在1920年12月发布了臭名远扬的“诏书”,严厉取缔一切马克思主义活动。1921年6月发生图谋刺杀摄政王亚历山大事件之后不到一个月,颁布“诏书”的大臣米洛拉德·德拉斯科维奇被刺杀,这些事件导致通过了一项更严酷的“国家保卫法”,迫使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运动转入地下。罗马



尼亚的社会情况极为紧张，1920年10月还发生过一次总罢工，尽管如此，罗马尼亚共产党却始终未能壮大，成立后不久就遭到严厉镇压，并于1924年被宣布为非法组织。波兰共产党人因1920年红军入侵而受到损害，但其后数年间在各城市里获得有限的成功。另一方面，匈牙利在库恩苏维埃垮台和白色恐怖之后，实际上并不存在有组织的共产主义运动。1925年共产国际力图恢复匈牙利党，派遣两名秘密工作人员前往布达佩斯，他们很快就被逮捕，判处长期徒刑。其中一人是拉科西·马加什，此人后来名声之大竟超过了库恩·贝拉。

实际上，从1920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红军冲向西方这段期间，马克思主义毫无危及这六国中任何一国的现存秩序。虽曾有过一些孤立的恐怖主义行动、兵变甚至起义，但从根本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月里，正像早已载入宪法条文中的那些民主保证一样，与东欧的民族性格格格不入。其实，对资产阶级统治集团最严重的潜在威胁并非来自马克思主义的左翼，而是来自各农民党，它们在世纪交替之际原是位卑力薄，及至战争结束时，农业工人带着新的思想归来，使它们一跃而高踞举足轻重的地位。斯塔姆博利斯基的保加利亚农民联盟，拉迪奇的克罗地亚农民党、米哈拉凯和曼纽的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曾经一度在巴尔干创造了“绿色起义”的形象：农业劳动者将要击败各个城镇力图强加给他们的孪生罪恶，亦即大实业与布尔什维主义。这场运动也不限于巴尔干各国。在波兰，维托斯的皮亚斯特党和达布斯基的解放党虽然在1931年以前一直由于对教权主义的观点不同而彼此分开，却始终坚持要求真正的土地改革；而在捷克斯洛伐克斯维赫拉与霍德扎领导下的农民党为所有的农业劳工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并建立起乡村生产合作社与城镇消费合作社之间的联系。捷克的农民党人倾向于抛弃他们的农民出身而与商人阶层、特别是

178

银行界结合在一起。对塞尔维亚农民党也可作类似的评述，而匈牙利的小农党却只代表比较富裕的中等地主——相当于俄国的富农——而对农民群众极少吸引力。值得注意的是，“绿色”运动在南斯拉夫最北部各省中却毫无进展，这里所有阶级都忠于科罗舍茨阁下那个具有鲜明的罗马天主教性质的组织，即斯洛文尼亚人民党；而在多瑙河以北，则有格林卡阁下，他同样有力地抓住了斯洛伐克人中的教友们在政治上的希望。

农民政党为中东欧所特有。它们从未能扩及巴尔干山脉以南的希腊（这里半数以上人口以务农为生），而企图在法国、巴伐利亚与荷兰组织类似政党的尝试都毫无成就。某些西方观察家论证说，乡村群众政治觉悟的增长是历史上的一桩大事，与以前几个世纪的中产阶级的兴起同样重要；他们格外赞赏农民拒不接受工业社会所接受的价值准则，并且赞赏他们以彻底的和平主义态度抨击军队和军备。但回顾起来，农民运动的弱点是显而易见的。个别的农村劳动者的痛苦，总是带有不同的地方性和特殊性，他们的敌人是肆无忌惮的地主、高利盘剥的放债者，或者颟顸糊涂的官僚。而他们天然的独立感却使他们不可能制定一项全面的国家政
179 策。随着战争年代的流逝，他们的眼光越发狭窄，一旦农民党领袖人物开始关心更广泛的问题，他们就不可避免地使自己脱离这一运动的基本群众。农民阶级与其代言人之间于是产生一道鸿沟。另外，从社会角度来看，村社本身缺少社会团结性，因为富有者、成功者与贫困者之间的差别显著，足以引起怨恨与嫉妒。农民们很容易成为旧统治阶级种种策略的牺牲品。他们受到皇权、军队、律师甚至城市社会主义者的攻击与剥削。农民领袖们未能在民主试验阶段之初取得统治权，确是两次大战之间的悲剧之一；唯独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人得以继续执政，却也不过是作为联合政府中的成员而已。

农民当政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1919年到1923年的保加利亚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斯塔姆博利斯基本人是典型的农民领袖，一身兼有丹东富于煽动性的口才和科贝特善于谩骂城里人的本领。他仇恨城市里作害的“寄生虫”，而无论其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成员；他执政期间的第一批行动之一便是通过一项法律，要求每个公民每年为国家从事十天无偿的义务体力劳动。他豁免了农民阶级的大部分赋税，而对资本则一律科以重税；通过价格控制使工业品售价一直低廉，而食品则售价昂贵。唯独农民党党员才有资格在农村担任行政职务。斯塔姆博利斯基公开表示尊重各项民主自由，1920年共产党号召铁路工人总罢工时，他没有企图剥夺共产党人的政治权利，但他对老的政治领导人却极少同情，总是威胁要把他们战时的渎职行为交付军法审判，从而限制他们在议会中反对自己。尽管他一味偏袒和专横武断，他的统治却给五分之四的国民带来持久的好处：农村教育大步跃进；一项严格限制庄园面积的土地改革法保证了几乎全国农民都耕者有其田（而在斯塔姆博利斯基垮台后，农民便被迫以高额现金偿付过去所得的土地）。

1923年4月，农民党人获得议会中二百四十五席中的二百一十二席，斯塔姆博利斯基采取一项极不明智的措施，开始极力主张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君主国的未来。国王博里斯和军队先发制人；6月9日趁斯塔姆博利斯基不在首都之际，索非亚发生了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乡村抵抗了四天，直到斯塔姆博利斯基本人被捕，并在备受酷刑之后，惨遭杀害。共产党人坐山观虎斗，看他们的两个敌手互相残杀。及至他们自己在9月间企图发动起义时，也遭到同样野蛮的镇压。一夏一秋，那年被杀的保加利亚人可能达到一万，¹⁸⁰军官阶层和他们的头子沃尔科夫上校牢牢地掌握了大权。农民当政让位于暗杀政治。其他国家的变化也都遵循这一模式，但从未

达到同等激烈的程度。

斯塔姆博利斯基之死是或至少部分是他对国际合作的信仰的后果，他认为这种合作是农民哲学的基本原则。他始终相信保证巴尔干半岛和平的最可靠途径是创建一个联邦制的南部斯拉夫联邦，保加利亚应与塞尔维亚或克罗地亚一样成为它的成员；而且在他被杀害前一个月以内，他已与南斯拉夫政府达成协议，采取联合措施制止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主义在马其顿东山再起。国王博里斯和他的军官们认为同贝尔格莱德合作不啻叛国，他们在整个 20 世纪 20 年代坚持争取废除纳伊条约，争取国际上承认保加利亚在马其顿的首要地位。不幸的是，他们这种不肯退让的态度要比斯塔姆博利斯基更为接近于欧洲的普遍心态；因为很少有政治领袖认为巴黎和约便是最终的解决办法，而有勇气主张和解而不是修订和约的人就更少。尽管日内瓦所有的国际联盟理想主义者都抱着很高的希望，支配东欧各族人民关系的却是恐惧与复仇的情绪。

早在巴黎和会散会以前，赢得胜利的大国便已形成最初的组合。罗马尼亚和波兰深切意识到东方的红军在数量上的优势，便于 1919 年缔结了一项军事协定；罗马尼亚人表明如果匈牙利出现哈布斯堡复辟的危险，从而危及其对特兰西瓦尼亚的控制，他们准备随时与南斯拉夫人和捷克人合作。贝奈斯当时认为，巴黎证券交易所里的有影响的集团可能会唆使法国外交部把匈牙利变成法国在多瑙河上的优惠庇护国；但因法国与霍尔蒂政府玩弄笨拙的诡计，捷克人和南斯拉夫人遂于 1920 年 8 月签订防御同盟条约，一旦匈牙利发动进攻或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盟约立即生效。匈牙利某新闻记者轻蔑地把马扎尔人所鄙夷的这两个国家的此种组合称之为“小协约国”。这一称呼本来出于嘲弄，往后却一直沿用下

来。

1921年春，捷克—南斯拉夫防御同盟扩大至罗马尼亚，当时哈布斯堡废帝查理跨入匈牙利西部境内，企图复辟而未果。三个国家之间于是签订了一项正式的军事协定，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之间的谅解范围扩大到保证纳伊条约各项条款的实施（因为南斯拉夫人已经几乎不相信斯塔姆博利斯基有表达保加利亚国家真正意愿的能力）。181

在北部，波兰的外交官们也很活跃。面临着苏德秘密勾结的种种谣传——现在已经清楚，这些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急于要在两个衰落的巨人中间保持本民族的地位。1921年3月毕苏茨基相应地与法国达成一项同盟条约，包括一项军事协定；一个月之后他与罗马尼亚签订正式协定保证两国边界不受苏联的攻击。但毕苏茨基拒绝由波兰承担在匈牙利万一入侵特兰西瓦尼亚时采取行动。他与霍尔蒂政府之间没有矛盾，相反，却把后者视为一个共同对付捷克的可能的盟友，因为尽管贝奈斯几度作出友好姿态，华沙与布拉格之间的关系仍旧很坏。切欣的解决办法令人怨恨，此外还有特别漫长而令人厌烦的有关雅沃里纳的争议；这是国境上塔特拉山高处一个村庄，两国都赋予它不相称的重要意义。尽管法国多次致力于调解，捷克斯洛伐克与波兰的裂痕在两次大战之间始终未能弥合。

自1923年以来，整个东欧的国际关系日益反映出在这个地区边缘的两个大国，即法国与意大利的互相疑忌和敌对情绪。法国人原来只考虑自身安全，主要是反对德国东山再起，对多瑙河流域各国的兴趣并不及对北部地区那么大，它感觉波兰既可以部分代替昔日的沙俄而成为盟国，又是自从科希秋什科时代以来法国人民便对它的自由一向关注的伙伴。法国一心考虑德国赔款问题，迟迟未能制定对小协约国的明确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它首先

是与捷克斯洛伐克签订条约建立联系，这是三国当中唯一与德国接壤的一国，那条约便是在鲁尔危机余波中于1924年1月签订的、规定维持现状的法捷条约。直到1926年夏，法国才签字承认罗马尼亚的边界线；直到1927年，与德国休战九周年之际，法国才和南斯拉夫签订一项友好条约。从此以后，至少直到1934年，法国才在多瑙河沿岸一带的政治势力达到至高无上的地步，而法国总参谋部在组织小协约国的军事力量方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事实上，国防部里始终存在一个有势力的集团，主张按照弗朗舍·德斯佩雷的传统与奥匈帝国的几个继承国建立军事联系，但是其中最

182 有影响的发言人在20世纪20年代却偏偏使自己陷入北非事务。

1922年11月墨索里尼执政后，意大利人在中欧事务中比法国人抢先一步。罗马像布拉格或贝尔格莱德一样不喜欢哈布斯堡有复辟的可能性，而法西斯分子乐于强调与“拉丁”罗马尼亚之间的所谓的历史联系。1924年1月意大利与南斯拉夫签订的一项条约保证“支持与热情合作”，接着又与捷克达成类似的协议；1926年又与罗马尼亚密切接触，这主要是因为罗马尼亚首相阿维雷斯库将军对墨索里尼使意大利人重新活跃起来的作法深表仰慕的结果。到此时为止，墨索里尼对匈牙利的主动接近却仍报以明显的冷淡态度，这一部分是因为他无意鼓励修改前哈布斯堡各属国的版图，更重要的则是因为他意识到，倘若庇护霍尔蒂，就会无可挽回地驱使小协约国投身法国阵营。

在某种程度上，墨索里尼的外交在奥匈的各继承国中所取得的利益不过是一种假象。意大利所能给予它们的除了漂亮话和故作姿态而外，实在寥寥无几——既无任何有价值的商业或经济往来，又无军事技术，它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影响也无法与法国和英国相比。随着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的前景逐渐暗淡，墨索里尼在巴尔

干诸国的野心便使尚未愈合的旧创重新迸裂。他在 1923 年所谓的“科孚事件”中对希腊抡起大棒——意大利人声称希腊非正规军杀害了他们一位将军，遂以报复为借口，派出舰队炮轰并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并在阿尔巴尼亚再次采取行动，都表明他对南亚得里亚海野心勃勃，这就必然使得对于丧失阜姆虽则无可奈何却是心情沉重的南斯拉夫人大为惊恐。再者，甚至早在保加利亚的农民党政府倒台之前，墨索里尼已开始怂恿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大肆活动；他对于导致斯塔姆博利斯基惨遭杀害的阴谋几乎肯定是知情的；而在 20 年代中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正在接受来自罗马的武器和经费。墨索里尼一边给马其顿叛乱余孽煽风点火，一边又在阿尔巴尼亚策划阴谋，这便使南斯拉夫人深信他的目的在于瓦解南斯拉夫王国，因此开始力促小协约国与法国更加密切联系。与此相应，意大利人也不再有所顾忌：1927 年春，匈牙利与意大利签订合作条约，给予匈牙利人在阜姆港经营商业的方便条件，这是对南斯拉夫人的莫大侮辱。次年一月，奥地利 183 海关官员查获意大利公然违反条约对匈牙利军队的限制，把一批机枪零件走私运往匈牙利，因此捷克人也断定墨索里尼已决心参加修订条约的阵营。墨索里尼本人在 1928 年夏公开宣布支持匈牙利的民族愿望，外交阵线终于明朗化：法国支持对 1919 至 1920 年的解决办法满意的国家，意大利则站在有怨言的一方。这种利害冲突，其实早在和约刚一签订时就可以预见得到。

20 年代期间，偶而有过争取小协约国国家与它们的心怀不满的邻邦匈牙利达成某种谅解的尝试。甚至早在 1920 年 12 月，捷克与匈牙利曾经会谈过调整斯洛伐克边界的可能性。可是，贝奈斯虽然准备让出一些差不多全属马扎尔人住居的地区，却同时坚持必须以匈牙利放弃再提修订条约的要求作为达成任何协议的主要条件；而匈牙利政府对于特里亚农条约规定的解决办法之不公正

仍耿耿于怀；因此，对这样一种保证根本无法考虑。对于塞尔维亚人，霍尔蒂本人和他的大臣们却不像对捷克人那样苛刻，但1926年马扎尔人建议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缔结的友好条约，甚至干脆未曾起草；理由很简单，双方谈判代表一开始交谈，就发现彼此之间毫无友谊可言，当然这是几个月之后他们才肯承认的。与罗马尼亚和解的前景同样渺茫，特别是在1927年罗马尼亚没收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地主财产一事惹恼新闻业巨头罗瑟米尔勋爵之后；布达佩斯议会中的每个有正义感的议员都看得清楚，英国报界“为匈牙利主持正义”，这在任何时候都比与布加勒斯特达成部分谅解更为可取。

以匈牙利为一方和以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为另一方之间的鸿沟逐年扩大。除普遍不愿考虑比较公平地划定国界外，关税壁垒的加固也妨碍了就经济问题进行合作，而这正是最能为中欧各民族带来利益的领域。这四国都是国际联盟的成员，还有小协约国中的这个或那个国家参加国联的理事会，而在忠心耿耿为国联工作方面，极少有人能比得上1918至1935年间的捷克外交部部长爱德华·贝奈斯；但尽管小协约国愿意在自己内部身体力行国联所提出来的有关和平合作的全部建议，在日内瓦却不曾有过与匈牙利和解的任何尝试，至于履行规定“重新考虑……已成为不切实际的条约”的盟约第19条就更谈不到了。在草拟这一条款整整十周年时，小协约国开始举行一系列军事会议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一旦匈牙利扰乱和平，它们将在多瑙河盆地采取军事行动的计划；这对于破灭了20年代的希望，真是一条阴暗的评语。

小协约国对魏玛共和国却从来没有像对匈牙利那样敌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人与德国民主党人向无任何争执，而捷克斯洛伐克更能与柏林保持友好关系，尽管德国报界不时对法捷友谊表

示怀疑，喜欢重弹老调，说什么遭到了“包围”。德国当局与捷克人亲密合作，允许后者使用汉堡自由港地区；他们也力图控制国境那边阴谋策划“为苏台德争取自由”的偏激的萨克森泛德意志集团。而贝奈斯这一面也对紧张局势在1925年稍见缓和有所贡献，洛迦诺公约的缔结即其具体象征；到了次年，他成为鼓吹德国加入国联的主要人之一。

捷克本也愿意小协约国与俄国达成谅解，但是即使贝奈斯也无法使他的伙伴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他步调一致：罗马尼亚政府与苏联政府之间的关系既受到一些重大问题的牵制，例如比萨拉比亚的地位，又遭到一些次要的恼人事件的干扰，例如苏联扣留玛丽皇后的珠宝问题。南斯拉夫人则直截了当地拒绝与任何布尔什维克政府的一切接触，因为南斯拉夫的国王对这个杀戮了沙皇家族的政权深恶痛绝。直到第一个和平的十年结束时，小协约国中还没有一个成员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贝尔格莱德还有一个“白俄”公使馆在活动。

新国家中幅员最大、地位最脆弱的是波兰，波兰共有六个邻国，关系恶劣的不少于四个，即德国、苏联、立陶宛和捷克斯洛伐克。魏玛共和国的历任外交部长都不打算承认德波边界已经最后划定，1925年的洛迦诺条约保证了德国的西部边界，却不包括沿通向但泽走廊的边界以及波兹南尼亚和西里西亚的边界，波兰人把这一事实解释为德国要谋求恢复其在东方失去的领土的有力证据，而且很可能与苏维埃俄国联合行动。波兰和德国的极端分子沿通向但泽的走廊煽风点火，当时发生了一场特别猛烈的关税战，导致整个这一地区出现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德波两国对此都难辞其咎。1927年12月，毕苏茨基确曾设法劝说德国外交部长中最有185和解精神的一位，即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开始就两国之间达成谅解一事进行谈判，但施特莱斯曼连这一试探性的倡议也置之不

理。毕苏茨基对德国修订派情绪的表现的惯常回答便是下令沿西部边境精心布置军事演习。就维持和平而言,这是笨拙的一招,只有在德国仍旧陷于内部危机而且无法指望苏联在东部进行干预时才能奏效。

对于波兰,幸运的是它在这一时期从未与德国和苏联的关系同时出现紧张的情况。1927年由于苏联驻华沙公使被一个反革命流亡组织的成员暗杀,而波兰当局以往曾对该组织轻率地予以捐助,波苏之间险些再开战端。这一次,立陶宛人支持俄国人,因为他们憎恨波兰人虐待维尔纳附近的同胞(俄国人在前一年签订的一项条约中,煞有介事地承认维尔纳是立陶宛的领土)。但是,主要的敌对双方都无意重复1920年的冲突,随着马克辛·李维诺夫逐渐从奇切林手中接管苏联外交政策重任以后,苏联与其西部边境接壤的诸邻国之间的关系开始稳步改善。1929年2月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集团(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及罗马尼亚一起签署所谓的“李维诺夫议定书”,据此苏联及其诸邻国都摒弃越过苏联边界互相侵犯的行动。很少人相信这种一般性的许诺真能有助于增进持久和平的希望,但这项议定书至少可使各签字国得以将宿仇积怨搁置起来,不必以劳民伤财大动干戈的叫嚣互相恫吓,从而获得一个喘息的机会;1932年7月,波兰甚至比议定书的条款更进一步,与苏联缔结了互不侵犯条约。

整个20年代,波兰的外交政策立足于三项基本设想:一是各大国都愿意维持凡尔赛的解决办法;二是与法国的联盟继续有效,其中包括俄国或德国一旦无故进攻波兰时法国将给予军事援助的保证;三是作为国际联盟成员而得到的一般安全保证。在20年代末,由于德国得到洛迦诺公约所给予的保证的支持,并在日内瓦扮演着主要角色,只剩下与法国的同盟关系还算得上一根重要支柱,但在毕苏茨基眼里,由于巴黎对贝奈斯博上的每一愿望都经

常表现出尊重的态度，法波联盟似乎也有所削弱。波兰人于是必然转向更传统的外交手段，想方设法挑拨离间那两个强大的邻邦，而不要被他们自己制成的老虎钳夹在当中，动弹不得。不幸的是，作为对协议的酬答，波兰人打算付出的未免太少，而可能得到的却已太多。 18

所有这六国的对内政策既反映出国际力量均势的变化，又对打破这种均势起了作用，这主要是因为紧张的局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少数民族问题引起的。民族最为复杂的是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需要得到斯洛伐克人和罗塞尼亚人的合作，而同时又需要设法使先前的统治民族德意志人和马扎尔人接受新秩序。然而民族问题超过其一切问题的国家却是南斯拉夫，不论是狭义的政治问题，还是社会和经济问题，都是如此。波兰和罗马尼亚既有少数民族又有大量犹太居民，这些问题的性质就不同了。而在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新近的失败所带来的屈辱人为地激起了民族自尊心，结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注意力都从关注紧迫的社会正义问题转移到热衷于干涉各邻国的事务。

1920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宪法尽管在许多方面堪称民主的典范，但它根本上属于中央集权性质。哈布斯堡君主国的旧省界已被废除，为的是突出“捷克斯洛伐克国”的统一形式，还把全国划分为二十六个行政区，预定各设一个议会，其成员一部分任命、一部分选举产生。还按照贝奈斯在和会上的诺言，为罗塞尼亚制订自治条例，并已载入宪法。同时还颁布语言法，允许不论任何地区，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只要有至少五分之一的居民使用，便可在法庭和大中小学通用。议员可以用本族语在议会上发言；宪法最后一条规定“强制推行非民族化”为犯罪行为。所有这些条款都密切遵循少数民族条约的规定，而后来所颁布的若干法律则采取一些保

障办法，以对付旨在危害国家完整的分裂主义阴谋活动。为了保全共和国而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完全正当的，因为苏台德的德意志人领袖洛格曼·冯·奥恩博士有意在1922年的议会上宣布“谁要以为一个德意志议员的最高职责竟不是在这个国家里进行叛国活动，那他就是大错特错了”。

马萨利克总统，这位德高望重、超乎党派斗争之上的人物，对洛格曼如此骄横的演说所包藏的威胁是充分注意到的。1919年他曾私下讲过，“对我们来说，德意志人问题是最重要不过的。如果我们能为我们的国家把德意志人争取过来，也就能把其他所有的民族都争取过来。”20年代期间，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关系迅速改善，虽然最初几年还不断有人抱怨存在歧视，特别是在实行土地改革和选拔任用公职人员方面。1926年，苏台德的德意志人的态度已充分缓和，他们的议会代表之一参加了执政的联合政府；直到30年代纳粹运动兴起时为止，苏台德德意志议员大多数始终支持政府。特别是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对共和国的政治生活作出了明显的积极贡献。马扎尔人比较不易和解，而他们所受的细微蔑视确实远较德意志人为少。议会里的匈牙利代表人数从未多于十名，其中有些属于左翼代表，他们对霍尔蒂的匈牙利和对马萨利克的捷克斯洛伐克同样敌视。

对于接受统一的国家这一原则，斯洛伐克人，特别是农民，要比马萨利克——他本人有一部分斯洛伐克血统——在1918年春与其移居美国的兄弟们谈判时所预期的要缓慢得多。起初，斯洛伐克人对新的政治秩序不过是不关心和了解，不见得心怀敌意，当时，如能机智从事，原是有可能争取到他们的积极支持。不幸的是王牌飞行员兼斯洛伐克人在“新欧洲”集团里的代言人米兰·斯捷法尼克1919年5月飞回布拉迪斯拉发、准备作为凯旋的英雄接受人们的欢迎时，飞机中途在下喀尔巴阡山出事，机毁人亡。而在那个

关键时期，却别无其他斯洛伐克领导人既具备能唤起同胞们激情的人格，而又为马萨利克和贝奈斯所信任，虽然后来有农民党人米兰·霍贾和社会民主党人伊凡·德雷尔，在捷克和斯洛伐克都获得广泛支持。在1919年和1920年，突然有一批行政官员和学校教师从捷克各省拥入斯洛伐克，斯洛伐克人震惊之余，自然而然转向本地少数受过教育的人，即神职人员寻求忠告与政治指导。在布拉迪斯拉发这样信奉新教的城镇里的路德派教士曾有过捷克-斯洛伐克合作的长期传统，统一的国家这一原则受到欢迎，尽管对其结构的细微末节也曾有过批评。但在远为广大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农村地区，绝大多数教士都反对布拉格的统治，而在某些区域他们公然表示亲马扎尔。捷克教育当局把天主教中学（大学预科学校）置于国家管辖之下，以便抵制亲马扎尔的教育，这一行动特别引起民愤。喀尔巴阡山麓地区的教士几乎都充当格林卡阁下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党”的地方代理人员。当然，还有一些村庄——大半在斯洛伐克西部——乐于投票拥护中央集权的捷克斯洛伐克诸党派来反对教会。但格林卡的追随者在1925年至1935年的每次选举中，所得票数始终恰好少于五十万张，人民党一直是斯洛伐克最大的一个政治组织。 188

斯洛伐克的生活条件在20年代完全改观。与匈牙利统治时代相比，社会立法较前完善，住房条件较前提高，学校和文化机构较前增多，政治和宗教信仰较前自由。然而人民党的一翼却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敌人秘密合作，接受匈牙利的鼓励和金钱，与波兰也有同样关系，不过规模小得多。赫林卡本人尽管因为布拉格不认为斯洛伐克“已经成熟到足以自治”而深感愤怒，却极力争取改善共和国两个主要地区间的关系。1927年，他授权两名党员参加联合政府班子，他们在政府里任职数年（虽然其中一个部长，即约瑟夫·蒂索神父后因充当希特勒在斯洛伐克的傀儡而臭名昭著）。1928

年初与梵蒂冈缔结了一项临时协议，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摩擦已在开始缓和，而 1929 年夏格林卡的最坚定可靠的追随者之一杜卡教授则因有勾结匈牙利人的叛国行为被交付审讯，判处十五年徒刑。虽然杜卡无疑有罪，而且还有许多未被逮捕的其他党员也的确有罪，这次审讯却激怒了相当大的一部分斯洛伐克人，重新触发两个民族集团之间的宿怨。

第三个民族集团，即罗塞尼亚人，从未得到宪法所保证给予他们的自治地位。马萨利克总统按宪法规定及时任命了一名喀尔巴阡—罗塞尼亚总督，但他应向其负责的议会却未能开会，大概是因为根本就没把议会选举出来。捷克人解释说，罗塞尼亚人没有政治觉悟，落后、无知，甚至比斯洛伐克人更不适于自治。1922 年国际联盟得知，在斯洛伐克与罗塞尼亚之间的准确边界线未明确划定之前，议会选举不能举行；后来事实表明，划定边界一事本身却须经罗塞尼亚议会批准。罗塞尼亚人当然参加了全国的议会选举，而且在 1925 年与 1935 年，共产党比其他九个政党中的任何一党都获得更多的支持。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初期，罗塞尼亚人从未积极敌视捷克人，这并不奇怪，因为罗塞尼亚人以前从未有过这样好的房屋、学校、道路和保健设施。捷克人对管辖罗塞尼亚时实行的实际上是一种仁慈的殖民统治，他们这二十年的试验 189 在中欧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试验成绩显著，同他们在波兰、罗马尼亚、或者苏维埃乌克兰的同胞相比，捷克境内的罗塞尼亚人所享受的自由要大得多，生活水平也高得多。但这一切倒并不恰恰是巴黎和会的设想。贝奈斯把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设得“有如瑞士”的想法在 20 年代末比在 20 年代初看来就更加不够适当。

“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这一名称虽然有些冗赘，倒比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更加中央集权。尽管科孚条约和

战争最后几星期错综复杂的谈判为建立一个真正的南斯拉夫联邦提供了某种前景，新国家却被控制在帕西奇和塞尔维亚激进党手中，九个民族都是由贝尔格莱德直接统治的。在南斯拉夫实行君主专制的二十三年期间，只有五个月是由一个非塞尔维亚人（1928年，斯洛文尼亚教士科罗舍茨）担任政府首脑。同样，塞尔维亚人始终是任陆军与海军大臣；1919年11月，特鲁姆比奇辞去外交大臣后，这一职务也一直由塞尔维亚人把持。关键性的外交官员和高级军事指挥官都只任命塞尔维亚人担任，其中几乎所有的人原籍都是1912年前的塞尔维亚。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的穆斯林虽曾参加各届政府——在王国成立后的头十年里共有二十四届——但难得把较重要的部门托付给他们。

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甚至在其后一些时候，非斯拉夫少数民族的地位十分悲惨。早在王国成立之初，就已经认定：所有保加利亚族马其顿人已经成为第二等的塞尔维亚人，而阿尔巴尼亚的什奇普塔尔居民的地位也同样低下，他们都急于要塞尔维亚化。马其顿人相应地也没有得到任何民族自由，只有信奉回教的什奇普塔人享有少量的宗教自由。巴纳特的罗马尼亚人初时受到严酷镇压，结果他们中间的大部分教师与传教士逃出国境，财产（不仅包括学校和修道院，而且包括教堂拥有的土地）全被没收供塞尔维亚人享用。出于外交政策上的考虑，南斯拉夫王国的态度后来略见开明，到20年代末，贝尔格莱德与布加勒斯特双方开始谈判允许罗马尼亚学校重新开学，恢复罗马尼亚正教教会一定的独立；但直到1933年才签订协定，承诺作出这些无足轻重的让步。

罗马尼亚毕竟还是友好邻邦和小协约国中的一名伙伴，其情况尚且如此，属于“前敌国”的匈牙利少数民族处境如何恶劣，就更可想而知。既然匈牙利人拥有的庄园特别庞大，土地改革强加于马扎尔少数民族的负担也许难免沉重，尤其在伏伊伏丁那一带。但

压制远远不止于此，受打击最大的与其说是以前的士绅阶层（他们大部分迁移到北边去了），倒不如说是比较贫苦的马扎尔劳工和农民。王国在行政和商业上，并且尽可能在私生活方面千方百计限制使用马扎尔语。只允许某些学校开设有限的几个用马扎尔语的班级，大部分教师却是塞尔维亚人或克罗地亚人，他们不大懂得这种语言。德意志少数民族（大约有五十万，略多于马扎尔人）受到的待遇不那么严厉，部分原因是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他们看来不像马扎尔人那样危及国家安全。一个德意志民族党 1923 年参加竞选，在议会获得八个席位，尽管一年之后因为其领导人冒犯了帕希奇而议会被解散。由于下一届政府更选，这个党竟得以重新组建，在整个 20 年代，议会中一直有它的代表，这是南斯拉夫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事件。但无论是马扎尔还是德意志少数民族都没有同南斯拉夫国和解；积怨过深，终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特别凶猛的方式发泄出来。

南斯拉夫的议会历史自始至终毫无秩序，几乎濒于一片混乱的地步；这是因为王国的政治结构所根据的宪法在议会里虽然获得令人满意的大多数的批准，当时却有五分之二 的议员拒不出席以示抗议。宪法在 1921 年 6 月 28 日维多夫丹节（即塞尔维亚的国庆节）通过，此举虽堪称适当，却不甚明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曾力争实行联邦制，而竟归于徒然，便拒不投票支持他们强烈反对的这一宪法；他们继续要求实行分权制。然而这部宪法根本是一项有关民主政体的文件，它坚定地确定了由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一院制议会以及内阁负责制原则。另外，摄政王亚历山大（1921 年 8 月国王彼得去世后才由他继承王位）诚心诚意地要当一位立宪君主，作为受他治下的各族人民委托的管理人。不幸的是亚历山大是个十足的军人，而且还是个塞尔维亚军人。对他来说，出自派性的反对意见无异于煽动闹事或公开叛变。因此，国家结

构不可能通过威胁或暴力，只能以巧妙暗示的变革来加以修改，而且不能用正式决定的宪法修正案的形式。这一层，斯洛文尼亚人领会了，克罗地亚人却没有。

斯洛文尼亚人逐渐在这个国家里获得高度的自治，这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主要发言人科罗舍茨的技巧，一部分则由于交了可称作他们民族特色的红运。只要斯洛文尼亚语被承认为“国语”之一，地方事务就必然得由他们自己掌管，因为既然欺侮百分之九十一的老百姓时，普通漂亮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已经够用，决不会有哪个塞尔维亚官员肯为哄骗百分之九的老百姓去专门另学一种语言。斯洛文尼亚人还占了另一样便宜：他们比其他南部斯拉夫同胞办事效率高，这一点是连塞尔维亚人也承认的，而且他们在奥地利统治时期就不时地有了一些行政经验。因此，在一个居民大半是文盲的王国里，他们常常被任命担任政府或银行及其他相似行业的高级职务就毫不奇怪了。塞尔维亚人气愤地声称“斯洛文尼亚人便是我们的捷克人”，克罗地亚人则说“斯洛文尼亚人便是我们的犹太人”，两种说法大同小异，相映成趣。塞尔维亚人的统治在斯洛文尼亚从来未像在克罗地亚那样引起民愤。从塞尔维亚各地区征来的兵员守护着斯洛文尼亚边疆或警卫着各城镇，而斯洛文尼亚青年则被派去维持巴尔干地区领土的治安；公告牌上的拉丁化的斯洛文尼亚文旁总并列着一排人们不熟悉的西里尔文，但这种恼人现象是小事一桩。斯洛文尼亚从未出现过强大的分裂主义运动。

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虽曾多次试图和解，似乎不可能长期相安无事。他们之间的分歧一部分有长远的历史根源，一部分出自新近的抱怨，譬如说克罗地亚人对那个把贸易中心从萨格勒布挪到贝尔格莱德的政府向他们征收重税就极为不满；尤其使他们恼火的是领导人物之间的冲突。南斯拉夫最强有力的人物无疑

是尼古拉·帕西奇，1926年12月他去世之前情况始终是这样。对于几乎半个世纪以来的巴尔干政治，他一一了如指掌，可是件件不饶。在萨格勒布每个关键时刻都反对他的则是斯捷潘·拉迪奇，这是一头反复无常、眼睛全被蒙住的骡子，克罗地亚的农民把他们的不满全都倾泄在他身上。这两个人互不谅解，互不信任；彼此之间的反感一方面转化为各自追随者之间的敌意，另一方面反过来又被这种敌意所加深。

在1923年的斯库普什丁纳^①的选举中，农民党在克罗地亚取得惊人的胜利，拉迪奇因此便打算与贝尔格莱德彻底决裂。在拒绝允许新选出的议员们参加任何议会讨论之后，他使用一份伪造的护照溜出国境，开始遍游革命的欧洲，为克罗地亚事业争取外国同情。他的最惊人的成就，是1924年7月他在莫斯科突然宣布他的党将参加农民国际，这是共产国际筹建最早的“统一战线”组织之一。多数克罗地亚农民虔诚信奉天主教，因此，尽管拉迪奇本人对教会的看法总是稍微有点古怪——例如人所共知，他曾以这样的祈祷口吻宣布若干会议的开始：“赞美耶稣、打倒教士！”——这一事态的发展在国内引起相当大的惊恐。拉迪奇从莫斯科向他在萨格勒布的报社发回热情洋溢的报道，告诉读者说：“新俄罗斯跟我们人道主义和共和制的克罗地亚并无二致，只不过苏俄要大得多、大得多。”他怀着富有诗意的狂热，简练地描绘了他对欧洲的印象——“莫斯科照耀着灿烂阳光，维也纳沐浴着朦胧月色，而布达佩斯则一片漆黑。”他流亡归来之后，以更加热烈的语言公开表达了同样的感情，这就促使帕西奇将农民党作为布尔什维克运动于1924年12月设法解散，还把拉迪奇同其他四名议员投入监狱。

南斯拉夫政治仍存在着令人难堪的个人主义作风。拉迪奇的

① 斯库普什丁纳(Skupština，即国民议会。——译者

侄子多次设法接近帕西奇，从而产生异常显著的结果：农民党再度获准公开活动；1925年夏，该党那位顽梗不化、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不但从狱中获释，而且被安排进帕西奇的政府，不恰当地被任命为公共教育大臣。但是，虽然拉迪奇在主张分裂的同时对亚历山大国王必恭必敬，却根本不懂得集体负责的概念，对议会中微妙的礼节一无所知，竟至在议院里站起身来，破口大骂一些内阁同僚形同猪猡。1926年4月1日，这位公共教育大臣只得辞职，农民党完全转为在野党。尔后两年，克罗地亚议员竭尽全力阻挠塞尔维亚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议员提出的措施。也许可以说，争端必然会达到这一顶点：1928年6月20日，一个门的内哥罗代表在斯库普什丁纳掏出左轮手枪，把两个克罗地亚农民党议员当场击毙，其他三人受重伤，其中包括拉迪奇。他在七星期后逝世时，整个南斯拉夫联邦似将瓦解。

亚历山大国王对这些事件委实感到震惊。他任命科罗舍茨为首相，希望这位斯洛文尼亚人能与克罗地亚人取得某些一致看法，这是任何塞尔维亚人绝对做不到的。但农民们所要求的并不仅仅限于政治上的变革：那年庄稼歉收，他们认为国家对此应该有所补偿；正是由于这个问题而不是民族问题，科罗舍茨政府竟于12月倒台。一时找不到明显合适的继任人。新年的第一个星期里，国王两次长时间接见并倾听克罗地亚农民党新领袖符拉德科·马切克的意见；只有把国家改组为联邦制，才能满足克罗地亚人的要求；对这一点，国王拒不让步。1929年1月亚历山大国王宣布亲自负责主持王国的政治：废除1921年宪法；解散一切现有政党；对新闻出版加以限制；由国王和以佩塔尔·日夫科维奇将军为首的内阁会议共同掌握行政权。这位将军自1913至1914年与黑手党发生冲突以来便是亚历山大的亲密朋友。紧接着在10月间发布命令根本改变王国的行政体制（在这些命令中，王国第一次正式称为“南斯拉夫”）。193

原有各行省和各部门的建制全部废除，诸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危险的刺激性名词也都代之以巴昂辖区^①，其中大都以河流命名。九个辖区中有六个划定边界时，都设法使塞尔维亚人成为多数，这次行政安排清楚地表明国王独裁真正的精神实质，尽管后来又有一些命令取消了军队里的明显是塞尔维亚式的军旗，并不再以维多夫丹节作为国家的主要节日。

国王独裁是恬不知耻的反民主做法，却并不一定因此而不得人心；政治把戏已令人厌倦得大伤脑筋。再者自国王发动政变以来，一连两个夏天五谷丰登，同时又出现了为时短暂的经济繁荣，特别是新兴的纺织工业。

但南斯拉夫警察当局取缔政治活动的措施则极其野蛮，农民党和共产党都横遭迫害。为了避免逮捕，人们自然要设法逃往国外。有些逃往日内瓦，准备了一份有关克罗地亚状况的备忘录递交国联；其中所提出的不经审讯随意监禁和使用酷刑的证据使西方舆论为之哗然。另有些人则决心向南斯拉夫的天然敌人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意大利为克罗地亚争取援助。居留意大利的人里面有一位是前克罗地亚农民党代表安特·帕韦利奇，国王发动政变的第二天，他在萨格勒布成立了一个秘密会社，其成员发誓要为建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而战斗。帕韦利奇的追随者自称“乌斯塔沙”^②造反者，看不上拉迪奇和马切克的自由主义的消极态度；他们深信唯独暴力与恐怖才能摧毁塞尔维亚的统治。王国独裁不但远未解决民族问题，反而使民族问题一旦再度出现，斗争势必更加残酷；1928年6月那天傍晚从议会大厅里传出来的枪声回响在南部斯拉夫国土上的山谷与森林中几乎长达二十年之久。

① 原文是Banovine，意即巴昂辖区（省）。——译者

② 乌斯塔沙(Ustaše)，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克罗地亚的法西斯武装组织。——译者

在法律方面，南斯拉夫是东欧新国家中第一个取消民主宪法 194 的国家。然而它却不是第一个建立独裁统治的国家，因为在波兰，议会时代在 1926 年春突然中断，虽然这一次还允许议员们假装治理国家，可是，四年半之后，许多监狱里满是在野党领袖。

波兰民主之所以夭折，并非由于民族纷争，而是由于有一个人对民主的软弱无力感到忍无可忍。荒谬的是，波兰共和国从建国之日起就是由一个比巴尔干任何君主都更有权势的独裁者约瑟夫·毕苏茨基统治着，国家在 1920 年 3 月授与他元帅称号。回顾起来，毕苏茨基魔力的实质究竟何在？人们找不着，抓不住：他是个有才能的军事指挥官，却比不上索比耶斯基^①；他勇敢，却缺乏远见；他谢绝担任政治职务，看到别人行使权力却又十分暴躁；他打击老同志，而且拉起一支部队来反对那个他声言是他一手创建的共和国。但是，如果说由他名望构成的底座过于脆弱，支撑不起他这个人物，那么他伟大的品质依然存在，毫不减色：他的伟大在他那信心十足的言论中铿锵有声，余音袅袅，他深信自己乃是民族求生意志的卫士。如果说他是战后的拿破仑式人物中的第一个，那么他也是波兰浪漫人物中最后的一个，他的奥秘可能就在这里。

从 1919 年至 1926 年波兰国民议会取得的成就始终平淡无奇，一则是因为按比例代议制导致软弱的妥协，一则因为全部议员都受训于已经覆灭的三个帝国的显著不同的学校。人数最多的政党是由维托斯的皮亚斯特农民组成的，他们原先来自加利西亚，虽然比来自前俄罗斯境内的地主和波兹南尼亚地区的贵族左倾，却比多瑙河盆地的农民党领导人保守得多。所谓土地改革，只是半心半意而不够光彩的，与德国之间连年不断的关税战自然造成通货

① 索比耶斯基(Sobieski 1624—1696)，波兰国王，1674—1696 年在位。——译者

膨胀，致使国家在1923年和1925年两度面临物价暴涨和失业人数陡增的局面。当维托斯的皮亚斯特农民党人企图将工资与物价挂钩时，便出现了罢工、骚动，克拉科夫甚至成立了寿命只有一天的苏维埃政权；国民民主党人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后来实行的那些莫明其妙的措施，也没有使商业与银行免于崩溃。看来只有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和加重赋税才能给共和国财政以喘息之机；而当联合政府在1926年4月提议实行这些措施时，它却面临着社会民主党人和全部产业工人反叛的威胁。

195 这位元帅自从1922年12月把“国家元首”的权力移交给宪法设想的第一任挂名总统纳鲁托维茨教授之后，就不曾担任政府职务（纳鲁托维茨实际上在两天之后即被暗杀，后由合作运动领导人沃伊齐霍夫斯基继任）。毕苏茨基继续担任总参谋长五个月，接着便退休回到苏莱约维克庄园，但对议会心怀疑虑，对宪法竟然把这样一位软弱无力的执政者安顿在国家元首的位置上，深感愤怒。

有三年光景，苏莱约维克庄园对于毕苏茨基有如他年轻的崇拜者夏尔·戴高乐1946至1958年在科隆贝双教堂时的情况一样。这位元帅不待沃伊齐霍夫斯基总统咨询，就不时给他出谋划策，要他节制议会中过火的民主行为，但无明显效果。1926年5月11日他终于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文章，总的目标是针对议会，主要却是攻击皮亚斯特党；第二天，忠于毕苏茨基的部队便占领了华沙的一部分郊区。值得注意的是，工人们支持这位元帅——他的政治生涯自然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者开始的——铁路工人接着举行罢工，阻止政府将军队从波兹南尼亚调往首都。连日激战，伤亡人数多达一千。5月14日到15日夜间，总统和政府辞职，政权再次落入毕苏茨基手中。

起初毕苏茨基仍旧拒绝承担行政职务，宁愿提名自己的朋友

出任总统兼总理，但在1926年10月至1928年3月和1930年一个短时期都曾同意出任政府首脑；他还坚持要担任陆军总监，这个位置相当于总司令。实际上，他的官衔如何，无关宏旨，直到1935年政变九周年他去世之前，各项内政外交方针大计无一不为他的观点所左右。议会仍然存在，而且在1928年和1930年照常进行选举，但是立法却只是大大加强了执政者的权威；政府则由行政官员执掌，他们只是在形式上对议会负责。从统计数字来看，波兰经济繁荣了；毕苏茨基似乎真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中流砥柱；于是，外国特别是美国便给予贷款，在平衡国家预算方面有所裨益。工业从战争影响下恢复了过来，格丁尼亚港的建成使波兰的对外贸易不再仰仗但泽港，并且摆脱了苛重的港口税。波兰却不免被紧紧地捆绑在美国的股票市场上；因此，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价的余震一直波及华沙和克拉科夫的各家银行。

少数民族问题在毕苏茨基时代表现得相当尖锐，但是无人认真解决。在波兹南尼亚和波莫瑞地区（即通往波罗地海的“波兰走廊”），当局与德意志族居民之间从一开始起就在教育政策上发生冲突；德国一加入国联，日内瓦就开始讨论对德语学校不足提出的怨言。毕苏茨基毫不改变他前辈们的“波兰化”倾向，并向德意志少数民族施加经济压力，故意逼迫他们迁居德国（许多人真地这样做了）。上西里西亚虽在国联派来的专员们的保护下享有某种程度的自治权，毕苏茨基却任命狂热的波兰民粹分子米哈尔·格拉增斯基担任地区总督，他在选举中不但纵容对德意志人、而且也对维护真正自治的讲波兰语的人们进行恫吓。在东方，为数远远超过波兰任何其他少数民族的乌克兰人，得不到任何形式的地方自治，抱怨学校里的“波兰化”较之德意志人理由更加充分。乌克兰人铤而走险，成立一个秘密革命组织——乌克兰解放组织（UWO），1930年夏季对波兰官员和地主们采取一系列恐怖行动。毕苏茨基把这

类骚动看作一次重大的叛乱，派骑兵前往东加利西亚各乡村，建立一恐怖政权，波兰军队因此臭名远扬，与十年前英国的“黑与褐”部队在爱尔兰的恶名不相上下。毕苏茨基政府既没有遵守1919年签署的少数民族条约的精神，也没有恪守其条文；1934年秋，更变本加厉地公然把这些义务一概否定。

从毕苏茨基元帅披着伪装的独裁统治中得到好处的唯一少数民族是犹太人，除美国外，波兰的犹太人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多。反犹太主义在波兰土地上根深蒂固，特别是执行过最后两代沙皇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法律的那些地区。1926年成立的毕苏茨基政府最先处理的问题之一便是一位犹太籍市长的上诉：一个波兰官员宣布他的当选无效，理由是与1890年的一项俄国法规相抵触。直到1931年毕苏茨基才最后保证废除沙皇对犹太人自由所施加的种种限制。更为积极的则是这位元帅还设法通过一项立法保护犹太教信徒的宗教权利，并继续奉行格拉布斯基所制定的承认犹太人应有独立的教育机构的政策。尽管如此，政府机关里的许多下级官员根本上仍持反犹太立场，深深妒嫉犹太居民在商业和银行界担任重要职务。甚至在毕苏茨基去世前，老习惯已开始重新抬头，而且在共和国最后一些年间也并没有认真地试图同化波兰籍犹太人。他们虽然熬过了许许多多侵犯其自由的粗野侮辱行为，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得遭受更加可怕的暴政的茶毒。

197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国内政治染上了慢性消化不良症。这并不奇怪，因为并入“大罗马尼亚”的新领土，面积和人口都超过了战前称作“雷格特”^①的旧王国，更何况这些领土在人种与

① 原文是Regat，意即旧王国。——译者

社会形态方面都种类繁多。如果说罗马尼亚已经改变的话，布勒蒂亚努和阿维雷斯库一类人物却没有变化，而这些年间的许多压力来源于布加勒斯特的老政治寡头们不肯承认他们正生活在一个新的国家，而不只是生活在一个膨胀了的“雷格特”里。荒唐的宫廷丑闻也阻碍了政治进步，因为这类事情使王朝失去保持国家统一的力量。大罗马尼亚肥沃的小麦产地和丰富的石油矿藏使它具有其他东欧国家所没有的潜力，但是，却没有哪个国家像它那样任性挥霍资源。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全国一般生活水平实际上低于1914年的“雷格特”时期。

虽然罗马尼亚新宪法直到1923年才起草，国王斐迪南仍履行了战时作出的一项保证：和约一经缔结，便扩大公民选举权；1919年11月举行的统一后的王国选举果然真正具备代议性质，并且摆脱了罗马尼亚历届选举中惯有的弄虚作假行为。传统的政党都不符合选民的要求：保守党被视为亲德；自由党则不过是一味按布勒蒂亚努的个人意志行事。（特兰西瓦尼亚）民族党获得最大成功，将近三十年来它率领罗马尼亚人反对布达佩斯的威胁；其领导人瓦伊达-沃伊沃德组成一联合内阁，第二把交椅便是扬·米哈拉凯，他的农民党是罗马尼亚政治生活中另一新鲜事物。

巴尔干战争以前布勒蒂亚努曾经许诺、继而斐迪南国王和国会又曾在1917年和1918年重申过的土地改革，终于有可能实行。但是，国王与老政治领袖们却对他们允许自由选举造成的局面惴惴不安。一想到列宁在他们北边和斯塔姆博利斯基在南边的所作所为，布达佩斯资产阶级华美的林荫道上的行人便不寒而栗。瓦伊达-沃伊沃德就任仅仅四个月就被国王专横地解除职务，由罗马尼亚主要的战斗英雄阿维雷斯库将军组织新政府，他刚刚为此需要建立了一个“人民党”。不出所料，他在选举中获得多数选票，这或者说明他深得民心，或者显示罗马尼亚的警察和小官吏可以跟

国内任何能工巧匠的本领媲美。

阿维雷斯库这个在1907年镇压过农民起义的人物在政治上心狠手辣：持不同政见的工人们被征入伍，置于军事纪律约束之下；
198 工会组织者被作为布尔什维克逮捕下狱。但是阿维雷斯库又是农民的儿子；他知道土地改革如果控制得当，能起到安全阀的作用；因为一旦农民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他们就会变成顽强的有产者，这种人根本不会同政治上的左派打交道。土地改革条例于是在1921年7月正式成为法律。土地重新分配的规模各省不同，对特兰西瓦尼亚的外国人庄园重分范围较之在“雷格特”境内大一些。总的情况是从特权贵族—士绅阶级手里没收大约占王国可耕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的土地，分给农民（农民于是成为罗马尼亚社会中的最大的组成部分）。从社会和政治意义上说，土地改革条例堪称成功；但在经济上则是一场灾难，因为把大面积的庄园分成小块便引起耕作标准下降。由于缺乏农业知识，作物年产量低得令人沮丧。有些时候农民们将小块土地变卖给较大的农场，移居城镇，可是，农村人口过剩的情况依然遍及全国。

1921年12月，阿维雷斯库政府也像瓦伊达-沃伊沃德政府一样突然倒台，原因是财政大臣蒂图列斯库大胆提出征收财产税，将军本人又很不明智地发表了一通使国王不悦耳的讲演。接着在1922年3月进行普选。这次轮到自由党人居然轻易取胜：他们的议席从1920年的十七席增加到二百六十席，而阿维雷斯库的党则从二百零九席降至十一席。短短的二十二个月里竟发生这样大幅度的摇摆，致使所有在野党议员都顿时怀疑这次选举的投票结果报告是否属实，进而怀着厌恶的心情退出议会。但是，没有在野党并未使布勒蒂亚努感到为难，他着手准备一部新宪法。宪法一经公布，他的敌手们虽又重返议会，却也无力修改宪法。

1923年的宪法一直是个伟大的政党道德败坏的悲哀的注脚。

它开宗明义就毫不让步地声称：“罗马尼亚王国是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国家”；贯穿整个文件的原则是中央集权制，绝无丝毫地方自治的痕迹。尽管“新罗马尼亚国民”不断抗议，老的行省区划却一扫无余，而代之以由布加勒斯特管辖的行政区。议会选举是一种独出心裁、毫无顾忌的比例代议制，1626年时只得以进一步的立法来表明当选的政党究竟应得到多少“附加席位”。保证男子享有不记名投票的普选权，也应允妇女在议会就她们行使选举权的条件作出规定后同样享有这种权利。对于代表们来说，这项任务可能确实繁重，因为一直到1946年，妇女们才得到选举权。国王保留相 199 当大的权力，国王在立法上有绝对的否决权，有权随意解散议会，有权不顾议会意志任免各部大臣。宪法虽然确实就传统的公民权和政治自由作了保证，但以不得危害“国家安全”为条件，这种含糊措辞后来作了广泛解释，特别用于限制工会运动的发展。一般地说，这部宪法是一份开倒车的文件，自由党以外的人士对它没有半点尊重。这是一个衰老的政党寻求从政治上永远控制王国的策略，它的寿命也就和自由党本身同样长久，亦即维持到1938年国王卡罗尔二世决定使其独裁制具有宪法约束力之时为止。

不出人们所料，紧跟着中央集权制宪法的制定，便是一段国内民族主义顽强表现的时期。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和多布罗加南部的保加利亚多数民族被视为罗马尼亚民族国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敌，他们的政治活动遭到怀疑和监视；然而马扎尔人却至少比在南斯拉夫享有较好的教育条件。德意志族居民没有造成什么麻烦，布加勒斯特政府对他们相当宽容，甚至娇纵，既承认他们生活方式的异国情调太浓，难以同化，而与此同时又千方百计防止他们被多瑙河中游各国要求修订和约条款的观点所诱惑。另一方面，比萨拉比亚的乌克兰少数民族的日子却相当难过，部分原因是罗马尼亚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迷惑了这个省份，部分

原因则是只要不实行军事管制，这里就会成为更多的无恶不作的小官吏的天下。1924年在塔特拉布纳里村（位于伊兹梅尔和敖德萨中间）就发生过一次严重的、的确是共产党鼓动起来的起义，其他地方也不断发生动乱，都被警察以无比残忍的手段随时任意镇压下去，布科维纳的罗塞尼亚人所受到的待遇不比他们的乌克兰同胞们优厚，但公开镇压的情况较少。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所关心的与其说是消除外来文化影响，倒不如说是为了确保经济控制权。根据1924年的文图拉·布勒蒂亚努“民族化法律”，一切由非罗马尼亚人担任经理的公司都由布加勒斯特任命的人员加以控制。这些措施的目的首先是控制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不断发展的工业，它们既引起各少数民族、又引起一些新罗马尼亚人的抗议；老“雷格特”境内的人倍受恩宠使他们怨恨。战前就掌握着商业命脉的犹太族居民本来也会饱受这种法律之苦，却靠了一种公认的惯例而得以免除。这就是企业每逢受到不利的立法的威胁时，只要给党或国家举足轻重的人物送上一笔巨款，便能消灾免祸。后来一些资产雄厚的德国和马扎尔人开办的公司逐渐也用类似的“护身法”，把扎在他们背上的法律限制的芒刺拔了出去，他们的负担因此几乎全部转嫁给一些较小的公司。不妨附带说说，这种排外的财政政策的一个最重要的副作用是阻碍外国投资，结果也就妨碍了本来能够支持罗马尼亚经济的实业的增长。

在摩尔达维亚——另一些地方其实也如此，虽然程度较差——年青一代并不赞同老一代人那种通权达变的实用主义：只要一张支票落到手里，民族热情就立即软化。这些年青人，其中许多是学生，抱有一种古怪歪曲的理想主义，装模作样地认为纯洁无瑕的罗马尼亚已被犹太人玷污；巴尔干诸国唯一的法西斯式群众运动正是在这种反犹太气候中扎根和滋长起来的。1923年不过

二十岁多一点的科内柳·科德里亚努在雅西大学时建立起“铁卫队”。到1928年,这个组织已十分强大,结果,它在克卢日、奥拉迪亚、胡内多阿拉和特兰西瓦尼亚其他城市迫害犹太人的暴行引起国际联盟的关注。铁卫队的受害者既有犹太人,也有一些少数民族。它的恐怖特点颇有狂热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科德里亚努宣称,在1923年他在狱中曾见天使长米哈伊尔显的幻象,召唤他去完成罗马尼亚民族道德上的新生。

在布加勒斯特,议会中的场面大部分仍旧是异常不体面的。选举结果,得票数还是和板球赛所得分数明显地相似,只不过总是更容易预测而已。阿维雷斯库在1926年获得二百九十二席,布勒蒂亚努则在1927年获得二百九十八席。但这是布勒蒂亚努最后一次的胜利,因为他在那年随即去世,自由党领袖由他兄弟文图拉接替。国王斐迪南也已去世,先是,他的长子卡罗尔私生活有种种丑事,他已强迫他宣布放弃王位。斐迪南的孙子米哈伊尔国王年仅六岁,便由一个摄政理事会代行王权。1928年摄政理事会打破新近的传统,允许自由选举。正如1919年那样,胜利归于特兰西瓦尼亚党和农民党合并而成的国家农民党,其领导人则为战前布达佩斯议会的老政治家、一尘不染的禁欲主义者尤利乌·曼纽。

其后两年,罗马尼亚享有它历史上唯一一届名符其实的议会政府。曼纽和主管农业的米哈拉凯为农民办了不少事情,诸如:减轻税收负担,行政上实行分权制;允许经选举产生的公社负责管
理地方事务。取消了对外国资本的限制,一笔国际贷款终于使罗
马尼亚的预算得以平衡。不仅政治体制形式上是统一的,而且全
国都感到一派合作的景象。情况普遍改善,甚至陷入困境的比萨
拉比亚也不例外。可是,曼纽在1930年夏季犯下一次策略性的错
误:他认为长时期实行摄政制度对罗马尼亚人民将是危险的,他与
流亡在外的三十六岁的卡罗尔大公进行了磋商。6月6日,卡罗尔

突然戏剧性地飞回布加勒斯特，夺取了王位，顿时成为欧洲报纸的头条新闻。卡罗尔之能复位，一切都出自曼纽的安排；他所坚持的唯一条件是卡罗尔必须抛弃他的情妇马格达·卢佩斯库。卡罗尔一旦登上宝座便不再觉得还必须信守在巴黎时通过私人使者达成的口头协议。8月4日卢佩斯库溜回罗马尼亚；10月6日曼纽辞职以示抗议。

国家农民党内阁并未从此结束，但在某种意义上，国家农民党政治却从此告终。该党在一班庸庸碌碌的脚色领导下勉强挣扎到1931年春。而政治生活却越来越为卡罗尔二世及其亲信所控制。遗憾的是，这位国王缺乏政治家的资质，其私生活尤其难给他的形象增添光彩。因为他和卢佩斯库的瓜葛决不是拉辛^①笔下那种难以满足的强烈爱情的悲剧，而是一出费多^②式的滑稽剧，剧中这个外省药店老板的红发女儿成了宠幸亲私、卖官鬻爵的总根源。而在卡罗尔自己塑造的形象中，堂堂君主的气派不多，花花公子的味道不少。人们很难摆脱这样一种感觉：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会配上这样一个统治者，算是各得其所；但布加勒斯特上流社会却并不就是罗马尼亚。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这两个战败国的社会结构和历史当然根本上互不相同。但两国都被迫接受战胜国所强加的和约条件这一事实，使它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心中的不满有罕见的相似之处。和约剥夺了它们的国土，使其版图相差无几，而两者中略小一些的匈牙利的人口比保加利亚多出一半以上。两者都是单一民族占压倒

① 拉辛(Jean Baptiste Racine 1639—1699)，法家诗人及悲剧作家。——译者

② 费多(Georges Feydeau 1862—1921)，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深受巴黎观众欢迎的少数法国戏剧家之一，其闹剧经常上演，著名剧作有《马克西姆家产的贵妇人》、《恶语伤人》等。——译者

多数的国家，也都要求修订和约，都把战后最初几年中的尖锐革命动乱看作国家蒙受的创伤。它们对创伤的不同反应方式却再次突出地显示中欧与巴尔干国家之间的根本区别。匈牙利一旦遇到危机，就谋求由传统的统治阶级组成坚强的政府；保加利亚既缺乏自信 202 心，又无所适从，一味纠缠不清的便只是旧仇与凶杀。

匈牙利从1920年至1931年间的政策一直为两个权势人物所左右，其一是摄政王霍尔蒂，另一是1921年4月终于被任命为首相的保守派贵族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最初，霍尔蒂行动审慎。1920年夏季大选结果，小农党成为议会里最大的一个集团，但是，让一个像罗伯特·皮尔的托利党那样激进的政党来统治特里亚农条约签订后的匈牙利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小农党人便接受劝说，让一位思想最高尚的权贵泰莱基·帕尔伯爵主持联合政府，他们自己只在其中担任次要职务。涉及匈牙利全国农业面积约十二分之一的土地改革“第一期”方案如期颁布。“第二期”方案虽经许诺，但从未执行。土地改革的最低措施还清了欠下选民的人情债以后，大多数小农党议员立即与贵族阶级的“基督徒联合会”合并成“统一党”，其主要领导人便是拜特伦。

与霍尔蒂相比，拜特伦在民主的20年代更加是政治上一个不合时宜的人物。他的责任感使他不至于成为暴君；他对匈牙利议会传统的尊重使他不至于成为独裁者；但他有一种几乎是18世纪贵族的责任观念，这就使他在十年的执政期间把匈牙利政治限制于独裁主义的束缚中。值得注意的是，他最初的政治行动之一是降低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1920年本来已经很低的百分之四十降低到仅仅百分之二十七。与此同时，他又将不记名投票限于建制既久、又有特许证的城市。在乡村和较新的城区，则实行“公开”选举。这也许并不奇怪，统一党在1922年选举中获胜，而1944年红军来到以前，继它之后组成的各党（名目繁多，颇有趣味，但一般称为

“政府党”)则在历届竞选中都稳操胜券,这或许是不足为奇的;然而应当附带说明,1939年的降灵节^①选举之前,不记名投票的原则已推行全国。

这些年来,匈牙利是个没有国王的王国,统治这王国的则是一位没有海军(多瑙河小舰队除外)的海军上将。与神秘的领土性象征相联系的“神圣王冠”使匈牙利必须保持君主国的体制;每年圣斯蒂芬节,庄严的游行行列高举王冠通过首都通衢大道,乃是要求修订和约的动人表演。1921年,匈牙利的法定君主查理曾两次谋求“权归旧主”,但霍尔蒂海军上将并不是清心寡欲的僧侣将军。这位摄政王明白表示无意交权,而当国王第二次尝试时,他甚至动用武装部队阻止国王向布达佩斯前进。哈布斯堡王朝复辟肯定会使奥匈帝国的诸继承国为之惊愕,很可能会导致战争,但匈牙利诸邻国的恼怒也许并不使其摄政王不悦,他感到难以想象一个姓哈布斯堡的人可能做的,一个姓霍尔蒂的为什么不能做得更好些。1921年11月匈牙利议会在国外压力之下通过一项废除王位的法令,庄严地取消查理国王的一切权利。国王既缺位,匈牙利天然保皇派中的“自由选民”便能够大耍物色候选人的把戏。这种把戏虽然不切实际,却也令人开心。到了这十年之末,据说有人在祈祷罗瑟米尔勋爵入主王国。但直到红军突破喀尔巴阡山边界线时,霍尔蒂摄政王仍端坐在布达山上的巨大皇宫之中。

霍尔蒂、拜特伦以及实际上每个自信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匈牙利人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目标,那就是彻底修订特里亚农和约的条款,恢复昔日的匈牙利。这种想法如痴如狂,渗透当时的公共教育和宣传工具;恰如不让1871年以后的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公民忘记1871年以后丧失亚尔萨斯-洛林的耻辱那样,就是不让马

^① 降灵节在复活节后的第七个星期日。——译者

扎尔人须臾忘怀他们旧日的领土。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古旧的风俗倍受珍重，迫切的当代社会问题反而不予解决。拜特伦政府确已改善工厂的工作条件，却不为实际上家无寸土、贫困不堪的三百万农民做点好事。拜特伦鼓励马扎尔族匈牙利人初次大批经营实业，但他们发现工业管理和银行界最好的位置早已为匈牙利籍犹太家族所把持；其结果是这种国家经营的资本主义只会激起新兴起的马扎尔中产阶级潜在的反犹太情绪。

拜特伦对财政建设的关切，特别是他在1923年末通过国联磋商借到的贷款，毫无疑问制止了通货膨胀，并为王国赢得了生死攸关的国际信用。可是，匈牙利也像波兰一样，终于不得不依赖美国维持其繁荣；她的主要出口商品仍旧是农产品，特别是小麦。因而在1929年华尔街股票大跌价和世界性谷价下跌不谋而合之时，拜特伦政权的脆弱基础很快便暴露无遗。拜特伦本人于1931年8月辞职，十五个月后，反犹太主义的反动人物贡伯什开始执政。甚至在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之前“右派激进主义”日积月累的偏见就已在匈牙利获胜。

保加利亚并不曾有过拜特伦式的建设时期，因为其经济结构 204 更加原始，政治问题也十分简单。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像匈牙利的领导人一样，急于要修订条约，他们却缺乏通过西方同情者的支持来达到目的的意志，而且本身也无力控制马其顿民族统一主义分子的暴力行动。

1923年政变和斯塔姆博利斯基死后的八年间，名义上保加利亚是由两届联合政府统治的，头一届以察科夫为首，直到1926年1月为止，接着是由利亚普切夫领导，他后来在1931年6月的选举中被自由党人和温和的农民党人联合击败。然而这一阶段的大部分时间，真正的权力掌握在国防部长沃尔科夫手中，政变时，他是军官联盟的政治首脑。虽然利亚普切夫在1927年从国联搞到一笔贷

款来救济保加利亚经济无力收容的来自马其顿和色雷斯的二十五万难民，他在这些年间未采取任何措施以改善全国的生活水平。政治生活的中心是三项主要问题：即来自共产党的威胁；来自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超级恐怖分子的时时存在的威胁；以及军官联盟的控制。

整个1924和1925年间，对“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不论青红皂白一律加以迫害。共产党人中的极端分子，显然违反了党的正式路线，采取暗杀手段。1925年4月14日他们刺杀一名政府官员；两天后为他举行葬礼时，索非亚的斯维塔·内迪拉大教堂屋顶上爆炸了一颗炸弹，教堂被炸毁，瓦砾中挖掘出一百多具尸体。其中有警察总监、索非亚市长和不下于十四名将军。其后四个月里，对所谓的共产党人滥判死刑，被害者为数与大教堂中被杀人数相等，未经正式审判程序即被杀害的人就更多。原负责监督保加利亚军队不得超过纳伊条约所允许的两万名正规军的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竟下令招募十万名志愿军以“恢复秩序”；西欧和美国的知识分子对政府的野蛮行为提出抗议。不过，还没有采取措施来封住议会里反对派的嘴，“社会主义者”继续在地方选举中获胜，直到1933年为止。在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接受莫斯科的得力领导的情况下，正式的共产党继续秘密活动。季米特洛夫是1923年逃往苏联的，他的一个兄弟却在这次“白色恐怖”时期死于狱中。

战争末期大批流入这个国家的难民，一贫如洗，理想破灭，成了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天然后补人员，这个组织在斯塔姆博利斯基政府上台的第二年恢复活动。但于1924年分裂为两个集团：205 一个是亚历山德罗夫和普罗托格罗夫派，主张在巴尔干联邦内实行马其顿自治乃至独立；另一个则是米哈伊洛夫的“中央集权”派，它企图在索非亚政府统治下合并全部马其顿领土。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两翼互相残杀，其残酷程度不减于他们在边境上与南斯

拉夫人和希腊人的斗争。亚历山德罗夫 1924 年被中央集权派暗杀；四年后，普罗托格罗夫遭到同样命运。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行径大大超越保加利亚国境；一个受害者死于米兰，另一个则在维也纳市布格剧院观看“皮尔·金特”演出时被枪杀。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主要活动却是沿着瓦尔达尔河与斯特鲁马河流域对希腊政府和南斯拉夫政府进行骚扰。1925 年希腊部队果然入侵保加利亚南部，为的是阻止这类攻击。

索非亚的许多军官都意识到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挑衅会将巴尔干其他国家的怒气招引到保加利亚头上；他们担心一场新的巴尔干战争将是一场灾难，会毁掉通过一致同意而修订条约的全部可能性；他们也认为国内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恐怖活动就像世界大战后的无政府状态一样难以容忍。然而，米哈伊洛夫显然得到国防部长以及由达米安·维尔切夫支持的新的军官联盟的保护，该联盟的成立，是为了把前任主席沃尔科夫将军撵出国防部。因此，1928 年的保加利亚军事统治集团也告分裂，正像 1913 到 1917 年间塞尔维亚的军方那样。实际上一切都取决于国王博里斯是否打算像摄政王亚历山大大公当年那样亲自执掌政权。

要查明博里斯的态度如何，当时就难，现在也不容易。他为保全性命和王位，养成一副对一切比较钟表和火车头机械结构更有争议的事物都不感兴趣的心情，虽则是心不在焉，却也煞是可爱。不过，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手段还是与他的性情格格不入，因为刺客下手，不可能总是经过仔细选择，他于是以惯用的迂回手法开始对米哈伊洛夫派及其保护人采取行动。他虽不打算解除沃尔科夫的职务，可是很愿意在 1929 年初派他为驻罗马公使；他无法逮捕米哈伊洛夫，却也不反对对他进行缺席审判，尽管可以完全预料到米哈伊洛夫将会因缺乏证据而被宣判为无罪。博里斯无意充当政治上的摆设，但在无法确定鹿死谁手之前，他决不会孤注一掷

地投身于斗争中的任何一方。以后，他将把这样的精明办法，作为自己的指导原则，不仅用于处理内政，也用于决定外交政策。

206 保加利亚似乎逐渐走向民主，而这正是它的诸邻邦无可奈何地委身独裁主义之时。1931年6月的选举使有自由主义思想的马林诺夫重新上台，表明旧日的右派联合已被摒弃。人民已对马其顿问题感到厌倦；他们在寻求一个改良主义的政府。对保加利亚人来说，不幸的是索非亚的变化表面多于实际。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在边境一带的活动使得保加利亚与希腊的关系在1934年以前始终高度紧张。虽然马林诺夫用意极善，他却无法将官僚班子里沃尔科夫的僚属全部清洗出去。议会政府在保加利亚也和在东欧其他国家一样，不过是门面装璜；西方既已蒙上世界性不景气的阴影，这种先天不足的民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也就可想而知。

第十章 右倾

207

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毁掉了英美人民的积蓄，像中世纪的瘟疫一样蹂躏着东欧和中欧。其影响不止于经济方面，因为它不仅造成个人的悲剧，而且使社会行为准则从来不曾达到最高水平的地区，如今就更加降低。早已在政治机体中诊断出来的癌细胞于是格外乘虚作害，扩散滋生。最后，自由社会的整个概念都成了它的牺牲品，欧洲的灵魂也毫无掩护地暴露在暴力和不人道的新思想意识面前。

灾难的型式是十分清楚的。1929年第四季度，这个地区所有六国都愈来愈为农业衰退所影响，1930年年初美国在投资和金融方面的财政危机的冲击加剧了农业衰退。1928年，商品价格开始略微下降；当时苏联的竞争造成木材降价，打击了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南斯拉夫的出口，但还不是灾难性的。次年，加拿大和美国中西部小麦生产过剩带来的打击远为严重，因为这迫使所有农业国家的基本作物普遍跌价。农民和农业劳动者面临着他们的劳动报酬极其微薄的形势，干脆就废弃货币，转而依靠以物易物这种原始制度，或以实物支付农村地区非农业阶层所提供的劳务。小土地所有者和较大的土地所有者则以两种方式来解决眼下的贫困：可能时便向银行借款；但基本上是把农民业已采用的办法加以扩大，不与外界往来，而日益依赖狭隘的本地经济。1930年、1931年和1932年，农产品价格跌越低，靠土地为生的人们都不再消费城镇和工厂的产品。农村里的这一急剧变化转而导致工业崩溃，城市地区出现大量失业人口。而当作为大萧条的一个间接后果——维

也纳的信贷银行于1931年5月无力偿付债务时，一阵破产风刮遍了所有的多瑙河国家，因为奥地利这家银行原来规模既大、信誉又高，和昔日帝国许多城市的小企业都有关系。不可避免的是，人们的积蓄一旦化为乌有，就会开始寻找替罪羊和听信激进的右翼政客的妖言蛊惑。

起初，六国政府作出一些努力，为了应付巨大的经济危机，他们放弃了十年来阻碍着合作的愚蠢的民族排外主义。1930年7月在布加勒斯特和锡纳亚召开两次农业会议，匈牙利代表与来自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专家会聚一堂，讨论共同关心的问题；此后三个月中，每月都开了其他一些会议，波兰人、保加利亚人、立陶宛人，以及小协约国都前来出席，就降低关税和规定粮价总标准提出了真诚的建议。法国外长白里安草拟了一项更广泛的欧洲联盟计划，国联的一个委员会对此作了详细的讨论。

不幸的是，提出审议的每项计划最终都遭到小心翼翼维护自己的独立的这一国或者那一国的反对，或者蒙受那些发现自己的贸易协定已被新的组合所危害的列强的敌视。这些冲突扩大了意大利和法国分别控制的两个集团之间旧有的分歧。1931年3月制定的奥德关税同盟计划原有可能成为打破关税壁垒的第一步，竟引起法国和小协约国的激烈反对；甚至由于刺激法国人从信贷银行撤回了他们的基金，该计划竟使整个危机发展到最严重的阶段。反过来，法国建议的一项排外的多瑙河关税联盟——1932年3月制订的所谓的“塔迪厄计划”——遭到意大利及其随从国的反对；意味深长的是，德国人由于坚决要与奥地利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932年9月在斯特雷扎召开由十五个国家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未能克服对立派别之间的政治猜疑；在德国的纳粹革命排除了现存的各个民族国家之间进行合作的一切前景之前，欧洲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

冲突在会议桌上继续展开时，各国国内那些更加气势汹汹的领土收复主义集团开始坚持自己的权利，从边界外寻求支持。例如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的德意志人早在1933年前就知道可以指望得到希特勒的支持：1931年捷克政府禁穿纳粹制服便是未来斗争的不祥之兆；在布尔诺有七名纳粹青年运动成员以叛国罪受审也是如此，这次审讯由于证据不足，从1932年夏季起一直拖到1933年秋才以一种软弱无力的判决告终。而墨索里尼和某些匈牙利人对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的鼓励则造成对和平更加直接的威胁。经布达佩斯当局同意，在匈牙利西南部的扬卡普茨塔建立一个恐怖分子训练中心；1932年6月，“乌斯塔沙”计划利用驻守达尔马提亚的南斯拉夫军队的兵变促成克罗地亚的总起义，宣布成立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墨索里尼将立即予以承认）。这个计划不周的冒险遭受亚历山大国王果断的反击，其中包括对意大利人提出严厉警告。但克罗地亚分裂主义活动仍然构成严重威胁：“乌斯塔沙”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之间存在一种谅解，要联合进行恐怖活动以便把克罗地亚和马其顿从“塞尔维亚统治下”解放出来。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以及作为“协商成员”的克罗地亚代表订立了一项秘密军事条约，规定如果克罗地亚起义导致南斯拉夫对其邻国采取讨伐措施，双方将采取联合军事行动。条约上附加的假设情况其多，很可能使条约根本没有什么重要；事关重要的是，条约之得以达成，不仅“乌斯塔沙”，连马切克的农民党也参加了谈判。

大萧条的年代中，政治和社会动荡不安所造成的威胁致使波兰和南斯拉夫这两个原来已在独裁主义政权统治下的国家加强其政府的权力；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强有力的统治者尽管略有迟疑，也趋向右倾。在波兰，毕苏茨基于1930年夏逮捕七十名议员，其中包括像维托斯和科范蒂（西里西亚自治主义者）一流的著名人物。许多政治家以特殊残酷的方式被关押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

克的古老城堡里；趁他们身陷囹圄、备受侮辱之际，毕苏茨基举行选举，以确保其对这傀儡议会的控制。

在南斯拉夫，国王于1931年9月颁布新宪法，规定设立两院制议会，但限制部长只对国王负责，并坚持当众口头表决，致使难以形成自由的反对派。因为仍然禁止任何政治结社，其后的选举都几乎毫无意义；无非是发给选民一张事先批准的候选人名单。当然，在克罗地亚，以及甚至某些居民主要为塞尔维亚人的地区，不少人坚决抵制选举。选举前三天，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们举行一系列的反君主制示威游行；据当局报告，在若干地区（主要是斯洛文尼亚）共产党人的活动有所增加。次年春季，马里博尔确实发生了一起古怪的共产党阴谋活动，十几个下级军官和军曹计划夺取该城，但据报道，因为这一事件是以两个中尉携带团队伙食经费逃往边境而告终，那么，某些参与者的动机很可能并非完全出于政治。但在斯洛文尼亚却出现严重问题，达尔马提亚发生农民骚动；主要的“反对派”发言人便是在这一背景下从萨格勒布发表一通强烈的抗议声明，主张在联邦的基础上恢复民主政治。国王的回答与毕苏茨基如出一辙：把马切克、科罗舍茨和其他非塞尔维亚政治领袖关押了几个月。主要的马克思主义者自然早已在国内相距甚远的不同地方服刑，刑期也长得多。约瑟普·布罗兹——当时尚未化名“铁托”——被关押在马里博尔和萨格勒布之间莱波格拉瓦的哈布斯堡旧牢中；另一些人，包括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则被囚于旧塞尔维亚和伏伊伏丁那的狱中。共产党的组织书记贾科维奇1929年4月在奥地利边境上被南斯拉夫警察击毙，而他并不是越来越残酷的宪警手下唯一的牺牲者。

罗马尼亚的卡罗尔生性不如亚历山大国王那样独断专行，也还没打算建立国王独裁的全部机器。他可是一位阴谋大师。在30年代最初的几年中，他成功地分裂了所有的旧党派，利用议会领袖

们的无能和混乱取得了支配地位。从1931年4月到1932年6月，罗马尼亚由国王过去的师傅尼古拉·约尔加掌权，约尔加是位历史学者，声誉颇高，自视更高。国王每星期亲自主持内阁会议；经济形势恶化，其中远非极次要的原因是国王拒不降低政府官员的薪金。报刊对政府发起一场攻击，因为不敢直接攻击国王，矛头只得对准不幸的马格达·卢佩斯库。约尔加辞职后出现了短期内阁这样一段短暂的插曲。国内发生严重的罢工，但国家从瑞士银行家借来一笔贷款，文职官员（他们人数太多）的薪金于是得以正常按期发给。及至1933年年底，国王设法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其中主要人物是过去以塔塔列斯库为首的自由党残余分子。国内最强的政治集团此时则已是铁卫军，其暴力行动近于脱缰之马。还有些较小的反犹太组织竭力效法他们。卡罗尔本人向来不辨贤愚，竟然对墨索里尼深表景仰；他在演说时开始以略带几分滑稽的方式模仿这位“领袖”的夸夸其谈、大吹大擂。但罗马尼亚依然暂时忠实于小协约国，忠实于与法国的同盟，忠实于为之提供财政支持的国联。从1932到1936年任外交大臣的蒂图列斯库，同贝奈斯博上一样，是个坚定信仰国联的人。 211

大萧条在匈牙利特别严重，部分原因是小麦价格对大平原的土地所有者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各家银行与奥地利信贷银行的金融关系密切。在1931年和1932年，匈牙利人被迫向国联寻求金融保护，国联坚持要求厉行节约，严征赋税。小土地所有者于是无可避免地转而反对政府。1932年9月末，霍尔蒂决定与旧的保守主义贵族决裂，把权力交给嚷得更凶的中产阶级发言人贡伯什·久洛。贡伯什曾于1919年组织过“国民军”，霍尔蒂就是靠此上台的，1921年10月挫败了查理·哈布斯堡冀求在匈牙利复辟活动的也是他的部队；但20年代贡伯什的政治观点立即既失之“过激”，又失之“过右”，因而不适合摄政王的口味。霍尔蒂坚决否决了这个

新首相提出的第一批内阁任命名单，并继续在他执政三年期间对他的国内政策加以约束。因此，并没像贡伯什曾以真正的纳粹方式所威胁的那样采取激烈手段解决“犹太问题”。因为匈牙利对外国银行家负债累累，任何蛊惑人心的宣传家也难以实践他历次发表的恶毒的反犹太言论。但在1928年，贡伯什富有印象主义色彩的头脑却构想出了他第一个称之为“柏林—罗马轴心”的前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借助于“匈牙利的复兴”将重新绘制欧洲的地图。他就任匈牙利政府首脑的头一个月，便匆匆赶往罗马与墨索里尼互相吹捧。匈牙利的帐篷已在意大利的营地牢牢地安扎下来。

这个普遍性的经济危机最令人震惊的后果出现在本书直接涉及的地区以外的德国。三年之间德国工业生产减少了一半，失业人数增加了两倍，纳粹党成员则增加了一倍。希特勒之所以能于1933年1月30日当上总理，当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重要的一条，是他的对手们政治上无能。可是，德国人民把纳粹分子推上台是出于绝望和受挫的情绪这种传奇式的说法在同样面临着“资产

21■ 阶级秩序”崩溃的当代人看来似乎言之成理，以至于德国人以外的其他民族也都很受鼓舞，指望他们的右翼党派来拯救他们。纳粹明目张胆地抛弃传统的自由的价值，受到那些长期以来已对个人自由及权利平等一类的美德感到靠不住的民族的欢迎。独裁政府排斥异己的做法并非希特勒的革命所独创；它不过是把它进而变成了政治生活的准则。

但是，最初希特勒的任职期似乎不可能长到可以使他将他的极端主义付诸行动。他被任命为总理，马上在已经体验过纳粹煽动颠覆活动的中东欧两个国家里引起恐惧不安；这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特别是贝奈斯，几个月来一直害怕出现贡伯什所想

象的那样“轴心”式的纳粹—法西斯合流。希特勒成功后不到三星期，小协约国便签署一项条约，恢复它们之间共同的条约义务，把它们松散的合作变成实质上的外交联盟，组成一个常设理事会，一个经济理事会和一个秘书处，这决非巧合。

波兰的反应较之捷克更充满敌意。毕苏茨基为但泽纳粹狂热分子所组织的示威所激怒，便于1933年3月和4月两度敦促他的法国盟友支持他对新的德国政府采取军事行动；在法国的支持下，波兰将占领但泽、东普鲁士和德国的西里西亚地区，直到希特勒辞职和接替他的总理保证遵守凡尔赛解决办法时为止（毕苏茨基甚至有意无限期地在但泽驻扎一支部队）。但法国由于有国内问题，不愿接受这一政策中带来的冒险因素。他们极力制止毕苏茨基，一场反对纳粹政府的预防性战争的机会从此错过，一去不返。5月初，希特勒亲自向波兰大使保证他将尊重现存的德波边界，但泽德意志人对他们祖国的情谊于是及时地鸦雀无声，这大约是秉承柏林的命令。

整个1933年，继续奔走于多瑙河国家和巴尔干各国之间的仍旧是意大利和法国。墨索里尼步子之大，为当时巴黎的四届短命政府所不能企及。“领袖”所偏爱的通过英、德、法、意四强协定来实现修订条约从而破坏小协约国的想法诚然因为过于微妙而不能成功，但他与保加利亚依然紧密联系，并以友好的讨论吸引着罗马尼亚人甚至南斯拉夫人。主要由于贡伯什的不懈努力，墨索里尼在1934年年初取得了最大的胜利；因为在2月间，通过所谓的“罗马议 213
定书”建立了由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组成的多瑙河集团，不仅与小协约国相抗衡，而且支持了维也纳的多尔富斯的半法西斯政权，当时这个政权正受到来自希特勒德国的压力。回顾起来，1934年春天似乎标志着意大利对中欧和东南欧影响的最高峰，因为到了当年冬天，墨索里尼由于对“乌斯塔沙”和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施舍太多而削弱了自身的地位；及至 1935 年，德国已在蒸蒸日上。

与此同时，法国看来正失去在维斯杜拉河上的立脚点，因为纳粹分子与波兰在 1934 年 1 月签订十年互不侵犯条约，而取得显著的成功。这一协定是在经过数月谈判之后才签订的，新当选的但泽议会主席劳斯奇宁在其中起了可贵的居间作用。但这条约的实际作用是有限的：希特勒正式放弃对波莫瑞的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支持，并命令纳粹领导人暂时潜伏；毕苏茨基则不在波兰与东普鲁士交界的地方挥舞军刀。哪一方也不相信另一方用心真诚，双方都认为自己取得了外交上的胜利。德国急于要在法国的包围圈上打开一个缺口，并希望通过鼓动波兰人仇视捷克斯洛伐克而使裂隙扩大，他们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毕苏茨基早先关于采取军事行动以反对德国的建议所受到的冷遇激怒了波兰人，他们认为这个条约将提醒法国人认识到与华沙和好的必要性并不低于与布拉格和好的必要性，也许，它达到了这一目的。毫无疑问，从 1932 年 11 月到 1939 年的灾难期间担任波兰外交部长的贝克上校憎恨捷克人，并主要是出于个人原因憎恶法国的保护：在他看来，这条约无异于一纸独立宣言，因为他虚荣心特强，又十分愚蠢。毕苏茨基见识较高。他坚持要贝克在 1934 年 5 月与苏俄达成同样的谅解，作为对德条约的补充。但这位元帅此时已是强弩之末，一年后便逝世了。从次年春天起，贝克承担起波兰对外事务的全部责任，而这个任务所需要的远见卓识是他所不具备的。

法国人对希特勒的成功感到吃惊，尽管波兰人出于谨慎事先已使他们得知正在谈判一项互不侵犯条约。1934 年 1 月出任法国外交部长的路易·巴尔杜计划组成一个庞大的反德同盟，将不仅包括小协约国诸国，还包括意大利和苏联在内。为使“罗马议定书”诸大国和小协约国国家和解而进行的对话预定于次年 3 月开始。

214 四个月后，他们看来已取得成功，因为当奥地利的纳粹分子作为与

德国联合的第一步谋杀了多尔富斯总理时，意大利和南斯拉夫都沿着奥地利边界集结重兵作出反应。维也纳的暴动以流产告终，其附带的后果却是恶化了“元首”和“领袖”的个人关系：因为纳粹暴徒暗杀多尔富斯竟然恰值多尔富斯夫人及其亲属作为“领袖”的私人贵宾访问意大利之际，墨索里尼对此大为愤怒。如果希特勒的直接目的是政治联合，那么，他已为两个迄今互相敌对的国家坚决行动所挫败；巴尔杜相信他的遏制政策已经证明是正确的。

实际上，德国人却正以较之巴尔杜传统的联盟网更为有效的方式沿着多瑙河扩展他们的影响，一直深入东南欧。德国已准备好与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开展贸易往来；而对那些在大萧条之后仍然步履艰难的国家来说，与一个只顾大谈安全和保持欧洲秩序必要性的大国相比较，另一个愿意按它们的利益调整其经济政策的大国乃是格外有吸引力的伙伴。1934年2月，德国与匈牙利签署秘密商务条约，德国从此开始输入几乎占匈牙利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商品，主要是家畜、矾土和工业原料；匈牙利也从德国输入工业产品、煤、焦炭及其制品。两国的经济关系变得如此密切，如果德国机器和零件的供应中断，匈牙利的工厂势必再次面临灾难。德国与南斯拉夫也于1934年5月签署一项内容虽不如此广泛性质则相类似的条约。不出两年，德国对南斯拉夫工业的投资显著增加，两国间的贸易同时增长一倍。1936年5月，又签署进一步的换货协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南斯拉夫半数以上的出口商品均运往德国，德国货物也差不多占南斯拉夫全部进口物资的半数以上。

德国帮助多瑙河流域国家解决其经济问题，当然并非纯粹出于好意。1934年6月德国外交部的一份备忘录（见德国外交文献的有关部分）记载道，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条约“具有超过其实际商业内容的政治意义”，“其目的是在匈牙利和南斯拉夫建立支持

215 德国在多瑙河地区的政策的两个据点，最重要的是抵销法国和意大利在该地区针对德国的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当南斯拉夫达成交易之后不过三星期，罗马尼亚也在寻求一项贸易协定的时候，德国外交部长通知他们说，德国“只对那些在政治上未曾支持我们的敌手的国家作出牺牲，罗马尼亚不属此种情况”，结果，罗马尼亚人只好等到 1935 年 5 月才得以签订他们期望的条约，尽管他们终于从其中得到很大好处：向德国出售小麦，定价大大高于世界市场一般价格，而同时限制卖给德国的石油数量，以求不妨碍罗马尼亚对西方当时承担的义务。保加利亚也于 1935 年与德国签订商务协定：德国高价购买保加利亚烟草，并作为交换向保加利亚供应军火（后者对此胃口之大，异乎寻常）。

大萧条及德国在东欧舞台上东山再起的双重后果导致巴尔干国家即使还不是从内心里至少也在态度上发生了变化。法国——而且，就其极其有限的作为来说，还有英国——都急于要把这个古老的巴尔干斗鸡场封闭起来。1933 年秋罗马尼亚的蒂图列斯库大部分时间都在周游东南欧，起草不侵犯条约以及建议签订一项保证巴尔干边界的内容更加广泛的条约。南斯拉夫的国王亚历山大宁愿先与保加利亚直接交涉，于是，与博里斯两次会谈（在贝尔格莱德和瓦尔纳），然后启程前往伊斯坦布尔和雅典去对土耳其和希腊施展他的个人魅力。博里斯也更加积极，1933 年 12 月正式访问贝尔格莱德，1934 年 1 月访问布加勒斯特。但保加利亚要求修订和约的态度根深蒂固，使博里斯无法支持一个以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现有的战后解决办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其他巴尔干领导人走到了他的前面，把他甩掉了。1934 年 2 月初，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两个“东方”小协约国国家与希腊和土耳其一同接受了巴尔干条约，条约保证四国在巴尔干地区的边界，并保证签字国在对其他巴

巴尔干国家(假定为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采取行动之前必须互相磋商。当年年底以前,这四个国家扩大条约范围,建立起“巴尔干协约国”,其中设有常设理事会,并在1940年最初几个月成功地召开过一系列会议。虽然它从未具有它所仿效的多瑙河军事联盟的意味,却是走向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独立地位的第一步。这明显是对意大利的断然拒绝,但也是避免屈从于法国。

巴尔干条约并未立即促使保加利亚寻求成立敌对的联盟。事实上,那年春天保加利亚国内事务出现重大变化:5月19日,国王博里斯发现,恰如十一年前一样,他面临着一场军事政变。军官联盟再次肇事,这回领头的是达米安·维尔切夫。博里斯经过劝说只得任命自称为“兹维诺”(环节集团)^①的领导人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将军为首相,该集团以在政治上整顿保加利亚国家为主要纲领。“兹维诺”为达到这一动听的目的而采取的方式与多尔富斯和墨索里尼所已采用的方式惊人地相似。但维尔切夫的辩护士们一直坚持说他的思想虽属独裁主义,却非法西斯主义。确实,保加利亚在对外事务上转而反对与意大利联系,并继续寻求与南斯拉夫和好。所有政党全部被解散,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也是如此。米哈伊洛夫被驱逐出境:6月间,格奥尔基耶夫宣布,西南保加利亚军事当局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手里没收了大量军火,共计不少于一万零九百三十八支步枪,七千七百六十七枚手榴弹,四十七挺机枪和大量弹药。如果说整顿保加利亚就意味着铲除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而别无其他,则“兹维诺”的工作应该说是干得不错的;但其他问题却证明不那么好办,而“兹维诺”政府的上层挤满了高级将领,根本没有哪怕仅仅是一个经济学家的容身之地。

① 原文是Zveno(The Chain),是保加利亚右翼集团。——译者

“兹维诺”哲学(如果能说是哲学的话)有许多方面为南斯拉夫的国王亚历山大所欣赏,1934年9月底亚历山大回访索非亚,借以增进保塞友谊。他当时正在摆脱对法国的依赖并急于加强与南斯拉夫和德国间的联系:希特勒本人曾以屈尊俯就的口吻谈到塞尔维亚人的尚武品质,国王与赫尔曼·戈林将军新近也曾进行若干次友好会谈。而法国人就其本身而言,遭到毕苏茨基和贝克的冷遇之后,他们再也经受不起和亚历山大国王闹翻。巴尔杜甚至依然希望能与意大利人和南斯拉夫人和解,把他们都囊括进他的反对新兴德国的联合阵营里。6月间,巴尔杜访问贝尔格莱德,发现南斯拉夫国王对他的建议并非全然反对。亚历山大愿意对墨索里尼在经济方面作出让步,特别是供应木材以换取意大利在政治上的保证。可是,他的政策当然有其限度,为了确保法国人理解他的观点,亚历山大接受了于1934年10月对巴黎进行国事访问的邀请,这是这位国王十三个月中的第五次出访。但这一次他未能达到目的,因为他刚刚离开马赛港的码头,一名马其顿刺客就开枪将他击毙,也同时打死了巴尔杜。

马赛谋杀案使中欧陷入自萨拉热窝事件以来最危险的危机。

217 刺客是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一名熟练的枪手,他受到米哈伊洛夫的指使去支持帕韦利奇的“乌斯塔沙”分子。阴谋显然是在意大利策划的,据调查表明,窝藏和鼓励这次克罗地亚恐怖分子的责任则在匈牙利。法国新外交部长赖伐尔甚至比巴尔杜更急于要与墨索里尼达成全面协定,因此根本没有谴责意大利支持“乌斯塔沙”事业以及庇护众所周知的凶手。12月国际联盟举行辩论,理所当然地谴责了匈牙利;安东尼·艾登作为英国良知的发言人,提出一份特别令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匈牙利所犯疏忽罪行的清单。但都没有采取任何决定性的行动,虽然意大利当局曾在他们国土上短期关押了“乌斯塔沙”的一些主要分子。帕韦利奇被法国法庭缺席判

处死刑，但意大利人一直未把他交出，最后倒让他安居在佛罗伦萨郊区的一幢小房子里。国联辩论后不到一个月，赖伐尔访问罗马，看来未曾提及帕韦利奇的引渡问题，但墨索里尼同意对小协约国作出让步的表示，以换取法国与意大利合作采取先发制人的办法来对付德奥合并。

在南斯拉夫国内，亚历山大死后，由他十一岁的儿子彼得二世继承王位。先王的遗嘱规定一个摄政期，在彼得达到十八岁生日以前(1941年9月)为摄政在法律上的有效期。主要摄政者是保罗亲王，他是亚历山大的堂兄弟，有相当的文化教养，责任感很强，厌恶巴尔干的政治。在许多方面，保罗较之亚历山大更具备真正南斯拉夫人的气质，因为他不相信狭隘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而以离开贝尔格莱德逃避到位于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中安享宁静的生活为乐。由于他把自己看作王位的临时监护人，故无意对王国体制结构进行激烈的改革，但对君主专政下的军事中央集权表示遗憾，认为他自己既然并无私心，便有可能把克罗地亚人争取过来。在九个月里试用三个不同的首相后，这位摄政王接受驻贝尔格莱德的英国公使的推荐，于1935年6月任命前塞尔维亚的激进派人物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为首相。此人有两个优点：既对经济有一定的了解，又准备和克罗地亚人在同一张桌边坐下。斯托亚迪诺维奇与伦敦银行界的联系在英国政府的心目中是他为人可敬的确切保证。但很快就发现他竟然和摄政王一样，认为戈林将军是那么富有同情心，那么慷慨大方，是那么理解别人，所以从英国观点看来，这可真是不幸。

及至1935年年初，德意志帝国已经大致恢复它在东欧国家的传统影响，尽管它称雄的要求现在受到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新手——而不是昔日的强大对手俄国——的挑战。苏维埃国家依然是个受了伤的巨人，每逢五一节便神气活现地把坦克大炮拉出来检

阅炫耀，却躲在李维诺夫议定书一纸书面保证后面。李维诺夫本人对希特勒的意图不抱任何幻想，于是，苏联逐渐再次开始在欧洲外交中发挥积极作用。德国于1933年10月退出国联，俄国恰好在十一个月后加入国联，并着手像其他会员国一样为集体安全而认真工作。但李维诺夫为了遏制德国甚至准备再进一步：不只是设立一道栅栏，他还恢复了传统的政策；英国和法国则继续信赖贝奈斯和蒂图列斯库。

1935年5月，法国和苏联正式缔结互助条约，不仅进一步确认签字国双方对国际联盟条约的义务，而且规定任何一方如果无故遭到攻击，另一方应立即予以援助。两星期内，捷克斯洛伐克也与俄国签订一项类似的条约，尽管条约这次明确表示只有在法国也对遭到进攻的任何一国提供军事支持的情况下，另一方才能提供军事援助。苏联和罗马尼亚之间没有签订任何条约，但李维诺夫和蒂图列斯库达成秘密谅解：罗马尼亚同意允许红军经过布科维纳进入罗塞尼亚以便援助捷克击退侵略军。罗马尼亚很少有人像蒂图列斯库那样相信俄国的善意，官方关系依旧远远落后于两国外交部长之间的个人诺言。直到1935年10月中旬，1920年关闭的那座跨越德涅斯特河而联结宾杰里和蒂拉斯波尔的铁路桥才重新开放。沿比萨拉比亚—乌克兰边界线两侧的生活开始享受四年半的不正常的“正常状态”。

法苏条约从来不是1914年前把第三共和国和沙皇帝国联在一起的二元联盟那样一种严肃的外交文件。没有像旧协定那样举行过军事会谈以确定新协定的范围。赖伐尔对苏联的评价很低，甚至没有把条约提交议会批准，而由于俄国拒绝在法国之前履行批准程序，因此一直到1936年3月赖伐尔因埃塞俄比亚战争而失势（并且下野）之后，条约方才生效。赖伐尔心里瞧不起李维诺夫，也不相信斯大林；他宁愿与墨索里尼合作，当法国、意大利和英国

1935年4月在斯特雷扎庄严谴责希特勒废除凡尔赛条约所规定的裁军条款、并重申他们决心防止任何强行重绘欧洲政治地图的行为时，他的理想终于实现了。²¹⁹

人们不久便看透，这个联合的“斯特雷扎阵线”只不过是转瞬即逝的幻想。那年夏天，法国和意大利的总参谋长花费大量时间计划采取联合行动从德国手中拯救奥地利，法国的甘默林将军甚至力图吸引小协约国的军事领导人对此计划产生兴趣，但未明显奏效，一切终归徒劳。在其后的十八个月里，因为继埃塞俄比亚危机之后又发生西班牙危机，法国和意大利的关系较之20年代抗衡期间的任何时刻都更加冷淡，尽管作为当时的混乱思想的特征，法国议会里一个势力强大的院外集团依然欢迎“领袖”的大话而不欢迎日内瓦的规劝。但果然不出贡伯什所料，只使用实行了一半的制裁这一空洞无力的武器，把墨索里尼推到了轴心国家一边；而意大利与德国友好的代价却是放弃了墨索里尼为保护多尔富斯的奥地利而于1934年承担的守卫多瑙河的责任。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欧和东南欧各国不可避免地要调整他们的政策；其中大部分国家高兴地注意到贸易数字的上升，心甘情愿地默许德国新建立的称雄的地位。

1936年3月的事态使它们对于与法国联盟的价值愈加怀疑。因为就在这个月，希特勒重新占领莱茵兰，他抱怨新近批准的法苏条约对德国的潜在威胁，而以此作为他破坏洛迦诺公约的理由。于是，法国与它的东方诸盟国被一道德国钢墙——后来成为一道防线——分隔开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都保证支持法国在军事上的对策，贝克看来也已代表波兰给予有保留的支持；虽然由于他对苏联的憎恨之深只不过低于他与捷克人之间的积怨，这三个国家竟会同心协力，就未免有些令人难以想象。当然，法国人一无所为。这一部分是因为他们自己国内政治上的虚弱，一部分则是因

为英国坚持不合作的孤立主义。德国军队沿着莱茵河中部站稳了脚跟,却没有任何西方邻国因此征集一名后备军人入伍;她的东方诸邻国静观发生的事态,各做各的打算。

外表上,小协约国依然团结一致,也忠于其与法国的关系。蒂图列斯库起草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公报,强调它们团结一致“反对造成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一切欧洲势力”,并在5月第一星期的会议上由三国外交部长签署。在军事上,小协约国也与巴黎协调一致。三个总参谋部建立了一个共同的情报部门,并就发报员如何使用共同的密码与法国军队合作的方法达成协议。5月,它们讨论了军事装备标准化问题;6月,它们甚至提出讨论设立一名联合司令官的可能性。他们也拟订了应急计划,准备应付奥地利一旦召回鄂图大公继承其父王位而哈布斯堡王朝可能复辟的局势:捷克即从布尔诺向维也纳进军;南斯拉夫即从马里博尔进军,然后取道格拉茨在维也纳城门与他们会师;罗马尼亚则负责监视匈牙利。这无疑是个消遣夏日黄昏的小小的、有趣的战争游戏。碰巧,这也是最后一场游戏。小协约国已在分崩离析。8月末,卡罗尔国王以维克多·安东尼斯库代替蒂图列斯库任外交大臣,罗马尼亚反对法国和俄国的路线从而强硬起来。斯托亚迪诺维奇一向就极不情愿追随捷克和罗马尼亚之后,如今就索性止步不前。及至1936年秋,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都在力求和德国达成谅解。

斯托亚迪诺维奇在对外事务方面基本上是中立主义者。他认为南斯拉夫应奉行独立政策,摆脱法国牵引他们的缰绳,和德国达成一种自然而现实的协议,对待昔日的敌手保加利亚和意大利也照此办理。在1936年的最后三个月,他坚持反对扩大法国和小协约国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他与德国达成一项非正式的协定:希特勒如能劝说保加利亚和意大利解决它们与南斯拉夫的问题,斯托亚迪诺维奇会慢慢地脱离他与法国的联盟,而变为真正的中立,

他还希望他也能促使罗马尼亚与他携手偕行。1937年1月末，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正式签订一项条约，颇有几分乐观地预告两国之间将存在“不可分割的和平和真诚而永久的友谊”。3月，南斯拉夫与意大利在贝尔格莱德签订了一项同样引人注目的条约：两个王国保证不以武力解决两国的分歧；同意尊重两国的共同边界；任何一方不得允许在其国土上策划针对另一方的恐怖主义阴谋；双方都致力于维护阿尔巴尼亚的现政权（它虽然名义上仍旧独立，但自1936年3月起实际上已是意大利殖民地）；两国政府将努力增加相互间的贸易；意大利将对伊斯特利亚的斯洛文尼亚居民在文化上作出让步。较之条约的条款尤其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签约时间的选择。意大利外交部长齐亚诺赴贝尔格莱德正式签署条约之期，恰恰在小协约国在那儿举行定期会议的一星期之前，也恰恰在贝奈斯——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将对南斯拉夫首都进行正式访问的前十二天。斯托亚迪诺维奇再次拒绝加强整个小协约国同法国的联系，就完全不足为奇了。他在给保罗亲王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像蛇一般精明，像鸽子一般温和。” 221

罗马尼亚暂时尚未采取南斯拉夫这样的独立路线，部分原因是国王卡罗尔和他的下属与巴黎有密切的个人和商业上的联系，部分原因是罗马尼亚重整军备依然靠设在比尔森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工厂（法国什奈德—克鲁索特公司在此拥有相当大的股份）源源不断的补给。尽管如此，罗马尼亚还在这两次会议上支持斯托亚迪诺维奇对法捷路线的挑战。此外，他们还通知俄国，如果发生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红军经过罗马尼亚国土；从而彻底颠倒了蒂图列斯库的非官方政策。但罗马尼亚无法对匈牙利作出任何让步，而德国和意大利却都坚持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必须就特兰西瓦尼亚达成一项谅解，作为走向与现在称为“罗马—柏林轴心”达成任何全面协议的重要的第一步。

小协约国中的第三个国家捷克斯洛伐克得不到两个伙伴的支持而日益孤立，与此同时又因内部意见不和而受到削弱。托马什·马萨利克在1935年12月他八十五岁时辞去总统职务。他退休后一直活到1937年9月，痛苦地看着他的朋友和继承人爱德华·贝奈斯四周阴影日深。对这个国家的完整的主要威胁来自苏台德德意志党（起初称为苏台德德意志家乡阵线），该党是过去的体操教练康拉德·汉伦负责组织的，得到柏林的资助，尽管它还是个不明确的纳粹组织。1935年，捷克斯洛伐克所有旧的德意志民主党派都被汉伦的竞选策略所击败，他不仅在以农业为主的地区的较小城镇而且在传统上同情左翼的北波希米亚工业中心赢得了选票。有一个时期，捷克人和德意志人似乎可能在政治上达成一致的意见。1937年初，米兰·霍德扎总理（斯洛伐克人）提出一个解决方案，答应让德意志人在主要是讲德语的地区的行政管理中分享相当大的权力。但是，汉伦却把这一提议看作是软弱的表现，极力要求承认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各民族自身有组成独立的自治“组合”的权利。这计划是布拉格政府根本不能接受的，却受到了格林卡和蒂索的斯洛伐克教权主义者的欢迎，捷克的中央集权主义于是在西北面222 和东面受到德意志人和斯洛伐克人的两面夹攻。由于罗塞尼亚人也骚然思动，波兰和匈牙利政府又在这个共和国内的它们各自的少数民族中制造骚动和不安，看来马萨利克的国家不大可能比它的创造者长寿。1937年10月，特普利茨城一个捷克警察忍无可忍，逮捕和殴打了苏台德区最为骄横傲慢的发言人卡尔·弗朗克，柏林的全部纳粹宣传机器便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猛烈的攻势。其后的十一个月中，德国人一直坚持说，他们的苏台德同胞正遭受着捷克当局难以容忍的压迫。

贝奈斯仍然负责捷克斯洛伐克的对外政策，一直到1935年年底为止，其后，他干预了一些国际上共同关心的事件，所涉及的范

围比他的前任较为广泛。直到1938年3月奥地利被并入第三帝国时为止，他仍然认为哈布斯堡复辟是对现存秩序最为严重的潜在威胁，甚至宁可让希特勒也不让鄂图大公进驻维也纳。奇怪的是，一个经验如此丰富的政治家竟然作出如此错误的判断。无疑部分原因是他念念不忘青年时期的政治斗争，但是，虽然与苏联签订的条约和与法国结成的联盟都真正就对付德国的入侵提供了一定的保证，西方还有许多反纳粹的人，他们会欢迎鄂图作为阻止自右而来的革命的障碍物。贝奈斯本人十分有意和德国达成谅解。恰如有一次他提醒英国外交大臣的那样，他与施特莱斯曼^①合作得很好，捷克与希特勒的德国没有边界争端（当然，它与法国的另一盟国波兰有边界纠纷）。

捷克有两次考虑调整对外政策。从1936年10月到1937年1月末，贝奈斯和两个德国使者进行了若干次非正式会谈。采取主动的看来是德国方面，虽然并不是纳粹政府。希特勒赞同这些会谈，他把会谈当作削弱苏捷联系的方法（可能也当作在苏联内部播下不和的种子的手段）。捷克似曾提出以“不采取亲苏的对外政策”来换取第三帝国对于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作出具体保证。不过这些会谈是否意味着对那个时期外交的一大贡献，还是值得怀疑的。会谈模棱两可，不够精确，这都表明它们主要是被用来试探对方的反应的策略而已。后来，霍德扎在1937年极力想把奥地利、匈牙利和小协约国拉到一起组成一个“多瑙河条约”组织；但尽管整个夏天一直在会谈，这些建议都已为时过晚，马扎尔人看不出在这个阶段支持一个摇摇欲坠的小协约国能得到什么好处。匈牙利外交大臣坎尼亚在这样事情上则总是看柏林的眼色行事；既然希特勒 223 准备亲自向他保证承认匈牙利对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的要求，多

^① 施特莱斯曼 Stresemann, 1878—1929），于1923年8、9两月曾任魏玛共和国总理，后一直担任外交部长。——译者

瑙河条约便不过一纸空文而已。

捷克人既在北方受到波兰人的威胁，对奥地利的命运又捉摸不定，就只得修筑自己的防御工事，并希望与苏联和法国签订的条约将能扼制包围着他们的敌对势力。1936年夏，他们开始沿捷德边界线修筑一道堡垒工事，计划把离德国边界仅四十英里的斯科达军工厂从比尔森迁往中斯洛伐克。扩建了罗塞尼亚西部乌日哥罗德^①的机场，以便供苏联轰炸机使用——如果它们来的话。

中东欧各国求助于柏林的不仅限于外交事务。甚至在大萧条之前，就存在鼓吹独裁主义这种浪漫神话的政治运动，尽管只有罗马尼亚的“铁卫军”发展成为反对崇拜少数人的群众组织。20世纪30年代的风尚，是模仿纳粹而不是模仿那些基本上属于法西斯的组织。于是萨洛希·费伦茨1937年在布达佩斯建立了一个对于摄政王霍尔蒂和老式的马扎尔贵族们来说都嫌过于激进和反犹太的匈牙利国家社会党。在罗马尼亚，诗人奥克塔维安·戈加领导着一个“国家基督教党”，对犹太人的敌意支配着它的每个行动。1934年从波兰国民民主党里分裂出来的“全国激进阵营”有类似的思想意识，它通过“青年波兰联盟”赢得年轻一代的支持。塞尔维亚也有个纳粹式的小组织，是季米特里耶·约蒂奇所领导的，但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内，唯一一个彻头彻尾的反犹太组织就是汉伦的苏台德德意志党。由于保加利亚的犹太人不超过五万，博里斯国王得以幸免于右倾激进主义这一特殊表现形式所造成的窘境。1938年春，一个称为“拉德尼察”^①的受纳粹分子指使的运动企图扩大为一个群众组织，博里斯立即下令解散。

在两次大战之间，这些进口的袖珍元首中只有一人曾掌过一段时间的权：1938年初，戈加当了四十四天的罗马尼亚总理。尽管

^① 原文是Radnitsa，意即保加利亚的纳粹运动。——译者

如此,30年代中期的中东欧所有国家都依然明显地倒向极右,唯独捷克斯洛伐克例外。在大多数情况下,现政权只是设法给思想保守的政府披上一身法西斯主义的外衣,装出一副现代化的模样。毕苏茨基便是如此。1935年4月,他在波兰实施的一部宪法,终于使议会变成咨询机构,建立了强大的总统制政权,而这正是这位元帅朝思暮想的。从正式意义来看,波兰既非纳粹也非法西斯国家,而是 224 是个“受指导的民主国家”,但给予各社会主义和农民政党的自由却微乎其微,毕苏茨基本人死于1935年5月12日,即他发动政变的九周年。他死后的四年中,这个“受指导的民主国家”便少了一个先决条件,即坚决有力的最高领导。国家实际的统治者不是莫希齐茨基,他仍旧是挂名总统,实际的统治者是武装部队总监兼总司令雷兹·西米格莱将军。像是为了强调毕苏茨基和雷兹·西米格莱之间一脉相承,他于1936年11月相应地晋级为元帅。尽管雷兹·西米格莱是个勇敢的军人,在任何礼仪场合都仪表堂堂,予人以深刻印象,却从不具备他的前任那种传奇式的权威。他不太懂政治,看不起政治家。他风度翩翩,他的马术十分高雅,令人赞赏,他的军事才能却颇有限,属于一种稀奇古怪的老式。1939年战争爆发时,波兰拥有世界上最出色的骑兵团,这正是这位人物和他的环境的特色。雷兹·西米格莱、莫希齐茨基和贝克治理下的波兰国在社会和军事方面都不合时宜:马刀和长矛对装甲兵团是毫无用处的。

相形之下,南斯拉夫军队置身于政治之外,他们听任文职大臣们在思想意识领域导演化装游行,只要不向塞尔维亚最高司令部的真正权力挑战便行。不愿以希特勒为榜样,斯托亚迪诺维奇政府更加明确地倾向于模仿墨索里尼。“斯托亚迪诺维奇是法西斯分子”,齐亚诺1937年访问贝尔格莱德之后写道,“如果根据是否公开对党表示忠诚来看他还不是的话,那么,根据他对权威的概念

来看，他确实是的”。他的党——南斯拉夫激进联盟——使用法西斯的敬礼并称他为“沃佳”^①。它的成员穿着绿色衬衫，剪裁完全是传统的右翼式样。但是，当保罗亲王询问激进联盟的性质时，他从警察总监那里得到了一个让他放心的回答：如果“从举起手到放下手的时间”来观察，这些绿衫党人的敬礼绝对不可能与它的罗马样板混为一谈。保罗亲王为人精明，并不相信这种说法，但极少有任何南斯拉夫人真把这位身著绿衫的领袖当回事，这也许倒是可以庆幸的。但由于他的治国之才相当高于他意在蛊惑人心的文章，直到1939年2月保罗亲王才能罢了他的官。

225 匈牙利的贡伯什的思想意识，在渊源上与希特勒更加相近。他于1935年10月去世，一直未能说服摄政王批准颁布他的早期理论。直到1938年伊姆雷第内阁才立法，限制犹太人在职业和商业方面的活动。尽管如此，在这一时期的匈牙利有广泛的反犹太情绪，特别是在中产阶级内部，而那些本身不是马扎尔人的居民社区中则尤其强烈。萨拉希便是从这些集团中为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以及更加广泛而自觉的匈牙利法西斯运动组织“箭十字团”物色大小头目。他从1938年到1945年指导着“箭十字团”，后来还能从一些较新工业的非技术工人中发展成员，部分原因是与老的手艺行业相比，这些人在社会上有自卑感，特别是老工人还有长期形成的工联主义的习惯。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政治上的右倾所取形式不同于东南欧其他国家，这主要由于博里斯国王和卡罗尔国王是按照自己的愿望来推动这种右倾。1934年的“兹维诺”专政由于领导它的军官内部意见分歧而有所削弱，1935年夏秋两季索非亚政治生活的内容表现为博里斯任命的人员与依旧效忠于维尔切夫原来的改革热情

^① 原文是Vodja，意为领袖。——译者

的军官们之间的争斗。即使在这一阶段，维尔切夫和格奥尔基耶夫的本性很可能仍然赞同共和主义。博里斯把他擅长大搞阴谋的本领全部施展出来挫败他们二人。1935年11月，博里斯对自己所处的地位觉得蛮有把握，于是把政府委托给他个人的朋友格奥尔基·基奥谢瓦诺夫，此人曾任驻贝尔格莱德公使，政治上没有任何经历。维尔切夫以叛国罪被投入监狱，军官联盟解散，“兹维诺”运动也告瓦解。这就使博里斯懂得他不必通过议会来进行统治；他从1936年3月起至1943年8月去世时止，是这个国家一切事情的独裁者，只不过没有这样的名义。1938年初举行选举，连已婚妇女也有选举权。但因过去所有的政党仍被查禁，而重建的议会又纯粹是个咨询机构，博里斯国王对选举结果就没有过分的关注。他没有为把自己塑造成国家守护者的形象而操心；也许正是这个原因使他在他的臣民中并不是没有声望的。

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也建立了国王专政，但不同于博里斯，他决心以这个国家的首席宣传家的形象出现。对卡罗尔来说，不幸的是科德里亚努和铁卫军已经扮演了这一角色，他们那“一人一英亩”的简明口号不仅赢得农民的支持，还获得城镇里传统的反犹太中心地区居民的支持。卡罗尔不信任科德里亚努，并公然妒忌他。可能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国王在1937年岁暮时邀请戈加组阁，尽管戈加的党在最近一次的选举中所得选票还少于百分之九。戈加实行了一种古怪的极端主义，为期虽然不久，却已在罗马尼亚败坏 226 了包括铁卫军在内的整个右翼激进运动的声誉，从而使卡罗尔得以用不妨称之为“右翼保皇主义”的运动来取代右翼激进运动。1938年2月8日，一个以罗马尼亚东正教会宗主教为首“民族团结内阁”宣誓就职。不到三个星期，一部新宪法便把全部重要的权力赋予了国王。一切政党都被查禁，一场精心安排的公民投票对卡罗尔的行动表示赞同，这种近于全国一致的赞同充分体现了罗马

尼亚选举机器的特色。国外的社会党和农民党领袖们谴责这一法西斯性质的实验,同时,卡罗尔本人准备对国内同情铁卫军力量、特别是对人们憎恨的科德里亚努大举进攻。

但在当时,罗马尼亚国王和铁卫军之间的冲突几乎全未引起欧洲新闻界的注意,因为在1938年初,国际关系的步伐突然加速。长期以来,维也纳政局一直不稳。自从1936年11月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建立实际上使奥地利的半法西斯政权失去它唯一的一个有力的保护者墨索里尼以后,形势一直紧张。只要不出现哈布斯堡王朝复辟(纳粹对此和贝奈斯同样恐惧),希特勒便准备等待奥地利自觉自愿地并入德国;他相信奥地利总统终将任命人员组成奥地利纳粹政府,就像兴登堡总统1933年委托他组织政府一样。迫使希特勒在1938年采取行动的是奥地利人自己。舒施尼格总理意识到纳粹的宣传正在损害他的地位,便把他的政治前途押在公民投票的结果上,邀请人民投票表示究竟是支持还是反对“一个自由的和德意志的、独立的和社会的、基督教的和统一的奥地利”。如果真按这种说法投票的话,舒施尼格必将获得相当大的多数选票,与德国合并的势头必将遭到严重挫折。一听到公民投票的消息,希特勒立即下令动员。维也纳出现了一场政治阴谋,回顾起来其中大部分情况似乎相互毫无关联似的。3月12日,德国军队越过奥地利边界,希特勒在他的出生地受到欢迎。第二天,奥地利被正式宣布为“德意志帝国的一个省”,凡尔赛条约和圣日耳曼条约所明确禁止的奥德合并却成了现实。

没有任何一个外国感到惊讶,有些国家提出抗议,但都接受了新的政治秩序。德军沿欧洲中部地带六国中的四国边境布上岗哨。只有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的边境哨所未曾荣幸地看到卐字旗。作为各继承国军火库的捷克斯洛伐克,成为陷入重围的民主堡垒。没有一个人相信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不会在几个月内遭

到侵犯，除非它的政策出现重大变化。是否有任何政府肯为维持这个共和国的完整而不惜一战，这是那年春天一个悬而未决的问



第十一章 德国潮

在希特勒胜利进入维也纳以后的三年半中，德国人向东拥进，直达黑海与爱琴海之滨和芬兰湾芦苇丛生的浅滩。与来自德国的日益增长的威胁相比，东欧的其它问题都显得微不足道，其他争端也全不相干了。这个时期的绝大多数内部变化，的确都是长期外部危机的间接反应。“卐”字的阴影沉重地落在这一整个地区之上。

完成这些锋芒毕露的征服的主要工具当然是德国军队，它有高明的应急计划，善于巧妙地使用装甲纵队，无情地发挥战术空军力量。但是最终军事上的成功还靠战前已经形成的三种状况：德国外交长于利用宿怨，挑拨诸邻邦以分散潜在敌人的注意；在侨居在第三帝国边界以外的六百万说德语而又有德意志思想的少数民族（德意志少数民族）中鼓吹种族团结和种族优越感；以及从1934年以来，多项商务条约给那些否则便无稳定市场的国家提供了真正的经济实惠，因而使中欧和东南欧诸小国同柏林联系得愈来愈紧密。1939年9月第一批装甲师进犯波兰之前，德意志至高无上的地位就已这样在多瑙河流域及巴尔干国家中树立起来了。

这些年代中希特勒在东方的最终目标并无多大改变，很可能是由于这些目标根本就不确切。他要在欧洲东部边境地区、特别是在乌克兰为德国争得“生存空间”（Lebensraum）。他设想大德意志帝国应囊括除了那些他认为十分幸运地生活在墨索里尼开明统治之下的南部蒂罗尔人以外的全部德意志人聚居地。东欧的其他民族——波兰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匈牙利人，甚至也许还有捷克人——可以作为附庸存在，允许有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其经济

希特勒的东欧 (1938年3月 1941年6月)

0 500
英里

1938年的边界线
德国占领地
意大利占领地
德国和意大利联合占领地
匈牙利占领地
保加利亚占领地
俄国占领地
立陶宛占领地

This map illustrates the territorial changes in Eastern Europe during the period from March 1938 to June 1941. It shows the 1938 boundaries as a dashed line. Various regions are shaded with different patterns to indicate occupation: diagonal lines for German-occupied areas (including Poland, Czechoslovakia, and parts of the Baltics), horizontal lines for Italian-occupied areas (Libya, Greece, and parts of the Balkans), and cross-hatching for areas jointly occupied by Germany and Italy (Cyprus, Rhodes, and parts of the Aegean islands). Other patterns represent occupations by Hungary, Bulgaria, the Soviet Union, and Lithuania. Major cities like Berlin, Moscow, Leningrad, and Bucharest are marked. The map also shows the Black Sea, the Mediterranean Sea, and the Red Sea.

和政治都依附于帝国。可是，希特勒没有为征服排定确切的日程表，也没有为他的“新秩序”提出详细的治理计划。他不时向文武首要官员们讲述他未来的政策，还总是给自己留下足够的回旋余地。然而在1937年11月5日的四小时长篇大论（即所谓的“霍斯巴赫”会议记录^①）中，他却许下诺言要将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帝国，作为对付苏联的重要的初步行动；但是他没有点明事件的顺序、性质，甚至也没有提到时间如何安排，虽然他说这次行动一定要在1943至1945年以前完成。他的行动规则是，一遇到有利时机，便须立刻抓住，若无有利时机，只得自己制造。德国武装部队将随时准备行动，但并不总是明确下个目标将在何处，也并不清楚谁是敌人，谁是朋友。希特勒外交政策的目的和意图表面上固然显而易见，却掩盖了瞬息万变的着重点，致使这几个月来的紧张局势更加捉摸不定。1938年捷克危机的详细记录提供的充分证据，足以说明希特勒处理外交事务，时而犹豫不决，时而急躁鲁莽；在此后的年月中，他都是以这种方式来对付国际上每一次发生的紧急情况。

希特勒一直讨厌和鄙视作为一个民族的捷克人，虽然感情冲动时偶尔对斯洛伐克人高看一眼。这两种偏见都源于他在奥地利度过的童年；后来，偏见之外又加上一层对作为“凡尔赛体系”产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政治仇恨。因此可以预言，他必定要设法尽早摧毁捷克国，以便把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并入大德意志帝国。1938年德国兼并奥地利两星期后，汉伦被召到柏林，奉命代表苏台德地区德意志人向捷克政府提出一系列捷克人永远不会同意的越来越苛刻的要求。汉伦被告知，他应当把自己看作元

^① 霍斯巴赫是纳粹德国国防军中的陆军上校，他以副官身份参加了希特勒于1937年11月5日召开的军事首脑会议，并记录了希特勒讲述的纳粹侵略计划的细节。他的记录成为纽伦堡战犯审判中的证明材料。——译者

首在苏台德和其他边境地区三百二十五万德意志少数民族中的代表。保证以动乱和政治倾轧来削弱捷克斯洛伐克是他的责任。德国人也作了准备：4月的第三星期，总参谋部奉令制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作战计划；并且与匈牙利人接触（再通过他们与波兰人接触），鼓励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他邻国都来要求分一杯羹。及至5月第一星期，希特勒又同意过几年再对捷克采取军事行动，他精明地算计到，姑且让这个共和国长期分裂瓦解，这样一来，将可向其他小国证明法国搞的联盟体系一文不值。

汉伦在他称为卡尔斯巴德而捷克人称为卡罗维发利的城市里 231 举行的苏台德德意志党年会上，正式担当了那个等待他去就任的职务。4月24日，他拒绝了布拉格当局准备作为一种和解姿态提出、但甚至尚未起草的“少数民族法”。他要求德意志少数民族完全自治，并保证他们“有承认属于德意志民族和具有德意志世界观的自由”。这种性质的自治势必破坏共和国的整个民主基础，捷克人于是拒不考虑他的要求。然而，他们受到法国的、尤其是受到英国的压力（汉伦曾两度访英，甚至给温斯顿·邱吉尔都留下了好印象）。无疑，汉伦得到了大量说德语的人的支持。德国兼并奥地利时，他的党已有七十五万党员，此后两个月中又有五十万人参加。仍然忠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概念的苏台德德意志社会民主党人也力促布拉格当局承认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特殊权利。捷克人接受劝说，将原来“少数民族法”的概念扩大成更为广泛的“民族法”，将在现存的政治结构内给予更高度的自治。内政部长甚至授权成立苏台德德意志防卫队，负责在地方选举（5月22日举行）的前夕在居民主要为德意志人的各城镇维持治安。恰如希特勒所希望的，共和国已在解体。

5月第三星期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恐慌使危机更加严重。很可能由于苏台德防卫队的活动再加之谣传德国部队纷纷调动，

致使贝奈斯认为捷克斯洛伐克即将遭到入侵。法国、英国和苏联都警告希特勒，边界上的突然行动很可能导致全面战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下令部分动员，但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至今仍无证据表明德军那一星期曾调动过哪一个师，而捷克人在布拉格上空发现伞兵，肯定是由于神经过度紧张。英法政府为此感到不快；它们不得不发表一通确切表示意向的声明；它们对贝奈斯竟然玩弄花招使它们采取如此有失身份的行动十分愤慨。贝奈斯因而受到更大压力，要他同汉伦达成协议，英国人决定派出一个“非官方调解人”使捷克人与德意志少数民族和解。7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宣布，这一使命将由朗西曼子爵执行，他是位老自由党人、造船业大王、二十五年前曾任农业渔业委员会主席，以精悍见称。唯恐人们认为朗西曼子爵对这一使命的背景一无所知，乃在他去布拉格的火车上拍摄一张表明他正在阅读刚出版的维斯克曼女士所著《捷克人与德意志人》一书的照片，脸上一副漠然无动于衷的神情。

毫不奇怪，朗西曼未能解决“这个该死的国家”——那年8月，他在布拉格逗留整整四星期之后这样地称呼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总的看来，他同情苏台德的领导人，谈到贝奈斯时则愤然地说他“行动缓慢，谈判拖拉”。这反正不起什么作用。希特勒已经打定主意。5月的战争恐慌激怒了他；德国以外的国家制造的危机不在他的估计之列；捷克和法国报纸宣称巴黎、伦敦和莫斯科的警告预先阻止了德国的入侵，这更激怒了他。5月20日，他口授一道军事指令，一开头就说：“若不是受到挑衅，我无意于近期内以军事行动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刚好八天以后，他改变指令的措辞，斩钉截铁地宣布，“至迟在10月1日摧毁捷克斯洛伐克是我不可改变的決定”。他认为不会发生全面战争，但他准备冒此风险。

此后几个月里，德国真心诚意地竭力说服西方国家，特别是英国，相信德国的事业是正义的。英国政府和报纸对此不无同情，

法国则甘愿追随伦敦。政治上，法国已无意承担白里安和巴尔杜所作的全面保证而完全退却了。法国外交部长庞纳，对于莫斯科所提出的现在已经到了法、捷、苏三国总参谋部应该举行军事会谈的时候的这一建议，不予理睬。德国驻巴黎大使向柏林报告，5月22日他曾与法国总理达拉第会谈，达拉第谈到他想解救欧洲，不让“哥萨克和蒙古游牧部落”把一种新型文化从东方带入一个个“荒无人烟、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度里”。鉴于法国总理对新近签订的法苏条约作出这般奇怪的评论，希特勒对避免一场欧洲战争的可能性何以如此乐观便不难理解。

1938年整个夏季苏联政策是个不解之谜，甚至现在回顾起来依然如此。与捷克斯洛伐克的联盟唯有在法国给予捷克军事支持的条件下方能有效。诺沃提尼政府1958年公布的文件暗示，斯大林和李维诺夫准备兑现苏联所承担的义务。于是，1938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驻莫斯科大使就是这样给布拉格发电报的：“如果受到请求，苏联准备——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一致——采取有关确
233
保捷克斯洛伐克安全的一切必要措施。她将安排进行这一工作的一切必要手段。”她果真这样做了吗？西方国家深知苏联那年夏天显然是虚弱的。这几个月正值老布尔什维克和苏军将领遭受大清洗的高潮，在这次大清洗中牺牲的有三名苏联元帅（包括总参谋长图卡切夫斯基）和七百名红军将官中的三百名。对苏联军事机器的效能表示怀疑不无道理。此外，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没有共同边界，波兰和罗马尼亚又都不会同意苏军过境，虽然不妨设想，如果苏联飞机飞越北布科维纳前往乌日哥罗德，罗马尼亚人（该国的外交政策声明极其不光明正大）很可能不会注意到。

从法国盟友那里得不到安慰，俄国盟友又令人捉摸不定，作为最后一着，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便于8月间全力以赴要把小协约国发动起来。如果这还不足以制止德国，至少可以抵消来自匈牙利

的威胁。小协约国各国外交部长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附近湖畔阴沉而美丽的景色中举行会议，匈牙利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应邀参加。会上达成一项协议，据此，匈牙利放弃对小协约国任何成员国使用武力，作为回报，捷、南、罗三国承认匈牙利有权重新武装，并答应在国内立法以改善马扎尔少数民族的处境。霍尔蒂及其外交大臣坎尼亚（当时两人正在德国访问）坚持声称协议使捷克斯洛伐克陷于完全孤立，因为该协议保证贝奈斯不得从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得到援助。另一方面，德国怀疑自己受骗，此后再不信任匈牙利。但明显的是，捷克的确吃了亏，布莱德会议实际上标志着小协约国从此结束。卡罗尔国王在9月危机中最严重的时刻给希特勒通信，向他保证罗马尼亚愿与德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而且虽然斯托亚迪诺维奇批准南斯拉夫军队部分动员，他却与戈林保持非正式接触，随后，曾向德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表示他对希特勒将苏台德并入帝国的方法“无限钦佩”。捷克人陷入了孤立无友、格格不入的国际环境中。

234 9月的第一星期，贝奈斯在布拉格接见两个苏台德德意志人领袖，主动提出给予他们实质上的自治，其性质同汉伦4月间在卡罗维发利提出的要求相似，捷克危机至此达到顶点。这一建议使汉伦处境尴尬，他当时已经离开本国前往纽伦堡参加纳粹党的大会，一心要脱离捷克。但是，贝奈斯的建议提出三天之后，在摩拉瓦—俄斯特拉发城发生的骚动使苏台德德意志人找到借口，中止一切谈判。一切似乎都已准备就绪，只待从地图上抹掉捷克斯洛伐克国家。

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的讲坛上斥责捷克斯洛伐克国内“令人无法忍受的局势”。当天夜间，在苏台德地区的一些城镇里暴徒捣毁了捷克人和犹太人的店铺，景象不堪入目。第二天，捷克征召预备役军人，在肇事地区实行军事管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张

伯伦于9月15日从伦敦飞抵贝希特斯加登会见希特勒。他返回后,便劝使英国内阁和法国政府对捷克人施加压力,要捷克把苏台德划归第三帝国;作为报偿,英法答应联合保障捷克的其余部分不受无缘无故的侵略。9月22日,他再次飞往德国,在戈德斯贝格面告希特勒,捷克人将割让德意志人居住的一些地区。但是,希特勒要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全面瓦解。在两次会晤的中间的一星期里,他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进行接触,并派密使去斯洛伐克鼓动蒂索(格林卡已于8月去世)。希特勒相应地在戈德斯贝格向张伯伦提交一份备忘录,要求移交苏台德地区,并满足非德意志民族的种种要求。

在一个短时期内,希特勒似乎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英法拒绝了戈德斯贝格备忘录。匈牙利人的要求只限于对作为种族集团的马扎尔人所居住的一片边缘地区;而斯洛伐克人表示,如能重新组成联邦国家,他们将以此为满足。只有波兰人完全按照希特勒的愿望行事,对法国限制希特勒的意图不予理睬。捷克斯洛伐克没有分裂;在若干天中,存在着发生全面冲突的危险,这较之希特勒所预料的更大一些。但是,列强中没有哪一个在军事上做好了战争准备;意大利的调停导致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在9月29日举行著名的慕尼黑会议。慕尼黑协议以迅速解决波兰与匈牙利少数民族问题为条件,承认将主要为德意志人居住的地区划归第三帝国,并规定由四国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其余部分不受无缘无故的袭击。10月1日,德国部队开入苏台德;10月3日,胜利地越过旧日的边界,至此,苏台德的大部分地区已落入希特勒之手。10月5日,贝奈斯总统辞职,不久便离开布拉格,最后去美国定居。

10月2日,波兰占领切欣周围约四百平方英里的地区,但是 235
与匈牙利划定新的边界却费时较长,部分原因是希特勒对布莱德协议不满,随后霍尔蒂和坎尼亚又坚持认为,匈牙利力量过于薄

弱，一旦发生全面战争，势必不能参与军事行动，以致对霍尔蒂和坎尼亚余怒未消。但是匈牙利的要求终于依靠德意两国的仲裁声明得到解决，这便是1938年11月2日公布的“第一号维也纳裁决书”，它把主要为马扎尔人居住的南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边境地区，包括重要的种族杂居城镇科希策和乌日哥罗德划给了匈牙利，但把布拉迪斯拉发留在斯洛伐克境内，并且不让匈牙利在罗塞尼亚与波兰接壤（像坎尼亚和贝克所期望的那样）。同一星期早些时候，匈牙利部队开入归还的地区，即他们称之为菲尔维代克的这个地方。11月11日，摄政王霍尔蒂骑着他那匹不可或缺的白马，驰入科希策（现在又再称为卡萨），政府全体高级官员列队尾随。在匈牙利，公众因修订条约的胜利颇为欢欣鼓舞。菲尔维代克面积约五千平方英里，人口八十五万，其中四分之三无可置疑是马扎尔人或讲马扎尔语的人。

慕尼黑协定和第一号维也纳裁决书使捷克斯洛伐克国家面积缩小近三分之一；这个被截去一部分的共和国的面积仍较大于德国兼并前的奥地利，比扩大后的匈牙利仅略小一点。但是捷克人失去了全部防线，失去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大部分工业，失去了半数的城镇和他们蕴藏量最大的一些煤矿。经济上，捷克斯洛伐克变成了德国的卫星国，由于布拉格政府与希特勒在11月底达成一项协议，这一变化进程更加突出；协议允许德国修筑一条穿越摩拉维亚直至维也纳的战略公路，并开始在奥得河与多瑙河之间开凿一条可以通航的运河。政治上，共和国也愈来愈以德国为榜样，亦步亦趋。斯洛伐克与罗塞尼亚都获得完全的自治权；但是成为斯洛伐克总理的蒂索于12月末取缔了除“斯洛伐克民族阵线”以外的所有政党，并靠特别招募的半军事性组织“格林卡卫队”维护权威。在此时已称作喀尔巴阡—乌克兰的罗塞尼亚，事态也是如此，可是，由于行政首府只不过是扩大了村子（胡斯

特^①), 整个地区的政治生活荒唐到了可悲的程度。罗塞尼亚的领导人沃洛申神父极力效法蒂索阁下的榜样, 成立“西奇卫队”^②以保卫乌克兰主义不受马扎尔人侵袭。“喀尔巴阡—乌克兰”与德国签订自己的经济条约, 将这片山区的全部采矿权拱手交给了柏林。²³⁶

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从未像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两地区那样, 如此公然实行专制独裁。年高德劭、然而极少政治经验的法理学家叶美尔·哈恰继贝奈斯之后任总统, 前农民党领袖鲁道夫·贝伦组织了政府。贝伦及其外交部长奇瓦尔科夫斯基都热衷于与德国合作。所有中间派的政治组织联合组成新的“民族团结党”, 该党的对立面是左派的外围组织——“国民工党”。起初还默许共产党存在, 又因人们认为苏联不同于法国, 在9月危机中原会站在共和国一边, 而且苏联并未派代表团飞往慕尼黑, 所以很多人参加了共产党。但是, 及至这年年底, 共产党便被禁止; 布拉格的议会活动不过是装点门面的空架子。

甚至在慕尼黑会议之后, 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仍有近二十五万德意志族人(斯洛伐克和罗塞尼亚也几有此数)。纺织与工程中心布尔诺有六万德意志居民, 布拉格市有五万。设法使这一少数民族在国家机关中高踞要职是希特勒政策的一部分。到圣诞节, 德意志居民的政治发言人孔德已在向哈恰和贝伦索取特权, 其态度之傲慢更甚于汉伦对待贝奈斯。实际上, 哈恰采取主动的自由权小得只等于德国的一个市长; 但是, 他认识不到他的独立地位所受的限制, 天真地认为他能够引导共和国在欧洲国家中获得新的地位, 既与德国交好又不受第三帝国的管辖, 而成为条顿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桥梁。就职不到六个月, 他就不免要尝到幻灭的悲哀

① 原文是 Khust, 意即村子。——译者

② 原文是 Sic Guard。——译者

——在希特勒的新秩序中，捷克人的地位是奴仆，不是伙伴。

对中欧和东南欧所有各民族来说，慕尼黑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在接受告诫要把国联盟约的原则奉为神圣的国家看来，慕尼黑会议是对日内瓦精神一种犬儒式的否定。事实上，这一地区没有一个国家能对此事问心无愧（大约除了保加利亚以外，因为博里斯国王为人精明，设法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佯装一无所知）。布莱德协议的签字国或者波兰都不配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因为在波兰的西里西亚地区的捷克人口数量占绝对优势。然而，由于慕尼黑会议而大丢面子的是法国和英国；其后，它们没有参加确定菲尔维代克边界线的会议，似乎足以证明它们的影响已经衰落。法国

237 承担的条约义务被当作一纸空文，人们认为达拉第和庞纳软弱无能，优柔寡断。尤其成为笑柄的却是英国首相张伯伦，他在一次对全国广播讲话中说道：“在一个遥远的国家里，两个民族发生纷争，我们对他们全然不了解，却因此必须在这里掘战壕，试戴防毒面具，这是多么可怕，多么荒唐，多么不可思议！”尽管按轰炸机飞行的直线计算，发生争端的地区比英国国家海军主要基地距离伦敦还要近些，他的大部分听众本来也会同意他的看法的。但是，即使可能为张伯伦勉为辩护，却也难以认为谋求“我们这一代的和平”这种异想天开的英格兰本土主义者^①的孤立主义能在其他“遥远的各国”提高英国的威望。既然伦敦和巴黎都已奉行姑息政策^②，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也一味姑息自然是合乎逻辑的了。这些小国都从“中立”转而投靠轴心巨人。

德国的成功也影响了本地区得以幸存的一些独立国家的国内

① 英格兰本土主义者(Little Englander)主张多注意英格兰本土而少注意大英帝国为较恰当。——译者

② 姑息政策(appeasement)通常也译“绥靖政策”。——译者

政策。在匈牙利，随着1938年夏秋捷克危机的逐步恶化，由霍尔蒂5月任命组织政府的伊姆雷第·贝洛也同时采取了一系列反犹太措施。原来限制某些职业中的犹太人比例不得超过百分之二十。慕尼黑会议之后，限额降至百分之六，而划定犹太人的界说反到扩大了。就在这时，伊姆雷第的政敌发现，他的出生于1807年的曾祖母诞生后的头七年信奉犹太教。伊姆雷第在一篇冗长的演说里驳斥了这一使他的出身的纯洁性蒙受耻辱的发现，但看来未能说服所有的听众。霍尔蒂讨厌伊姆雷第其人，并一向认为有许多匈牙利人虽然赶巧是犹太人，却是好人，他抓住这个机会迫使伊姆雷第辞职；继任者是1920年的保守派首相、温和的泰莱基·帕尔伯爵。泰莱基虽然赞成同西方建立联系，但认为德国在中欧的影响之大，已使他难以大幅度地改变伊姆雷第的政策。因此，他让伊姆雷第任内的外交大臣恰基伯爵留任，此人相信需要与轴心国合作。他还允许种种反犹太法律在国会通过。另一方面，他解散了“箭十字团”组织，该组织的领导人萨拉希已被伊姆雷第投入监狱——并且不动声色地扑灭了伊姆雷第按照斯托亚迪诺维奇的“绿衫党”发起的一种“运动”。

在罗马尼亚，卡罗尔国王继续小心翼翼地走政治钢丝绳。他这时已安排好要在1938年秋赴伦敦和巴黎进行国事访问，便克尽职，完成了这些任务。虽然他在参加礼节活动的间隙积极进行游说，但无论伦敦的商界、还是巴黎的证券交易所都没有对他的奉承讨好有所反应。他断定在归途中访问德国可能是外交上比较策略的做法，于是在11月24日，希特勒在贝希斯特加登接见了，对他说了许多甜言蜜语，宣称他本人就赞成在罗马尼亚和第三帝国之间建立更为密切的经济联系。希特勒同时表示他同情4月间以叛国罪判处十年徒刑而入狱的科德里亚努。不幸的是，国王与元首会晤后六天，罗马尼亚监狱当局的警惕性较高，在发觉科德里

亚努和其他十三名铁卫军头目“企图越狱时”将其击毙。因为希特勒急于要得到罗马尼亚的石油和小麦，所以甚至这种公开的冒犯也没有延误一项新的贸易协定的谈判，该协定于12月10日正式签字。似乎是为了证实他这个法西斯分子至少不比科德里亚努逊色，国王果断地创立一党制的“民族复兴阵线”，该阵线通过选举取得了罗马尼亚人民的认可。选举是以公开记名投票的方式进行的，没有反对党候选人参加竞选。但是希特勒对卡罗尔的政治表演无动于衷，也无意予以支持。科德里亚努被杀后幸存下来的铁卫军组织于1939年9月进行报复，暗杀了卡罗尔的唯一命是从的首相卡利内斯库。

保加利亚的国内事务没有什么变化，外交政策也只略有修改。仍由国王博里斯和他的朋友基奥谢瓦诺夫首相作出一切决定；但允许议员在国会进行辩论，报纸上还偶尔出现不同意见，需要说明的是，这些批评多来自政治上的右派，而不是来自自由派。1938年7月底，保加利亚与巴尔干协约国（希腊、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在萨洛尼卡达成协议，正式承认保加利亚有权重新武装，并作出五国间互不使用武力的决议。但是，萨洛尼卡协议非但未能吸引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国，反而在索非亚触发了要求修订条约的情绪；人们争辩说，既然纳伊条约中解除武装的条款可以一笔勾销，那么领土划分方面最使人不能接受的条款也同样可以一笔勾销。由于这个国家里没有德意志族人，这种要求修订条约的情绪就为德国人提供了争取保加利亚统治阶级倾向轴心国政策的最有效的诱饵。可是，在德国拥有亲属、又娶了意大利公主为妻的博里斯，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力量和局限性都很清楚。当他的邻邦罗马尼亚的国王要在钢丝绳上向前挪步时，博里斯倒宁愿站在远处观赏这样的政治杂技，不时瞧瞧表演者脚下的深渊，深感忧虑。

这一时期，巴尔干诸国中发生变化最为广泛的是南斯拉夫。慕尼黑会议后的几个月里，摄政王保罗对斯托亚迪诺维奇愈来愈感失望。在国内事务方面他成就极微：未能与马切克和克罗地亚人和解；在塞尔维亚东正教教会的压力之下，废止了与梵蒂冈就宗教事务达成的协议；疏远了老年急进党人和“普雷恰尼”塞尔维亚人。虽然斯托亚迪诺维奇改善了南斯拉夫与其邻邦的关系，但是保罗亲王对他与齐亚诺日益增长的友谊不大放心，怀疑他卷入了旨在允许意大利并吞阿尔巴尼亚的阴谋，事情也确实如此。然而，斯托亚迪诺维奇未能察觉自己的地位已岌岌可危。他解散了“斯库普什丁纳”，并于1938年圣诞节前不久举行大选。

选民要么选择政府提出的名单（包括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南斯拉夫激进同盟”、科罗舍茨的斯洛文尼亚人党和一个穆斯林党），要么选择反对派提出的名单（以马切克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为首，但包括塞尔维亚民主党人和农民党人，甚至还有一度追随过帕西奇的人）。尽管压力和恫吓双管齐下，政府也仅获得百分之五十九的选票，反对派获百分之四十一的选票。与上次1935年5月进行的选举相比，反对政府名单的选票又增加了二十五万余张。选民不过二百万，按照当时的政治制度，这实质上等于投了不信任票。可是斯托亚迪诺维奇执迷不悟：他向保罗亲王解释说，选举结果如此之糟完全是科罗舍茨的过失，因为这位担任内政大臣的斯洛文尼亚神甫如此玩忽职守，竟允许国家雇员根据各自的心愿投票。科罗舍茨因此辞职，接着，贝尔格莱德经历了六个星期复杂的政治倾轧。2月3日，斯托亚迪诺维奇的林业矿业大臣在议会大发脾气，宣称唯有曾在1916年直捣卡伊马克查兰^①的那些塞尔维亚人才有权决定国家的政策。这是极不策略的说法：这已是1939年，参

^① 原文是 kajmakalan，1916年，塞尔维亚军队的德里纳师攻占卡伊马克查兰。——译者

加过塞尔维亚军队勇猛攻击的老战士已经寥若晨星，摄政王本人当时又在巴黎。2月4日，斯托亚迪诺维奇被解职。

240 新政府以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为首，他是萧条时期尼什市一位能干的市长。虽然他以位于铁路枢纽处一座外省城市的行政要人的褊狭眼光对待国际问题，他对南斯拉夫国内弱点的了解却是正确的。他已与马切克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从1939年3月到8月，连续进行了旨在给予克罗地亚一定程度自治的谈判。谈判旷日持久，困难重重，这不仅是由于马切克分寸不让——因为他知道，就像他之前的拉迪奇一样，他是克罗地亚的主宰——而且还由于塞尔维亚的各反对党害怕茨维特科维奇把主张改革的主要人物争取过来，从而使当时的独裁政府长期存在。摄政王本人一度拒不接受马切克的全部要求，克罗地亚农民党代表便再次与意大利人联系。4月，甚至出现意大利进军南斯拉夫强迫达成解决的危险（当然，从中受益最大的将是帕韦利奇，而不会是马切克）。但是在8月23日正式签订一项协定（斯波拉宗）^①；三天之后，马切克出任副首相。

根据这一协议，合并了1929年建立的两个巴昂辖区，加上波斯尼亚、斯拉沃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某些边境地区，建立一个称为“克罗地亚”的单独行政单位；它将拥有自己的省长和议会，并将享有相当大的地方自治权力。新的体制结构与二元君主国时期的旧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极为相似。所有关于国防、外交政策、商业和交通的职权都属于贝尔格莱德中央政府，恰如过去属于布达佩斯和维也纳一样。克罗地亚宪兵由南斯拉夫陆军部训练，但由该省省长管理。“斯波拉宗”应该对南斯拉夫各族人民都有益处；双方协议制定新的选举法，确保代议制度较为公平；应允南斯拉夫

^① 斯波拉宗(Sporazum)，南斯拉夫就克罗地亚问题达成的协议(1939年)。——译者

人重新享有政治自由。然而，无论斯洛文尼亚人或大多数塞尔维亚人都不满意“斯波拉宗”的条款，虽然茨维科特维奇和马切克都曾保证说，最终将把联邦的原则扩及整个王国。此后十八个月里，进展甚微，部分是因为摄政王不愿在他摄政的最后两年里批准体制改革，但更重要的却是因为他和政府均担心趋向民主制度的任何公开改革都会招致与南斯拉夫毗邻的两个轴心国的干涉。关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争端的解决办法仍不完善；而且为时过晚，已不足以拯救王国免于灾难。

1939年3月，希特勒终于放弃他早些时候所宣称的只求统一德意志居民占多数的地区，居然要动手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领土。慕尼黑协定签订不过三星期，柏林就发出要占领布拉格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其他部分的军令。如同前一年德国兼并奥地利的情形一样，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内部事务终于又一次决定了希特勒进军的时间。中央政府分配给斯洛伐克的款项数目问题引起一场争端，致使布拉格与布拉迪斯拉发之间的关系在二月底发生严重裂痕。同时，沃洛申的“西奇卫队”在“喀尔巴阡—乌克兰”对他们认为属于捷克、波兰、犹太或马扎尔血统的一切人和一切事都任意闹事。3月第一星期末，哈恰总统和贝伦政府鼓起勇气，命令一名捷克将军负责控制罗塞尼亚。接着，哈恰解散蒂索的斯洛伐克政府，3月10日清晨，派遣捷克部队进入布拉迪斯拉发。241

这些事件使希特勒有机可乘。他将蒂索召到柏林，建议他召开斯洛伐克国会会议，宣布斯洛伐克在德国保护下独立；这是3月14日干的事情。当晚，哈恰也飞抵柏林，希特勒在凌晨（3月15日）通知他德国军队将于清晨六点钟进入捷克各行省。在总理官邸接待室侍候的戈林补充一项情报说，布拉格将被炸毁。哈恰立刻昏倒了。入侵前两小时，他签署一项公报，声称“满怀信心地将捷克

人民的命运放到元首手中”。希特勒当天晚上进入布拉格，第二天，波希米亚—摩拉维亚作为德国的保护国并入帝国。斯洛伐克保持德国保护下的名义上的独立，由德国军队驻守它的城镇。蒂索成为这个一党制国家的总统，它的活动分毫不差地与帝国协调一致，它的经济发展由柏林控制。

沃洛申效法蒂索，却未经希特勒支持就于3月14日宣布喀尔巴阡—乌克兰为独立的共和国。如今轮到匈牙利人行动了；他们担心，如果不攻占罗塞尼亚，这片领土就会被波兰人或罗马尼亚人或双方共同征服。沃洛申的小小共和国从未得到生存的机会。它恰好存在了二十四小时。匈牙利人与“西奇卫队”互相开枪打了一阵，“胡斯特”没有多少有组织的抵抗，马上就陷落了。3月17日，匈牙利人已占领罗塞尼亚全境，终于和波兰有了一条共同边界。匈牙利军队企图向斯洛伐克部队防守的杜克拉隘口挺进，罗塞尼亚的西部于是也发生了战斗。斯洛伐克的德国保护人断然命令匈牙利纵队在罗塞尼亚边境前几英里处停止前进。面积比英国德文郡稍大一些、等于美国康涅狄格州一半的整个罗塞尼亚省此后并入匈牙利，成为菲尔维代克的一部分。

242 因为德国军队是被“邀请”来充当保护人的角色，所以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灭亡在法律上并不违背慕尼黑协定；尽管如此，1939年3月的事件却导致英法两国根本改变政策。它们抛弃了姑息政策，转而对那些面临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威胁的国家慷慨地提出可以给予一系列保证，但并不一定为对方所接受。3月31日，波兰人接到了来自伦敦和巴黎的予以支持的保证，但与罗马尼亚人仍在举行谈判。罗马尼亚驻伦敦代表确信，在3月的第三星期，他的国家将遭到德国的入侵，战火迫在眉睫。甚至当这一威胁没有变为现实的时候，英国外交部门的某些人员仍敦促巴尔干各国组成由西方支持、甚至得到苏联保障的统一战线。这是个思想混乱的

时期，白厅及其驻外使馆的情况一律如此。

然而那年复活节，组织巴尔干联盟体系一时之间似乎至为必要。墨索里尼为树立个人威信而急于想取得某种惊人成就，便在4月7日占领阿尔巴尼亚，几天后将其并入意大利王国，阿尔巴尼亚前统治者（索古国王）匆匆出亡，不复参与政治。阿尔巴尼亚十多年来一直是意大利的卫星国，它之所以丧失独立从许多方面来说都只是个政治细节问题。西方则认为，墨索里尼此举是轴心国过激政策的明证；然后，于3月13日对希腊和罗马尼亚作出保证。接着，土耳其也接受了英法两国的保证，但是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都宁愿不沾边儿，决意不得罪轴心国伙伴。

在5月签署的“钢铁公约”是一个不祥之兆的政治军事联盟，它强调的是意德团结；然而时至初夏，事态渐趋明朗：继续真正威胁东欧和平的不是意大利而是德国，争夺的主要地区则是波兰。希特勒一向不信任波兰人，尽管直至占领布拉格后他仍然维持着以1939年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为基础的与波兰友好的假象。甚至迟至1939年1月，假如波兰同意将但泽割让给帝国（作为报偿，将得到使用港口的某些权利），并允许德国有经过波莫瑞前往东普鲁士的享受治外法权的通道，那么，德国也还会准备同波兰合作。德国又要求波兰签署反共产国际公约，该条约最初是德日两国1936年签订的，作为一种反对布尔什维主义的表示。后来1937年11月墨索里尼又使意大利与该条约发生了联系。但是，波兰外交部长贝克担心接受这些条件将使波兰成为德国的附庸；德国的建议遂毫无结果。

贝克无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政治才干和波兰国的军事力量²⁴³。因为波兰是东欧最大的国家，他便认为他拥有其他较小国家所不具备的行动自由。他把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当作一个“第三欧洲”来考虑，认为它可以平衡英法与轴心国之间的代

伴关系。在柏林，他强调“第三欧洲”是阻止苏联扩张的壁垒；而在伦敦或者巴黎，他把“第三欧洲”解释成一道遏制德国东进的屏障。大约除了匈牙利而外，谁也没有认真对待他这说法；虽然希特勒觉得这一壁垒不过是一道木栅，英法却仍然重视波兰的军队。

英国给予波兰的保证使希特勒为之惊讶。就在宣布这一保证的四天后，他命令最高统帅部着手制订波兰战役的初步计划。贝克访问伦敦时，强调他是来谈判缔结互惠同盟条约的（实际上，这条约到8月25日才签订），然而张伯伦却尽最大努力劝说波兰人行动不可过火，特别在但泽问题上更应如此。贝克的伦敦之行使希特勒确信是英法阴谋利用波兰作为包围德国的工具。因此，他在走向战争的道路上加快了步伐。4月11日，便开始认真制定入侵波兰的周密的军事计划；十七天之后，希特勒正式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直到五月底，德国报纸日复一日，连篇累牍地攻击波兰人虐待波莫瑞和波兹南尼亚的德意志少数民族，这实在是一种不祥之兆。但在整个六月和七月的大部分时间里，德国舆论却又比较克制。希特勒很少露面，人们开始觉得整个事件不过是一场虚惊，是占领布拉格后产生震惊的反应。7月底，危机又骤然加剧，波兰抱怨德国人在但泽港无理对待波兰海关人员；在整个8月里，德国报纸和电台不断列举波兰人威吓边境地区的德意志族人的事例。

一旦发生战争，无论英国或是法国都不可能向波兰直接提供军事援助。5月中旬，法国总参谋长甘默林将军与波兰高级参谋人员在巴黎举行会谈，但这只不过强调波兰在地理上的孤立。甘默林充其量所能办到的是应允在发生军事行动的第十七天在西线对德国发动牵制性的攻势。很清楚，能在对德战争中给予波兰有效支援的唯一国家是苏联。

244 1939年整个春季和初夏，英法两国和苏联的代表在莫斯科举

行了漫无边际的会谈。在结盟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苏联要求双方作出互相支持的保证，英国则希望苏联单方面作出保证；而且，即令苏联准备给予军事援助，波兰也明确表示，她不允许红军进入加利西亚或维尔纳地区去和他们的敌人德军对垒。值得怀疑的是张伯伦政府是否曾真心愿意和苏联结盟；而在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任外交部长时，俄国人又开始显得似乎根本不想与西方有任何接触。当然，毕竟还存在着法苏条约，不过双方均未有履行这一条约的任何举动。彼此都深深怀疑对方的企图。会谈的唯一价值在于可能对德国有威慑作用。但是，连这唯一的一点也归于无效，因为当英法报纸把西方对待苏联的态度公之于众的时候，苏联与德国的私下接触已大有进展。西方与俄国谈判人员最后一次会议在8月21日上午不欢而散，会谈遂告流产：那天晚上宣布，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已应邀前往莫斯科。

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8月23日签订德苏条约。公布的条款包括保证互不侵犯，以及无论德国还是苏联一方卷入战争时，另一方要保守中立。正像四个月前希特勒宣布废止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一样，德苏条约的有效期为十年。秘密条款证实，苏联与德国再一次成为东欧真正的主宰所能达到的程度：苏联可自由处理芬兰、爱沙尼亚、波兰东部和比萨拉比亚的领土问题；德国人保留处理立陶宛——他们在3月间已从该国获得它所归还的梅梅尔港——及纳雷夫河、桑河与维斯杜拉河等三条河以西波兰其余领土的权利。这条约公开地孤立了波兰，私下却准备第五次瓜分这个国家，虽然不一定将它完全消灭。

德苏条约是德国外交上一次重大的胜利。希特勒深知，现在他可以随意肢解波兰，而在即将到来的战役中，他只向他最近争取到的一个欧洲附庸斯洛伐克寻求支持。希特勒很可能认为，德苏

条约将向英法指明支持波兰之愚蠢；当张伯伦打发一位瑞典调停人肩负和平使命前往柏林时，他不无理由地认为，这便向另一次慕尼黑会议走出了最初的几步。希特勒对9月第一星期中一系列事件的反应，说明他当时并未预料到将会发生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
245 尽管英波互助条约在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天之后终于签字。墨索里尼又及时建议举行会议，这恰恰是在他倡议召开慕尼黑会议之后十一个月；直到9月3日，他一直在提出各种调停建议。在他看来，不存在任何理由说但泽港和波兰走廊问题不可以按1938年解决苏台德问题的方式加以解决。不过这一次张伯伦却端坐在威斯敏斯特纹丝不动。

像以往不时发生的那样，这次墨索里尼又错误地判断了西方的心态；而如果希特勒一心只想打一场局部化的战争，他也犯了大错，或者是所掌握的情报有误。未经宣战，波兰战役在9月1日、星期五清晨四点四十五分开始，但泽郊区发生若干事件，德国部队穿过边界进入波莫瑞和波兹南尼亚地区。七十分钟之后，第一批德国轰炸机出现在华沙上空。星期日，英法两国履行对波兰承担的义务，为但泽而投入战争，这使欧洲和它们自己都吃了一惊。

对波兰的入侵于星期五开始。到下一个星期二晚间，波兰的防御工事已被粉碎；战场上，德军装甲纵队滚滚向前，强大的钳形攻势威胁着波兰的主力部队。实际上，战役进行十八天即告结束，虽然某些波兰驻军仍在华沙、利沃夫和但泽附近的海尔半岛顶端孤军奋战。德国人充分发挥了其空中优势和坦克兵团的作用，德意志少数民族的破坏活动及波军过时的防御战略也帮了他们的忙。波兰军队没有以河流为屏障充分集结，而是稀疏地分散在数百英里长的边界线上，势单力薄。9月16日夜间，俄国通知业已

撤退到东加利西亚的波兰政府，红军将占领波兰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地区，以便向居民提供波兰政府已不复能给予的保护。9月17日，波兰当局越过国境，进入罗马尼亚，在那里被扣留。西部波兰于10月19日正式并入大德意志帝国，居民主要为波兰人的地区由设在克拉科夫的“综合政府”管理。纳雷夫河、布格河及桑河以东的波兰领土则被苏联兼并。

波兰的命运从三个不同的方面震动了东欧其它独立国家：一个较大的国家竟如此迅速地在军事上被击败，使它们惊恐；英法两国竟未能向波兰提供有效援助，法国依约在西线发起的进攻只不过是向萨尔一带作轻微的试探前进，使他们不安；红军汹涌西进，而且显然受到反共产国际公约炮制者的明显纵容，更几乎使他们陷入一片慌乱之中。1939至1940年的整个冬季，最紧急地危及东部边境地区全面稳定的乃是来自莫斯科的威胁。苏联把波兰东部土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和白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之后，接着便向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两个波罗的海国家强索基地。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就立陶宛问题进行了复杂的谈判；立陶宛本已划入德国势力范围，但是当德军把他们在波兰的战线推至布格河畔时，立陶宛旋即被划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苏联将维尔纳让给立陶宛，但坚持要求在立陶宛许多地方建立陆海军基地。苏联还向芬兰要求领土，遭到拒绝，于是未经宣战便于1939年11月30日入侵芬兰。芬兰坚持抵抗整整十五个星期以后才交出斯大林所要求的那些基地。这一长时间的抵抗不仅赢得英国和法国的钦佩，而且也赢得与德国联系较为密切的国家如意大利和匈牙利的赞扬。苏联与芬兰的“冬季战争”还导致国际联盟采取了五年来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决定性行动：1939年12月，它庄严地开除苏联的国联成员国资格。

国联开除苏联一举并未使芬兰感到宽解，对苏联的其它西部

邻邦也安慰不大。东南欧的每一个国家都极力使自己显得为德国所不可或缺，指望希特勒的反对会阻止苏联以入侵相威胁。南斯拉夫人准备向德国出售他们出产的全部铜，和几乎全部的铅与锌，换取一百架梅塞施米特式飞机（德国可一直未给）以及当时已在德国管理下的斯科达军工厂生产的三百七十门大炮。罗马尼亚人可以奉献的东西更多：普罗耶什蒂的石油及瓦拉几亚平原的玉米和小麦。希特勒确实决意使战争不至波及罗马尼亚，因为他不愿让这片油田被炸毁、麦田被坦克履带压平。1939年12月和1940年1月签订的一系列协定中，罗马尼亚向德国作出了截至当时为止最广泛的经济让步；虽然德国不让罗马尼亚产生希望德国会保护比萨拉比亚以抵制苏联的要求，里宾特洛甫却的确抑制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要求修正边界的情绪。博里斯由于对德国无可奉献，便在政治上采取审慎的态度：他拒绝了土耳其人想拉保加利亚加入巴尔干协约国的企图，拒绝苏联建立反罗马尼亚联盟的试探并于1940年2月指派亲德分子波格丹·菲洛夫接替忠心耿耿、俯首帖耳的基奥谢瓦诺夫任总理。

1940年初夏，当大规模战斗正在比利时和法国境内进行之际，苏联的威胁更加严重。德国坦克一进抵英吉利海峡，苏联报纸立即报道立陶宛出现了“反苏活动”；德国装甲纵队进入巴黎时，斯大林便把他的边界推至涅曼河畔。1940年6月中旬，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都被迫接受共产主义阵线政府；8月，被接受为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6月的最后一星期，苏联人正式提出他们对罗马尼亚的要求。最初，莫洛托夫不仅要求归还比萨拉比亚，而且要求割让前哈布斯堡君主的土地布科维纳。德国事先获悉莫洛托夫的企图，对苏联扩大势力范围提出抗议，因为头一年8月间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的秘密交易中并未列入布科维纳。苏联因而把自己的要求

限于比萨拉比亚和居民主要为乌克兰人的北布科维纳。6月26日，苏联驻布加勒斯特公使递交最后通牒，限定二十四小时内答复。经常发表好战的爱国主义演说的卡罗尔国王考虑进行抵抗。德国劝他接受，意大利亦然；英国无能为力；法国自己已经垮台。卡罗尔只好让步：红军于是开到了普鲁特河与多瑙河旁。

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眼看罗马尼亚把领土拱手送给苏联而拒不接受它们修正边界的要求，当然感到无法容忍。匈牙利的举止得体，未向布加勒斯特发出最后通牒。泰莱基和恰基只是向希特勒和意大利外交部提出匈牙利的要求，指出如果德国和意大利无法用和平手段满足匈牙利对特兰西瓦尼亚的要求，匈牙利便只得自己动手，凭武力解决。希特勒看到，卡罗尔国王坚决反对在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上让步，却准备在南多布罗加问题上满足保加利亚。由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极力坚持，罗马尼亚与匈牙利于8月在塞维林堡就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举行会谈。三天后，会谈在某种程度的混乱中中断。一星期后再作尝试，仍未成功；匈牙利就开始征召预备役军人。由于俄国在摩尔达维亚边界地区采取威胁态度，尤其使希特勒十分愤怒。他无意让俄国人到达油田，立即调十个德国师匆匆东进。同时，里宾特洛甫和齐亚诺召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派人到维也纳会谈。两国代表团分别从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来到维也纳时，发现轴心国的两位外交部长已决定不进行什么谈判，而是要强迫他们接受一项仲裁。1940年8月30日的“第二号维也纳裁决书”规定将特兰西瓦尼亚五分之二以上的土地归还匈牙利；随后进行的一次普查表明，该地区二百五十余万人口中，百分之五十二被认为是马扎尔人。这条分界线自西北而东南，使匈牙利得到诸如科洛兹瓦尔（克鲁日）和纳吉瓦拉德（奥拉迪亚）这样一些重要城市，但是不包括科洛兹瓦尔以东罗马尼亚的突出地区，那儿一家德国工业康采恩——赫尔曼·戈林工厂——根据已与罗

马尼亚政府谈判商定的贸易协定优惠待遇，控制着当地的沼气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都被要求必须签订保护其国内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条约；与匈牙利签订的议定书真可谓是一绝妙文件，因为它允许德意志少数民族参加德国军队而不必在匈牙利军中服役。

与保加利亚的协定则于几天之后在克拉约瓦签字。根据协定，将居民绝大多数为保加利亚人的南多布罗加退还给索非亚政府，使1913年不公正的解决终于得以纠正。在十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卡罗尔国王已给他的人民丢掉了比萨拉比亚、北布科维纳、差不多半个特兰西瓦尼亚和南多布罗加。卡罗尔国王在铁卫军中的宿敌又极力煽动，罗马尼亚国内因此反应十分强烈。9月6日，卡罗尔国王让位于他的儿子米哈伊尔（1927至1930年期间，他在摄政团监护下已经当过名义上的君主）。卡罗尔遂从罗马尼亚出走，其仓皇的程度与他十年前回国时相同。在扬·安东内斯库将军的领导下建立起一个主要由铁卫军分子组成的专制独裁政权，他宣称，既然德国在“元首”、意大利在“领袖”的领导下繁荣昌盛，罗马尼亚便应该承认他为“首领”。

德国人下定决心，为了不让一场持久的危机威胁他们对罗马尼亚经济的控制，要从政治和军事上把这个国家抓在手中。安东内斯库在9月末被告知，希特勒决定用德国部队保护罗马尼亚的工业中心和油田。德国要求匈牙利允许帝国的空军和陆军由匈牙利过境，进入罗马尼亚。到10月，每天六列火车通过匈牙利将德军东运，一个庞大的德国军事代表团于10月中旬进驻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的独立性已和斯洛伐克一样，所余无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德国人的到达终于使铁卫军瓦解。安东内斯库政府执政的头三个月中，许多省份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249 在布加勒斯特也发生多起暴行。铁卫军不仅杀害犹太人，还杀害许多自由派人士和前国王卡罗尔的支持者。1941年1月21日，他

们企图推翻极力约束他们的过火行动的安东内斯库。罗马尼亚军队与铁卫军狂热分子进行了三天残酷搏斗，德国人支持安东内斯库。铁卫军全被歼灭；1月27日，首领组成新政府，其成员几乎全是军人。国家的一切政治生活整整停止了三年：由安东内斯库、军队和德国人控制着王国。

1940年秋，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缔结了一项措辞凶恶的“三国公约”，确保三国政治合作；此后数月中，里宾特洛甫的外交政策主要是使德国的附庸追随签署这个文件。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斯洛伐克都于1940年11月的第四星期在“三国公约”上签字。保加利亚国王博里斯仍按他特有的作风办事，壮着胆子尽量拖延，宣称他在同月访问希特勒时曾辩解说，他同情这些试图建立新秩序的国家，但是他不能在一个可能把邻国土耳其推入德国的敌人怀抱里的条约上签字。但是，到1941年1月中旬，希特勒对博里斯的耐心到了尽头，一部分是因为德国驻安卡拉大使的报告使他相信，土耳其不会采取任何危险的行动。2月8日，德国与保加利亚两国总参谋部代表签订一项军事协定，3月1日，保加利亚也签署了三国公约。第二天，德国第十二军应邀进入保加利亚建立防护阵地。两次大战之间中东欧六个独立国家中，只剩下南斯拉夫尚未被德国潮淹没。

对于南斯拉夫，意大利构成的威胁比德国尤为严重。随着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倒台，意南友谊也告终结，而当墨索里尼于1939年复活节吞并阿尔巴尼亚时，意大利军队就不仅在西北部而且在南部警戒着南斯拉夫一共长达三百余英里的边界线。意大利舰队威胁着漫长的达尔马提亚海岸线，而且南斯拉夫的情报人员获悉，墨索里尼仍在鼓励帕韦利奇的“乌斯塔沙”及其他一些克罗地亚分裂主义运动。在1940年的好几个月里，人们一直无法断定，意大利为了耀武扬威，究竟是将按照外交部长齐亚诺的企图进攻希

腊，还是按照墨索里尼的意愿进攻南斯拉夫。齐亚诺的意见占了上风，1940年10月28日，一支准备不足的意大利军队向希腊进犯。

250

意大利进攻希腊给南斯拉夫带来了急迫的问题。希腊是南斯拉夫的老盟友，而且二十余年来，萨洛尼卡港一直是特属王国的塞尔维亚地区的主要入海口。南斯拉夫人在萨洛尼卡享有特殊的条约权利；如果该城落入意大利人之手，墨索里尼就会更紧地卡住南斯拉夫的脖子。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包括陆军大臣米兰·奈迪奇将军在内的一些高级成员想要入侵希腊所辖的马其顿，抢在意大利人抵达萨洛尼卡之前攻占萨洛尼卡港。可是，保罗亲王不赞成这个计划；听到此事的南斯拉夫人都认为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背信弃义，其中包括当时驻柏林的公使伊沃·安德里奇（此人后来弃外交生涯而从事文学，1961年获诺贝尔奖金）。希腊人击退了意大利的初次进攻，随即将入侵者推回阿尔巴尼亚的冰天雪地之中，萨洛尼卡迫在眉睫的威胁得以解除。在希特勒看来，意大利的尴尬处境突出地表明了南斯拉夫与轴心国阵营合作的必要性；而他指望用来诱使茨维特科维奇政府合作的钓饵便是让南斯拉夫人得到萨洛尼卡。11月27日，罗马尼亚签署三国条约仅仅三天，希特勒便在贝希特斯加登接见南斯拉夫外交大臣亚历山大·钦察尔-马尔科维奇，敦促他使南斯拉夫承担建立欧洲新秩序的义务。

茨维特科维奇—马切克政府全体一致、真心诚意地奉行中立主义，保罗亲王也是如此，虽然就个人来说他是同情西方的。但是在许多阶层的南斯拉夫公众中政府不得人心：贝尔格莱德大学学生曾于1939年年底发生骚动；塞尔维亚军队的老将们的脑际萦绕着卡伊马克查兰的影子；东正教的宗主教憎恶“斯波拉宗”，并且不合情理地把轴心国视为天主教的政治武器；塞尔维亚的小商人对国际政治不感兴趣，但责怪茨维特科维奇“卖身投靠”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萨格勒布和卢布尔雅那对现状还算满意，不过

贝尔格莱德却盛传可能发生暴动，这些谣言受到各外交使团的注意，而且分别报告给伦敦、华盛顿和柏林。茨维特科维奇政府不得不小心行事。

钦察尔-马尔科维奇虽然远非一个令人鼓舞的人物，却是一位机敏的外交官，像邻国保加利亚的博里斯国王一样难以捉摸。有三个月之久，他一直使用缓兵之计。一部分是作为对安全的进一步保障，一部分为了安抚希特勒，他劝政府接受匈牙利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条约里只字未提匈牙利对南斯拉夫的修改边界的要求；但是在谈判中双方取得谅解，这些要求日后可以提出来。出于过分乐观，或是作为一种预先作出的嘲讽，钦察尔-马尔科维奇坚持条 251
约中的主要条款应该写作：“匈牙利王国与南斯拉夫王国之间将保持持久和平与永恒友谊。”条约即以这种形式在1940年12月12日正式签订。南斯拉夫人希望这协定能权充一种代用品，使他们免于签署正式的三国公约，从而使他们多少有点回旋的余地，可以和英国、美国，甚至和苏联进行谈判，几个月以来，他们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联系。但是国外却认为这条约是南斯拉夫钻进轴心国阵营的一种迹象，虽然另一方面希特勒仍然急于要南斯拉夫更确切地声明支持德国。

英国和美国都鼓励保罗亲王采取反对希特勒的坚定立场；他收到了邱吉尔、罗斯福和英王乔治六世的亲笔信。南斯拉夫对这些关注并非无动于衷，也在寻求得到予以支持的确切保证。然而，英国由于对非洲承担的义务，无法再分出力量，美国也只能答应在将来某个时候供给武器。因此，保罗亲王向美国公使阿瑟·布利斯·莱恩说的抱怨话便是很有理由的了：“你们大国可真狠。你们口口声声谈论我们的荣誉，可你们却离得那么遥远。”保加利亚既已同意采取协调一致的步骤，德国便施加更大的压力劝说南斯拉夫签署三国公约。茨维特科维奇和钦察尔-马尔科维奇于2月14

日应召去萨尔茨堡会见希特勒。两个半星期以后，保罗亲王也前往贝希特斯加登。3月5日他回到贝尔格莱德，确信南斯拉夫必将接受德国的要求，否则会面临德国的入侵；除非盟国能给予军事援助，他敢肯定南斯拉夫将在两星期内遭受德军蹂躏。

那年3月，南斯拉夫与英国之间曾有一系列接触，因为保罗亲王和茨维特科维奇都不愿他们的国家落入德国掌握之中。这些谈判中最出奇的一次涉及到前首相斯托亚迪诺维奇。由于怀疑有人阴谋使一名亲轴心国的政治领袖掌权，茨维特科维奇政府设法把斯托亚迪诺维奇押过边境，进入希腊，由英国代表加以逮捕，随后拘留在毛里求斯。其他一些接触虽然比较正常，却不那么成功。南斯拉夫一名高级参谋和英国及希腊的指挥官在雅典秘密进行军事会谈；在斯普利特，马切克本人在梅什特罗维奇的家里与一位英国发言人会谈。梅什特罗维奇是一位伟大的雕刻家，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他就已经在提倡南斯拉夫理想。可是，同盟国明确表示，在德国人切断瓦尔达尔河之前，毫无希望派遣远征军沿河而
252 上；他们能提出的唯一建议只是入侵阿尔巴尼亚，那里有意大利军械库，而且防守不严。

3月19日，德国通知南斯拉夫再给她五天时间，要么签署三国公约，要么承担一切后果。在贝尔格莱德郊外的摄政王王宫举行了极度痛苦的会议。政府无可奈何地决定在三国公约上签字。三名阁员辞职，以示抗议。由于害怕首都公众的不满情绪，茨维特科维奇和钦察尔·马尔科维奇3月24日晚从郊区某一火车站偷偷溜走前往维也纳。第二天，他们在贝尔维德雷宫举行的仪式上签署这项公约；希特勒的为人最不敏感，却也抱怨说当时的气氛像是在举行葬礼。

几星期以来，英国特务已与贝尔格莱德的持不同政见派别、特别是预备役军官俱乐部的成员取得联系。3月26日夜间，邱吉尔

政府的一位成员利奥·艾默礼在英国广播公司的对外节目中发表讲话，特别向塞尔维亚人呼吁“一定要永远保持民族精神”。几小时之后，3月27日凌晨二时二十分，贝尔格莱德卫戍部队和附近的泽蒙地区空军指挥官举行起义。黎明，电台宣布保罗亲王的摄政已告结束，政府已辞职。保罗亲王当时在萨格勒布，他回到首都，正式交出权力，之后，步斯托亚迪诺维奇的后尘流亡国外，并被英国拘留。

《纽约时报》称之为“划破沉沉夜空的闪电”的贝尔格莱德政变，是由博拉·米尔科维奇将军策划和领导的；新政府首脑却是他在空军中的高级指挥官杜尚·西莫维奇将军（1918年时曾率领塞尔维亚部队进入斯洛文尼亚，当时是上校）。贝尔格莱德的广场和街头举行了盛大庆祝活动，因为塞尔维亚人民从来就不曾理解保罗亲王的曲线政治，也不信任茨维特科维奇和他的同僚。塞尔维亚的独立精神比东面和北面的邻国更为顽强，对德国人的欺侮和威吓手段（例如，德国人以特别盛大隆重的方式放映宣传影片《西线无战事》，企图以此恫吓贝尔格莱德人）十分憎恶。然而人民群众比西莫维奇及其同僚更为坚决。新政府宣布继续承担南斯拉夫的全部国际义务；表示无意考虑改变本国与轴心国家的关系。西莫维奇私下向英国表明，他无法接受当时在雅典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的访问。英帝国总参谋长的确曾秘密飞往贝尔格莱德，但归来后却无法向邱吉尔保证南斯拉夫愿意合作。

希特勒拒不相信关于贝尔格莱德政变的最初报道。政变消息一经证实，他怒不可遏；无论西莫维奇政府如何表白对德国的友好，都无法使南斯拉夫幸免于他的盛怒：他命令“用军事手段将南斯拉夫消灭掉，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消灭掉”。德国统帅部在4月初就准备进军希腊，把意大利人从一连串难堪的军事失败中解救出来。这时便匆忙修改巴尔干战役的准备工作，米尔科维奇的部

队采取最初行动后不到十五小时，希特勒签发了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的作战总计划。意大利、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三国政府应邀前来满足他们的领土野心，不难设想，一向顺从的罗马尼亚王国也将成为德国侵略者的基地。

后来证实，匈牙利人没有像希特勒所期望的那样密切合作。霍尔蒂起初欢迎德国的建议，认为这是为匈牙利取得沿海地区的办法。这是他心中珍贵的个人抱负之一。但是，一直主张应与英国人保持联系的泰莱基向摄政王指出，军事行动将与他四个月前签订的“友好条约”相悖，力求以此阻止匈牙利参战。内阁会议同意：只有当南斯拉夫瓦解或马扎尔少数民族处于危险之中时，匈牙利军队方可进军伏伊伏丁那。然而，要阻止匈牙利总参谋部是困难的；泰莱基宁死不肯把政策颠倒过来，眼见军方领导人正在将他推入一场灾难性的战争，只得于4月3日凌晨开枪自杀。在致霍尔蒂的遗书中他写道：“由于怯懦，我们已与恶棍结成同盟。”他的死固然挽救了他的荣誉，却未能挽救南斯拉夫，最终也未能挽救匈牙利。

4月6日清晨，德国的俯冲轰炸机在淡紫色的天际出现，袭击了贝尔格莱德。没有宣战，只有斯图卡式机群飞过多瑙河彼岸的平原，一批一批地向贝尔格莱德拥来。两天之中，每隔片刻便有一阵炸弹落在市区，与此同时，德国第十二军从保加利亚西进，攻击斯科普里，装甲纵队南进，直指萨洛尼卡和希腊的腹地。4月8日，又有两个德国师和一个保加利亚师越过边界向尼什和贝尔格莱德挺进；第二天，德军主力部队第二军从南奥地利进入斯洛文尼亚，从匈牙利平原进入克罗地亚。4月11日，另一德国军团从特梅斯瓦尔穿过巴纳特。在这同一天，意大利和匈牙利决定他们也可以前进了。经过为时不到一星期的一次战役，入侵的各个纵队在贝尔格莱德会师；4月13日，德国人正式接管这座城市。有组织的

抵抗实际上已告结束。四天以后,在波斯尼亚逃难的钦察尔-马尔科维奇不幸被德国人发现,用飞机送回贝尔格莱德,让他跟着一个被俘的将军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在德国人眼里,他是南斯拉夫最后一届合法政府的代表;从他在维也纳当着元首的面在另一宗文件上签字以来,为时不过三个半星期。

这是一次奇怪的战役:德军战死疆场的不足一百七十人,却有二十五万南斯拉夫士兵进了战俘营。据统计,南斯拉夫拥有二十八个步兵师和三个骑兵师,但当德国进攻时,这些部队却分散在一千余英里长的陆地边界线上。只有五个步兵师和两个骑兵师参加了战斗。南斯拉夫的失败既是军事上的失败,也是政治上的失败。王国分崩离析了。说德语的少数民族手执越过边界偷运进来的武器,抢占了南斯拉夫后方的军事要冲;他们攻下了马里博尔的中心和德拉瓦河上的桥梁。三个克罗地亚团一枪未放就开了小差,有些部队公开倒戈攻击塞尔维亚人。“乌斯塔沙”尾随侵略者而至,并于4月10日在德国控制下的萨格勒布宣布克罗地亚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六天之后,“乌斯塔沙”的“领袖”(Poglavnik)安特·帕韦利奇自封为“第一届克罗地亚民族政府”总理。拒不与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一起逃亡的马切克虽然本人退出了政治生涯,也号召克罗地亚人接受新体制。年青的国王彼得二世在这些灾难性的战争日子里,大大显示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勇敢精神之后,把一个流亡政府留在开罗进行激烈的争吵,自己则于当年秋天进入剑桥大学攻读国际法。

到4月底,希特勒下令瓜分南斯拉夫领土。斯洛文尼亚北部被德国兼并,南部的三分之一并入意大利。墨索里尼还得到了门的内哥罗、科索沃地区和斯普利特以南的达尔马提亚海岸。“乌斯塔沙”克罗地亚则成为意大利的斯波累托公爵统治下的王国(但这位爵爷一直未曾有暇前来巡视自己的疆土);王国包括波斯尼亚、黑

塞哥维那和若干沿海小地段。匈牙利原来指望得到自治的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海滨的一个狭长地带，认为这是希特勒已经应允给它的，后来所得到的只不过是克罗地亚西北部的一小块地方和半个伏伊伏丁那。关于巴纳特的归属问题，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互相争执不下，结果仍留在德国手中。保加利亚占领了南斯拉夫马其顿的大部，但德国不允许博里斯将它立即兼并。塞尔维亚残余部分归德国军队严加控制，虽然8月间在贝尔格莱德成立了一个影子“政府”，由前陆军大臣奈迪奇将军担任名义上的政府首脑，而以塞尔维亚纳粹分子廖蒂奇为同德国人合作的主要人物。“作为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确已经被消灭掉了。

255 到4月23日，希腊也沦于轴心国占领之下，从雅典的卫城到梅梅尔港，卐字旗飘扬在整个东欧。自从希特勒的军队于1940年10月进入罗马尼亚以来，德军便沿着一条九百余英里的德苏共同边界设防；德苏条约所形成的不寻常的和睦气氛，在冬季的几个里愈来愈稀薄。由于苏联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最初的龃龉早在9月便已发生，但在嗣后几星期中情况又略有改善。尽管德国人当时正在加强他们在苏联的另一邻国——芬兰的阵地，11月间里宾特洛甫还是在柏林带着几分亲热劲儿接待了莫洛托夫。

希特勒认为，德苏最终难免一战；他希望战争按照他自己选择的时间而不是斯大林选择的时间来进行。莫洛托夫从柏林返回莫斯科后，德国立即开始制订在东方发动进攻的第一步计划。12月18日希特勒签署了著名的“第二十一号指令”，“以速决战粉碎苏联”。“巴巴罗萨行动”（对苏战争的代号）的秘密准备工作在此后三个月里稳步推进。到1941年2月底，仅罗马尼亚一地的德陆军士兵和空军人员就多达六十八万。当德国军队在3月的第一星期也开进保加利亚时，莫洛托夫对希特勒扩大德国对黑海沿岸控制的

作法提出抗议。可是，俄国人并不认为战争会如此迅速地降临到他们头上。

德苏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该地区的所有其他国家产生影响。为了对抗德国政治上的主动权，俄国人在1941年年初几个月里力图加强他们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联系。对匈牙利人方面表示，只是将沙皇尼古拉一世1849年在维拉戈斯缴获的五十余面旗帜正式归还霍尔蒂在罗塞尼亚的边防军，此外别无进展。但与南斯拉夫的接触则较为郑重。苏联大事声张地讨好茨维特科维奇和西莫维奇两届政府。希特勒动手摧毁贝尔格莱德之前不足五小时，苏南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签字。希特勒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甚至曾以苏联恐将干涉南斯拉夫事务作为发动巴尔干战争的借口。他可能真心害怕苏南缔结军事条约，这样的条约无疑是西莫维奇梦寐以求的目标，不过斯大林却十分小心谨慎，远不致于为作出这种姿态而承担责任。

事实上，苏联无论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不足以改变希特勒侵略的决定。南斯拉夫迅速溃败之后，斯大林虽对德国作出一连串友好姿态，为时已晚，于事无补。由于贝尔格莱德发生政变，德国推迟了原定五月中旬进行的“巴巴罗萨行动”。4月30日的一次军事会议决定，6月22日开始入侵苏联。希特勒私下说，他预期到8月15日莫斯科将落入德国手中，10月以前苏联便会乞和。在这场危机中，德国的卫星国都被安排了适当角色。5月23日通知安东内斯库，德国正在准备“为保卫罗马尼亚而反击苏联可能发动的进攻”；6月12日他奉召去慕尼黑，得知希特勒的计划。罗马尼亚人开始部分动员，决心利用这次新战役的机会收复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其他各个棋子很快也都各就各位。斯洛伐克则只进入待命状态，因为可以指望蒂索随时派出他有限的部队，以间隔适当的距离尾随德国坦克之后。对保加利亚，除了要它将部队沿土耳

251

其边界集结，以防安卡拉政府利用德国全神贯注地对付红军的机会进军巴尔干诸国，并未谋求它合作。

如同往常一样，匈牙利又成了问题。希特勒无意让它参战，一方面是因为匈牙利军队素质低劣——那年4月一支装甲纵队进军伏伊伏丁那，前进仅三十英里之后便没有了汽油；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不信任匈牙利的治安防卫计划。一部分德国将军和匈牙利总参谋部的大多数人却急切希望匈牙利参战。接替泰莱基任首相的巴尔多希·拉斯洛想要两面讨好、左右逢源，最好不必实际投入战斗。作为对军方妥协，内阁会议同意如果希特勒要匈牙利进军，匈牙利将接受他的要求。可是希特勒的全部要求不过是要匈牙利保卫喀尔巴阡防线，防止苏联对德国侧翼进行反击。

6月22日，德国入侵苏联。希特勒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坚持说他以先发制人的办法，防止了红军对并无猜疑之心的德国发动背信弃义的进攻，但迄今尚无证据表明斯大林心中曾有任何如此明确的想法。意大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相应地对苏宣战，芬兰于6月24日正式与德国结盟。匈牙利人在6月26日以前一直举棋不定；这一天，据称是苏联的飞机轰炸了科希策城和附近的铁路线。巴尔多希利用这一事件作为借口，宣布匈牙利认为它已与苏联处于交战状态。直到今天也没有人知道轰炸科希策的飞机的国籍：看上去飞机像是德国设计的，似乎有轴心国的标志；它们很可能是斯洛伐克的而不是苏联的飞机。这个问题就其性质来说，大有学术气味；因为既然这不仅是一场讨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十字军东征，而且蒂索与安东内斯库又恰恰站在正义的一方，匈牙利自然不可能长期置身事外。在苍莽无垠的草原上，德国潮已泛滥成灾；东欧诸小国不过是残骸碎片随波飘流而已。

第十二章 贰心

258

“巴巴罗萨”行动在战争史上史无前例。那年夏季，沿着一条长达一千一百英里的陆地战线，九百万人投入了战斗。在北面，芬兰人这次确信能获得外援，于6月24日向苏联宣战，将1939至1940年的战役“重新进行下去”。在这条战线的主要地段，从芬兰湾直至黑海，敌对双方所动员的兵力人数旗鼓相当，各为一百六十个师。德国的北路兵团由冯·勒布统率，以列宁格勒为主攻目标。中路兵团则在冯·博克统率下，沿着拿破仑1812年进军的路线直捣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在这次战役的头两个半星期，俘敌三十万。南路兵团，包括一支人数众多的罗马尼亚部队、一个意大利军团和一支斯洛伐克远征军，则由冯·伦德施泰特统率，向基辅和顿河流域进发。红军猝然遭到打击，初时踉跄后退，然后也组成三支主力部队：由伏罗希洛夫对付勒布，铁木辛哥对付博克，布琼尼则对付伦德施泰特。入秋已见分晓：尽管俄国方面的伤亡比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较惨重，他们的顽强和无情却使德国装甲纵队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

如同1812年，俄军指挥员决定利用祖国的辽阔疆域把入侵者诱入覆灭的罗网。他们的战略是越过平原后撤，退却时采取“焦土政策”，却把兵力结集起来扼守较大城镇或铁路枢纽，延缓敌军的推进，并不惜一切代价予以重大杀伤。然而，为了维护威望，他们也准备集中重兵固守一些主要城市，以待严寒冰雪来临时，得以脱离困境。希特勒却和在他以前的拿破仑一样上了这一策略的当。10月3日，这位元首在柏林宣称：“敌军显然已被打垮，从此将一蹶不

振。”而在拿破仑发动的战役中，恰恰在同一时刻，这位皇帝也曾告诉他的随从人员说，俄国人行将在二星期内求和。12月8日，也就是那支不可一世的法国大军缓缓退入维尔纳的纪念日，希特勒宣布1941年战役正式结束。表面上，他获得的成功远远超过拿破仑，因为他的军队已越过苏联边界东进六百余英里，基辅、斯摩棱斯克、加里宁和奥廖尔都已落入德军之手。但红旗仍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和塞瓦斯托波尔上空飘扬，战火截至此时尚未达到伏尔加河，而入侵者已从顿河下游被击退。那年冬季苦寒，甚于人们记忆中的任何一年，而俄国人丝毫不让敌军获得喘息时间，较之他们祖先在1812年的打法毫不逊色。德国人的“闪电战”未能使敌人屈膝投降，这还是第一次；意味深长的是希特勒居然在11月向外国来访者煞费苦心地说，闪电战这种概念是英籍犹太人宣传家们杜撰出来诋毁德国赫赫战果的。及至圣诞节，罗马和东京都谣传德国向苏联试探求和。对德国军队是否万无一失的怀疑开始在希特勒的东方盟友中间蔓延开来，因而也就不足为奇了。三国公约所规定的协调一致，勉强度过侵入苏联以后的第一冬；它注定次年春季之前便要在伏尔加河这道巨大弧形战线上碰得粉碎，而且无法修补。

起先，“巴巴罗萨”行动激动人心的画面一度奏效，掩盖了希特勒的三个主要东方伙伴——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各自对这场战争所抱的不同态度。三者之中，保加利亚给予德国的援助最少，麻烦也最少，只在划定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边界问题上同她的盟友意大利有点摩擦。与此相反，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的敌对状态却经常使德军统帅部不得安宁，甚至有时还孕育着在一场战争中爆发另一场战争的危险。

博里斯国王确认，参加一场进攻苏联的战役对他的国家有百

弊而无一利。他准备祝贺希特勒战胜布尔什维克，将保加利亚军事基地提供德国陆海军使用，但他经常巧妙地解释说，保加利亚人民具有泛斯拉夫主义传统，公然与苏联武装冲突是不可取的。苏联外交官继续留在索非亚，而且享有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尽管在保加利亚也驻扎着德国部队。博里斯的首相、考古学家波格丹·菲洛夫在9月25日向德国公使担保，如果与苏联终止一切接触，保加利亚将感到高兴，但“它可不愿主动同苏联断绝关系而给他们这种便宜。”这种暧昧论点暂时似乎还合乎德国人的心意；保加利亚保持非交战状态，可使其军队完整无损，便于在巴尔干执行占领任务，又能在一旦苏联当局求和时为希特勒提供与苏联直接联系的可能渠道。至于博里斯，则毫不踌躇地于1941年12月先后向英美宣战，以此显示他对三国公约的忠诚，这一行动并未使他的同胞直接感到有什么不便。 200

当匈牙利开始对苏联作战时，布达佩斯曾设想这一战役几星期之内便能结束。由二万四千人组成的一个机动军团参加了向第聂伯河的首次进军。这军团作战英勇，伤亡比较轻微，但使霍尔蒂和总参谋部大为惊愕的是，作战开始不到两个月便断送了它的大部分装备。这位摄政王一心要把部队在冬季之前撤回匈牙利，他的首相巴尔多希支持这一想法。9月6日，霍尔蒂解除其亲德总参谋长的职务，任命桑博特黑伊·费伦茨将军接替；后者是个直性子人，敢于讲话，他看不出匈牙利在一望无边的俄罗斯平原上丧失其最精锐部队有何价值。他一上任就与霍尔蒂、巴尔多希一起到东普鲁士战地司令部与希特勒会谈。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当时写道，桑博特黑伊“自私地认为，要紧的是考虑到匈牙利在巴尔干的义务，一定得保存她的实力。”霍尔蒂亲自要求把这个机动军团撤回国内，表面上双方一致同意，这支部队应在目前的战役结束后撤出，尽管德国以为匈牙利会另派部队前来替换。双方的参谋人员接

着进行了长时间谈判，实际结果是匈牙利部队统统从苏联战线消失，虽然还留下一支象征性的部队在乌克兰执行占领任务。希特勒在司令部第二次接见巴尔多希(12月28日)时，有所针对地向他大谈芬兰人的辉煌战果。匈牙利失宠了。

罗马尼亚狂热地投入了初期的各次战斗。安东内斯库把三十个师派往前线，急不可待地要收复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到7月底，这两个省便都落到罗马尼亚人手中。8月5日，罗马尼亚人切断了敖德萨这个大海港的对外联系，虽然直到10月16日才在德国军队的支援下战胜了城中俄国人的顽强抵抗。这位“首领”本人则沉浸在罗马尼亚军队冒功得来的荣耀之中：8月6日，希特勒亲自授予他骑士十字勋章，并额外授予一级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各一枚；8月21日，米哈伊国王把他晋升为元帅；后来他在10月
261 兼并乌克兰西南部时，得意洋洋地发布命令：敖德萨从此更名为“安东内斯库”以资纪念。

然而，在罗马尼亚业已出现不满的迹象。支持这场战争的最初不仅有安东内斯库及其追随者，还有自由党和农民党的老领袖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和尤利乌·曼纽。人们以为，如果罗马尼亚证明自己是比匈牙利更可靠的盟国，希特勒就会修改第二次维也纳裁决书而把特兰西瓦尼亚北部归还给它。罗马尼亚人民并不掩饰他们的情绪。11月8日，布加勒斯特举行祝捷游行，陆军元帅凯特尔代表德军最高统帅部参加。当罗马尼亚军队行经凯旋门时，一部分群众开始反复高呼：“还我特兰西瓦尼亚！”塞瓦斯托波尔是德国战略中的下一个目标，但对罗马尼亚人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克鲁日才是他们追求的战利品。

1941年最后几星期，匈牙利与罗马尼亚由于特兰西瓦尼亚和巴纳特问题而关系日益紧张。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极力使双方冷静下来，至少是防止了一场公开冲突，虽然安东内斯库坚持决不应该

让匈罗两国军队在苏联战役中并肩作战，“以免滋生事端”。及至1942年初，布加勒斯特的有影响集团已和他们的对手匈牙利一样，都急于想从苏联抽身。1月，曼纽和布勒蒂亚努联名上书“首领”，诉苦说“国家长期不断流血”，力促他“从苏联撤回军队。”他们意味深长地问安东内斯库，希特勒曾否向他保证，“特兰西瓦尼亚失地”将于和平解决时归还罗马尼亚。

为使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重视罗马尼亚的要求。安东内斯库1942年2月和3月两次亲自到德国进行访问。他此时仍是那位德国元首宠幸的依附者，曾以其“狂热的民族主义”和善于兜捕犹太人而倍受赞扬，直到由于反犹太主义而对德国控制下的罗马尼亚经济造成损害的地步，才使德国人有必要让他略略收敛他的狂热。然而，无论是什么也不能使德国人重提特兰西瓦尼亚问题，连授予德国外长以高级的罗马尼亚骑士勋章也无济于事。鉴于罗马尼亚反匈浪潮日益高涨和频繁，最高统帅部曾认真地考虑过把特兰西瓦尼亚置于德国保护之下。1942年4月，匈罗边界部分封闭，讨伐布尔什维主义运动中两个名义上的盟国之间发生这种情况，委实出奇。罗马尼亚诱使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一起对匈牙利施加压力，形势一时颇似当年的小协约国，但未能奏效。在伯尔尼和里斯本，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外交官员骤然掀起一阵密谋活动的热潮，暗中竞相向德国情报机构告发另一方与西方盟国勾搭——这些指控并非纯属捏造。如果说德国认为这些伙伴令人恼怒，倒也不足为怪。

然而，尽管他们令人厌烦，希特勒亟需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同他合作。他需要它们的谷物和石油（匈牙利当时也在开发油田，罗马尼亚的石油产量则为匈牙利的四倍）。而首要的是由于俄罗斯的冬季严寒使德军伤亡累累，希特勒需要为1942年的夏季战役聚集兵力。他要这两个国家都作出巨大贡献，尽管这场战争在两国城乡日益不得人心。6月，罗马尼亚军队在克里米亚伤亡惨重；7月，

匈牙利军队在顿河沿岸遇到拼死抵抗。更糟糕的还在后头。十五个罗马尼亚师参加了向伏尔加河的进犯，它们与德军第六军一道，于1943年1月在斯大林格勒城下吃尽苦头而终被击溃。同月，沃罗涅日一役匈牙利军队在比例上甚至遭遇更大的灾难，全国训练有素的上兵伤亡过半，坦克和现代化装备损失殆尽。

在斯大林格勒和沃罗涅日的损失如此惨重，致使两国无法再积极参加苏联境内的这场战争。与此同时，他们也停止了彼此之间的争吵。霍尔蒂的首相卡洛伊·米克洛什（他于1942年3月接替巴尔多希）认为德国行将战败，便开始与英美建立联系，希望能使匈牙利最终免受苏联的入侵。安东内斯库和罗马尼亚的其他集团也在同样努力与西方接触，以求保住他们从苏联获得的领土。到1943年夏季，希特勒帝国在东方的主要支柱开始崩溃。但当时还无法看出它们竟然拖了很久才终于垮台。

轴心国较小的卫星国在苏联战役中一直还没有什么惨重损失，但到1943年的头几个月，它们对新秩序的幻想也日益破灭。这些卫星国中最早被扶植起来的“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实际上从未甘心接受极权主义统治；因为这个保护国名义上虽然自治，并且直至战争结束始终保有一个徒具空名的政府，然而捷克的一切资源却遭到德国所派代表K. H. 弗朗克（以前是苏台德德意志人的煽动者）和恶名昭著的党卫队头子莱因哈德·海德里希肆无忌惮的掠夺。与苏联进行战争更使捷克各族人民的疏远之感达于极点。德国人甚至发现有必要处决他们扶植的傀儡政府首脑埃利亚斯将军，因为风闻他与在伦敦的流亡者频频接触。1942年初夏海德里希被暗杀，接踵而来的恐怖统治之甚，超过了纳粹当局以往所曾采取的一切镇压措施：七星期之内近一千三百名捷克人被处死，整整两个村庄（利迪策和列日阿基）的村民被斩尽杀绝。

在这场战争的后两年，希特勒已不打算掩饰他消灭整个捷克民族的决心；尽管在形式上存在着“保护国”，捷克人的遭遇却同波兰人一样坏，而希特勒对后者从未建立过波兰人政府来代行其统治。

对照之下，毗邻的斯洛伐克保护国情况就异常良好。战争头几年中，镇压性法令执行不严。城镇以外食物充足，而城内也不难从黑市购得。出于战略上的考虑，德军改善了交通状况；长期忽视的工业也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虽然斯洛伐克的贸易有四分之三是与德国进行的。但在1942年间，德国人开始向蒂索及其部长们要求征调更多的斯洛伐克劳动力；到1943年春，德国境内就有二十五万斯洛伐克人被当作下等牲畜参加工业劳动。大约同样数目的斯洛伐克人在苏联战线各军服役，然而由于缺乏军事训练和有泛斯拉夫主义情绪的嫌疑，他们最初总被分派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担当警卫任务。斯洛伐克人民不满德国的掠夺，痛恨蒂索政府竟对美国（战前无数斯洛伐克家庭心目中的人间天堂）宣战，以及精明地认识到德军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必将证实是希特勒体制的致命伤——所有这些因素都导致他们深信蒂索的保护国的命运绝不会长久。斯洛伐克爱国志士虽然对旧共和国的捷克当权者毫无好感，却于1943年夏，开始试探与美国、甚至与流亡国外的贝奈斯进行接触。与此同时，很久以来一直作为蒂索及其拥护者的精神源泉的斯洛伐克教会统治集团，开始坚定地反对迫害犹太人。直到此时为止，斯洛伐克尚无强大的抵抗运动，但在欣欣向荣的1940至1941年里深孚众望的蒂索却已日益不得人心。

如果说德国人眼中的斯洛伐克是新秩序的“模范保护国”，那么，克罗地亚独立国便是个政治屠宰场，希特勒的大多数文武官员都对它极为蔑视。这个“乌斯塔沙”国家是由其“领袖”安特·帕韦利奇按照法西斯模式塑造的，但是缺乏墨索里尼那种把外国观察

家哄骗了多年所独创的外表上的效率。早在1941年7月9日，统率驻克罗地亚德军的老奥地利纳粹分子格拉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就曾为“乌斯塔沙”分子对塞尔维亚少数民族犯下的暴行向帕韦利奇提出抗议，以后又曾对这些“令人无法容忍的事件”提出另一些抗议；然而，正如格拉斯向柏林的报告所说，“克罗地亚是属于意大利势力范围的独立国”，因此德国军事当局感到无法干预。不管德国如何抗议，屠杀塞尔维亚人和犹太人以及强迫东正教徒改信天主教的事件不断发生。“乌斯塔沙”统治下的唯一受惠者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穆斯林，帕韦利奇把他们看成是反对犹太人和东正教徒的可靠同盟军。作为回报，在萨格勒布兴建了一座清真寺，但天知道它是供谁用作膜拜场所的，因为离它最近的穆斯林居民区也远在七十多英里以外。

由于“乌斯塔沙”分子的极端残暴和颀预腐败，帕韦利奇向来就不得人心，不像蒂索还曾在斯洛伐克一度受到拥戴。1942年晚夏，“领袖”帕韦利奇颁布一纸法令，专横地征用那年的收获物，农民们因此更加愤怒。虽然官僚腐化在克罗地亚并不新鲜，帕韦利奇的官员贪赃枉法，却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甚至连帕韦利奇自己的国防部长斯拉夫科·克瓦泰尔尼克将军（他家接连好几代在哈布斯堡军队中服役）也向德国人抱怨上司的无能；曾企图在10月间把帕韦利奇撵下台，由他取而代之，意大利人却表示反对，他们对德国人在萨格勒布的影响强烈不满。克瓦泰尔尼克被迫引退到斯洛伐克，帕韦利奇改组了政府。但是换汤不换药。到1943年春，克罗地亚大部分为抵抗运动组织所控制，“领袖”的权势仅能达到萨格勒布的远郊。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随着战争的长此拖延，帕韦利奇倒成了德国人的至宝；这是因为他的绝大部分政界同僚都谋求与西方同盟国接触，装出一副反对布尔什维克群魔的基督教卫士的架势。这种表演无人相信，起先支持帕韦利奇的罗马

天主教会,此时的态度也已变得不冷不热,还挑剔他的种种做法,然而为时已晚。

南斯拉夫的其他地区从未达到过克罗地亚那种程度的名义上的独立。希特勒不肯承认有什么斯洛文尼亚民族,也未曾试图在卢布尔雅那建立傀儡政权,虽然德国曾在1943年允许鲁普尼克将军——南斯拉夫军队中身居高位的极少数斯洛文尼亚人之一——组建地方民兵对付游击队员。塞尔维亚的德军当局未同柏林的外交部商量,便聚集当地的残渣余孽组成一个政府;1941年9月初,当里宾特洛甫终于承认有必要专门建立一个塞尔维亚行政机构以恢复秩序时,他对他的驻贝尔格莱德的代表听任陆军如此任意行事严加斥责。接着,奈迪奇的“救国政府”获准招募一支小小的辅助部队;但柏林方面继续对恢复塞尔维亚的政治生活心怀疑虑,惟恐奈迪奇政府会像里宾特洛甫所说的那样,“从心态到行动都转而反对德国。”这种疑虑确有道理,因为奈迪奇内心里仍然是个狭隘的塞尔维亚爱国者;然而,正如他这一代的许多人,他宁愿与宿敌同流合污,也不想看到他在其中生活的社会屈服于共产主义。 265

苏联一参战,便使反德联盟的各个成员面临重大的政策问题。英国的立场十分明确:德军炮火在东线开始轰击十八小时后,邱吉尔就斩钉截铁地宣布:“任何与纳粹主义战斗的国家都将得到我们的援助。……我们要尽一切可能帮助俄国。”然而,东欧那些较小国家的发言人却难以用如此简单明了的方式看待形势。旧日的争吵、猜疑和失望,都使各流亡政府不信任它们这位新发现的苏联盟友。这些流亡政府都在力求把国外的人力资源组织起来,包括出国避难或在祖国遭到进攻时早已侨居海外的国民;它们也都要求那些沦于敌军占领下的同胞效忠自己。从1941年仲夏开始,流亡者发现,尽管国内起火的范围日益扩大,由于一种深为老一代许

多政治领袖们所厌恶的社会革命的影响，起义的性质却改变了。此外，各流亡政府的权威，也日见其甚地受到爱国起义者或曾在苏联避难的共产党人建立的新委员会的挑战。这些事态的发展影响了英美这两个大盟国此后的东欧政策。

最难于处理的问题涉及波兰的未来。1941年间波兰人与俄国人嫌隙之深，与整个19世纪期间不差分毫。波兰流亡者认为，苏联与德国同样都是掠夺他们祖国的强盗。将近两年，波兰人一直在酝酿建立一个新共和国，并为此付出巨大努力，但斯大林政府在其他盟国心目中的地位的突然改变，似乎给准备就绪的许多事情都带来了威胁。1939至1940年的种种事件，给其后的战争年代笼罩上了一层沉重的阴影。

1939年9月底波兰政府逃亡罗马尼亚时，成员均按布加勒斯特当局的命令遭到拘留。莫希齐茨基总统于是以无法履行职责为理由而引退，将总统权力移交此时已逃往巴黎的参议院议长拉奇凯维奇。尽管拉奇凯维奇总统曾是毕苏茨基的拥护者，他却利用这一机会进行了一次实际上的政治革命；他把去世的那位元帅在波兰军官团中最大的对头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请出来主持流亡政府。西科尔斯基在昂热^①建立了一个“民族委员会”，由除共产党以外的战前各反对党的代表组成。他的政府得到了英、法、美三国的承认。1940年法国军队被打垮，西科尔斯基把政府和民族委员会都迁往伦敦。有意义的是，当拉奇凯维奇总统1940年6月21日抵达维多利亚车站时，英王乔治六世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仪来欢迎他。

1940年和1941年这两年，波兰流亡者的威望继续增高。波兰士兵在挪威、法国和希腊作战；波兰战舰与英国皇家海军一起在

① 昂热(Angers)是法国西部一城市。——译者

大西洋和地中海游弋；而波兰飞行员在英国战役中战功尤为显赫。成果还不仅限于此。西科尔斯基的政府还组织了一支“国家军”，预定从事破坏活动和为盟军海外情报机构搜集情报；同时又成立了一个地下民政委员会，同占领政权针锋相对。到1941年6月，国家军为数已达七万人左右，而且人数还在增加。这一令人生畏的力量及其对伦敦流亡者的特别忠诚，被西科尔斯基视为希特勒入侵后的若干月内与苏联打交道的“一张王牌”。

希特勒侵入苏联七星期后，波兰与苏联之间表面上达成和解。1941年7月30日，西科尔斯基与苏联大使迈斯基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协议，正式取消1939年的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瓜分议定书，恢复苏波外交关系，并规定在苏联国土上建立一支波兰军队。接着波兰战俘都从苏联集中营释放出来，组成专门的波兰人部队编入红军，但由瓦拉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统率，他是一个曾在毕苏茨基年代显示过卓越才能的前沙皇上校。1941年12月西科尔斯基访问斯大林，双方曾短暂地表现过不甚热情的亲切；但是，大多数被释放的波兰战俘对俄国人象对德国人一样痛恨，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波兰人相信苏军还能把侵略者抵挡住几个月。

波兰人与俄国人之间这种有限的谅解无法持久。1942年的一系列事件导致双方关系迅速恶化：俄国人逮捕并继而枪杀了两个试图在安德斯的军队中建立单独犹太部队的波兰社会主义者；267波兰人抱怨苏联军事当局克扣军粮，俄国人则反过来指责波兰人不愿同德国人作战。这种争吵拖延了好几个月，直到那年春末夏初，在斯大林的勉强同意下，安德斯才获准将其军队转移到波斯，最终又开往北非。俄国人业已看清，不可能使安德斯这样难以对付的人物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他的离去也使俄国人对留下未走的那些波兰居民加紧了控制，他们都是原先被强迫运送到苏联来的。安德斯手下的一个军官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留在苏联，

他于1943年5月负责组建“科希秋什科师”，由苏联指派的指挥官统率，与红军一道在东线作战。

1942年到1943年头几个月里，反德武装斗争在旧日的波兰领土上大为发展。农村特点之不同，使游击战无法像在巴尔干那样大规模展开，但在南部森林地区，国家军与党卫队之间进行了一系列小规模战斗。然而，国家军对于苏联空投到波兰来作为“人民近卫军”先遣人员的游击队领导人，却报之以猜疑的目光。国家军和游击队又都没有给予一个专由犹太人组成的战斗组织以有效的支援，这个组织是为了反抗纳粹分子推行凶残的灭犹政策而在1942年10月建立的。1943年4月，十万幸存的犹太人宁死不屈，对德国人进行了武装抵抗，激烈的战斗在华沙犹太人区持续了一个多星期。国家军发动了好几次牵制性袭击来转移德国人的注意力，并向犹太人供应武器，但是，华沙极大部分的犹太居民就像他们过去孤立地活着一样，孤立地死去。这次犹太人区的起义，是犹太人民历史上光荣的篇章，但流亡政府和苏联当局对他们的牺牲竟然都无动于衷，这真是波兰悲剧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华沙犹太人区的起义，以及五个月后被禁锢在维尔纳和比亚韦斯托克两地犹太人区的犹太人的较小规模的起义，都表现出莫大的勇气，这对于在若干年内缓和波兰人民旧有的反犹太情绪可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华沙犹太人区的毁灭恰值西科尔斯基政府与俄国人关系恶化臻于极点之时。1943年4月13日，德国人宣布他们发现一连串波兰军官万人冢，说这些人是在1940年遭俄国人屠杀而埋葬在斯摩棱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里的。由于俄国人曾拒绝说明1939年俘获的一万名波兰军人失踪的原委，西科尔斯基政府便请求国际红十字会调查卡廷的发现。斯大林坚持说这一行动等于和德国人
268 狼狈为奸；4月25日，俄国人与波兰流亡政府断绝外交关系。

与西科尔斯基正式决裂后不到两星期，俄国人宣布成立一个

“波兰爱国者联盟”，它连同贝林格的“科希秋什科师”为日后成立的共产党的解放委员会奠定了基础，而这个机构则向伦敦的波兰流亡者的权威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流亡政府遭受到一次巨大的意外打击：1943年7月4日，西科尔斯基将军在直布罗陀的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拉奇凯维奇总统任命农民党领袖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继任总理，并任命一度是毕苏茨基密友的索森科夫斯基将军接替西科尔斯基的陆军总司令职务。米科拉伊奇克作为一个温和的民主派领导人而在西方受到尊敬，但他有两大弱点：一是缺乏外交谈判经验；二是未在军人中当然也未在同盟国政治家中享有西科尔斯基那样高的威望。由于西科尔斯基之死，流亡政府对整个波兰民族的控制力削弱了，而就在此时，东线的军事形势开始转化。

西科尔斯基始终希望建立一个倾向于西方的波兰国。他的死排除了这一可能性。尽管在意大利的波兰军队将于1944年建立殊勋，国家军又行将在华沙发动起义，然而老一代波兰领袖却不再掌握主动权。德国人一开始从苏联撤退。所有的政治优势就全都落入波兰共产党人手中。1943年11月，一个经过改组的“波兰工人党”，在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及其新总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的领导下建立起来了。在东方战胜侵略者预示波兰问题将全然按苏联方式来解决，恰如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世时代那样。波兰的未来，不是掌握在西方比较熟悉的那些人物手中，而是掌握在贝鲁特和哥穆尔卡两人手中；而他们的权威则取决于红军的力量以及他们的克里姆林宫保护人一时的兴致。

其他流亡政府在与苏联打交道时，谁都没有经历过像波兰人那样的困难。这丝毫不足为奇，因为俄国人没有占领它们的领土。对照之下，甚至还可以这样说，贝奈斯和捷克流亡者在西方的地位

269 得以改善,实际上是由于苏联遭受了侵略。因为,尽管捷克斯洛伐克临时政府在1940年7月即已建立,贝奈斯在伦敦仍继续有些遭受冷遇,直到1941年7月18日,他的政府才获得英国的完全承认。就在这一天,捷克斯洛伐克也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

贝奈斯有时把自己看作是东方对西方的公断人和解释者。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与托马什·马萨利克以及任何一个老一代的捷克政治家相比,他对俄国人始终较为同情。如今他决心与斯大林及其军事指挥官尽可能密切合作,同时也要与英国人和美国人保持友好关系。由于他深信东线各军将会把捷克斯洛伐克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他自然就应该寻求与俄国人以及莫斯科所训练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达成协议。这种独立性在华盛顿和伦敦都引起了几分猜疑。

1943年12月,贝奈斯访问莫斯科,签署了捷克斯洛伐克与苏联之间的一个为期二十年的同盟条约。起先,他受到过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领导下的共产党同胞们的非难;他们责备他在1938年秋屈服于西方压力,而不依靠据说是斯大林已经担保给予的支持。然而,俄国人自身更感兴趣的却是目前的现实,而不是对过去的指责。他们知道贝奈斯在国内外仍享有相当高的威望。他对苏联军事成就的那种显然真诚的赞赏,是捷克与苏联在战争最后阶段密切合作的保证。苏联因而无意试图建立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卫星政府。

贝奈斯在莫斯科获得的成功,使得可以在苏联招募一个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卢德维格·斯沃博达将军任军团司令,他是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沙场老将,时年四十八岁,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参谋学院教授马扎尔语,之后于1939年逃往波兰,接着被苏联当局拘留。斯沃博达与其同时代的波兰同行安德斯将军不一样,他对红军指挥官颇为尊敬,特别是对托尔布欣元帅和科涅夫元帅,而他

的这种感情也得到了回报。因此，在从德国人手中解放祖国的战斗中，捷克斯洛伐克各部队得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虽然在1944年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罗塞尼亚民族委员会，贝奈斯及其总理施纳麦克阁下的权威并未遭到苏联指挥官的反对。1945年3月终于在解放了的科希策成立联合政府，领导人是贝奈斯曾经选作他的驻莫斯科特使的兹德涅克·费林格。

1942和1943年，苏联政策对希腊和南斯拉夫的未来的影响不如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直接；这两个巴尔干流亡政府与莫斯科之间也很少直接接触。1942年8月，苏联提高了南斯拉夫王 270 国驻莫斯科外交代表的地位，从公使级升格为大使，这确实是对王国投了一张明显的信任票；但是，这一姿态殊少重要意义，它不过是在敌占区共产党活动日益频繁之时，为了消除王国的疑虑所作的一种表示而已。实际情况是，1941年4月的灾祸动摇了这两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其严重性已超过流亡者之所能认识的程度。南斯拉夫流亡者奉行泛塞尔维亚主义达到了肆无忌惮、排斥异己的地步，而且脱离了在敌占区的同胞。希腊流亡者的所作所为也仿佛表明旧制度会在战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似的。这些保皇派政治家们对未来如此信心十足，甚至还与南斯拉夫流亡政府达成了一项协议，决定一旦两国国土重返贝尔格莱德和雅典，将以此作为一个新的巴尔干联盟的基础。

这种乐观毫无道理。在旁观者看来，这两个国家中不管是哪一个都越来越未必能在撵走侵略者后恢复君主制度。具有偏爱德意志独裁主义传统的希腊王室，无论对于国外的低级官员，还是对于山区的抵抗运动领导人来说，都已经没有什么号召力；而塞尔维亚人对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的旧情，由于从伦敦和开罗不断传来流亡的军人和政客之间无聊的派系之争以及年轻国王本身举止失检的消息而受到严重的挫伤。这些传闻当然被彼得国王在国内的敌

人太加渲染，但他公开发表的一些声明，却也未考虑到是否有助于美化他的形象。1942年和1943年在中东的南斯拉夫和希腊军队的忠诚曾经几次动摇；驻埃及的部队中也曾发生过一些规模不大的兵变。

然而，政府的未来型式并不取决于流亡者的意愿，而是取决于抵抗运动的性质以及主要盟国给予它们的庇护。轴心国入侵不到三个月，在南斯拉夫各地区就开始爆发反抗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起义，并在入冬后发展到阿尔巴尼亚境内。与此同时，希腊的抵抗运动也在雅典的大学生中以及在较为偏远的山村里勃然兴起；但希腊游击队员直到1942年11月才完成了他们的第一项重大破坏活动：在戈尔戈波塔穆斯炸毁一座极其重要的铁路高架桥。这些事态的政治意义相当重大，但决非彼此相同。以南斯拉夫为例，当一位爱国英雄从游击部队中涌现并被占领当局承认为危险对手时，则不论其政治倾向如何，任何流亡机构便都难以违抗他现实的权力而坚持自己的意愿。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既非基于一种排他性的民族观念，也非基于一种排他性的宗教信条；它成了一种促进统一的因素，而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各个政党狭隘的党派主义恰成对照。阿尔巴尼亚的运动情况大致相同，虽然规模较小，也没有保皇派情绪这种复杂情况（阿尔巴尼亚无人想让索占^①复辟）。希腊却另是一种情况：共产党领导的阵线（民族解放阵线）中未能产生一位独一无二的杰出人物，关于统一的思想又传统地与东正教教会相联系，英国军队因而有可能在希腊流亡政府返国后设法维持其统治，直至后者能逐渐削弱民族解放阵线在国内许多地区所赢得的支持。希腊处于东欧的南部边缘，其地理位置使英国不妨在此作某种程度的卷入，而这在其他巴尔干国家中便不可能。

① 阿尔巴尼亚国王，1928—1939年在位。——译者

南斯拉夫之成为巴尔干抵抗运动的典型或许是势所必至，塞尔维亚和波斯尼亚的深山密林天然适于进行这种性质的战争。最初，在1941年晚夏，出现了政治上截然不同的两支反抗占领军的游击力量：一支是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的切特尼克，^①他们沉浸于塞尔维亚的传奇之中，向往着充满浪漫色彩的往昔，一心效法尚武好战的圣徒和哈伊杜克虬髯英雄；另一支则是游击队员，他们从一开始就力求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来实现社会革命。这两个运动之间的冲突加深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悲剧：在四年战争期间，他们每十人之中就有一人牺牲。

关于米哈伊洛维奇部下抗德活动的报道始于1941年9月，比游击队反抗活动的消息传到西方要早得多。不难理解，流亡政府极力宣扬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终于使得各同盟国政府以及伦敦和纽约的报界一致把他们认作抵抗运动的英雄。南斯拉夫政府坚称切特尼克是正规军的组成部分，并晋升米哈伊洛维奇为将军，甚至在1942年1月任命他为缺席的陆军部长。1941年和1942年之间的那个冬天，一些英国军官被空投到塞尔维亚南部切特尼克控制的区域。然而，米哈伊洛维奇在政治上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一种时代错误。他十分乐意保护在塞尔维亚上空被击落的盟国空军人员，但限于他从极端个人主义出发来估量祖国的需要，便不能对打败希特勒作出多大贡献。他恨克罗地亚人，更恨“共产党匪徒”。他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积蓄力量、待机而起以支援盟军在巴尔干登陆。他不能、也不愿阻止下级指挥官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勾结反对游击队。他所奉行的政策终于与奈迪奇并无区别。然而，尽管切特尼克对于牵制共同敌人无多作为这一点，已日益得到证实，邱吉尔直至1944年1月才停止向米哈伊洛维奇供应军

272

^① 切特尼克分子有意追求奇特古怪、凶恶狰狞的外表，满脸胡须，全副武装。——译者

需品，英国军事代表团则到5月间方才撤回。

游击队的抵抗运动于1941年7月7日始于塞尔维亚，及至当月月底就扩展到门的内哥罗、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10月第二星期，在塞尔维亚所辖的马其顿也爆发了起义。11月，德国向游击队大举进攻，用飞机和坦克迫使他们从乌日采城撤到塞尔维亚与波斯尼亚东部交界处的山区。1942年1月至2月，德国和“乌斯塔沙”分子又发动第二次攻势，但游击队员逃脱包围，甩开德国人重兵追击，转移到德里纳河上游的小镇福查。在此休整三个月，免受德军的猛烈攻击，也就在这段间歇中，1937年底被指定为南斯拉夫共产党总书记的四十九岁的克罗地亚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以一位起义战略家、一位为南部斯拉夫人的统一而努力的斗士而崭露头角。

及至1942年仲夏，敌军压力大大加强，铁托决定把指挥中心向西转移一百八十英里，经过波斯尼亚到达比哈奇周围地区。他在那里建立政府，管辖被游击队员解放的城镇乡村。1942年11月26日，由1920年制宪议会议长非共产党人士伊沃·里巴尔主持在比哈奇召开一次代表会议，即为谋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会议。会议通过若干决议，保证南斯拉夫人民的“真正的民主权利”，确认“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一次如此性质的会议居然在被占领的欧洲召开，这就迫使同盟国中的几个大国注意到南斯拉夫国内取得的不寻常的进展。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从未发表过这种关于民主原则的宣言（虽然米哈伊洛维奇后来确实在1944年1月于塞尔维亚的巴城召开了一次会议，即“圣萨瓦代表会议”）。在莫斯科和伦敦，人们仍然对南斯拉夫的事态摸不着头脑。因而迟至1943年4月邱吉尔还坚持认为游击队员是纯属克罗地亚地区的抵抗运动，直到5月末第一批英国军官空降到南斯拉夫的铁托控制区域，各同盟国才开始理解这一民族解放运动的全部重

大意义。

1943 年的最初几个月里，德国人及其盟友拼命地企图击溃游击队，南斯拉夫人因而伤亡甚大。可是，墨索里尼垮台以及意大利随后于 1943 年 9 月退出战争，却给他们帮了大忙。他们得以从斯普利特——那年秋季游击队员在德军压力下被迫再次退入山区前，曾固守这座城市达三星期之久——等中心城市的仓库补充了少量军需品。1943 年 11 月末召开（这次是在亚伊采）反法西斯会议的第二次会议，会议的政治决议较之十二个月以前在比哈奇所作的决议远为激进。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告自己是“南斯拉夫国家最高行政与立法机构”，战后的南斯拉夫将是一个“确保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各民族完全平等”的联邦。君主政体将来究竟如何，有待全国解放后解决。根据斯洛文尼亚代表团提出的动议，亚伊采代表会议正式授予铁托“南斯拉夫陆军元帅”的军衔。²⁷³

这些革命行动削弱了彼得国王和南斯拉夫流亡政府的地位。然而，铁托对于他的祖国的前途确实在一切方面都有发言权。举行亚伊采会议时，游击队员们牵制着不下十九个德国师以及其他轴心国的十六万军队。为了击溃游击队，德国被迫在波斯尼亚山区集中经过特殊训练的部队，并派出一支空运特遣部队。随着德军在东方朝多瑙河、在西南方沿意大利半岛向北退却，铁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他的军事实力。他的部队正夹在向巴尔干推进的红军与亚得里亚海彼岸的英美两国军队的正中间作战。这就毫不奇怪希特勒何以把这一游击运动看得如此严重，正如希特勒所猜疑的，邱吉尔也意识到了南斯拉夫作为进入中欧通道的潜在价值（尽管出于不同的打算，他遭到了美国人和俄国人的同时反对）。

1943 这整个一年，德国人和他们的东南欧各卫星国似乎被一

把钳子夹得越来越紧。3月底,德军的最后一次主要攻势在哈尔科夫以东受阻不前;从7月开始,俄国人毫不留情地向西推进。8月,奥廖尔和哈尔科夫先后被解放,苏联的七个集团军扑向第聂伯河。9月24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先头部队已经望见河对岸基辅的一些高塔;次日,由此往北三百英里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进入斯摩棱斯克。及至11月的第一星期,基辅已回到俄国人手中,红军从好几处渡过第聂伯河。天气严寒,西边的沼泽地带已经冻硬,到那年年底,苏联军队已逼近1939年前的波苏边界,距罗马尼亚边境不足一百英里。同时,英美两国军队则沿意大利半岛向北挺进,由于攻陷了布林迪西,他们似有可能渡过亚得里亚海向巴尔干进攻。
274 1943年9月意大利的崩溃对整个东南欧都有影响。那里的小墨索里尼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岁月中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顷刻之间,似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都有可能背弃德国人的事业,匈牙利也保不住会单独媾和。

从那年春天起,希特勒便已明白他的新秩序有可能分崩离析。4月,希特勒卜居萨尔茨堡附近的施洛斯克莱斯海姆,他把博里斯国王、安东内斯库元帅、霍尔蒂海军上将、蒂索和帕韦利奇一齐召去,怒气冲冲地举行了一系列会谈,其目的是要向他们证明,除非德国全胜,否则他们的国家就都毫无前途可言。博里斯和往常一样,在与希特勒的口头争辩中似乎是坚守住了自己的立场。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则因企图退出这场战争而遭到痛斥。希特勒特别谴责安东内斯库竟然容许曼纽有批评其政策的自由。希特勒说:“我把我的政敌都宰了!”安东内斯库的回答简单明瞭:“我没有。”轮到霍尔蒂时,希特勒指责他包庇的犹太人过多,还对他说他的首相卡洛伊是“一个政治冒险家和德意志民族的头号敌人。”这位摄政王忿怒地拒绝听从德国人的吩咐罢免卡洛伊,也抵制了想让他签署一份关于匈牙利必须继续“与布尔什维克主义及其盎格鲁-撒

克逊盟友”战斗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声明的企图。尽管德国人发的新闻稿毫不理会霍尔蒂的顾忌，坚称德国所有的伙伴团结一致，希特勒对匈牙利的真正意图已是深信无疑。

希特勒的这些来访者，或许除了可怜的帕韦利奇以外，谁也没有把克莱斯海姆的会谈放在心上。8月，卡洛伊与英国缔结了一项协定，达成如下谅解：一旦西方盟军攻抵匈牙利边界，他们会发现匈牙利武装部队已作好无条件投降的准备。想方设法要挤进圣人行列的不仅仅是卡洛伊一人。罗马尼亚外交部长米哈伊·安东内斯库——与他安东内斯库元帅同姓，但非一家——也在与伦敦的同情者接触，并间接与贝奈斯联系。当然，匈牙利人与罗马尼亚人并未合作，特兰西瓦尼亚问题虽然暂时搁置，却仍然使他们疏远，甚至影响到各自的打算。

保加利亚所处的地位不同于三国公约的任何其他成员。保加利亚人既不甘愿充当希特勒的伙伴，也不打算积极反对他。1942年虽然颁布了一些纳粹式的反犹太主义法令，但除在保军占领的外国领土以外并未认真执行。报刊上和无线电广播中不时捧出共产主义这个妖怪，尤其是当首都和郊区发生一系列暗杀事件的时候。1942年6月，扎伊莫夫将军——他在30年代中期曾经是维尔切夫军事集团内一位颇受尊敬的成员——由于被指控为苏联特务而处决。这一指控无人相信，普遍的看法是扎伊莫夫一直在密谋发动一场军事政变。但撇开这些惊恐不谈，保加利亚却依然令人奇怪地置身于这场大战之外。截至此时为止，保加利亚人在这场战争里混得不坏。从1941年春天起，马其顿和色雷斯的大片地区就落到保加利亚控制之下，1943年意大利垮台后，这些疆域实际上还有所扩大。俄保两国之间仍处于和平状态。随着巴尔干日益进入盟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内，索非亚和其他中心城市有遭受空袭的危险，但直到1944年1月空袭加剧，才促使首都人口部分疏散。驻扎

在保加利亚的德军不过几千人。情况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要好得多。

博里斯国王在他的臣民中仍然深孚众望。尽管保加利亚政治谋杀案件层出不穷，他继续公然漫步于索非亚的街头，不愧为法国“平民国王”路易·菲利普的曾孙。但在1943年8月28日，即博里斯到东普鲁士司令部访问希特勒归来后的第三天，他却猝然死去。博里斯年方四十九岁，他未见有明显患病迹象，一时谣言四起，说他为德国人所暗害；有人说他从东普鲁士返回途中在飞机上遭枪杀；又有人说他是被毒死的。但很可能是自然死亡。

博里斯一死，保加利亚统治阶级便失去了一位善于随机应变的代言人，他具有治国的天赋，并由于四分之一世纪中命运多变而愈加机敏。继承人是他的儿子西美昂，年仅六岁，王权由摄政（理事会）代行；这个机构名义上以博里斯的兄弟西里耳亲王为首，但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前首相波格丹·菲洛夫。摄政者们暂时还能使这个国家不被卷入苏联战役；但随着红军逼近巴尔干，泛斯拉夫主义情绪在这个国度日益滋长。持不同政见的官员、农民联盟盟员、社会民主党人和真正的共产党员，在“祖国阵线”这个政治反对派的地下组织中联合起来。游击小组开始在罗多皮群山中活动，一场抵抗运动逐渐在保加利亚兴起，但它却从未达到象南斯拉夫一样的规模。

276 随着意大利被击溃及红军解放乌克兰，各同盟国的政治家们都看清楚了欧洲的战局已经转变到对他们有利。然而，尽管举行了多次外交部长级会议以及邱吉尔与罗斯福、邱吉尔与斯大林之间的双边讨论，还一直没有召开旨在决定军事行动的最终范围并为战后解决办法做好准备工作的重大会议。报刊上早就在预测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要举行一次最高级会议。这次会议1943年11

月 28 日终于在德黑兰召开，与铁托的亚伊采革命代表大会的时间不谋而合。会议结果对整个东欧有重大影响。

对于英国人和美国人，德黑兰会议主要是促成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战略协作和苏联最终参加对日作战的一种手段；从这方面来看，会议是成功的。就斯大林而言，这次会议却有双重目的，性质多少有所不同。在军事上，会议使他得以向盟国强调苏联热切希望盟国对即将在法国开辟的“第二战场”上作出坚决的努力，并劝阻它们在亚得里亚海沿岸或爱琴海上横生枝节。会议对他也是一个机会，使他可以确保红军能作为苏联边境地区唯一的宪兵，从而在波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甚至沿多瑙河中游，摆脱英美的干预而任意行动。12 月 1 日达成的军事协议既确切而又扼要中肯：联合支持铁托的游击队；1944 年 5 月越过英吉利海峡和在东线同时发起联合攻势；应允土耳其，一旦保加利亚向上进攻，苏联即将对保宣战，藉以鼓励土耳其协同参战；还达成如下谅解：军事参谋人员将就今后作战行动的细节进一步合作。相形之下，对会议上提出的政治问题则仍听其含糊不清，未作解答。斯大林拒不说明苏联的领土要求。取得一致意见的是：波兰边界应向西“挪动”到奥得河，寇松线以东在 1939 年就已并入苏联的前波兰国土均归还给苏联；但斯大林似已颇为感激地接受了邱吉尔提出的方案：“对边界线的实际划定，需待仔细研究，也可能需要在某些地点解决各族居民杂居的情况。”关于罗马尼亚几乎什么也没有谈。斯大林已于战争期间在好些场合一再坚称，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割让没有更改余地；而英国人和美国人则明确认定这两个行省属于苏联军事利益范围之内。许多身居高位的罗马尼亚人似乎深信，英美军队会通过某种不可思议的办法赶在红军进入之前到达这个王国，同他们进行停战谈判。但抱如此幻想的时日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德黑兰会议之后，无论是在伦敦或华盛顿，将很少有人怀疑谁

会成为东欧全部边疆地区的主人，尽管当时还预见不到他的势力会向西方延伸多远。

277 德黑兰会议上议定的条款，有些仍是空谈，另一些则在实践中加上了不少附带条件：在这一阶段还无法诱使土耳其参战，因而苏联截至此时尚无必要向保加利亚提出最后通牒；尽管苏联已在2月间派军事代表团去铁托那里，却把向铁托提供物资的任务留给了英国，英国已在巴里开辟一个基地。然而，战役的进程却使得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两个苏联当时特别感兴趣的地区不久就必将成为检验德黑兰决议的场所。

1944年1月4日，红军在萨尔尼——普里皮亚特沼泽地带南部边缘的一个铁路枢纽站——越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旧波苏边境。波兰问题于是尖锐地提了出来。国家军的某些部队愿意协助苏联驱逐德寇，另一些部队却发现自己从一开始就在与红军作战，而这并非全是出于他们自己的选择。在伦敦的米科拉伊奇克政府提议，只要苏联承认波兰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边界以西拥有主权，国家军就应给予他们以战术性支援。同时，米科拉伊奇克与邱吉尔仍在继续谈判，希望波兰与苏联能就将来的边界达成某种一般性协议。2月，波兰流亡政府作为最大让步——军方对此只是极其勉强地予以同意——提出一条“临时分界线”，分界线划在紧邻维尔纳和利沃夫以东的地方，把这两座城市都留归波兰国。由于斯大林坚持按人种划分的正确边界是寇松线（邱吉尔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根本毫无希望得到苏联对于这个提议的认可。尽管罗斯福和邱吉尔力图弥合苏联与这个流亡政府之间的裂痕，苏联却继续支持鲍列斯瓦夫·贝鲁特及其新建立的“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而当红军逼近1941年边界时，贝鲁特的人民代表会议即受托对寇松线以西即将解放的领土负起行政管理的职责。布尔加宁将军——日后的苏联总理——奉派代表斯大林参加这一代理行政

机构。8月，贝鲁特和布尔加宁在卢布林城建立一个“民族解放委员会”，宣布在华沙被德军占领期间，暂以卢布林作为波兰首都。

罗马尼亚也处于苏军将在那年春季到达的威胁之下。尽管米哈伊尔·安东内斯库和曼纽派出的密使在马德里和安卡拉十分活跃，但是，英国和美国坚决拒绝与罗马尼亚缔结任何单独协定，安东内斯库元帅本人急于想使罗马尼亚摆脱战争，也与同盟国秘密接触。德黑兰会议后不久，元帅的使者弗洛里安·内诺在斯德哥尔摩遇见一个保加利亚人，此人当时正在兜售会见苏联外交官员的介绍信和旧的珠宝。通过这个异常非正统的推销员，内诺得以同俄国人会谈了三个多月，接着，莫洛托夫在4月公开宣称，尽管苏联意在保有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在其他方面不会受到损害，俄国人也不会谋求改变这个国家“现有的社会结构”。此时，红军已到达布科维纳，在安卡拉的会谈较之在斯德哥尔摩更为加紧地进行着。罗马尼亚人被告知：期待他们向德国宣战；而特兰西瓦尼亚将在最终解决办法中全部归还罗马尼亚。就在这个当口，所有谈判一律中止，表面上是因为安东内斯库对美国猛烈轰炸普洛耶什蒂和其他中心城市十分气愤，但更可能是由于匈牙利所发生的事件。

尽管希特勒在上年8月对霍尔蒂痛斥卡洛伊，这位摄政王拒绝在匈牙利政府中作任何重大人事变动，甚至还在卡洛伊就任首相的二周年纪念日向他颁发一枚高级勋章。而卡洛伊则在1943年最后几个月中继续谋求同盟国保证予以支持。他的接触范围之广殊属惊人：他居然能与当时远在大西洋彼岸的哈布斯堡王室首脑人物鄂图大公取得间接联系（鄂图曾三次会晤罗斯福，并与邱吉尔会谈一次）；而在天平的另一端，他又同铁托元帅安排好秘密休战，这一着比鄂图大公的建议更有实际价值。但卡洛伊的宏伟计划却归于失败。他曾要求把一个英美军事代表团空降到匈牙利境

内,以便为英、美军队空降着陆做准备:他所设想的空降兵大约二万人左右(将近二倍于次年9月空降到阿纳姆的兵力)。卡洛伊也曾建议把所有的匈牙利部队都撤回到喀尔巴阡山后,完全从苏联战役中摆脱出来,这显然是希望能同红军达成类似他和铁托所安排的那种休战。卡洛伊解释说,这样办,匈牙利将仍是中欧唯一稳定的政治单位、西方阻挡布尔什维主义的柱石。

难以相信那些负责的达官贵人曾经认真考虑过这些计划,因为他们对1944年的政治和军事平衡问题几乎毫无关系。然而,关于英美军队将随候鸟在春天一同飞来的谣言已经到处传遍,而且3月20日是科苏特逝世五十周年纪念日,也正是最适合他们来到279的日子。这一谣言当即有人报告到德军司令部,根据被截获的卡洛伊的一部分文电,德国人果然信以为真。2月的最后一星期,希特勒决定采取军事行动以惩戒匈牙利人,使他的其他伙伴再不敢干这样的背叛勾当。霍尔蒂于是又一次被召到克莱斯海姆。

3月18日,霍尔蒂抵达萨尔茨堡。接着,在愤怒的气氛中进行了一系列会谈,希特勒就卡洛伊的“背叛阴谋”对这位摄政王严加斥责。他坚持要霍尔蒂要么组成一个德国人信得过的政府与德合作,要么就难免看到匈牙利不但被德国人,也要被斯洛伐克人、克罗地亚人和罗马尼亚人看作敌国来实行占领。霍尔蒂接受了德国人的要求,以为只要他还是摄政王,他仍然有可能保住一些权势。但德国人却一心要使霍尔蒂实际上成为阶下囚。他从萨尔茨堡返回布达佩斯所乘的火车一路上故意拖延,两个城市相距三百二十英里,却磨蹭了整整十五个小时,而他和随行人员都无法给卡洛伊打电话告知所发生的一切情况。当这位政治上已遭孤立的摄政王被困在维也纳市郊的时候,德国开始从四个不同方向出兵占领匈牙利,并派出伞兵攻占了布达佩斯的全部机场和战略据点,丝毫没有遇到抵抗。等到霍尔蒂终于在3月19日接近中午时分抵达首

都时，车站上和王宫前都已换上德国警卫队。臭名昭著的党卫队将军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巴结地随侍在摄政王身旁，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此后的四个半月，德国人成了匈牙利的主子，纳粹机构对那些有破坏“新秩序”嫌疑的人实行十足的恐怖统治。卡洛伊在土耳其公使馆得到外交庇护，一个懦弱顺从的将军接替首相职务。最深重的灾难落到了犹太人头上。一百万匈牙利籍犹太人中有三分之一被杀害，大部分死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里；可能还有二十五万人饱受放逐和监禁之苦，但却得以幸存。虽然个别匈牙利人保护了某些犹太家庭，有许多暴行却是非德意志人犯下的，而且，霍尔蒂及其大臣们对驱逐犹太人出境的态度也很暧昧。霍尔蒂似乎多少有些天真地认为，一旦犹太人迁离王国，纳粹分子就会随之而去；但他却介入阻止把布达佩斯较富裕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这些居民对匈牙利的经济至关重要。

德国占领匈牙利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反响。这给斯洛伐克和克罗地亚的傀儡政权撑了腰，蒂索和帕韦利奇都以为霍尔蒂的明显失宠对他俩都有好处。对于安东内斯库，这件事则有双重作用：2 罗马尼亚人既为德国人控制其邻国之迅疾感到震惊，又在希望特兰西瓦尼亚将会因此而全部归还给他们。希特勒在3月底确实曾对安东内斯库元帅说过，“对他而言，维也纳裁决书已不复存在。”当时，苏联军队正在比萨拉比亚挺进，日益逼近并于3月31日抵达喀尔巴阡山山麓。安东内斯库想必已经了然，除非挡住苏军进攻，希特勒就不会再有机会来处理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但在1944年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两国边境的战斗都一时停息下来，使人产生误解。苏军在其战线的南段倾全力肃清敖德萨和克里米亚的德军，他们在4月10日解放敖德萨，5月9日重新进入塞瓦斯托波尔。在此期间，喀尔巴阡山脉的弧形地带一直未受侵犯，匈牙利和

罗马尼亚的一些乐观派开始认为俄军或许会被挡住。

安东内斯库元帅本人似乎已在希望，新的防御工事线能够久久拖住红军，使斯大林将会准备谈判一种“合理的”解决办法。这位“首领”就像他在1941年那样争辩说，倘若罗马尼亚人在此危急时刻继续忠于同德国的联盟，就能表明他们比叛变的马扎尔人高明得多，一旦纳粹分子和苏联人都精疲力尽而只得谈判缔结妥协性的和约，德国人出于感激，必然会把特兰西瓦尼亚归还他们。这种充满信心的情绪在布加勒斯特未能持久：曼纽以及“得到宽容的”反对派到6月中旬再度与英国人有所接触，安东内斯库也在7月与俄国人进行接触；然而，暂时的欢欣症使罗马尼亚的崩溃推迟了好几个月，其结果，红军直到秋收完毕之后才开进多瑙河流域。

到1944年春，英国人开始对俄国人深入东南欧可能达到的程度颇感震惊。邱吉尔富于想象力的头脑中构成了在希腊或沿达尔马提亚海岸登陆的方案，可是，他的三军参谋长和美国人都不喜欢这类牵制性袭击；甚至，他早些时候所提的巴尔干作战计划在德黑兰就已被否定。但邱吉尔认为今后的事态必将证明这一战略是正确的，从未打算予以放弃；1944年5月和6月，他继续力主朝东北方向扩展意大利战役，赶在红军大举越过喀尔巴阡山之前把多瑙河中游置于英美控制之下。他提议在伊斯特利亚登陆，与铁托的部队会师，然后通过卢布尔雅那隘口长驱直入，经由格拉茨和塞梅林隘口攻抵维也纳。这一计划未能使罗斯福的军事顾问们感到兴趣（颇为古怪的是，他们似乎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巴尔干冒险行动”）；然而，经过修修补补，那年夏天这计划却一直盘旋在邱吉尔的脑海里，有助于他从南斯拉夫政治倾轧的“混乱中建立秩序”的想法。有意义的是，1944年8月邱吉尔终于在那不勒斯与铁托会晤时，他首先关心的事情之一就是游击队究竟能提供多大程度的合作，

为英军打开经由卢布尔雅那和马里博尔通往格拉茨的道路。

铁托的军事和政治命运在1944年几经发生变化。5月24日，德国对德尔瓦尔游击队司令部一次计划得极其高明的空降突袭，险些儿把他活捉；他连元帅制服都丢失了，被德军作为战利品拿到维也纳去展览。但英国既然倚重他，这就保证他不久便得以在维斯岛上建立起新的指挥中心；在他渡海登陆进入塞尔维亚开展游击队袭击之前可以在岛上得到英国海军船舰的保护和补给。铁托与保皇派流亡政府终于在政治上取得某种一致。6月，彼得国王在英国人的劝说下撤换了他的首相博日达尔·普里奇，代之以伊万·舒巴希奇，后者是受命组织南斯拉夫政府的第一个克罗地亚人。普里奇好多个月以来一直采取塞尔维亚沙文主义态度，要是在早二十五年前，这准会使他的岳父帕西奇洋洋得意；但舒巴希奇却准备与铁托会晤，并在8月底力劝彼得国王公开承认铁托是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唯一军事指挥员。多次试图使铁托与国王会晤未成，但铁托的个人威望已空前提高。8月，他与邱吉尔在那不勒斯商讨战略；9月，又与斯大林在莫斯科谈判达成红军与游击队员军事合作的协议，规定所有的解放区都归南斯拉夫政府管辖。铁托这个独特的指挥员和传奇式人物，对东方和西方似乎都必不可少，而他也极为精明地充分利用了他的这种地位。

那年夏季，波兰人中也产生了一位卓越的抵抗运动领袖。塔代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伯爵将军，以其代号“博尔”^①著称，他战前是一名正规军官，在最精锐之一的骑兵团里服役；根据伦敦发来的命令他从1943年7月开始统率国家军。不幸他竟成为米科拉伊奇克与西方盟国之间的误解的牺牲品。也可能是他本身的经历和贵族家世都对他不利。本来打算让国家军骚扰一支沿着交通线撤

① 原文是Bor。——译者

282 退的德军；但博尔却经流亡政府赞同，按照 1794 年和 1830 年的传统策划了一次华沙起义。假如这次起义成功的话，波兰旧秩序的代表人物就能处于强有力的地位，而可以同红军和追随它的波兰共产党人讨价还价。它的失败却毁掉了东欧唯一的一支强大的反共力量。从政治上来说，这为斯大林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好处。它进一步注定波兰在战后世界将仍处于苏联的影响之下。当然，要说苏联是有意听任德国镇压这一民族抵抗运动，省得它必须自己动手，那倒还查无实据；然而这种犬儒主义之于斯大林时代，恐怕也不是不适合的。

华沙起义犹如一首史诗，叙述起来却简单得令人难以相信。起义开始于 1944 年 8 月 1 日。8 月 4 日，全城就有三分之二控制在国家军手中。然而德国调来党卫军增援，把各个起义区团团围住。国家军被分割成小股，只能通过下水道网互相联系。他们久候外援而终于无望，后因粮绝，遂于 10 月 3 日按照体面的条件被迫投降。起义持续九星期，伤亡达一万五千人，而敌军蒙受的损失约为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二。

博尔及其部下博得了广泛的赞赏和钦佩，甚至在其德国敌人中也不乏敬慕者。英国、南非联邦和波兰的飞行员从意大利飞来，空投补给，但数量甚小，空投者伤亡颇大。9 月的第三星期，美国飞机也送来援助物资，用降落伞投给守军。红军却几乎毫不援助。诚然，该战区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部队在不到五星期中就推进了将近四百英里，他的供给线遭受到重大压力。此外，还可以辩解说，苏联的战略总计划规定，在向西面继续跃进前应在维斯杜拉河畔暂停并整顿部队；因为苏军一直倾向于按预定计划从一条大河向前推进到另一条，而且华沙又是一支困乏的部队所难以攻克桥头堡。但意味深长的是，起义爆发时，米科拉伊奇克本人正在莫斯科，斯大林亲自拒绝予以援助，除非他同意接受寇松线为边

界，并与贝鲁特及共产党人合作组织联合政府。及至邱吉尔和罗斯福发出呼吁后，红军竟然又能向这座城市发起突袭，这是不祥之兆。然而，当时已进入9月中旬，为时已晚，难以奏效。从起义开始以来已经超过六星期，尽管“苏维埃波兰人”（贝林格的“科希秋什科师”）得以攻占维斯杜拉河东岸的普拉加区，他们却未能渡河建立桥头堡。而红军直到1945年1月17日——博尔投降十五星期后——才开进业已光荣地夷为废墟的华沙。 283

波兰起义的悲剧使苏联与其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极度紧张。人们对苏联的军事问题并不了解，唯独对她的政治意图深怀疑虑。波兰孤零零地夹在德苏两大国之间，这一地理位置总是使波兰人沦为俎上肉。看来，1944年中令人惊讶的新局面使俄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在一场争夺的这一回合结束前就看到了下一回合，而英国和美国对此却无能为力，一筹莫展。到那年秋季比德黑兰会议时更加显而易见，处在夹缝中间的这些国家，将来只不过是红军的演兵场而已。

俄国人在1944年8月和9月的主要军事努力，集中在维斯杜拉河流域的南面的远处，喀尔巴阡山与黑海之间三百英里长的地带。防守这条战线的是二十七个德国师和二十个疲于战争的罗马尼亚师。德国此时在南面如此远的地区再无后备部队，因为早些日子苏军进攻华沙时，机动程度较大的一些师都已北调，以确保在维斯杜拉河畔挡住苏联朝柏林方向进军。苏军战绩斐然。他们于8月20日发起攻击，不到三天就渡过普鲁特河，进入雅西，其装甲部队已向摩尔达维亚纵深挺进。看来在多瑙河以北已不可能再构筑任何防线。

曼纽和反对党领袖们，此时已放弃劝说“首领”与德国人断绝结盟关系的希望。他们深信，罗马尼亚在此危急关头应当仿效

意大利 1943 年树立的榜样。米哈伊尔国王同样确信非这样办不可；8 月 23 日，当两位安东内斯库都要求同他在布加勒斯特王宫会晤时，他乘机逮捕了他俩，把他们关进他父亲为王室集邮而修造的有特设通风装置的保险库内。这位国王于是广集贤能组阁，任命他的军事顾问萨纳特斯库将军为首相，四个副首相则分别为曼纽、布勒蒂亚努、一个著名的社会党人（帕特雷斯库）和一个共产党人（帕特勒什坎努）。同日，罗马尼亚与俄国停止战斗，8 月 24 日，米哈伊尔国王对德宣战。

284 罗马尼亚人掉转枪口之迅速，为苏军指挥官带来相当大的好处。铁路、港口设施或油井实际上都没被破坏。到 8 月 30 日，苏军不仅占领了康斯坦察，而且已在利用其港口设施卸下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增援部队和装备。次日，他们在布加勒斯特被作为解放者受到欢迎。十天之内，德军在东南欧的侧翼全部被包抄。

罗马尼亚人的倒戈推动了芬兰人的求和，他们久已认为胜利无望；9 月 5 日，赫尔辛基电台宣布苏芬停战。对保加利亚人则产生了更富于戏剧性的效果。在索非亚，三位摄政者四下邀请他们所能找到的任何反对党领袖来组成亲西方的政府。斯塔姆博利斯基的外甥穆拉维耶夫接受了这一委任——如果能称之为“委任”的话。祖国阵线拒不理睬摄政者们和穆拉维耶夫的主动表示。然而，单是亲西方的感情是不够的。9 月 5 日，苏联对保宣战，准备渡过多瑙河进入多布罗加。穆拉维耶夫真不愧是八面玲珑，同一天就请求停战，紧接着又在几小时之内宣布保加利亚已经对德宣战。9 月 8 日，大批苏联部队进入保加利亚境内，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当晚，维尔切夫和格奥尔基耶夫——都是发动军事政变的老手——在索非亚以祖国阵线的名义夺取了政权。新政府以格奥尔基耶夫为首，颇使人感到意外的是，它奇怪地与 1934 年的兹维诺（“环节”联盟）组阁的情况相仿；但阁员中却有两名共产党人和农民联盟成员尼古拉·

佩特科夫。城市工人游行示威，山村游击队员举行庆祝活动，表示支持祖国阵线。9月16日红军抵达索菲亚，再次被作为解放者的队伍受到欢迎。保加利亚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同苏军和铁托的部队并肩作战，打击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境内的德国占领军。然而，他们不时也同南斯拉夫人在马其顿的未来归属问题上发生摩擦。

大部分德国部队在穆拉维耶夫作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之前即已撤离保加利亚本土。驻扎在这个国家的德军向来不多，而且希特勒已经决定，鉴于罗马尼亚的背叛，有必要将驻巴尔干本土的全部德国师撤回，以便建立一条新的中欧防线。德军开始从希腊和马其顿撤出时，南斯拉夫、希腊和保加利亚的游击队一起出动骚扰，沿各主要交通线战斗异常激烈，尤其是在瓦尔达尔河—摩拉瓦河流域。德军的撤退井然有序，但十分缓慢，许多部队发现他们已被大举向西迅速推进的苏联各军切断退路。在德军背后则开来了英军，他们于10月的第一星期中在希腊大陆的帕特雷和纳夫普利翁两地登陆，10月14日攻入比雷埃夫斯和雅典。直到那个月的月底，希腊境内的德军才终于被肃清。

285

苏联各主力部队仅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稍事停留，接着就在9月的第三星期内在瓦拉几亚境内朝西南方向挺进。10月初，他们就已越过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向罗、匈边境推进。更往南面，托尔布欣元帅的集团军分两路纵队越过南斯拉夫边界：一路取道罗马尼亚的巴纳特，另一路则从铁门的东南方过来。10月4日，苏军与铁托的游击队在摩拉瓦河谷会师。10月20日，苏军与游击队员一起开进贝尔格莱德，这时德军已决定固守蒂萨河防线，以求在那年冬季挡住苏军潮水般的猛烈攻势。托尔布欣的部队不到两个月就挺进了四百五十多英里。他们兵临多瑙河中游给德国带来了新的威胁，与1918年弗朗舍·德斯佩雷所造成的威胁相似，而其火力要比当年强大得多。

亲身经历过 1918 年溃败的老军人中，有一人在二十六年后仍然身居高位，这就是霍尔蒂·米克洛什。当时，他曾向南斯拉夫人交出奥匈舰队，退居自己的庄园，冷眼看着心中鄙弃的那些人力求为匈牙利单独媾和，签订停战协定，以免国家被大多数马扎尔人所轻视的少数民族占领。眼下，他发现自己所处的地位与这些人不无相似之处。在罗马尼亚出现危机的那几星期，德国放松了对布达佩斯的政治压力，霍尔蒂乘机撤换他那不起作用的亲德首相斯托亚伊，代之以较为稳妥可靠的拉卡托什将军。尽管霍尔蒂对背弃其德国盟友心存顾忌，但他相信战争的败局已定。这位摄政王虽因进入七十七岁高龄而见迟钝，毕竟也慢慢地悟出匈牙利必须求和，但条件只能是：西方盟国可使王国摆脱被苏联占领的恐怖（如能摆脱南斯拉夫、捷克或罗马尼亚占领的侮辱则更好）。他在 9 月间多方设法与西方打交道——甚至通过鄂图大公，因为罗斯福总统再一次接见了这位大公——并于 9 月 22 日派出秘密使团飞往意大利的英军最高司令部。但是，向西方的所有请求都得到了同样的回答：要停战只能同苏联谈判。与斯洛伐克的苏军最高指挥部实际上的确已经建立初步联系，商谈停战的代表团也已于 10 月 1 日飞往莫斯科。10 月 9 日，邱吉尔和艾登抵达莫斯科，同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讨论波兰及巴尔干问题；英国人因而也获悉匈牙利企图退出同德国的联盟。10 月 11 日，苏联与匈牙利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匈牙利军队将撤退到 1920 年的边界线上，并在适当的时候对德国反戈一击。苏联以为所有这些情况都将立即实现。但霍尔蒂却不这样想。在这个当口他竟打算模仿芬兰人的榜样，通过无线电台广播宣布停战。效法这个先例就会误入歧途，因为赫尔辛基远离主要战区，而布达佩斯则是通往德国南部的干线之一的必经之地。

此时，德国人已经揣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并已采取预防措施。他们原来就一直豢养着狂热的箭十字团头子萨洛希·费伦茨作

为后备力量。他们也在布达佩斯郊区布置下由斯科尔兹内少校（此人1943年9月曾营救墨索里尼出狱）率领的特种部队。10月15日清晨，斯科尔兹内绑架了摄政王的儿子，后者当时正与据说是铁托的代表某人谈话。当天（星期日）过后不久，在布达佩斯电台广播霍尔蒂宣布匈牙利缔结停战协定的公告时，德国人得以迅速采取行动反击摄政王的这一着。他们抓住了霍尔蒂本人，强迫他宣布停战公告“无效”，又将他的儿子作为人质，逼他退位并任命萨洛希为首相。接着，霍尔蒂被带往巴伐利亚拘留起来；他的儿子则最终被投入达豪集中营。这整个插曲是一个因为看错时机、手忙脚乱和三心二意而酿成的可悲事例。匈牙利人于是被迫同德国人又并肩作战了六个月，蒙受严重破坏；在此期间，萨洛希政权赖以培养鼓动那种乖戾而又趋于消沉的爱国精神的竟是野兽般的反犹太主义。

严冬来临之前，德国人和匈牙利人企图挡住俄国人及其盟友进军的一切尝试均告失败。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从东面向布达佩斯进军；但主要威胁来自托尔布欣的部队，11月底他们在莫哈奇附近沼泽地带强渡多瑙河，然后向北直捣首都，向东^①进攻巴拉顿湖。布达佩斯在圣诞节那天被包围，但布达这座天然城堡一直坚守到2月中旬，整个城市破坏之惨重几乎与华沙相似。德军在巴拉顿湖沿岸负隅顽抗，甚至3月间在塞克什白堡附近突然发动反攻。直到1945年4月4日最后一批德军撤离匈牙利，退入奥地利。从土耳其人入侵以来，没有哪一次战役曾经给匈牙利王国带来这样的浩劫。

1944年12月底，一个匈牙利临时政府由苏联主持在德布勒森成立。政府以米克洛什将军为首，包括共产党、各农民党以及社

① 此处按原文eastwards照译，据查地图，方向正好相反。——译者

287 会民主党的代表。1945年1月21日，该政府使节在莫斯科与同盟国正式签订停战协定，4月14日，政府迁回布达佩斯，承担起令人伤感的职责：把一个患着弹震休克症的民族转变成拥护一个民主共和国的斗士。

从1944年10月至12月，波兰战线上没有重大进展。这种明显的僵持局面部分是由于交通困难：苏联战线的后方地区破坏严重，直达铁路的联结又受到阻碍，因为不仅轨道被毁，而且标准的欧洲轨距与较宽的苏联轨距不同。直到年底，一切才准备就绪；1945年1月12日，红军在维斯杜拉河上游、克拉科夫与桑多梅日之间八十英里长的地区大举进攻。五天后，朱可夫部猛攻波兰战线的中心地段，即在华沙附近，罗科索夫斯基部则深入东普鲁士，向但泽挺进。苏联的兵力和装甲车辆拥有六对一的优势，因此，其进军之神速，一如“巴巴罗萨”行动初期的德军。一星期内，战线就向西推进了一百英里。及至2月初，红军已占领战前波兰的大部分国土；尽管德军仍占有捷克斯洛伐克版图的三分之二、匈牙利的整个西部和克罗地亚平原的一部分，希特勒对东欧的控制终于被迫放松。与此同时，英军和美军（在其他西方盟国的部队和安德斯将军率领的波兰军队的支援下）也已渡过莱茵河攻入德国境内，并到达意大利的阿尔诺。这就是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从1945年2月4日到2月11日，在克里米亚半岛上已经解放的雅尔塔，举行的战争期间他们三人的第二次最高级会议时欧洲的军事形势。

雅尔塔会议并不像人们有时所说的那样是俄国人对一位疲惫不堪的英国首相和一位疾病缠身的美国总统所取得的惊人外交胜利。罗斯福此时对于力量对比的意识已经比德黑兰会议时敏锐得多，而邱吉尔则继续遵循其现实主义政策，在一切决定最终必须根

据苏联军队强大实力来作出的范围内，坚持自己的意见应被听取的一份权利。还在1944年10月，邱吉尔就已与斯大林达成其著名的“比例”交易：斯大林承认英美在希腊居于支配地位，承认在日后的匈牙利和南斯拉夫，苏联和英美势力均等；而作为回报，英美将允许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几乎可以自由行动而不受约束。在雅尔塔，邱吉尔力求确保在新波兰也有“西方”的一份，纵然苏联已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合法政府，而伦敦和华盛顿则继续承认那些流亡机构。他在波兰政府的组织形式以及波兰的未来边界这两方面，都及时设法达成了妥协方案。罗斯福则得以劝使斯大林接受一项《关于获得了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其中规定“自由地选举代表人民意愿的政府”。斯大林所作的这些让步，看来是空言多于实际，但它们至少给了人们这样的希望：一旦军事紧急情况得到缓和，将有机会建立一个通过民主方式选举的议会。 288

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所费的时间比其他任何问题都要多，却未能制订最后的解决方案。此时，已一致同意苏联的西部边界应沿寇松线作较小调整，但苏联提出应以奥得河和尼斯河西支流为波兰西部边界线的要求却被暂时搁置起来。会上宣布，“波兰的北部和西部领土应大幅度扩大”，但“最终划定西部边界线”应待召开和会时解决。同样，尽管一致同意应以卢布林委员会作为组成“民族团结临时政府”的基础，也提出了新政府将包括国外波兰人的民主派领袖。1945年6月底新政府终于成立时，人们看到是“民族团结”意味着十六名“卢布林”波兰人、三名“伦敦”波兰人（包括米科拉伊奇克）和两名其他成员。这可不是邱吉尔所希望的那种妥协。一切都将取决于对《关于获得了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如何解释；当然，对所有东欧国家和对波兰一样，都是如此。

雅尔塔会议散会后，战斗在欧洲还持续了十二个星期。英美军队和苏联军队赛跑式地争夺柏林。从奥得河进军的朱可夫部抢

先攻下了柏林，但从西南方向打过来的美国军队也已离德国首都不过五十英里，而且深入雅尔塔会议上暂时划定的苏联占领区一百多英里。攻进维也纳的也是苏联军队，尽管由于意大利北部德军抵抗部队崩溃，英国军队得以攻克的里雅斯特并进入奥地利南部。他们在卡林西亚拘留了好几千名为逃避铁托游击队的追击而流窜来的“乌斯塔沙”分子，恰如1919年的塞尔维亚人，游击队员们此时也越过卡拉万克山脉，藉以支持南斯拉夫一贯对克拉根福盆地的坚决要求。

5月7日，德国在兰斯的艾森豪威尔司令部无条件投降；次日，西欧和美国人民庆祝欧洲战争结束。但即使在5月9日柏林德军统帅部认可投降之后，还有一宗战利品——布拉格尚在争夺之中。289 爆破的炮弹和炸弹把这座都城震得地动天倾。捷克诸省不太适于游击战，这一点与巴尔干各国和斯洛伐克不同，1944年底苏军逼近喀尔巴阡山时，这些地方就已经有了强大的抵抗运动牵制着德军及其傀儡们。布拉格则和华沙一样，有历史悠久的反抗传统；1945年5月5日，布拉格人民奋起反击纳粹压迫者。然而，他们遭到猛烈的抵抗，因为当地的党卫军都是狂热分子，而苏台德德意志纳粹党徒更是亡命之徒。接连好几天，布拉格经历着华沙和布达佩斯经历过的恐怖。

起义爆发时，巴顿将军的美国第三军在布拉格西南十五英里处的比尔森，而科涅夫元帅的集团军（其中包括斯沃博达将军的捷克军团），则在七十英里以外的摩拉维亚边境。尽管巴顿的坦克部队在一天之内就能到达布拉格，尽管艾森豪威尔请求苏军总参谋长允许他们向前推进，苏军却坚持他们应该沿着从卡罗维发利经比尔森至伏尔塔瓦河上游的捷克—布杰约维采这条线止步不前。此时已经解放了罗塞尼亚和斯洛伐克的红军，为了提高其威望，想由他们自己来解放位于欧洲最西面的这座斯拉夫城市。布拉格因

此而成为强权政治竞争中一支悲剧性插曲的牺牲品。甚至最早一批苏军在5月9日到达，也未能使纳粹党徒停止顽抗。直到5月11日科涅夫元帅亲自进入这座城市时，最后的一批德国狙击手才被围歼，捷克人才得以自由地对苏军表示他们当时确实怀有的那种热情。五天后的3月，已经从伦敦飞往莫斯科、并随斯沃博达部从科希策到达布尔诺的贝奈斯总统回到了俯瞰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的赫拉德欣山上的城堡。他是由于红军的宽容和本国人民的意愿而得以复位的战前唯一的政治家。

第十三章 苏联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缔造和平的过程在形式和性质上都与1814至1815年或1919至1920年所进行的长期谈判不同。在维也纳和凡尔赛的和会上，尽管政治首脑们互相怀疑对方的动机及其理想的诚意，传统的秩序观念和公认的外交词令终于使他们联结在一起。但在1945年这一切早已事过境迁。诸如“法西斯主义”、“帝国主义”、“民主权利”、“自由选举”这类词语，对俄国人以及对英美两国人，其涵义并不相同。抗衡双方的发言人无法理解彼此的意图，导致互相不满，指控对方不守信用；而笨拙地使用军事力量的做法似乎又十分经常证实了这类指控。苏联将一种新的、强制性的行为方式带进了国际事务，苏联的外交史权威学者波克罗夫斯基把它描述为“马克思—列宁式的科学辩证法”。实践起来，这种做法就像它的定义一样累赘，其构成是一半儿敌意加一半儿伪善，所以根本不能成为建设性和平的基础。不过其本意亦非如此。在许多较年轻的红军指挥员和某些年岁较大的布尔什维克看来，革命似乎又一次在前进。这一次，将不会有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和会了。

然而，斯大林本人却由于阅历丰富而没有成为政党术语的奴隶。在战时三次最高级会议的最后一次中，他更感兴趣的是巩固和安全，而不是再把红旗插向更远的地方。1945年7月17日波茨坦会议召开之初，他同邱吉尔、艾德礼和杜鲁门会晤，此时他在东欧已有两项明确目标。他知道在苏联庇护下建立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政府几乎全无民众的支持，便设法使英美两

国给予它们外交承认以示其稳定。他也清楚波兰人已经在被遣送去奥得河与西尼斯河以东的原德国土地上定居，便设法使这些疆土最终被确认为属于波兰的主权所有。这次会议因而不时出现激烈的争论。

俄国人先是遭到邱吉尔的强烈反对，及至工党执政后，又遭到新任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的强烈反对。事实证明，就东欧事务达成协议比就德国经济的军事管制取得一致更费周折，并有大量问题留待外交部长会议日后解决。但经过十六天时断时续的争吵，最后的公报表明取得了某些进展。对各个新政府的承认，推迟到与前轴心国的卫星国签订一系列和约的准备工作完成之后。波兰被授权“管理”奥得河至尼斯河一线以东的土地，但波兰的西部边界要等到对德缔结和约之后才能划定。

波茨坦宣言引起争论最多的部分，是关于东欧各国的德意志少数民族，他们之中有许多人在接踵而至的战后余波中遭受到粗暴的对待。在波茨坦会议上一致同意将德意志种族的居民逐出新恢复的那些国家以及由波兰管理的各地区。宣言希望这种驱逐出境将是“有秩序与合乎人道的”，而且将推迟到同盟国为使难民能被德国妥善收容而共同作好安排时才执行。可是，这些规定并未履行。波兰人至少驱逐了六百万德意志人出境，对其中许多人所采取的做法，简直野蛮得可耻。捷克人在1945至1946年从苏台德逐出了大约三百万德意志人。虽然捷克政府在波茨坦宣言发表之后企图控制大批移民出境，在某些地区却已发生暴行或虐待的情况。把这种人口结构的变化说成是德国推行民族主义而自食其果，虽可能解释这悲剧的原委，决不能证明其为正确。德意志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的仇恨还要延续到下一代；如果有朝一日被逐出国境的德意志人要求修订和约的情绪强烈起来，那么，曾经捧着这些不幸的人们背井离家的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将在军事上仰仗苏联，

以谋自保。在多次驱逐的同时，就为尔后华沙条约和其他诸多事态播下了种籽。

波茨坦宣言授权(苏、美、英、法、中五国)外交部长会议不时举行，以便“为和平解决办法作必要的准备”，并审议经五个成员国政府协议提交的其他紧急事项。外长会议因而从1945年9月在伦敦首次召开直到1947年12月名义上结束任务为止，经常成为国际争吵的策源地。贝文同美国国务卿詹姆斯·F.贝尔纳斯^①一直敦促苏联当局容许在东欧各国建立“民主政府”；莫洛托夫则反唇相讥，指责英、美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国内事务横加干涉，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密谋复辟旧政权。贝文当然希望，或许贝尔纳斯也希望，为欧洲安全起见鼓励苏联与巴尔干及维斯杜拉河流域各国建立良好关系。但是，他们却古怪地不愿看到，如果允许在波兰、罗马尼亚或匈牙利进行自由选举，人们对苏联解放者幻想的破灭就会导致反苏政府卷土重来；他们也不愿看到，这种发展在1946至1947年决不会被俄国人接受，正如自由选举产生的德奥联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未被胜利的协约国接受一样。尽管俄国人在外交部长会晤时以及联合国早期会议上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令人沮丧，西方却有一种趋势，期望苏联能遵守高得脱离现实的国际行为准则；这就使欧洲加速分裂为对立的阵营。缔结和约的准备工作因而进展缓慢。

早在外长会议开始工作之前，苏联就已解决了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造成巨大麻烦的两个问题。1945年6月20日，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政府应邀派代表去莫斯科。莫洛托夫命令波兰应从切欣（6月中旬波军即已占领该地）撤军，并在该地区恢复1920年的边界。与此同时，俄国人劝使捷克斯洛伐克人把罗塞尼

^① 此处原文为James.E.Byrnes, 经查号,E.为Francis首字母F之误, 特予改正。
——译者

亚割让给苏联，确保全部乌克兰人从此并入斯大林帝国，并使红军得以控制喀尔巴阡山脉的一些要隘。只要认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将在政治上结合于一个共同的国家之中，这一领土调整方案从人种学观点来衡量似乎无可非议。托马什·马萨利克本人在1915年认为：一旦哈布斯堡君主国垮台，罗塞尼亚自然归于俄国，这是不言而喻的；在两次大战之间，该地区一直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包袱。然而，“外喀尔巴阡乌克兰”此时在战略上却殊为重要：它使苏联和匈牙利有了一条七十英里的共同边界。

1946年初夏，外长会议在与意大利、芬兰、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签订和约的问题上达成了有限的协议。从7月29日到10月15日，在巴黎召开有二十一个国家参加的和会，讨论和制定了这些和约的详细草案。苏联以及南斯拉夫、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代表团强烈反对一系列提案，特别是那些有可能使西方与东南欧的经济联系永久化的提案。草案最终提交外长会议于11月初在纽约召开的一次会议。莫洛托夫再次迟迟不予接受，企图要对方让步，拖延到一个月以后，像是会无止境地僵持下去。然而俄国人还是不愿什么事都悬而不决，终于就大多数事项有所让步。五项和约中有四项于1947年2月10日在巴黎签订；第五项——对意和约——也于四天后签字。

这些和约所规定的领土改变极少涉及中东欧。罗马尼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毕竟曾在战争的最后八个月中同苏联军队并肩作战。罗马尼亚在希特勒对苏联的战役中已牺牲五十万人，在越过喀尔巴阡山向多瑙河上游的进军中，又损失了十五万人。同样，保加利亚军队参加了托尔布欣在南斯拉夫发动的攻势，到1945年5月就已越过边境进入奥地利，与来自意大利战线的英军在克拉根福会师；有三万二千名保加利亚士兵在这些战斗中阵亡。和约正式规定恢复保加利亚1941年1月时的国界，从而使保加利亚人除保持两次

大战之间的领土丝毫未动之外，还得到了南多布罗加，这一地区是罗马尼亚在1940年9月割让的。罗马尼亚获得整个特兰西瓦尼亚，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却为苏联所保有。和约的安排对匈牙利十分不利。虽然它在1946年春派出强有力的代表团先后去莫斯科、伦敦和华盛顿，要求公正处理马扎尔人占绝大多数的特兰西瓦尼亚地区，和约的所有代表——除美国一国持有异议外——却都坚持按特里亚农条约所规定的边界，这条边界线在1945年苏联倡议停火时业已暂行恢复。匈牙利还被迫在多瑙河彼岸从布拉迪斯拉发割让一小块领土给捷克，但南斯拉夫人却满足于特里亚农边界，不想在巴兰尼亚三角地带或巴茨克绍地区扩张领土。他们的野心在别的地方。

294 从对意和约中受益的东欧国家仅有希腊和南斯拉夫，前者获得多德卡尼斯群岛，后者得到扎达尔、亚得里亚海上的一些意大利岛屿以及伊斯特拉半岛的大部分，包括里耶卡（阜姆）和普拉两个港口。关于的里雅斯特的归属问题在和约中未作决定。南斯拉夫原来希望得到这个大港口，因其内地居民绝大部分是斯洛文尼亚人。1945年5月初，当德军司令官向威尼托开来的新西兰师投降时，游击队员们正在的里雅斯特的市郊战斗。将近两个月南斯拉夫军队与英联邦部队之间关系异常紧张。但双方在6月间达成协议，城市本身及通往蒙法尔科内和威尼斯的铁路线由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管辖，而这一争议地区的南部地带则归南斯拉夫控制。对意和约确定的里雅斯特为“自由区”，但这种解决办法既不为南斯拉夫人、也不为意大利人所喜。和约建议的里雅斯特应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任命的一名人员管理，而在此之前，1945年6月建立的两个军事地带将继续存在。然而，安理会却始终未能就管理的里雅斯特的人选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意大利人与南斯拉夫人之间的摩擦持续了好几年，使港口贸易蒙受损失。1954年10月终于

达成协议：英美管辖地带交还意大利，南部地带则在分界线稍加调整后并入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的里雅斯特因而在地理上的地位与两次大战之间的阜姆相似，但南斯拉夫与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之间往日的那种紧张局势则不复存在。这一最终解决办法虽然不过是一种令人失望的实用主义的妥协，实际上也曾行得通。

的里雅斯特争端没有引起苏联外交家们特别强烈的反对，纵然，回顾起来有趣的是，甚至在1946年他们便已倾向于支持意大利而不支持南斯拉夫，这可能是为了取悦于影响日益增大的意大利共产党。苏联对欧洲地图最大的影响是在北部和多瑙河流域。在纸面上它对对芬和约中得到的好处最大，其中规定将佩萨莫地区割让给它，并答应苏联舰队在芬兰湾北部进口处的波卡拉租借一处海军基地。然而，归根结底，俄国人沿多瑙河获得的好处却有更持久的意义。由于确认比萨拉比亚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苏联成为沿河唯一的大国，得以控制多瑙河从林茨直到入海处的全部河上贸易。诚然，各项和约中列有保证通航自由以及多瑙河沿河各国待遇平等的条款，但战后十年的军事形势却使这些保证实际上毫无意义。次年，在贝尔格莱德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修订了多瑙河委员会的章程：凡属领土不与多瑙河接触的各国，一律不得参加本委员会，苏联称雄的地位于是巩固了下来。以上这些规定，连同停战协定以及各项和约规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应付给苏联的巨额赔款，其影响所及，莫斯科肯定将发号施令支配这区域的经济生活，谋求决定其对外贸易的性质和数量，一如希特勒时期德国的所作所为。

莫洛托夫终于接受了这些条约，似乎对西方稍有让步。每项和约中都包含着对有关国家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的保证。但是，很难设想远离该地区的各个国家如何确保这些义务得到履行；²⁹⁵而且，苏联和西方对这种种自由内涵的解释又全然不同。此外，虽然解决办法中规定同盟国军队撤离匈牙利、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

却又规定苏联可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保留驻军，藉以确保与奥地利的苏联管区的交通联络不致中断。1947年12月的第三星期，红军从保加利亚撤出占领部队；但鉴于外长会议商谈对奥地利的和平解决办法未有任何进展，苏联当局似乎将无限期地沿多瑙河保持一条军事通道的合法权利。由于在波兰也驻有苏联军队以保护与德国的苏联管区的交通联络，红军便得以在重新进行政治和经济调整的那些年代里继续昂首阔步地出现于东欧。唯独捷克斯洛伐克人的地位要比他们的近邻稍微愉快一些。1945年圣诞节全部外国军队撤离共和国：美国军队撤离波希米亚西部，苏联军队则撤离这个国家的其余各地；但除巴伐利亚以外，沿捷克斯洛伐克的所有边界上都驻扎着红军，因此，它在外交事务上的独立大都是徒然幻想而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共产主义在东欧任何一国向来不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对于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来说，它过于城市化，也过于教条；对于若干世纪以来已在教会和封建社会结构影响下形成其生活方式的简朴的村社来说，它则是过于复杂了。这些地区传统的各种激进政党，在形式上与其说是共产主义的政党，倒不如说是平均地权的政党；城市中的工人自然更倾向于社会民主党，而不是革命的社会主义。除了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领袖被公认为民族英雄以外，首要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是些身居异国、而无群众追随的人物（虽然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曾因1933年在莱比锡的国会纵火案审判中嘲弄纳粹分子而传奇般地誉满保加利亚）。不少次要人物在苏联度过许多岁月，由于接触不到本国的问题，他们考虑问题往往首先从特定的苏联利益出发。有些人，像匈牙利的拉科西，则如铁托后来所挖苦的，“叼着烟斗在事后飞回祖国，就这样地解放了他们的国家”，这种尖酸刻薄的弦外之音，或许

还包括季米特洛夫在内。其他一些人，例如波兰的贝鲁特曾参加过对纳粹作战，但却是在苏联最高统帅部的保护下跟随红军一道西进的。共产党人能在东欧任何一国政府机构中独揽大权以前，²⁹⁶必须首先建立起政党机器，踩着已经威望扫地的旧日各政治组织代表人物的肩膀爬上权力的宝座。在罗马尼亚、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出现过联合内阁，其中有共产党人以及所有中间偏左的政党的代表。甚至南斯拉夫1945年的临时政府，起先也还有一个前克罗地亚农民党人以及南斯拉夫民主党的战前领导人，虽然两人就任不到六个月就都辞了职。在其他国家中，这种联合则维持得长久一些。

苏联对保加利亚的控制最为牢固。其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祖国阵线联合政府的性质，二是季米特洛夫的个性，三是保加利亚人甘愿接受他们在苏联的斯拉夫同族深感满意的那种统治方式。祖国阵线建立后，有两年多时间不是由共产党公开支配的。祖国阵线在1944年9月的维尔切夫政变中建成，1946年秋季以前一直由基蒙·格奥尔基耶夫担任领导，此人曾于1934至1935年担任“环节”联盟政府的首相。农民联盟——这个政党因为根据传统始终由农民控制，故在保加利亚仍有大量的追随者——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直到1945年夏季都支持祖国阵线。共产党人企图控制警察，并抑制一切政治批评，致使农民联盟和社会民主党的一些重要发言人与祖国阵线决裂；但在这两个政党中，仍有一些次要人物准备在祖国阵线政府中继续为格奥尔基耶夫效劳。其中一些人不过是机会主义的趋炎附势之徒。

1945年11月8日，季米特洛夫从莫斯科飞回索非亚，这恰好是在延期很久才举行的普选之前十二天。他受到热烈欢迎，但却明智地决定，在对被迫离开二十二载之久的祖国的政治潮流熟悉之前暂不出头露面。他的回国使祖国阵线中把他看作保加利亚的



列宁的共产党人一翼的士气大振，但这件事对普选究竟带来什么影响，谁也说不清楚。由于反对党正式声明一致拒绝参加竞选，祖国阵线最后宣布有四分之三的选民终于投票支持单独由政府提出的候选名单。英、美两国的观察员不习惯于巴尔干各国特有的这种选举惯例，抗议说：这次选举之前采取了恫吓手段，选举之后又公然在选举结果上弄虚作假。他们也许说对了，可是丝毫不起作用。祖国阵线认为自己深得民心，开始着手清洗旧政权的所有领导人物。前摄政王西里耳亲王、菲洛夫教授和米霍夫将军均已于 298 审判后处决；此时，好几百名高级官员也同遭厄运。政府可能是惧怕发生军事暴动，开始搜罗反对维尔切夫（当时任陆军大臣）的证据；但他在格奥尔基耶夫的保护下得以幸免，并于 1946 年夏出任保加利亚驻伯尔尼公使，这是把他驱逐出国的一种考虑周到的过渡办法。⁴1946 年夏季举行的公民投票表明，百分之九十二的保加利亚人民反对君主制，尤其是反对科堡王朝。尚在童年的国王西美昂随其母离开了这个国家；9 月 15 日，保加利亚正式宣布为“人民共和国”。

这些急剧的政治变革是在比较审慎的土地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祖国阵线早期的土地政策，在很多方面是基于二十五年前斯塔姆博利斯基所倡导的变革。它主张通过合作化而不是通过集体化来发展农业。“劳动农民”可以保留其土地所有权，只要面积不超过四十八英亩。东正教教会也获准保有其产业的很大一部分，这些产业分属于合作精神令人称羨的宗教机构，亦即修道院。然而，尽管祖国阵线的发言人煞费苦心地强调，农民即使加入了合作社也仍然是自己土地的所有者，但是在许多农民看来，改革似乎有些过分超前，政府不得不在农村中放慢改革的步伐。格奥尔基耶夫政府采取的种种措施得民心的程度究竟如何，难以估计。1946 年 10 月的选举并不能真正说明问题，因为在竞选运动中通常采取干

涉的行动,包括逮捕乃至监禁农民党和社会民主党的许多政治家。虽然祖国阵线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同盟者在四百六十五席中获得了三百六十四席,季米特洛夫本人事后承认有一百万选民没有投祖国阵线候选人的票。祖国阵线政府随即改组,季米特洛夫任总理,共产党人掌握九个最重要的职位。及至1947年初,季米特洛夫如同四年前的博里斯一样,俨然成为保加利亚的独裁者。

共产党人花了较长的时间才完全控制罗马尼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国王米哈伊尔的有力抵制。他在1944年8月带头推翻两个安东尼斯库的统治,从而深受举国上下的爱戴;苏联当局一度对他颇为赞许,甚至授予胜利勋章。在王室政变之后,政府由这位国王任命的将军们领导了七个月,他们属于众所周知的一个反德而又毫不同情共产主义的集团。只是到了1945年3月,米哈伊尔迫于苏联副外长维辛斯基的压力,才任命了一个“民族民主阵线”的联合政府;又过二年半,这位国王才对共产党人让步,使他们获得了完全胜利。

民族民主阵线是由持有异议的农民党人与莫斯科培训的共产党人杂糅而成的。1944至1945年冬,政府的权威尚未达到比较边远的农业地区,那里的农民开始支持“农民阵线”,这是1933年早在特兰西瓦尼亚南部组织起来的左翼农民运动,领导人是彼特鲁·格罗查,他曾于1920年和1926年两度在阿维雷斯库的政府中供职。各工业中心则支持共产党人安娜·波克和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安娜·波克是个五十岁刚出头的漂亮犹太女人,她在苏联电台担任主要对罗广播员之前,曾断断续续蹲过十五年监狱。乔治乌·德治是个“土生土长”的共产党人,不曾在莫斯科接受过思想训练,用连字符连接的姓,证明他曾在德治城坐牢多年。他负责各工厂共产党人组织网的工作,远不像安娜·波克那样引人注目,后来他自称在1944年8月政变中有功,但我们所掌握的事实没有

证实这一点。在波克和乔治乌-德治背后的是强有力而却不为人知的埃米尔·波德纳拉希，他是个具有乌克兰和德意志混合血统的人物。他原先是罗马尼亚军队中的军官，在去斯大林格勒途中几乎像圣保罗改宗那样转而信仰共产主义，成为苏联公民。嗣后，他又赶在红军之前返回罗马尼亚，建立和控制共产党的半军事性组织。他在政治活动中生命力很强，到1969年还仍然是共产党主席团成员之一，并兼任国务委员会副主席。

米哈伊尔国王任命格罗查为民族民主阵线政府的首相，他任职七年多。共产党人起先只担任三个大臣职务：即内务大臣、司法大臣和国民经济大臣（此职由乔治乌-德治担任）。令人颇感惊奇的是外交大臣却由塔塔列斯库担任，此人曾在三十年代领导过自由党较为反动的一翼，并从1933年12月到1937年12月担任卡罗尔国王的首相。格罗查和米哈伊尔国王之间关系十分紧张，以致国王竟然有好几个月离开布加勒斯特，并拒绝对政府的任何措施表示同意。最重要的改革是颁布一项法令，规定所有面积超过一百二十英亩的私有土地一律重新分配，这法令是在这位国王开始“罢工”前实施的。1946年1月，格罗查让国家农民党和自由主义派人士中桀骜不驯的那一翼各派一名代表参加政府，国王才重理政事，英美两国也在外交上承认罗马尼亚政府。 300

格罗查政府鄙视并在某种程度上惧怕罗马尼亚三位最著名的老领导人。曼纽、米哈拉凯和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发现他们的活动受到了成帮结伙高呼口号的歹徒的阻碍，不管这些家伙在政治上效忠于谁，却几乎与铁卫军毫无区别（也许他们前几年就是铁卫军）。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认为可以根据1946年11月的选举结果公正地估计出人民大众的情绪。“民族民主阵线”获得三百四十八席，曼纽和米哈拉凯的农民党获得三十二席，布勒蒂亚努牌号的自由主义派人士则获得三席。一个匈牙利少数民族的政党获得另

外的二十九席，该党倾向于共产主义，但在法律上并未参加联合阵线。这次选举的重要意义在于民族民主阵线候选人所获票数的分配情况：社会民主党人得八十一票，塔塔列斯库领导的自由党人得七十二票，格罗查的农民党人得七十票，共产党人得六十七票。在1946年至1947年的罗马尼亚议会中，每六个议员中仅有一名是共产党人，但格罗查和他的大臣们都不过是共产党的傀儡而已。

曼纽本人好多年来一直是个活跃的反派，从在布达佩斯议会中引诱伊什特万·蒂萨上圈套的那些日子直到苏联战役期间向“首领”提出批评性的备忘录。他丝毫不把格罗查政府的威胁放在眼里，对其名义上的总理极其轻蔑。1946年5月两个安东内斯库作为战犯受审时，曼纽在提供证词后竟坚持要与前元帅和前外交大臣分别握手；这种姿态并不为民族民主阵线所欣赏。两个安东内斯库都被判处死刑枪决。曼纽在政治上继续活跃了一年。1947年6月，米哈拉凯被逮捕，并被指控犯有阴谋作乱罪；7月，曼纽及其国家农民党约一百名成员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有证据证明该党的一些拥护者曾与美国特务轻率地谈论对共产主义进行武装抵抗，尽管曼纽和米哈拉凯都没有直接牵连在内，却已有人制定计划准备把他们二人空运出罗马尼亚。1947年11月，他们二人受审，主持审讯的法官在安东内斯库时期曾任监狱和拘留营的官员。曼纽庄严地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格罗查政府非法，因为它破坏了和约中保障政治自由的那些条款。曼纽和米哈拉凯均被判处终身单独监禁。他们被定罪前七个星期，在索非亚以捏造的叛国罪处决了保加利亚农民领袖尼古拉·佩特科夫。这两项判决震动了非共产党世界的舆论界。这种嘲弄人权的审判以后曾多次发生，成为战后十年的一种司空见惯的特色。

民族民主阵线的共产党成员以逮捕曼纽和米哈拉凯作为加紧

整饬“国内秩序”的一种手段。国家农民党被解散，塔塔列斯库经过劝说辞去外交大臣职务而由安娜·波克继任(她是世界上第一个担任这种职务的妇女)。米哈伊尔国王获准在曼纽的审判结束后立即离开罗马尼亚赴伦敦参加伊丽莎白公主的婚礼，或许是希望他从此不再回来。他与波旁-帕尔马家族的安妮公主订婚后返回布加勒斯特，发现政府不批准他在罗马尼亚举行婚礼(因为这将会进一步提高这位二十六岁的君主的声望)，面对让他退位的要求，他于1947年12月30日正式签署了退位诏书。在嗣后的流放中，他坚持认为退位诏书无效，因为他是被迫签署的。

1948年春，罗马尼亚成为“人民共和国”，通过了一部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样板的宪法。统治国家的联合政府更改旧称“民族民主阵线”为“人民民主阵线”。共产党人在政府中所占据的重要职位也增多了。波德纳拉希将军就任国防部长，乔治乌-德治则主管长期经济计划，这又是一项苏联舶来品。

共产党人为在匈牙利和波兰确立其控制所用的方法，基本上与他们在上述两个巴尔干战败国接管政权的手法相似，所不同的只是这两个国家都没有王室人员需要遣送出境这样一种无关紧要的情节。1946年2月1日在布达佩斯议会大厦宣布成立共和国，使匈牙利成为君主国的悖时要求于是戛然而止；实际上这种要求在1945年3月27日就已告终止，当时，“圣斯蒂芬的神圣王冠”已由其卫队长帕伊塔什上校隆重护送运出奥地利边境，最终交给美军第三军监管。波兰先是自称为1918年共和国直接的、合法的继续，但为了赶时髦，又在1952年7月改名为“波兰人民共和国”。

1944年12月在苏联监护下成立于德布勒森并在四个月后又迁往布达佩斯的“民主匈牙利临时国民政府”，是一个十分保守的机

302 构。它以米克洛什·贝洛将军为总理，此人仅仅一年前还是霍尔蒂的军机大臣，而且是这位被推翻的摄政王的私友。前总参谋长、霍尔蒂的另一个亲信人物弗夫什·亚诺什将军当上了国防部长；泰莱基·盖佐伯爵则任宗教事务和教育部长。这届政府的其他成员中再没有如此杰出的人物，他们即使在所代表的政党里也都是无名之辈。领导小农党的前加尔文派教长蒂尔迪·佐尔坦曾被考虑为入阁成员，但又遭否决；因而代表这些年来观点较之萧条时期更为进步的小农党参加政府的，只是两个名不见经传的代言人。截至此时，莫斯科的匈牙利共产党人中最负盛名的拉科西·马加什尚未露面，但他的副手格罗·埃诺却在组织这届政府中起到了左右人选的作用，尽管他自己谢绝入阁。有两名共产党人参加政府：一人担任贸易部长，是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另一个担任农业部长的，却名声出众，尤其是格罗和拉科西所未料想到的。此人是土壤保持专家，和蔼可亲，身材敦实，戴着一副夹鼻眼镜，神态活像漫画中一位处事认真的欧洲大陆学者。他名叫纳吉·伊姆雷，曾和铁托一样被沙皇军队俘虏，并作为刚刚释放的战俘而目睹列宁所领导的那场革命；他也将 在 1956 年度过他的既是胜利、又是悲剧的那一个月。

纳吉·伊姆雷负责制定临时政府最重要的一项法令，即 1945 年 3 月颁布并立即于获得解放的领土上实施的土地改革法。庞大的匈牙利庄园和广袤的修道院领地被分成一份份地块，大多数面积不超过一百约克^①（即一百四十英亩）。这一改革直到 1946 年秋季才完成，当时估计在十八个月内有六十四万二千人获得了占有土地的权利。临时政府还保证尊重民主权利和私人财产，虽然也曾指出，最终将制定计划对主要工业实行国有化。

① 原文是 yoke。——译者

这只是小农党的纲领，而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1945年11月举行了真正自由的选举（只把右翼的反动政党排除在外）；毫不奇怪，小农党人在议会中获得了百分之六十的席位，而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仅各获百分之十七。选举的结果临时政府自然必须更换。但是由什么样的政府取而代之呢？接着出现了一场特别重大的政治危机。匈牙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首脑伏罗希洛夫元帅无意让共产党人被推到议会反对党的地位。他甚至在这次选举之前就已坚持仍然必须是组成一个联合政府；但他也准备把内阁的一半 303 席位分给获胜的小农党人。蒂尔迪·佐尔坦任总理，拉科西和社会党领袖萨卡希奇二人任副总理。并确保共产党人对警察的控制，因为纳吉·伊姆雷成为内务部长。

1945年的匈牙利大选给了俄国人两大教训，这对东欧所有国家都有普遍的重要意义：土地改革为平均地权政策或小农政策，而不是为教条的农业集体化的共产主义赢得了支持；真正的自由选举使得人们有对“解放者”以及曾追随其后的任何马克思主义者提出抗议的机会。只要东欧各国处于苏联的军事控制之下，其中任何一国就再也不能自由选举。

不到两年，匈牙利的小农党已经从一个富有进取心和主动精神的独立运动退化为仅仅是共产党控制的那个阵线的附庸。蒂尔迪本人只不过担任了三个月的总理，因为共和国一宣布成立他就当选为总统。新政府继续以小农党人纳吉·费伦茨（他与内务部长共产党人纳吉·伊姆雷并非亲属）为首。与蒂尔迪和霍尔蒂年代的小农党大多数代言人不同，纳吉·费伦茨本人就是他自称所代表的阶级中的一员。他不打算向不可理喻的苏联压力卑躬屈节，也无意于接受拉科西指令奉行的政策。但他却也知道自己的追随者有何缺点和长处；1946年3月，当一个老资格的小农党议员舒伊奥克·戴西代尔发表了攻击斯洛伐克人的讲话时，苏联指责小

农党的一翼是“沙文修正主义”，这位总理准备予以接受这一指责。舒伊奥克和另外二十一名议员被开除出党，但却继续留任议员；他们既在议会里，也在共产党许可的范围内在全国发动了一场“自由运动”，从而在其后的一年中引起公众的极大注意。

拉科西利用舒伊奥克事件，使一个更热情的革命者劳伊克·拉斯洛接替纳吉·伊姆雷的内务部长职务。（劳伊克先是在匈牙利某大学，后又在西班牙的第十三国际纵队，而不是在莫斯科的精修学校形成了他的政治信仰。）会同彼得·高博尔组织了穷凶极恶而有虐待狂的安全警察即“阿弗欧”^①的正是劳伊克，而三年后他自己竟也成了这个组织的牺牲品。但在1946年的其余时间和1947年大半年中，“阿弗欧”却集中力量搞臭小农党。它有个得力的帮手，就是国防部组织的一支边防警察特种部队，1946年春，这支部队也首次归共产党控制。4月，斯维里多夫将军继伏罗希洛夫任管制委员会首脑，他善于发现不满情绪的潜伏中心，并要求纳吉·费伦茨采取行动予以对付。就这样，“危险的反动巢穴”童子军运动被解散，罗马天主教青年运动也是同样的下场。有几次纳吉拒不受命，但他答应对匈牙利的总主教明曾蒂红衣主教提出警告：宗教界人士必须停止对红军和匈牙利解放者的攻击。这是风暴欲来的信号，因为明曾蒂曾被萨洛希手下人逮捕，当时他坚持穿上一身法衣入狱。作为反纳粹主教，他在1946年10月就任总主教时曾经受到临时政府甚至共产党发言人的赞美。

对小农党的主要打击是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上一年的最后几星期中，共产党控制的安全机构发现了民族主义分子的一起阴谋活动，断言其目的是复辟霍尔蒂政权，想恢复到1944年3月德国军队占领布达佩斯以前的局面。这一阴谋的军事领导人是

^① 原文是AVO，意即匈牙利保安警察。——译者

韦赖斯·洛约什将军，在文职的同谋中有些是小农党人。“阿弗欧”开始调查几位议员的活动，对纳吉·费伦茨和蒂尔迪总统的一再抗议都置若罔闻；2月26日俄国人也插手干预，宣称身为小农党总书记而又是总理的密友和同事的科瓦奇·贝洛曾刺探过红军设施的情况。韦赖斯将军受审讯达七星期之久，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科瓦奇·贝洛虽未被法庭传讯，其处境并无区别，两人都被放逐到西伯利亚，长时期被认为已经死去；然而八年之后，两人都出现在苏联的一所集中营里，在1956年的十月骚乱中，又都出现于布达佩斯。

纳吉·费伦茨本人健康欠佳，又因朋友的厄运而深受震惊，便去瑞士度假。他在国外逗留期间，据共产党人宣称，他们掌握一些证据，可以表明他也与一起阴谋有牵连。没有返回布达佩斯，他就辞职了。一位和蔼可亲、无足轻重的人物接替了他，因此，仍然可以说总理是个非共产党人。但所有实权现已集于拉科西一身。1947年8月宣布实行按苏联模式制定的三年计划。接着举行普选，拿西方的标准来衡量，其欺诈性和压迫性不亚于匈牙利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选举。小农党四分五裂，形成若干派系。次年，共产党人所需要做的只是两件事：唆使这些派系自相攻击，同时使剩余的社会民主党人与莫斯科训练的马克思主义者结成死党。1948年1月，共产党和社会党融合成为“统一工人党”；七个月后，蒂尔迪总统被迫引退，让位于新党的主席萨卡希奇。匈牙利成为“人民共和

30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波兰的共产党人及其政治盟友们组织得比东欧其他任何国家都更为强大。然而，他们决非深得人心。

莫斯科提名的领导人贝鲁特(从1947年2月开始,正式成为共和国总统)是个无名之辈,没有莫斯科训练的其他共产党人如保加利亚的季米特洛夫或者甚至匈牙利的拉科西那种传奇般的声望。曾在国内参加抵抗斗争的哥穆尔卡,则作为战前的工联主义者和反德的左翼爱国者而享有一定的名声;他的朋友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在波兰的游击队指挥员中战功最为卓著,也颇有声誉。社会党人则较知名,特别是约瑟夫·西伦凯维兹,1939年前他曾在克拉科夫的大学生中开展过广泛的活动,逃出奥斯威辛和茅特豪森的集中营之后,于1945年7月成为社会党总书记。而在国内真正受到拥戴的唯一人物则是米科拉伊奇克,他从伦敦回国后就在“民族团结政府”中任副总理。年事已高的农民党创建人维托斯1945年10月去世后,他成为该党的领袖。米科拉伊奇克的同胞们深信,他将为农民参加管理国家找到一种波兰的特殊解决方式,即“西方”议会传统和“东方”极权主义之间的折衷;在他成为农民党领袖的三个月后,该党宣称:登记的党员已达六十万人,这是人们对他寄予信任的突出的标志。值得注意的是,哥穆尔卡居然会早在1945年7月就把米科拉伊奇克形容成为“所有反民主分子的代表,民主和苏联的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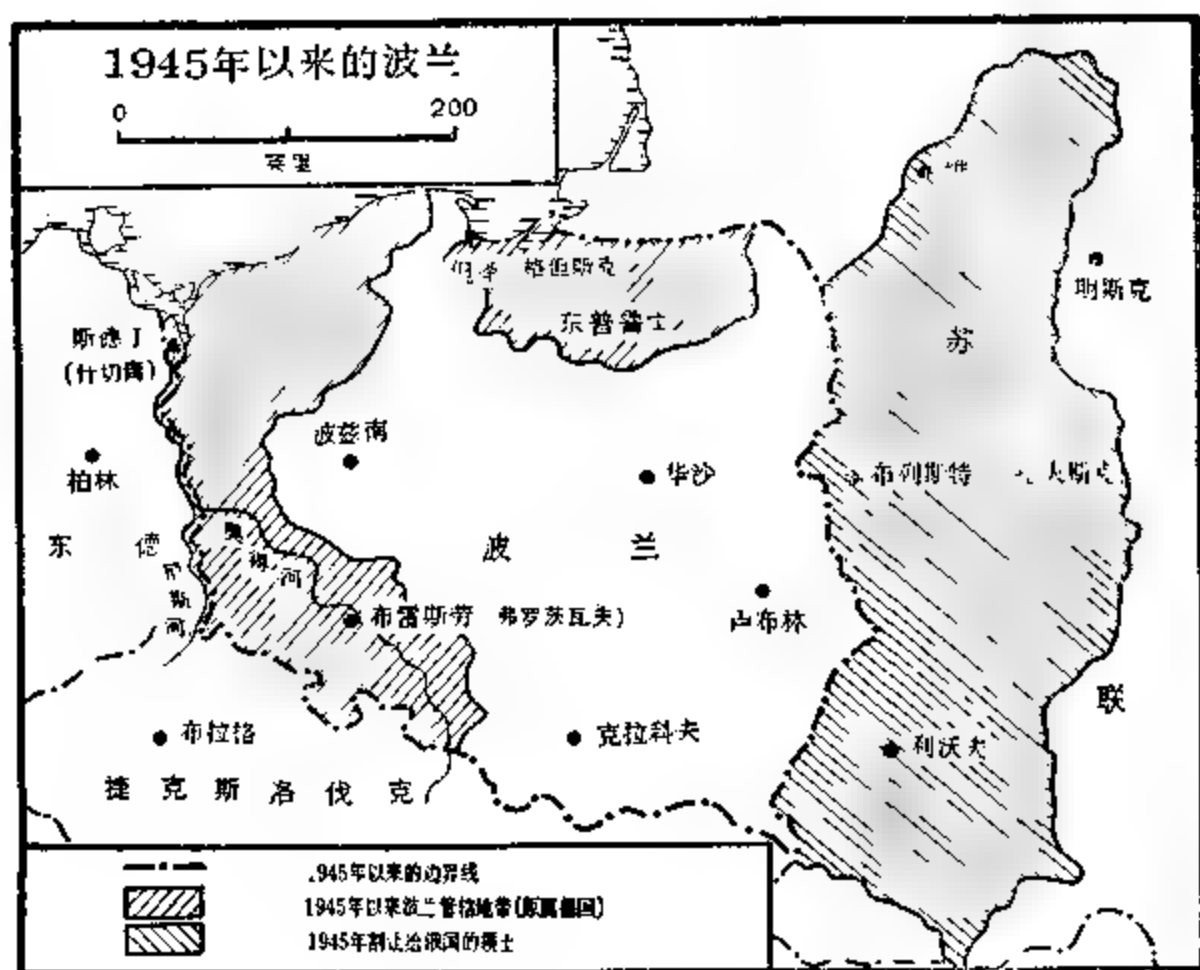
然而到1947年底,米科拉伊奇克又逃亡国外,波兰像多瑙河流域的那些共和国一样,受到共产党的控制;苏军司令部与“波兰工人党”之间的密切联系,确保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掌握了国内安全的一切手段,从而大大地削弱了农民党的活动。民族团结政府的成员中只有六名共产党(工人党)党员,但和匈牙利一样,他们都身居要职。分管国内事务的是两个部:公共行政部和公安部。公共行政部长是个农民党党员,其职责仅限于行政机构的那些例行公事。原先德国领土的有关事务,单独另设一“收复领土部”(原文如此)来处理。哥穆尔卡亲自抓这些事务,由于他大权在握,共产党

得以控制西部地区，与英国人移居新大陆极盛时期坦慕尼协会^①对纽约市的统治毫无不同之处。公安部长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凯维奇是在苏联受过训练的共产党人，直到1954年他始终控制着一支人数比军队还多的武装公安军团。

民族团结政府执行了卢布林委员会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没收大庄园，把土地重新分配给农民。这项措施进一步推动了在两次大战之间开始的土地改革；但暂时尚未触及教会的土地，因为政府不愿与有影响的天主教教会统治集团发生冲突。1946年1月，凡雇工超过四十人的工业一律收归国有；但又过了十二个月，波兰才通过三年计划以提高农业和工业产量，而苏联式的长期计划直到1950年7月才开始实行，此时，波兰和苏联的经济体系已经紧密相连。1945年后几个月和1946年上半年，政府谋求由米科拉伊奇克居间交涉，从美国获得经济援助以进行战后恢复工作；但因波兰没有执行雅尔塔宣言和波茨坦宣言，到1946年仲夏美国政府便撤回一切支援。

波茨坦会议期间，波兰临时政府曾保证在一年内举行自由选举。但它却拖延到1947年1月方才举行，据说是因为新边界引起了国内居民的迁徙，一时不便于选举；即使举行了选举，其选举程序也使西方观察家们十分震惊，以致提出抗议。四个月之前通过的一项选举法，使西部的前德国领域内的代表名额比例较高，在仁慈的哥穆尔卡老板看来，这可能是反映当地居民对工人党感恩戴德。为使农民党威望扫地和分崩离析用尽了一切手段：从取消代表候选人资格直到策划审讯以证明米科拉伊奇克与英美情报机关有联系。米科拉伊奇克事后估计，在竞选期间，他的党员中有十万人入狱。共产党—社会党联合竞选团获得三百九十四席，农民党

^① 坦慕尼协会(Tammany Society)是美国民主党在纽约市的一个强有力的政治组织，以老虎为标志，成立于1789年。——译者



二十八席，同情政府的各个小集团仅共得二十二席。社会党人西伦凯维兹在2月任总理，一部基本上属于苏联式的临时宪法也在选举刚过一个月后颁布。米科拉伊奇克不堪忍受跟踪追捕和辱骂，决定在丧失发言权以前离开本国。1947年10月，为了避免落得佩特科夫、科瓦奇和曼纽的同样下场，他逃往西方。波兰的社会党人独立于共产党之外的现象又继续了十四个月，1948年12月，两党联合为“统一工人党”，从此一直统治着波兰。

复兴后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的局势与南北诸邻邦都迥然不同。红军在布拉格只呆了七个月，一旦解决切欣问题并承认罗塞尼亚的割让，国内事务便不再受到苏联的军事干涉。几乎所有的政治领袖都曾参加过1938年前共和国的议会活动。不仅名声大得多的“资产阶级”代言人贝奈斯和扬·马萨利克——那位总统兼解放

者的儿子，1940年7月成了伦敦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是如此，主要的共产党人哥特瓦尔德、西罗基和萨波托茨基也是如此。1945年10月联合政府宣布：将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国有化，并进行广泛的土地改革。这些措施与其说是对左派的让步，倒不如说是贝奈斯及其同僚们经过流亡岁月中的冷静思考以后作出的决策。捷克的工农业由于德国人的占领而遭到破坏以及斯洛伐克的种种事态发展之后，以上各项措施是被看作合乎逻辑的步骤而采取的。

1946年5月的议会选举，通过完全自由的竞选运动和严格的³⁰⁸不记名投票选举，在议会的三百个席位中共产党获得一百一十四席，占选票的百分之三十八，国家社会党（贝奈斯—马萨利克的政党）获得百分之十八，人民党（罗马天主教徒的政党）获得百分之十六，社会民主党则获得百分之十三。在斯洛伐克，拥护贝奈斯—马萨利克传统的人几乎寥寥无几，一个斯洛伐克民主党获得选票的百分之六十一；共产党人则获得百分之三十，这对以农业为主的地区来说是高得异乎寻常的数字。总统及时召见共产党领袖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邀请他组织联合政府。他的内阁共有二十六名部长，其中只有九个是共产党人。扬·马萨利克留任外交部长，但共产党人占据两个要职：内务部长和情报部长。

1947年夏季以前，联合政府一直工作得卓有成效。捷克斯洛伐克在外交方面倾向于支持苏联，而在国内则有真正的议会自由以及生动活泼而勇于批评的新闻界。最严重的国内危机是关于前斯洛伐克傀儡总统蒂索阁下的命运。1947年春，他因涉嫌叛国受审，并被证明有罪。共产党人坚持予以处决，斯洛伐克民主党人和人民党人却都主张宽大处理，因为他既是斯洛伐克人，又是教士。然而，贝奈斯拒绝干预法律，蒂索遂被处绞刑。斯洛伐克仍存在着广泛的不满情绪，在布拉迪斯拉发，旧日对捷克人统治及布拉格暴政的怨声又起，而喀尔巴阡山麓天主教势力强大的区域更是怨声

載道。

1947年6月4日，美国国务卿乔治·卡·马歇尔提出他那著名的美国“改善世界经济状况的援助”计划。7月在巴黎安排了一次会议，审议此时已称为马歇尔援助计划所应采取的形式。波兰和匈牙利先表示愿意参加会议，后又拒不出席。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接受派遣代表赴巴黎的邀请，于7月7日宣布这一决定。次日，斯大林对当时恰好在莫斯科而其成员中有哥特瓦尔德和扬·马萨利克的一个捷克代表团说，倘若捷克斯洛伐克参加马歇尔计划“有可能被解释为对该国与苏联之间的友好关系的一次打击”。7月10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正式撤销三天前的决定；马歇尔援助将仅仅是西欧的复兴方案。

309 有些评论家认为，这一事件促使斯大林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全盘纳入苏联体系，这一论点在胡贝尔特·里普卡博士的论述中得到强有力的支持。他是当时布拉格的外贸部长，贝奈斯的热心拥护者之一。然而，苏联对捷克人施加的压力骤然加剧还有其他原因。由于欧洲分裂为互相猜疑的两大军事阵营，捷克斯洛伐克在地理上处于由西向东的轴线位置，因此，在战略上就有无比的重要性：它是美军驻防巴伐利亚与喀尔巴阡—乌克兰之间一条长达三百七十英里的走廊，正好把维斯杜拉河畔的红军与驻守多瑙河的红军分隔开了。即使没有马歇尔计划，捷克斯洛伐克在其民主宪法的指引下，也可能不久就会加强它与西方的联系；因为在1948年5月大选期间，民众对共产党的个别首脑的不满情绪日益加剧，哥特瓦尔德的党这一次不可能再得到多数票。然而，哥特瓦尔德却有一个有利条件：他的党内同僚诺塞克是内务部长，这一职务使他能把可信赖的“进步”官员塞满警界，从而发现种种反民主阴谋，尤其是在斯洛伐克。

1948年2月的危机是由哥特瓦尔德内阁的非共产党阁员挑

起的。他们都抗议诺塞克设法往警界塞人的做法：由于前几星期内一连撤换八名高级警官在布拉格激起了极大义愤，2月12日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大家要求他切莫再解除忠于国家的有经验官员的职务。诺塞克和哥特瓦尔德对这些抗议都置之不理；2月21日，政府中所有属于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成员全部辞职。然而，社会党人尽管早些时候也曾一同对诺塞克的行为提出抗议，却仍留在政府里。有了他们支持，哥特瓦尔德在议会中依旧拥有多数。

有一星期，布拉格似乎即将爆发革命。工人民兵纷纷离开工厂，涌向街头，行动委员会接管了政府办公大楼和大学院系。国防部长斯沃博达将军没有采取行动。他是个无党派人士，他的职责是保持军队中立，除非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命令军队开上街头维持秩序。斯沃博达履行了他的职责；贝奈斯总统恪守宪法条文，也忠于职守。他曾希望在共产党人和企图脱离政府的议员之间进行调解，但哥特瓦尔德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根本不想妥协。虽然有一名苏联的高级使者来到布拉格，但是没有红军部队开进这个国家。哥特瓦尔德有民兵和诺塞克的警察支持；共产党人已经确保把无线电台和印刷厂都控制在他们手中。几经劝说后，贝奈斯决定留任哥特瓦尔德为新的联合政府总理，在这届政府中所有要职都落入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手中，其他政党各有一名成员参加政府，³¹⁰但不是由他们本党领袖、而是由哥特瓦尔德指定的。作为一种明显的让步，扬·马萨利克被邀请留任外交部长；他之所以接受这一职务，无疑是希望自己能够使他父亲创建的国家推迟一些时间变为苏联的属国。1948年2月25日，哥特瓦尔德的新政府就职；3月10日，正是两星期之后，人们发现扬·马萨利克死在切尔宁宫即外交部大厦的院子里。他究竟是被谋害致死，还是发现自己在一群狂热分子和趋炎附势者组成的政务会中独持异议，孤立无援，

遂愤然自杀，一直无从确定。

5月间，按照宪法规定举行大选，却没有采取民主的方法。没有一个反对党的候选人：投票者只能从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中挑选产生的官方名单中决定取舍。哥特瓦尔德获得惊人的胜利，不管是真是假：百分之九十的捷克人和百分之八十六的斯洛伐克人投了赞成票。这对贝奈斯未免太过分了。此时他已经病魔缠身，但在6月6日辞职时还是向继任者哥特瓦尔德表明，他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离开赫拉德欣堡的。之后不到三个月他便去世，人们对他的深切怀念却被这个国家的一班新统治者嗤之以鼻。

哥特瓦尔德成为总统后，总理由安托宁·萨波托茨基继任，他是捷克斯洛伐克总工会的共产党主席，工会拥有很大势力，会员人数比共产党员还多。最著名的斯洛伐克共产党人弗拉吉米尔·克里门蒂斯成为外交部长。共和国的政治按司空见惯的形式发展。从大学和文职人员中清洗了“反动分子”，教会遭到辱骂和恫吓，强迫劳动营也作为对持有错误政治观点者的改造机构建立了起来。1949年1月宣布了五年计划，重点为实现重工业化和建立与苏联更密切的联系。尽管未驻有苏联军队，捷克斯洛伐克同她北面和南面的邻邦一样紧紧地束缚在苏联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之中，而她的人民则继续享有较高的生活水准，也比较有见识。但经受了极大苦难而在1945年春重新赢得的独立，不到三年便被捷克的工人们几乎是漫不经心地抛弃了。

311 在英国人和美国人看来，大战结束后的三年里南斯拉夫在所有的共产党国家中似乎是苏联最可靠的盟友。在国际会议和联合国的无数场合，南斯拉夫人公开支持苏联的政策，他们所使用的词语，经常比任何苏联代表在一本正经持否定态度的莫洛托夫时代所使用的言语还要过分和偏激些。例如1947年夏马歇尔计划一

经提出，南斯拉夫人就予以痛斥，其愤怒之强烈一如 16 世纪的新教徒被邀去接待耶稣会布道团。同年 9 月，各国共产党的一次会议宣布成立“共产党情报局”，这个新机构的总部也似乎自然而然地应设在贝尔格莱德；因为共产党情报局的宗旨是对各人民民主国家进行教育，使它们在思考问题与处理事务时都与苏联保持一种“具有兄弟般友爱的同志式的团结精神”。既然这就是对它们提出的任务要求，那末在 1947 年就不可能有比铁托的南斯拉夫更好的样板了。

南斯拉夫人在 1945 年底以前就已经完成了由党来创建一个铁板一块的国家机构的大部分阶段，比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都提前了两年多。战争的环境使游击队员及其共产党政治委员会控制了民族解放阵线，这个组织在 1945 年 8 月更名为“人民阵线”。共产党与各“资产阶级”政党名义上的合作为时短暂：1945 年 9 月舒巴希奇就退出了政府，与此同时，其他政治集团的代表也纷纷退出（例外的是人民农民党的领袖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他继续支持铁托直至 1946 年 7 月为止）。1945 年 11 月的选举表明，百分之九十点五的选民赞同单一的“人民阵线”^① 候选人名单。新议会于这月月底召开会议，在作出亚伊采各项决议的二周年纪念日宣布南斯拉夫为“联邦人民共和国”。伊沃·里巴尔当选为总统。1946 年 1 月开始实施的新宪法，强调共和国的联邦性质，并包含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各项基本原则的条款。

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机构的组织者是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位声名卓著的塞尔维亚游击队的领导人。秘密政治警察及其间谍情报人员网，在工作效率上超过了兰科维奇本人曾受其折磨的战前安全机构。1946 年 3 月，他们在波斯尼亚东北部的群山中追踪

^① 此处原文为“National Front”，据上文并查考有关资料，应为“People's Front”之误，译时已予更正。——译者

擒拿了“切特尼克”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他被控告集结军队反对游击队并犯有战争罪行。6月间，共产主义制度的另外二十三个敌人与米哈伊洛维奇一同受审；包括米哈伊洛维奇在内的十一名被告被判处死刑。这件事在英国和美国激起了抗议，虽然米哈伊洛维奇本人未必指望有任何其他下场，而以听天由命的勇气来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他在7月17日被枪决。两个月后，安全警察逮捕了克罗地亚罗马天主教会的首领斯特皮纳茨大主教。他被控曾与“乌斯塔沙”分子狼狈为奸，判处十六年徒刑（他在1951年获释，条件是只当乡村教士，不得复任大主教）。他是被东欧共产党政府监禁的第一位年高而身居教会要职的人物。外国观察家中有这种感觉：斯特皮纳茨之所以被判刑，并非因为他战时曾与帕韦利奇联系，而是他公开谴责南斯拉夫当局侵犯罗马天主教会在教育方面的传统权利和没收教会财产的做法。南斯拉夫马克思主义者反对教权主义的斗争精神，远较其他东欧共和国更加放肆。南斯拉夫党又一次证明了它那高度教条主义的正统观念。

然而，按照斯大林的观点，南斯拉夫共产党人所享有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却太多了。铁托与其他共产党领袖相比，有两大优越条件：一是他受到人民真正的拥戴；一是他的国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因为一则南斯拉夫在战略上对苏联有极大价值，一则漫长的亚得里亚海岸线也确保这个共和国无论在何处也不受苏联的钳制，不会像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那样地都被牢牢地夹在苏联的老虎钳里。铁托可以决定自己对待孤立的阿尔巴尼亚的政策（那里的抵抗运动领袖恩维尔·霍查已在1945年11月建立共产党政府），也可以决定他要给予希腊共产党人——他们在1946年夏开始发动一场内战，反对君主政体复辟——援助的方式和规模。他相信自己也能与季米特洛夫在巴尔干的各种问题上达成协议；正是在这个问题上，俄国人与南斯拉夫人之间发生了第一次重

大冲突。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建立之后，南保两国为避免在马其顿问题上发生摩擦曾经作出真诚的努力。好不容易才达成妥协，决定在边界两侧的马其顿人都应获得文化和语言方面的种种权利。嗣后，又在铁托的南斯拉夫建立马其顿人民共和国，作为构成联邦的六个单位之一；迪米特尔·弗拉霍夫则成为南斯拉夫专门负责马其顿地区的一位副总理，他一度是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的地区特派员，后又成为带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的恐怖分子。在1944至1947年期间，甚至多次讨论过成立从的里雅斯特直达黑海的大南斯拉夫联邦的方案，这是又回到一百多年前的老想法上去的一种有趣的还原。然而，南斯拉夫人和保加利亚人在看法上却存在巨大分歧；因为南斯拉夫人设想保加利亚将作为第七个组成单位参加联邦，与克罗地亚、塞尔维亚或马其顿地位相同，而保加利亚人却赞成建立一个南斯拉夫—保加利亚二元共和国。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到布莱德去与铁托签订一项协定，应允两国之间进行密切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合作。 313

1947年秋，铁托访问大多数东欧国家的首都，很象亚历山大国王在30年代早期的做法。这位元帅在布拉格、华沙、索非亚、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都受到大批群众的欢迎。11月27日他在索非亚对保加利亚人说，“我们要建立的合作如此广泛、如此密切，联邦将不过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九星期之后，季米特洛夫在布加勒斯特满怀希望地谈到，最终的联邦将包括东南欧的所有民族在内。巴尔干共产党人所表现的如此明显的独立性使斯大林为之震惊。季米特洛夫匆匆赶到莫斯科，及时表示悔过。铁托却拒绝按俄国人的要求亲自前往克里姆林宫，而是派遣他的主要理论家——卡德尔和门的内哥罗领导人米洛万·吉拉斯为代表。这两个才智胜过季米特洛夫的人物为南斯拉夫辩解说：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

间并无严重分歧。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不相信。1948年2月12日凌晨，卡德尔被劝诱在一项协定上签字，答应南斯拉夫将在日后处理一切外交问题时与苏联咨商。南斯拉夫人富于民族自豪感，决不会轻易忘记这次蒙受的羞辱。

在前三年间，铁托与斯大林还有过其他争议：铁托曾抱怨红军解放者在贝尔格莱德胡作非为；抗议俄国人招募南斯拉夫人充当特务；并拒不接受联合开办苏南银行而且由斯大林指定行长。现在，苏联又想用自从沙皇垮台以来未曾有过的方式来干预巴尔干事务：苏联要建立一个新的巴尔干国家，一个可以让阿尔巴尼亚参加的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的联邦，并将专门为它设计一个国名。南共中央委员会于3月1日召开会议，铁托拒绝苏联的全部建议。这月月底，苏联的军事专家和民用建筑项目的工程师全部撤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交换一系列信件，苏联方面想使铁托深切地认识到他的异端邪说之无法无天，甚至提醒他别忘了托洛茨基的下场。可是，铁托拒绝哀求乞怜，中央委员会中也只有一位委员站在苏联一边反对铁托元帅。

1948年6月28日，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报纸宣布，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会议，从兄弟共产党的大家庭中开除了南斯拉夫。斯大林以为南斯拉夫党会撤换其领导人。在外交官员，亦即在南斯拉夫驻共产党情报局其他成员国的使节中，是出现了一些叛国变节分子，但国内的团结却坚如磐石，这无疑一部分是由于兰科维奇的秘密警察发挥了效率。然而，在8月11日深夜，据说是出于偶然，陆军参谋长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在逃往罗马尼亚时刚巧遭遇一支边防巡逻队拦截而被击毙。但弄不清楚他究竟是想成为一个反铁托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呢，还是先谋求与红军司令员建立联系，而作为在贝尔格莱德发动军事政变配合苏联人同时入侵边境的第一步。他的潜逃未遂，是南斯拉夫所发生的不忠于

铁托的唯一严重事件。

斯大林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各成员国的经济封锁会在南斯拉夫造成莫大困难而迫使铁托下台。苏联中断了一切贷款，并停止供应建设钢厂和电站的一切材料，这对于南斯拉夫1947年4月所通过的工业化五年计划是个沉重的打击。与此同时，南斯拉夫的外贸也遭到破坏，因为其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外贸是与所谓苏联集团打交道。最后，铁托力求从西方获得援助，但这只是在一年多以后才得以对南斯拉夫的经济有所助益；究其原因，一部分是由于互相猜疑，一部分则是由于有几个西欧国家坚持要求获得如下保证：对1945年以来收归国有的战前外国资产最终给予补偿。尽管南斯拉夫重新确定自己的政策，摆脱了苏联偏见的羁绊，却从未摒弃它建立一个独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基本目的；这个不同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终于使南斯拉夫在左派人士的心目中，尤其是在非洲和中东地区，赢得了特别显要的地位。

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的一个更为直接的后果是铁托不再支持希腊共产党人。1949年10月，希腊游击队最后剩下的一些小股兵力遭到围歼，剧烈的内战乃告终止。南斯拉夫在被共产党情报局谴责后封闭南希边界，这虽只是希腊共产党人失败的诸多原因之一，但其影响颇大，尤其是因为斯大林始终对希腊事务不感兴趣，对希腊所有的马克思主义信徒的忠诚也有所怀疑。

铁托早就在经济上控制着阿尔巴尼亚，这使恩维尔·霍查及其大部分支持者烦恼不安，他们深恐自己的国家会被这个远为强大的邻国所吞并。因而阿尔巴尼亚人欢迎贝尔格莱德与莫斯科之间的争端，想藉此摆脱南斯拉夫的束缚。俄国人亲自接管了在阿尔巴尼亚的南斯拉夫企业；从此直到斯大林去世，阿尔巴尼亚人一直是他在东南欧宠爱的依附者。与铁托关系破裂后不到两年，就已有三千名苏联专家进驻阿尔巴尼亚，他们一面兴建这个国家的

315

基本工业，一面鼓励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越过南斯拉夫边境采取收复领土的行动。谁也比不上霍查那样热烈而又全面地谴责“由托派土耳其式恐怖主义者组成的铁托集团”；他那措辞激烈的辱骂成为萦绕俄国人耳际的美妙音乐达六、七年之久。此外，虽然阿尔巴尼亚资源贫乏，它所在的地理位置却使苏联舰队得以游弋在亚得里亚海和奥特朗托湾，因为在发罗拉和都拉斯附近有良好的海军基地。俄国人的不幸在于他们对霍查的了解并不比对铁托更充分；当南斯拉夫和它的那些共产党邻邦都有必要重归于好之时，它们却大为震惊地发现：阿尔巴尼亚谴责运动的矛头，不仅一如既往指向“痴心妄想的贝尔格莱德殖民者”，而且又指向了新添加的“莫斯科殖民者”。俄国人最终不得不把他们的舰队撤离发罗拉并与恩维尔·霍查断绝外交关系：但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八年。霍查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所受苏联影响之深，一如二十年前意大利对索古统治下的阿尔巴尼亚的影响；奇妙的却是上一次最终是意大利把索古撵跑，而这一次则是霍查留了下来，离开的却是俄国人。

对于共产党统治下的东欧各国，南斯拉夫被逐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斯大林在与铁托决裂之后活了四年零九个月，但他从此一直怀疑他在“人民民主国家”中的全部重要副手。1948年的冲突是因为苏联和南斯拉夫双方的领袖毕竟还都是从民族的观点来考虑问题。斯大林如此惯于把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认同起来，竟至于真诚地指望苏联以外的所有共产党人也都把他们各自的忠诚从属于1941至1945年间“伟大卫国战争”中创造出来的“苏维埃祖国”这一概念下的事业。铁托违抗不驯所起的效果，导致斯大林在苏联以外的共产主义领袖中发动一场政治迫害运动，搜捕那些支持地区民族主

义而不支持在克里姆林宫墙内所界说的那种“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的人们。“铁托主义”成了马克思主义“宗教”裁判所的一个新的肮脏字眼,不仅用于民族共产主义的信仰者,也用于那些不时作独立思考而不毫无批判地接受苏联党的统治的人们。斯大林在世的这最后几年中有过两次大清洗的浪潮:1949至1950年一 316 次,牺牲者主要是“当地的”共产党人,这些人不曾在莫斯科的辩证法学校里受过训练;1952年的一次则主要针对犹太族的知识分子,因为斯大林在世的最后几个月中成了一个彻底的大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掀起一股排犹太主义的潮流,冲向那些过去太经常、也太轻易地为这种潮流所淹没的国度。

谁也不知道这两次清洗的牺牲者为数几何。还不是所有的人都被处决,有一些后来回到了公众生活中,肉体上和精神上都留下了过去的折磨造成的创伤。官方有时公布开除出党的人数:1950年愚人节那天,保加利亚宣布过去十二个月内有九万二千四百人被逐出党外;第二年7月,罗马尼亚公布过去两年内总共开除了十九万二千人。有些著名人物被交付审判,并公布所犯的错误;另一些则从此默默无闻,或被遗忘。清洗以后,各个中央委员会中留下相当多的缺额,新人物于是出现,按照他们以为斯大林会赞许的路线制定本党的政策。

从具体的细节上看,清洗以1949年6月11日“铁托主义”的内务部长科奇·佐治的判罪和处决而始于阿尔巴尼亚,但审讯重要的政治人物却是在9月16日首次见于布达佩斯法庭。1948年8月已从内务部调到外交部的劳伊克·拉斯洛与七名“同谋犯”被交付审判,被控阴谋“用暴力推翻民主的国家制度”,硬说他十八年来一直是匈牙利共产党的叛徒,准备发动政变,其办法是与兰科维奇作出安排,由身穿匈牙利制服的南斯拉夫部队进入匈牙利,拥戴劳伊克充当匈牙利的傀儡总理。假使匈牙利的地理和战略位置能

使匈牙利这个国家表现出铁托式的独立精神的话，劳伊克倒确实真有可能成为它的领袖；但尽管如此，这些证据却显然纯属捏造。不过，全部被告都供认了他们的“罪行”；劳伊克和党的书记处的两位前任书记被判处死刑，9月27日被绞死；其余的都投入监狱。此后十八个月中，另一些知名的匈牙利共产党人被免职，有的还被判处徒刑；其中有著名的前社会党主席萨卡希奇·阿尔帕德以及继劳伊克任内务部长的卡达尔·亚诺什（他遭到“阿弗欧”残酷的严刑拷打，在瓦茨被单独囚禁了好几个月）。

317 劳伊克死后七星期，在索非亚开始了一场“表演性质的审判”，特拉伊乔·科斯托夫和另外十名保加利亚共产党人被控曾进行民族主义的煽动及左翼宗派主义活动。科斯托夫于6月被捕，他当时是副总理。被捕后一星期，公布了季米特洛夫在莫斯科就医期间逝世的消息。毫无疑问，科斯托夫的受审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集团中的权力之争有关；这种斗争之残酷无情，有时殆近于当年的拜占廷。科斯托夫像劳伊克一样，也被诬告曾谋划与南斯拉夫人合作策动政变；他被控充当英国特务以及“阻挠国家计划的实现”。他拒不承认这些罪行，但仍被判决有罪，处以绞刑。同案的被告则被判处长期徒刑。他的处决恰值索非亚一场最高权力之争的高潮，因为季米特洛夫已由一位参加过1923年共产党起义的老战士瓦西尔·科拉罗夫继任；此人在就任时健康情况已经不佳，1950年1月底即逝世，距科斯托夫的处决不过五星期。于是轮到季米特洛夫的妹夫伏尔科·契尔文科夫接任；这是一位地道的“莫斯科人”，凡事都奴才般地模仿斯大林，甚至对一位死去的领袖致悼词的方式也不例外。契尔文科夫立即着手用“与科斯托夫帮派成员”有关联为理由，从共产党领导机构（保共政治局）中清除了七个可能的敌手。他自己的副总理安东·于哥夫向1950年的党代表大会承认错误，得以宽大处理，保留住职位。两位老赤卫队员以及科斯

托夫这一伙魔鬼的死，使契尔文科夫在保加利亚爬上了权力的宝座；看来，只要斯大林还健在，这位置便与拉科西在匈牙利的位置同样安稳。

波兰的清洗比较不这么有声有色，但却使俄国人对这个国家取得了甚至更大的控制权。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之前三星期，哥穆尔卡作为工人党的总书记，曾就“波兰工人运动的历史传统”作了一次报告；在1948年的那种气氛中，这被解释为民族主义言论。他随即在波兰政治局一次会议上表示忏悔，情愿从此退居幕后，他之所以得免于公开审讯，很可能是这个原故。12月，他被解除职务，从1951年起受到保护性拘留，一直拘留到1955年秋天。同时，另一些“当地的”共产党人也和哥穆尔卡一样被清洗出党，而贝鲁特则被俄国人确认为他们在华沙的可靠的代理人。但是，红军却怀疑波兰军官中有政治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又由于东德与西德之间关系日趋紧张，斯大林就坚决主张苏联应牢牢控制波兰武装部队。国防部长齐米尔斯基（一度是毕苏茨基军团的军官）被撤职，他的副手、哥穆尔卡在抵抗运动中的战友和同事斯彼哈尔斯基也被撤职。1949年11月6日，罗科索夫斯基元帅被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长，六个月后又成为波兰政治局委员。罗科索夫斯基虽然是波兰血统，他的军事生涯却全部是在红军中度过的。而且，他受命之时正是驻扎在波兰领土上的苏军司令官。他身为波兰军队的主子的七年间，华沙受制于苏联的程度恰如康斯坦丁大公爵的时代。 318

最初，清洗对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的高级人员无甚影响。1948年2月，杰出的知识分子卢克雷提乌·帕特勒什坎努被开除出罗马尼亚党，随即被囚禁，原因是对特兰西瓦尼亚的马扎尔少数民族实行狭隘的民族霸权政策；以此而身败名裂，这在布加勒斯特的政客中还是罕见的。他于1954年4月被处决。1948至1949年，

发生多起人事变动，其中多数变动的目的显然在于提拔安娜·波克(此人敢于直言不讳地批判铁托)和瓦西尔·卢卡。波克继续任外交部长，卢卡成为财政部长，两人都当上了副总理。1952年春天，一贯满足于控制党内行政和国民经济的乔治乌-德治开始抓权，罗马尼亚的重大变故便从此开始；波克和卢卡两人同时失势。彼特鲁·格罗查充当挂名的政府首脑已达七年，如今获得有名无实的晋升，成为挂名的国家元首。乔治乌-德治于1952年6月成为总理。他从政府中清洗了波克和卢卡的全部支持者，其中许多是犹太人(波克本人当然也是)。乔治乌-德治可能首先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才出此下策；但是，有若干犹太人从罗马尼亚党中消失，在这个时节却是取悦于斯大林，因为这时他的思想已经被“犹太复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国家以色列的威胁缠住了。其实卢卡并非犹太人的同情者；相反的是，犹太人约瑟夫·奇西聂夫斯奇却在罗马尼亚政治局中保持着显要的地位，直到1957年为止。

如果说反犹太主义在罗马尼亚的清洗中不过是旁枝末节，在捷克斯洛伐克1952年的动荡里却似乎是头等大事。1949年，有若干次要人物被捕，国防部和最高司令部人事大量变动。1950年夏天，一位过去的社会主义议员被交付审判，然后处决。但直到1952年11月，方才有十四名身居领导地位的共产党人被交付审判；他们多数是犹太人，其中包括从铁托被贬时起直到1951年9月一直担任党的书记的鲁道夫·斯兰斯基，以及1948至1950年间的外交部长克里门蒂斯。两人都是犹太族知识分子。克里门蒂斯在他出生和受教育的地方斯洛伐克还有为数可观的拥护者。在319 起诉书中，全体被告均被指控为“替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托洛斯基分子、铁托主义分子、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信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叛徒。……”其中十一人被判处绞刑，其余三名情节较轻的“罪犯”则判处长期监禁。新党员再一次迅速登上前台，虽然哥特瓦尔德

以总统身分终身控制着党和国家的机构。高升的共产党人中有安东宁·诺沃提尼，他取得了过去掌握在斯兰斯基手中的党的一大部分权力，并以较为慎重的方式来行使权力。这一审判及其结果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造成的震动，超过各邻国早些时候的任何一次清洗；这部分是由于审判过程逐日广播公布，但也因为如此公然地嘲弄法律，对捷克人这样西洋化的民族来说，乃是格格不入的。这使他们对一个仗恃告密者和逼供为统治诀窍的政权产生了恐惧之感，但同时也相当厌恶。

当然，如果把东欧各国说成是这几年来只一味致力于党内少数寡头政客之间的权力之争，那就会引起误解。这些国家曾真正试图增加工业生产，执行按斯大林模式而采取的长期经济计划。通过诸如“合营”公司这样的一些方法，苏联加强了它对多瑙河流域诸国、尤其是罗马尼亚的贸易的控制。开始了重大的建设项目，其目的是修建有价值的运河与水电站，实现铁路现代化，扩大纺织工业，以及改善各国间的交通（例如，在苏联的赞助下修建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多瑙河铁路公路大桥，从而把罗马尼亚的久尔久和保加利亚的鲁塞联结起来）。波兰的大型企业建设取得了巨大进展，例如克拉科夫附近兴建了全新的工业中心，称为新胡塔。城市中的消费品反倒愈来愈稀少。匈牙利的情况与此类似：其重工业也有所增长，许多产品却与匈牙利的资源不相适应。因为这是用从苏联进口的原料制造的，然后又运回苏联以供消费。原料与产品的交换既然是按苏联的利益安排的，匈牙利在这过程中获得了什么长期的利益就不得而知。所有这些国家都克尽厥职地鼓励农民接受集体化，而成功甚少。农业产量仍旧在预期的指标以下。

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最大阻力来自基督教的各个教会。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政府和东正教教会还有可能共处而不致发

320

生严重冲突，一部分是由于东正教的神职人员及主教团准备接受那些禁止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和威胁要对任何扰乱治安的宗教游行采取措施的法规。新教徒的日子更难过些：路德派教会向来有干预政治的传统，而匈牙利的加尔文派教徒则与霍尔蒂时期、甚至与更早的蒂萨时期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但与国家冲突最大的却是负有国际义务、而且又与旧政权有联系的罗马天主教会。布拉格的贝伦大主教毫不迟疑地谴责了天主教行动委员会，这委员会是经政府鼓励于1949年成立的，其目的是清除教会中的反动神职人员和主教。华沙的红衣主教赫隆德和后来的红衣主教维辛斯基竭力在波兰保持和平，而当局却在一有任何大规模的宗教活动时，便采取措施限制教会在政治事务和教育中的权利。教会和政府之间最著名的一次冲突，是在1948年12月——无辜婴儿屠杀纪念日——逮捕了匈牙利的总主教：红衣主教明曾蒂·约瑟夫。

明曾蒂表现得异常勇敢，既像贝克特那样刚毅无畏也像贝克特那样顽固不化。他抨击政府，承认他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很有可能发生；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现政权崩溃，他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他叙述了1947年他经纳吉·费伦茨政府许可而去美国访问时在芝加哥与鄂图大公爵的一次长谈。这位红衣主教毫不企图掩藏他对共产党人的敌意，以及他那基本上属于哈布斯堡正统王权派的信仰。也许他自甘殉教。果真这样的话，没有让他按照传统公认的方式达到目的。他被判处终身服苦役。最高法院驳回了他的上诉，理由是他“本应判死刑”。

许多匈牙利人如果是处在一个比较自由主义的政府之下，原会觉得明曾蒂的观点难以容忍地令人感到压抑，从社会的观点来看也是保守的。如今这位红衣主教却成了抵抗共产主义和苏联占领的象征。虽然不时谣传他已去世或者是奄奄一息，人们却觉得他还没有作最后的发言。他不由自主地成了人民英雄；在50年代

初期的东欧,这种人物是少有的。富于讽刺意味的是,唯一可以和他媲美的人却是那个曾经囚禁萨格勒布大主教斯特皮纳茨的人:铁托元帅。

第十四章 打翻塑像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个人崇拜在整个中东欧达到了极点。除南斯拉夫外,所有的人民民主国家里,斯大林的名字无处不在。罗马尼亚第二大城市布拉索夫在地图上就标为“斯大林城”。保加利亚重要港口瓦尔纳和阿尔巴尼亚边远高地的库乔瓦都直截了当地正式称为“斯大林”。波兰工业城卡托维兹变成了“斯大林诺格罗德”,而匈牙利的农业地区多瑙彭泰莱则由于变成钢铁中心“斯大林城”而失去了自身的个性与特征。捷克斯洛伐克人虽然给兹林改名而使哥特瓦尔德总统的名字永垂不朽,却出于谨慎或世故而不肯把一个外国政治家的名字搬进自己的地名录。但东德人却认为斯大林城这名称对于靠近波兰国境的一座新兴钢铁城市非常合适,并且为了颂扬这位大元帅——他麾下的坦克曾穿过菩提树下大街——把柏林的街道冠上了他的名字。工厂里挂满画像,公共场合遍竖巨型雕像,六个国家中解放了的无产阶级不大可能忘记他们对“伟大的斯大林”所欠下的恩情。一位欧洲统治者一心使自己神化到这种地步,是几个世纪以来未曾有过的事情。

1953 年 3 月 5 日,人们发现这位神明原来并非长生不老,而四天之后他便被葬入陵墓,躺在列宁身旁。从许多方面来看,他死在此时,可算幸运。尽管他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和他的主要帮手们的特务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肆行暴政,他在世的最后几个月中,人民的不满已经开始表现出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罢工,比尔森举行示威游行,波兰出现动乱。生活水平没有提高,在捷克斯洛伐克

的确反而降低了。在多瑙河沿岸各国，人们怨恨强迫集体化的情绪已十分明显。共产党领袖们指望斯大林给他们出些主意，但他显然已经年迈，而且总是由于过去玩弄的阴谋而疑神疑鬼。国际形势丝毫也没有缓和。1949年，俄国人在他们的德国占领区制造了一个政治实体，称之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瓦尔特·乌布利希为元首。乌布利希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曾任德意志帝国国会的共产党代表，1945年以红军上校的身分返回到柏林；及至1953年，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经是苏联及其共产党伙伴的政治上和经济上³²²的保护国。当时还未允许它享有完全的政治主权，因为俄国人仍旧希望乌布利希政权仅属临时性质，一旦与西方签订对德和约，便可将它一脚踢开。东德政府在国内非常不得人心，不得不经常镇压人民，而同时又缺乏足够资源来完成苏联摊派给它的重工业化项目。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和其他几个城市发生骚动。乌布利希无法控制局势，只得呼吁苏联出兵恢复秩序。红军原本不愿干预，后来却把坦克与装甲车开了进去，使用这样的高压手段维持一个共产党政权存在下去，这是第一次，但不是最后一次。柏林的骚动对苏联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因为苏联感到无法就一个不稳定的、敌视共产主义的德国进行谈判。六年之后乌布利希承认，他当时曾认为斯大林一死，他的克里姆林主子们可能会把他踢开。但是没有别的人可以取而代之。

在苏联国内，斯大林一死，紧接着政治局其余的委员们立即开始一场权力斗争。马林科夫战胜贝利亚，成功地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贝利亚当时是保安机关的首脑，他后来在6月间被清洗，12月被处决。东欧所有的领导人看来都地位稳固。唯独捷克斯洛伐克立即发生变化，因为哥特瓦尔德总统在参加斯大林葬礼时忽患肺炎，从莫斯科回国后三天便死去。继承他的是安托宁·萨波托茨基，此人和蔼朴实，深受捷克斯洛伐克工人的欢迎。萨波托茨基总

统从未享有哥特瓦尔德那样的权威，而新总理威廉·西罗基根本没有政治声望，他是斯洛伐克人，因此为捷克人所鄙薄，他的斯洛伐克同胞则因为他“卖身投靠布拉格”而百般蔑视他。由于哥特瓦尔德之死而获益最多的是诺沃提尼，他成为第一书记，在党内的地位乃随之巩固，时年四十八岁。诺沃提尼比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共产党组织的任何主要人员都更懂得和更了解党的机器如何运转。他首先是个政治工程师，是俄国人所谓的“组织者”的最高典范，是通过党内行政机构训练出来的思想狭隘的官僚，既无个性，又缺乏富于想象力的同情心。在斯大林以后的反动时期中，有越来越多的“组织者”在东欧各国和苏联本国牢牢地控制着政权，而把戏剧性的表演留给了比较波澜壮阔的革命时代幸存下来的为数不多的老革命。

1953年中有几个月，匈牙利似乎有可能从拉科西和“阿弗欧”
323 的暴政下解放出来。主要由于计划不周和管理不善，匈牙利的情况已经恶化。拉科西本人于1952年8月接管政府，实行从城市向农村流放人口的政策，这样，就可把在布达佩斯没收的住房分给忠诚而贫困的党员，以示酬劳。但用这种很可能是从1794年雅各宾立法中抄袭来的解决经济困难的政策，在拉科西时代并不比在罗伯斯庇尔时代有效。1952年农业收成极好，可是，管理不善，却造成当年冬季和次年春季粮食奇缺。拉科西的教条主义不可救药，他竟提出一个新的五年计划。政治局以纳吉·伊姆雷为首的其他委员勇敢地加以反对，莫斯科的马林科夫也表示反对。苏联当局召唤拉科西、纳吉和另外两名匈牙利政治局委员前往克里姆林宫，并劝告他们另采“新路线”。1953年7月，纳吉取代拉科西任总理，他答应结束发展重工业这种脱离实际、华而不实的作法，表示将给人民以较大的政治自由、较多的消费品和放松农业集体化。不幸的是，纳吉·伊姆雷宽容了老斯大林分子。那年夏天，没有对拉科

西发动一次热月政变^①：竟让他继续控制党的机器。虽然生活水平在纳吉领导下有所改善，在某些领域甚至恢复了私人企业，但是，“阿弗欧”这一恐怖机构依然存在，而在批评过去种种错误时也没有点拉科西的名。在公开的声明中矛盾百出，“新路线”有时似乎未免计划不周。

波兰、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斯大林逝世后的两年中，都未发生重大变化。贝鲁特对波兰的控制没有受到挑战，尽管在华沙和克拉科夫的知识分子中反苏情绪日益增长。契尔文科夫过高地估计了自己掌握保加利亚政权的力量，而忽略了托多尔·日夫科夫对他的地位的威胁日见其大。1954年3月，日夫科夫成为党的第一书记，其政治生涯和个性都与诺沃提尼相似。乔治乌-德治继续担任罗马尼亚总理和党的书记直到1954年4月为止，然后竟把自己在党内的职务交给他信得过的追随者格奥尔基·阿波斯托尔。及至嗣后发现原来真正的权力在党组织而不在国家，他遂于1955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并且把阿波斯托尔从十八个月前他所昇予的位置上撵了下去。实际上他放松了对党的机器的控制，因为他不同于契尔文科夫，经过细心安排，他已把自己任命的人都提升到主要的组织岗位。其中的主要人物便是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于1944年罗马尼亚解放时齐奥塞斯库接受开展共产主义青年运动这一重大任务。1954年4月他才36岁，就当上了罗马尼亚党的政治局候补委员。

1955年2月，马林科夫辞去苏联总理，接替他的是布尔加宁，实权却在1953年当上苏共书记的赫鲁晓夫手中。马林科夫的倒台看来主要属于内部斗争，但既然他全力支持东欧各国缓和的改

① 热月政变，热月（Thermidor）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共和历的第十一月，相当于公历七月十九日至八月十七日。资产阶级右翼集团在热月发动政变，推翻雅各宾专政，建立热月党反动统治。——译者

革政策，领导人的更迭免不了会影响苏联西部边境以外的邻邦。起初，似乎会恢复纯粹的斯大林主义。马林科夫辞职后不出十一天，拉科西就以更顺从的赫格居什代替纳吉·伊姆雷担任匈牙利政府首脑。如果苏联正准备从奥地利撤军，这就必须在匈牙利安置一个强有力的统治者以便保卫沿蒂萨河而上通往喀尔巴阡山隘口这一重要的战略要道。而纳吉在俄国人眼里却是软弱无力之辈，就在前一年，他还曾鼓励组成称作“爱国人民战线”的非党组织。赫鲁晓夫因此宁愿重新安置一个拉科西提名的人，虽然坚持不要轻易采取过火的镇压措施，而把它留作威胁手段，以免引起激烈的动荡。纳吉·伊姆雷在政治上丢了面子，又因为他不承认错误，同年11月就被开除出党。但纳吉并未被交付审判或处决，这是因为新的共产党领导班子想与过去的清洗割断联系，也因为大家都知道纳吉的健康状况很坏，可能不久于人世，从此将被人遗忘。因此允许他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活下去，但他依旧是布达佩斯一位深受群众欢迎的人，在咖啡馆、戏院以及其他公共娱乐场所，他和群众公然打成一片。

赫鲁晓夫时代的第一年，苏联政策发生明显变化。随着波茨坦会议以来的第一次最高级会议1955年7月在日内瓦召开，东西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似乎有所缓和。在这之前，苏联领导人两次作出人们意料之外的姿态。那年初春，他们突然收回过去九年苏联历届政府反对缔结对奥和约的全部意见；5月间，莫斯科又宣告布尔加宁与赫鲁晓夫拟于“不久的将来”访问南斯拉夫。

325 1955年5月15日，英、法、苏三国外交部长和美国国务卿在维也纳的贝尔维德雷宫签署对奥和约。^①奥地利共和国成为完全

^① 原文为 Austrian State Treaty(奥地利国家条约)，现依照一般历史书籍简译为“对奥和约”。——译者

独立的国家，保证其永久中立。它永远不得允许哈布斯堡王朝复辟或与德国结盟。占领军从各自地区撤出，最后一批红军部队也于10月第四星期撤入匈牙利。苏联通过磋商达成一项东欧互助条约，从而保证其中欧的军事地位，这条约是对奥和约签字的前一天在华沙签订的一般称为“华沙条约”。条约是由苏联、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东德、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八国代表签订的。它一方面确认友谊与合作的必要，一方面规定成立一个所有成员国武装力量的统一指挥部。这样，在驻守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是为了保持与苏联在奥地利的占领区联系通畅这一借口失去效力之后，苏联红军和空军仍有理由继续留驻在这两国境内。与此同时，华沙条约规定苏联对其盟国的内部军事事务可以进行更多的干预。这条约并不专是共产党国家合作的工具：第九条说明其他国家也可以加入该条约，而“不问其社会或国家制度如何”。9月，苏联在宣布打算从芬兰的波卡拉海军基地撤出时，邀请芬兰参加华沙条约；芬兰愿守中立，苏联似乎满足于只与芬兰签订一项友好条约。

对奥和约签订后不到两星期，苏联领导人便飞往贝尔格莱德，对1948年的事件公开道歉，取消斯大林和另一些人当年对铁托元帅的谴责之词。铁托本人早在1953年已就任联邦人民共和国总统，他和芬兰人一样，并不准备再次充当苏联的盟友。他竭尽全力消除诸邻邦中斯大林主义压迫的残余痕迹，并在次年4月最后达到使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正式解散的目的。然而他未能说服赫鲁晓夫相信拉科西的引退将最有利于中东欧的安全，他对拉科西特别反感。1956年3月，拉科西在埃格尔的一次讲话中宣称党已给当时业经去世的劳伊克（1949年他被宣判为铁托分子）恢复名誉，并说对他的审判是误判。如果这种虚伪姿态意在安抚铁托的话，并未奏效。那年夏天晚些时候，铁托访问莫斯科时，继续极力要求撤销拉科西的职务。

从1955年以后,苏联也曾力图加强各共产党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1949年1月,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作为东欧和愈来愈相互依存的而与西欧经济相抗衡的组织。只要斯大林健在,他就不允许经互会有多少主动性,而他似乎一直把这一组织主要看作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的机构。但是,1955年时任副总理、经互会成立时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的米高扬,却成功地使大家接受了一条原则:委员会应定期开会,在会上东欧各国的部长们将商定共同的经济政策,并调整贸易的形式。1955年在布达佩斯举行的一次部长级会议上同意设立各种委员会以决定各会员国在工业生产上的专业分工。但是进展缓慢:各会员国表现出明显的互不信任,确实也不信任苏联;直到1960年经互会才组织就绪,发表了基本章程,并决定了合作的原则。结果,经互会在共产党国家之间引起的摩擦较之华沙条约涉及的军事问题所引起的摩擦还要多些。

1956年2月举行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由于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谴责斯大林并批判其作法的长篇秘密报告,以及四个月后美国情报机关发表了这一报告的“泄密”文本,这次大会后来闻名遐迩。这种抨击并不仅是郁积已久的咒骂。它包含着由其他发言人加以发挥的三条原则:共处的必要性;承认“走向共产主义的不同道路”;以及个人崇拜的根本反社会主义的性质。这种意识形态上的修正必然对各华沙条约国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其中某些国家则是一种危险的令人陶醉的酒。

“非斯大林化”的后果首先在波兰表现了出来,这一部分是由于偶然的情况,即贝鲁特也像三年前的哥特瓦尔德一样熬不过苏联的严冬,大会结束后十七天,他竟死于莫斯科。要找到一个继承人担任党魁可不容易,因为贝鲁特掌握权力已有十二年之久,而且

把他的大部分敌手都从权威地位上罢免掉了。赫鲁晓夫在3月20日亲自帮助波兰人选中新的第一书记爱德华·奥哈布。奥哈布是个老斯大林分子，国内很少有人拥护。但他与哥穆尔卡是姻亲，其后五个月中他经常向哥穆尔卡征求意见，尽管并不总是言听计从。³²⁷政治局势充满反常现象。其例之一是，虽然哥穆尔卡自上年10月以来已经获得自由，但直到4月间的第一个星期才公布他已解除保护性拘留，迟至8月才正式恢复党籍。同样，总理仍旧是前社会党党人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他在哥穆尔卡被解除职务期间担任政府首脑，而且一心要保住职位，尽管保护他的那些老斯大林分子都已消声匿迹。于是，西伦凯维兹遂得以在1956年4月23日发表一篇热情洋溢的讲演，欢迎“创造性地寻求一项新政策，和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曾参加的大辩论”。从那以后，他一直担任总理。

波兰政府中其余的斯大林分子在4月和5月间被解除职务；各次清洗的幸存者一律恢复了名誉；当权者的名单上也出现一些新名字。例如，前社会党人亚当·拉帕茨基在4月27日政府改组时出任外交部长，并担任这一职务达十二年以上。政治方面的变化却只能触及波兰问题的表面。前五年中消费品价格约计上涨百分之五十五，而新政府应允的增加工资似乎落在后面，并且由于官僚们办事不力而姗姗来迟。6月28日，波兹南机械厂的工人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厂是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罢工抗议低工资。游行队伍到达市中心时，另有一些受过委屈的市民参加进来，接着便对一些公共建筑物进行攻击。骚动时断时续，直到次日傍晚方才罢休。曾调来部队以迅速恢复秩序。五十三人被杀。虽然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元帅飞往华沙劝说奥哈布和西伦凯维茨对叛乱分子采取强硬手段，而这两个波兰人却坚持说罢工工人的要求是合法的。后来增加了工资，被捕者只受到轻微惩处。

波兹南发生骚动后，在7月和8月间接连又出现性质较为平和的另一些示威游行。感情激动的公众把哥穆尔卡当作波兰的辛辛内塔斯^①，要把他安置在政府里，好从敌人的阴谋中拯救这个共和国。8月25日至26日，琴斯托霍瓦也有一次意义重大的集会，五十多万人参加纪念波兰民族在与俄罗斯人长期斗争中皈依天主教蒙圣母玛利亚庇护的三百周年纪念活动。10月中旬政治骚动达到高峰，恰值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选举新委员。当时盛传苏联军队正在调动，苏联准备插手干涉从而阻挠哥穆尔卡派上台。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另外一些苏联要人在会议的第一天早上抵达华沙。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劝告苏联代表团说，对哥穆尔卡进行武装干涉将会导致波兰人民永久疏远苏联。这次选举哥穆尔卡和他的改革派大获全胜。波兰人向赫鲁晓夫保证他们无意割断与俄国人的联系而把自己的国家变成维斯杜拉河畔的南斯拉夫。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总司令和国防部长职务改由斯彼哈尔斯基将军接任，但波兰继续忠于华沙条约，苏联通往德国的交通线也未受干扰。

哥穆尔卡重新掌权被看作民族的胜利，受到举国上下的欢迎。他在五十一岁时成了党的第一书记。奥哈布体面地同意降为农业部长，而且同新政府忠诚合作。哥穆尔卡的社会主义概念出奇地守旧、严格而稳重：他的支持者把他的胜利欢呼为“十月里的春天”。但他的思想却缺乏他们那般奔放的热情。有些人发现现实落后于他们的理想时，很快就有幻想破灭之感。然而哥穆尔卡却仍旧忠于两条基本原则：承认波兰可以塑造出它特有的社会主义形式；波兰要在它战后的边界以内确保安全生活，就必须采取与苏联共同防御的政策。如果说这些理想达不到敬慕他的人们所设想

^① 辛辛内塔斯(Lucius Quinctus Cincinnatus)公元前五世纪时罗马的一名将军及政治家。——译者

的自由革命的高度的话，至少还有切合实际、合乎常识这一优点。哥穆尔卡过去是、现在仍旧是一个注重实效的、保守的马克思主义者，每逢急躁时便想独断专行，却也有打算进行有限的改革，为愤怒的鲁莽之流提供一个安全阀。他的政治手腕使波兰幸免于布达佩斯所经历的悲剧。

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后果导致保加利亚政府发生重大变化，但对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都没有多少影响。保加利亚党中央指责契尔文科夫醉心于搞“个人崇拜”，1956年4月由马其顿人安东·于哥夫取代契尔文科夫任总理，但这场权力斗争中的真正胜利者是党的第一书记日夫科夫。与此同时，保加利亚政治局宣布一系列旨在提高生活水准的改革。契尔文科夫没有一垮到底，他仍担任副总理。乔治乌-德治已经在1952年清除了罗马尼亚党内的莫斯科斯大林分子一派人物；他在1955年12月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先提出和平共处和社会主义中的民族差异理论，而赫鲁晓夫两个月后才在莫斯科提出这些理论。捷克斯洛伐克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较满意，他们对于马扎尔人和波兰人潜在的敌意使他们没有受到边界另一侧的骚动的感染。尽管如此，诺沃提尼却不能对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完全置之不理。他解除了不得人心的国防部长阿列克赛·采皮茨卡的职务，同时免职的还有几个次要的官僚；政府提高了养老金，限制工作日的时间，并降低物价，表明艰苦的岁月已经过去，工人们政府对政府深感满意。诺沃提尼深知在这种情况下决不会产生叛乱。

匈牙利的情况则不然，拉科西的傀儡总理赫格居什在三月末谴责个人崇拜，并在这次广播演说之后宣布普遍降低物价。但布达佩斯动乱的历史根源和爱国主义感情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共产党国家。整个春季和夏季，一个原为党内青年知识分子而成立的、意

味深长地称为“裴多菲俱乐部”的团体里，始终在继续鼓动。他们要求出版自由，要求制定适合匈牙利国情而不屈从于莫斯科的政策。知识分子把纳吉·伊姆雷奉为马扎尔的哥穆尔卡的作法使拉科西本人惊惶不安，因此，他准备再次进行清洗。但俄国人不想再次清洗，特别是当时他们正力争胜利完成与铁托的谈判。米高扬飞抵布达佩斯，宣布克里姆林宫对拉科西“不信任”的判决。7月18日拉科西辞职，离开匈牙利前往雅尔塔隐居。

前斯大林分子格罗·埃尔诺接替拉科西担任第一书记，1944年他曾协助组成德布勒森临时政府。为安抚那些更加激进的分子，格罗与卡达尔·亚诺什共同负责党务工作，1949年卡达尔作为铁托分子入狱，1954年被纳吉·伊姆雷释放。新政治局答应“进一步民主化”，从秋天直到多雨的10月，局势愈来愈紧张。经常伴随革命而来的粮食歉收和燃料短缺（这一次是由于来自波兰的煤炭供应突然中止）使动乱更加严重。作为对公众要求的另一项让步，10月初恢复纳吉·伊姆雷的党籍；但新闻界公开极力主张应该重新任命他为政府首脑。纳吉本人离开布达佩斯前往巴拉顿湖附近的鲍道乔尼，并且作为主宾在那里参加10月22日的葡萄酒节庆祝活动。次日下午，切佩尔岛的大学生和工厂里的工人走上布达佩斯街头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在政治上作出让步，并实现匈牙利的真正独立。当晚9时半，矗立在市区公园中心的斯大林巨型塑像便被人从底座上推倒在地，然后装进清扫街道的卡车，拖往国家大戏院。这种做法忠实地反映了此时此刻的群众情绪。不幸的是他的一双靴子却牢牢地留在底座上；这也别有一种象征意义。

匈牙利革命开始于1956年10月23日，11月4日即以失败告终。从一开始它就好比把哥穆尔卡推上台的波兰人民的感情浪潮更加波澜壮阔，也更为根深蒂固。布达佩斯学生和工人在10月23日最初提的要求反映出他们所固有的与匈牙利历史传统的继承

感：因为在坚持要求撤走苏联军队和恢复基本自由的同时，他们纲领中曾建议用“科苏特的古老的匈牙利纹章”代替异国情调的国徽，规定3月15日为国庆节，以纪念1848至1849年的斗争。而裴多菲的诗句鼓舞着1956年的革命者，也与1848年革命的情景相仿佛。游行示威的群众在裴多菲纪念碑前，也在1849年为了匈牙利而与俄国人拼死斗争的波兰流亡者贝姆将军的雕像脚下敬献花圈。对历史的这类缅怀很可能终于损害了革命事业，因为使苏联统治者认定这次运动具有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和反斯拉夫的性质，不像华沙的运动那样，没有公然提起1830年和1863年的起义，主要只是爱国的改良主义。匈牙利革命风起云涌，声势日大，到了第二个星期，其目标在俄国人看来已属危险的“反革命”性质，超过了他们所能容忍的限度。

在布达佩斯起义的第二天和第三天，苏联当局认为他们还可以像在波兰那样，搞出一个能与之合作的新的匈牙利党政领导班子。于是纳吉·伊姆雷在10月24日取代赫格居什任总理。第二天格罗被排挤掉了，由卡达尔接手当唯一的书记——第一书记。米高扬和苏联党的政治局里的中东欧问题专家苏斯洛夫亲临布达佩斯监督交接工作。米高扬与纳吉和卡达尔就红军撤出匈牙利问题进行商谈并达成协议。直到10月底，俄国人对合作很可能仍是有诚意的。但是束缚一旦取消，便释放出一股政治感情的怒潮，一夜之间，1945至1946年间所有的旧政党重新露面，一支匈牙利民兵护送红衣主教明曾蒂返回布达佩斯的宗主教宫，10月31日晚间他向匈牙利人民发表广播演说。纳吉把前小农党领袖科瓦奇·贝洛、前总统蒂尔迪·佐尔坦（另一小农党人）和勇敢的社会民主党人凯特利·安娜等延揽进他的联合政府；对旧秩序的这种不明智的怀念情绪造成一种危险可能使这些温和的左翼代表人物和纳吉本人遭遇没顶之灾。在11月1日夜间到2日凌晨，卡达尔·亚

331 诺什从布达佩斯突然失踪；前一天，首都遍传消息说：苏军已停止向边境撤退，转而掉头西进，并且后面还跟着配有最新式坦克的增援部队。

纳吉向联合国求援，并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寻求国际上承认匈牙利为类似奥地利和瑞士那样的中立国。西方诸大国对此毫无反应，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错打了算盘，在10月31日开始轰炸埃及机场，想凭武力解决苏伊士运河以及中东问题，而这是与美国的政策和世界舆论背道而驰的。匈牙利因而陷于孤立。卡达尔在匈牙利东部宣布成立“工农革命政府”，要从布达佩斯的“霍尔蒂法西斯革命者”手中拯救共和国。11月4日，苏联坦克驶入首都的林荫大道，同时以重炮从格列尔特山岬轰击布达以及滨河一带，自由纪念碑耸立在格列尔特山上，它便是这个城市及其人民的苦难的见证。纳吉和他的部长们逃到南斯拉夫公使馆避难，明曾蒂则在美国公使馆避难。苏军卷土重来，遭到市内人民的英勇壮烈的抵抗，有成千上万的人丧生。甚至在卡达尔重新控制首都之后，工厂工人和矿工们仍在坚持总罢工。大约二十万难民成群结队逃往西方，至于究竟有多少匈牙利人被流放到东方，则不得而知。

卡达尔至今仍是个谜一般的人物。当时西方以及他的一部分共产党同仁们对他百般辱骂，说他出卖了纳吉。然而他从未完全恢复拉科西时代的恐怖统治，而且自1959年以后一直允许匈牙利人有较大的自由。匈牙利在革命的第二个星期里改变政治性质之迅速，可能真正使他感到惊恐。但是，有许多事情永远无法苟同的：尽管马莱特尔·帕尔将军持有苏联军事当局的安全通行证，但仍被逮捕，后来又被处决；1956年11月22日纳吉·伊姆雷得到卡达尔政府的安全保证离开南斯拉夫公使馆，但是他仍被放逐、审讯，然后在1958年6月被处决。有些人认为卡达尔在这些问题上身不

由己,而且十年之内,匈牙利在他的治理下实现了他作为纳吉的同僚之一所接受的纳吉的全部原则,唯独苏联军队撤离匈牙利边区一事除外。卡达尔确实在匈牙利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这在1956年的劫后余波中似乎是绝无可能的。随着时间的流逝,创伤已愈合,而历史却迟迟不肯宽恕。

第十五章 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

尽管匈牙利发生了骇人听闻的悲剧,从1956年到1968年,东欧各共产党国家还是逐渐得到了较大的行动自由。匈牙利十月革命后的两年间,非斯大林化减慢了步伐,然而进程却从未逆转。若干外部情况,其中包括苏联对中东和非洲的兴趣日益增长,苏美两国的对抗已趋向扩及全球而不仅限于东欧这一特定的角逐场,尤其助长这一形势的形成。甚至1961年的柏林危机以及修建那堵横贯柏林把这座城市分为两半的丑恶的墙也未在其他华沙条约国家中引起什么反响:它们觉得这主要是两个大国及其德国附庸之间的争夺。另一方面,从1959年到1964年,东欧各国政府更为关注的倒是中苏关系的长期变幻莫测,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得以充分利用喜爱讨价还价的自然倾向,以转而效忠于北京的“新教皇”^①来威胁莫斯科的统治者,从中获得好处。俄国人本身对巴尔干诸国的兴趣已不如前十年。除了支持那个由于昔日的对抗而残留下来的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所谓“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外,赫鲁晓夫主要热衷于创立一套超国家的经济秩序,他同共产党伙伴们的争端也大多是由经互会各委员会的决定引起的。

赫鲁晓夫掌权时期,其他的共产党国家各走各的“社会主义道路”,有时踌躇不前,但最终还是朝着获得更大自主权的目标前进。只是到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接替赫鲁晓夫时,这些“新方针”才受到严重怀疑,而即使在那时,各共产党国家在国际共

① 原文是 the new pope, 原意为新教皇。亦可译为新权威。——译者

产党会议上仍旧得到一些让步。这些发展究竟是真正独立的预兆,或者仅仅是外部力量控制中东欧的漫长斗争中的一段插曲,直到1968年底仍然令人琢磨不定。

在这整个时期,南斯拉夫是共产党国家中最不与苏联保持一致的,而且在外交上是唯一完全独立于苏联控制之外的国家。1948年南斯拉夫与斯大林的决裂,使它有可能在组织经济企业和实行地方分权制等方面从事实验。因为有了外援,工业生产能在50年代中期飞跃发展;从1953年至1960年,工业制品出口量增加一倍以上。虽然为了使用机械和发展比较复杂的耕作技术保留了合作组织,但是自1953年以来允许农民带着土地和牲畜退出农业合作社,南斯拉夫农业中于是保存了“私人成分”。在政治理论上,最有趣的改革是将工厂和其他机构的管理权交给工人,并在1950年6月颁布一项法令,每两年选举一次工人委员会,使这项改革得以进行。1953年南斯拉夫宪法进行广泛修改后,建立起由国营企业工人通过委员会选举产生的议会第二院,因此正式承认了这些工人委员会的地位。十年之后,铁托时代的第三部宪法进一步扩大这一代表形式,创立四个生产者委员会,由它们组成议会的一个院,另一院则由构成南斯拉夫国家的六个共和国提名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代表组成。工人管理的发展和中央政府极为复杂的结构无疑使南斯拉夫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模式,而居于独特的地位。

随着经济方面的变化,发表意见的自由有所增加,并对加班加点和兼职的人给予金钱鼓励。各种企业互相竞争,结果在1952年至1961年之间南斯拉夫的生活发生显著变化。几乎没有政治犯,治安保卫人员也很少见到。不过,政治改革是有限度的:尽管非党人士被选入议会,但是不容许有组织的反对派别存在。前副总统米

洛万·吉拉斯极力主张实行西方化的民主政治，受到党的谴责，1957年竟以从事颠覆活动的罪名投入监狱，刑期四年。（后来，由于他继续发表文章批评时政，1962年又被审判和监禁，1966年12月获释，1968年夏获准前往西欧和美国。）

在整个50年代和其后的日子里，铁托始终牢牢控制着内政和外交。他的主要副手有斯洛文尼亚人、党的主要理论家爱德华·卡德尔和1945年至1966年一直负责国内安全事务的亚历山大·兰科维奇。1952年11月，党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四个月后，又扩大党的后备队伍群众组织“人民阵线”的阵容和影响，改名为“社会主义同盟”。“同盟”和“联盟”偶尔发生冲突；有一个时期，似乎“同盟”可能削弱昔日游击队领导人对共产党组织的控制。兰科维奇对同盟心生疑忌，1960年他接替卡德尔任同盟总书记时，同盟的独立性便丧失大半。1966年，同盟代表大会攻击联盟的令人窒息的古板态度。铁托支持这些批评者，当发现兰科维奇甚至利用安全措施监视总统本人时，他开始在联盟组织内进行一次短暂而有效的清洗。铁托指控兰科维奇政治上的主要同伙斯蒂凡诺维奇利用自己内务部长职务“通过窃听电话进入各阶层人民的生活”，1966年7月1日铁托解除了这两人的公职。允许兰科维奇和斯蒂凡诺维奇在公众面前为自己辩护，他们的言词公开刊登在南斯拉夫的报纸上。未对他们两人提出刑事起诉。这是南斯拉夫人民享有的人身自由高达何种程度的一项重要证明。

然而，在1966年兰科维奇事件背后有一片不祥的阴影：这次清洗的两名对象被控告为不惜损害其他民族的利益而优待了塞尔维亚人。两次大战之间遗留下来的南斯拉夫国内的民族对立情绪远远没有完全消失。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曾多次、特别是在60年代初，表示怨恨北方大力资助落后的南塞尔维亚和马其顿地区以及贫穷程度次于上述两地区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1967年,克罗地亚知识界的一批名流在萨格勒布发表宣言,指责由于过多地引进塞尔维亚语词汇和用法,已使克罗地亚语的纯洁性受到严重损害。不过,这些地区性爱国主义情绪的流露与20年代及30年代的世仇相比可以说是无害的。设立六个地区议会的作法使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有所疏泄,共和国愈来愈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特鲁姆比奇和苏皮洛设想的民族联邦。1968年发生最严重的一些冲突,是由于主要居住在科索沃—梅托希亚的一百万什奇普塔尔阿尔巴尼亚人(即阿尔巴尼亚穆斯林)怨恨地方行政机构中占绝大多数的塞尔维亚官僚办事不公道。1957年,那个通常称为科斯梅特^①的地区也曾爆发过类似的冲突,无疑是边境彼侧的地拉那煽动起来的。包括这两个城镇中的严重动乱在内的1968年的骚动,当然也可能受到那不知疲倦的恩维尔·霍查的怂恿,但335也可能是由于第一批受到良好教育的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少数民族青年成年以后,社会的分裂性煽起了潜在的民族仇恨。住在伏伊伏丁那的马扎尔少数民族超过五十万人,他们受到通情达理的对待,允许其自由使用本族语,并分享诺维萨德地区行政管理的自治权;他们与贝尔格莱德当局之间没有严重的矛盾。

南斯拉夫对外政策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在与其他共产党国家完全疏远期间,南斯拉夫难免比较靠近西方;1953年,它甚至与希腊和土耳其缔结一项巴尔干条约,这两国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不过,总的来说,南斯拉夫尽量避免与阵线分明的大国集团结盟,并且曾在联合国中发挥了不小作用。当塞浦路斯问题使希腊和土耳其关系恶化时,南斯拉夫人已准备抛弃巴尔干条约的规定。虽然迟至1955年4月三国军事参谋人员还曾在贝尔格莱德会谈,但是巴尔干条约和以前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许多条

① 原文为 Kosmet, ——译者

约一样成了历史的故纸。南斯拉夫人宁可突出强调他们的中立，其办法是与亚非的“不结盟国家”合作，一个明显的例子是1961年9月在贝尔格莱德召开的一次难忘的国际性国家首脑会议，与会者有二十多个国家的代表。与此同时，南斯拉夫人全力以赴地改善与不发达国家的贸易关系，尽管他们既向布鲁塞尔召开的欧洲经济共同体(共同市场)的各种会议派遣观察员，又从1964年下半年起参加共同市场的对手即由苏联发起的经互会的若干机构。

甚至在赫鲁晓夫和铁托在1955至1956年互访以后，南斯拉夫同它的北面和东面的共产党邻邦仍然偶尔关系紧张，至于和阿尔巴尼亚的关系则从未真正改善。从1957年最后几个月到1962年春，贝尔格莱德和莫斯科用相当猜疑的眼光互相打量着，这一部分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强烈反对南斯拉夫的一切，而俄国人名义上仍与中国共产党友好。应该说明，中国持这种态度并不完全由于北京不赞成南斯拉夫在意识形态方面离经叛道，而是因为中国和南斯拉夫在东南亚新兴国家，特别是在印度尼西亚，都是政治和贸易上的对手。1961年10月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苏联和中国的疏远进一步公开化，促成赫鲁晓夫和铁托之间再一次改善关系。从1962年9月这位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至1964年10月他垮台时，南斯拉夫和华约国家之间关系密切。在这期间，铁托本人又一次在莫斯科受到接待，并与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及罗马尼亚的领导人互访。赫鲁晓夫辞职时，铁托冒着得罪苏联新主子的危险，公开为已下台的部长会议主席的政策辩护。然而，此时尚无明显裂痕：1964年12月，苏联代表团出席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大会，次年6月，铁托再次前往莫斯科。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使苏南关系达到自斯大林逝世以来未曾有过的紧张程度。当华约五国在1968年8月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时，不过十天之前还在布拉格

的铁托总统发出了愤怒的谴责。他声称“外国军队未经合法政府邀请便擅自入境……践踏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主权”，是对“社会主义和世界进步力量”的严重打击。数月之内谣言四起，传说在匈牙利南部和保加利亚有部队调动，令人惴惴不安。

面积还不及苏格兰三分之一的国家阿尔巴尼亚，自1948年起便执拗地孤立于所有邻国之外。恩维尔·霍查这位丝毫不肯通融的第一书记，保留了斯大林主义的全部作法，控制着党，虽然还允许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在日常行政工作中发挥一些主动性。阿尔巴尼亚制定对外政策的主要依据是它与南斯拉夫的潜在冲突。因此，铁托与赫鲁晓夫在1955年的关系改善便标志着苏阿关系开始恶化，而在阿尔巴尼亚人接受了毛主义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的解释，并于1961年处决一批亲苏党员以后，苏阿关系更加迅速恶化。那年，断绝了与苏联的所有联系，接着在1962至1963年得到中国的大力资助。1968年9月，阿尔巴尼亚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正式退出华沙条约，因为其成员国对捷克斯洛伐克背信弃义，说明他们是“货真价实的法西斯分子”。阿尔巴尼亚怀疑保加利亚人正在重新提出1878年圣斯特法诺条约中规定的对全部马其顿疆土的要求，这导致1968年地拉那和索非亚之间的一场互相辱骂。不过并未相应地出现其与南斯拉夫或希腊和解的迹象。如果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再次驰骋于巴尔干山脉一带，南、希两国甚至比阿尔巴尼亚更要遭殃。在阿尔巴尼亚这个甚至在共产党控制下仍然贫穷落后的国家里，继续郁积着宿怨。如果发生任何重大冲突，阿尔巴尼亚人民除了摆脱锁链以外将一无所失。

337

整个50和60年代，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对于社会主义能容忍多少个人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观点，一贯代表着两个极端。要用这种价值尺度来衡量波兰就困难多了。波兰1957年1月的选

举允许选民自由表达自己的情绪的程度，远远超过华沙条约任何国家通常的做法，选民可以划掉工人党候选人的名字，有时可以拒不选举他们而另选其他派别的代表。选举规则仍保证工人党能获得多数选票，但是与以往各届议会比较，新的议会中反对派势力较大，议员中有从前的农民党党员和罗马天主教徒，他们现在又获准组织各种政治俱乐部。小心翼翼地采取这种自由民主的措施是哥穆尔卡执政头五年中进行的各种有限改革的特点。但是到1962年，这种实验又奉命停止；到1963年夏，哥穆尔卡似已放弃使他掌权不到七年的纲领而全面倒退。

1956至1957年的变化是显著的，其中一些具有长期的性质。例如，在农业方面广泛地改变了人们憎恶的集体化制度，肯定了土地私有制是最适合波兰情况的农业制度：哥穆尔卡执政的整个时代，波兰有五分之四以上的可耕地为私人所有。此外，1957和1958年所采取的限制秘密警察权力的措施导致旧时的窥探、镇压制度真正有所放松。1965年，有迹象表明这一制度又将恢复，哥穆尔卡便亲自干预，命令以军纪约束国内治安部队。1968年7月，为了阻止警察再一次的迫害，他调换了内务部的行政人员。但是也有许多弃置不用的方案被扔在波兰“社会主义道路”的旁边。到1957年底，在“十月之春”中昙花一现的文化自由和创作积极性已经大为减少。1963至1964年，以及1968年初夏在华沙和克拉科夫、卢布林、波兹南等大学城的学生发生骚动之后，哥穆尔卡曾经常攻击进步的知识分子，指责他们散布荒谬、有毒的理论。

然而，引起最严重冲突的是宗教问题。1956年12月，当过激的宗教情绪可能使“新面貌”的政府和苏联之间的微妙关系就像在匈牙利那样破裂时，波兰总主教红衣主教维辛斯基运用他在宗教界的德高望重的地位支持哥穆尔卡。作为酬劳，波兰主教团的神职人员获准在学校甚至在军队中自由活动，他们的这种影响是在

任何共产党国家无与伦比的。及至 1960 年夏，政府似已对教士的影响之大深感不安，于是对用于教会活动的建筑物征收特别税，议会也通过法令，重申学校的非宗教性质。由于教会反对政府的节制生育政策，导致共产党人发动一场运动，竭力把维辛斯基描绘成反动分子，认为他比其他主教和牧师落后一些。

1965 年至 1966 冬春之交，冲突发展到高潮，原因是波兰的宗教界首脑致函西德主教团，邀请一些主教参加 1966 年 5 月波兰皈依基督教千年庆典，表示愿意彼此宽恕和忘记战争中发生的一切。哥穆尔卡坚持说这封信无异于教会干涉外交事务；政府拒绝给愿意来波兰参加庆祝活动的外国人发入境签证，这一恶意行动未免器量狭小，但是却有效地阻止了保罗教皇预定的访问。大多数波兰人支持教会显要，尽管共产党人组织了反对千年纪念日的游行，而且宣传维辛斯基是亲德分子，他所鼓吹的是“宽恕敌人的奴才哲学”，但是仍有数十万信徒参加宗教纪念活动。这场争端的后果反而提高了这位红衣主教在群众中的名望。哥穆尔卡鬼迷心窍似地对德国问题念念不忘，对比之下，维辛斯基倒显得不念旧恶，尽管他的性格在社会问题上保守的。

1962 年，哥穆尔卡对“自由化”的态度的转变表面化了，这是由相互关联的两件事引起的：一是某种程度上由于 1957 年政治局拒绝采用南斯拉夫式地方分权制度的建议，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二是党内有了一个难以对付的新斯大林主义和排犹太的派别。这个新派别的领袖是前抵抗运动战士、通过党务工作一步步爬上去的里沙尔德·斯切莱斯基和 30 年代职业军队旧军士、在政治生活中仍颇多地保留着行伍生活粗鲁习气的米耶茨齐斯拉夫·莫茨扎尔。他们的追随者被认为是游击队员，经常聚众滋事；辱骂“犹太人、自由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号召采取强有力的行动对付示威的学生，掀起一阵阵波兰民族主义情绪的浪潮。这些游击队员

们崛起之时，恰值 1964 年春失业人数增加到二十五万。无职业的工人大多数是青年，是人口陡增与强制性经济收缩的偶然受害者。⁴³⁰ 当时的状况更像是魏玛德国的末日，而不如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健康成长的情景。

哥穆尔卡对付莫茨扎尔和游击队向他本人的挑战要比对付经济欠佳的本领高强。1964 年初，斯切莱斯基进入政治局，莫茨扎尔就任内务部长；但是哥穆尔卡削弱了内务部长的实际权利，并且几乎不理睬斯切莱茨基的建议，从而抵消了这股已经增长的势力。整个 1966 年，莫茨扎尔仍然很有影响，在 1967 年 5 月的工人党重要会议上，他猛烈攻击“间谍和帝国主义的特务”在波兰横行无忌。1968 年第一季度，反犹太主义极其猖獗，因此在同年 6 月举行的一次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引起争论，哥穆尔卡玩弄手腕，把莫茨扎尔排斥出政治局和内务部，但是莫茨扎尔和斯切莱茨基都成了仍以哥穆尔卡为首的工人党八人组成的书记处的成员。1967 年 4 月，第一书记的一位老朋友和同僚斯彼哈尔斯基元帅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取代了自从 1964 年 8 月以来一直担任这个职务而没有倾向性的奥哈布；但因社会主义波兰国务委员会主席的权力不及两次大战之间波兰共和国总统的权力，所以斯彼哈尔斯基的升迁对哥穆尔卡派的地位几乎毫无实际影响。波兰的权力之争持续的时间比其他共产党国家都长，存在这样的可能性：最终的胜利者既不是哥穆尔卡，也不是莫茨扎尔，而是西里西亚党的首脑盖莱克。

尽管 1964 年曾紧急实行改革，在总的计划范围内给予工厂以较大的管理本厂事务的自由，但是从 1963 年至 1968 年，波兰经济仍不稳定；波兰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得依靠经互会其他成员国特别是苏联来扶持，这分明限制着这个国家独立行动的自由。失业人数进一步增加的可能性继续使议会惊惶不安：到 1966 年，每年约

有一百万青年完成其正规教育，寻求工作，而目前的工业却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除非移民出境（华沙和莫斯科对此都不赞同）或发动一场规模巨大的“回到田间去”的运动，似乎别无他法。

国内问题限制了改革后的波兰政府在早些时候表现出来的外交上的独立性。波兰外长拉帕茨基在1957年10月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建立一个包括波兰和两个德国在内的无原子区的建议，随即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支持。人们称作的“拉帕茨基计划”也受到 340 英国工党的欢迎，一些美国知识分子认为它是“脱离接触”的第一步，表示对它颇感兴趣；但是“拉帕茨基计划”在西方的拥护者当时全是政治上的在野党发言人，因此，当1961年苏联需要极力支持东德时，这计划就被束之高阁，不久便被人们遗忘。此后波兰便奉行一项符合其苏联盟友愿望的外交政策，而拉帕茨基似乎也一直紧跟哥穆尔卡的旨意行事，直到1968年秋他离开外交部时为止。哥穆尔卡本人对世界局势有两点固定不变的信念：一是确信德国是一个危险的要求修订战后和平条约的国家，它急不可耐地想把波兰人从他们在1945年获得的土地上赶出去；二是认为美国对任何问题的政策都口是心非，有害于波兰，这一观念的由来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他父亲是作为一个幻想破灭的移民在他即将出生前从美国回到加利西亚来的。究竟是由于害怕德国、害怕多如牛毛的美国间谍，还是由于波兰人历来害怕捷克人，则不甚清楚，但是，其结果是哥穆尔卡和拉帕茨基支持华沙条约国家在1968年夏天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恐吓。这一行动突出地表明波兰再次依附于苏联到了何等程度：它与1956年“十月之春”时无视苏联的姿态恰成鲜明对照。

波兰已从1956年制定的改革规划全面退缩，卡达尔领导下的匈牙利却与此完全相反。直到1959年11月匈牙利党代表大会召

开之时为止，卡达尔政权基本上采取守势，尽管他渴望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总是抵制重新加强警察恐怖统治的诱惑。代表大会以后，党再一次允许人们批评党的工作方法；自1956年以来便全都深受疑忌的作家们也获准有较大的言论自由。1961年恢复与西方的文化联系之后，所许可的艺术自由甚至更大些，匈牙利人出国旅游的数量超过战后任何时期。1963年3月颁布大赦令，几千名政治犯获释，非党人员开始参加国家企业的管理工作。甚至在卡达尔的苏联朋友和支持者赫鲁晓夫倒台后，摆脱旧日党的狭隘的清规戒律的趋势仍在继续着。1966年公布一项选举改革条例，允许选民从本选区的几名候选人中进行选择，而不是唯有接受党按照全国范围宣布的名单；不过所有候选人必须是“爱国人民战线”——一个包括党和所有社会组织以及文化团体的庞大联合体——的成员。随后，卡达尔似乎真正失望，因为1967年的竞选运动是在一片无动于衷的气氛中进行的，大多数选民对政治问题漠不关心。但是他采取措施，严防人们在1966年10月以任何行动纪念那场失败的革命十周年。此后不久，任命高级警官科罗姆·米哈伊为司法部长，这也是一种不祥之兆。

如果说很多匈牙利人真像卡达尔在1967年3月抱怨的那样，都不参与积极的政治活动，部分原因在于以前十年中发生的一些事件，部分原因则是从1963年底开始，大量消费品再次出现在市场上，“赶快发财”的实利主义风气弥漫社会各个阶层。卡达尔自1959年以来所进行的经济变革是以南斯拉夫为榜样，鼓励竞争，分散权力；而这些措施也得到苏联的大力支持。1960至1965年的五年计划突出了重工业，特别是化学工业的重要性，不过也准许制造家俱、鞋、衣服、公共运输车辆、甚至非必需的奢侈品。农业方面，匈牙利取得的进展较小，整个赫鲁晓夫时期一直被迫从苏联进口谷物，这无异于对合作化最初几年情况可悲的评语。卡达尔把

这种合作管理的原则推广到几乎所有的农场，但是与拉科西的方法相反，他保证农民们可以保留一小块土地，还可以在自由市场上按照传统方式出售农产品，用这种方式吸引农民加入合作社。60年代中期，农业产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制度却仍然脆弱，1968年春天的一场大旱使匈牙利再次依赖苏联供应谷物，而这正是苏联反对中欧社会自由化的种种表现形式趋于强硬的时候。

卡达尔自重新掌权到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整整十二年中，一直控制着政策。他在党内从未遇见过折磨着哥穆尔卡的那种困难。他曾两度身兼政府首脑和党的主要负责人的职务：1956年11月至1958年1月他的第一次内阁，主要致力于镇压革命失败后的罢工运动；1961年9月至1965年6月他的第二次内阁，是一个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时期，他竭尽全力与潜在的敌人和解。1964年甚至与梵蒂冈达成协议，尽管匈牙利的总主教仍在美国大使馆避难，还是让罗马天主教多少有一点活动自由。卡达尔辞卸总理职务后，接替他的是3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人、1942至1943年间 342 与拉伊克积极参加反战运动的卡拉伊·久洛。卡拉伊是卡达尔亲密的政治伙伴和朋友：他于1951年被“阿弗欧”逮捕，判处死刑，在死囚牢里关了两年，纳吉·伊姆雷首次任总理时，他才获释。卡拉伊不喜欢警察使用的方法，他似乎曾经对政府中某些较少自由思想的阁员加以约束。1967年4月，他成为匈牙利议会的议长，将总理职务移交给长期以来充当卡达尔的劳资关系顾问的经济学家福克·耶诺。福克政府立即实行经济改革，于1968年初付诸实施：允许关闭亏损的企业，鼓励进一步分散领导权和工业更加多样化。匈牙利某些地区物价上涨和失业的威胁使福克的经济改革遭受责难；在整个1968年中，他不得不大大依靠卡达尔的支持。五十六岁的卡达尔在党内是一位受人拥戴的父亲般的人物，任期之长甚至在当时就已超过拉科西。

纳吉·伊姆雷及其僚属被苏联人逮捕并准备于1958年初夏对他们起诉期间，罗马尼亚拘留了这些人，从而在镇压匈牙利革命中扮演了凶恶的角色；尽管如此，1956年匈牙利和波兰所发生的事件无论对保加利亚还是对罗马尼亚都未产生太大的影响。但是，这两个巴尔干国家，靠着外交技巧高超和敢于标新立异，对中苏争端的每一次浪潮都做出了反应，虽然他们究竟对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说教真有多少同感，颇可怀疑。

从1956年到1961年的保加利亚国内政治是一种奇异的混合物，一方面是由议会勇气十足地宣布为“大跃进”的大幅度经济改革，另一方面是日夫科夫、于哥夫和契尔文科夫之间三鼎足的权力之争。契尔文科夫虽在1956年春被迫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但在其后的五年中仍拥有相当的影响。1958年他曾访问中国，在北京受到盛情款待，回国后，保加利亚随即采取迅速实现工业化的政策，模仿当时正在改变中国经济的庞大的、多种多样的计划，只不过规模较小罢了。保加利亚的政策令人沮丧地失败了，因为结果证明连最低的发展目标都未能达到；而且看来这个国家不得不甘心扮演1958年5月经互会会议让它充当的“乡下老倌”角色，当时设想保加利亚只能经营农业。在政治上，“大跃进”的失败致使契尔文科夫格外时运不佳，一些由他任命的部长也被解除了职务。只要计划看起来有几分实现的可能性，日夫科夫就是大跃进最积极的代言人，可是一旦保加利亚经济表现出缺少这一形象比喻所要求的杰出的体育技巧，日夫科夫就埋头党务，让于哥夫去搞掉契尔文科夫，于是在1961年底，契尔文科夫就从政界悄然消失。谣传中国可能开始帮助保加利亚人度过难关，这一流言竟使俄国人大为震惊，结果是苏联开始以投资的方式支撑保加利亚经济，加强已是证据确凿的“反毛主义者”的日夫科夫的地位以反对他的对手。

在契尔文科夫最后垮台恰好一年之后的1962年11月，于哥夫接受劝说自动辞职，日夫科夫旋即成为部长会议主席，并兼任党的第一书记。

虽然此后六年中常有日夫科夫即将辞职的流言，他却继续把这两个职务抓在手里。赫鲁晓夫利用他作为苏联政策的国外代言人，在试探其他共产党对中苏较量中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争论的反应上，他具有特殊的作用。赫鲁晓夫下台后，日夫科夫为勃列日涅夫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一个突出的例证是在1966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上，他十分笨拙地向恩维尔·霍查伸出了手，表示和解，而后者却不予理睬。在国内事务中，日夫科夫上台伊始便摆出一副向自由化前进的时髦姿态：释放了政治犯；报纸上批评行政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其言词之尖刻是罕见的。但不出六个月，日夫科夫又转而全面攻击文化生活与政治生活中的“自由化”，不久这个国家几乎又全部恢复了斯大林式的僵化状态。1965年4月，秘密警察发现了一桩军事阴谋，它原来预谋建立一个基本属于全民性的而不受莫斯科控制的共产党政府，其总的政策则与南斯拉夫权力分散的政府相类似。保加利亚人民的不满情绪究竟达到了什么程度，难以估计：次年2月举行的选举表明，百分之九十九点八五的选民投票赞成提交给他们的独一无二的“祖国阵线”名单，这是个一手炮制的大肆夸张了的数字，它反而表明日夫科夫的真正追随者已寥寥无几。选举之后三星期，该党的主要意识形态理论家米特科·格里戈洛夫继契尔文科夫和于哥夫之后被打入政治冷宫；日夫科夫发表演说，宣称在一年之内对外贸易猛增百分之九十七。

到1968年初，日夫科夫已在附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调子，同声斥责战后的一代对政治漠不关心。他号召保加利亚青年共产党员应以国家的传统而自豪，而其结果则十分不妙；因为具有民族

344

主义传统的人们偏偏选择圣斯特法诺条约^① 签订九十周年大肆庆祝，断言马其顿土地本属保加利亚所有，这就遭到贝尔格莱德尖锐的反驳（如前所述，也遭到地拉那的反对）。整整一年，保加利亚与邻邦南斯拉夫关系紧张，而在日夫科夫取道瓦尔纳和奥德萨向斯洛伐克派遣坦克和步兵部队以表示对苏联盟国的忠诚时，紧张关系明显加剧。看来，只要俄国人继续支持保加利亚的经济，日夫科夫便没有理由不把这个国家与华沙条约组织紧紧拴在一起，也把谴责北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护视为自己的本职。

有很长一段时间，罗马尼亚是多瑙河流域国家中正统共产主义的最后一座堡垒。但把乔治乌-德治看成斯大林分子是不正确的，因为直到 1962 年他对赫鲁晓夫的旨意就像他对其前任们的旨意一样唯命是从。不过在乔治乌-德治的领导下，罗马尼亚工人党建设得像一个列宁所设想的、为社会主义的成功所必不可少的强有力的“革命干部”：该党作为一个机构从未受人拥戴，一般说来，罗马尼亚人并不喜欢它的教导，但它组织严密，而且在 1952 年的清洗之后就出色地团结在其领导人的周围，这与波兰党和保加利亚党大不相同。

在斯大林时代，罗马尼亚受到俄国人的无情剥削：苏罗联合公司接管了战前那些依靠外资的企业；而罗马尼亚的石油和谷物却以爆玉米花一般低廉的价格卖给苏联。红军仍旧呆在罗马尼亚，给它的保安部队撑腰。到 1957 年，罗马尼亚俨然成为一个被吓得服服贴贴的管辖地；1958 年 6 月，赫鲁晓夫已十分有把握地觉得乔治乌-德治将继续支持他，便把全部苏联部队撤出罗马尼亚，他们或渡过普鲁特河撤至比萨拉比亚，或向西撤至匈牙利。

^① 结束俄土战争的条约（1878 年 3 月 3 日）。——译者

乔治乌-德治把工业化当作共产主义信仰中的一项主要内容而深信不疑；他于1960年建议实行一项开发特兰西瓦尼亚矿物资源以及在全国的西南部增建水电站的六年计划。优先考虑的是加拉茨的大型冶金联合企业，乔治乌-德治二十几岁时曾在该地当过电车轨道修理工；还有一个项目是距布加勒斯特八十五英里的斯拉蒂纳的炼铝厂。乔治乌-德治在党代会上宣布这计划时，赫鲁晓夫在场，演说一结束，赫鲁晓夫便以其惯有的热情鼓掌欢呼，亲自表示这计划得到了他个人的赞同。但是，1962年9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会议上，这位苏联领导人却建议在东欧推行超国家的经济规划，据此，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得集中力量发展农业，而把工业生产留给那些工业已经成为其经济主要部分的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罗马尼亚人对经互会伙伴们的这种专横深感愤怒：它使罗马尼亚的六年计划和已经投入该计划的资金和劳力成为一通胡闹，它无视罗马尼亚的工业增长率已经高于欧洲其他共产党国家这一事实；它忽视了那些未经开发的、到80年代初便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变成一个具有捷克斯洛伐克那样生产能力的工业国家的自然资源。派往各委员会的罗马尼亚代表拼命反对经互会的建议；到1963年秋天，提出这些建议的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似乎已把建议作了重大修改，甚至可能已经抛弃掉了。 345

而罗马尼亚人甚至在反对经互会计划取得胜利之后，继续对苏联表现其独立性，他们与美国和西欧、特别是与德国和法国加强了经济联系；国内事务方面，在教育、文化，甚至在为街道广场命名这种事情上，各种反苏的刺激性小动作都受到鼓励，这一系列姿态虽然稍嫌幼稚，却颇得人心。更为严重的是，罗马尼亚人力求与中国共产党人和他们在欧洲的傀儡阿尔巴尼亚交往：其他经互会国家减少了与北京的接触，他们却扩大了与中国的贸易；他们发表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赫鲁晓夫进行的教条主义攻击的主要内容，而

且罗马尼亚总理在1964年访问北京,1966年6月周恩来进行礼节性回访。中国对布加勒斯特可能产生影响,这一威胁使得赫鲁晓夫及其后继人容忍了罗马尼亚的冷淡,这在前几年是不可想象的。1963年,赫鲁晓夫怂恿波德纳拉希将军推翻乔治乌·德治、建立亲苏政权的明显企图未被理睬:波德纳拉希率领一个外交代表团访问贝尔格莱德和北京,表明他无意再次给苏联充当仆从。

党中央委员会在1964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声明确切宣布罗马尼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立场:它谴责经互会的超国家经济计划,重申每个共产党国家均享有国家主权,各共产党之间一律平等,坚决主张任何一个党的政策都不应听命于其他党。这种独立性很强的态度招来华沙条约国家的批评,也导致苏联力图统一与中国对抗的政策。齐奥塞斯库根据1964年声明,谴责了1968年一切惩戒捷克斯洛伐克的企图;正如他在那年7月15日的一次演说中所说的,“我们连一刻也不曾想到过,华沙条约竟被用作干涉其他国家内政的正当理由。”他随后又访问布拉格,而在苏联入侵之后,他严厉斥责这种“对兄弟国家主权的公然践踏”。

乔治乌·德治1965年3月逝世,齐奥塞斯库继任党的总书记职务。这次人事变动没有引起政策上的什么变化,因为齐奥塞斯库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这位已故的领导人,政府仍由从1961年3月起便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杨·格奥尔基·毛雷尔领导。齐奥塞斯库粉碎了保安部头子亚列克山德鲁·德勒吉奇再次拼凑亲苏派别的笨拙尝试,从而迅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967年12月,齐奥塞斯库当选为总统,这样,他又重新实行乔治乌·德治在其最后四年里的做法,身兼党的领袖和国家首脑两职。齐奥塞斯库和毛雷尔都急于要改革罗马尼亚国家机器对内实行镇压的恶名,在1968年4月举行中央委员会会议,为1954年被处决的帕特勒什坎努昭雪,还为更早些时候的受害人平反,委婉地说他们是“虚构供词”的

牺牲品；然而党仍旧不愿采取积极的自由化措施。

在毛雷尔任部长会议主席期间，过去那些约束着罗马尼亚民族自豪感的措施都取消了，这一过程起初几乎难以察觉。修订后的“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于1965年通过，与1952年通过的宪法相比，已在少数民族地位问题上作了重大修改；1952年宪法予以保证的马扎尔自治区在新宪法中没有特别提到。实际上，该自治区的独立性在1960年便已大为削弱，政府几次企图把设在克卢日的匈牙利大学并入罗马尼亚大学。在较低一级则关闭了一些少数民族学校，因为它们“已不再是必要的了”。报纸重新强调罗马尼亚民族古老的拉丁特色；1968年春戴高乐进行国事访问时，热烈祝福连结巴黎和布加勒斯特的纽带。1967年10月，罗马尼亚改变了原来的全国行政区划，将人民共和国划分为四十八个县，与卡罗尔二世在位时的行政区划极其相似，同时取消了所有的马扎尔自治区。另一方面，七位副总理中有一位少数民族匈牙利人福泽考什·亚诺什，宪法也仍然保障居住在境内的各民族可以“自由使用其本族语”。1968年，马扎尔少数民族看来不象以往四十年那样受压制，但是社会地位仍然较低；每逢共产党罗马尼亚³⁴⁷的整个政策受到它那些华沙条约邻国责难时，他们无法在布达佩斯提出这个问题。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复苏还有其另外的一面。失去北布科维纳，特别是失去比萨拉比亚以后而产生的忿恨公开化了。1964年12月，罗马尼亚科学院发表卡尔·马克思一篇被忽略而从未编入文集的手稿，这篇文篇攻击俄国人于1878年并吞比萨拉比亚，并在那里施行苛政；尽管马克思抨击的对象是沙皇暴政，但是，沙皇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与八十多年后的共产主义伙伴苏联的所作所为令人难堪地相似。官方注意避免公开流露要求修订和约的情绪；所以当齐奥塞斯库1966年5月7日发表关于罗马尼亚共产党历

史的长篇演说时，他只是强烈谴责昔日的共产国际曾号召肢解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罗马尼亚，以及罗马尼亚在“不公平的条件”下，根据维也纳裁决书把特兰西瓦尼亚的部分土地割让给匈牙利；他却让听众自己去判断，罗马尼亚同时被迫割让土地给苏联，并在战后确认其为苏联领土是否也同样不公道。齐奥塞斯库在演说结束时强调“为摆脱外国压迫的桎梏奋斗了几个世纪、梦想自由和民族独立”的各族人民决不会甘心“放弃这些神圣的特权”，他清楚地表明自己与曼纽和布勒蒂亚努父子一样，也是一位罗马尼亚的爱国者。1944年时他的共产主义青年联盟曾把苏联军队当作将布加勒斯特从沙文主义反动派手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先锋加以欢迎，从那时以来，他已经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哥特瓦尔德逝世后的十年中，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领袖人物没有发生什么更动。诺沃提尼一直是党的领袖，并于1957年萨波托茨基逝世后成为共和国总统。西罗基当了那整整十年总理。但是，在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看来，政治不如经济那么重要。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早在战前就是中东欧国家中独一无二的高度发展的工业国，而且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工厂遭受空袭和入侵的破坏也较小。哥特瓦尔德和他的继任者们都继续执行把工业发展到斯洛伐克高原地带的政策，这政策始于战争期间，贝奈斯认为它是有利的。1949年公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时，颁布了一项官方指令：“按照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机械工厂”。

共产党政权建立后的最初十二年，捷克斯洛伐克工业蓬勃发展，经济成为稳定的典型。苏联向捷克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绝大部分原料，而成品又重新出口给俄国人和他们的经互会伙伴。统计数字表明，尽管数字落后于五年计划的乐观设想，生产却稳步上

升。生活水准高于毗邻的各共产党国家：没有听到有关食物严重短缺的报道，并且在1953年夏取消了定量配给制。那年6月发生过由于币制改革而引起的骚动，但是在50年代，捷克人并未严重抵抗共产主义。外界观察家认为，他们的态度似乎是既对政治漠不关心，又对官僚主义的腐败颀颀报之以无声的蔑视，同时还表现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反苏情绪从未潜藏心底，却是被完全控制住了。

捷克的五彩肥皂泡的破灭是发生在1961年，尽管直到1962至1963年那个严寒的冬天，整个国家才充分体会到经济危机的影响。陈旧而又过度损耗的机器大批报废；电力不足降低了生产，也给家庭带来困难；前一年农业歉收，运输系统的瘫痪又妨碍了粮食的分配，因而粮食匮乏。这次生活水准突然下降的原因应追溯至很多年以前：大量的投资用于重工业，致使作为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专长的制造加工等轻工业遭到忽视而日渐衰落；过分的中央控制抑制了地区生产的多样性和主动性，对欧洲以外的欠发达国家所承担的义务导致忽视国内至关重要的维修、保养和现代化的主要工厂。正如后来批评这种制度的人所强调的，行政官员太多而技术工人却不足，因为某些工业——特别是纺织业——的经理部门并未设法补足1945年至1946年从苏台德地区赶走的讲德语的手艺人。农业的情况和工业一样糟：集体化强使耕作方法一律化，而这些方法对国内很多地区并不适宜；值得注意的是，仍允许农民开垦的小片自留地，生产率却比集体农庄相对地高些。农民极不愿意对农业计划采取合作态度，在斯洛伐克尤其如此。

尽管有这些缺陷，诺沃提尼仍然继续掌权，安然度过了经济危机。1962年2月，他宣布斯大林主义分子、前内政部长鲁道夫·巴拉克因“滥用职权”和贪污罪被捕，随后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另外还有一些次要官员被褫夺政治权利。但是，割除这些赘疣并未

使捷克斯洛伐克工人满意。1960年7月通过了一部宪法，标志着革命阶段已告完成，并将国家名称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与此同时，党的官方报纸大许其愿，把这些诺言和现实生活水准两相比较，许多工人都有幻想破灭之感。大学生比工人易于激动，他们在1962年底举行示威游行，反对仍在政府中任职的铁杆斯大林分子，作家也开始冲破书刊审查而提出批评。

1962至1963年间最严重的动乱，发生在斯洛伐克。其所以如此，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农民对集体农庄的经营管理方式不满，工人对决定关闭一些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在斯洛伐克建立的多余的而效率不高的工厂特别愤怒。政治不满情绪的爆发，一则是由于中央政府不允许斯洛伐克真正享有任何程度的自治，根据1960年宪法，把“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立法权严格地局限于地方事务；一则是由于继续监禁两名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修正主义者”——拉佐·诺沃麦斯基和古斯塔夫·胡萨克，他们在诺沃提尼成为党的领袖之后不久、斯大林主义还正风行之时即被判罪。虽有一个同胞担任总理之职，这一点远不足以使斯洛伐克人感激涕零，他们认为西罗基不过是诺沃提尼一切决定的橡皮图章，太过于唯唯诺诺。而且大多数党员对布拉迪斯拉发第一书记卡罗尔·巴齐列克看不上眼，此人也是诺沃提尼任命的。

整个1963年，诺沃提尼总统采取守势。他已于1962年取消第三个五年计划，试图依靠较为灵活的方式增加生产，以一年为单元管理经济，并希望捷克斯洛伐克的工业能得到经互会的支持。与此同时，他在政治上作出更大让步。诺沃麦斯基和胡萨克悄悄地获得释放，并准其恢复在斯洛伐克共产党内的活动。巴齐列克在1963年4月被免职，接着西罗基在9月也被免职。斯洛伐克国民议会主席约瑟夫·列纳尔特奉召从布拉迪斯拉发前往布拉格接替西罗基任总理；他四十岁，曾在前拔佳制鞋厂担任工会组织人，后

于 1958 年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人们估计,他在布拉格将会证明自己不像西罗基那么驯服。巴齐列克的继任人是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他比列纳尔特大一岁,30 年代曾在苏联受过教育。由于杜布切克在 1955 年至 1958 年又回莫斯科学习了三年马克思主义理论,人们认为他是赫鲁晓夫的得力支持者;但是尽管诺沃提尼 1963 年也得到赫鲁晓夫的大力支持,杜布切克却与大多数斯洛伐克人一样喜欢批评总统和他的政策。然而在 1964 年 10 月,诺沃提尼仍然充分控制着党的官员们足以确保再一次当选任期七年的总统之职。 350

伴随政治领袖的变动而来的是自由化倾向。1963 年 9 月全国最出色的经济学家奥塔·西克教授被允许在党的主要意识形态月刊上发表文章,号召彻底重新估价当前的经济结构,有许多人赞同他的意见。在布拉格以外的地方,政治上也有变革的迹象。1964 年 5 月,扩大了斯洛伐克国民议会的权力,并恢复 1960 年以前一直在斯洛伐克实行的地方行政专员制度。斯洛伐克的文学刊物十分公开地表现了这一新的批判精神。布拉迪斯拉发在 18 世纪末作为启蒙主义前哨城市所享有的文化威望有所恢复;1967 年夏,这个古老城市的无数书店出售大量书籍,可供选择的范围之广,引人注目,这种破格行为与上游几英里之外满布瞭望塔和铁丝网的戒备森严的奥匈边界形成奇特的对照。对党的权威们来说,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种种思想未免过于先进;1965 年 3 月,埃乌根·洛埃布尔在斯洛伐克的一家文化刊物上发表文章,主张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个人的权利高于集体的权利,他因宣扬错误的价值观念而受到批判。他不仅是个斯洛伐克人,还是个犹太人,曾因斯兰斯基事件余波的牵连而被监禁;他的作品既是他出于理智的产物,更是他发自良知的声音。

诺沃提尼鼓励奥塔·西克制定一个能为捷克经济带来较大灵

活性的“新经济模式”(NEM)，希望藉以安然渡过这一愤怒的浪潮。随着繁荣与工资稳定的局面重新出现，有迹象表明，诺沃提尼有意再次取缔作家和知识分子刚刚获得的自由。新经济模式建议让私营企业组织成综合性的协作托拉斯。中央的控制应降低到最低限度，即制定一般性质的长期计划。某些物价将自由决定，另一些由各个托拉斯根据市场情况协商确定，而若干基本产品则按中央管理机构规定的价格出售。对生产效率高的企业，除工资和薪金外另加鼓励性报酬。这一改革方案于1965年1月通过，但经过两年时间新经济模式才在经济的各部门开始施行。西克教授在党报上抱怨说，改革之所以迟迟不予实施，是由于内阁官僚们过分考虑的保守态度。1966年的进展比预期的缓慢得多，这年年底，埃乌根·洛埃布尔和西克一起批评当局不愿鼓励自由竞争，但是全年的总产量却增加约百分之七。物价上涨之猛，超过计划者预先的估计，党中央委员会不得不于1967年5月采取紧缩通货的办法，而为了把苦丸药裹上糖衣来缓和矛盾，略微增加了一些社会保险福利措施，含糊地允诺在此后两年内尽力实现每星期工作五天，基本工作时数为四十二小时。经济危机的阴影继续笼罩着全国，这个“社会主义共和国”蛮象会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1966年五一劳动节举行庆祝活动，布拉格发生了第一次严重动乱，学生们撕掉政治标语，辱骂警察。两星期之后，大学生的春假变成了大规模政治示威，其中一条标语是“苏联万岁——但是靠它自己的资源万岁去吧！”。诺沃提尼利用6月初举行的第十三次党代会谴责学生，责备在文化杂志上发表文章的不负责任的作家是青年人胆敢提出错误的政治观点的根源。他对那些鼓励散布“资产阶级思想”的知识分子发出严厉警告。这类警告收效甚微。1966年9月，埃乌根·洛埃布尔的又一阵连珠炮般的谴责震撼了内阁中那些“教条主义者”，但是他既未能把他们赶下台，也没有招来当

局的报复。1966至1967年的那个冬天双方暂时停火，但仍骚动不安和互相猜疑。而与此同时，人们要求进一步清查过去的冤案，为无辜被判为叛徒的人恢复名誉。到4月，诺沃提尼的地位似乎已相当稳固，一次共产党国际会议因而得以在卡罗维发利举行。除了控诉美国人和西德人的罪恶之外，会议未能就任何问题取得一致意见。人们看到“一切进步力量政治统一战线”已很虚弱，诺沃提尼竭力集结力量以求实现新斯大林主义的团结一致的企图，颇有些象天鹅垂死时一曲凄婉的哀歌。

从1967年6月到9月，党和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的关系一直紧张，当局要求保证一切文化活动都应符合意识形态的正确政策的企图激起作家们的愤怒。与这一冲突相联系的是反犹太主义重新抬头，因为许多作家是犹太人，党本身在中东冲突中支持阿拉伯人，而总的说来，舆论却同情犹太人的事业，赞赏以色列国家所取得的成就。然而，捷克斯洛伐克的自由革命的发端却是对物质生活条件的抗议，而不是大规模的政治示威。10月31日晚，学生们手擎蜡烛从大学学生宿舍游行至布拉格市中心，高呼“我们需要灯光”。他们所抗议的是学生宿舍供电不足，但是他们的游行正好赶上报纸报道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会上“对党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富有生气的讨论”。学生遭到警察的袭击，警察后来又进入学生宿舍痛打那些甚至压根儿没有参加游行的学生。点燃的蜡烛无意中引发一场政治大爆炸。 352

整个共和国的知识分子都支持学生。政府的调查承认学生宿舍采暖和照明都不充足，并对警察使用“不适当的粗暴手段”表示歉意；但却辩解说他们之所以采取行动是由于当时情况“不明”。对此谁也不能满意，随后谣传党本身已由于对党的前途的看法不一而发生分裂。新经济模式在生产、贸易和物价水平方面取得的结果都令人失望：反对改革的人责备西克和改革者；提倡改革的

人分辩说党内的那些白吃粮不干事的人根本就没打算让改革成功。在发表了官方关于警察殴打学生的调查报告和推行经济政策的总结之后不几天，中央委员会于12月20日至22日再度召开会议。不到半个月又召开一次会议，并于1968年1月5日宣布，诺沃提尼总统已经辞去第一书记职务，其所遗职位由四十六岁的斯洛伐克领袖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继任。

诺沃提尼在总统职位上又恋栈了十一个星期，但他既已辞去党内职务，就使斯大林时代之后的新共产党人能够接管党务工作。在整个2月和3月里，人们一方面批评总统，同时要求恢复各项政治权利和取消书刊审查。2月25日，证实诺沃提尼曾经企图要求捷克斯洛伐克部队开进布拉格以保证他对党的控制，但是职业军官们拒绝干预政治。新的党中央委员会在全国清洗了约计二十五万下级官员，并根据工会会员的要求于3月开始改组政府。3月22日诺沃提尼辞职，5月暂时取消其党员资格。

■53 新总统是七十二岁的斯沃博达将军，他是1943至1945年东部战线的捷克斯洛伐克部队的老资格统帅，并且从解放至1950年一直担任国防部长。俄国人对他极为敬佩，在他佩带的勋章中有列宁勋章和苏联英雄勋章。根据自从马萨利克和贝奈斯时期以来的传统，总统的权威实际上一向大于捷克斯洛伐克宪法的规定，而在政治改革时期，至关重要的是，国家首脑不应该只是改革者所操纵的傀儡。斯沃博达保证了他同共和国的连续性：早在独立以前，他就曾经是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军团的成员，半个世纪之后的此刻，作为总统，他坚持要求前往马萨利克和贝奈斯的墓前表示悼念，二十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斯沃博达总统上任后首先采取的行动之一便是同意列纳尔特总理的辞职，此人在12月的党内斗争中支持诺沃提尼，从而丧失了作为一个斯洛伐克自由派人士在共产党中享有的名望。他的职

务由前副总理、捷克人奥尔德里赫·切尔尼克接替。在切尔尼克选择的副总理中有奥塔·西克和古斯塔夫·胡萨克。进步的自由派分子依里·哈耶克受任为外交部长。前几个月里批评诺沃提尼最激烈的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当选为国民议会主席。

切尔尼克政府的主要任务是把中央委员会在5月底通过的民主改革“行动纲领”变为现实的法律。该纲领攻击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内；建议准许有新闻出版自由、集会自由和出国旅行权利的自由。议会比较顺利地解散了新闻审查机构，通过了恢复名誉法案，确保以往的冤案一律平反，规定对1953年至1965年之间由于政治罪名而被错判的人赔偿损失。6月底，通过联邦制法案，规定斯洛伐克与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具有同等地位，不过议会否决了把共和国从二元政治实体变为三元政治实体的建议，即让摩拉维亚—西里西亚与波希米亚和斯洛伐克同样在行政上独立的建议。对于总理切尔尼克和第一书记杜布切克来说，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才能削弱党的极权主义性质而又不至于使它放弃其在国内的首要地位。杜布切克坚决不同意搞多党制，从改革一开始他就知道，苏联和其他共产党国家不会赞同捷克斯洛伐克恢复西方式的民主政治。

1968年的整个夏天，杜布切克和切尔尼克内外交困。捷克和斯洛伐克都举行了会议，要求加速改革整个党的体制，而不仅仅是清洗可鄙的“党的官员们”；为了应付这些要求，杜布切克答应在秋天召开一次共产党代表大会的特别会议，研究解决这些问题。但是要使华沙条约国的其他党的领导人满意就困难得多，他们当中颇有些人认为，一个国家要是允许非共产党人对党的政策是否英明评头品足，那就不再是“社会主义国家”。从5月以来，苏联和东德的报纸和电台开始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民族主义者”；外国党的领袖们和捷克人就捷克报刊获准享有危险的自由一事交换信

件。苏联对此十分担心，故派遣驻布拉格使馆人员到各工厂里视察，给他们可能找到的任何一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打气。看来，这是一桩困难的任务。

苏联企图使捷克斯洛伐克人就范所用的办法有二：金钱和武力。他们迟迟不肯贷款给切尔尼克政府，这笔贷款是政府为了解决向新经济模式过渡时由于三心二意而引起的问题才要求苏联借予的。苏联还坚持在该共和国领土上举行华约各国军事演习。联合部队的军事演习总是引起捷克人的反感，因为开支庞大，并造成工业、交通和农业的混乱。例如1966年9月，曾在捷克斯洛伐克南部举行战后最大的一次军事演习，其内容是华约国部队击退一次北约国部队的模拟进攻。1968年5月，切尔尼克和哈耶克与苏联的谈判取得部分成功：军事演习局限于通讯部队和参谋部，但是这些演习还是显示了华约国部队的机动性，以及它们在战略上紧紧地钳制着捷克斯洛伐克。

国外危机真正开始于7月14日和15日，当时苏联、保加利亚、东德、匈牙利和波兰各国领导人在华沙集会，致函捷克斯洛伐克党，呼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结”，并以进行干涉相威胁：“各国的和平与安全首先取决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强大、一致和团结；”信中宣称，“为维护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坚决斗争不仅是你们的任务，同样也是我们的任务。”捷克人在复函中以平静的语气申明其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忠诚，不禁令人联想起二十年前铁托写给斯大林的复信。苏联耀武扬威地沿捷克斯洛伐克边界进行军事演习，同时，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双方同意两国领导人将在位于科希策和外喀尔巴阡之间的一个斯洛伐克小村、蒂萨河畔的切尔纳会晤。会议从7月29日开到8月1日；两天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又在布拉迪斯拉发与曾经参加7月中旬在华沙举行的会议的各国会谈。根据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和斯沃博达总统的叙述，

在切尔纳和布拉迪斯拉发对如何实行改革已经达成协议，捷克斯洛伐克也作出了忠于华沙条约的保证。危机暂告缓和。

355

1968年8月20日夜间十点钟，苏联坦克进入捷克斯洛伐克，以来自波兰、匈牙利、东德和保加利亚的象征性占领部队作为陪伴。到第二天，在该共和国内可能已有二十五万外国军队；一星期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宣称有六十五万军队占领这个国家，平均一个士兵对付十三个成年公民。杜布切克被捕，带着手铐解往莫斯科。斯沃博达总统单独被拘留在赫拉德欣堡，不过他还能向全国广播，呼吁克制。在一些城镇，特别是在布拉格，人民采取了对抗态度，但是没有发生公开的军事抵抗。举行了示威游行及限定时间的象征性大罢工，还有几起纵火事件。俄国人要另建政府的企图未能成功，部分原因是总统、政府和党得以赶在入侵发生后四小时之内广播了一项联合声明，对这一非法行动表示遗憾，并强调人民和党的团结。在此后的日子里，斯沃博达总统表现得极为高尚，他率领一个六人代表团赴莫斯科谈判，使杜布切克和与他同时被捕的人获释归国。这次入侵虽然没有导致再次出现十二年前在布达佩斯发生的悲剧和破坏，却也表明苏联领导人又一次决心限制其共产党邻邦的独立性。华约国家为什么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上显然达成妥协之后仍决定采取如此激烈行动的原因至今不详：可能它们认为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政权是反革命的先锋；也可能它们惧怕自由化会对边境另一侧喀尔巴阡—乌克兰的罗塞尼亚人和斯洛伐克少数民族产生影响。布拉格8月9日至10日对铁托总统以及8月15日对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的热情欢迎可能使人想起它们三国是反苏小协约国，这种离经叛道的举动是正统的党的理论家和军事战略家同样无法接受的。不管入侵的动机如何，其结果是窒息了一个部分开放的社会的发展；在1968年头几个月里，这样一个社会看来原会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对马克思主

义意识形态的进化所作出的一种贡献。

1968年10月底，捷克斯洛伐克人在庆祝国家独立五十周年时，“行动纲领”中的绝大部分目标已经被迫放弃。公共秩序法案、新闻法、取缔非党政治结社以及部分恢复书刊审查，这些都意味着诺沃提尼时代令人意气消沉的清规戒律的死灰复燃。哈耶克被解职，奥塔·西克被迫流亡，斯姆尔科夫斯基作为国民议会主席的自由受到限制。但还不是一切都丧失殆尽。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仍然是进步的自由主义者。苏联打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的希望尚未成功，甚至已经下台的诺沃提尼也反对苏联入侵。制定联邦法的工作正在进行，以便1969年初就使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摩拉维亚分治。捷克斯洛伐克人民的勇气和智慧阻止了在国内问题上的一次全面政治大倒退。虽然苏联军队仍驻扎在大多数城镇周围，人们还是公开庆祝圣诞节，二十年来这是头一遭。

1968年过去了，怀疑依旧存在。9月里，斯姆尔科夫斯基曾强调团结的必要：他说，团结是“一座拱门，决不能让哪怕一块石头从门上坠落下来。”然而，斯姆尔科夫斯基拱门的根基比贝奈斯联结东西方的桥梁更坚实吗？拱门和桥梁一样，可能被掘倒或被炸毁；而爆破手甚至在中央委员会里也不乏其人。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迅速恶化，“布拉格之春”会不会繁花怒放而进入盛夏，看来前景渺茫。

关于资料来源的注释

357

下列书籍与文章的内容,详见参考书目。

在本注释与参考书目中,使用缩写如下:

AHR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美国历史评论》(华盛顿版)

IA International Affairs 《国际事务》(伦敦版)

JCEA Journal of Central European Affairs 《中欧事务学报》(博尔德,科罗拉多版)

JMH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近代历史学报》(芝加哥版)

SEER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Review 《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伦敦版)

1. 欧洲的交界地区

本章的依据主要是一批规范著作和个人的观察。引用最多的地理著作是 H. G. 旺克林的《欧洲的东部边疆地区》, P. 乔治与 J. 特里卡特合著的《中欧》(两卷本)以及 A. F. A. 马滕著《东欧》(仅参考捷克部分)。本章及其后各章所引用的通史包括: L. S. 斯塔伏里亚诺夫的《1453 年以来的巴尔干诸国》; A. C. 麦卡特尼的《匈牙利简史》; R. W. 塞顿-沃森的《罗马尼亚人历史》和《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历史》; 哈勒基的《欧洲历史的界限与分期》; 斯蒂芬·克利索德主编的《南斯拉夫简史》; R. J. 克纳主编的《南斯拉夫》; W. F. 雷德书主编的《剑桥波兰史》, 第二卷; W. A. 休特利、H. C. 达比、克劳利与 C. M. 伍德豪斯合著的《希腊简史》。另外参考 C. A. 麦卡特尼的《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对于特殊争议地区, 见 R. W. 塞顿-沃森写的小册子《特兰西瓦尼亚: 一个关键问题》, 并比较 C. A. 麦卡特尼所著《匈牙利与其后继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关于马其顿, 见 E. 巴克的《马其顿在巴尔干政治中的地位》和 H. R. 威尔金森的《地图与政治》。L. B. 纳米尔的《面向东方》中有许多关于中东欧的激动人心的议论, 而在沃尔特·科拉尔斯基的《东欧的神话与现实》中有误用历史而引起争论的研究。F. B. 辛格尔顿的《东欧的背景》则是一部有价值的概括性的入门书。

2. 维也纳会议和最初的民族起义

前章列举的一些通史对本章也有用处。此外还有 H. 尼科尔森的《维也纳会议》；伯蒂埃·德·索维尼的《梅特涅及其时代》；戈洛·曼的《欧洲的秘书》，即弗里德里克·冯·根茨的生平。关于民族情绪的增长，参见 H. 蒂安德的《东欧的觉醒》；汉斯·科恩的《泛斯拉夫主义》；费尔多·西希奇的《南斯拉夫的思想》；还可参看 F. 兹维泰的三篇文章：《伊里利亚主义与南斯拉夫人的感情》，载于 1933 年 4 月、5 月和 6 月号的《斯拉夫世界》上。我还用了 G. R. 诺叶斯编译的美国版奥勃拉多维奇的自传《多西特·奥勃拉多维奇的生平及事业》。丽贝卡·韦斯特夫人的《黑羔与灰隼》是对塞尔维亚的过去历史极为深刻的研究，它并非与史实毫无出入，但写得极其富有艺术技巧。D. 朗卡的《斯洛文尼亚人社会史》写得简洁而引人入胜。对研究这一时期有用的两篇文章是 J. 哈纳克发表于 1932 年 4 月号《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的《19 世纪初期的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和 V. 佐罗维奇发表于 1938 年 4 月《斯拉夫与东欧评论》的《武克·卡拉季奇》。

关于塞尔维亚起义，E. 豪芒的《南斯拉夫的形成》，对于研究整个 19 世纪及 20 世纪的最初二十年都是很有价值的。比起 G. 英·德·莫尔的写于 30 年代中期的德国的综合性参考资料《南斯拉夫今昔》，我更喜欢豪芒的叙述。H. W. V. 坦珀利的《塞尔维亚史》也已过时。G. 亚克希什的《欧洲与塞尔维亚的新生》仍然是一部次要的经典性著作。瓦索·楚布里洛维奇的《历史、政治、思想和塞尔维亚》把起义归入总的意识形态范畴，虽然他不像人们料想的那样与早期非马克思主义的浪漫派历史学家大相径庭。另外请参看 W. S. 武锡尼奇发表于 1961 年 4 月《中欧事务学报》的评论文章，关于《马克思对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的解释》。关于希腊起义的背景，见 C. M. 伍德豪斯的《希腊独立战争》的引言部分和 D. 戴金关于《1821 年希腊起义的原因》的文章，此文载于 1952 年 10 月《历史》杂志。M. S. 安德森的《东方问题》一书是对 1774 年至 1923 年间东方问题的概述。

3. 街垒的年代

关于 19 世纪中叶的波兰事务，W. J. 罗斯的《波兰民主的兴起》及 R. 迪波夫斯基的《波兰史纲》可以作为《剑桥波兰史》的补充。俄国的政策则在休·塞顿-沃森的《俄罗斯帝国（1801—1917 年）》第五、第九及第十章均详加叙述。

对这一时期的波兰问题最为详尽的英文论著见于 R. F. 莱斯利教授的两部研究著作：《波兰政治与 1830 年 11 月的革命》，《俄罗斯波兰的改革和起义》（主要关于 1863 年的革命）。波兰国外流亡者诸如密茨凯维奇及克拉辛斯基的部分著作可以在 T. M. 菲利普所编《波兰文选集》（英文本）中读到。

在我写这章的时候，关于哈布斯堡国家 1848 年革命还没有详细的学术性著作。1969 年 2 月 C. A. 麦卡特尼的《哈布斯堡帝国》出版，弥补了这一缺陷，也弥补了其他许多缺陷。在没有这部著作时，我依靠的是 L. B. 纳米尔在 1944 年雷利历史讲座的《1848 年——知识分子的革命》一文，其中有几页谈到 1846 年的加利西亚，相当多的篇幅谈到 1848 年的波兹南尼亚，有关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篇幅占全书四分之一。这部讲稿原载于《1944 年英国科学院记录汇编》，我从这部分（第 276 页）引证了波希米亚总督就布拉格会议所作的报告（见第 58 页），又从第 246—247 页中引用了法兰克福议会有关波兰的辩论（如上，第 59—60 页）。L. 纳米尔爵士的其他有关波兰的文章包括在他的《消失了的霸权》里，而 P. 泰伯里和 J. 伊斯特伍德的《1848 年——革命的年代》和 R. J. 拉思的《1848 年的维也纳革命》都可以作为补充。在《1848 年革命一百周年史学会议文件》中，我引用了弗朗西斯·埃克哈德的文章：《1848 年的匈牙利革命和维也纳法庭》，加肖沃夫斯卡教授的《1846—1848 年间波兰的社会问题》及 J. 马居勒的《1848 年与摩拉维亚》。1942 年 4 月的《中欧事务学报》所载 J. C. 坎贝尔的《1849 年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一文对罗马尼亚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了有趣的阐明。 359

关于马扎尔文艺复兴问题，参阅 D. M. 琼斯对爱特维施和裴多非的主要非政治性的研究一文《匈牙利五作家》。1960 年 10 月的《中欧事务学报》是塞切尼专号，文章是由乔治·巴拉尼，B. G. 伊凡尼和弗朗西斯·S. 瓦格纳写的。在约瑟夫·F. 扎采克的《帕拉茨基和他的捷克国家历史》一文中讨论了帕拉茨基的文学作品，这篇文章发表于 1964 年 1 月的《中欧事务学报》（停刊前的最后一期）。

科苏特的传记均非现代著作。他的《访英讲演集》依然是一部重要的自白书。爱德华·克兰克肖的《哈布斯堡王朝衰亡记》虽是一部读起来很有趣的书，但有时似乎特别敌视匈牙利，对科苏特尤其如此。A. J. P. 泰勒的《称霸欧洲的斗争》的前四章强调了从 1848 年到克里米亚战争时国际事务的连续性。T. W. 赖克的《罗马尼亚的形成》依然是关于这个问题的最详尽的英文著作。

4. 多瑙河上的风云

阿瑟·S.梅的《哈布斯堡君主国(1867—1914年)》是一部立论持平而又全面的著作, A. J. P. 泰勒的《哈布斯堡君主国》颇值得一读。目前这两本书都为麦卡特尼的《哈布斯堡帝国》所取代。路易斯·埃桑芒的《1867年的奥匈协定》一直是一部第一流的著作, 所涉及的范围比其书名广泛。威克姆·斯蒂德的《哈布斯堡君主国》, 是1902到1913年间这位《泰晤士报》驻维也纳特派记者就他的观察对这个国家的结构所作的分析, 但它包括大量的历史背景知识, 而且有些非常透彻的见解, 虽然回顾起来, 其乐观未免令人诧异。R. W. 塞顿-沃森的《南部斯拉夫问题与哈布斯堡君主国》支持克罗地亚事业, 对于研究斯特罗斯迈尔是一份特别有价值的材料。有一部七百页的文献, 包括四十四篇论述阜姆历史的文章, 名为《里耶卡历史文件汇编》, 编辑人是亚克萨·拉夫利奇。此书资料丰富, 虽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写成, 但每篇文章都有英文提要。1868到1870年间的捷克问题上述各部通史中都有所论述,《中欧事务学报》中有两篇文章专门详加讨论: 斯坦利·B. 金布尔的《1868年的布拉格斯拉夫大会》, 载于1962年7月《中欧事务学报》; 和奥塔卡尔·奥德洛齐利克的《俄国与捷克的民族抱负》, 载于1963年1月《中东事务学报》。威斯克曼教授的《捷克人与德意志人》开头几章有对这一时期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两个民族间达成妥协的种种尝试的概括评述。

我所使用的关于保加利亚早期工业史的资料来自 I. 萨卡佐夫的《保加利亚经济史》和 J. 罗思柴尔德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前数章。有关塞尔维亚的奥姆拉丁纳的最新英文论述见符拉迪米尔·戴迪耶尔的《通向萨拉热窝的道路》, 第48—50页。法国驻贝尔格莱德总领事昂格拉德在1872年2月呈交法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 后来刊印在《法国外交文献》第1辑, 第1卷, 第127—30页, 其中对早期南部斯拉夫运动有特别精辟的分析。B. H. 萨姆纳的《俄国与巴尔干诸国(1870—1880年)》一书, 详尽地讨论了塞尔维亚运动和保加利亚的动乱, 这是一部杰出的学术著作, 值得再版。有关保加利亚事务, 亦可参看 C. E. 布莱克的文章《西方政治思想对保加利亚的影响(1850—1885)》, 发表于1943年的《美国历史评论》。还可参看查尔斯·耶拉维奇的《沙俄与巴尔干民族主义》和彼得·休格的文章《南部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俄国形象》, 发表于1961年4月《中欧事务学报》D. 哈里斯的巨著《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的外交史》, 虽如此命名, 其时限却没有超过1876年, 但对研究初期国际紧

张局势颇有价值。R. W. 塞顿-沃森的《狄斯雷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及M. D. 斯扎扬诺维奇的《列强与巴尔干诸国》都对萨姆纳的经典著作有所补充。W. L. 兰格的《欧洲的联合与结盟》中提供了详细的文献目录。切尔尼耶夫在塞尔维亚的活动在D. 麦古齐的一篇题为《泛斯拉夫主义的实践》的文章中有详细的描述，本文发表于1964年的《近代历史学报》。1930年3月的《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中有一篇R. 罗塞蒂写的短文——《罗马尼亚在1877年战争中的一份作用》。沙皇在1876年11月11日演说摘要（见本书第85页所引）引自萨姆纳的著作第227页。有关其后事件请参看C. E. 布莱克的著作《保加利亚立宪政府的建立》。

5. 民族主义的全盛时期

关于波兰的事件，我使用了上文所引的标准著作，并用R. W. 蒂姆斯的《普鲁士统治下波兰人的德意志化》一书加以补充。关于商涅列尔和塔菲时期，见阿瑟·S. 梅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第9章及威斯克曼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的第5章，并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英译本第93—94页）中关于商涅列尔的评论作比较。关于蒂萨，我主要依据梅和麦卡特尼的著作（匈牙利），并按R. W. 塞顿-沃森的《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对特兰西瓦尼亚问题作了补充。塞顿-沃森博士的其他著作本身就是这个时期的历史的一部分，因此不可能被忽略：《匈牙利的种族问题》主要涉及斯洛伐克人，书中包括关于政治审判的细节；《匈牙利的腐败及改革》中对某些特定的选举作了详尽的分析，对1910年的斯扎科尔察选举亦有记载；《克罗地亚的专制主义》也同样是反马扎尔人的，但它主要是塞顿-沃森博士的《南部斯拉夫问题》的扩充。关于克罗地亚，见鲁道夫·基斯林的显然属于右翼的著作《克罗地亚人》中有关南部斯拉夫运动总的情况，除了上面引用的关于南斯拉夫思想的著作外，亦见安特·史密斯·帕韦利奇的《安特·特鲁姆比奇博士》。

6. 走向萨拉热窝

361

I. 阿伯蒂尼的《1914年大战的起源》第1卷和伯纳多特·施米特的《战争来临》可作为已引用的梅、泰勒和斯塔伏里亚诺斯的著作的补充。还有一些专题，见W. S. 武锡尼奇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塞尔维亚（1903—1908年）》；D. 戴金的《希腊在马其顿的斗争（1897—1913年）》和伯纳多特·施米特的《兼并波斯尼亚（1908—1909年）》。关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见J. 斯怀尔的

《保加利亚的阴谋》。D. 米特拉尼在他的《罗马尼亚的土地与农民》一书中分析了罗马尼亚1907年的农民起义。关于布拉戈耶夫及保加利亚的马克思主义者，见罗思柴尔德的《保加利亚共产党》（已引用）。V. 戴迪耶尔的《通向萨拉热窝的道路》（附有广泛的参考书目）对1903至1914年之间波斯尼亚的动乱有极为详细的描述。E. C. 赫尔姆赖克的《巴尔干战争中的外交（1912—1913年）》，虽然出版已经三十多年，可是始终没有超过它的。关于1914年6月和7月之间发生的一些事件还可参看约阿希姆·雷马克的《萨拉热窝》和汉斯·于贝斯贝格尔的《俄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奥地利》，及S. 加夫里洛维奇发表于1955年12月《近代历史学报》的文章《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新证据》。在我看来，孔拉特·冯·赫留道夫的回忆录《我的服役期》是对奥地利政策的强烈控诉，任何同情协约国者的作品都难以匹敌；第8卷尤其如此。A. F. 普利勃兰姆的《奥地利的外交政策（1908—1918年）》则为奥地利的政策辩护。我发现阿瑟·J. 梅教授的作品《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衰亡》第1卷第1部分有关塞尔维亚政府责任的论断难以接受，否则它倒是一部极为出色的著作；他引用的证据似乎并不比以前的声嘶力竭的论战文章更有说服力。

7. “争取各民族自由的普遍战争”

除以上引用的标准历史著作外，我还利用了：Z. A. B. 泽曼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1914—1918年）》；J. C. 亚当斯的《冬季的飞行》；T. 科马尼基：《波兰共和国的再生》；T. G. 马萨利克的《一个国家的形成》，E. 贝奈斯的《战争回忆录》；W. W. 戈特利布的《秘密外交研究》；阿伯特·平戈的《法国外交史》。关于1914年的俄—捷关系，见A. 波波夫的《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沙皇时代的外交》（俄文本），原载《红色档案》，第33卷及第34卷。我也利用了俄国档案中的一些文件，原载于M. 波克洛夫斯基主编的《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3辑，第6、7、8卷；多数文件所附的详细参考书目，已包括在麦卡特尼与帕尔默合著的《独立的东欧》第2章的脚注中。关于苏皮洛和南斯拉夫委员会，见约瑟夫·霍瓦特的《苏皮洛》（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本）；P. D. 奥斯托维奇的《南斯拉夫真相》；罗德的《社会与外交回忆录》；姆拉达·帕乌洛娃：《南斯拉夫的管理机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本，这却是一部有学者诚实风格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及安特·曼迪茨：《幽居生活片断》。在P. H. 米歇尔的《亚得里亚海问题，（1914—1918年）》一书中，有很多关于塞—意争端的饶有兴味的文献。关于塞尔维亚在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协约国军队

在马其顿的活动，见艾伦·帕尔默的《萨洛尼卡的园丁，马其顿战役（1915—1918年）》（附有参考书目）。

关于瑙曼及其思想，最出色的研究著作是H.C.迈耶：《德国人思想和行动中的中欧》，这是对刊载于1951—1952年《美国历史评论》中迈耶的《1890—1914年期间德国与东南欧经济关系》一文的补充。关于英国对中欧所持态度的形成，在哈利·哈纳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不列颠与奥匈帝国》一书中可见端倪；也可参看R.W.塞顿-沃森的《马萨利克在英国》。关于美国的政策以及伍德罗·威尔逊的影响，见V.S.马马泰的《美国与中东欧（1914—1918年）》。梅教授的二卷本《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衰亡》，从全球角度透视这些问题。

有关各项专题，见Z.萨斯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罗马尼亚及诸交战国（1941年7月—10月）》一文，原载1954年1月《中欧事务学报》，以及查尔斯·耶拉维奇的《尼古拉·P.帕西奇，大塞尔维亚还是南斯拉夫？》一文，原载1951年7月《中欧事务学报》。关于查理皇帝，见E.冯·格斯-霍斯特瑙的《奥匈帝国的崩溃》及A.C.波尔泽·霍迪茨的《查理皇帝》。戈登·布鲁克-谢泼德的《哈布斯堡末代》利用了王朝的部分秘密档案，其中包括齐塔皇后的日记片断，但比较全面的还是赖因霍尔德·洛伦茨的《查理皇帝与多瑙河君主国的灭亡》，尽管由于缺少索引而颇感不便。刘易斯·纳米尔爵士的《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覆灭》一文，原为《巴黎和会史》而作，将近四十年后改名为《消失了的霸权》重版。米哈伊·卡罗利伯爵的两部自传体著作《对全世界作战》和《不存幻想的信仰》，缅怀往事，动人心弦。I.莱德勒的《和会上的南斯拉夫》一书曾对南部斯拉夫民族委员会所处的奇特地位加以讨论。

8. 缔造和平

最能引人入胜而在学术上也最有启发性的关于和会的书籍依然是哈罗德·尼科尔森爵士的《缔造和平》，而H.M.W.坦伯利主编的半官方性质的《巴黎和会史》则为一部不可忽视的著作（关于中东欧的大部分有关章节见第4卷）。在本章及此后三章中有若干材料的来源，与麦卡特尼和帕尔默所著《独立的东欧》一书相同。该书本身附有很长的参考书目，因此我就不一一罗列我所参考的全部著作。但是，我将列举最近的一些书籍和文章以及所有真正重要的研究论著。

我觉得有四本关于个别国家在和会上的政策的书籍颇有特别价值：莱

德勒的《和会上的南斯拉夫》，此书已见前引；奥尔布雷施—卡里的《巴黎和会上的意大利》；F. 戴阿克的《和会上的匈牙利》（它应与坦伯利发表于1928年4月的《外交月刊》的《匈牙利的边界是如何划定的？》对照来读，S. D. 斯佩克特教授的《巴黎和会上的罗马尼亚》对布勒蒂亚努作了精采的研究，而且其文风特别生动活泼。A. J. 迈耶的《媾和中的政治与外交》对一些具体问题特别是协约国和美国政府对待俄国和匈牙利的布尔什维主义的状态叙述十分详细，但是与其说这是一篇有关外交上讨价还价的研究论文，倒不如说是一篇关于制定（有时歪曲）主要战胜国政策的压力集团的论文。鲁道夫·托克斯的《库恩·贝拉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追溯匈牙利共产主义运动的起源，并研究共产党—社会党联盟的形式，但是，它忽略了中产阶级成员对表面上作为“历史上的匈牙利”的拥护者库恩所给予的支持，也未能认识到库恩的犹太血统在当时和以后的影响。C. A. 麦卡特尼的《匈牙利及其后继者》对于斯洛伐克、罗塞尼亚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的论述是无与伦比的。威斯克曼教授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对于贝奈斯的评价比塞顿—沃森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历史》（或者比其他许多作家）都更加公平。E. 施拉姆·冯·塔登的《希腊与列强（1913—1923年）》虽然几乎写于四十年前，却无人能够超过他。有关本章末尾提出的经济问题，参阅F. 赫茨的《多瑙河流域国家的经济政策》及A. 巴希的《多瑙河盆地与德国的经济领域》。

9. 民主的幻想与现实

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所编的《国际事务概观》连同相应的《文献汇编》若干卷，是研究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几个时期必不可缺的，我已广泛地加以利用。我还从某些国别史中获益匪浅，除上述者之外，我还参看了罗斯所著的《波兰近代史》，H. L. 罗伯茨的《罗马尼亚：一个农业国的政治问题》以及C. A. 麦卡特尼的《十月十五日》。本书虽主要是1925至1945年间的匈牙利史，但其第1卷中有五章专门叙述这个国家的早期情况。休·塞顿—沃森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是一部富于启发性的入门著作，对研究罗马尼亚大事特别有用。D. 米特拉尼的三部作品都很重要：《世界大战对东南欧的影响》着重社会和经济分析；《罗马尼亚的土地与农民》是一部小小的经典作品；而《马克思与农民的对抗》是对于整个这一地区的平均地权论与共产主义的冲突的有趣的研究。M. 霍德扎的回忆录《中欧的联盟》则另外提供了有关国际农民运动的资料。J. 托马塞维奇的《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变化》对巴尔

于农民阶级的社会问题及其政治信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C. 耶拉维奇与B. 耶拉维奇主编的《过渡中的巴尔干》一书中所刊载H. L. 罗伯茨的《一个小国的政治：巴尔干的范例》是一篇有趣的关于东南欧政治动态的一般性论文。关于斯塔姆博利斯基，参看斯怀尔的《保加利亚的阴谋》和罗斯柴尔德的《保加利亚共产党》。阿瓦库莫维奇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史》第1卷里有关于1918至1941年期间南斯拉夫国内政治各方面的大量资料，而我发现其所引用的克罗地亚当代报刊上的剪报，对了解拉迪奇非凡的号召力特别有价值。

研究20世纪20年代小协约国的历史，可参看R. 麦克雷的《小协约国》，也可参看F. J. 冯德拉切克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有关军事会议的材料，见鲁道夫·吉斯林的《小协约国军事协定（1929—1937年）》。关于波兰外交政策，见J. 科贝尔的《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波兰（1919—1933年）》；R. 戴比基的《波兰外交政策（1919—1939年）》以及Z. J. 加肖沃夫斯基论述1918到1926 364年间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关系的文章，发表于1956年12月和1957年6月的《斯拉夫与东欧评论》。P. S. 万迪茨的《法国及其东方诸盟国（1919—1925年）》论述了填补中东欧权力真空的情况。

10. 右倾

第九章注释中提及的许多本书对本部分所涉及的时期同样提供了情况。赫茨的《多瑙河盆地的经济问题》及巴希的《多瑙河盆地与德国的经济领域》可以用国际联盟的研究报告《世界经济萧条的进程和分期》及C. A. 麦卡特尼的《十月十五日》第1卷第6章作为补充。麦卡特尼博士的巨著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政策、对匈牙利的政策及其政治人物都提供了相当丰富的材料。M. 日纳伊及L. 日茨什（主编）的《海军上将霍尔蒂的秘密文件》中包含一些对本章及下一章（主要是关于贡伯什）非常重要的文献。马切克的回忆录《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的材料经过选择，但就其本身而言还是能说明某些问题。A. L. 伊斯特曼在《卡罗尔国王，希特勒与卢佩斯库》一书中对卡罗尔国王作了体贴的论述，而斯蒂芬·格雷厄姆在《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中却把亚历山大国王浪漫化了。S. J. 伍尔夫（主编）的《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对于匈牙利、罗马尼亚及波兰三国的右翼运动的起源提供了有益的研究。关于希特勒掌权对毕苏茨基的影响，参阅1955年4月《中东事务学报》齐格门特·加肖沃夫斯基的文章《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及汉斯·罗斯的《波兰与欧洲》的第65—78页。关于小协约国合作后期的各个阶段，参阅R. 麦克雷

的《争夺多瑙河的斗争与小协约国(1929—1938年)》。《德国外交文献》C辑第1卷对于研究德国在此时期对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态度特别有价值。关于保加利亚的兹维诺运动,参阅斯怀尔的《保加利亚的阴谋》。关于亚历山大被刺对于摄政时期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影响,参阅J.B.霍普特纳的《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年)》。霍普特纳博士发表于1956年7月《中欧事务学报》的文章《中立国南斯拉夫(1937年)》也是很重要的。内维尔·亨德森的《桥下水》^①及国王彼得的《一个国王的遗产》中有一些关于斯托亚季诺维奇的材料。J.F.蒙哥马利的《匈牙利——于心不甘的卫星国》中也有一些关于南斯拉夫事务的情报。格哈特·温伯格发表于1960年7月《中欧事务学报》的文章《1936—1937年间希特勒与贝奈斯的秘密谈判》中包括一些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的材料。戈登·布鲁克-谢泼德的《德奥合并——强奸奥地利》以整个中欧为背景评价这一事件。A.J.P.泰勒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详细地研究了许多正统的观点,并指出其缺乏逻辑性。

11. 德国潮

涉及1937年秋到1941年12月11日整个阶段的《德国外交政策文献》D辑第13卷是本章不可缺少的资料来源,当然其中有几卷主要是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霍斯巴赫会议备忘录》见第1卷,第29—39页。军事情况的最重要来源是弗朗兹·哈尔德上校的《战时日志》——这是他从1939年8月中旬至1942年9月任德国总参谋长期间写的日志;其中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这一阶段的哈尔德日志的第2卷对研究巴尔干事务特别有价值。关于1938年至1941年之间德意志少数民族的活动见L.德·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

关于苏台德问题,我主要依靠威斯克曼教授的《捷克人和德意志人》,并以J.W.布罗伊格博士的《德意志人与捷克人》及文泽尔·亚克斯赫有争议的研究《通向波茨坦的欧洲之路》为补充。布罗伊格博士发表于1967年7月《国际事务》的文章《1938年以前的德国外交和苏台德问题》,主要研究接连几任德国公使发自布拉格的报告;它表明早在1934年汉伦就得到在政治上敌视贝奈斯的一些捷克集团的支持。基斯·罗宾斯博士的《慕尼黑(1938年)》是对慕尼黑危机的最新研究,但是对这个问题最全面的研究还要算鲍里斯·策

① 《桥下水》(Water under the Bridges)意即“事过境迁”。——译者

洛夫斯基的《慕尼黑协定(1938年)》。J. A. 卢卡斯的文章《列强与东欧》是一部关于苏捷关系的特佳著作,不过他的叙述应当以V. E. 克洛乔主编的《关于慕尼黑历史的新文献》和W. V. 华莱士发表于1959年10月《国际事务》的同名文章为补充。华莱士的文章中有布拉格档案馆的材料。关于英国的政策和舆论见吉尔贝特和哥特的《绥靖者们》。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发表于1961年4月《国际事务》的1960年史蒂文森纪念演说《重新评价慕尼黑》是审慎的、回顾性的全面评述。

霍普特纳博士的《南斯拉夫在危机中》和麦卡打尼的《十月十五日》有大量未经发表的关于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本章所涉及的这段时间里的政策材料。M. 温奇的《一日共和国》虽然是在其所描写的事件发生几星期后写的,仍不失为关于罗塞尼亚问题的第一流著作。

关于波兰政策,见贝克的(未完成的)回忆录《最后的报告》和一本更为有用的编年史,前波兰副部长J. 泽姆贝克的《日记(1933—1939年)》。波兰驻柏林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的文章和回忆录《出使柏林(1933—1939年)》突出地说明波兰外交政策受贝克个人的指挥达到何种程度,同时贝克对捷克人和他们的西方支持者深怀敌意。安娜·青卡拉教授在《波兰与西方列强(1938—1939年)》一书中为贝克辩护,特别是她在第241页的评论,在我看来似乎并不令人信服,但是它强调说明贝克的政见与波兰外敌的观点何其相似;他甚至进行试探,希望让与波兰一块托管殖民地,主要由波兰的犹太人定居。恐怕波丹·布度罗维茨博士在《波苏关系(1932—1939年)》中所描述的贝克的良好形象同样使我无动于衷,它还连带证实了在军事上“波兰优先考虑其东部边界”,而忽视其与德国接壤地带的防务。

关于罗马尼亚的政策,见希尔格鲁伯的《希特勒,卡罗尔国王和安东内斯库》和加芬库的《欧洲的末日》。马里奥·托斯卡诺的《钢铁公约的来源》是修订后的意大利原著的翻译,其中包括许多关于1938—1939年间大事的有用文献。

《国际事务概观》(由A. 托因比和V. 托因比主编)的战争时期的几卷采取一种与前几卷不同的形式。第1卷为《1939年8月的世界》,第2、3卷为《大战前夕》和《轴心国最初的胜利》(1939年9月至1941年12月);这三卷对本章的撰写非常有参考价值。让·布莱利的《多瑙河的黎明》表达了战争最初几年布加勒斯特和贝尔格莱德的气氛;但是它应该由K. 圣·帕夫洛维奇发表于1964年1月《中欧事务学报》的极为有趣并带有部分自传性的文章《南斯拉

夫和罗马尼亚(1941年)》作为补充。汇集1941年2月至6月期间文件的《德国外交政策文献》D辑第12卷关于巴尔干事务的资料特别丰富;德国的记录虽然没有提高安东内斯库和罗马尼亚人的声望,却似乎表明保罗亲王和南斯拉夫大臣们对希特勒的反抗远远超过以前评论家们所承认的程度(比较: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第3卷第9章)。保罗亲王在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公使布利斯·莱恩发表于《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2卷)的报告中也是个很好的形象。关于1941年的贝尔格莱德政变,用西方语言写的最新研究是德拉吉萨·里斯蒂奇的《南斯拉夫的1941年革命》,但它未能回答关于起义的全部问题,而且缺乏霍普特纳博士著作那样的高质量。凡是想了解1941年那些事态的人,不可能无视麦卡特尼博士的《十月十五日》第1卷叙述生动的最后几章。

12. 贰心

我没有利用较近的对“巴巴罗萨”行动的历史记述资料,而是利用了一些关于俄国战役的个人记载资料,诸如亚历山大·沃思的《俄国在作战(1941—1945年)》,汉茨·古德里安的《坦克部队司令》,以及弗朗兹·哈尔德的《战时日记》,第3卷。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的评述《希特勒的欧洲》及其所附大量文献,是十分重要的原始资料;例如,其中有1942年1月曼纽致布勒蒂亚努信件的译本。《德国外交政策文献》D辑第13卷,载有发自布达佩斯、索非亚和布加勒斯特的一些重要急件,我在本章的第一部分广泛利用了这些资料。这些德国文献中也述及奈迪奇政府在贝尔格莱德的建立,其中并有格莱斯·冯·霍斯特瑙及其他人士对克罗地亚的帕韦利奇政权的评论。拉迪斯拉斯·霍利及马丁·布罗扎特的《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国家(1941—1945年)》,是唯一的一部对“克罗地亚独立国”进行了认真而不带偏见的研究的著作;它比基茨林的《克罗地亚人》中的有关部分远为重要。

对于波兰在这些年里的悲剧性历史尚无完全令人满意的研究著作,虽然汉斯·罗斯的《波兰近代史》一书作了很好的概括,西德尼·洛厄里也在《希特勒的欧洲》及其续篇《欧洲的改组》的有关篇章中作出了最为明智的评价。斯坦尼斯拉夫·别甘斯基上校等人合编的两卷本《波苏关系文献(1939—1945年)》,第1卷主要包括1939年8月至1943年4月这一时期;第2卷从1943年5月至1945年8月,并对前几年作了某些补充。我还利用了S·米科拉伊奇切克的《苏联统治的型式》,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的《第二次世界大

战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及温斯顿·邱吉尔爵士的《第二次世界大战》。M. K. 德热万诺夫斯基的《波兰共产党》是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涉及的年代从俄国革命直至1958年9月；全书五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是文献目录。休·塞顿·沃森的《东欧的革命》的第6章和第7章概括波兰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颇有价值。贝奈斯博士的《回忆录》是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原始资料之一，虽然较之他关于早期外交斗争的回忆录有必要在使用时更要加以选择。J. A. 卢卡斯的《列强与东欧》及R·李·沃尔夫的《当代的巴尔干诸国》所作的概要评述，见解正确，内容全面；卢卡斯对中欧的评述特别精辟，沃尔夫则以罗马尼亚部分写得最好。

关于南斯拉夫的事态，见斯蒂芬·克利索德的《旋风》，V·戴迪耶尔的《铁托传》，及非茨罗伊·麦克莱恩的两部著作：《东方的途径》和《被争夺的防寨》。后来任南斯拉夫副总统的罗多留布·佐拉科维奇所著战争回忆录《赢得自由》，其英文节译本应给以较高的评价；该书关于1943年在亚伊采发生事件的记载，特别富有情趣。对米哈伊洛维奇表同情的著作有D. 马丁：《被出卖的同盟者》，及C. 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

卡洛伊是轴心国家中幸存的少数领导人之一，并得以撰写其回忆录《匈牙利首相》；这本书比摄政王霍尔蒂的《回忆录》内容充实些。关于1944年3月和10月的事件，我几乎全部仿照麦卡特尼博士：《十月十五日：匈牙利近代史（1929—1945年）》的第2卷。尽管巴克小姐的《巴尔干的休战》主要叙述1946年的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有一些章节追溯了战争年代。切斯特·威尔莫特的《争夺欧洲》仍然是引人入胜的著作，即使因为有更新的书籍问世而不再那么流行。

13. 苏联的影响

本章利用了上章所提到的许多著作，特别是休·塞顿·沃森的《东欧的革命》。西德尼·洛厄里在《欧洲的改组》中论述“东欧的和平解决”部分，是对这些事态的极好概括。我发现其他有用的著作是纳吉·费伦茨的《铁幕后的斗争》；E. 霍尔珀林的《胜利的异教徒》（主要与1945—1956年期间的南斯拉夫有关）及吉塔·杨涅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1944—1967年）》。多琳·沃里纳发表于1949年4月《国际事务》的《大战以来的东欧经济变化》一文，是对这一地区首次试行苏联式计划所作的颇有洞察力的评价。伊丽莎白·威斯克曼的《德国的东方诸邻邦》论述了奥得—尼斯线及毗邻德国的捷克边境问题。

莫顿·卡普兰教授简短的研究专题论文《捷克的共产主义政变》，对1945—1948年期间的事态提供了精辟的分析。我发现，卡普兰关于政变基本上并非预谋的论点，较之约瑟夫·科贝尔的《共产党人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1938—1948年)》一书易于使人接受，后者的书名集中体现了它的论点。在我看来，科贝尔的这部著作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军官们、尤其是对斯沃博达将军所处的困境似乎并不理解。休伯特·里普卡的《被奴役的捷克斯洛伐克》，由于作者是哥特瓦尔德政府成员中的一位民主人士而成为极其珍贵的原始资料。E.塔博尔斯基的《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1948—1960年)》，是一部作者头脑清醒、也使读者头脑清醒的研究著作。戈登·谢泼德的《俄国的多瑙河帝国》，则是关于考验和清洗时期的新闻报导，显示作者颇有才华。

14. 打翻塑像

休·塞顿-沃森的《东欧的革命》一书初版只写到1950年的头几个月，但1956年的修订本则增补到赫鲁晓夫时代的开端。罗斯的《波兰近代史》把涉及哥穆尔卡的一部分写得特别好，这很可能有些过分乐观。论述匈牙利事件的书籍和小册子极多，我所参照的有乔治·迈克斯的《匈牙利革命》，蒂博尔·梅雷的《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纳吉·伊姆雷论共产主义》是一部对新的路线的研究，看来是写于1955年，纳吉被捕后才偷偷地送到西方出版的。

15. 从布达佩斯到布拉格

我在写这一章的过程中，广泛地依赖当时的新闻报道，主要是《泰晤士报》和《卫报》，并对向我提供帮助的查塔姆豪斯出版社图书馆深表感谢。我还发现《基辛当代档案》很有价值。

描写赫鲁晓夫时代东欧国家情况的一本最佳著作是J.F.布朗的《新东方欧》。在库尔特·伦敦主编的《过渡中的东欧》一书的某些章节里，编者作到了高度的客观；而乔治·A.肖夫林写的“共产主义下的少数民族问题”那一章出色地摘要汇集了大量的详细资料。R.巴里·法雷尔的《南斯拉夫与苏联(1948—1956年)》刊布了十七份文献，前言中概括了1955年12月以前的主要外交往来。在为平装本《当代世界》丛书写的一本题为《南斯拉夫》的概况简介中，我对根据1963年宪法规定的政府结构作了图解分析。吉塔·杨涅斯库的《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瓦解》着重叙述1948年至1964年间各国共产党在

理论上的分歧。杨涅斯库博士的一部篇幅更长的著作《欧洲共产党国家的政治》更深入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流派。瓦茨拉夫·贝奈斯、安德鲁·乔治和乔治·斯坦布克的《东欧的政府与政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年中各国的继续和变化逐一进行评论；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没有把保加利亚包括在研究范围之内。

在我写这一章的时候，还没有关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书，我只好依靠新闻报道和此前一年我对斯洛伐克进行短暂访问时个人的观察。在我完成这一章的草稿之后不久，出版了两本关于这一问题的好书：Z. A. B. 泽曼的《布拉格之春》和非力普·温泽与亚当·罗伯特合写的研究捷克的“改革、镇压和反抗”的著作——《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这本平装书包括十篇与危机有关的重要文献。

参 考 书 目

I. 文献原始资料

我写作本书时,仅用了少数几卷官方汇编的外交文献。注解中所曾引用的有如下的一些:

《法国外交文献(1871—1914年)》第1辑 1871—1900年,第1卷(巴黎,1929年及其后若干年)。

《德国外交政策文献(1918—1945年)》,C辑,1933—1937年,共六卷;D辑,1937—1941年,共十二卷集(伦敦,1948—1964年版)。

《美国对外关系(1941年)》第2卷(华盛顿,1958年版)。

M.波克罗夫斯基(主编):《帝国主义时期的国际关系》,第3辑,1914—1916年,第6、7、8卷(莫斯科,1930及以后若干年)。

引用的其他文献汇编:

斯坦尼斯拉夫·别甘斯基(以及西科尔斯基将军历史研究所的其他编辑):

《波苏关系文献(1939—1945年)》,第1卷1939—1943年(伦敦1960年版及纽约版);第2卷1943—1945年(伦敦1967年版及纽约版)。V.E.克洛奇科(主编):《慕尼黑历史新文献》(布拉格,1958年版)。

P.H.米歇尔:《亚得里亚海问题(1914—1918年)》(巴黎,1938年版)。

M.西纳伊及L.日茨什(合编):《霍尔蒂海军上将的秘密文献》,布达佩斯及韦林巴勒,诺桑茨,1966年版及纽约版)。

I. 日记、回忆录和演讲

J.贝克:《最后的报告:波兰政治(1926—1939年)》,(纳沙泰尔,1951年版)。

E.贝奈斯:《战争回忆录》(伦敦,1928年版)。

《爱德华·贝奈斯博士回忆录:从慕尼黑到新的战争和新的胜利》,(伦敦及康涅狄格州米斯蒂克,1954年版)。

罗多留布·佐拉科维奇:《赢得自由》(纽约,1962年版)。

弗朗茨·孔拉特·冯·赫普道夫：《我的服役期（1906—1918年）》第3卷（柏林，1924年版）。

汉茨·居德里安：《坦克部队司令》（伦敦，1952年版；纽约，1967年版）。

弗朗茨·哈尔德：《战时日记》，共二卷（斯图加特，1962—1964年版）。

内维尔·亨德森：《桥下水》（伦敦，1945年版）。

A. 希特勒：《我的奋斗》（未经删节的英文版，伦敦1939年版及纽约版）。

M. 霍德扎：《中欧的联盟》（伦敦，1942年版）。

370

N. 霍尔蒂：《回忆录》（伦敦1956年版及纽约版）。

N. 卡拉伊：《匈牙利首相》（纽约，1962年版）。

M. 卡罗利：《对全世界作战》（伦敦，1925年版）。《不存幻想的信仰》（伦敦，1956年版）。

I. 科苏特：《科苏特访英演讲集（附生平简述）》（伦敦，1852年版）。

约瑟夫·利普斯基：《出使柏林（1933—1939年）》（纽约，1968年版）。

符拉德科·马切克：《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纽约，1957年版）。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东方的途径》（伦敦，1949年版）。

安特·曼迪茨：《幽居生活片断》（萨格勒布，1956年版）。

T. G. 马萨利克：《一个国家的形成》（伦敦，1927年版）。

S. 米科拉伊奇切克：《苏联统治的型式》（伦敦，1948年版）。

纳吉·费伦茨：《铁幕后的斗争》（伦敦，1949年版）。

纳吉·伊姆雷：《纳吉·伊姆雷论共产主义：为新的路线辩护》（纽约，1957年版）。

G. R. 诺叶斯（主编）：《多西特·奥勃拉多维奇的生平及事业》（伯克利，1953年版）。

多西特·奥勃拉多维奇见上文。

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一个国王的遗产》（伦敦，1955年版）。

J. 泽姆贝克：《日记（1933—1939年）》（巴黎，1952年版）。

II. 其他次要著作

J. C. 亚当斯：《冬季的飞行》，（普林斯顿，1942年版）。

I. 阿伯蒂尼：《1914年大战的起源》第1卷（牛津及纽约，1952年版）。

R. 奥尔布雷施-卡里：《巴黎和会上的意大利》（纽约，1938年版）。

M. S. 安德森：《东方问题》，伦敦及纽约，1966年版）。

- I. 阿瓦库莫维奇:《南斯拉夫共产党史》(阿伯丁,1964年版)。
- 伊丽莎白·巴克:《巴尔干的休战》(伦敦,1948年版)。《马其顿在巴尔干强权政治中的地位》(伦敦,1950年版)。
- A. 巴希:《多瑙河盆地与德国的经济领域》(纽约,1943年版)。
- V. 贝奈斯、A. 乔治及G. 斯坦布克:《东欧的政府与政治》(伦敦和纽约,1966年)。
- C. E. 布莱克:《保加利亚立宪政府的建立》(普林斯顿,1943年版)。
- 让·布莱利:《多瑙河的黎明》(巴黎,1946年版)。
- J. W. 布罗伊格:《德意志人和捷克人》(斯图加特,1967年版)。
- 戈登·布鲁克·谢泼德:《德奥合并》(伦敦,1963年版)。
- 《哈布斯堡末代》(伦敦1968年版)。
- J. F. 布朗:《新东欧》(伦敦,1966年版及纽约版)。
- 波丹·布度罗维茨:《波苏关系(1932—1939年)》(伦敦及纽约,1963年版)。
- 鲍里斯·策洛夫斯基:《慕尼黑协定(1938年)》(斯图加特,1958年版)。
- 温斯顿·S. 邱吉尔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共六卷(伦敦,1948—1954年版及纽约版)。
- 安娜·青卡拉:《波兰与西方列强(1938—1939年)》(多伦多,1968年版)。
- 371 斯蒂芬·克利索德:《旋风:铁托元帅取得政权过程记》(伦敦,1949年版)。
- 斯蒂芬·克利索德(主编):《南斯拉夫简史》(剑桥及纽约,1966年版)。
- 爱德华·克兰克肖:《哈布斯堡王朝衰亡记》(伦敦及纽约,1963年版)。
- 瓦索·楚布里洛维奇:《历史、政治、思想与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1958年版)。
- 道格拉斯·戴金:《希腊在马其顿的斗争(1897—1913年)》(塞萨洛尼基及芝加哥,1967年版)。
- F. 戴阿克:《巴黎和会上的匈牙利》(纽约,1942年版)。
- 罗曼·戴比基:《波兰外交政策(1919—1939年)》(纽约,1962年版;伦敦,1963年版)。
- 符拉迪米尔·戴迪耶尔:《铁托传》(伦敦,1953年版)。
- 《通向萨拉热窝的道路》(纽约,1966年版;伦敦,1967年版)。
- R. 迪波夫斯基:《波兰史纲》(纽约,1931年版)。
- M. K. 德热万诺夫斯基:《波兰共产党》(伦敦及马萨诸塞州剑桥,1959年版)。
- A. I. 伊斯特曼:《卡罗尔国王、希特勒与卢佩斯库》(伦敦,1942年版)。

- 路易·埃桑芒：《1867年的奥匈协定》（巴黎，1904年版）。
- R. 巴里·法雷尔：《南斯拉夫与苏联（1948—1956年）》（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56年版）。
- T. M. 菲利普：《波兰文选集》（伦敦，1944年版）。
- C. 福蒂奇：《我们打输了的战争》（纽约，1948年版）。
- G. 加芬库：《欧洲的末日》（伦敦，1947年版）。
- P. 乔治与 J. 特里卡特：《中欧》共二卷（巴黎，1954年版）。
- 马丁·吉尔伯特与里查德·哥特：《绥靖者们》（伦敦及纽约，1963年版）。
- E. 冯·格拉斯·霍斯特瑙：《奥匈帝国的崩溃》（伦敦，1930年版）。
- W. W. 戈特利布：《秘密外交研究》（伦敦及纽约，1957年版）。
- 斯蒂芬·格雷厄姆：《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伦敦，1938年版）。
- O. 哈勒基：《欧洲史的界限与分划》（伦敦，1950年版；印第安纳州圣母城，1962年版）。
- F. 霍尔瓦林：《胜利的异教徒：铁托抵抗斯大林的斗争》（伦敦，1953年版）。
- 哈利·哈纳克：《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大不列颠与奥匈帝国》（牛津及纽约，1962年版）。
- D. 哈里斯：《1875—1878年巴尔干危机的外交史：第一年》（斯坦福，1936年版）。
- E. 豪芒：《南斯拉夫的形成》（巴黎，1930年版）。
- E. C. 赫尔姆赖克：《巴尔干战争中的外交》（伦敦，1937年版；纽约，1938年版）。
- F. 赫茨：《多瑙河流域国家的经济问题》（伦敦及纽约，1947年版）。
- W. A. 休特利、H. C. 达比、C. W. 克劳利及 C. M. 伍德豪斯：《希腊简史（自早期至1964年）》（剑桥及纽约，1965年版）。
- A. 希尔格鲁伯：《希特勒、卡罗尔国王和安东内斯库》（威斯巴登，1954年版）。
- J. B. 霍普特纳：《危机中的南斯拉夫（1934—1941年）》，（伦敦及纽约，1962年 372 版）。
- 约瑟夫·霍瓦特：《苏皮洛》（萨格勒布，1922年版）。
- L. 霍利及 M. 布罗扎特：《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国家（1941—1945年）》，（斯图加特，1964年版）。
- 吉塔·杨涅斯库：《共产主义在罗马尼亚（1944—1962年）》，（牛津与纽约，1944年版）。

《苏维埃帝国在东欧的瓦解》(伦敦及纽约,1965年版)。

《欧洲共产党国家的政治》(伦敦及纽约,1967年版)。

查尔斯·耶拉维奇:《沙俄与巴尔干民族主义:俄罗斯对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内政的影响》(伯克利,1958年版)。

查尔斯·耶拉维奇与B.耶拉维奇(合编):《过渡中的巴尔干》(伯克利,1963年版)。

D.M.琼斯:《匈牙利五作家》(牛津与纽约,1966年版)。

L.德·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第五纵队》(伦敦,1956年版)。

莫顿·卡普兰:《捷克的共产主义政变》(普林斯顿,1960年版)。

R.J.克纳(主编):《南斯拉夫》(伯克利,1949年版)。

鲁道夫·基茨林:《克罗地亚人:南部斯拉夫民族命定的道路》(格拉茨及科隆,1956年版)。

《小协约国的军事协定,1929-1937年》(慕尼黑,1959年版)。

汉斯·科恩:《泛斯拉夫的历史和理论》(纽约,1953年版)。

沃尔特·科拉尔斯基:《东欧的神话与现实》(伦敦,1946年版)。

T.科马尼基:《波兰共和国的再生》(伦敦,1957年版)。

约瑟夫·科贝尔:《共产党人颠覆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1938—1948年)》(伦敦及普林斯顿,1959年版)。

《介于东西方之间的波兰(1919—1933年)》(伦敦及普林斯顿,1963年版)。

W.L.戈格:《欧洲的联合与结盟(1871—1890年)》,修订本,纽约,1950年版)。

(国联研究)《世界经济萧条的过程和阶段》(日内瓦,1945年版)。

I.莱德勒:《和会上的南斯拉夫》(伦敦及纽黑文,1963年版)。

R.F.莱斯里:《波兰政治与1830年11月的革命》,伦敦及纽约,1956年版)。

《俄罗斯波兰的改革和起义(1856—1865年)》,伦敦及纽约,1963年版)。

D.朗卡:《斯洛文尼亚人社会史》(克利夫兰,1939年版)。

库尔特·伦敦(主编):《过渡中的东欧》(伦敦及巴黎,1966年版)。

赖因霍尔德·洛伦茨:《查理皇帝与多瑙河君主国的灭亡》(维也纳,1959年版)。

J.A.卢卡斯:《列强与东欧》(纽约,1953年版)。

C.A.麦卡特尼:《民族国家与少数民族》(牛津,1934年版;纽约,1963年版)。

《匈牙利及其后继者》(牛津及纽约,1937年版)。

《十月十五日:匈牙利近代史(1929—1945年)》,共二卷(爱丁堡,1957年

版)。

《哈布斯堡帝国(1790—1918年)》(伦敦,1969年版)。

C. A. 麦卡特厄,与A. W. 帕尔默著:《独立的东欧》(伦敦及纽约,1962年 373 版)。

R. 麦格雷:《小协约国》(伦敦及纽约,1929年版)。

《争夺多瑙河的斗争与小协约国(1929—1938年)》(伦敦,1938年版)。

菲茨罗伊·麦克莱恩:《被争夺的防务》(伦敦,1957年版)。

V. S. 马马泰:《美国与中东欧(1914—1918年)》(普林斯顿,1957年版;牛津,1958年版)。

戈洛·曼:《欧洲的秘书、拿破仑之敌弗里德里希·根茨生平》(纽约,1947年版)。

D. 马丁:《被出卖的同盟者,铁托与米哈伊洛维奇的真实关系史》(纽约,1946年版)。

吉尔伯特·英·德·莫尔:《南斯拉夫今昔》共三卷(莱比锡,1936—1938年版)。

阿瑟·S. 梅:《哈布斯堡君主国(1867—1914年)》(伦敦及剑桥,1951年版)。

《哈布斯堡君主国的衰亡》,共二卷(伦敦及费城,1966年版)。

A. J. 迈耶:《媾和中的政治与外交》(伦敦及纽约,1968年版)。

蒂博尔·梅雷:《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二天:纳吉·伊姆雷与匈牙利革命》(伦敦,1959年版)。

H. C. 迈耶:《德国人思想和行动中的中欧(1815—1945年)》(海牙,1955年版)。

乔治·迈克斯:《匈牙利革命》(伦敦,1959年版)。

D. 米特拉尼:《罗马尼亚的土地与农民》(牛津,1957年版)。

《世界大战对东南欧的影响》(纽黑文,1936年版)。

《马克思与农民的对抗:对社会的教条主义的研究》(北卡罗莱纳州,查佩尔希尔,1951年版;伦敦,1961年版)。

J. F. 蒙哥马利:《匈牙利:于心不甘的卫星国》(纽约,1947年版)。

A. F. A. 马顿:《中欧》(伦敦及纽约,1961年版)。

L. B. 纳米尔(刘易斯爵士):《面向东方》(伦敦及纽约,1947年版)。

《消失了的霸权》(伦敦1958年版及纽约)。

哈罗德·尼科尔森:《缔造和平》(伦敦,1937年版;纽约,1965年版)。

- 《维也纳会议》(伦敦及马萨诸塞州, 马格诺利克, 1946年版)。
- 艾伦·帕尔默:《萨洛尼卡的园丁, 马其顿战役(1915—1918年)》(伦敦及纽约, 1965年版)。
- A. W. 帕尔默:《南斯拉夫》(牛津及纽约, 1964年版)。
- 姆拉达·帕乌洛娃:《南斯拉夫的管理机构》(萨格勒布, 1921年版)。
- 安特·史密斯·帕韦利奇:《安特·特鲁姆比奇博士, 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关系问题》(慕尼黑, 1959年版)。
- 阿伯特·平戈:《大战期间的法国外交史》, 共三卷(巴黎, 1938—1941年版)。
- A. C. 波尔泽·霍迪茨:《查理皇帝》(伦敦, 1930年版)。
- A. F. 普利勃兰姆:《奥地利的外交政策(1908—1918年)》(伦敦, 1923年版)。
- 亚萨克·拉夫利奇(主编):《里耶卡历史文件汇编》(萨格勒布, 1953年版)。
- R. J. 拉思:《1848年的维也纳革命》(得克萨斯州奥斯汀, 1957年版)。
- W. F. 雷德韦(主编):《剑桥波兰史》, 共2卷(剑桥, 1941年版)。
- 37 约阿希姆·雷马克:《萨拉热窝》(伦敦及纽约, 1959年版)。
- T. W. 赖克:《罗马尼亚的形成——一个国际问题的研究(1856—1966年)》(牛津, 1931年版)。
- H. 里普卡:《波奴役的捷克斯洛伐克》(纽约, 1950年版)。
- 德拉吉萨·里斯蒂奇:《南斯拉夫的1941年革命》(伦敦帕克, 宾夕法尼亚州 1966年版; 伦敦, 1967年版)。
- 基斯·罗宾斯:《慕尼黑(1938年)》(伦敦, 1968年版)。
- H. L. 罗伯茨:《罗马尼亚: 一个农业国的政治问题》(伦敦及纽黑文, 1951年版)。
- 汉斯·罗斯:《波兰与欧洲: 波兰外交政策研究(1931—1939年版)》(蒂宾根, 1957年版)。
- 《波兰近代史》(伦敦及纽约, 1966年版)。
- W. J. 罗斯:《波兰民主的兴起》(伦敦, 1944年版)。
- 约瑟夫·罗斯柴尔德:《保加利亚共产党的起源和发展(1876—1936年)》(伦敦, 1959年版; 纽约, 1962年版)。
- I. 萨卡佐夫:《保加利亚经济史》(柏林, 1929年版)。
- 伯蒂埃·德·索维尼:《梅特涅及其时代》(伦敦, 1962年版及纽约版)。
- 伯纳多特·F. 施米特:《战争来临》, 共二卷(纽约, 1930年版)。

- 《兼并波斯尼亚(1908—1909年)》(剑桥,1937年版及纽约版)。
- E. 施拉姆·冯·塔顿:《希腊与列强(1913—1923年)》(格丁根,1933年版)
- 休·塞顿-沃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东欧》(剑桥,1945年版;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62年版)。
- 《东欧的革命》(修订本,伦敦,1956年版及纽约版)。
- 《俄罗斯帝国(1801—1917年)》(牛津,1967年版)。
- R. W. 塞顿-沃森:《匈牙利的种族问题》(伦敦,1908年版)。
- 《南部斯拉夫问题与哈布斯堡君主国》(伦敦,1911年版)。
- 《匈牙利的腐败及改革:选举程序研究》(伦敦,1911年版)。
- 《克罗地亚的专制主义》(伦敦,1912年版)。
- 《狄斯雷利、格莱斯顿和东方问题》(伦敦1933年版;纽约,1962年版)。
- 《罗马尼亚人的历史》(剑桥及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34年版)。
- 《捷克人及斯洛伐克人的历史》(伦敦,1943年版及康涅狄格州,哈姆登版)。
- 《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关键问题》(牛津,1943年版)。
- 《马萨利克在英国》(剑桥,1943年版)。
- 戈登·谢泼德:《俄国的多瑙河帝国》(伦敦,1954年版)。
- F. B. 辛格尔顿:《东欧的背景》(牛津及纽约州长岛城,1965年版)。
- 费尔多·西希奇:《南斯拉夫的思想》(贝尔格莱德,1937年版)。
- S. D. 斯佩克特:《和会上的罗马尼亚》(纽约,1962年版)。
- L. S. 斯塔伏里亚诺斯:《1453年以来的巴尔干诸国》(伦敦及纽约,1958年版)。
- H. 威克姆·斯蒂德:《哈布斯堡君主国》(伦敦,1911年版;纽约,1914年版)。375
- M. D. 斯托扬诺维奇:《列强与巴尔干诸国 1875—1878年》(剑桥,1939年版)。
- B. H. 萨姆纳:《俄国及巴尔干诸国(1870—1880年)》(牛津及康涅狄格州,哈姆登,1937年版)。
- J. 斯怀尔:《保加利亚的阴谋》(伦敦,1937年版)。
- P. 泰伯里及伊斯特伍德:《1848年——革命的年代》(伦敦,1948年版)。
- E. 塔博尔斯基:《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主义(1918—1960年)》(普林斯顿,1961年版)。
- A. J. P. 泰勒:《哈布斯堡君主国》(修订本,伦敦,1951年版及纽约版)。

- 《称霸欧洲的斗争(1848—1918年)》(牛津和纽约,1954年版)。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伦敦,1961年版;纽约,1962年版)。
- H. W. V. 坦伯利:《塞尔维亚史》(伦敦及纽约,1917年版)。
- (主编):《巴黎和会史》,共四卷(牛津,1920年版)。
- H. 蒂安德:《东欧的觉醒》(维也纳及斯图加特,1934年版)。
- R. W. 蒂姆斯:《普鲁士统治下波兰人的德意志化,东欧边界地区的H-K-T协会(1894—1914年)》(纽约,1941年版)。
- 鲁道夫·托克斯:《库恩·贝洛与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伦敦及纽约,1967年版)。
- J. 托马塞维奇:《南斯拉夫的农民,政治与经济的变化》(斯坦福,1965年版)。
- 马里奥·托斯卡诺:《钢铁公约的来源》(第三次修订本,巴尔的摩,1967年版)。
- A. 托因比及V. 托因比(主编):《国际事务概观(1939—1946年)》,共十一卷,包括:《1939年3月的世界》(伦敦,1958年版);
《大战前夕》(伦敦及纽约,1958年版);
《轴心国最初的胜利》(伦敦及纽约,1958年版);
《希特勒的欧洲》(伦敦及纽约1954年版);
《欧洲的改组》(伦敦及纽约,1955年版)。
- 汉斯·于贝斯贝格尔:《俄国与塞尔维亚之间的奥地利》(科隆—格拉茨,1959年版)。
- (联合国大会):《匈牙利问题特别委员会报告》(伦敦及纽约,1957年版)。
- F. J. 冯德拉切克:《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政策》(纽约,1937年版)。
- S. 韦恩·武锡尼奇:《介于东西方之间的塞尔维亚(1903—1908年)》(斯坦福,1954年版)。
- P. S. 万迪茨:《法国及其东方诸盟国(1919—1925年)》(明尼阿波利斯,1962年版)。
- H. G. 旺克林:《欧洲的东部边界地区》(伦敦,1941年版)。
- 亚历山大·沃思:《俄国在作战(1941—1945年)》(伦敦及纽约,1964年版)。
- 丽贝卡·韦斯特:《黑羔与灰隼》,共二卷(伦敦,1942年版及纽约版)。
- H. R. 威尔金森:《地图与政治,马其顿人种分布图的研究》(利物浦,1951年版)。
- 切斯特·威尔莫特:《争夺欧洲》(伦敦,1952年版及纽约版)。

M. 温奇：《日共和国》（伦敦，1939年版）。

菲力普·温泽及亚当·罗伯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的改革、镇压及反抗》376（伦敦，1969年版）。

伊丽莎白·威斯克曼：《捷克人和德意志人》（牛津，1938年版；纽约，1967年版）。

《德国的东方诸邻邦，奥得—尼斯线及捷克边境地区问题》（牛津，1956年版）。

R. 李·沃尔夫：《当代的巴尔干诸国》（伦敦及马萨诸塞州，剑桥，1956年版）。

C. M. 伍德豪斯：《希腊独立战争：历史背景》（伦敦，1952年版）。

卢埃林·伍德沃德爵士：《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英国的外交政策》，伦敦，1963年版；纽约，1967年版）。

S. J. 伍尔夫（主编）：《欧洲的法西斯主义》（伦敦，1968年版）。

G. 亚克希什：《欧洲与塞尔维亚的新生（1804—1934年）》，巴黎，1907年版）。

Z. A. B. 泽曼：《哈布斯堡帝国的瓦解（1914—1918年）》（牛津及纽约，1961年版）。

《布拉格之春》（伦敦，1969年版）。

IV. 报刊杂志文章

乔治·巴拉尼：《塞切尼问题》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0年10月第20卷，第3期，第249—267页。

C. E. 布莱克：《西方政治思想对保加利亚的影响（1850—1885年）》，原载《美国历史评论》（纽约，麦克米伦版），1943年4月第48卷，第507—520页。

J. W. 布罗伊格：《1938年以前的德国外交与苏台德问题》，原载《国际事务》（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第37卷，1961年7月第3期，第323—331页。

J. C. 坎贝尔：《1849年的特兰西瓦尼亚问题》，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版），第2卷，1942年4月第1期，第20—34页。

V. 佐罗维奇：《伍克·卡腊季奇》原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伦敦），1938年4月第16卷，第48期，第667—677页。

D. 戴金：《1821年希腊起义的原因》原载《历史》（伦敦），1952年10月第37卷，第131期，第228—235页。

弗朗索斯·坎克哈特：《1848年的匈牙利革命和维也纳法庭》原载《1848年革

命一百周年纪念史学会议论文集》(巴黎,1948年),第228—235页。

N. 加肖沃夫斯卡:《1846—1848年间波兰的社会问题》原载《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史学会议论文集》,第177—183页(巴黎,1948年)。

Z. I. 加肖沃夫斯基:《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55年4月第15卷,第1期,第15—45页。

《波捷关系(1918—1926年)》原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伦敦),第84期,第35卷,1956年12月,第170—187页及1957年7月第85期,第340—361页。

S. 加夫里洛维奇:《萨拉热窝暗杀事件的新证据》原载《近代历史学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55年12月第27卷第4期,第410—414页。

J. 哈纳克:《19世纪初期的斯洛伐克人和捷克人》原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伦敦),1932年4月第10卷,第30期,第588—601页。

J. B. 霍普特纳:《中立国南斯拉夫(1937年)》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56年7月第16卷,第2期,第156—176页。

377 B. G. 伊凡尼:《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匈牙利塞切尼改革的经济背景》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0年10月第20卷,第3期,第270—288页。

查尔斯·耶拉维奇:《尼古拉·P. 帕西奇,大塞尔维亚还是南斯拉夫?》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第11卷,1951年7月第2期,第133—152页。

斯坦利·B. 金布尔:《1868年的布拉格斯拉夫大会》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2年7月第22卷,第2期,第174—199页。

D. 麦肯齐:《泛斯拉夫主义的实践:切尔纳耶夫在塞尔维亚》原载《近代历史学报》(伊利诺伊州,芝加哥),1964年第36卷,第279—297页。

J. 马居勒:《1848年与摩拉维亚》原载《1848年革命一百周年纪念史学会议论文集》,第203—209页。

H. C. 迈耶:《德国与东南欧的经济关系》原载《美国历史评论》(纽约,麦克米伦版),1952年第57卷,第77—90页。

L. B. 纳米尔:《1848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原载《1944年英国科学院会议记录汇编》(伦敦,1948年),第20卷,第161—282页(另有牛津大学出版社印行的单行本)。

奥塔卡尔·奥德洛齐利克:《俄国与捷克的民族抱负》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3年1月,第22卷,第4期,第407—439页。

- K. 圣·帕夫洛维奇：《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1941年）》，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4年1月，第23卷，第451—484页。
- A. 波波夫：《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与沙皇时代的外交》（俄文本）原载《红色档案》（莫斯科，1929年版），第33卷，第3—33页及第34卷，第31—38页。
- R. 罗塞蒂：《罗马尼亚在1877年战争中的一份作用》原载《斯拉夫与东欧评论》（伦敦），1930年8月第8卷，第548—551页。
- 彼得·F. 休格：《南部斯拉夫人心目中的俄国形象》，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1年4月，第21卷，第1期，第45—52页。
- Z. 萨斯：《特兰西瓦尼亚问题，罗马尼亚及诸交战国（1941年7月—10月）》，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54年1月第8卷，第4期，第409—435页。）
- H. W. V. 坦伯利：《匈牙利边界是如何划定的》原载《外交月刊》（纽约），1928年4月，第6卷，第432—447页。
- W. S. 武锡尼奇：《马克思对第一次塞尔维亚起义的解释》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1年4月第21卷，第1期，第3—14页。
- 弗朗西斯·S. 瓦格纳：《塞切尼及哈布斯堡帝国的民族问题》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0年10月，第20卷，第3期，第287—309页。
- W. V. 华莱士：《关于慕尼黑历史的新文献》，原载《国际事务》（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1959年10月，第35卷，第4期，第447—454页。
- 多琳·沃里纳：《大战以来的东欧经济变化》，原载《国际事务》（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1949年4月，第25卷，第2期，第157—167页。
- 查尔斯·韦伯斯特爵士：《重新评价慕尼黑》，原载《国际事务》（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院），1961年4月，第37卷，第2期，第137—155页。
- 格哈特·温伯格：《1936—1937年间希特勒与贝奈斯的秘密谈判》，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0年1月，第19卷，第4期，第366—374页。
- 约瑟夫·F. 扎采克：《帕拉茨基和他的捷克国家历史》，原载《中欧事务学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1964年1月，第23卷，第4期，第412—423页。
- F. 兹维泰：《伊里利亚主义与南斯拉夫人的感情》，原载《斯拉夫世界》（巴黎），1933年4月号，第39—71页；1933年5月号，第161—185页；1933年6月号，第358—375页。

索引

(条目后的数字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本书边码)

Abdul-Aziz, Sultan 阿卜杜尔·阿齐兹
苏丹, 80, 85

Abdul-Hamid, Sultan 阿卜杜尔-哈米
德苏丹, 85

Adrianople (Edirne) 阿德里安堡(埃
迪尔内), 15; 和约(1829年), 38; 俄国人
进入(1878年), 86; 在巴尔干战争中,
114, 115

Aehrenthal, Baron Alois 阿洛伊斯·
爱伦达尔男爵,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11, 112

Africa, 'uncommitted' nations of 非
洲“不结盟”国家, 314, 332, 335

Agricultural Society, Warsaw 设于华
沙的农业协会, 67, 68

agriculture 农业, 在波兰, 41, 337; 从事
农业的人口比例, 175; 20世纪30年代
危机中, 207; 在匈牙利, 319, 341; 经互
会规定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专门经
济, 342, 345; 在捷克, 348

Akkerman, Convention of 阿克曼条约
(1826年), 38

Albania 阿尔巴尼亚, 13; 反土耳其起
义, 32; 与塞尔维亚, 113, 116; 独立
(1913年), 114; 成为意大利的保护领
地(1915年), 125, 166; 塞尔维亚人撤
入, 129; 在和会上, 154; 和平解决办法,
168; 与意大利, 182, 220, 239; 意大利占
领(1939年), 242, 249; 南斯拉夫从经
济上控制, 314; 追随苏联, 314—15; 处
决奉行“铁托主义”的部长(1949年),
316; 参加华沙条约(1955年), 325; 孤

立, 336—7; 在马其顿问题上对南斯拉
夫的怀疑, 336, 344; 退出华沙条约
(1968年), 336

Albanian Moslem 阿尔巴尼亚穆斯林,
见Shqiptars条

Albanians, in Yugoslavia and Greece
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阿尔巴尼亚人,
18, 171

Alexander of Battenberg 巴滕贝克的
亚历山大, 当选为保加利亚的大公, 88;
退位, 89

Alexander, King of Greece 希腊国王
亚历山大, 163

Alexander Obrenović 亚历山大·奥
布雷诺维奇 塞尔维亚国王, 103, 109

Alexander (Karadjordjević) 亚历山
大(卡拉乔治维奇) 塞尔维亚的王储,
117; 摄政王, 126, 136, 153, 176; 南斯拉
夫国王, 190, 192, 215; 遇刺(1934年),
216

Alexander I of Russia 俄国亚历山大
一世, 23, 26; 与波兰, 24, 42

Alexander II of Russia 俄国亚历山大
二世, 66; 与波兰, 67, 68; 与巴尔干, 85;
与柏林条约, 87

Alexandroupolis (Dedeagatch) 亚历
山德鲁波利斯(杰加加赫), 16

Alexandrov, Todor 托多尔·亚历山
德罗夫,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领袖, 305

Allöd plain in Hungary 匈牙利的奥
尔弗尔德大平原, 7, 8, 63

Ali Pasha of Janina 亚尼纳的阿里帕

夏·阿尔巴尼亚首领, 35, 36, 40
 Allenstein plebiscite in 1920 1920 年的阿伦施泰因公民投票, 156
 Amery, Leo 利奥·艾默礼, 向塞尔维亚人广播发出呼吁(1941年), 252
 Anders, General Wladyslaw 瓦拉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 指挥红军中的波兰部队, 266; 在北非, 267; 向莱茵河挺进, 287
 Andrássy, Count Gyula 久拉·安德拉西伯爵, 匈牙利首相, 后为外相, 73, 74, 75; 与捷克人, 78; 与巴尔干半岛, 83, 85; 与柏林条约, 87
 Andrić, Ivo 伊沃·安德里奇, 南斯拉夫驻柏林公使, 后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250
 Annunzio, Gabriele d' 加布里埃勒·邓南遮, 战斗英雄、诗人, 攻占阜姆, 166
 anti clericalism,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反教权主义, 312
 Anti-Comintern Pact 反共公约(1936年), 242, 246
 anti semitism 反犹太主义; 泛德意志主义者的, 94, 96; 在罗马尼亚, 107, 164, 210, 223, 261, 318; 在匈牙利, 162, 203, 211, 223, (通过立法, 224-5, 237); (萨拉希政权的, 286); 在波兰, 196, 338, 339; 苏台德区德意志党的, 223; 在克罗地亚, 264; 和斯大林, 316, 318; 在捷克斯洛伐克, 318, 351
 Antivari Bar) 安提瓦利, (今称巴尔), 门的内哥罗港口, 87
 Antonescu, General Ion 扬·安东内斯库将军, "1; 罗马尼亚"首领", 248, 249; 与进攻苏联, 256, 257, 260, 261; 应希特勒之召唤, 274; 被米哈伊尔国王逮捕, 283, 298; 被处决, 300
 Antonescu, Victor 维克多·安东内斯库 罗马尼亚外交大臣, 220
 Apostol, Gheorghe 乔治·阿波斯托尔, 罗马尼亚共产党书记, 323
 apparatchiki 党的官员们, 302; 在捷

克斯洛伐克, 350, 353
 appeasement of Hitler, policy of 对希特勒的绥靖政策, 237, 242
 Apponyi, György 奥波尼·捷尔吉, 匈牙利的"进步的保守主义者", 50, 51
 Arabs, communist support for 共产党支持阿拉伯人, 365
 Arad, Hungarian counter-revolutionary regime at 阿拉德的匈牙利反革命政权, 161
 armaments 武器 法国供应塞尔维亚, 110; 法国供应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 151; 德国供应保加利亚, 215; 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罗马尼亚, 221
 armies 军队, 奥匈二元君主国的, 101, 121, 149, 巴尔干各国的, 106;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征募, 110; 征兵制起了进行社会教育的作用, 175; 波兰的, 224, 243; 德国的, 228, 262, 263
 Arpad dynasty, Hungary 匈牙利阿尔帕德王朝, 19
 Arrow Cross 箭十字团, 匈牙利法西斯运动, 225; 被镇压, 237
 Arz von Straussenberg, General 阿茨·冯·斯特劳森堡将军, 132; 担任奥匈帝国总参谋长, 134
 Asia, 'uncommitted' nations of 亚洲"不结盟"国家, 335
 Asquith, H. H. H. H. 阿斯奎斯, 英国首相, 124
 Attlee, C. C. 艾德礼 英国首相, 290
 Auen, Dr Lodgmann von 洛格曼·冯·奥恩博士 苏台德区德意志人领袖, 186
 Ausgleich (Compromise) between Austria and Hungary (1867) 奥匈协议(妥协)(1867年), 71, 73-4, 101; 告终(1918年), 146
 Austria 奥地利(奥匈帝国或二元君主国的一个行省); 召开制宪会议(1848年), 52; 铁路, 71
 Austria-Hungary, Dual Monarchy of

(1867) 奥匈二元君主国(1867年), 71-4, 102, 133, 146; 波兰人, 92-3; 捷克人, 95-6; 与塞尔维亚的秘密条约(1881年), 103; 促进巴尔干的铁路建设, 80; 与俄国达成的关于巴尔干的协议, 85, 86, 106; 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1913年), 116, (1914年), 118; 与塞尔维亚人交战, 121-2, 118-9; 与俄国人交战, 122-3, 127, 131; 国内的厌战情绪, 133; 议会举行会议(1917年), 134-5; 同盟国不以它的解体为战争目标, 139-40; 与意大利人交战, 141-2; 寻求停火(1918年), 143; 与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脱离, 145; 与匈牙利脱离, 146; 海军的命运, 147, 148; 分裂为七个经济体系, 171;

Austrian Empire (before Ausgleich)
(奥匈协议前的)奥地利帝国, 12, 20, 21; 宣布为帝国(1804年), 27; 在维也纳会议上, 24-7; 撒丁-皮埃蒙特对——宣战(1848年), 52; ——镇压匈牙利革命的战争(1848-9年), 61-3, ——的官僚统治, 64; ——在克里米亚战争中占领多瑙河两公国(1854-7年), 65; ——与波兰抗俄起义(1863年), 68; ——的工业发展, 71-2; ——成为奥匈二元君主国(1867年), 71-4; 其余参看奥匈二元君主国

Austrian Republic ('German Austria')
奥地利共和国('德意志奥地利'); 订立和约(1919年)150; 与南斯拉夫的边界, 167; 和德国的关税同盟计划(1931年), 208; 参加通过罗马议定书组成的多瑙河集团(1934年)213; 努力防止德国吞并, 217, 219; (希特勒实现吞并)(1938年), 226; 英国军队进入(1945年), 288, 293; 议和, 295, 323-4; 俄国军队撤出, 324, 325; 成为中立国, 324, 331

Avars 阿瓦尔人, 6

Averescu, Marshal 阿维雷斯库元帅;
镇压农民起义, 107; 任罗马尼亚首相,
182, 197-8, 299

Bacilek, Karol 卡罗尔·巴齐列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 347

Backsa^① 巴茨克绍, 伏伊伏丁那的一个
地区, 8, 293

Badoglio, General 巴多格里奥将军,
意大利司令官, 166

Baja 包姚, 伏伊伏丁那的一个城市,
164

Balkan League (1912) 巴尔干同盟
(1912年), 114, 169

Balkan Pact (1934) 巴尔干条约(1934
年), 其后成为巴尔干协约国, 215,
246; 与保加利亚订立萨洛尼卡协定,
238,

Balkan Pact (1953) 巴尔干(1953
年), 335

Balkan mountains 巴尔干山脉, 13

Balkan wars 巴尔干战争(1912-13
年), 114-15,

Balkans 巴尔干各国, 13-17; 铁路,
15, 16, 79, 80; 奥匈二元君主国和俄
国就巴尔干各国达成的协议(1877年),
85, 86; 1903年达成的协议, 106

Baltic Provinces 波罗的海各省, 俄国
于1918年交出, 后来成为波罗的海各
国, 137

Baltic States 波罗的海各国; 参加签
署李维诺夫议定书(1929年)185, 1930年
德苏条约规定归于苏联(1939年), 241;
并入苏联, 247; 参看Estonia, Latvia,
Lithuania条

Banát 巴纳特 伏伊伏丁那的一个地
区, 8; 罗马尼亚的要求(1915年), 126;
通过秘密条约许给罗马尼亚(1916年),
132; 和会上分给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① 据商务1984年版《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有个 Backa, 译作“巴奇卡”, 可能就是 Backsa, 特注明于此, 待查。——译者

153, 163; 镇压少数民族, 189, 190; 在德国占领下, (1941年), 254

Baptists, in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的洗礼教会教徒, 12

Barac, Dr 巴拉茨博士, 萨格勒布大学校长, 克罗地亚人领袖, 137

Barak, Rudo'f 鲁道夫·巴拉克, 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长, 349

Baranya 巴兰尼亚, 伏伊伏丁那的一个区, 8, 165, 293

Bardossy, László 巴尔多希·拉斯洛, 匈牙利首相, 256, 260

Barthou, Louis 路易·巴尔杜, 法国外长, 213, 216, 232; 被刺死, 216

Basarab family, Wallachia 瓦拉几亚的巴萨拉布家族, 10

Bashi Bazouks 巴希-巴佐克, 土耳其非正规部队, 85—88

Batthány, Count 鲍詹尼伯爵, 匈牙利内阁会议主席(1848年), 52, 56, 57, 61; 被处决, 63

Beaconsfield, Earl of 比肯斯菲尔德伯爵, 英国首相, 85, 86

Beck, Col. Józef 约瑟夫·贝克上校, 波兰外长, 213; 与德国的领土要求 242—3

Belcredi, Count 贝尔克雷迪伯爵, 奥地利首相, 73

Belgrade 贝尔格莱德, 7; 帕夏, 32, 34; 被塞尔维亚起义者攻克(1806年), 32; 土耳其人再次进入, 33; 土耳其卫戍部队撤离, 80; 作为边境城市, 103; 在1914—1918年战争中, 121—2, 128, 129, 143; 市内的共产党员, 176; “白色”俄国使团, 184; 夺走萨格勒布的贸易, 191; 反对君主专制的示威游行(1931年), 209—10; 德国人轰炸(1941年), 253; 游击队员和红军进入(1944年), 285; 设立共产党情报局总部, 311; 各国首脑举行会议(1961年), 335

Bem 贝姆, 波兰将军; 为匈牙利作战(1848—9年) 62, 63; 纪念, 300

Beneš, Edvard 爱德华·贝奈斯, 捷克领袖, 150, 140; 控制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145; 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外长, 145, 180, 181, 183, 222; 在和会上, 153, 159; 为国际联盟工作, 183, 184; 和法国, 187; 护心罗马—柏林轴心, 212; 任总统, 220, 221; 和希特勒, 231, 232, 233; 辞职, 234, 在美国, 234, 263; 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首脑, 268, 269, 274; 返回布拉格, 289, 307; 辞职(1948年), 310, 纪念, 353

Beran 贝伦, 布拉格大主教, 320

Beran, Rudo'f 鲁道夫·贝伦, 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理(1938年), 236, 241;

Berchtesgaden 贝希特斯加登; 希特勒会见张伯伦, 234; 希特勒会见罗马尼亚的卡罗尔, 238

Beria 贝利亚, 俄国保安警察的首脑; 被处决, 322

Berlin 柏林; 条约(1878年), 86, 105, 111, 俄国人进入(1945年), 288; 发生暴乱(1953年), 322; 危机(1961年) 332

Berling, Zygmunt 齐格蒙特·贝林格中校, 在红军中组成波兰的科希秋什科师, 267, 268, 282

Beseler, General Hans von 汉斯·冯·贝斯勒将军; 德国驻华沙的军事总督(1915年), 128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10, 按布加勒斯特条约并于俄国(1812年), 20, 25; 经维也纳会议承认为俄国一部分, 27; 按巴黎条约划属摩尔达维亚(1856年), 66; 为俄国收复(1878年), 85, 87, 103; 按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丢失给了德国①(1917年), 137—138; 归于罗马尼亚(1918年), 138, 164; 和俄国—罗

① 原文作 lost to Russia(丢失给了俄国), 有误。——译者

马尼亚两国的关系,184;乌克兰少数民族,199;和乌克兰的边界,218;在德苏条约中划归俄国,244,246;俄国要求获得并占领,247;罗马尼亚重占,260;俄国决定保有,276,278,293;红军的挺进,280;马克思的评述,347

Beskid mountains 贝斯基德山脉,2,6

Bethlen, Count István 拜特伦·伊斯特万伯爵,匈牙利首相,202,203

Beust, Ferdinand, von 斐迪南·冯·博伊斯特,奥地利首相,73,74

Bevin, Ernest 欧内斯特·贝文,英国外交大臣,291,292

Bialystok 比亚韦斯托克,波兰地方:犹太人起义(1943年),267

Bierut, Boleslaw 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俄国扶植的波兰领袖,268,277,282,295;任总统,305,323;去世,326

Bihać 比哈奇,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的召开(1942年),272

birth rate 出生率;斯拉夫人和德意志人的,95

Bismarck, Prince Otto von 奥托·冯·俾斯麦亲王,70,150;论波希米亚,6;与奥地利,73,95;与巴尔干各国,83,85,103;与柏林条约,87;倒台(1890年),93

Bitolj (Monastir) 比托利(莫纳斯提尔),15;保加利亚的主教区,105;塞尔维亚打败土耳其人(1912年),114;被萨洛尼卡军队解放(1916年),133

'Black Hand' "黑手党",塞尔维亚秘密会社,81,112—13,116,117;塞尔维亚军队摆脱影响,136

Black Sea 黑海;贸易,11;克里米亚战争与海军力量,65;按巴黎条约非军事化(1858年),82

Blagoev, Dimitar 迪米特尔·布拉戈耶夫;建立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108

Blaj 布拉日;举行的罗马尼亚反匈牙利集会(1848年),56

Bled 布莱德;小协约国举行的会议(1938年),233,235,236,铁托与季米

特洛夫的会晤(1947年),313

blitzkrieg 闪电战,259

Bock, General von 冯·博克将军,德国对俄作战司令官(1941年),258

Bodnaraş, Emil 埃米尔·波德纳拉希,罗马尼亚共产党人,299;任国防部长,301;赴贝尔格莱德和北京的代表团团长,345

Bohemia-Moravia 波希米亚-摩拉维亚,4—6,19,20;捷克语言和民族主义,29,64;社会和文化变迁,48—9,64;在1848年,53—4,58,59;立宪政治,77—8;作为“中欧”的中心,130;在匈牙利军队控制下(1917年),134;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1938年),236;作为保护国并入德意志第三帝国(1939年),241,262;其余参看Czechoslovakia条。

Bohemian Museum Society 波希米亚博物馆学会(1818年),49

Bollman, Dr. of Philadelphia 费城的博尔曼博士;在维也纳会议上,23

Bonnet, Georges 乔治·庞纳,法国总理,232,237

Boris 博里斯,保加利亚王储,104;其父让位,继任保王(1918年),144;保王三世,179,180,205,215,216;独裁,225,238;不理睬慕尼黑协定(1938年),236;与俄国战役(1941年),259;希特勒之召唤,274;去世,275

Borodino 鲍罗季诺;战役(1812年)22

Borojević, Marshal Svetozar 斯韦托扎尔·博罗耶维奇元帅、奥匈二元君主国军队(1914—18年战争期间)中的克罗地亚人,141

Bosnia 波斯尼亚,14,80;反土耳其起义,32,83;据布达佩斯协定(1877年)划归奥地利势力范围,85;奥地利获得占领的权力(1878年),87;奥地利兼并(1908年),104,110—11;成为南斯拉夫的一部分189;成为克罗地亚王国的一部分254;抵抗运动,272

Bottev, Hristo 赫里斯托·波特夫,保加利亚领袖,82

Boy Scouts 童子军, 在匈牙利被取缔, 304

Braila 布勒伊拉, 多瑙河上港口, 171

Brandenburg 勃兰登堡; 成为普鲁士王国, 21

Brasov 布拉索夫, 罗马尼亚城市, 改名为“斯大林城”, 321

Bratianu, Constantin 康斯坦丁·布勒蒂亚努, 罗马尼亚自由党领袖, 261; 任副首相, 283; 在1946年选举中, 303

Bratianu, Dimitrie 迪米特尔·布勒蒂亚努,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领袖(1848年), 61

Bratianu, Ion 杨·布勒蒂亚努, 罗马尼亚民族主义领袖(1848年), 61; 任首相, 103

Bratianu, Ionel 杨诺尔·布勒蒂亚努, 罗马尼亚自由党领袖, 107; 任首相, 120, 163, 198, 200; 在和会上(1919年), 153, 164

Bratianu, Vintila 文图拉·布勒蒂亚努, 199; 罗马尼亚首相, 200; 民族化法律, 199

Bratislava (Pozsony, Pressburg) 布拉迪斯拉发(波索尼, 普雷斯堡), 斯洛伐克首府, 5, 29; 召开匈牙利改革议会(1832年), 50; 召开议会(1847年), 51; 归于捷克斯洛伐克(1919年), 160; 按第一次维也纳裁决书留给斯洛伐克(1938年), 235; 把捷克部队派入(1939年), 241; 由匈牙利割让给捷克斯洛伐克的、得自多瑙河对岸的领土(1945年), 293; 在倾向自由化期间, 350; 捷克斯洛伐克与华沙条约国领袖的会谈(1968年), 354

Brest-Litovsk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 签订停战协定(1917年), 137; 举行和平谈判, 137, 138, 139; 波兰政治家被关押(1930年), 203

Brezhnev 勃列日涅夫, 苏联共产党人; 继承赫鲁晓夫(1964年), 332; 与日夫科夫, 343

Briand, A. A. 白里安, 法国外交部长,

208, 232

Brindisi 布林迪西, 15

Britain 英国; 在维也纳会议上, 27; 与希腊独立, 37, 38, 40; 与波兰, 44, 68, 在巴尔干进行贸易, 修筑铁路, 79; 与俄土战争, 86, 87; 在塞尔维亚杀害国王后与之断交, 109; 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兼并表示遗憾, 111; 与1914—1918年大战中的从属民族, 124; 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141; 在和会(1919年)中, 151, 152, 153; 支持希腊人反对土耳其人(1919年), 169; 与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之举, 231, 232, 236, 237; 对波兰作出保证, 242, 243, 244, 245; 也对罗马尼亚和希腊作出保证, 242; 保加利亚的宣战, 260; 承认波兰民族委员会, 266; 军队在意大利, 273; 拒绝与罗马尼亚单独议和, 277; 谣传军队在匈牙利空降着陆, 278—9; 军队在希腊登陆(1944年), 284; 军队到达莱茵河, 287; 进入奥地利, 288, 293; 承认罗马尼亚政府(1946年), 310; 在匈牙利革命期间正忙于苏伊士问题(1956年), 331

Brno 布尔诺, 48; 审判纳粹青年运动成员, 208—9; 德意志少数民族, 236

Broz, Josip 约瑟普·布罗兹, 1914—1918年大战中的一名军士长, 121; 作为共产党员被判处徒刑, 210; 详见Tito条

Brussilov, General 布鲁西洛夫将军, 1914—1918年大战中的俄军司令官, 122, 131

Bucharest 布加勒斯特, 107; 条约(1812年), 20, 25; 临时政府(1848年), 61; 保加利亚爱国人士避难, 82; 和约(1913年), 115, 126; 德国人进入(1916年), 132; 举行的农业会议(1930年), 208; 俄军作为解放者进入(1944年), 284; 共产党情报局开会(1948年), 313

Buchlau 布希洛; 奥地利与俄国两国外交大臣会谈(1909年), 111—12

Budapest 布达佩斯, 7, 20; 激进的大学生(1848年), 52; 奥地利军队攻占(1849年), 62; 行政职权操于捷克人手中, 64;

奥皇加冕为匈牙利国王(1867年), 72;
(奥地利和俄国于1877年就巴尔干各国
达成的)一些协定, 85, 86; 工业展览会
(1885年), 98; 法军司令官(1915年),
160; 罗马尼亚人占领(1945年), 286;
俄国镇压发生的革命(1956年), 330-1
Budenny, Marshal 布琼尼元帅, 对波兰
作战的俄国骑兵司令官(1920年), 170;
为对德作战司令官(1941年), 258
Bug river 布格河, 2, 245, 246
Bul'ganin, Marshal 布尔加宁元帅, 派
驻波兰临时政府的俄国代表(1944年),
277; 任俄国总理, 224
Bulgaria 保加利亚, 13, 14, 16, 17, 30;
语言复兴, 20, 81; 俄国人占领(1828—9
年), 81; 第一条铁路(1836年), 79; 民族
的觉醒, 81—2; 成立东正教区(1870年)
82, 105; 土耳其人镇压起义(1876年),
83—4; 奥地利庇护, 83, 84—5; 在俄土
战争中(1877年), 8; 新的自治国家,
86—7; 危机(1885—6年), 88—9; 宣布
对土独立(1903年), 104; 农民党, 107,
178, 179; 社会民主党, 108; 在巴尔干战
争中, 113—14, 114—15; 寻求与奥匈二
元君主国和德国结盟(1914年), 115; 保
持中立(1914年), 126; 加入德奥一方参
战(1915年), 128; 国内厌战, 142; 与停
战(1918), 143; 战后的混乱, 144; 与和
约, 150, 167—8; 要求修订和约的情绪,
170, 186, 238, 246; 各个政党, 174; 农
业人口比例, 176; 共产党人, 176, 204;
陆军政变(1923年), 179—80; 共产党
起义被镇压, 180; 国内政策, 204—6; 军
官联盟, 205, 216, 225; 与墨索里尼的接
触, 212; 与德国的贸易条约(1935年),
215; 与巴尔干协约国, 215, 238, 246;
右倾, 216, 225; 与南斯拉夫签订条约
(1937年), 220; 镇压由纳粹教唆的运
动, 223; 罗马尼亚割让多布罗加(1940
年), 247—8; 参加三国公约, 德军进
入(1941年), 249, 255; 参加进攻南斯拉
夫, 253; 占领马其顿的大部, 254; 在对
俄战争中保持不参加作战, 259—60; 孤

立于主要冲突之外, 274—5; 祖国阵线,
275, 284, 296; 新政府对德作战, 俄国人
以解放者身分进入索非亚, 284; 俄国人
可以任意行动, 287, 290; 在和议中,
293; 红军退出(1947年), 295; 联合政
府, 296; 共产党取得政权, 298; 与南
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对马其顿的关系,
312—13, 336, 344; 共产党清洗党员,
316; 国内政治(1950—61年), 342—
4; 经国会规定以农业为唯一产业, 342,
345

Bulgarians 保加利亚人, 17; 在多布罗
加, 164; 在希腊, 171; 在南斯拉夫, 171,
189; 在罗马尼亚, 199

Bulow, Prince von 冯·皮洛夫亲王,
德国首相, 93

Buol, Count Ferdinand 斐迪南·包
尔伯爵, 奥地利外交大臣, 65, 66

bureaucracy 官僚政治; 普鲁士的, 59;
奥地利的, 64, 79

Burgenland 布尔根兰, 由匈牙利转让
给新的奥地利共和国(1900年), 163

Burian, Count Stephen 斯蒂芬·布里
安伯爵, 治理波斯尼亚 黑塞哥维那,
110; 任奥匈二元君主国外交大臣, 242

Byelo-Russians 白俄罗斯人; 在波兰,
4, 170

Byrnes, James E. E. 詹姆斯·贝尔
纳斯, 美国国务卿, 291, 292

Byzantium, Byzantine Empire 拜占
庭, 拜占庭帝国, 16—17

Calinescu, Anton 安东·卡利内斯库,
罗马尼亚首相, 为铁卫军所刺杀, 238

Calvinism 加尔文教派; 在特兰西瓦尼
亚, 12; 蒂萨家族的信奉, 97; 霍尔蒂的
信奉, 162; 和共产党人, 320

Capodistrias, John 约翰·卡波第斯
特里亚, 与涅谢尔罗迭同时担任俄国外
交大臣, 36; 为希腊首任总统, 37—8

Caporetto 卡波雷托; 意大利的战败
(1917年), 141

Carinthia 卡林西亚, 29, 30; 南斯拉夫

提出的要求, 165, 167; 在南部举行公民投票, 167; 留归奥地利, 167; 乌斯塔沙部队在游击队追击下逃入, 288

Carniola 卡尔尼奥拉, 29, 30, 34

Carol I of Roumania 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一世, 87; 与奥匈二元君主国和德国缔结秘密条约(1883年), 103, 108

Carol I of Roumania 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二世, 199, 200, 201, 220; 附合墨索里尼, 210—11; 与法国的联系, 221; 实行独裁, 235—6; 与希特勒, 233, 238; 访问巴黎和伦敦, 227; 考虑抵抗俄国, 247; 同意割让领土, 248; 退位, 248

Carpathian mountains 喀尔巴阡山脉, 1, 6, 9, 11

Carpatho-Ukraine (independent Ruthenia) 喀尔巴阡—乌克兰(独立的罗塞尼亚), 235—6, 241, 355

Castlereagh, Viscount 卡斯尔雷子爵, 英国外相, 23, 24, 25, 26

Catholic Church 天主教会; 在波兰, 4, (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 45, 68, 92; (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 46, 92; (在共产党统治下的波兰), 306, 337—8; 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 17, 54, 56, 100, 264; 在捷克斯洛伐克, 96, 187; 在斯洛伐克, 263; 在匈牙利, 304, 320, 341; 在南斯拉夫, 312

Caucasus 高加索, 87, 138

Cavour, Count di 加富尔伯爵, 70

Ceausescu, Nicolae 尼古拉·齐奥塞斯库,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 323—4; 任总统, 346, 347; 在布拉格受到欢迎(1968年), 355

Censuses, Linguistic and racial 语言及种族普查, 在马其顿, 105; 在切欣, 158; 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 165

Cepicka, Alexei 阿列克塞·采皮茨卡, 捷克斯洛伐克内政部长, 329

Cernavoda 切尔纳沃达, 多瑙河沼泽地的大桥, 39, 132

Cernik, Odrich 奥尔德里赫·切尔尼克,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353, 554

Cetinje 采蒂涅, 门的内哥罗旧首都, 15, 83

Clamberlain, Neville 内维尔·张伯伦, 英国首相; 派为中间人去见希特勒(1939年), 231, 241; 会见希特勒, 234; 谈捷克斯洛伐克局势, 255; 与波兰, 243

Charles 查理, 奥地利皇帝、匈牙利国王, 133, 142, 146; 与协约国接触, 134, 140; 退位(1918年), 148—9, 企图复辟未遂, 181, 202, 211

Charles of Hohenzoellern-Sigmaringen 霍亨索伦—西格马林根王族的查理; 被选为罗马尼亚大公(1866年), 80; 在俄土战争中, 85; 成为国王(1881年), 85(详见Carol I条)

Charles V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 1

Charles V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 5

Chernaev, General 切尔尼耶夫将军, 在保加利亚作战的俄国司令官(1876年), 84

Chervenkov Vuko 维尔科·契尔文科夫, 保加利亚总理, 317, 323, 328, 343

Chicherin, Georgii 格奥尔基·奇切林, 俄国外交人民委员, 185

China 中国; 与苏联的关系, 332, 335, 343, 344; 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335; 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 336; 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342; 与罗马尼亚的关系, 345

Chisnevrchi, Josif 约瑟夫·奇西聂夫斯奇, 罗马尼亚政治局委员, 318

Chlopicki, General Jozef 约瑟夫·赫沃皮茨基将军; 波兰临时政府首脑(1830年), 42

Cholera, epidemics of 霍乱流行; 在波兰 1831年, 43; 在意大利(1849年), 53

Chou En-lai 周恩来; 访问罗马尼亚(1966年), 345

Churchill, Winston 温斯顿·邱吉尔; 对汉伦产生深刻印象, 231; 与捷克斯洛伐克, 251, 255, 272, 273; 以首相身分在希特勒进攻波兰后发表广播谈话,

265; 和斯大林一起参加战时会议(在德黑兰), 276, 277, (在莫斯科), 285, (在雅尔塔); 会见鄂图大公, 278. 计划英美部队控制多瑙河流域, 280-1; 在波茨坦会议上, 290

Chvalkovsky, František 弗兰蒂什克·奇瓦尔科夫斯基,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 236

Ciano, Count 齐亚诺伯爵, 意大利外交部长, 220, 224, 239, 248, 249

Cierna nad-Tsou, 蒂萨河畔切尔纳, 俄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两国领导人的会晤(1968年), 354

Cincar-Marković, Aleksander 亚历山大·钦察尔-马尔科维奇, 南斯拉夫外交大臣, 250-1, 252, 253-4

Circassian irregular troops (Turkey) (土耳其的)亚尔卡亚人非正规部队, 84

Cis-Leithania 西斯勒萨尼亚(奥匈二元君主国中的非匈牙利部分); 泛德意志主义, 94-5

Cities Balkan distrust of 巴尔干人对城市的不信任, 107-8

Clausewitz, General 克劳塞维茨将军, 45-6, 126

Clemenceau, Georges 乔治·克雷孟梭, 法国总理, 134, 146, 151, 152, 154, 161, 164

Clementis, Vladimír 弗拉吉米尔·克里门蒂斯, 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 310; 被处决, 318-9

Ciuj (Koložsvár, Klausenberg) 克卢日(科洛兹瓦尔, 克劳森堡), 特兰西瓦尼亚主要城市, 12; 审判罗马尼亚领袖(1894年), 98, 104; 根据维也纳裁决书划归匈牙利(1940年), 243; 罗马尼亚希望得到, 261;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大学, 346

Coal mines, in Duchy of Teschen 切欣公爵领地的煤矿, 158

Codreanu, Corneliu 科内柳·科德里亚努, 罗马尼亚铁卫军的创建人, 200, 225, 226, 238

Collective security 集体安全, 120

Collectivization of Agriculture 农业集体化, 319, 321, 337, 348

'Comecon' "经互会"(东欧国家的经济互助委员会), 326, 332; 与南斯拉夫, 335; 与保加利亚, 342, 345; 与罗马尼亚, 345; 与捷克斯洛伐克, 347

Cominform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 311, 313; 解散(1954年), 325

Comintern 共产国际, 176, 191; 反共产国际公约, 242, 246;

Communists 共产党人; 在奥匈帝国, 139; 在匈牙利, 161, 302-5; 在南斯拉夫, 176, 193, 295, 311-14; 在保加利亚, 176, 204, 295, 298; 在罗马尼亚, 176, 298-301; 在捷克斯洛伐克, 176, 236, 307-10; 在阿尔巴尼亚, 295, 314-15; 在波兰, 295, 305-7; 在希腊, 312, 314; 清洗, 316-20

Conrad von Hotzendorf, Franz 弗朗茨·孔拉特·冯·赫岑道夫, 奥匈帝国总参谋长, 111, 112, 128, 133, 134; 谈萨拉热窝刺杀案, 118

Constanta 康斯坦察, 黑海港口, 11, 79; 被德国人占领(1916年), 132; 俄国人(1944年), 284

Constantine 康士坦丁 大公爵, 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之弟, 42, 43

Constantine 康斯坦丁, 希腊国王, 128, 169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80; 青年土耳其党人, 111; 英国在萨洛尼卡的部队转向(1918年), 143

Constitutions 宪法; 保加利亚的(1879年), 88; 捷克斯洛伐克的(1920年), 186; (1960年), 349; 南斯拉夫的(1921年), 190, 193, 194; (1931年), 209; (1946年), 311, 333; 罗马尼亚的, (1923年), 197, 198-9; (1948年), 301; (1952年, 1965年), 346; 波兰的(1935年), 223-4

Cooperative societies 合作社; 在捷克斯洛伐克, 178

Coraes, Adamantios 阿达曼提俄斯·科腊伊斯, 希腊民族主义者, 35—6
Corfu 科孚岛; 法国卫戍部队, 22; 岛上的塞尔维亚政府, 129; 塞尔维亚人与南斯拉夫委员会订立的协定(1917年), 136, 189; 意大利人轰炸和占领(1923年), 182
Cracow 克拉科夫, 维斯杜拉河盆地城市, 2, 25, 77, 95; 十日共和国(1846年), 47; 游行示威(1848年), 58; 一天苏维埃政权(1925年), 194; 学生肇事(1968年), 337
Crimea 克里米亚; 被俄国兼并(1783年), 20; 战斗(1942年), 162; 俄国人重占(1944年), 280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45, 65
Croatia-Slavonia 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 8, 16; 和达尔马提亚的“三位一体王国”(1848年), 54, 56; 在匈牙利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方, 61, 64; 被承认为匈牙利的一部分(1867年), 73; 匈牙利的统治, 75—6, 98—100; 文化复兴, 76; 与塞尔维亚的关系, 76, 99, 100—1, 121, 191; “纯右党”, 100; 农民党, 100, 101, 121, 154, 178, 191—2, 193; 决定脱离匈牙利(1918年), 146, 147; 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南斯拉夫王国)的一部分, 148, 153, 163, 164, 189, 190; 分离主义活动受到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鼓励, 203, 240; 成为自治单位(1939年), 240; 抵抗运动, 272; 成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个部分, 334
Croats 克罗地亚人, 17; 在拿破仑统治下与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结合, 30; 语言, 50, 75, 334; 与科苏特, 51, 57;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 141
Crusaders 十字军, 15
Cśaky, Count 恰基伯爵, 匈牙利外交大臣, 237
Curzon line 寇松线, 作为波兰的东部国界, 170, 276, 277, 282, 288
Custoza, battle of 库斯托扎之战(1848年), 52, 57

Cuza, Alexander 亚历山德鲁·库扎, 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所选举出来的大公, 66—7, 80
Cvetković, Dragiša 德拉吉萨·茨维特科维奇, 南斯拉夫首相, 239—40, 251, 252, 255
Cyprus 塞浦路斯, 英国人获准驻守(1878年), 87
Cyrankiewicz, Josef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 波兰社会主义者, 305; 任总理 306, 327
Cyril 西里尔, 保加利亚的摄政王, 275; 被处决, 298
Czartoryski, Adam 亚当·查尔托里斯基, 波兰贵族, 24, 42, 44, 45; 任俄国代理外交大臣, 33; 任波兰五人委员会主席(1831年), 43
Czechoslovak National Council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1916年), 130, 140, 141, 145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宣布成立(1918年), 145; 与波兰之间的国界之争, 158—9, 181; 少数民族, 159—60, 171, 222; 匈牙利人, 160, 161; 政党, 174, 176, 178; 社会立法, 175; 在小协约国中, 180—1, 183, 184; 与法国签订的条约, 181, 219; 与意大利签订的条约, 182; 国内政策, 186—9; 国内苏台德区的德意志人, 见 Sudetenland 条; 国内禁穿纳粹制服, 208; 与俄国订立互助条约, 213; 孤立于小协约国伙伴之外, 221; 国内与德国的分歧, 221—2; 德国并吞奥地利后, 226—7; 被希特勒灭亡, 230—6, 240—2; 流亡政府, 268—9; 反纳粹起义(1945年), 295; 将罗塞尼亚割让给俄国, 292; 外国军队撤出(1945年), 295; 联合政府, 296, 307—9; 与马歇尔计划, 308; 共产党政府, 309—10, 321, 347—8; 清洗共产党人, 318—19; 支持拉帕茨基计划, 340; 经济危机, 348; 困难和骚动(1963—8年), 349—53; 新经济模式 NEM, 350, 352, 354; 作家协会, 351; 改革计划, 353; 联邦制法,

353, 356; 华沙条约国的干涉(1968年), 354—6

Czechs 捷克人, 5, 6, 17; 语言, 5, 29, 64, 79, 95; 遗产: 元君主国的前景, 72; 在文化上的进步, 78; 与日尔曼人之间的关系, 78, 95, 和俄国人的接触, 123; 和英国及法国的接触(1915年), 124; 在维也纳议会中(1914年), 134;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的哗变(1918年), 139; 在俄国的军团, 141; 法国的庇护, 151. 亦见Bohemia-Moravia条

Czernin, Count 切尔宁伯爵,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07, 134

Czernowitz (Cernauti, Chernovtsy) 切尔诺维策 切尔诺夫策, 切尔诺夫策), 布科维纳的主要城市, 12, 122

Czestochowa 琴斯托霍瓦; 波兰人举行宗教集会(1936年) 327

Dabsa, V. V. 达布斯基, 波兰解放党的领袖, 178

Dacia 达契亚, 罗马帝国行省, 18

Datadier, Édouard, 爱德华·达拉第, 法国总理, 231, 234, 27

Dalmatia 达尔马提亚, 15, 16; 与拿破仑, 22, 20; 被奥地利兼并, 27, 56; 与奥地利将军们, 83; 把北部沿海地区许诺给意大利(1915年), 115, 148; 被宣布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一部分(1918年), 147; 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要求, 166, 167; 意大利获得海岸部分(1941年), 254

Danube river 多瑙河; 盆地, 6—11; 作为贸易航道, 20, 79, 90; 与巴黎和会(1856年), 66; 三角洲归于罗马尼亚, 87; 被匈牙利控制, 97; 在1914—1918年大战中, 12; 法国在这一带的势力, 181; 德国在这一带的势力, 214; 红军到达(1940年), 247, (1944年以后) 285, 294; 河上的新桥, 319

Danubian Commission 多瑙河委员会, 66

Danubian Customs Union 多瑙河关

税同盟、塔迪厄计划, 1912年), 208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多瑙河两公国(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 10, 11, 17, 18; 与俄国的基督教徒, 20; 民族意识, 28; 在当地的霍斯波达尔统治下(1826年), 38; 被俄国占领(1848—50年), 60—1; 被俄国人再次占领(1853—4年, 即克里米亚战争的最初原因), 65; 被奥地利占领(1854—7), 6; 名义上属于土耳其, 66; 选出共同的君主, 并命名为罗马尼亚(1859年), 66—7, 79; 余见 Roumania 条

Danzig 但泽, 经国际联盟宣布为自由市, 156; 波兰用建设格丁尼亚来代替, 195; 纳粹分子, 212; 德国提出的要求, 242

Deak, Ferenc 戴阿克·费伦茨, 匈牙利自由党人, 50, 51, 52, 57, 61; 会见弗兰西斯·约瑟夫, 72; 与奥普战争, 73; 与少数民族法, 74—5

Dedeagatch 杰贾加赫, 爱琴海上的保加利亚港口, 115, 168

Dembinsky 丹宾斯基, 为匈牙利作战的波兰将军(1948—9年), 62

Derer, Ivan 伊凡·德泽尔, 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人, 187

de-Stalinization 非斯大林化, 331—31, 332

Deutschnationaler Verein, Pan-German political party 德意志全国同盟, 泛德意志主义政党, 94

Diebitsch, Marshal 迪比奇元帅, 俄国在波兰的司令官(1831年), 43

Dimitrievic, Col, Dragutin ('Apis'), 德拉古廷·德米特里耶维奇(“阿皮斯”)上校, “黑手党”首脑, 111, 116, 118; 被处决, 136

Dimitrov, Georgi 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 保加利亚共产党人, 108, 104, 295, 296; 成为独裁者, 298; 会见铁托, 313; 在莫斯科, 317; 去逝, 317

Dinaric mountains 迪那里克山脉, 13, 15

- Djalević, Djuro 久罗·贾科维奇;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 210
- Djilas, Milovan 米洛万·德吉拉斯 门的内哥罗领袖, 313, 333
- Dmowski, Roman 罗曼·德莫夫斯基, 波兰国民民主党创建人, 93, 127, 135—6, 111
- Dnieper river 第聂伯河, 260
- Dniester river 德涅斯特河, 10; 俄国边界推进到(1792年), 10; 河上的铁路桥, 218
- Dobrovsky, Fr 多布罗夫斯基 捷克语言学家, 29, 49
- Dobrudja region 多布罗加地, 11, 79; 按柏林条约划归罗马尼亚(1878年), 87; 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要求(1913年), 115; 被德国人占领(1916年), 132
- Dobrudja, Southern 南多布罗加, 割让给保加利亚(1918年), 138; 割让给罗马尼亚(1919年), 164; 保加利亚少数民族, 199; 割让给保加利亚(1940年), 并由保加利亚保持下来(1945年), 293
- Dodecanese archipelago 多德卡尼斯群岛, 162, 21
- Dollfuss, Engelbert 恩格尔伯特·多尔富斯, 奥地利总理, 218; 被纳粹分子谋杀, 214
- Don basin 顿河盆地, 轴心国的推进, 258, 259
- Dragoman Pass 德腊果曼隘口, 15, 168
- Drasković, Milorad 米洛拉德·德拉斯科维奇, 南斯拉夫政治家; 被谋杀, 176
- Drava river 德拉瓦河, 8
- Dreikaiserbund, and Balkans 三皇同盟与巴尔干各国, 83, 85, 103
- Drinov, Prof Marin 马林·德里诺夫教授, 保加利亚教育大臣, 81, 82
- Drucki-Lubecki, J. J. 德乌茨基-卢拜茨基, 波兰财政部长, 42
- Dubcek, Alexander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 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 349—50;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1968年), 254, 355
- Dubrovnik (Ragusa) 杜布罗夫尼克(拉哥萨), 16, 126
- Durres (Durrazzo) 都拉斯; 苏联红军舰队, 315
- East Germany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321—2, 332
- Eastern Rumania 东鲁米利亚, 15, 87, 88
-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经济上的考虑; 与和会(1919年), 155, 171; 使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附属于德国, 235
- Eden, Anthony 安东尼·艾登, 英国外交大臣, 217, 252, 285
- education 教育; 在(俄国统治下的)波兰, 45, 67, 92; 在(普鲁士统治下的)波兰, 92, 94; 在罗马尼亚, 67; 在保加利亚, 81, 105; 匈牙利少数民族的, 98, 99; 在捷克斯洛伐克, 137; 波兰少数民族的, 196
- Edward VII of Britain 英王爱德华七世, 109
- EEC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Common Market) 欧洲经济共同体, 共同市场, 335
- eight-hour day 八小时工作日制; 在南斯拉夫, 176; 捷克斯洛伐克农业劳动者获得, 178
- Eisenhower, General 艾森豪威尔将军, 283, 284
- Elbe river 易北河, 4
- Elias, General 埃利亚斯将军, 捷克政府首脑, 德国傀儡, 263
- Eötvös, Baron 厄特沃什男爵, 匈牙利中央集权派分子, 50, 51, 52, 75
- Epirus 伊皮鲁斯, 115, 169
- Essad Pasha 艾萨特帕夏; 在和会被刺死(1919年), 154
- Estergom, citadel of 埃斯泰尔戈姆城堡, 7

Esterházy, Count Maurice 莫里斯·埃斯特哈泽伯爵, 马札尔贵族, 72
Esterházy family, estates of 埃斯特哈泽家族的庄园, 48
Estonia 爱沙尼亚, 135, 137; 宣布独立, 138; 签署李维诺夫议定书 (1929年), 185; 按德苏条约划归苏联 (1939年), 244; 并入苏联, 247
Ethiopia, Italian invasion of 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 218, 219
Eugene, Prince of Savoy 萨沃伊尤金亲王, 6
European Union, concept of 欧洲联盟的设想, 208

Falk, Adalbert 阿达尔伯特·法尔克, 普鲁士教育大臣, 92
Falkenhayn, General Erich von 埃里奇·冯·法尔根汉将军 德国总参谋长, 128, 132
fascists, embryo groups of 初期的法西斯组织; 在意大利 (1919年), 166; 在罗马尼亚, 200
Fazekas, János 福泽考什·亚诺什, 罗马尼亚副总理, 346
Felvidék 菲尔维代克, 匈牙利从捷克斯洛伐克收复的一个地区 (1938年), 235, 236, 241
Ferdinand I 斐迪南一世, 奥地利皇帝, 52, 56; 退位 (1848年), 62
Ferdinand 斐迪南, 罗马尼亚国王, 197, 200
Ferdinand of Saxe-Coburg 萨克西-科堡的斐迪南, 保加利亚国王, 89, 104, 108; 让位于其子博里斯 (1918年), 144
feudalism 封建主义; 在加利西亚, 46; 在匈牙利, 51, 52; 在奥地利, 57; 在罗马尼亚, 67
Fierlinger, Zdenek 兹德涅克·费林格——为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位于解放后的科希策) 首脑 (1945年), 263
Filov, Bogdan 波格丹·菲洛夫, 保加

利亚总理, 247, 259, 275; 被处决, 298
Finland 芬兰; 在俄国统治下, 26-7, 135, 137; 按苏德条约划归俄国, 244; 俄国入侵, 246; 德国人, 255; 与德国结盟, 256; 与俄国交战, 258, 284; 和约作出的决定, 294; 不参加华沙条约, 宁愿中立, 325
Fiume (Rijeka) 阜姆 (里耶卡), 97, 126; 匈牙利和克罗地亚要求治理, 75, 76; 被宣布为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的一部分 (1918年), 147; 被匈牙利割让, 163; 南斯拉夫要求获得, 166, 182; 邓南遮攻占 (1919年), 166; 成为自由市 (1920年), 167; 被割让给意大利 (1924年), 167; 让衰落, 171; 给予匈牙利经营商业的方便条件, 182; 南斯拉夫要求获得 (1945年), 293; 复归于意大利 (1954年), 294
Flottwell, Erich 厄里奇·弗洛特韦尔, 波兹南尼亚的普鲁士总督, 46
Fock, Jeno 福克·耶诺, 匈牙利总理, 342
Foreign Ministers, Council of 外交部长会议 (1945—7年), 291, 292, 293
Foreign Office, London, memoranda of 英国外交部备忘录; 有关战后中东欧的, 131; 有关维也纳会议的, 150
Fourteen Points, of President Wilson 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 120, 139, 149
France 法国; 在维也纳会议上, 151; 与希腊独立, 47; 波旁王室的倒台 (1830年), 41; 奥尔良王室的倒台 (1848年), 51, 57; 与多瑙河两公国, 60; 与波兰, 68; 与罗马尼亚的贸易, 79; 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兼并表示遗憾, 11; 1914—18年大战中与各从属民族的关系, 124; 承认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 141; 在和会上, 151; 匈牙利充当庇护国, 189;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 (1924年), 与罗马尼亚的条约 (1926年), 与南斯拉夫的条约 (1927年), 181; 与波兰联盟, 181, 185, 213; 支持对1919

—20年间的和平解决办法，以满意于各国，183, 208; 反对奥德关税联盟，208; 与德波条约，213; 计划组织反德同盟，213, 216; 与俄国的互助条约(1935年)，218, 219, 232, 244; 与希特勒消灭捷克斯洛伐克事件，231, 232, 236—7; 向波兰提出保证，234, 也向罗马尼亚和希腊提出保证，242; 与俄国会谈，244; 与希特勒交战，245; 匈牙利革命期间(1956年)正忙于苏伊士运河问题，331;

Franchet d'Espèrey, Marshal 弗朗舍·德斯佩雷元帅; 任在萨洛尼卡的司令官，142—3; 在匈牙利，146, 151, 161, 182, 185

franchise 公民权; 在特兰西瓦尼亚，75; 在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76; 在保加利亚，88, 225; 在波希米亚，95; 在奥地利，96; 在匈牙利，101; 在匈牙利以此进行“威胁”，107; 在巴尔干各国，106; 在战后的匈牙利，162, 202; 在战后的其他国家，174; 在罗马尼亚，197, 198

Francis I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弗朗西斯二世(奥地利的弗朗西斯一世)，27, 29

Francis Ferdinand 弗兰西斯·斐迪南，奥地利的大公，79, 95, 97, 100, 102, 133; 被刺，117

Francis Joseph 弗兰西斯·约瑟夫，奥地利皇帝，62, 63, 72; 与二元君主国，71, 72, 73, 74; 与捷克人，77, 78; 与巴尔干各国，83; 与各政党，5, 60, 97; 访问萨格勒布，99; 与马扎尔沙文主义者，101; 在马其顿政策上与俄国的尼古拉意见一致(1903年)，106; 去世，133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战争，82

Franco-Soviet Pact of Mutual Assistance 法苏互助条约(1935年)，218, 219, 232, 244

Frank, Joseph 约瑟夫·弗兰克，克罗地亚“纯右党”领袖，100

Frank, Karl 卡尔·弗朗克，苏台德的领袖，222, 262

Fredrick William IV of Prussia 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四世，46, 59

Fruska Gora hills 弗鲁什卡山，9

Gaj, Ljudevit 路德维特·盖伊，克罗地亚学者，30, 50

Galati 加拉茨，多瑙河港口，11, 171, 344

Galicja 加利西亚(属波兰)，4, 12, 24; 按维也纳条约划归奥地利，25; 发生动乱(1845年)，46; 农民起义(1846年)，47, 92; 议会74, 77; 与普属及俄属波兰相比，成为自由主义的避难所，92; 在1914—18年大战中，121, 127; 波兰对东部提出要求，153, 170

Gallipoli, fighting on 加利波利半岛上的战斗，127, 128

Gamelin, General 甘默林将军，法国参谋部总长，219, 243

Gaulle, President de 戴高乐总统，346

Gdynia 格丁尼亚，波兰的一处新港，195

Geneva, summit conference at 日内瓦最高级会议(1950年)，324

Gentz, Friedrich von 弗里德里希·冯·根茨，维也纳会议秘书，23, 24, 26, 37

George VI of Britain 英国的乔治六世，251, 266

Georghiev, General Kimon 基蒙·格奥尔基耶夫将军，保加利亚首相，216, 225, 284, 296, 298

German Confederation, under Habsburgs 哈布斯堡王室治下的德意志联邦，27, 54

German National Assembly, Frankfurt 设在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国民议会(1848年)，54, 57, 59

Germanos, Archbishop of Patras 耶尔曼诺斯，帕特雷大主教，37

Germans 德意志人; 在中东欧，4—5, 7, 11, 12, 17; 民族主义的传播，41, 94, 95; 在捷克领土上，48, 54; 促进巴尔干半岛上的铁路建设，80; 在捷克斯洛伐

- 克, 159, 186—7 (亦见苏台德条); 在南斯拉夫, 165, 190; 在罗马尼亚, 164, 199; 在德奥两国境外 (Volksdeutschen 德意志族人), 171, 228, 248; 在波兰, 196; 被逐出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 (1945—6 年), 291, 348
- Germany 德国; 发生骚动 (1830 年), 41; 与罗马尼亚国王卡罗尔签订秘密条约 (1883 年), 103; 以及与奥地利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关系, 111; 支持奥匈帝国, 并宣战 (1914 年), 119; 在 1914—1918 年大战中, 127, 128; 与巴尔干诸国, 129—130; 订立和约, 150, 151; 与小协约国关系, 184; 与波兰关系恶化, 184—5; 希特勒在经济危机中掌权, 211—12; 与波兰缔结十年互不侵犯条约 (1934 年), 213; 废除这一条约, 243; 势力扩大至巴尔干, 214, 218, 219; 建议与奥地利结成关税联盟, 208; 合并奥地利及努力防止合并, 217, 219; 希特勒于 1938 年完成这一合并, 220; 重新占领莱茵兰 (1936 年), 219; 消灭捷克斯洛伐克, 230—6, 240—2; 与意大利缔结钢铁公约, 242; 与俄国缔约 (1939 年), 244; 缔结三国公约 (1940 年), 249; 与俄国的关系, 255—6; 入侵波兰, 245—6; 占领罗马尼亚 (1940 年), 247—9, 255; 占领保加利亚 (1941 年), 249; 入侵和瓜分南斯拉夫 (1941 年), 251—4; 入侵俄国 (1941 年), 256; 占领匈牙利 (1944 年), 279; 退出巴尔干 (1944 年), 284; 退出匈牙利 (1945 年), 286; 投降, 288
- Gerő, Ernő 格罗·埃尔诺, 匈牙利共产党书记, 302, 329, 330
- Gheorgiu-Dej, Gheorghe 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 299; 任计划部长, 301; 任总理, 318, 323, 328, 344—5
- Gierek, E. E. 盖莱克, 波兰西里西亚地方的共产党领袖, 339
- Gladstone, W.E. W.E. 格莱斯顿, 76, 84
- Glaise von Horstenau, General 格拉斯·冯·霍尔斯特瑙将军, 驻克罗地亚的德军司令官, 263, 264
- Gmund 格蒙德, 奥地利; 调整边界, (1919 年), 159
- Gneisenau, General, and Prussian Poland 格内森奥将军与普属波兰, 45—6
- Godesberg 戈德斯贝格; 希特勒和张伯伦的会见, 234
- Goering, Hermann 赫尔曼·戈林; 与南斯拉夫, 216, 217, 233
- Goga, Octavian 奥克塔维安·戈加, 罗马尼亚国家基督教党领袖, 223; 任首相 44 天, 225
- Golncowski, Count A. A. 戈鲁考夫斯基伯爵, 奥匈帝国外交大臣, 110
- Gömbös, Gyula 贡伯什·久洛, 奥匈帝国“国民主义者”领袖; 反对革命, 161, 162; 任首相, 203, 211, 224
- Gomulka, Wladyslaw 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 波兰共产党人, 268, 305, 306; 被开除出党, 317; 被重新接受入党, 327; 重新掌权, 328, 337
- Gorchakov, Prince Alexander 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公爵, 俄国首席大臣 82, 85, 86
- Görgei, Arthur 戈尔盖·奥尔图尔, 匈牙利将军, 62, 63
- Gorgopotamus 戈尔戈波塔穆斯, 希腊; 抵抗运动部队破坏铁路, 270
- Gorz (Gorz) 戈里齐亚 (戈尔茨); 意大利提出要求 (1915 年), 125; 争夺的战斗, 127; 南斯拉夫提出要求, 166, 167
- Gottwald, Klement 克利门特·哥特瓦尔德;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 269, 307; 任总理, 308, 309—10; 任总统, 310, 319, 321, 347; 去世, 322
- Grabski, Stanislaw 斯坦尼斯瓦夫·格腊勃斯基, 波兰国民民主党领袖, 194, 196
- grain 谷物; 罗马尼亚, 79, 197; (供应同盟国, 1914—18 年), 129, 132, 133; (希特勒与罗马尼亚, 215, 238, 246,

267; (俄国与罗马尼亚), 344; 匈牙利, 203, 341; 美国生产过剩, 207. 价格会议, 208

Graz, Slovene studies at 格拉茨的新斯洛文尼亚研究, 30

Grazynski, Michael 米哈尔·格拉兹斯基 上西里西亚的波兰总督, 196

'Great Stalin' "伟大的斯大林", 321

'Greater Bulgaria' "大保加利亚", 86, 105

'Greater German Reich' "大德意志帝国", 228, 245

'Greater Germany' "大德国", 91

'Greater Greece' "大希腊", 168

'Greater Moravian Empire' "大摩拉维亚帝国", 5

'Greater Rumania' "大罗马尼亚", 91, 197

'Greater Serbia' "大塞尔维亚", 91, 113, 125

'Greater South Slav Federation' "大南斯拉夫联邦", 312

Greece 希腊, 13, 14, 16. 阿尔巴尼亚人, 18, 171; 独立斗争, 35—8; 取得塞萨利, 87; 在巴尔干战争中, 114, 115; 在1914—18年大战中, 128, 168—9; 与英国, 152; 在和会上, 169; 占领士麦拿; 被土耳其人逐出, 1922年, 169; 农民占人口的比例, 178; 由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与保加利亚关系紧张, 205, 206; 英法的保证, 242; 意大利进攻, 249—50; 德国人占领, 253; 255; 抵抗, 270—1; 划归英美势力范围, 287; 和约的安排, 293; 反对复辟君主制的内战, 312, 314; 塞浦路斯问题和与土耳其关系, 335

'Green Rising', imag. of, in Balkans 巴尔干半岛上的“绿色起义”形象, 178

Grey, Sir Edward 爱德华·格雷爵士, 英国外交大臣, 124, 125

Griffiths, Col. Norton 诺顿·格里菲斯上校, 破坏普洛耶什蒂油田 (1916年), 133

Grigorov, Mitko 米特科·格里戈洛夫, 保加利亚共产党理论家, 343

Groener, General Wilhelm 威廉·格罗纳将军, 德国后勤专家, 129

Groza, Petru 彼特鲁·格罗查, 罗马尼亚“农民阵线”领导人; 任总理, 297, 300; 任国家元首, 318

guild laws, in Balkans 巴尔干地区的行会法, 79

gypsies, in Hungary 匈牙利的吉卜赛人, 7

Habsburgs 哈布斯堡; “历史省份”归于, 5; 匈牙利的“神圣王冠”归于, 8, 20; 建立“边屯区”对抗土耳其人, 9, 43; 和维也纳会议, 26, 27; 国家性质暧昧不明, 48; 与泛德意志党, 94; 忠于哈布斯堡的克罗地亚人, 99, 100; 旗帜的最后招展, 119

Hacha, Emil 叶美尔·哈恰, 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 (1938年) 的总统, 236, 241

hajduk warriors 哈伊杜克战士 (塞尔维亚), 22, 24

Hajek, T. D. 依里·哈耶克, 捷克斯洛伐克外长, 353, 356

Halder, General 哈尔德将军, 德国总参谋长, 60

Hamburg, Czech territorial rights in 捷克人在汉堡的过境权, 172, 181

Havlicek, Karl② 卡列尔·哈弗利契克, 捷克记者, 64

Haynau, General 海瑙将军 (奥地利), 60

Hegedus, Andras 赫格居什·安德拉什, 匈牙利总理, 324, 329, 330

Hellen, Konrad 格拉德·汉伦, 苏

① 正文印文为 Hajek, Jiri 与索引拼法不同, 仍考——译者

② 索引原文作 Havlicek, Karel 与正文不同, 现从正文, ——予音

台德区德意志党领袖, 221, 230, 231

Henrys, General 昂里斯将军法国派往华沙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152

Herder, Johann 约翰·赫德; 德国哲学家, 49

Herzegovina 黑塞哥维那 13, 83; 奥地利获准占领(名义上仍属土耳其, 1878年), 87; 奥地利兼并(1908年), 104, 110; 在克罗地亚王国管辖内(1941年), 254

Heydrich, Reinhard 莱因哈德·海德里希, 党卫军头目, 252, 被刺, 263

Hindenburg, Field Marshal von 冯·兴登堡, 陆军元帅, 122; 生于波兹南, 156; 任德国总统, 226

Historic Provinces (Historic lands of the Crown of St Wenceslas) 历史省份(圣文采斯拉斯王室历史领土), 5

Hitler, Adolf 阿道夫·希特勒, 91; 掌权, 211—12; 与墨索里尼, 214; 论塞尔夫维亚人的战斗素质, 216; 重占波兰, 219; 与捷克斯洛伐克, 222, 230—1, 240—2; 与匈牙利, 223, 274, 278, 279; 与罗马尼亚, 238, 261; 与奥地利, 220; 外交政策, 228, 230; 与波兰, 242—6; 与南斯拉夫, 252, 253, 273; 与俄国, 256, 258; 将轴心国伙伴召至施洛斯克莱斯海姆(1942年), 274

Hlinka, Mgr 格林卡阁下, 斯洛伐克人民党领袖, 154, 178, 187—8, 211; 之死, 234

Hlinka Guard 格林卡卫队, 235

Hlond, Cardinal, in Poland 赫隆德红衣主教在波兰, 320

Hodza, Milan 米兰·霍德扎, 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领袖, 178, 187; 任总理 221, 222

Hohenwart, Count Karl 卡尔·霍亨瓦特伯爵, 奥地利首相, 78

Hohenzollerns 霍亨索伦家族, 97

'Holy Alliance' "神圣同盟", 26

'Holy Crown' of Hungary 匈牙利的"神圣王冠"; 传给哈布斯堡, 8, 20; 领土归于奥匈协议后的二元君主国, 73, 133, 146; 交予同第三军监管(1945年), 301

Horthy, Admiral Miklos 霍尔蒂·米克洛什海军上将, 向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交出奥匈帝国的舰队, 148; 指挥匈牙利"国民军", 161; 当选为摄政王, 162, 180, 183, 202; 与捷克斯洛伐克, 233, 235; 与南斯拉夫, 253; 与犹太人, 237, 274, 279; 与希特勒多次会见, 260, 274, 278, 279; 企图与俄国达成停火, 285—6

Hossbach Conference (1937), Hitler's speech at 希特勒在霍斯巴赫会议上的演说, (1937年), 230

Hoxha, Enver 恩维尔·霍查,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政府首脑 312, 314, 315, 335, 336, 343

Hultschin, frontier adjustment at 在胡尔茨钦进行的国境线调整(1919年), 159

Hungarian National Council 匈牙利国民会议, 146

Hungarians 匈牙利人, 17; 详见Magyars条

Hungary 匈牙利, 5, 6—8; "神圣王冠", 8, 20, 301; 犹太人, 17, 203, 237, 274, 279; 马扎尔语, 29; 贵族, 48; 社会及政治上的发展, 49—52; "三月法令"(1848年), 53; ①新议会, 57; 镇压革命, 61—3; 成为二元君主国的一个部分(1867), 71—4, 102, 133, 146; 民族法(1868年), 98; 独立党(1918年), 142; 签订的和约(1920年), 150, 160, 163; 革命和反革命, 160—3, 176; "历史上的"七个民族, 173; 农业人口在人口中所占的比例, 175; 共产国际代理人, 176; 与法国, 180; 与波兰, 181; 与意大利, 182;

① 此处原作 1948 年, 第 57 页, 现从本书正文第二章改为 1848 年, 第 53 页。——

与捷克斯洛伐克, 183; 与小协约国, 184; 国内要求修订和约的情绪, 186, 246; 国内政策, 101-3; 小农党, 178, 202, 302; 在农业会议上, 208; 与意大利的秘密军事协定, 69; 右倾, 209, 211, 224-5; 与墨索里尼, 213; 与德国的秘密贸易条约(1934年), 214; 鼓励克罗地亚恐怖主义分子, 217; 与罗马-柏林轴心, 221; 国社党, 223; 与捷克斯洛伐克(1938年), 233, 234; 占领罗塞尼亚(1938年), 241; 许可德军过境, 248; 签署三国公约(1940年), 249; 参加进攻南斯拉夫, 253; 分得半个伏伊伏丁那(1943年), 254, 256; 俄国进行的试探, 255; 参与进攻俄国, 256, 260, 262; 与西方进行接触, 262, 274, 278; 与铁托休战, 278; 德国人占领, 279; 企图与俄国停战, 285-6; 进行的战役, 286; 停战, 287; 与俄国, 290, 292; 与俄国的边界, 292; 和约中的解决办法, 293, 294; 俄国驻军, 295; 联合政府, 296, 301-2; 共产党政府, 302-5; 保安警察(AVO, “阿弗欧”), 303, 316, 323, 342; 清洗共产党人, 316; 工业的发展, 319; 管理不善与粮食短缺, 322-3; 革命(1956年)被俄国镇压, 329-30; 卡达尔政权, 340-2

Huns 匈奴, 6

Husak, Gustav 古斯塔夫·胡萨克, 斯洛伐克领袖, 349; 捷克斯洛伐克副总理, 353

Huss, John 约翰·胡斯, 5

hydro-electric power 水力发电, 10, 14

Ibrahim Pasha 易卜拉辛帕夏, 对希腊作战的埃及军队司令官, 37

Ignatiev, Général 伊格纳切夫将军, 俄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 80, 82, 84, 86

Ilidze 伊利扎, 波斯尼亚矿泉疗养地, 110

Illyrian Provinces 法兰西帝国的伊利里亚行省, 30

Illyrianism 伊利里亚主义, 50

Isrády, Bela 伊姆雷第·贝洛, 匈牙利首相, 224, 237

IMRO (Internal Macedonia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 105, 106, 115; 反对拥护共和的保加利亚人(1918年), 144; 保加利亚与南斯拉夫达成协议(1923年), 180; 受到墨索里尼的鼓励, 182, 213; 恐怖活动, 204-5, 206; 分裂为两个集团, 205; 与乌斯塔沙的和解, 203; 被属于“兹维诺”的保加利亚人解散, 216; 南斯拉夫的亚历山大被刺死, 216-17

industry 工业; 发展(在波兰), 41, 45, 69, 92; (在捷克领土内), 48, 78-9, (在奥匈帝国), 71-2, (在巴尔干), 79, 106, (在匈牙利), 97, 341, (在罗马尼亚), 199, 344-5, (在南斯拉夫), 314, 333, (在俄国统治下的多瑙河国家), 319, (在保加利亚), 342, (在捷克斯洛伐克), 347-8; 国有化, (在波兰), 306, (在捷克斯洛伐克), 347-8; 工人管理, 在南斯拉夫, 333

Innsbruck 因斯布鲁克, 奥地利宫廷在此避难(1848年), 16, 57

Ionescu, Take 塔基·约内斯库, 罗马尼亚政治家, 153

Iorga, Nicholas 尼古拉·约尔加, 罗马尼亚首相, 210

‘Iron Gates’ on the Danube 多瑙河上的“铁门”, 9-10, 97, 129

Iron Guard, Roumania 铁卫军, 罗马尼亚, 210, 220, 223, 225-6; 领袖被囚, 238; 支持的政府, 248; 被镇压, 249;

‘Iron Ring’ “铁环”, 奥地利的联合政府, 95, 96

Ismail 伊兹梅尔, 比萨拉比亚的港口, 171

Israel, state of 以色列国, 351

Istria 伊斯特拉; 归奥地利, 27, 74; 在秘密条约中应许给意大利(1915年), 125, 148; 作为折衷办法建议瓜分, 166-7; 斯洛文尼亚人, 171, 220; 大部分归

于南斯拉夫, 293
 Italians 意大利人, 17; 民族主义的传播,
 Italy 意大利; 与土耳其交战(1911年), 113; 与英法俄三国的秘密条约(1915年), 125—6, 155, 166; 在1914—18年大战期间, 127, 141—2; 反对关于成立南斯拉夫联邦的想法, 131; 与奥匈帝国海军, 148; 在和会上, 151; 与南斯拉夫的争端, 166—7; 在中欧, 182; 支持对1919—20年解决办法不满的各国, 183, 208; 鼓励克罗地亚分离主义者, 209, 240; 与南斯拉夫订立条约(1937年), 220, 与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订立条约, 221; 占领阿尔巴尼亚(1939年), 242; 签订反共产国际公约(1937年), 242, 钢铁公约(1938年), 242, 以及三国公约(1940年), 249; 控制下的克罗地亚傀儡王国, 254, 279; 对俄国宣战, 256; 同盟国攻入, 268; 崩溃, 272, 274; 共产党人, 294
 Izvol'ski, A.P. A.P.伊兹沃尔斯基, 俄国外交大臣及驻巴黎大使, 111—12
 Jagiellon dynasty, Poland 波兰的亚盖隆王朝, 4, 19
 Jajce 亚伊采,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召开(1943年), 273, 276, 311
 Janina 亚尼纳, 114, 115
 Janissaries 土耳其近卫军, 31—2
 Japan 日本; 签订反共公约(1936年), 242; 签订三国公约(1940年), 249
 Jassy 雅西; 条约(1792年) 20; 发生的游行示威(1848年), 60
 Jehlička, Dr F. 贾赫利奇卡博士, 斯洛伐克自治主义者, 154
 Jellacic, Baron Josip 约瑟夫·耶拉契希男爵, 克罗地亚的巴昂(总督) 54, 57; 参加镇压匈牙利之战, 61—2, 75
 Jews 犹太人; 在波兰, 4, 59, 196, 267; 在特兰西瓦尼亚, 12; 在巴尔干, 17; 在匈牙利, 17, 203, 237, 279; 在捷克领土上, 48; 与泛德意志党, 74; 在罗马尼亚,

107, 136, 199, 200
 John Sobieski 约翰·索别斯基, 波兰国王, 21
 Jordan, Wilhelm 威廉·乔丹; 在法兰克福议会中, 60
 Joseph I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约瑟夫一世, 29
 Jovanović, General Arso 阿尔索·约瓦诺维奇将军, 从南斯拉夫出走时被打死(1943年), 314
 Jovanović, Dragoljub 德拉戈留布·约瓦诺维奇, 南斯拉夫人民农民党领袖, 311
 Jugov, Anton 安东·约哥夫, 保加利亚副总理, 317
 Jungmann, Joseph, Czech Dictionary of 约瑟夫·容格曼编的《捷克语大词典》(1835—9年), 49
 Junker landowners, eastward colonization by 容克地主向东殖民, 92
 Kadar, Janos 卡达尔·亚诺什; 任匈牙利内务部长, 316; 任匈牙利共产党书记, 329, 330; 任政府首脑, 331, 340—2
 Kalemegdan 卡拉梅格达姆, 贝尔格莱德一座要塞, 34, 84
 Kalinin 加里宁, 1941年被德军攻陷, 259
 Kallai, Gyula 卡拉伊·久洛, 匈牙利总理, 342
 Kallay, Benjamin 卡洛伊·本杰明,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匈牙利统治者, 110
 Kallay, Miklos 卡洛伊·米克洛什, 匈牙利首相, 262; 与希特勒, 274, 278, 279
 Kaltenbrunner 卡尔登布鲁纳, 驻匈牙利的党卫军将军, 279
 Kánya, Kálmán 坎尼亚·卡尔曼, 匈牙利外交大臣, 223, 233, 235
 Karadjordje (Djordje Petrović) 卡拉乔治(乔治·彼得罗维奇), 塞尔维亚领袖, 32—3, 34, 36

Keradjordjević dynasty 卡拉乔治维奇王朝, 136, 270
 Karadzić, Vuk 武克·卡拉季奇, 塞尔维亚学者, 31
 Karavelov, Lyuben 柳宾·卡腊维洛夫, 保加利亚领袖, 82
 Karawanken mountains 卡拉万克山脉, 9, 167, 288
 Kardelj, Edvard 爱德华·卡德尔, 南斯拉夫共产党理论家, 313, 333—4
 Karlovy Vary (Karlsbad) 卡罗维发利(卡尔斯巴德), 苏台德德意志党召开年会(1938年), 231, 234; 举行共产党国际会议(1967年), 351
 Károlyi, Count Mihály 卡罗利·米哈伊伯爵, 匈牙利政治家, 142, 146; 任总统, 160—1, 163
 Karolyi family, estates of 卡罗利家族的庄园, 48
 Katowice 卡托维兹, 波兰地方, 重新命名为斯大林格罗德, 321
 Katyn 卡廷 波兰“军官的万人冢”所在地, 267—8
 Kavalla 卡瓦拉, 色雷斯的港口, 15, 16
 Kazan defiles of Danube 多瑙河上的卡赞峡谷, 9, 10
 Keitel, Field-Marshal Wilhelm 威廉·凯特尔陆军元帅, 在布加勒斯特参加庆祝胜利的阅兵仪式, 201
 Kemal, Mustapha 穆斯塔法·基马尔, 土耳其民族革命领袖, 169
 Kerensky, Alexander 亚历山大·克伦斯基, 俄国自由主义者, 总理, 135
 Kherson 赫尔松, 俄国黑海的港口, 20
 Khrushchev, N. N. 赫鲁晓夫; 任俄国共产党书记, 324, 325; 谴责斯大林, 326; 在波兰, 328; 主张和平共处以及社会主义的表现形式可因民族而异, 328, 332; 与铁托互访, 335, 336; 与日夫科夫, 343; 与罗马尼亚, 344, 345; 与捷克斯洛伐克, 350
 Khuen Hedervary, Count Karl 卡尔·库恩-海代尔茨里伯爵, 克罗地亚

的匈牙利统治者, 99, 100
 Kiev 基辅; 被波兰人攻占(1920年), 170; 被德国人攻占(1941年), 258, 259; 被俄国人收复(1943年), 273
 Kiosseivanov, Georgi 格奥尔基·基奥谢瓦诺夫, 保加利亚首相, 225, 238, 247
 Kirk Kilisse 克尔克·基利斯; 保加利亚主教土耳其人(1912年), 114
 Kharkov 哈尔科夫 德军受阻; 俄国人解放(1943年), 272
 Klagenfurt 克拉根福; 南斯拉夫要求获得, 165, 288; 留归奥地利, 167; 英军和保军相遇, 293
 Kleist, General von 冯·克萊斯特将军, 6—7
 Klessheim 克萊斯海姆, 希特勒将轴心国伙伴召喚至此(1943年), 274
 Kolarov, Vassil 瓦西尔·科拉罗夫, 保加利亚总理, 317
 Kellár, Jan 杨·科拉尔, 南斯拉夫主义诗人, 29
 Kolozsvár 科洛兹瓦尔, 见Cluj 多
 Komorowski, General Count Tadeusz (“Bor”) 塔代乌士·科莫罗夫斯基伯爵将军(博尔)波兰国家军司令, 282, 283
 Koniev Marshal, of Red Army 科涅夫 红军元帅, 269, 289
 Kopečvansk Fr O., Polish grammar of 天主教神父克普辛斯基编写的波兰语法, 28
 Komitar, Jernej 杰尔内伊·科皮塔 斯洛文尼亚学者, 30
 Korfanty A. A. 科范蒂, 波兰的西里西亚自治主义者, 209
 Korom, Mihály 科罗姆·米哈伊, 匈牙利司法部长, 311
 Korosec, Fr. Antan 安顿·科罗舍茨, 天主教神父, 维也纳议会的南斯拉夫人领袖, 124; 南斯拉夫国民议会主席, 147; 副首相, 148; 领导斯洛文尼亚人民党, 178, 191; 任首相, 189, 191; 被

四, 210; 在 1938 年选举中, 239
 Kosciuszko, Tadeusz 塔德乌什·科希秋什科, 21, 24; 纪念, 68, 69, 145
 Kosciuszko Division, of Poles in Red Army 红军中的波兰人组织的科希秋什科师, 267, 268, 287
 Košice (Kassa) 科希策(卡萨); 成立的昙花一现的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1919年), 161; 归于匈牙利(1939年), 235; 被轰炸(1941年), 256; 联合政府(1945年), 269
 Kosovo 科索沃; 战役(1389年), 19, 104; 意大利获得周围地区(1941年), 254
 Kosovo-Metohija (Kosmet) region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的科索沃—梅托希亚(科斯梅特)地区, 334
 Kossuth, Lajos 科苏特·拉约斯, 匈牙利的演说家和记者, 50—1, 52, 91; 成为匈牙利的统治者, 57, 61, 62; 流亡国外, 63, 64; 与克罗地亚人, 76; 纪念, 330
 Kostov, Traicho 特拉伊乔·科斯托夫, 保加利亚副总理, 317
 Kosygin, A.N. A.N.柯西金, 接替赫鲁晓夫(1964年), 332
 Kotor 科托尔, 海军基地, 27, 123, 138
 Kovács, Béla 科瓦奇·贝洛, 匈牙利小农党党员, 304; 参加纳吉政府, 330
 Kramár, Karel 卡列尔·克拉玛什, “青年捷克党”的领袖, 96, 123, 124, 135, 145; 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总理, 145
 Krasinski, Count Valerian 瓦勒里安·克拉辛斯基伯爵, 波兰诗人, 14
 Kresimir, Peter 佩塔尔·克雷希米尔, 克罗地亚英雄, 19,
 Kulturkampf 文化斗争, 92
 Kun, Béla 库恩·贝拉, 匈牙利共产党人, 139; 任短命政府的首脑, 161
 Kundt, Erich 埃里克·孔德, 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德意志人的代言人, 276
 Kutchu'-Kamardji, Treaty of 库楚克—开纳吉条约(1741年), 20

Kvaternik, General Slavko 斯拉夫科·科瓦泰尔尼克将军, 克罗地亚国防大臣, 264
 Lakatos, General 拉卡托什将军, 匈牙利首相, 285
 Lammach, Heinrich 海因里希·拉马施, 奥匈帝国最后一位首相, 145
 land reform 土地改革, 175; 在波兰, 194; 在罗马尼亚, 197, 198, 299; 在匈牙利, 202, 302; 在保加利亚, 298; 在捷克斯洛伐克, 307
 Langiewicz, General Marjan 马里安·兰盖维茨将军, 波兰领袖, 68, 69
 languages and consciousness of nationality 语言与民族觉悟, 28—31
 Latin America, Polish refugees in 波兰难民在拉丁美洲, 44
 Latvia 拉脱维亚; 参加苏署李维诺夫议定书(1920年), 185; 并入苏联, 247
 Lausanne, Treaty of 洛桑条约(1923年), 169
 Laval, Pierre 彼埃尔·赖伐尔, 法国外交部长, 217, 218
 Lazar 拉扎尔·塞尔维耶公爵, 19
 League of Nations 国际联盟, 163; 但泽成为国际联盟管理下的自由市, 156; 接纳阿尔巴尼亚加入, 168; 波兰获得维尔纳(1923年), 171; 将条约附加于各项和约, 172; 小协约国在国联理事会上的席位, 183; 与罗马尼亚, 211; 与匈牙利, 211, 217; 德国退出(1933年), 218; 苏联加入(1934年), 218; 苏联被开除(1939年), 246
 Ležaky 列日阿基, 捷克村庄, 263
 Leeb, General von 冯·勒布将军, 侵苏德军司令, 258
 Lelewel, Joachim 约阿希姆·列维维, 波兰历史学家, 五人委员会成员(1860年) 43, 44
 Lenart, Jozef 约瑟夫·列纳尔特, 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342, 353
 Lenin 列宁, 137, 138, 321

Leningrad 列宁格勒, 258, 259
 Leopold I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利奥波德二世, 29
 Liapchev, Andrij 安志列·利亚普切夫, 保加利亚首相, 204
 Liberated Europe, Declaration on
 (1945) 关于获得了解放的欧洲的宣言(1945年), 238
 Lidice 利迪策, 捷克村庄, 263
 Linde, Samuel Bogomil, Polish Dictionary of 萨穆尔·博古米尔·林德编纂的波兰语词典, 28
 Linz Programme, for Pan-Germanism
 推行泛德意志主义的林茨纲领, 94
 List, Field-Marshal Wilhelm 陆军元帅威廉·里斯特, 6
 Lithuania 立陶宛; 波兰要求获得, 43, 67; 俄国压迫, 69; 沦于德国人手中(1915年), 127; 宣布独立(1918年), 138; 将维尔纳与波兰, 170, 171; 参加签署李维诺夫议定书(1920年), 185; 参加农业会议, 0; 德苏条约中规定属于德国, 244; 苏联人开始建立基地, 246; 并入苏联版图(1940年), 247
 Lithuanians, in Poland 波兰境内的立陶宛人, 4, 92
 Little Entente 小协约国; 捷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组成, 180; 与法国, 181, 219—20; 与各邻邦举行会议, 208; 重建(1933年), 212; 与墨索里尼, 215, 217; 捷克企图使小协约国重新发挥作用(1938年), 233; 罗马尼亚的响应, 261
 Litvinov, Maxim 马克西姆·李维诺夫, 苏联外交人民委员, 185, 218, 244
 Litvinov Protocol (1920) 李维诺夫议定书(1920年), 185, 21
 Ljotić, Dimitrije 季米特里耶·廖蒂奇, 塞尔维亚纳粹集团首领, 223, 225
 Ljubljana (Laibach) 卢布尔雅那(莱巴克), 斯洛文尼亚首府, 147, 264
 Lloyd George, D. D. 劳合-乔治, 英国首相, 139—140
 Locarno Pact (1925) 洛迦诺公约(1925

年), 184, 185, 219
 Lodz, Poland 罗兹, 波兰, 93, 123
 Loeb, Eugen 埃乌根·洛埃布尔, 斯洛伐克作家, 350, 351, 352
 Lombardy 伦巴第; 奥地利兼并, 27; 起义(1848年), 52—53
 London 伦敦; 关于希腊独立的条约(1832年), 38, 40; 大使会议(1912—13年), 114, 115; 秘密条约(1915年), 120—6, 151, 156; (由布尔什维克公布), 139
 Lovcen 洛夫钦, 黑塞哥维那的黑山, 13
 Lublin 卢布林; 波兰政府临时设于(1944年), 277, 288; 发生学生骚乱(1968年), 337
 Luca, Vasile 瓦西尔·卢卡, 罗马尼亚财政部长、副总理, 318
 Ludendorff, General 鲁登道夫将军; 出生于波兹南, 156
 Luger, Karl 卡尔·吕格, 维也纳地方官, 96
 Lule-Burgas 卢累 布尔加兹; 保加利亚人击溃土耳其人(1912年), 114
 Lupescu, Magda 马格达·卢佩斯库, 罗马尼亚卡罗尔二世的情妇, 201
 Lutherans 路德会教徒; 在特兰西瓦尼亚, 12; 在布拉迪斯拉发, 29; 普鲁士的和波兰的天主教徒, 46; 在捷克斯洛伐克, 187; 和共产党人, 320
 Luxemburg, Rosa 罗莎·卢森堡, 波兰共产党人, 93
 Lvov, Prince 利沃夫大公, 俄国首相, 135, 152
 Lvov (Lemberg) 利沃夫(伦贝格), 58, 77; 在1914—18年战争中, 122, 127; 波兰人坚持抵抗(1939年), 245; 波兰人要求获得, 277
 Macedonia 马其顿, 14, 80; 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竞相要求获得, 16, 105; 暂时划归保加利亚(1878年), 86; 仍留归土耳其, 87; “问题”, 101—105;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建立(1893年), 105, 206,

- (参见IMRO条);在巴尔干战争中,113—14,115;在1914—18年战争中,142,143;塞尔维亚获得的领土获准属于南斯拉夫,167;保加利亚少数民族,171;属于南斯拉夫境内的一部分土地被保加利亚占领(1941年),254,275;发生反德起义(1941年)272;南保发生摩擦,284;南保达成妥协,312;与阿尔巴尼亚,336
- Macedonian People's Republic 马其顿人民共和国,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的一个组成部分,312
- Macedonians 马其顿人,17;在南斯拉夫,189
- Maček, Vladko 符拉德科·马切克;克罗地亚农民党领袖,192;与意大利、匈牙利谈判,209;被监禁(1931年),210;与塞尔维亚人谈判(1939年),239;任副首相,240,250,251
- Mackensen, Field-Marshal von 陆军元帅冯·马肯森,122,127,128,129,132,143
- Magyarization, of minorities in Hungary 匈牙利少数民族的马扎尔化,49—50,98—9
- Magyars 马扎尔人,5,6,7;语言,7,29,49,101;在特兰西瓦尼亚,11—12,17,163,183,199,248,318;在捷克斯洛伐克,159,187;在罗马尼亚,164,346—47;在南斯拉夫,165,190,335;在匈牙利国境以外,171
- Maisky, Ivan 伊凡·迈斯基,苏联驻伦敦大使,266
- Malenkov, G. G. 马林科夫,苏联总理,322,323,324
- Maleter, General Pál (Hungarian) (匈牙利的)马莱特尔·帕尔将军,331
- Malinov, Alexander 亚历山大·马林诺夫,保加利亚首相,142,206
- Malinovsky, Marshal, of Red Army 苏联红军马利诺夫斯基元帅,286
- Manu, Iuliu 尤利乌·曼纽;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罗马尼亚人领袖,146—47;国家农民党领袖,178,209;与入侵苏联的战争,261;希特勒的评论,274;与西方接触,277,280;任副首相,283;在1946年选举中,300;被监禁,300
- Maradures region, carpathians, to Roumanian 喀尔巴阡山马拉穆列什地区划归罗马尼亚(1920年),163
- Mao Tse-Tung 毛泽东,342
- Marburg (Maribor) 马尔堡(马里博尔),165,167,210
- Marcinkowski, M. M. 马辛科伍斯基,波兰《市场》杂志创始人,46
- Maria Theresa, of Holy Roman Empire 神圣罗马帝国的马丽亚·特丽萨,29
- Marienwerder (East Prussian frontier) 马伦沃德(东普鲁士边界);地区的公民投票(1920年),156
- Maritsa river 马里查河,15
- Marković, Svetozar 斯韦扎尔·马尔科维奇,塞尔维亚共产党人,108
- Marshall, George C. 乔治·C.马歇尔,美国国务卿,308
- Marshall Plan 马歇尔计划,308,311
- Marx, Karl 卡尔·马克思,44,108;论比萨拉比亚,347
- Masaryk, Jan 扬·马萨利克,捷克斯洛伐克外交部长,307,308;逝世,310
- Masaryk, Tomáš 托马什·马萨利克,布拉格哲学教授,95,96;捷克“现实主义”领袖,97;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联系(1908年),101;在1914—18年战争中,124,130;斯拉夫人民的代言人,131,140;俄国支持,(1917年)135;在美国,140—41,145;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统,145,186,187,188;辞职,221;与罗塞尼亚,231;缅怀,353
- Mašin, Draga 德拉加·马辛,塞尔维亚亚历山大的妻子,109
- Masuria 马祖里亚,2,122
- Matyas Hunyadi 洪雅迪·马提亚,匈牙利国王,19
- Maurer, Ion Gheorghe 扬·格奥尔基·毛雷尔,罗马尼亚总理,346

Memel 梅梅尔：德国人攻占立陶宛的（1939年），244
Mestrovic, Ivan 伊凡·梅日特罗维奇，克罗地亚雕刻家，南斯拉夫理想的倡者，101, 251
Metallurgy, in Balkans 巴尔干各国的冶金术，14, 344
Metternich, Prince 梅特涅亲王 奥地利外交大臣，23, 24, 25, 26, 32；敌视希腊起义，37；论哈布斯堡国家，48；被解职（1846年），51；在伦敦，41, 52
Michael the Brave of Roumania 罗马尼亚的勇敢的米哈伊尔，19
Michael, King of Roumania 罗马尼亚的国王米哈伊尔，200, 248, 260；对德宣战，283；被苏联人授予勋章，298；被迫退位，301
Mickiewicz, Adam 亚当·密茨凯维奇，波兰诗人，44—45, 120
Middle class, growth of 中产阶级的发展；在塞尔维亚，30；在波兰，51；在捷克，48, 64；在匈牙利，20
Mieroslawski, Ludwik 路德维克·梅洛斯拉夫斯基，波兰领袖，46, 59, 68
Mieszko 梅什科，波兰勇士国王，4
Mihailov, Ivan 伊凡·米哈伊洛夫，“中央集权派”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领袖，205, 217
Mihailovic, Col Draža 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上校；南斯拉夫切特尼克抵抗运动领袖，271—72；被处决，311—12
Mihailescu, Ion 扬·米哈拉凯，罗马尼亚国家农民党领袖，178, 197, 200, 300
Mikov, General 米霍夫将军，保加利亚摄政王；被处决，208
Miklos, General Bela 米克洛什·贝洛将军，匈牙利临时政府总理，286, 301
Mikolajczyk, Stanislaw 斯坦尼斯瓦夫·米科拉伊奇克，波兰总理；流亡国外，268, 277, 282；在新政府中任职，288, 305；被解职，305；参加1947年选举，306
Mikoyan 米高扬，苏联外贸人民委员，

后任副总理，326, 328, 329, 330
Milan 米兰；从奥地利统治下获得解放（184年），52；初期法西斯小组（1919年），166
Milan Obrenovic 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塞尔维亚大公，80, 83, 84；称王89, 103；退位，109；作为皇帝重新执政，109
Military Front of Habsburgs against Turks 哈布斯堡王朝防御土耳其人的地区，9, 73
Milovanovic, Milovan 米洛万·米洛万诺维奇，塞尔维亚首相，113
Mindszenty, Cardinal 明曾蒂红衣主教，匈牙利总主教，304；被监禁（1948年），320；在1956年革命中获释，330；在美驻匈公使馆避难，331, 341
mining in Balkans 巴尔干各国的采矿业，14
minorities, national, after 1919 peace settlement 1919年凡尔赛和约签订后的各少数民族，171，分别参见各民族条
Mirkovic, General Bora 博拉·米尔科维奇将军；发令贝尔格莱德政变（1941年）252, 253
Miskolcz 米什科尔茨，原为匈牙利领土；被捷克人占领，后又驱逐出（1919年），161
Moczar, General Mieczyslaw 米耶茨卡斯拉夫·莫茨扎尔将军，波兰新斯大林主义和反犹太派别领袖，338, 339
Mohacs 莫哈奇；土耳其人击败马扎尔人（1526年），8, 10；第二次战争，20
Moldavia 摩尔达维亚；反犹太主义，107, 200；参看多瑙河两公国条
Molotov, Vyacheslav 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苏联外交人民委员，244, 247, 255, 278, 285；参加外交部长会议，291—92, 293；与和约，294—95；与南斯拉夫，313
Moltke Field Marshal von 陆军元帅冯·毛奇；与奥地利，73
Montenegro 门的内哥罗，13, 15, 20；东正教，17, 125；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

- 访问, 83; 在俄土战争中, 85; 承认独立, 86, 87; 在巴尔干战争中, 114, 115, 116; 在1914—18年战争中, 129; 在“十四点原则”中, 139; 并入南斯拉夫(1919年), 154—55; 被意大利兼并(1941年), 254; 抵抗运动, 272
- Moraczewski, A. A. 莫拉柴夫斯基, 波兰总理, 175
- Morava river, valley of 摩拉瓦河谷, 15, 285
- Moravia 摩拉维亚, 参见 Bohemia-Moravia 条
- Morocco, crisis over 摩洛哥危机, 111
- Moscicki, Ignatius 伊格纳蒂乌斯·莫希齐茨基, 波兰总统, 224; 辞职, 265
- Moscow 莫斯科, 258, 259
- Moscow Slavonic Benevolent Committee 莫斯科斯拉夫慈善委员会(1858年), 81
- Moslems 穆斯林; 被逐出希腊(1922年), 169; 在南斯拉夫, 189, 239; 在克罗地亚, 264; 参见 shqiptars 条
- Mostar 莫斯塔爾, 黑塞哥维那首府, 15
- Munich 慕尼黑; 希特勒、张伯伦、达拉第和墨索里尼开会(1938年), 234, 236
- Muraviev, N. N. 穆拉维耶夫, 保加利亚首相, 284
- Murzsteg 穆尔茨施特格; 奥匈帝国与俄国讨论马其顿问题(1903年), 106
- Mussolini, Benito 贝尼托·墨索里尼; 任报纸编辑, 140; 掌权, 167, 182; 与罗马尼亚的卡罗尔国王, 210—11; 贡伯什访问, 211; 与多瑙河流域国家接触, 212—13; 与希特勒的关系, 214; 和小协约国, 213, 217; 参加慕尼黑会议(1938年), 234; 建议就波兰问题进行调解, 245; 与南斯拉夫, 249; 垮台(1943年), 272
- Muzuranić, Ivan 伊凡·马米兰尼奇, 捷克学者、诗人; 被任命为克罗地亚巴昂, 99
- Nagoda 纳果达, 匈牙利与克罗地亚—斯拉沃尼亚人之间的解决办法(1868年), 75, 76, 99, 164
- Nagy, Ferenc 纳吉·费伦茨, 匈牙利总理, 303, 304, 320
- Nagy, Imre 纳吉·伊姆雷; 任匈牙利农业部长, 302; 任内务部长, 303; 任总理(1953年), 323; 被共产党开除党籍, 324; 再次任总理, 310; 被处决, 331, 342
- Nagyvarad (Oradea) 纳吉瓦拉德(奥拉迪亚); 被罗马尼亚割让给匈牙利(1940年), 248
- Nano, Florian 弗洛里安·内诺, 安东尼斯库元帅的密友, 27*
-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 在维也纳, 21—22; 卡拉-乔治的呼吁, 3^o; 在俄国, 258, 259
- Napoleon III 拿破仑三世, 66; 捷克人的呼吁, 78
- Narodna Odbrana (National Defence) “国防”, 泛塞尔维亚组织, 112
- Narutowicz, Prcef 纳鲁托维茨教授, 任期仅两日的波兰总统(1922年), 195
- nationalism 民族主义; 的发展 28—31; 为治国之必需, 40; 全盛期, 91—102
-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335, 354
- Naumann, Pastor Friedrich 弗里德里希·瑙曼牧师; 著作《中欧》, 1^o0
- Navarino, naval battle of 纳瓦里诺海战(1827年), 37
- Navy League, German 德国海军同盟, 95
- Nazi-Soviet Pact (1939) 德苏条约(1939年), 244, 255
- Nazis 纳粹分子; 在捷克斯洛伐克, 208; 在但泽, 212; 在奥地利, 214; 与苏台德德意志人, 222
- Nedić, General Milan 米兰·奈迪奇将军; 任南斯拉夫陆军大臣, 250; 在德国人统治时期任政府名义上的首脑, 254, 264—65, 271
- Neisse river 尼斯河; 波兰国界线, 258
- Nelidov, A. A. 涅利多夫, 俄国驻马士坦丁堡大使, 86
- Nemanjid dynasty, Serbia 塞尔维亚

的尼科雅王朝, 19
 Nenadović, Matija 拿多·多维奇, 马蒂亚; 率领塞尔维亚代表前往巴黎求和, 33, 34
 Nesselrode, Count von 冯·涅谢尔罗迭伯爵, 俄国外交大臣, 26, 36
 Neuilly 纳伊, 与保加利亚签订和约(1919年), 150, 164, 167, 180, 181; 力求修改条约 170, 186, 238, 246
 New Europe “新欧洲”: 杂志, 131; 有关的集团, 136, 140, 147
 Nicholas I of Russia 俄国的尼古拉一世, 38; 与波兰, 42, 61, 67
 Nicholas II of Russia 俄国的尼古拉二世, 与波兰, 93; 承认保加利亚的斐迪南国王, 104; 同意弗兰西斯·约瑟夫皇帝的马其顿政策, 106
 Nicholas Nicolaievich, Grand Duke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 俄国部队统帅, 123
 Nikita 尼基塔, 门的内哥罗大公, 后称王, 83, 84, 88, 154
 Niš 尼什, 15; 保加利亚人攻占 89; 共产党人 176
 nobility 贵族; 在加利西亚的波兰, 46—47; 在奥地利帝国境内的波兰, 48; 在匈牙利, 49, 50
 Nosek, A. A. 诺塞克, 捷克内务部长, 309
 Novi Sad 诺维萨德, 伏伊伏丁那自治区首府, 335
 Novipazar, Sanjak of 新帕扎尔州, 87, 103; 奥地利人撤离, 111; 分属塞尔维亚和门的内哥罗, 116
 Novomesky, Lac 拉兹·诺沃麦斯基, 斯洛伐克领袖, 41
 Novosiltsov, Nicholas 尼古拉·诺沃西尔佐夫, 俄国派往波兰的专员, 42
 Novotny, Antonin 安托宁·诺沃提尼,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 322, 329; 任总统, 347, 348—49, 350, 351; 辞职, 352; 抗议苏联的入侵, 356
 Nowa Huta 新胡塔, 波兰新工业区,

Obradović Dositej 多西特·奥勃拉多维奇, 塞尔维亚学者, 31, 33
 Obrenović, Prince Michael 米哈伊尔·奥布雷诺维奇大公, 80, 84
 Obrenović, Prince Milan 米兰·奥布雷诺维奇大公, 参见 Milan
 Obrenović, Milos 米洛什·奥布雷诺维奇, 塞尔维亚领袖, 34, 36, 38
 Ochab, Edward 爱德华·奥哈布, 波兰共产党书记, 326—27; 任农业部长, 328; 任总统, 339
 Ochrid, Bu'lgarian bishopric 保加利亚奥赫里德主教区, 105
 Oder river 奥得河, 2, 6; 波兰边界 288
 Odessa 奥德萨, 苏联黑海港市, 20; 希腊秘密会社, 30; 被罗马尼亚—德国军队攻占(1941年), 260; 更名为安东尼斯库, 261; 苏联人解放, 280;
 Olmutz (Olomouc) 奥尔穆茨(奥洛莫乌茨), 6, 62
 Olympus, Mount 奥林匹斯山, 13
 Omladina 奥姆拉丁纳, 塞尔维亚秘密青年运动, 81
 'Operation Barbarossa' “巴巴罗萨行动”, 德国入侵苏联, 255, 258, 259; 因贝尔格莱德事变而延期, 256
 'Oppressed Peoples, Congress of' “被压迫民族代表大会”(罗马, 1918年), 140
 Orava, county of 奥拉瓦县; 分属波兰和斯洛伐克(1920年), 158
 Orel 奥廖尔; 被德军攻陷, (1941年) 259
 Organic Statute (of Tsar in Poland, 1832年) (1832年沙皇在波兰颁布的) 宪法, 45
 Orthodox Church 东正教, 在特兰西瓦尼亚, 12, 75; 在巴尔干各国, 17; 在奥斯曼帝国, 与俄国人, 9, 125; 与语言, 28; 塞尔维亚的宗主教区, 31, 100, 125; 与希腊的民族主义, 10; 保加利亚的督大主教区, 82, 105; 在南斯拉夫, 189, 250;

在乌斯塔沙分子统治下的克罗地亚, 264; 与共产党人, 38, 319—20

Ostmarkverein 东马尔克联盟; 在普属波兰, 94

Otto of Bavaria 巴伐利亚的鄂图; 成为希腊国王(1832年), 38

Otto, Archduke 鄂图大公; 对奥地利王位提出要求, 220, 222, 278, 285; 与红衣主教明曾蒂, 320

Paderewski, Ignace 伊格纳策·帕戴赖夫斯基, 钢琴家, 波兰民族委员会驻美代表; 136, 出席巴黎和会, 153

Padua 帕多瓦; 停战协定(1918年), 148

Paisij 帕伊西, 保加利亚僧侣学者, 29

Pajtas, Col. 帕伊塔什上校, “圣斯蒂芬的神圣王冠”卫队长, 301

Palacký, František 弗朗蒂舍克·帕拉茨基, 捷克历史学家、政治家, 29, 49, 64; 与德意志国民议会, 54, 59; 与斯拉夫大会, 58, 77

Palmerston, Viscount 帕默斯顿子爵, 英国外交大臣, 38, 66

Pan Aegean commonwealth, vision of 泛爱琴海联邦的设想, 16, 35

Pan-Germanism 泛德意志主义, 91, 94—5, 130, 159

Pan-Slav Congresses 泛斯拉夫大会, 58, 77, 81

Pan-Slavism 泛斯拉夫主义, 80, 81, 82, 89, 275

Pannonia 潘诺尼亚, 6

Paris 巴黎, 44, 51, 52, 57; 召开和会(1856年), 66, 82, (1919—20年)150—5 (1946年)292

Parnassus, Mount 帕纳萨斯山, 13

Partisans (resistant movement) 游击队(抵抗运动); 在巴尔干各国, 271, 272, 273; 与铁托, 276, 288; 和红军取得联系, 285

Pašić, Nikola 尼古拉·帕西奇, 塞尔维亚激进党领袖, 109—10, 任首相, 113, 117; 与黑手党, 116; 与萨拉热窝暗

杀案, 117—118; 与南斯拉夫理想, 125; 害怕伦敦条约, 126; 肃清军队中黑手党的影响, 136; 与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订立科孚协定 136—7, 147; 辞职(1918年), 148; 参加和会, 153; 是南斯拉夫的重要人物, 191, 192

Paškievič, Marshal 帕斯凯维奇元帅, 镇压波兰起义的俄军指挥官(1830年), 43, 44, 45; 任命波兰总督, 60, 67; 戈登投降, 63; 与多瑙河两公国, 65

Pasvan-Oglu 巴斯温—沃格洛, 维丁的帕夏, 38, 40

Patrascu, Lucretiu 卢克雷蒂乌·帕特勒什坎努,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 任副首相, 283; 被处决, 318; 死后恢复名誉, 346

Patrescu, C. C. 帕特雷斯库,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者; 任副首相, 283

Patton, General 巴顿将军, 美国第三军司令, 289

Pauker, Anna 安娜·波克, 罗马尼亚共产党人, 299; 任外交部长, 301; 与副总理, 318

Paul 保罗亲王, 南斯拉夫的摄政王, 217, 224, 239, 240; 与西方列强, 250, 251, 252

Pavelić, Ante 安特·帕韦利奇, 克罗地亚的乌斯塔沙创建人, 193, 217, 240; 在德国人控制下, 253, 263, 264, 280

Peasant International 农民国际, 191

Peasants, Polish 波兰农民, 46—7, 69; 政党, 178—9; 与集体化, 319, 321

Pécs 佩奇; 被塞尔维亚占领(1918年), 165

Personality, cult of 个人崇拜, 321, 326, 328, 329

Peter, Gabor 彼得·高博尔, 匈牙利保安警察组织人, 303

Peter Karadjordjevic 彼得·卡拉乔治维奇, 塞尔维亚国王, 109—10, 117

Peter I of Yugoslavia 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 217; 流亡国外, 254, 270, 273, 281

Petkov, Nikola 尼古拉·佩特科夫, 保加利亚政治家, 284; 被处决, 300

Petőfi, Sándor 裴多菲·山多尔, 匈牙利爱国诗人, 49, 52, 63; 缅怀, 330

Petőfi Circle 裴多菲俱乐部, 329

petroleum 石油; 在罗马尼亚, 10, 198, 133, 197(向同盟国出口), 1914—18年, 129, 132, (向纳粹德国出口), 215, 238, 246, 262, (向苏联出口), 344; 在匈牙利, 162

Petrović, Djordje (Karadjordje) 乔治·彼得罗维奇(卡拉乔治), 塞尔维亚领袖, 32—3

Petsamo 佩萨莫, 芬兰; 被割让给苏联, 294

Pflanzner-Ballin, General 普夫兰策尔—巴尔廷将军, 149

Phanariot Greeks 法纳尔希腊人, 16—17, 36

Pheraios, Constantinos Rhigas 康斯坦丁·里加斯·费拉依奥斯, 希腊民族主义英烈, 35

Philadelphia Agreement 费拉德尔菲亚协定; 旅居美国的捷克人和罗马尼亚人签订, 141

Philike Hetairia 菲莱克希特里亚, 希腊秘密会社, 36—

Philippopolis 菲利普波利斯 参见 Plovdiv 条)

Piast dynasty, Poland 波兰的皮亚斯特王朝, 19

Piast Peasant Party, Poland 波兰的皮亚斯特农民党, 178, 194, 195

'Pig war' "猪战"; 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发生(1906), 110

Pilsudski, Jozef 约瑟夫·毕苏茨基, 67; 主张波奥合作, 93; 在1914—19年大战中, 121, 123, 127, 135; 成为波兰国家首脑(1918年), 144, 170, 181, 195; 与德国, 184—5; 与少数民族, 196; 向右转, 209, 223—4; 主张波法联合行动对抗希特勒, 212; 与德波条约(1934年), 213

Pindus mountains 品都斯山脉, 13, 15

Pirin mountains 皮林山脉, 13

Pittsburgh Convention 匹茨堡协定; 旅居美国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集团订立, 141

Plevna 普列夫纳 在俄土战争中, 86

Ploesti 普洛耶什蒂, 油田和炼油厂, 10, 133, 278

Plovdiv 普罗夫迪夫(菲律普波利斯), 15, 80, 86; 东鲁米利亚的中心, 87, 88

Podgorica 波德戈里察; 门的内哥罗议会设在, 154, 155

Pokrovsky, M.N. M.N. 波克罗夫斯基, 苏联共产党外交历史学家, 290

Poland 波兰, 1—2, 4, 17; 被瓜分, 21; 与维也纳会议, 24—5; 在俄国统治下, 41—2, 45, 60, 92; 起义(1830—31年), 41, 42—4, (1863年) 41, 67—70; 在普鲁士统治下, 45—6, 60, 92, 93; 在奥地利统治下, 46—7, 134; 国民民主党, 93, 136; 俄国的许诺(1914年), 123; 德国人、奥地利人穿越, 123, 127; 德奥的许诺, 134; 俄国临时政府的保证(1917年), 135; 俄国放弃, 1—7; 在“十四点原则”中, 139; 与法国, 1—1—2; 与巴黎和会, 156—9; 与苏俄交战, 156; 少数民族, 170, 171, 195—6; 政党, 174; 工厂立法, 175—6; 与罗马尼亚的军事会谈, 180, 181; 与法国结盟, 181, 185; 与捷克斯洛伐克, 181, 213; 与邻邦不睦, 184—5; 实行民主失败, 194—6, 参加农业会议, 208; 向右转, 209, 223; 与希特勒, 212; 与德国签订为期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213(废除此条约), 243; 全国激进阵营, 223; 拒绝苏联军队过境, 223, 244; 与捷克的灭亡, 234; 占领切欣地区, 235, 236; 英法的保证, 242, 243, 244, 245; 德国入侵, 243, 245; 德苏条约中的处理, 244; 苏波协定废除对波的处理(1941年), 268; 苏联占领东部(1939年), 172, 24; 领导人在罗马尼亚被拘留, 245, 265; 前途问题, 265—8, 276, 277, 288; 国家军, 266, 267, 268, 281—3; 工人党, 268; 与德黑兰会议, 276, 277; 被苏联军

队穿越西进, 287; 移民定居原德国境内, 290, 291; 苏联的指示, 292; 苏军进驻, 295; 成立联合政府, 296; 成立共产党政府, 305—7; 清洗共产党人, 317—8; 动乱, 321, 323; 非斯大林化, 326—7; 与苏联, 327—8; 1957年的选举, 337; 从改革纲领后退, 337—40; 支持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 340

Poles 波兰人, 17; 语言, 28; 与斯拉夫大会, 58; 参加交战国双方作战(1917年), 135, 136; 作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少数民族, 159

Polish National Committee, in switzerland 在瑞士的波兰国民委员会, 136, 140

political parties 政党, 174; 农民的, 178—9; 被查禁的, 216, 235; 平均地权的, 295

Polonization, of minorities in poland 波兰境内少数民族的波兰化, 196

Pomerania 波美拉尼亚, 21

Pomorze(Polish Corridor) 波莫瑞(波兰走廊), 156, 164, 195—6; 希特勒与波莫瑞的德意志少数民族, 213, 243; 德国人要求穿越的治外法权, 242; 德国军队进入(1939年), 245

Popović, General Damian 达米安·波波维奇将军, 塞尔维亚黑手党人, 116

Porkkala 波卡拉, 芬兰; 苏联的海军基地, 294, 325

Potiorek, General 波蒂奥雷克将军, 波斯尼亚省长, 121

Potsdam Conference (1945) 波茨坦会议(1945年), 290—1, 306

Poznan (Posen) 波兹南(波森), 4, 46; 发生动乱, 327, 337

Poznania 波兹南尼亚; 在普鲁士统治下, 25, 46, 59, 60; 归属波兰(1918年), 156, 195—6; 希特勒和德意志少数民族, 243; 德军进入(1939年), 245

Prague 布拉格, 6, 42; 大学, 5, 27, 95; 在1848年革命时期, 53, 58; 弗兰西斯·约瑟夫计划前, 加冕, 73, 77; 建议为“新

欧洲”首都, 139; 德意志居民, 236; 希特勒进入, 241; 爆发反纳粹起义(1945年), 289; 发生动乱(1948年), 309, (1966年), 351, 352; 捷克人对苏联人的反抗(1968年), 355

Premysl dynasty, Bohemia 波希米亚的普舍米斯尔王朝, 5, 19

press 新闻; 匈牙利的新闻自由, 51; 西方新闻界评论土耳其对保加利亚的压迫, 84

Pribičević, Svetožar 斯维托扎尔·普里比切维奇, 南斯拉夫国民议会副主席, 147, 148

Princip, Gavrilo 加夫里洛·普林西普; 在萨拉热窝暗杀弗兰西斯·斐迪南(1914年), 117

Proletariat, urban 城市无产阶级, 71, 225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比例代议制; 在捷克斯洛伐克, 174, 在波兰, 174, 194; 在罗马尼亚, 198

Protoguerov, General 普罗托格罗夫将军, 马其顿内部革命组织领袖, 144, 205

Prussia 普鲁士, 21; 参加维也纳会议, 24, 25; 与波兰, 45—6, 60, 92, 93

Pruth river 普鲁特河, 10, 25

Pechner, General (Romanian) 普奇纳将军(罗马尼亚人), 62

Pula 普拉; 奥匈帝国的海军, 27; 被意大利人攻占, 148; 归属南斯拉夫, 293

Purges 清洗; 在俄国, 233, 316; 在中东欧各国, 316—20, 352; 在南斯拉夫, 293

Purić, Bozhider 博日达尔·普里奇, 流亡的南斯拉夫首相, 281

Putnik, Marshal Radomir 拉多米尔·普特尼克元帅, 塞尔维亚陆军统帅, 117

Quadrilateral (of fortresses) (四要塞组成的)四边形; 奥地利军队和皮埃蒙特人作战守卫, 52, 56

Rački, Franjo 弗兰约·拉契奇, 克罗地亚历史学家, 76

Racziewicz 拉奇凯维奇, 流亡的波兰总统, 266, 268

Raczinski, Edward 爱德华·拉津斯基, 波兰公共图书馆创建人, 46

Radetzky, Marshal 拉杰茨基元帅, 奥地利驻意部队司令, 52—3, 56, 63

Radić, Joseph 约瑟夫·拉迪奇, 克罗地亚农民党创始人, 100

Radić, Stjepan 斯捷潘·拉迪奇, 克罗地亚农民党创始人, 100, 178; 在1914—18年战争时期, 121; 与科孚协定, 131; 与巴黎和会, 154; 访问莫斯科, 191—2; 被监禁, 192; 任公共教育大臣, 192; 被暗杀, 192

Radnitsa 拉德尼察, 保加利亚的斗争运动; 被镇压, 223

Radkiewicz, Stanislaw 斯坦尼斯瓦夫·拉德基耶维奇, 波兰公安部长, 306

Radomir 腊多米尔, 保加利亚共和国宣布成立(1918年), 144

Radoslavov, Vasil 瓦西耳·拉多斯拉沃夫, 保加利亚首相, 142

Radziwill family, in Prussian Poland 普属波兰的拉齐威尔家族, 45

railways 铁路, 在巴尔干半岛, 15, 16, 79, 80, 101 维也纳的, 45; 联系东西方的, 77, 在匈牙利 97

Rajić, Jovan 约万·拉伊奇, 塞尔维亚的隐修士学者, 31,

Rajk, László 劳伊克·拉斯洛, 匈牙利内务部长, 316; 为老后恢复名誉, 325

Rákosi, Mátyás 拉科西·马加什, 匈牙利共产党人, 161, 176, 295, 302; 任副总理, 303, 317; 任总理, 323; 与铁托, 325; 辞职, 329

Ranković, Aleksander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 南斯拉夫共产党人, 210; 任秘密警察首脑, 311, 314, 316, 334

Rapacki, Adam 亚当·拉帕茨基, 波兰外交部长, 327; 建议建立“无原子区”, 339—40

Rapallo, Treaty of 拉巴洛条约 意大

利和南斯拉夫订立, 167

Rasputin 拉斯普京, 125

Rauschning, Hermann 赫尔曼·劳斯奇宁, 但泽议会主席, 213

Reichstadt 赖希镇; 奥普就巴尔干问题订立秘密协定(1876年), 85

resistance movement 抵抗运动; 克罗地亚反对乌斯塔沙统治, 264; 在斯洛文尼亚, 264; 在波兰, 266, 267, 268, 281—3; 在南斯拉夫, 270, 271—3, 281; 在希腊, 270—1; 在保加利亚, 275; 在捷克斯洛伐克, 289

Rhineland 莱茵兰; 希特勒重新占领(1936年), 219

Rhodope mountains 罗多彼山脉, 13, 15, 275

Ribar, Ivo 伊沃·里巴尔, 为南斯拉夫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会议主席(1942年), 272; 任南斯拉夫总统, 311

Ribbentrop, Joachim von 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 德国外交部长, 244, 246, 247, 255, 261

Rieger, František 弗兰蒂塞克·列涅尔, 捷克政治家, 77, 7

Riga, Treaty of 里加条约(1921年); 划定苏波边界, 170

Rijeka 里耶卡, 参见Fiume条

Ripka, Dr Hubert 胡贝尔特·里普卡博士, 捷克斯洛伐克外贸部长, 309

Ristić, Jovan 约万·里斯蒂奇, 塞尔维亚首相 34

Rodd, Sir Rennell 伦内尔·罗德爵士, 英国驻罗马大使, 24

Rokossovsky, Marshal of Red Army 苏联红军的罗科索夫斯基元帅, 273, 282, 287; 被任命为波兰国防部长, 318—9, 328

Romanovs 罗曼诺夫家族 97, 131, 135

Rome 罗马; 被压迫民族大会召开(1918年), 140; 意南签订条约(1924年), 167; 意匈奥签订议定书(1934年), 213

Rome Berlin Axis 罗马—柏林轴心, 212, 219, 221; 宣布组成(1936年), 226

Roosevelt, President 罗斯福总统, 251, 276, 287, 288; 与鄂图大公, 278, 285
Rothermere, Viscount 罗瑟米尔子爵, 报业巨擘; 与匈牙利, 183, 203
Roumania 罗马尼亚, 8, 10—13, 17 (参见Danubian Principalities 条) 与克里米亚战争, 65; 首次正式使用国名, 80; 在俄土战争中, 85, 86; 独立得到承认 (1878年), 86, 87; 与奥匈秘密条约, (1883年) 103; 农民起义 (1907年), 107; 社会民主党人, 108; 与协约国谈判 (1915年), 126, 并签订秘密条约 (1916年), 132, 155, 162; 签订和约 (1918年) 138; 向德国再次宣战, 143; 与法国, 151; 占领特兰西瓦尼亚并向布达佩斯挺进 (1919年), 161; 获得的领土, 163; 少数民族, 164, 171, 199; 政党, 174, 197; 土地改革, 175; 共产党人, 176; 与波兰订立军事协定, 180, 181; 加入小协约国, 180—1; 与法国订立条约, 181; 与意大利, 182; 与匈牙利, 183; 与俄国, 184; 参加签署李维诺夫议定书, 185; 国内政策, 197—201; 参加农业会议, 208; 向右转, 209, 210—1, 225—6; 与墨索里尼, 212; 与德国订立贸易协定, 215, 246, 248; 寻求与德国达成谅解 (1936年), 220; 与俄国签订秘密条约, 218 (废除此条约) 221; 与罗马—柏林轴心, 221; 国家基督教党, 223; 拒绝苏联军队过境, 221, 233; 与捷克的灭亡, 233; 民族复兴阵线, 238; 英法的保证, 242; 波兰领导人被拘留, 247, 265; 苏联占领的领土, 247, 255; 将多布罗加让予保加利亚, 247, 248; 铁卫军政府, 248; 与德国, 247—9; 境内的德军, 248, 255; 签署三国公约, 249; 对苏宣战, 256; 对苏发动进攻, 260, 261, 262; 与西方接触, 262, 274; 与德黑兰会议, 276, 277; 英美拒绝单独订立协定, 277; 倒戈, 283—4; 与俄国, 287, 290, 292, 293; 在和平解决办法中, 293, 294; 俄国的驻军, 295; 联合政府, 296; 共产党政府, 298—301; “农民阵线”, 299; 清洗共产

党人, 316, 318; 工业的发展, 319; 受苏联剥削, 341; 非斯大林化, 328; 与匈牙利叛乱, 342; 苏军撤离 (1958年), 344; 与捷克叛乱 (1968年), 346, 347
Roumanian National Council 罗马尼亚民族委员会, 146—7
Roumanians 罗马尼亚人, 11, 17, 18, 60; 在特兰西瓦尼亚, 11, 12, 61, 75, 104; 语言, 28; 与匈牙利民族主义, 49, 50, 56; 民族感情, 66; 在比托利的学校, 105; 在匈牙利, 164; 在南斯拉夫, 164, 189
Rudolf 鲁道夫, 奥地利王储, 99
Rumelia, Eastern 东鲁米利亚, 15, 87, 88
Runciman, Viscount 朗西曼子爵, 前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密使, 232
Rundstedt, General von 冯·伦德施泰特将军, 德军侵苏司令, 258
Rupel Pass 鲁佩尔隘口, 15
Rupnik, General 鲁普尼克将军; 组织斯洛文尼亚民兵与游击队作战, 264
Russia 俄国 (苏联), 6; 与比萨拉比亚, 10, 18, 25—6; 在与土耳其多次战争中, 20, 38, 85—7, 88; 在波兰, 21, 45—6, 60, 92, 93; 参加维也纳会议, 24, 25; 与希腊起义, 37, 38, 40; 占领多瑙河两公国, 60—1; 在匈牙利战争中, 63; 自由主义者的态度, 63, 64—5; 与巴尔干各国, 81—9, 103, 106, 111—2, 114, 116; 与青年捷克人党, 96; 向波兰人和捷克人提出建议 (1914年), 123; 德奥对俄战争的胜利 (1915年), 127; 向奥地利推进, 131; 布尔什维克革命 (1917年), 137; 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 137—9; “白军”, 152; 与波兰的战争, 156; 与小协约国, 164; 失去的领土, 172; 与邻国的关系, 185; 克罗地亚领袖, 191—2; 与法、捷签订互助条约 (1935年), 218; 与罗马尼亚签订秘密条约, 218, (废除此条约) 221; 与重新占领莱茵兰, 219; 与捷克的灭亡 232—3, 236; 清洗老布尔什维克 (1938年), 233; 与英法的谈判 (1939年), 244; 与德国订立条约, 244,

245; 占领波兰东部, 215; 入侵芬兰, 246; 兼并波罗的海沿岸诸国、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 247, 255; 与德国关系恶化, 与匈牙利、南斯拉夫接触, 255; 德国入侵 (1941年), 256, 28-9; 战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 259; 与波兰的关系, 265-8; 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 268-9; 以及与罗马尼亚的关系, 278, 283-4; 与芬兰的停战协定 (1944年), 284; 参加缔造和平, 290; 与南斯拉夫关系破裂, 313-4; 支持阿尔巴尼亚, 314-5; 清洗, 316; 与多瑙河沿岸国家的贸易, 319; 镇压柏林的动乱 (1953年), 322; 赫鲁晓夫时代, 324-6; 与波兰, 327-8; 镇压匈牙利革命, 330-1; 在柏林危机期间 (1961年), 332; 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开始执政 (1964年), 332; 支持保加利亚, 343; 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预 (1968年), 354-6

Russification, policy of, in Poland 在波兰的俄罗斯化政策, 91, 92, 93

Russo-Japanese war (1905), 日俄战争 (1905年), 112

Russo-Turkish war (1877-78), 俄土战争 (1877-78年), 85-7, 88

Rustchuk (Ruse on Danube 多瑙河畔的鲁楚克(鲁塞), 79-80

Ruthene National Councils 罗塞尼亚民族委员会, 147; 在共产党领导 (1944年), 269

Ruthenes 罗塞尼亚人, 17, 58;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 139; 在捷克斯洛伐克, 186, 188-9; 在罗马尼亚, 190 (参见 Ukrainians 条)

Ruthenia 罗塞尼亚, 12, 13; 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 (1912年), 159, 160, 163; 边缘地区归属匈牙利 (1938年), 235; 其余部分获准自治, 235-6 (参见 Carpatho Ukraine 条); 一日共和国, 241; 被匈牙利占领, 241; 被苏联解放, 289; 被割让给苏联 (1945年), 292, 307, 355

Rydz-Smigly, Marshal 雷兹-斯米格莱元帅, 波兰司令, 244

Sadowa-Siniggratz 萨多瓦-辛尼格拉茨; 普军击败奥军, 12

Safarik, P.J. P.J. 萨法里茨 斯洛伐克领袖, 58

St Germain 圣日耳曼; 签订对奥和约 (1919年), 150, 167, 172

Salisbury, Marquess of 索尔兹伯里侯爵 英国外交大臣, 87

Salonica 萨洛尼卡, 15, 16, 17, 105; 青年土耳其党, 111; 被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攻占 (1912年) 114; 被希腊人占有, 115; 英法联军登陆 (1915年), 128; 南斯拉夫的过境权利, 172, 250; 保加利亚与巴尔干小协约国缔结协定 (1938年), 238

Samo 萨莫, 保加利亚酋长, 7

San Stefano 圣斯特法诺; 俄国人占领, 86; 流产的条约 (1877年), 105, 168, 344

Sanatescu, General 萨纳特斯库将军, 罗马尼亚首相, 283

Sarajevo, Bosnia 波斯尼亚-萨拉热窝, 15, 17, 110, 147; 奥地利皇太子被暗杀 (1914年), 117-8

Sardinia-Piedmont 撒丁-皮埃蒙特; 对奥宣战 (1848年), 52

Sava river 萨瓦河, 8-9, 103, 121

Savov, General 萨沃夫将军, 保加利亚统帅, 115

Saxons, in Transylvania 特兰西瓦尼亚的撒克逊人, 11, 12, 49;

Saxony 萨克森; 泛德意志分子, 184

Sazonov, Serge 谢尔盖·萨佐诺夫, 俄国外交大臣, 123, 151

Schassburg 沙斯伯格; 俄国人击溃匈牙利人 (1849年), 61

Schneider Creusot 什奈德-克鲁索特, 军火公司, 151, 221

Schönerer, George von 乔治·冯·商涅列尔, 泛德意志主义倡议人, 94, 95

Schuschnigg, Dr Kurt von 库尔特·冯·舒施尼格博士, 奥地利总理, 226

Schwarzenburg family 施瓦岑贝格家

族;地产,48
'Scorched earth' policy 焦土政策
258
Sebastopol 塞瓦斯托波尔 259, 261,
280, 284
'Second Front' 第二战场·与盟国会议,
276
Secret ballot, in Hungary 匈牙利的不
记名投票, 202
Seeckt, General Hans von 汉斯·冯·
西克特将军, 128
Self-determination, for nations 民族
自决, 40, 120, 150
Serbia 塞尔维亚; 与马其顿, 10, 115; 文
化觉醒, 30—1; 向土耳其统治挑战, 31
—5; 东正教的宗主教区, 31, 100, 125;
独立, 34; 与匈牙利民族主义, 51, 56,
57; 与克罗地亚的关系, 76, 90, 100—
1, 121, 191; 经济增长缓慢, 79; 在保加
利亚起义期间, 84; 在俄土战争中, 80;
独立得到承认, 86, 87; 与柏林条约, 89;
入侵保加利亚(1885年), 80; 与奥匈帝
国签订秘密条约, 103; 激进党, 107—8,
189; 农民党, 108, 178; 持不同政见的青
年激进党, 107—8, 189; 在巴尔干战争
中, 113—4, 115; 黑手党与萨拉热窝暗
杀案, 116—8; 在 1914—18 年战争中,
121—2, 128—9, 147; 在“十四点原则”
中, 139; 与南斯拉夫委员会达成协议并
订科孚协定, 136—7; 与法国, 151
Serbia (as part of Yugoslavia) 塞
尔维亚(南斯拉夫的一部分); 纳粹式集
团, 223; 和与克罗地亚人签订的斯波拉
宗协议(1929年), 240; 反政府情绪
(1940年), 250; 在德国统治下, 264—5;
抵抗运动, 334
Serbo-Croat Coalition 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联合, 100—1
Serbo-Croat language 塞尔维亚—克
罗地亚语言, 50, 75
Serbs 塞尔维亚人 14, 17, 19; 在拿破仑
统治下与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联
合, 30; 伏尔伏丁那的普雷恰尼, 30, 32,

24, 62, 92, 164; 在匈牙利统治下克罗地
亚境内, 69; 在南斯拉夫担任全部主要
官职, 189; 克罗地亚人作为少数民族
的, 263—4; 南斯拉夫对情绪威胁,
334
Serbs, Croats, and Slovenes 塞尔维亚
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 一
系, 30; 提联合的建议, 134—5, 136—7;
王国宣布成立(1918年), 148; 参加巴
黎和会, 153—4; 参见Yugoslavia条)
Serfdom 农奴制度 在波兰 43; 被匈牙
利废除, 63; 被俄国废除, 69
Seton Watson, R. W. 里·W. 塞顿—沃
森, 110
Sevres 塞夫勒; 与土耳其签订和约
(1921年), 150; 与土耳其签订和约
始终未获批准, 169
Shehu, Mehmet 穆罕默德·谢胡, 阿尔
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 336
Shqiptars (Albanian Moslems) 什奇
普塔尔人(阿尔巴尼亚的穆斯林), 17,
18; 在希腊, 171; 在波斯尼亚, 189, 315;
反塞尔维亚情绪, 23. 参见Mosle-
ms条)
S ě Guard, in Ruthenia 罗塞尼亚的
西奇卫队, 235, 241
Sik, Prof Ota 奥塔·西克教授, 捷克
斯洛伐克经济学家, 350, 351, 352, 353;
流亡国外, 356
Sikorski, General Wladyslaw 瓦迪斯
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 波兰流亡政府
首脑, 266, 267; 因飞机失事身亡, 268
Silesia 西里西亚, 2, 3, 74; 在 1848 年,
53—4; 分属德国和波兰(1921年), 156,
158; 德国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 172; 波
兰的政策, 196
Simeon I 西美昂一世, 保加利亚沙
皇, 19;
Simeon II 西美昂二世, 保加利亚国
王, 275, 298
Simović, Col Dušan (later General) 杜
尚·西莫维奇少校(后为将军), 萨
拉耶沃的塞尔维亚司令, 148; 任南斯拉夫

首相, 252, 255
Sinaia 锡纳亚, 召开农业会议 (1930 年), 208
Siret river 锡雷特河, 10
Siroky, Viliam 威廉·西罗基, 斯洛伐克共产党人, 307; 任捷克斯洛伐克总理, 322, 347, 349
Sixtus, Prince of Bourbon-Parma 西克斯图斯, 波旁-帕尔马的亲王; 奥地利试探和平 (1917 年), 134
Skanderberg 斯坎德贝格, 阿尔巴尼亚英雄, 18, 19
Skoda, armament works, Plzen 比尔森的斯科达军工厂, 221, 223, 246
Skopje 斯科普里, 105, 116
Skoropadski, General 斯科罗帕茨基将军; 治理乌克兰, 138
Skorzeny, Major 斯科尔兹内少校; 指挥进行绑架和营救的特种部队, 286
Skrzynecki, General Zygmunt 齐格蒙特·斯克申奈茨基将军, 波兰司令, 43
Skutari, Albania 斯库塔里, 阿尔巴尼亚, 在巴尔干战争中, 114, 115
Slansky, Rudolf 鲁道夫·斯兰斯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书记; 被处决, 318—9
Slatina, Roumania 斯拉蒂纳, 罗马尼亚; 计划建设炼铝厂, 344
Slav Congress 斯拉夫大会 (1848 年), 58
Slavonia 斯拉沃尼亚, 8; (参见 Croatia-Slavonia 条)
Slavonic people 斯拉夫民族, 4, 18
Slavs, Western and Southern 西部和南部斯拉夫人, 17, 56 (参见 South Slavs 条)
Slivnitsa 斯利夫尼察, 15; 保加利亚人击败塞尔维亚人 (1885 年), 89
Slovak National Council 斯洛伐克民族会议, 147
Slovakia 斯洛伐克, 5, 6; 发生的匈牙利战争, 62; 在匈牙利统治下, 73, 97, 98; 并入捷克斯洛伐克 (1919 年), 159—60,

163, 171; 边缘地区归属匈牙利 (1938 年), 235; 获准自治, 235; 德意志人, 236; 与布拉格关系破裂 (1939 年), 241; 在德国保护下独立, 241; 参加签署二国公约, 249; 对苏宣战, 256; 在德国统治下, 261, 263, 279; 对美宣战, 263; 苏军解放, 289; 1946 年的选举, 308; 工业的增长, 347, 349; 动乱, 349, 350
Slovaks 斯洛伐克人, 17, 58; 在匈牙利, 49, 56, 160; 民族会议 (1918 年), 147; 巴黎和会中没有代表参加 (1919 年), 154; 在捷克斯洛伐克, 186, 187—8; 与希特勒, 230, 234; 在德国被迫劳动, 263; 在苏联境内罗塞尼亚, 355
Slovenes 斯洛文尼亚人, 17; 语言, 29; 在拿破仑统治时期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联合, 30; 在奥匈帝国军队中, 139; 在奥地利卡林西亚地区, 167, 171; 在南斯拉夫, 189, 190—1; 在意大利伊斯特利亚, 171, 220; 在的里雅斯特内地, 293
Slovenia 斯洛文尼亚, 9, 22; 天主教, 17, 12; 与拿破仑, 22; 语言运动, 29—30; 成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 (南斯拉夫) 的一部分, 147; 人民党, 178; 共产党人, 210; 和克罗地亚与保罗亲王缔结的斯波拉茨协议 (1929 年), 240; 被德意瓜分 (1941 年), 254, 264; 抵抗运动, 272; 反塞尔维亚情绪, 334
Slowacki, Juliusz 尤柳什·斯洛伐茨基, 波兰诗人, 44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258, 259, 273
Smrkovsky, Josef 约瑟夫·斯姆尔科夫斯基, 捷克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议长, 353, 354, 356
Smuls, General 斯马茨将军; 率领使团赴布达佩斯, 161, 162
Smyrna (Izmir) 士麦拿 (伊兹密尔); 希腊人要求、占领以及被逐出, 169
Social Democratic parties in Balkan countries 巴尔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 108

Sofia 索非亚, 15, 81—2; 在俄土战争中, 86; 马其顿流亡者, 105; 大教堂的炸弹爆炸事件(1925年), 204; 红军作为解放者进入, 284

Sokolovsky, Marshal, of Red Army 苏联红军元帅索科洛夫斯基, 273

Sokols 索科尔斯, 捷克人的群众性体操运动, 78

Sonnino, Baron 桑尼诺男爵, 意大利总理, 131; 任外交部长, 166, 168

Sosnkowski, General 索森科夫斯基将军, 流亡国外的波军, 司令, 268

South Slavs 南部斯拉夫人, 17, 56, 统一运动, 76, 80, 100; 和弗拉西斯·斐迪南, 117; 与意大利人, 126, 140; 在维也纳议会中(1917年), 134; 联邦理想, 180, 312—3

Spš (Zips, Szepes) district 斯皮什(齐普斯, 塞普斯)地区; 被哈布斯堡王朝攻占, (1769年), 21; 分属波兰和斯洛伐克(1920年), 158, 163

Split 斯普利特, 16, 126; 被游击队暂时占领(1943年), 271—2

Spoletto, Duke of 斯波累托公爵 作为克罗地亚国王, 254

Sporazum 斯波拉宗, 南斯拉夫就克罗地亚问题达成的协议(1950年), 240, 250

Spychalski, Marshal 斯彼哈尔斯基元帅, 波兰游击队司令 305; 任国防部副部长, 317; 任国防部部长, 320; 任国务委员会主席, 339

Sramak, Mgr 施纳麦克阁下, 保证摩拉维亚人忠于奥匈帝国(1914年), 171; 任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总理, 269

Srem region 希雷姆地区, 9

Stalin, Joseph Vissarionovich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 被伐尔的不信任, 218; 向德国人做出友好姿态(1941年), 256; 与波兰人, 266, 267, 268, 282; 参加战时会议, 276, 285, 287,

288; 出席波茨坦会议, 290; 与南斯拉夫人, 312, 313, 314; 将俄国民族主义与国际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 316, 318; 逝世, 321; 的批判, 326; 在布达佩斯的塑像被推倒, 329—30

Stalingrad, battle for 斯大林格勒的争夺战, 262, 26

Stamboliisky, Alexander 亚历山大·斯塔姆博利斯基, 保加利亚农民党领袖, 107, 108, 178; 任为时短暂的共和国总统; 144; 任首相(1919年), 144, 179, 181, 被谋杀, 179, 180, 182

Stambulov, Stefan 斯特凡·斯塔姆博洛夫, 保加利亚领袖, 82, 88; 任首相, 104

Steed, Wickham 威克姆·斯蒂德, 泰晤士报国际新闻编辑, 130, 140

Stefanik, Milan 米兰·斯捷法尼克, 捷克斯洛伐克委员会中的斯洛伐克代表, 130—1, 18

Stefanović, svetoslav 斯韦特斯拉夫·斯蒂凡诺维奇, 南斯拉夫内务部长, 334

Stephen 斯蒂芬, 马扎尔国王, 7—8

Stephen, Tvrtko① 斯蒂芬·特夫尔特科, 波斯尼亚的统治者, 19

Stepinac, Archbishop 斯特皮纳茨大主教, 克罗地亚天主教首脑; 被监禁, 312, 320

Stettin 什切青; 给予捷克人的过境权, 172

Stojadinović, Milan 米兰·斯托亚迪诺维奇; 任南斯拉夫首相, 217, 220, 221; 与戈林, 217, 23; 倾向法西斯主义, 224; 被解职, 239, 24; 被英国人扣留, 251

Stolypin, P.A. P.A. 斯托雷平 俄国内阁总理, 93, 112

Straits Convention 海峡条约(规定俄国战舰不得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 111

Strategic considerations 战略方面的考虑(1919年); 与巴黎和会, 155, 159—

① 查王史第19页为Stephen Tvrtko, 与“索引”中姓名恰好颠倒, 如依正文照译。译者

Stresa, conference at 1932) 斯特雷扎会议(1932年), 208

Stresa Front 斯特雷扎阵线; 法意英三国遣兵希特勒重新武装德国的(1935年), 218—9

Stresemann, Gustav 古斯塔夫·施特莱斯曼, 德国外交部长, 185, 222

Strossmayer, Joseph 约瑟夫·斯特罗斯迈尔, 贾科沃主教, 南部斯拉夫运动领袖, 76, 99

Strumica, Bulgarian bishopric of 斯特鲁米察的保加利亚主教区, 105

Strzelecki, Ryszard 里沙尔德·斯切莱茨基, 波兰新斯大林主义、反犹太派别领袖, 338, 339

Styria 施蒂里亚, 29, 30, 165

Šubašić, Ivan 伊万·舒巴希奇, 流亡的南斯拉夫首相, 281; 退出政府, 311

Subotica 苏博蒂察, 划归南斯拉夫的伏伊伏丁那一市镇, 164

Sudeten mountains 苏台德山, 2

Sudetenland 苏台德; 德意志居民 4—5; 代表要求与奥地利代表团一道参加巴黎和会, 154; 被捷克作为被征服的敌国土地管理, 154; 泛德意志分子, 184; 与捷克斯洛伐克政府, 186, 187; 与希特勒, 208, 230, 231; 德意志党, 221; 德意志防卫队, 231; 拒绝自治, 233—4; 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德国人进入, 234; 德意志人被赶出, 291, 348

Sulyok, Desider 舒伊奥克·戴西代尔, 匈牙利小农党议员, 303, 402

Sumadija region 舒马迪亚地区, 塞尔维亚民族的摇篮, 9, 32

Supilo, Frano 弗兰诺·苏皮洛, 南斯拉夫理想的倡导者, 100, 101, 334; 在1914—18年战争中, 124—5, 126; 在南斯拉夫委员会, 131, 137

Suslov, M. A. 苏斯洛夫; 苏联政治局委员在布达佩斯, 330

Sutu, Michael 米海尔·苏图, 摩尔达维亚的霍斯波达尔(总督), 36

Svatopluk 斯瓦托普鲁克, “大摩拉维亚帝国”大公, 5

Svehla, A. A. 斯维赫拉, 捷克斯洛伐克农民党领袖, 178

Sviridov General 斯维里多夫将军, 设于匈牙利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首脑, 303—4

Svoboda, General Ludwig 卢德维格·司沃博达将军; 任俄国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司令, 269, 289; 任捷克斯洛伐克国防部长, 309; 任总统, 352—3, 354, 355

Szakasits, A. A. 萨卡希奇, 匈牙利副总理, 303; 任总统, 305; 被监禁, 316

Szálasi, Ferencz 萨洛希·费伦茨, 匈牙利国社党创建人, 223, 225; 被监禁, 237; 任首相, 286, 304

Széchenyi, Count Istvan 塞切尼·伊什特万伯爵, 匈牙利权贵的代言人, 50, 52, 57, 61

Szeged, Hungary 塞格德, 匈牙利, 8, 161

Szeklers 塞克勒人, 特兰西瓦尼亚讲马扎尔语的民族, 11—12, 17, 163

Szlachta 什拉赫塔, 波兰贵族地主, 68, 69

Szombathelyi, General Ferencz 桑博特洛伊·费伦茨将军, 匈牙利部队总参谋长, 260

Sztojay 斯托亚伊, 匈牙利首相, 285

Taaffe, Count Edward 爱德华·塔菲伯爵, 奥地利首相, 95, 96

Talleyrand, C. M. de C. M. de 塔列朗, 波旁王朝的法国在维也纳会议的发言人, 23, 25

Tannenberg, Battles of 坦仑堡战役(1410年), 4; (1914年) 121

tariffs 关税; 被奥地利帝国内取消, 64; 为匈牙利工业建议的关税壁垒, 101; 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牲畜征收, 110; 和约中的问题, 172; 与奥匈帝国解体后各继承国的关系, 183; 德国与波兰的关税战, 184; 被降低以对抗萧条的建议, 208

Tartars 鞑靼人, 19
 Tatarescu, Iorghe 伊奥尔杰·塔塔列斯库, 罗马尼亚首相, 210; 任外交大臣, 299; 被劝诱辞职, 301
 Tatra mountains 塔特拉山, 6
 Tatrabunary, Bessarabia 塔特拉布纳里, 比萨拉比亚; 共产党人起义(1924年), 199
 Teheran 德黑兰; 邱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举行会议(1943年), 276
 Teleki, Count Géza 泰莱基·盖佐伯爵, 匈牙利临时政府部长, 202
 Teleki, Count Pal 泰莱基·帕尔伯爵, 匈牙利首相, 202, 237; 自杀, 253
 Teleki family estates 泰莱基家族庄园, 48
 Temesvár (Bénat) 特梅斯瓦尔(巴纳特); 划归罗马尼亚, 163
 Tepla 特普拉; 斯洛伐克国民议会设于(1848年), 56
 Teschen, Duchy of 切欣公爵领地; 分属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1920年) 158, 159; 波兰占领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部分(1938年), 235; 苏联人使波兰人退出(1945年), 292, 307
 Teutonic knights 条顿骑士, 4
 Thaya river 萨亚河, 6
 Thessaly 色萨利; 归属希腊(1881年), 87
 'Third Europe' (Poland, Hungary, Rumania, Yugoslavia) "第三欧洲"(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 243
 Thirty Years' war 三十年战争, 20
 Thrace 色雷斯; (西部) 归属保加利亚(1878年), 86; 归属希腊(1913年) 113; 被归还希腊(1919年), 168; (东部) 归属希腊(1920年), 169; 土耳其人保有, 169; (希腊) 保加利亚少数民族, 171; 保加利亚占领某些部分 自1941年起), 275
 Tildy, Zoltan 蒂尔迪·佐尔坦, 匈牙利小农党领袖, 302; 任总理, 303; 任总

统, 303, 304; 被迫辞职, 304; 参加纳吉政府, 330
 Timoshenko, Marshal 铁木辛哥元帅, 苏军对德作战司令, 258
 Tiso, Fr Joseph 约瑟夫·蒂索神父, 斯洛伐克领袖, 118, 211; 与希特勒, 234, 241; 任斯洛伐克总理, 235; 被免职, 241; 与德国人勾结, 256, 257, 263, 280; 被处决, 308
 Tisza, Istvan 蒂萨·伊什特万, 匈牙利首相, 97, 101, 133, 145, 300; 被免职(1917年), 134; 被谋杀(1918年), 146
 Tisza, Kálmán 蒂萨·卡尔曼, 匈牙利首相, 97—8
 Tisza(Theiss) river 蒂萨河, 8
 Tito 铁托; 原名为约瑟普·布罗兹, 121, 210; 任南斯拉夫共产党书记, 272; 被授予元帅称号, 273; 游击队, 276, 277; 与匈牙利休战, 278; 会晤邱吉尔, 281; 被流亡政府承认为唯一抵抗运动司令, 281; 论拉科西, 295; 得到广泛支持, 312, 320; 会晤季米特洛夫, 313; 与苏联决裂, 313, 314; 获得西方援助, 314; 苏联做出友好姿态, 325; 继续掌握大权, 333; 与赫鲁晓夫互访, 335, 336; 论苏联在匈牙利的镇压行动, 336; 在布拉格受到欢迎, 355
 Titulescu, Nicholas 尼古拉·蒂图列斯库, 罗马尼亚首相, 198, 211; 任外交大臣, 215, 218, 219, 221
 tobacco Balkan 巴尔干半岛的烟草, 79, 215
 Tolbukhin, Marshal, of Red Army 苏联红军的托尔布欣元帅, 269, 285, 286, 293
 Toleration, Patent of (Austria, 1781) 信仰自由令(奥地利, 1781年), 29
 Tomislav 托米斯拉夫, 克罗地亚英雄, 19
 trade treaties 贸易条约; 德国与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签订, 214—5, 228
 trade unions, in Yugoslavia 南斯拉夫人的工会, 176

- Transylvania (Siebenburgen) 特兰西瓦尼亚(七座堡垒), 11-12, 29, 61; 罗马尼亚人, 11, 12, 61, 75, 104; 东仪天主教会, 28; 境内的匈牙利战争, 62; 被奥匈协议承认为匈牙利领土, 73, 75; 在匈牙利统治下, 97, 98; 罗马尼亚的要求, 126; 被应允给予罗马尼亚(1916年), 132; 匈牙利人企图保卫, 161; 归属罗马尼亚(1920年), 163; 马扎尔少数民族, 183, 199, 248, 318; 匈牙利的要求, 247; 维也纳裁决书规定一部分归属匈牙利(1938年), 248; 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关系紧张, 261; 与苏联的未来, 278, 280; 归属罗马尼亚(1946年), 293
- Transylvanian Alps 特兰西瓦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 9
- Trianon, peace treaty signed with Hungary at (1920) 与匈牙利签订的特里亚农和约(1920年), 150, 160, 163, 172; 希望修订, 203; 恢复规定的国界, 293
- Trieste 的里雅斯特; 被应允归属意大利(1915年), 125; 南斯拉夫的要求, 165-6; 293; 英军攻占, 283, 293; 讨论问题, 293-4
- Tripartite Pact(1940) 三国公约(1940年), 244, 251, 259, 260
- "Triple Loyalty", policy of, in Poland 波兰的“三忠于”政策, 92-3
- Trnovo constitution, Bulgaria 特尔诺沃宪法, 保加利亚, 1879年, 88
- Trotsky, Leon 利昂·托洛茨基, 139
- Truman, President 杜鲁门总统; 出席波茨坦会议, 290
- Trumbić, Ante 安特·特鲁姆比奇, 斯普利特市长, 南斯拉夫理想的倡导者, 100, 101, 125, 324 任南斯拉夫委员会主席, 131, 147; 与科孚协定, 136-7, 147; 任外交大臣, 148, 149, 出席巴黎和会(1919年), 153, 166
- Tsankov, Prof. Alexander 亚历山大·桑科夫教授, 保加利亚首相, 201
- Tuka, Monseigneur 杜卡阁下, 斯洛伐克的分离主义分子, 188
- Tukhachevsky, Marshal 图卡切夫斯基元帅, 俄国侵波司令, 170; 1938年清洗的受害者, 233
- Turkey Ottoman Empire 土耳其(奥斯曼帝国), 20, 21, 26, 79; 镇压塞尔维亚起义, 31-5; 与俄国交战, 20, 38, 83-7, 88; 与希腊争取独立的斗争, 35-8; 镇压保加利亚起义(1876年), 83, 84; 镇压马其顿动乱(1902年), 105-6;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 111; 与意大利交战(1911年), 113; 反对土耳其的巴尔干战争(1912年), 114-5; 在1914-18年战争中, 128, 129, 在穆德罗斯签订停战协定, 143; 和约(1920年), 150; 基马尔主义革命; 希腊人被逐出, 169; 在巴尔干协约国中, 215, 238; 在1939-45年战争中, 246, 249, 271; 在塞浦路斯问题上与希腊的关系, 335
- Turks 土耳其人, 6, 9, 16; 在莫哈奇击败马扎尔人(1526年), 8, 19; 和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1389年), 19; 阿尔巴尼亚人吸收其文化, 18; 其奥斯曼帝国, 20
- typhus epidemic, in Serbia 在塞尔维亚斑疹伤寒流行, 122, 129
- Tyrol, South 南蒂罗尔, 125, 228
- Ukraine 乌克兰, 13, 43; 德军进入(1918年), 137, 并宣布为独立国, 138; 被罗马尼亚兼并西南部(1941年), 260; 被红军解放(1943年), 275
- Ukra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UWO) 乌克兰解放组织, 196
- Ukrainian National Council 乌克兰民族委员会, 144
- Ukrainians 乌克兰人; 在波兰, 4, 92, 170, 196; 在罗马尼亚, 12, 164, 199; 在苏联国境以外, 171; (参见Ruthenes条)
- Ulbricht, Walter 瓦尔特·乌布利希, 东德政府首脑, 321-2
- Ulcinj 乌尔齐尼; 被门的内哥罗占领(1880年), 88

unemployment 失业情况;在德国,211;
在波兰,339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纳吉·伊姆雷
的呼吁,331;和南斯拉夫,335;拉帕茨
基的建议,339—40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利坚合
众国;波兰难民,44;传教士被保加利亚
人绑架,106;参战抗击德国,136;与捷
克斯洛伐克,140—1;参加巴黎和会,
151,152;对波兰贷款,195,对匈牙利贷
款,203;经济危机(1929年),195,203,
207;与南斯拉夫接触,251;保加利亚
宣战,260;军队在意大利,273;拒绝与
罗马尼亚单独媾和,277;谣传军队在匈
牙利空降,278—9;澳裡邱吉尔控制多
瑙河中游的计划,281;军队抵达莱茵,
287;承认罗马尼亚政府(1946年),300
撤销对波兰的援助(1946年),306

Ustaše (Rebels) 乌斯塔沙分子(反
叛者),克罗地亚党派,193;墨索里尼鼓
励,209,213,249;与马其顿内部革命组
织之间的谅解,209;与南斯拉夫亚历山
大王被暗杀,217;统治下的克罗地亚
王国,254,263—4;协助德军打击游击
队,272

Užhorod, Ruthenia^① 罗塞尼亚的乌日
哥罗德;飞机场,223;归属匈牙利,235

Uzice, Yugoslavia 乌日采,南斯拉夫;
共产党人,176;游击队被迫撤离(1941
年),272

Vaida-Voevod, Alexander 亚历山大·
瓦伊达-沃伊沃德,罗马尼亚民族党领
袖,197

Varna 瓦尔纳,黑海港口,11,79;英军
登陆(1854年),65;更名为“斯大林”,
321

Vatican Council 梵蒂冈会议;斯特罗
斯迈尔出席,76

Velchev, Col. Damian 达米安·维尔

切夫上校,保加利亚军官联盟首脑,
205,216,225;以祖国阵线名义夺取政
权(1944年),284,296;任驻伯尔尼公
使,298

Veles, Bulgarian bishopric of 佛累斯
的保加利亚主教区,105

Venetia 威尼提亚;被奥地利兼并,27;
起义,53

Venetian Republic 威尼斯共和国;承
认匈牙利(1949年),63

Venice 威尼斯;与达尔马提亚,16;法西
斯初期组织(1919年),166

Venizelos, Eleutherios 厄琉特里俄斯·
维尼齐洛斯,希腊首相,114,128;在巴
黎和会遇刺受伤(1919年),154;“大希
腊”理想,168;在选举中失败,169

Veress, General Lajos 韦赖斯·洛约什
将军;据说是匈牙利阴谋叛乱分子,304

Versailles 凡尔赛;对条约的签订(1919
年)150

Vesnić, Milenko 米兰科·维斯尼奇,
塞尔维亚驻巴黎公使,153—4

Via Egnatia 厄格那夏大路 15,105

Vidin, Danube Port 维丁,多瑙河港
口,168

Vienna 维也纳;土耳其军队被击溃
(1683年),20,21;拿破仑,21—2;会议
(1814—15年),23—7,150;动乱(1848
年),51,53;第二次起义(1848年),57,
62;贫民窟,71;议会内的混乱,96;国际
博览会(1873年),97;法军进军(1918
年),143;共产党人,176;信贷银行破产
(1931年),207,208,211;纳粹组织的暴
动流产(1934年),214;苏军进入(1945
年),288

Vienna Awards to Hungary 解决匈
牙利问题的维也纳裁决书第一号(1938
年),235;第二号(1940年),248;罗马尼
亚希望修订,261,280,347

Világos 维拉戈斯,匈牙利人投降(1849

① 原文有误,应为Uzhgorod。——译者

- 年), 63
- Villach 菲拉赫; 南斯拉夫人的要求, 165
- Vilna(Wilno) 维尔纳, 4; 大学, 42, 45; 波兰从立陶宛手中夺取(1918年), 170, 171; 波兰与立陶宛因争夺而对抗, 185; 被苏联占领并割让予立陶宛(1934年), 246; 犹太人起义(1943年), 267; 波兰人的要求, 277
- Vis island 维斯岛, 游击队活动中心, 281
- Vistula river 维斯杜拉河, 波兰民族的轴心, 1—2, 128, 282, 287
- Vittorio Veneto 维托里奥·威尼托; 意军获胜(1918年), 143
- Vlachs 弗拉几人; 在马其顿, 105
- Vladaya, Bu'lgaria 弗拉达亚, 保加利亚; 内战中的战争(1918年), 144
- Vladimirescu, Tudar 图多尔·弗拉迪米雷斯库, 瓦拉几亚领袖, 36
- Vlahov, Dimitar 迪米特尔·弗拉霍夫, 南斯拉夫副总理, 312
- Vlonë (Valona) Albania 发罗拉, 阿尔巴尼亚; 成为苏联红军海军基地, 315
- Vodnik, Fr Valentin 瓦伦丁·沃德尼克神父; 与斯洛文尼亚语言, 29, 30
- Vojvodina region 伏伊伏丁那地区, 8; 是塞尔维亚的文化中心, 30—1, 34, 56; 塞尔维亚人逃亡到, 33; 匈牙利战争, 62; 在1918年, 147; 归属南斯拉夫(1920年), 163, 164; 马扎尔少数民族, 165, 190, 335; 在瓜分南斯拉夫过程中(1941年), 254, 256
- Volga 伏尔加河; 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的挺进(1942年), 262
- Volkov, Ivan 伊凡·沃尔科夫,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 204, 205
- Vološin, Fr 沃洛申神父, 罗塞尼亚领袖, 235, 241
- Aoronezh 沃罗涅日; 匈牙利军队受挫(1943年), 262
- Vövös, General János 弗夫什·亚诺什将军, 匈牙利临时政府国防部长(1944年), 302
- Voroshilov, Marshal 伏罗希洛夫元帅, 苏军抗德将领, 258; 任设在匈牙利的盟军管制委员会首脑, 302
- Voulgaris, Archbishop of Kherson 赫尔松的沃尔加里斯大主教, 35
- Vysinsky, A. A. 维辛斯基,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298
- Vyx, Col. 维克斯上校, 驻布达佩斯的法国统帅部代表, 160
- Wachock 瓦霍克; 波兰起义根据地(1863年), 68
- Wallachia 瓦拉几亚 (参见 Danubian Principalities 条)
- Warsaw 华沙, 2, 44, 45, 60, 67; 拿破仑的大公爵领地, 22, 24; 沙皇尼古拉一世加冕, 42; 落入德军手中(1915年), 127; 苏联公使被暗杀(1927年), 195; 德军轰炸(1939年), 245; 波兰人据守, 245; 犹太人的起义和抵抗运动(1943年), 267; 国家军起义(1944年), 268, 282—3; 学生骚动(1968年), 337
- Warsaw Pact 华沙条约; 成因, 291; 签订(1955年), 325; 与南斯拉夫国家的关系, 336; 阿尔巴尼亚退出(1968年), 336; 与罗马尼亚, 345; 军队在捷克斯洛伐克演习, 354; 军队威胁, 并对捷克斯洛伐克进行干涉, 354; 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355
- Warsaw State Council 华沙国家委员会; 为德奥倡建的波兰政府之前身(1917年), 135
- Warta river 瓦尔塔河, 2, 123
- Wenczias, st 圣文采斯拉斯, 波希米亚国王, 5
- White Mountain, battle of 白山之战(1620年), 19, 20
- White Russians, in Poland 波兰的白俄罗斯人, 4, 170
- Wielopolski, Alexander 亚历山大·维洛波尔斯基, 俄国派驻波兰的专员,

William I 威廉二世, 德国皇帝, 115
 Wilson, President 威尔逊总统, 126, 131, 139; 与马萨利克, 140; 发表的见解受到尊重, 144; 参加巴黎和会, 150—1, 152, 153, 166; 与秘密条约, 155; 同情保加利亚, 168; 未能再次当选, 167
 Windischgraetz, Prince 温狄什格莱兹亲王, 奥地利将军, 58, 62
 Witos, Wincenty 文岑蒂·维托斯, 波兰农民党领袖, 194; 被捕, 200; 去世, 305
 Wojciechowski, Stanislas 斯坦尼斯拉夫·沃伊齐霍夫斯基, 波兰合作运动领袖, 总统, 195
 Wyzynski, Cardinal 维辛斯基红衣主教, 波兰总主教, 320, 337—338
 Wyzwolenie Party 解放党; 要求进行土地改革, 178
 Xoxe, Koci 科奇·佐治, 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 被处决, 316
 Yalta 雅尔塔; 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举行会议(1945年), 287
 Young Bosnians 青年波斯尼亚党人, 113, 117, 176
 Young Czech party 青年捷克人党, 95, 96, 120
 Young Turk revolutions 青年土耳其党革命(1908年), 111
 Ypsilanti, Demetrius 季米特里乌斯·伊普西兰梯, 希腊将领, 37
 Ypsilanti, Alexander 亚历山大·伊普西兰梯, 法纳尔希腊人将军, 36, 40
 Yugoslav National Committee 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 131, 140, 147; 与塞尔维亚人签订科孚协定(1917年) 130, 189; 奥匈帝国舰队投降(1918年), 148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9, 13, 14, 17, 18; 是一个创造的新词, 30—1; 理想, 100, 124—5; 和黑手党, 113; 疆界, 165—8; 少数民族, 171, 189; 九个民族, 173; 政

党, 174; 土地改革, 175; 社会进步, 176; 共产党党人, 176, 193, 270—1, 272, 295; 取缔共产党的“诏书”, 176; 和捷克的防御同盟, 180; 罗马尼亚加入捷、南防御同盟, 180—1; 与法国订立条约, 181; 与意大利订立条约, 182; 与苏联, 184; 国内政策, 189—94; 正式成为国家名称, 193; 出席农业会议, 208; 向右转, 209—10; 与德国签订贸易条约(1934年), 214, 246; 设法与德国达成谅解(1936年), 220; 与保加利亚、意大利订立条约(1937年), 220; 与捷克的灭亡, 233; 向联邦制迈进, 239—40; 与意大利, 249—50; 与匈牙利订立互不侵犯条约, 250; 与苏联订立互不侵犯条约(1941年), 255; 德国入侵并瓜分(1941年), 251—4; 流亡政府, 270; 抵抗运动, 270, 271—3; 为谋求民族解放的反法西斯会议, 272, 273; 苏联红军进入并与游击队取得联系(1944年), 285; 未来, 287; 在和约中, 293; 联合政府, 296; 支持苏联的政策, 310—11; 共产党政府, 311—312; 与保加利亚在马其顿问题上的关系, 312—3, 336; 344; 与苏联决裂, 313—4; 变化, 333—5; 外交政策, 335—6

Yugov, Anton 安东·于哥夫, 保加利亚总理, 328, 342, 343

Zadar (Zara), Dalmatia 扎达尔(扎拉), 达尔马提亚 16, 167, 293

Zagreb 萨格勒布, 克罗地亚首府, 16, 54, 75; 文化发展, 76; 发生反匈示威游行, 99; 南斯拉夫民族委员会, 147; 共产党人, 176; 被贝尔格莱德取代成为贸易中心, 191; 清真寺, 264

Zaimov, General 扎伊莫夫将军; 据称是活动在保加利亚的苏联特务, 275

Zamoysky, Count A. A. 扎莫伊斯基伯爵, 波兰地主领袖, 68

Zapotecky, Antonin 安托宁·萨波托茨基,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人, 307; 任总理, 310; 任总统, 322, 347

Zeligowski, General 泽利戈夫斯基 将军;为波兰人攻占维尔纳(1920年), 170
Zhivkov, Todor 托多尔·日夫科夫, 保加利亚共产党书记, 323, 328, 342, 343
Zhukov, Marshal, of Red Army 苏联红军朱可夫元帅, 287, 288
Zivnostenska, Banka 齐夫诺斯滕卡银行, 捷克的第一所银行, 79
Zog 索古, 阿尔巴尼亚国王, 242, 271,

315

Zois(Cojz), Baron 佐伊斯男爵, 研究斯洛文尼亚民间传说的学者, 29
Zollverein 关税同盟; 南斯拉夫组成的可能性, 110
Zveno('The Chain') 兹维诺(“环节”), 保加利亚右翼集团, 216, 225, 284
Zymierski, General 齐米尔斯基将军, 波兰陆军部长;被免职, 317